

## 编者的话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称《选编》）是一部从我们所搜集到的有关苏联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原始档案资料选编而成的大型文献集。

自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来，俄国陆续解密并公布了苏联时期自1917年十月革命至1991年底70余年间大量历史档案，引起国际理论界和史学界的极大关注。我国史学界对这些档案材料也极为重视，尽其所能地展开了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成立《选编》课题组并于同年8月将《选编》作为院“九五”重点研究课题正式立项。项目开展以来，一直受到各方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为了能尽快翻译、出版，1998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进一步加强了对课题组的领导，同时加大了资助力度。几年来，课题组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收集各国有关俄国解密档案的文献专集和杂志、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苏联的历史档案，并分赴俄国、美国、德国、荷兰等有关国家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俄国解密的原始档案；组织大批翻译力量，将其中的万

余件档案译成中文；编委会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校对、注释、编辑，加工成为数百项专题并分别编成34卷（包括总目录1卷），总计近2000万字。现在，这一对于研究世界近现代史、研究苏联兴亡史、研究俄罗斯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课题终于结项。

历史档案是记录历史事实的文字材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资料。然而某一件档案材料是否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事实”，是需要研究者从多方面加以判断的。因而不可认为凡是档案记录的，都是历史事实。正如马克思早在《神圣家族》中所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sup>①</sup>。记录历史档案、保管历史档案，乃至解密公布历史档案，都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也就是说，都是为一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其他目的服务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档案材料也是如此。它们形成于苏联历史中各个不同时期，出自于不同人之手，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甚至往往还出现关于同一件事而说法迥然不同的材料；再者，哪些材料应该公布，哪些材料不应该公布，也都取决于档案持有者的某种需要。俄罗斯解密并公布苏联时期部分历史档案也是如此。苏联解体后，俄国档案管理虽在法律上规定逐步向社会开放，但在实际操作上依然服从于一定政治目的。叶利钦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18~119页。

为对前苏联共产党官员进行审判提供证据，向宪法法院提交了大量没有达到解密期限的文件；为调整与某些国家关系开放了大量涉外事件的文件；俄国国内的大小刊物在追求一定政治经济利益的背景之下，争相刊登从多种渠道获取的档案文件。因此，我们现在所编纂的这些档案资料的价值还有待于研究者去判断。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史料进行考证、探寻、对比、分析，才有可能获得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

值此《选编》问世之际，编委会深感本书年代跨度之大，涉及方面之广，造成编译上巨大困难。工作中我们力求坚持严谨作风，译文力求严格忠实于原文，体例力求清晰，便于查阅，编者注释只在于辅助说明事件、人物等方面的背景。虽然如此，疏漏和错误之处仍然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选编》的出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在此，我们谨致诚挚的谢意！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辑委员会

2001年12月

## 体例说明

一、《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简称《选编》)共34卷(包括总目录卷1卷),收入自80年代末以来前苏联和俄国解密的历史档案文献10000余件,文献上限为1917年初,下限至90年代初。

二、本《选编》所收入的文献主要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经济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等,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有些选自已经出版的各种档案文献集和专业杂志(包括少量的英文刊物),还有些是国外学界同仁赠与的。

三、本《选编》大体上按时间顺序分卷,每卷分若干专题,各个专题内的档案文献按时间顺序编排。最后一卷为全书总目录卷,总目录按全部所选文献的时间顺序编排,并标注卷次和页码。为便于读者查阅,同时编有全书专题的总目录。

四、本《选编》专题名称、专题说明、文献标题、文献日期、注释均为编者所加，个别标题是原有的。档案原件中有批注或划线的地方，凡能辨识者均予以保留或加注说明。

五、文件所标的档案编号只是为便于核查原文由编者所加的收藏编号。

六、凡人名、地名、书报刊名、组织机构名称及专门用语等，均参照以下工具书翻译：《列宁著作译名汇编》、《苏联百科词典》、《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俄语姓名译名手册》（新华社编）等。必要时采取音译和或加注说明。

## 本卷前言

本卷苏联历史档案共有 9 个专题。

“战前苏联的文学战线”专题收录了 1932 年 4 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改组艺术团体的决定，政治局关于苏联作家协会的决定，组织局关于文学杂志编辑工作的决定以及有关这一决定的执行情况，政治局和书记处关于演出剧目问题的决定，中央宣传鼓动部关于文学评论和图书评介工作的报告等，以及反映一系列作家及其作品在这一时期的命运、作家对书刊检查制度的微弱抗议的文件。

“战时苏联的文学战线”专题收录的文件概括地反映了战时苏联文学的基本状况和处境。其中有 1943 年 12 月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关于对文学杂志的监督》的决定、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关于对图书出版的监督情况的报告等政策性文件，关于战时苏联作家协会及其领导人的活动的文件，关于多夫任科、左琴科、谢尔文斯基等一系列作家及其作品的命运和某些作家得到当局支持帮助的文件。这些材料有助于了解联共（布）领导人以及中央机关管理文学的机制和方式。

“战后苏联的文学战线”专题涉及的主要问题有：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及其下属的文学部对苏联作家思想情绪的分析和报告；对一些作家及其作品的审查、批判和斗争；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事件的原因、过程和结果等。该专题反映了联共（布）中央意识形态部门和苏联领导人对战后苏联文学的监督和控制。

“关于建立柴可夫斯基纪念碑的问题”与“斯大林谈电影《伊凡雷

帝》”两个专题收录的文件反映了斯大林对电影《伊凡雷帝》的看法和围绕建造柴可夫斯基纪念碑所经历的十余年曲折。文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苏联领导人对于艺术问题的关注、他们的见解以及干预方式。

“《苏联大百科全书》等著作的出版”专题主要涉及《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编撰出版过程中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苏共中央书记处对历史研究所的关注”专题主要涉及苏共中央对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工作和干部安排，这两个专题所收录的文件反映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对历史学的直接干预。

“《历史档案》杂志的命运”收录了自1953年至1962年间有关《历史档案》杂志的创办、编辑出版、被停刊的档案材料。这些有关《历史档案》命运的文件表明了苏共中央书记处和意识形态部门对杂志的工作方向以及具体事务的监督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解冻”时期苏共意识形态政策的特点。

“图哈切夫斯基与‘法西斯军事阴谋案’”专题收录了伏罗希洛夫在联共（布）1937年2~3月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和1964年苏共中央特别委员会对图哈切夫斯基案的复查报告这两个文件。前一个文件反映了当时苏联国内的政治气氛并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图哈切夫斯基难逃厄运，后一个文件则全面揭示了这一所谓“案件”炮制出笼的真相。

“朱可夫元帅的命运”专题收录的文件主要反映了朱可夫元帅在卫国战争结束后的遭遇，国家安全机关采取各种手段对朱可夫进行调查并试图制造朱可夫策划军事阴谋的假案的情况，以及1957年朱可夫因被认为有“波拿巴主义”企图而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后，其言行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严密监视的情况等以往不为人知的事实和内幕。

姚海

2001年2月

# 目 录

本卷前言 ..... 13-1

## 战前苏联的文学战线

(1932年4月至1941年5月)

专题说明 ..... 13-1

№0214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改组文艺团体》  
的决定(1932年4月23日) ..... 13-2

№02150 格隆斯基关于作家对文艺团体改组的态度致  
联共(布)中央的报告  
(不晚于1933年6月) ..... 13-4

№02151 日丹诺夫关于作家代表大会情况致斯大林的报告  
(草稿)(1934年8月28日) ..... 13-10

№02152 谢尔巴科夫关于沙吉尼扬问题致高尔基的信  
(1936年2月28日) ..... 13-12

№02153 皮利尼亚克关于对其作品的批判问题致  
米高扬的信(1936年5月25日) ..... 13-15

№02154 安加罗夫、基尔波京关于作协理事会党组  
会议情况致联共(布)中央的报告  
(1936年8月29日) ..... 13-17

- №02155** 安加罗夫关于格隆斯基问题致联共（布）  
中央的报告（1937年3月27日）…………… 13-24
- №0215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谢尔文斯基  
剧本的决定（1937年4月21日）…………… 13-27
- №02157** 安加罗夫、塔马尔金关于作协理事会和书记处  
情况致联共（布）中央的信  
（1937年5月3日）…………… 13-28
- №02158** 沙布洛夫斯基关于作协领导机构问题致  
安德列耶夫的信（1937年12月17日）…………… 13-32
- №02159** 格拉西莫娃、卡拉瓦耶娃关于作协领导问题致  
安德列耶夫的信（1938年3月2日）…………… 13-34
- №02160** 沃伊廷斯卡娅关于作家协会有关情况致  
日丹诺夫的信（不晚于1938年3月15日）…………… 13-37
- №0216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乌里扬诺夫一家》  
的决定（1938年8月5日）…………… 13-43
- №02162** 联共（布）中央关于苏联作家协会工作的决定  
（草案）（1938年8月）…………… 13-45
- №02163** 法捷耶夫、巴甫连科关于奖励作家名单致  
安德列耶夫的信  
（不晚于1939年7月26日）…………… 13-49
- №02164** 安德列耶夫关于拟奖励作家问题致斯大林的报告  
（草稿）（不晚于1939年7月26日）…………… 13-50
- №02165**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关于《十月》杂志的决定  
（1939年8月4日）…………… 13-53
- №02166** 波斯佩洛夫关于文学杂志的编辑工作致联共（布）  
中央的报告（1939年8月19日）…………… 13-54
- №02167**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关于文学杂志的编辑  
工作的决定（1939年8月20日）…………… 13-58

- №02168** 波斯佩洛夫、波利卡尔波夫关于剧本《暴风雪》  
等问题致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0年8月30日) ..... 13-60
- №02169** 库兹涅佐夫关于《暴风雪》问题致联共(布)  
中央的报告(1940年8月30日) ..... 13-63
- №02170**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关于《开诚布公》等  
剧本的决定(1940年9月14日) ..... 13-65
- №0217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剧本《暴风雪》  
的决定(1940年9月18日) ..... 13-66
- №02172**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关于苏联作家协会文学  
基金会和保护著作权管理局基金会的决定  
(1940年9月21日) ..... 13-67
- №02173** 克鲁宾关于阿赫玛托娃的诗集致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0年9月25日) ..... 13-68
- №02174** 亚历山德罗夫、波利卡尔波夫关于《警告处分》  
致联共(布)中央的报告  
(1940年9月26日) ..... 13-74
- №02175** 阿谢耶夫关于作协理事会工作问题致  
日丹诺夫的信(1940年10月9日) ..... 13-77
- №02176** 亚历山德罗夫、波利卡尔波夫关于出版阿赫玛  
托娃诗集问题致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0年10月19日) ..... 13-79
- №02177**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关于出版阿赫玛托娃  
诗集的決定(1940年10月29日) ..... 13-81
- №02178** 亚历山德罗夫、普京关于文学评论和图书评介  
状况致联共(布)中央的报告  
(1940年11月18日) ..... 13-82

- №02179** 普京关于执行中央《关于文学杂志编辑工作》  
决议的情况致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1年3月10日) ..... 13-85
- №02180** 法捷耶夫关于魏列萨耶夫的文章致联共(布)  
中央的信(1941年5月7日) ..... 13-87

### 战时苏联的文学战线

(1941年9月至1945年4月)

- 专题说明** ..... 13-91
- №02181** 洛佐夫斯基关于法捷耶夫在情报局的工作状况致  
谢尔巴科夫的报告(1941年9月3日) ..... 13-92
- №02182**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关于给予法捷耶夫警告  
处分的决定(1941年9月21日) ..... 13-94
- №02183** 法捷耶夫关于擅自离开莫斯科问题致联共(布)  
中央的信(1941年12月13日) ..... 13-95
- №02184** 梅赫利斯关于法捷耶夫上前线问题致安德列  
耶夫的电报(1941年12月13日) ..... 13-98
- №02185** 马哈诺夫关于法捷耶夫的工作问题致安德列  
耶夫的报告(1941年12月15日) ..... 13-99
- №02186** 洛马金关于疏散到塔什干的作家情况致安德列  
耶夫的报告(1941年12月17日) ..... 13-100
- №02187** 亚历山德罗夫关于处理《文学和艺术报》的错误  
致谢尔巴科夫的报告(1942年6月2日) ..... 13-103
- №02188** 洛佐夫斯基关于小说《围困》致谢尔巴科夫的信  
(1942年5月19日) ..... 13-105

- №02189** 鲁宾施泰因关于法捷耶夫的表现致亚历山德罗夫的  
报告 (1943 年 7 月 1 日) ..... 13-107
- №02190** 亚历山德罗夫关于中篇小说《胜利》问题致  
谢尔巴科夫的报告 (1943 年 7 月 9 日) ..... 13-109
- №02191** 帕斯捷尔纳克关于自己的境遇致谢尔巴科夫的信  
(1943 年 7 月 16 日) ..... 13-113
- №02192** 亚历山德罗夫关于处理中篇小说《战火中的  
乌克兰》致谢尔巴科夫的报告  
(1943 年 11 月 22 日) ..... 13-115
- №02193** 联共 (布) 中央书记处关于谢尔文斯基创作中  
错误的决定 (草案)  
(不晚于 1943 年 11 月 26 日) ..... 13-116
- №02194** 左琴科关于《日出之前》一书致斯大林的信  
(1943 年 11 月 26 日) ..... 13-117
- №02195** 亚历山德罗夫关于诗集《雷鸣的年代》致  
谢尔巴科夫的报告 (1943 年 11 月 26 日) ..... 13-119
- №02196** 阿谢耶夫关于出版作品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43 年 12 月 2 日) ..... 13-126
- №02200** 亚历山德罗夫、普京、叶戈林关于《十月》等  
杂志问题致马林科夫的报告  
(1943 年 12 月 2 日) ..... 13-128
- №02197** 联共 (布) 中央书记处关于对文学杂志进行  
监督的决定 (1943 年 12 月 2 日) ..... 13-144
- №02198** 联共 (布) 中央书记处关于提高文学杂志责任  
书记的责任感的决定 (1943 年 12 月 3 日) ... 13-145
- №02199** 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关于《十月》杂志的决定  
(1943 年 12 月 22 日) ..... 13-147

- №02201** 左琴科关于《日出之前》一书致  
谢尔巴科夫的声明（1944年1月8日）…… 13-151
- №02202** 马哈诺夫关于批判左琴科致日丹诺夫的信  
（1944年1月11日）…… 13-152
- №02203** 谢尔巴科夫关于多夫任科问题给谢尔比纳的指示  
（1944年2月8日）…… 13-154
- №02204** 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撤消多夫任科  
职务的决定（1944年2月12日）…… 13-155
- №02205** 萨德奇科夫签发的关于禁止发表多夫任科  
作品的通告（1944年2月23日）…… 13-157
- №02206** 波利卡尔波夫关于作协理事会全体会议情况致  
马林科夫的报告（1944年2月23日）…… 13-158
- №02207** 关于电影故事《战火中的乌克兰》的批判发言  
（不晚于1944年2月26日）…… 13-162
- №02208** 洛佐夫斯基关于《围困》一书出版问题致  
日丹诺夫的报告（1944年3月7日）…… 13-175
- №02209** 楚科夫斯基关于童话《战胜巴尔玛列伊》致  
《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1944年3月14日）…… 13-177
- №02210** 费多谢耶夫关于长诗《俄罗斯》致  
谢尔巴科夫的信（1944年3月31日）…… 13-179
- №02211** 叶戈林、约夫丘克关于文学杂志《旗》的文章致  
谢尔巴科夫的投告（1944年4月4日）…… 13-180
- №02212** 帕斯捷尔纳克关于本人处境致谢尔巴科夫的信  
（1944年5月5日）…… 13-189

- №02213** 亚历山德罗夫、费多谢耶夫关于出版监督问题给谢尔巴科夫的报告（摘录）  
（1944年5月5日） ..... 13-192
- №02214** 亚历山德罗夫关于出版帕斯捷尔纳克作品问题致谢尔巴科夫的报告（1944年6月24日） ..... 13-196
- №02215**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关于《日出之前》等问题与左琴科的谈话情况  
（1944年7月25日） ..... 13-197
- №02216** 亚历山德罗夫等关于文学杂志《旗》的问题致马林科夫的报告（1944年8月7日） ..... 13-204
- №02217** 联共（布）中央关于《旗》编委会成员的決定  
（1944年8月23日） ..... 13-210
- №02218** 亚历山德罗夫、费多谢耶夫关于《旗》发表的作品问题致谢尔巴科夫的报告  
（1944年10月18日） ..... 13-211
- №02219** 伊万诺夫关于《围困》的出版问题致日丹诺夫的报告（1944年11月20日） ..... 13-216
- №02220** 吉洪诺夫、波利卡尔波夫关于调整作协领导机构问题致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的报告  
（1945年1月9日） ..... 13-218
- №02221** 波利卡尔波夫关于发表英贝尔的作品致《旗》编委会的信（1945年2月9日） ..... 13-220
- №02222** 塔拉先科夫关于《旗》的编辑出版问题致日丹诺夫的报告（1945年2月22日） ..... 13-224
- №02223** 爱伦堡关于在《真理报》受到批评致斯大林的信  
（1945年4月15日） ..... 13-228

## 战后苏联的文学战线

(1945年7月至1946年10月)

- 专题说明..... 13-230
- №02224** 吉洪诺夫、波利卡尔波夫关于更换《十月》杂志  
主编致马林科夫、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5年7月12日) ..... 13-231
- №02225** 尤诺维奇关于《十月》编委会工作致  
日丹诺夫的信(1945年7月14日) ..... 13-233
- №02226** 叶戈林关于战时苏联文学状况致马林科夫的报告  
(1945年8月3日) ..... 13-237
- №02227** 利科文科夫关于沙吉尼扬的言论致波波夫的报告  
(1945年8月23日) ..... 13-254
- №02228** 亚历山德罗夫、叶戈林关于沙吉尼扬在作协党  
组织会议上的发言致马林科夫的报告  
(不早于1945年8月23日) ..... 13-257
- №02229** 列兹尼克关于文学评论问题致马林科夫的信  
(1945年12月1日) ..... 13-260
- №02230** 波利卡尔波夫关于潘诺娃作品发表问题致《旗》  
编委会的信(1945年12月24日) ..... 13-271
- №02231** 塔拉先科夫关于作协领导人的工作作风问题致  
马林科夫的信(1946年3月19日) ..... 13-272
- №02232** 马斯林关于作协党组讨论文学批评的情况致马林  
科夫的报告(1946年4月2日) ..... 13-276

- №02233** 亚历山德罗夫关于潘菲洛夫的文章致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6年4月30日) ..... 13-279
- №02234** 亚历山德罗夫、叶戈林关于《星》和《列宁格勒》的问题致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6年8月7日) ..... 13-282
- №02235**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讨论《星》和《列宁格勒》问题的会议速记记录 (1946年8月9日) ..... 13-291
- №02236** 阿巴库莫夫关于左琴科问题致库兹涅佐夫的报告 (1946年8月10日) ..... 13-314
- №02237** 谢尔巴科夫关于左琴科短篇小说集致库兹涅佐夫的报告 (1946年8月12日) ..... 13-318
- №02238** 叶戈林关于左琴科背景材料致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6年8月14日) ..... 13-320
- №02239**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 (1946年8月14日) ..... 13-322
- №02240** 叶戈林关于左琴科情况的简要报告 (不晚于1946年8月15日) ..... 13-327
- №02241** 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作家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不晚于1946年8月16日) ..... 13-329
- №02242** 左琴科关于个人情况致斯大林的信 (1946年8月27日) ..... 13-334
- №02243** 波诺马廖夫关于回击国外报刊致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6年9月21日) ..... 13-337
- №02244** 维什涅夫斯基给《新群众》的答记者问(草稿) (不晚于1946年9月21日) ..... 13-339
- №02245** 亚历山德罗夫关于发表维什涅夫斯基的文章致日丹诺夫的报告 (不早于1946年9月21日) ..... 13-346

- №02246** 费多谢耶夫关于文艺界对日丹诺夫报告的反应给日丹诺夫的材料 (1946年9月25日) ..... 13-347
- №02247** 莫斯科市委关于文艺工作者对日丹诺夫报告的意见的通报 (1946年9月28日) ..... 13-352
- №02248** 左琴科关于如何看待其作品致日丹诺夫的信 (1946年10月10日) ..... 13-363
- №02249** 阿巴库莫夫关于驻德苏军对日丹诺夫报告反应致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6年10月23日) ..... 13-365

### 关于建立柴可夫斯基纪念碑的问题

(1940年5月至1954年月)

- 专题说明**..... 13-368
- №0623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纪念柴可夫斯基百年诞辰活动的决定 (1940年5月5日) ..... 13-369
- №06233** 穆欣娜关于纪念碑竖立问题致斯大林的信 (1951年3月14日) ..... 13-371
- №06234** 穆欣娜关于纪念碑方案致斯大林的信 (1952年3月5日) ..... 13-374
- №06235** 克鲁日科夫关于重新设计纪念碑方案给波斯克列贝舍夫的报告 (1952年3月10日) ..... 13-376
- №06236** 穆欣娜关于造型艺术等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53年9月26日) ..... 13-381
- №06237**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建造柴可夫斯基纪念碑的决定 (1954年6月10日) ..... 13-383

## 斯大林谈电影《伊凡雷帝》

(1947年2月)

- 专题说明..... 13 - 385
- No06448 斯大林与电影《伊凡雷帝》创作人员的谈话记录  
(1947年2月25日) ..... 13 - 386

## 《苏联大百科全书》等著作的出版

(1949年7月至1953年10月)

- 专题说明..... 13 - 393
- No01555 斯大林关于《苏联大百科全书》问题与瓦维  
洛夫的谈话(1949年7月19日) ..... 13 - 394
- No01556 斯捷潘诺夫和福米乔夫关于大百科词条篇幅致  
米哈伊洛夫的便函(1953年1月10日) ..... 13 - 398
- No01559 韦坚斯基关于大百科全书编辑问题致  
赫鲁晓夫的信(1953年3月21日) ..... 13 - 400
- No01561 斯捷潘诺夫等关于大百科全书词条篇幅致  
波斯佩洛夫的报告(1953年4月9日) ..... 13 - 402
- No01562 波斯佩洛夫关于大百科全书词条篇幅致  
赫鲁晓夫的报告(1953年4月14日) ..... 13 - 404
- No01564 莫斯科夫斯基、沃龙佐夫关于大百科全书词条致  
波斯佩洛夫的报告(1953年4月22日) ..... 13 - 406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13卷

- №01565** 韦坚斯基关于大百科全书词条篇幅致赫鲁晓夫的信  
(1953年4月24日) ..... 13-417
- №01567** 沃龙佐夫和克鲁日科夫关于压缩大百科全书词条  
篇幅致波斯佩洛夫的报告  
(1953年5月7日) ..... 13-418
- №01568** 韦坚斯基关于大百科全书所配照片问题致  
波斯佩洛夫的信(1953年5月14日) ..... 13-419
- №01569** 韦坚斯基关于大百科全书所配照片问题致  
苏斯洛夫的信(1953年5月22日) ..... 13-420
- №01570** 莫斯科夫斯基、沃龙佐夫关于大百科全书所配  
照片问题致波斯佩洛夫的报告  
(1953年5月25日) ..... 13-421
- №01571** 莫斯科夫斯基、沃龙佐夫关于《简明教程》  
词条的问题致波斯佩洛夫的报告  
(1953年6月16日) ..... 13-422
- №01572** 沃龙佐夫、博戈柳博夫关于《简明教程》词条的  
问题致莫斯科夫斯基的报告  
(不早于1953年6月16日) ..... 13-423
- №01573** 别利亚科夫关于大百科全书照片问题致苏斯洛夫  
秘书处的报告(1953年6月17日) ..... 13-424
- №01574** 兹沃雷金关于《简明教程》词条致莫斯科夫  
斯基的信(1953年6月26日) ..... 13-425
- №01576** 莫斯科夫斯基和普图什金关于《简明教程》词条  
致苏共中央书记处总务部的报告  
(1953年7月8日) ..... 13-426

- №01578** 梅利尼科夫等关于《希特勒的将军们为美国服务》一书出版问题致马林科夫的信  
(1953年8月12日) ..... 13-427
- №01579** 莫斯科夫斯基等关于《希特勒的将军们为美国服务》一书出版问题致苏共中央书记处总务部的报告  
(1953年9月11日) ..... 13-429
- №01580** 韦坚斯基关于词条《列宁和斯大林的陵墓》致波斯佩洛夫的信(1953年10月20日) ..... 13-431
- №01581** 克鲁日科夫等关于词条《列宁和斯大林的陵墓》致苏斯洛夫的报告(1953年10月22日) ..... 13-432

### 苏共中央书记处对历史研究所的关注

(1953年2--7月)

- 专题说明**..... 13-433
- №01557** 潘克拉托娃和西多罗夫关于历史所工作致苏斯洛夫和鲁缅采夫的信(1953年2月17日) ... 13-434
- №01558** 涅斯梅亚诺夫和托普契耶夫关于历史所问题致苏斯洛夫的信(1953年3月21日) ..... 13-437
- №01560** 邦契-布鲁耶维奇关于历史所机构变动问题致赫鲁晓夫的信(1953年4月5日) ..... 13-440
- №01563** 鲁缅采夫和利霍拉特关于历史所机构问题致波斯佩洛夫的报告(1953年4月15日) ..... 13-442
- №01566** 鲁缅采夫等关于加强历史所领导力量致苏斯洛夫的报告(1953年4月30日) ..... 13-444

- No01575 西多罗夫关于历史所任务致波斯佩洛夫的信  
(1953年7月4日) ..... 13-446
- No01577 赫鲁斯托夫等关于历史所的问题致波斯佩  
洛夫的报告(1953年7月29日) ..... 13-450

### 《历史档案》杂志的命运

(1953年10月至1962年11月)

- 专题说明..... 13-452
- No01582 克鲁格洛夫关于创办《苏联档案》杂志给波斯佩  
洛夫的报告(1953年10月28日) ..... 13-453
- No01583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关于出版《历史档案》的决议  
(摘录)(1953年12月11日) ..... 13-455
- No01584 克鲁日科夫和鲁缅采夫给波斯佩洛夫的报告  
(1953年12月15日) ..... 13-456
- No04043 苏联内务部中央档案管理局等部门关于创办  
《历史档案》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4年2月29日) ..... 13-458
- No04044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关于同意出版《历史档案》  
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54年4月26日) ..... 13-461
- No04045 苏共中央科学与文化部和宣传鼓动部关于出版  
《历史档案》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4年4月30日) ..... 13-462
- No04046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出版《历史档案》  
杂志的决定(1954年5月15日) ..... 13-464

- No04047** 谢佩列娃关于“库班游击队运动”文献专辑致  
苏共中央的报告（1957年7月9日） ..... 13-465
- No04048** 苏共中央科学、高校和中小学部关于“库班游击队  
运动”文献专辑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7年7月23日） ..... 13-467
- No04049**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历史档案》杂志的决定  
（1957年8月2日） ..... 13-469
- No04050** 《历史档案》杂志关于发表列宁的新材料致苏共  
中央的信（不晚于1958年11月4日） ..... 13-470
- No04051** 苏共中央对加盟共和国宣传鼓动部关于发表  
列宁的新材料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8年11月4日） ..... 13-471
- No04052** 苏共中央意识形态、文化和国际政党联络事务  
委员会关于发表列宁的新材料的决定  
（1958年11月19日） ..... 13-472
- No04053** 苏共中央科学、高校和中小学部关于更换  
《历史档案》主编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0年5月11日） ..... 13-473
- No04054**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更换《历史档案》主编的决定  
（1960年5月17日） ..... 13-475
- No04055** 苏共中央意识形态、文化和国际政党联络事务  
委员会关于审查亏损的历史杂志的决定  
（1961年1月4日） ..... 13-476
- No04056**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关于减少苏联科学院各历史  
杂志的亏损问题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1年3月3日） ..... 13-477
- No04057**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历史类杂志的决定  
（1961年5月16日） ..... 13-479

- №04058** 斯塔索娃关于保留《历史档案》致苏斯洛夫的信  
(1961年7月1日) ..... 13-480
- №04059** 萨莫鲁科夫关于保留《历史档案》致苏斯  
洛夫的信(1961年7月6日) ..... 13-481
- №04060** 赫沃斯托夫等关于保留《历史档案》致苏斯  
洛夫的信(1961年7月6日) ..... 13-483
- №04061** 苏共中央科学、高校和中小学部关于继续出版  
《历史档案》的报告(1961年12月28日) ... 13-485
- №04062**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继续出版《历史档案》  
杂志的决定(1962年1月4日) ..... 13-487
- №04063** 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关于《历史档案》的错误  
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2年11月4日) ..... 13-488
- №04064**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历史档案》杂志的  
错误的决定(草案)  
(不晚于1962年11月4日) ..... 13-490
- №04065**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历史档案》停刊的决定  
(1962年11月12日) ..... 13-491

## 图哈切夫斯基与“法西斯军事阴谋案”

(1937年2月至1964年6月)

- 专题说明**..... 13-492
- №04569** 伏罗希洛夫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发言  
(速记记录)(1937年2~3月) ..... 13-493
- №04570** 什维尔尼克关于图哈切夫斯基案复查情况致  
赫鲁晓夫的报告(1964年6月26日) ..... 13-523

## 朱可夫元帅的命运

(1946年4月至1963年6月)

专题说明	13 - 645
<b>№09369</b> 阿巴库莫夫关于诺维科夫声明致斯大林的信 (1946年4月)	13 - 646
<b>№09370</b> 布尔加宁关于扣压朱可夫的家具致斯大林的报告 (1946年8月23日)	13 - 655
<b>№09371</b> 阿巴库莫夫关于秘密搜查朱可夫住所事致 斯大林的报告(1948年1月10日)	13 - 656
<b>№09387</b> 朱可夫关于被人指控致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8年1月12日)	13 - 660
<b>№09388</b> 莫洛托夫关于朱可夫的声明致日丹诺夫的通报 (1948年1月21日)	13 - 665
<b>№09372</b> 阿巴库莫夫关于移交朱可夫被没收的物品事致 斯大林的报告(1948年2月3日)	13 - 666
<b>№09373</b> 阿巴库莫夫关于逮捕图日洛夫问题致 斯大林的报告(1948年2月6日)	13 - 668
<b>№09375</b> 谢罗夫关于阿巴库莫夫编造谎言致斯大林的信 (1948年2月8日)	13 - 682
<b>№09376</b> 克留科夫关于屈打成招致苏共中央的声明 (1953年4月25日)	13 - 690
<b>№09377</b> 克留科夫关于转呈声明副本致朱可夫的信 (1953年5月4日)	13 - 701

- №09378** 朱可夫关于转呈克留科夫声明致赫鲁晓夫的信  
(1953年6月2日) ..... 13-702
- №09379** 赫鲁晓夫关于克留科夫的申诉致苏共中央主席团  
成员的信(1953年6月3日) ..... 13-703
- №09380** 谢列平关于朱可夫的言论致赫鲁晓夫的报告  
(1959年9月7日) ..... 13-705
- №09381**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处理谢列平报告所说  
问题的决定(1959年9月11日) ..... 13-709
- №09382** 布琼尼关于朱可夫的言论致苏共中央的信  
(1959年9月18日) ..... 13-710
- №09383** 什维尔尼克关于处理朱可夫言论问题致苏共  
中央的报告(1959年11月27日) ..... 13-711
- №09384** 谢米恰斯内关于朱可夫的情况致赫鲁晓夫的报告  
(1963年5月27日) ..... 13-713
- №0938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关于朱可夫问题的讨论记录  
(1963年6月7日) ..... 13-716
- №09386** 谢米恰斯内关于朱可夫的言论致赫鲁晓夫的报告  
(1963年6月17日) ..... 13-717

## 【专题说明】

# 战前苏联的文学战线

(1932年4月至1941年5月)

1932年春，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取消了原先的无产阶级文艺团体，随即组织了苏联作家协会，苏联文学界因此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格局，联共（布）开始以新的方式领导文学战线。本专题选编的文件主要内容包括：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定、政治局关于苏联作家协会的决定、组织局关于文学杂志编辑工作的决定以及有关这一决定的执行情况、政治局和书记处关于演出剧目问题的决定、中央宣传鼓动部关于文学评论和图书评介工作的报告等。此外，也有著名作家魏列萨耶夫对书刊检查制度的琐碎和专横发出的微弱抗议。这一时期是苏联社会政治生活空前紧张、全国范围内大清洗猖獗的时期，文学界自然也深受其影响。有一系列文件反映了许多作家及其作品在这一时期的命运。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刁绍华翻译)

№0214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定

（1932年4月23日）

文学艺术界的组织问题。

1. 中央确认，近年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相当大成就的基础上，文学和艺术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几年以前，当新经济政策初期特别活跃的异己分子在文学界具有很大影响、而无产阶级文学干部队伍还很薄弱的时候，党曾经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用一切办法帮助成立和巩固单独的无产阶级组织，目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作家和艺术工作者的阵地。

现在，当无产阶级文学和艺术的干部队伍已经成长起来，从工厂、集体农庄涌现一批新的作家和艺术家的時候，现存的无产阶级文艺团体（“伐普”<sup>①</sup>、“拉普”<sup>②</sup>、“拉姆普”<sup>③</sup>等）的范围便显得狭窄了，并且阻碍艺术创作的真正开展。这种状况所造成的危险，就在于这些团体从一种最大限度地动员苏联作家和艺术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手段变成了推行小团体的关门主义的手段，脱离当前的政治任务 and 大批同情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和艺术家。因此必须相应地改组文艺团体并且扩大其工作的基础。

① ВАПП，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成立于1921年。

② РАПП，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成立于1925年。

③ 正确的简称应该是拉普姆——РАИМ，俄罗斯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成立于1923年。

从这一点出发，联共（布）中央决定：

- (1) 取消无产阶级作家团体（“伐普”、“拉普”）；
- (2) 把一切拥护苏维埃政权纲领和努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团结起来，组成其中有共产党党团的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
- (3) 在其他形式的艺术方面实行类似的改变；
- (4) 委托组织局制定贯彻本决定的实际措施。

№02150

## 格隆斯基关于作家对文艺团体改组的态度 致联共（布）中央的报告

（不晚于1933年6月）

联共（布）中央书记

约·维·斯大林同志，拉·莫·卡冈诺维奇同志

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

A.И. 斯捷茨基同志<sup>①</sup>

2月12~19日召开的组织委员会<sup>②</sup>第二次全体会议，总体来看，同第一次全体会议一样成功。

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显露出来的右翼作家向苏维埃政权方面转变的势头（安德列·别雷<sup>③</sup>、米·米·普里什文<sup>④</sup>、潘捷莱蒙·罗曼诺

① A.И. 斯捷茨基（1896~1938），1930~1938年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

② 在联共（布）中央作出改组文艺团体的决定之后，成立了由高尔基担任名誉主席的俄罗斯联邦的苏联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格隆斯基被任命为作家协会主席和共产党党团书记，B. 基尔波京（文艺学家，文学评论家。1932~1936年间任联共（布）中央文学部主任、苏联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责任书记）任协会责任书记。全俄组委会负责接收拉普的一切事务和财产，并在俄罗斯联邦作家代表大会召开之前领导一切现有的作家组织以及文学小组。除俄罗斯联邦外，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等也都成立了类似的组织委员会，并成立了由俄罗斯联邦组委会和各加盟共和国组委会的代表组成的苏联作家全苏联合会组委会。

③ 安德列·别雷（1880~1934），原名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布加耶夫，作家，象征派的主要代表之一。

④ 普里什文，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1873~1954），作家。

夫<sup>①</sup>、留里克·伊甫涅夫、鲍·皮利尼亚克<sup>②</sup>、一批乌克兰作家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声明)，比我们起先估计的更大一些。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我们听到了阿·尼·托尔斯泰<sup>③</sup>、扬卡·库帕拉<sup>④</sup>、贾瓦希什维利<sup>⑤</sup>和其他一些人的声明。而一些非正式的谈话则表明，作家们正在彻底地改变自己的观点，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直截了当地提出转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以及在党的领导下和按照党的任务进行工作的问题。在克服宗派主义方面，我们也取得了进展。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们已经使法捷耶夫<sup>⑥</sup>、丘曼德林<sup>⑦</sup>、李别进斯基<sup>⑧</sup>、叶尔米洛夫<sup>⑨</sup>和谢利瓦诺夫斯基<sup>⑩</sup>脱离了拉普的核心集团。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科瓦连科<sup>⑪</sup>、布阿奇泽<sup>⑫</sup>、马卡里耶夫<sup>⑬</sup>（他没能发言：因为正在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上工作）和格鲁茨卡娅<sup>⑭</sup>同

- ① 罗曼诺夫，潘捷莱蒙·谢尔盖耶维奇（1884～1938），作家。
- ② 皮利尼亚克，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1894～1941），原姓沃高（Boray），作家。
- ③ 托尔斯泰，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1882/83～1945），作家，社会活动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38年）。
- ④ 扬卡·库帕拉（1882～1942），原名伊凡·多米尼科维奇·卢采维奇，苏联白俄罗斯诗人。
- ⑤ 米哈伊尔·贾瓦希什维利（1880～1937），原名米哈伊尔·萨维奇·阿达马什维利，苏联格鲁吉亚作家。
- ⑥ 法捷耶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1901～1956），作家，社会活动家。1926～1932年间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拉普”）领导人，后来担任苏联作家协会领导人。1939年起是苏共中央委员，1956年为候补委员。
- ⑦ М.Ф. 丘曼德林（1885～1946），作家。
- ⑧ 李别进斯基，尤里·尼古拉耶维奇（1898～1959），作家。
- ⑨ 叶尔米洛夫，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1904～1965），苏联文艺学家，文学评论家。
- ⑩ А. 谢利瓦诺夫斯基（1900～1939），文学评论家。在大清洗中遭到镇压。
- ⑪ Б.Л. 科瓦连科（1903～1938），文艺学家、评论家。死于大清洗中。
- ⑫ М. 布阿奇泽（1905～1937），文艺学家、评论家。在大清洗中被镇压。
- ⑬ И.С. 马卡里耶夫（1902～1958），文艺学家、评论家。1925～1932年间是“拉普”书记。
- ⑭ А.Я. 格鲁茨卡娅，作家。

志放下了武器并且转到组委会方面来。至于阿菲诺格诺夫<sup>①</sup>、基尔雄<sup>②</sup>和阿韦尔巴赫<sup>③</sup>，他们的立场至今还不明朗。他们在个别谈话中表示，他们与组委会没有分歧，可是在发言中却从来没有直接和明确地谈到过自己以前曾经对抗中央4月23日决议的落实。尽管我在全体会议上也曾批评了阿菲诺格诺夫同志的发言，可是我却更倾向于认为这些同志与组委会确实没有分歧，虽然跟个别工作人员（例如季纳莫夫）的关系上依然存在着私人的不和。这种不和由于如下的情况而保持着：我们的某些同志不明白，拉普分子的投降造成了局势的变化，这就要求改变对待他们的态度，要求从对他们不信任和与之斗争的政策转到吸引他们参加工作的政策上来。

宗派主义的状况目前大致是这样的。在俄罗斯联邦，宗派主义已被粉碎（特别是在列宁格勒）；在乌克兰共和国也是如此（那里有一个人数不多的“左倾分子”集团，可是这个集团也在瓦解）；在白俄罗斯共和国，宗派主义目前正处在瓦解的过程中。如果白俄罗斯共和国的组委会不干蠢事——那里的宗派主义在最近一两个月之内也将被粉碎；在亚美尼亚，宗派主义也在瓦解；在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宗派主义还没有被粉碎，看来在那里需要进行大量工作才能克服宗派主义。我想，在召开作家代表大会之前，我们一定会实现在文学界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紧密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团结。

① 阿菲诺格诺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1904～1941），剧作家。

② 基尔雄，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1902～1938），剧作家。在大清洗中被镇压。

③ И. И. 阿韦尔巴赫（1903～1939），文学评论家，政论家。1918年加入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19年加入俄共（布）。《青年近卫军》杂志编辑。在大清洗中遭到镇压。

\* \* \*

组委会全体会议的基本问题，如你们已经知道的，是《关于苏联戏剧的任务》的报告。我在这里不转述这些报告和讨论的内容。两三个星期以后，我们将出版全体会议的材料，届时我立即将材料寄上。我在这里只指出一点：戏剧问题无论在作家中间还是在戏剧工作者中间都引起了巨大的兴趣。全体会议的会议大厅简直是挤得水泄不通，虽然我们发放的来宾请柬是极其有限的。对戏剧兴趣的这种高涨，只能有一个解释：对戏剧问题的研究工作非常薄弱，在这个领域里缺少明确的路线，没有给剧作家指出他们应该按照什么方向来发展苏联戏剧。全体会议为剧作家和评论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材料；它对戏剧提出了问题，但尚未解决。我们应该开展大量的工作来制订“戏剧文件”，我们已经着手这项工作。

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了有奖征集剧本的决定<sup>①</sup>，这是非常适当的。公布的前一天，斯捷茨基同志在全体会议上宣布了有关征集活动的消息，而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最后一天，决定正式公布了。这极好地巩固了全体会议的工作。

外高加索地区各组委会的报告都带有信息性质。报告人讲述了这些民族文学发展的问题，在讨论中谈得最多的是宗派主义。我们看到，在那里，特别是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文学正经历着巨大的高涨。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文学工作是严肃认真的。在阿塞拜疆则相反，没有任何人从事文学工作。那里组委会的工作很薄弱。党委不能提供有能力领导文学的工作人员，而把全部工作都推

<sup>①</sup> 指苏联人民委员会1933年2月17日作出的《关于组织征集优秀剧本》的决定。该决定于1933年2月18日在《消息报》上公布。

到伊布拉吉莫夫<sup>①</sup>同志一人身上，这是个优秀的年轻布尔什维克，但对于作家来说却绝对不是个有威信的人。

作协章程原则上已经通过，委托主席团审定最后的修订稿。为了加强主席团的工作，需要做些什么呢？需要：

(1) 允许组委会审定章程并开始组建作协（吸收会员等等）；

(2) 允许全苏组委会出版文学月刊《苏联各民族的文学》，大约为17个印张；

(3) 审定文学评论杂志的名称（中央已就出版这个杂志作出决定）。我们建议把这个杂志称作《苏联文学》并且批准由基尔波京同志为这个杂志的主编。

(4) 允许组委会解散“全俄作曲家和剧作家协会”，在组委会之下设立剧作家部。

我们要向中央请示的问题大致就是这些。这些决定一旦由联共（布）中央通过，我们将立即开展作家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准备会议议程、报告人选和报告提纲。不言而喻，我们将送交中央审定。<sup>②</sup>

党组书记 H. 格隆斯基<sup>③</sup>

又及。

兹将我在组委会全体会议上两次发言的速记稿呈上：一次是就

① 米尔扎·伊布拉吉莫夫（1911—？），苏联阿塞拜疆作家。

② 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于1934年8月17日在莫斯科召开。大会筹备期间，根据政治局决定，苏联人民委员会拨款235万卢布用于建立文学基金会和召开代表大会。

③ H. M. 格隆斯基（1894—1985），文学评论家，1932—1937年间任《新世界》杂志主编。1933被任命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和共产党党团书记。

卢那察尔斯基同志的报告所作的发言（2月16日），另一次是在全体会议闭幕式上的发言（2月19日）。在第一次发言中，我试图阐述斯大林同志关于文学、特别是关于戏剧的教育意义的观点，并且涉及到我在作家代表大会筹备工作中正在解决的一些问题（对文艺复兴的分析，关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文学以及作家向工人阶级立场的转变，关于高尔基等等）。其中提出的论点，皆为草稿，尚需进一步加工。

#### II. 格隆斯基

No02151

日丹诺夫关于作家代表大会情况  
致斯大林的报告（草稿）

（1934年8月28日）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作家代表大会现在正在就关于戏剧的报告进行讨论。晚上是布哈林关于诗歌的报告。我们想在31日结束大会。人们开始疲劳了。代表们的情绪非常好。大家一致称赞大会，甚至那些在作家阶层中并不少见的不可救药的怀疑论者和爱说怪话的人也是如此。

头两天，我们着实为大会担心。这是在就第一个问题做报告的时候。当时，人们在侧厅里走来走去。大会好像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但是，讨论高尔基和拉狄克的报告<sup>①</sup>却非常活跃。圆柱大厅里挤得满满的。情绪很高涨，代表们坐在那里一连4个小时不休息，但几乎没有来回走动的。大厅里座无虚席，侧厅里也拥挤不堪。祝词十分热烈，尤其是少先队员和莫斯科州女集体农庄庄员斯米尔诺娃的致词使作家们深受感动。全体一致的印象是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

作家看到了国家对待文学的态度，看到了自己，感到了自己的活动所承担的巨大责任。因此所有的发言都带有认真准备的迹象。大会上形成的总的基调一下子便排除了把大会变成宗派斗争的讲坛的可能性。所有的人都尽其可能地努力在自己发言的思想性、提出

<sup>①</sup> 8月21~24日高尔基所作的《关于苏联的文学》的报告进行了讨论；25和26日是讨论拉狄克所作的《当代世界文学和无产阶级艺术的任务》的报告。

创作问题的深刻性和讲话的外在修饰方面盖过别人。

在这方面，我们在代表大会前夕的两次共产党员会议上所作的警告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在组委会和代表大会的党组会议上曾经就可能出现拉普情绪的危险性警告说，如果在代表大会上冒出宗派情绪，中央将给予坚决的打击。

昨天，就布哈林将要做报告一事再次发出警告。一伙共产党员诗人（别济缅斯基和其他一些人）准备利用布哈林常犯的反辩证法的错误，在代表大会上狠狠地批评他，准备与其过去的错误联系起来，把他击溃。

我们在主席团的党组会议上宣布：（1）我们谴责团伙性质的预备会议，（2）可以批评诗歌领域里的个别论点，但不准把批评引入政治总结的范畴。同时还强调，代表大会之前采取的策略在大会进行的过程中已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共产党员们保证竭尽全力不违犯纪律。<sup>①</sup>

中央的警告，大会上和大会周围的情况，迫使拉普分子及其同情者们改变了战线，没有揭疮疤，而是显示了好的一面——谈论创作问题。至于发言，共产党员的发言与非党人士比较显得苍白、平淡。然而，我觉得，如果做出像高尔基所做出的那样的结论是不公正的，他在代表大会以前说过而且在文章中写过，共产党员在作家阶层中没有任何威信。非党人士的讲话……

<sup>①</sup> 实际上，布哈林在大会上所作的题为《关于诗歌、诗学和苏联诗歌创作的任务》的报告，遭到了杰米扬·别德内、别济缅斯基、扎罗夫、基尔萨诺夫和苏尔科夫等人的猛烈攻击。

No02152

## 谢尔巴科夫关于沙吉尼扬问题致高尔基的信

(1936年2月28日)

亲爱的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

我认为有必要通告您下述事件：

2月22日，我收到玛·沙吉尼扬<sup>①</sup>关于退出作协的声明。从声明中仍然很难理解，为什么沙吉尼扬做出了这种令人不解的奇怪举动，因此我委托巴甫连科<sup>②</sup>同志跟她谈话。从这次谈话中弄清了，她——沙吉尼扬——一向反对作家协会，她加入作协的时候就是动摇的，而如今则彻底相信协会的无益。顺便还弄清了，她反对《真理报》与音乐、建筑、文学中形式主义斗争的路线。

在这之后，我让沙吉尼扬到书记处来做出正式解释。听说我叫她之后，她并没有来，而是用电话通知说，她在给安·安·安德列耶夫<sup>③</sup>同志的信中已经做了详细的解释，对此不能再做任何补充了。

我们认为沙吉尼扬的举动是反苏维埃的，决定要狠狠地打击她，好让别人不敢再这么做。召开了理事会主席团会议，就沙吉尼扬的声明一事一致通过了谴责她的决议。沙吉尼扬出席了这次会议，她逐渐地，不是立刻，但最后终于承认自己的行为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错误。

① 沙吉尼扬，玛丽艾塔·谢尔盖耶芙娜（1888--1982），作家。著有关于列宁的四部曲《乌里扬诺夫一家》等。

② 巴甫连科，彼得·安德列耶维奇（1899--1951），作家。

③ 安德列耶夫，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1895--1971），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我想您会支持书记处的举措的。附上主席团的决定。沙吉尼扬的举动在《真理报》上也受到了相应的评价。<sup>①</sup>

等到房子装修完毕，我们马上就会在莫斯科分给费定<sup>②</sup>一套住宅。别墅也将提供。只是有这样的困难——塔拉索夫—罗季奥诺夫〔从前〕的别墅修缮还没有竣工，尚需要一些时间。我还想建议费定，在别墅和住宅没有装修完毕的期间，他可暂时住在莫斯科郊区的一个疗养院里。

我已同弗·伊万诺夫<sup>③</sup>商定，在选出文学基金会<sup>④</sup>新任主席之前，他将继续工作。顺便说一下，他提出让费定担任这一工作，您对此有何意见？

请接受我向您的致意

亚·谢尔巴科夫<sup>⑤</sup>

1936年2月28日

① 1936年2月28日的《真理报》发表了Л.奥西波夫批评沙吉尼扬的文章。

② 费定，康斯坦丁·亚历山大罗维奇（1892～1977），作家，社会活动家。

③ 伊万诺夫，弗谢沃洛德·维亚切斯拉沃维奇（1895～1963），作家。

④ 苏联文学基金会是苏联作家协会的下属机构，1934年建立。

⑤ 谢尔巴科夫，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1901～1945），1918年加入俄共（布），1932～1936年在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1934年起兼任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1936年开始先后担任过列宁格勒等州的州党委书记。1938～1945年间担任莫斯科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1941年起担任联共（布）中央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2年起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副国防人民委员，苏联新闻局局长。

附 录

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  
关于玛·沙吉尼扬退出作家协会声明的决定

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坚决谴责玛丽艾塔·沙吉尼扬关于退出苏联作家协会的声明，认为这一举动与每一个苏维埃集体对其成员的基本要求尖锐对立，是严重反社会的。理事会主席团认为，玛·沙吉尼扬在其声明中所阐述的退出协会的动机是毫无根据的，具有恣意诋毁苏维埃国家作家团体的性质。玛·沙吉尼扬在其声明中暴露出对自己在苏维埃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无知，也暴露出她妄自尊大、骄傲自满以及过高地估计自己在文学中的意义。

苏联作协理事会主席团听取了玛·沙吉尼扬在主席团会议上所做的声明，认为她关于退出苏联作协的声明以及在声明中所阐述的动机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错误。

№02153

## 皮利尼亚克关于对其作品的批判问题 致米高扬的信

(1936年5月25日)

莫斯科 40,  
真理大街 1/A, 21 号  
电话: Д1-77-12  
1936年5月25日

亲爱的和尊敬的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

我们会见的时候，您曾问过我：为什么我在苏联文学界独来独往？——不是我独来独往，而是某些苏联评论家把我拒之门外。请允许我请求您读一读附上的一份剪报，这是5月24日《文学报》上刊登的<sup>①</sup>，因为它不仅涉及到我，而且也涉及到您。我不保守秘密，因为我无论如何也不认为（现在也不认为）我做的是反苏维埃的和有害健康的，当时我是通过苏联一家优秀的大型杂志的主编И.М. 格隆斯基的关系接受了您的倡议，并且着手写作《肉》的。据剪报所说，您将看到，我写了——“给食品铺子做的广告”

并且

“我在欺骗俄罗斯。欺骗全俄罗斯。欺骗祖国。”

当书稿交给“订货者”的时候，——

<sup>①</sup> 指的是 А. 埃尔利赫的文章《承包文学》。

“双方都感到很不好意思，仿佛是做了一件伤天害理的事”。书是根据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和格隆斯基的倡议而写的，印制成书并且为人所知了。<sup>①</sup> 根据《文学报》书评者的说法——由此类推——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就是“食品铺子”，为它写了“广告”，和“订货者”一起欺骗“全俄罗斯”，做了一件“伤天害理的事”。

我给您写信不是为了说明某些评论家如何让我“独来独往”，而是为了提请您注意某些“苏联评论家”是如何评价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的活动的。

请允许我向您致意

永远感激的 Б. 皮利尼亚克

我已把本信的抄件寄给苏联作家协会责任书记亚·谢·谢尔巴科夫同志。

---

<sup>①</sup> 1936年第2、3、4期的《新世界》杂志发表了由皮利尼亚克与别利亚耶夫合作的长篇小说《肉》。

№02154

安加罗夫、基尔波京  
关于作协理事会党组会议情况  
致联共（布）中央的报告

（1936年8月29日）

联共（布）中央书记

拉·莫·卡冈诺维奇同志

安·安·安德列耶夫同志

尼·伊·叶若夫同志

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于8月25和26日召开党组会议，讨论了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的判决<sup>①</sup>以及报刊上那些警告苏联作家协会缺少自我批评的文章。

这两次会议对于作家协会的生活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匪徒皮凯利<sup>②</sup>曾是作协会员，作协组织中揭露出一系列两面派分子和叛徒（谢列布里亚科娃<sup>③</sup>、谢利万诺夫斯基、格鲁茨卡娅、特罗欣科<sup>④</sup>、塔拉索夫—罗季奥诺夫<sup>⑤</sup>等），这一情况迫使党组仔细地检查自己

① 指1936年8月24日苏联最高法院对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一案的判决。

② P. B. 皮凯利（1896—1936），文学和戏剧评论家。在大清洗中遭到镇压。

③ Г. H. 谢列布里亚科娃，加琳娜·约瑟福夫娜（1905—1980），作家。

④ E. H. 特罗欣科，文学评论家。

⑤ 塔拉索夫—罗季奥诺夫，亚历山大·伊格纳季耶维奇（1885—1938），作家，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曾参加文学团体“锻冶场”，“拉普”的组织者之一。在大清洗中遭到镇压。

的工作和自己的队伍。理事会主席斯塔夫斯基<sup>①</sup>同志主持了协会的自我批评。讨论过程中，揭露出一系列重要的事实。作家伊万·卡达耶夫（1919年的党员）在1928年曾去利佩茨克会见流放到那里的托洛茨基分子沃隆斯基，听取其关于“山隘”文学集团<sup>②</sup>工作的指示。卡达耶夫<sup>③</sup>曾经与一些被判刑的托洛茨基分子系统地保持积极的联系，给他们以资助。他曾资助过被判刑的托洛茨基分子米罗夫和马列耶夫。后者写了一本小书歌颂被枪决的斯米尔诺夫，他当时曾任康拜因工厂厂长。由于书籍出版总局的干预，该书没能问世。卡达耶夫一直包庇被清除出党的托洛茨基分子作家扎鲁京。1932年，伊万·卡达耶夫声明解散“山隘”文学集团。实际上，这个集团在沃隆斯基的积极参与下继续存在着。这个集团弄到了一份杂志，题为《三十年代》，直到最近一个时期，伊万·卡达耶夫和皮利尼亚克还在坚持要求获准出版同名文集。党组决定开除伊万·卡达耶夫出党。在党组的会议上，一些杂志和《文学报》的工作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新世界》（主编为格隆斯基）曾连续刊登皮凯利的作品。格隆斯基不能就此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红色处女地》的主编叶尔米洛夫积极维护与卡塔雷诺夫<sup>④</sup>有联系并已被逮捕的马兹宁<sup>⑤</sup>。加米涅夫从前的秘书切尔尼亚克在编辑部任职。《十月》刊登谢列布里亚科娃的作品；弗里德良德<sup>⑥</sup>和特尔-瓦加

① 斯塔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1900～1943），作家，社会活动家。曾任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书记。1943年在前线牺牲。

② “山隘”文学集团存在于1923年到1932年，主要成员有A.沃隆斯基、Д.戈尔博夫、A.列日涅夫等。1924～1928年出版《山隘》文集第1～6期。

③ 卡达耶夫，伊万·伊万诺维奇（1902～1939），作家。在大清洗中遭到镇压。

④ И.И.卡塔雷诺夫，1934年被镇压的大学生。

⑤ Д.М.马兹宁（1903～1938），诗人。在大清洗中遭到镇压。

⑥ Л.Е.弗里德良德（1888～1960），作家。

尼扬<sup>①</sup>在《十月》组织的关于历史小说的讨论中发言，他们的发言稿刊登在杂志上。阿菲诺格诺夫在《剧院和戏剧》上刊登一些可疑人物（前白卫分子克鲁季、佐宁）的文章，如斯塔夫斯基所说，其内容极不实事求是，即吹捧他和他的朋友基尔雄的剧本。阿菲诺格诺夫一直反对驱逐这些撰稿者。《文学报》不仅不揭露文学界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而且在审判的那些日子里竟然发表完全学院式的文章，登载吹捧被捕的托洛茨基分子阿戈尔的小书的评论。报纸的编辑苏波茨基同时是军事检察官，却抱怨说，他没有工作人员，得不到帮助。

共产党员对非党人士的工作受到了激烈的批评。可以列举的事实是：英贝尔<sup>②</sup>现在寄居在党员别斯帕洛夫<sup>③</sup>的别墅里。英贝尔是托洛茨基的亲戚，是他堂兄的女儿。英贝尔在作家大会<sup>④</sup>上的发言很坏，她在休息室里还说，她是被人逼着发言的。别斯帕洛夫跟她住在一栋房子里，但没有帮她准备发言做任何事情。

作家协会理事会党组的工作受到了激烈的批评。党委书记马尔钦科<sup>⑤</sup>（现已被区委会撤职）身兼作协理事会责任书记的助手，与谢列布里亚科娃有联系，往好里说，变成了她的文学走狗。他认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便是给她的书做广告：在工厂组织讨论会，让人给写喝彩的书评，等等，他把一些被其他文学机构撤职的人安置在自己身边。特别是他把被文学基金会撤职的伊萨耶夫安置到苏维埃宫工作，该人现已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他在有关一

① 特尔-瓦加尼扬（1893-1936），1934年是《红色处女地》杂志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在大清洗中遭到镇压。

② B.M. 英贝尔（1890-1972），诗人。

③ H.M. 别斯帕洛夫（1900-1937），文学评论家。在大清洗中遭到镇压。

④ 指的是1936年8月21日举行的全莫斯科作家大会。

⑤ Д.А. 马尔钦科，苏联作家协会党委书记，1937年被枪决。

些组织成员的非党性行为的报告材料上批示“不要离题太远”，然后锁进文件柜里，不让党委其他成员审阅。他在党的组织里压制自我批评。

苏联作协理事会党组决定向党的组织提出开除马尔钦科党籍的问题。党组会议上还讨论了文学基金会的工作问题。围绕着文学基金会会有许多营私舞弊的事。有些人大量拖欠文学基金会的贷款，可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借贷。住在彼列杰尔金诺镇的作家们甚至不缴纳普通的房费，这项费用是别墅合作社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缴纳的。只有4个人缴纳了房费。一些作家携带家眷住在疗养院里，花费苏维埃的经费，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凭着技术书记们的便条，借口领导已经同意，大笔给钱，例如发给已被清除出党的塔拉索夫—罗季奥诺夫一万卢布。

文学基金会的资金常常落入敌对分子手中。譬如说，掌握新西伯利亚文学基金会大权的竟然是托洛茨基分子韦格曼<sup>①</sup>，他把文学基金会变成了托洛茨基分子的金库。

党组决定撤消除列宁格勒之外的各州文学基金会分部，在对文学基金会的工作进行检查之前停止发放贷款。

在会议发言中还应该指出伊利延科夫<sup>②</sup>的讲话。他指出，阿韦尔巴赫作为拉普的领导人，在自己周围纠集和培植了一大批党的敌人：拉普的前任书记马卡里耶夫（现已被逮捕）、马兹宁（已被逮捕）、谢利万诺夫斯基（曾在拉普领导之下任《文学报》编辑）、格鲁茨卡娅、特罗欣科已被开除党籍，以及其他一些人。

① B.Д. 韦格曼（1873—1938），方志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

② 伊利延科夫，瓦西里·帕夫洛维奇（1897—1967），作家。

在党组会议上，拉胡蒂<sup>①</sup>和斯塔夫斯基同志最后做总结发言。拉胡蒂同志说，他作为作家代表大会以后当选的理事会书记，实际上是在斯塔夫斯基同志来担任领导以后才成为书记，而以前则被排除在领导之外，受到歧视，机关公然嘲弄他，甚至不准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

拉胡蒂同志的发言受到普遍的注意，他讲了斯大林同志亲自给予他的慈父般的关怀和重视。

斯塔夫斯基同志对两天来党组的工作做了总结。他用很多时间谈了党的领袖对作家和文学的关怀。

党组会议在团结和友好的气氛中结束。发言谈到党和国家所爱戴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给予苏联文学的支持，给人以强烈的印象。

#### 主席团

8月25日，作协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了最高法院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的判决。非党人士参加会议的有B.英贝尔、列昂诺夫<sup>②</sup>、罗马绍夫<sup>③</sup>、波戈廷<sup>④</sup>、卢戈夫斯科伊<sup>⑤</sup>、奥廖沙<sup>⑥</sup>和特列尼约夫<sup>⑦</sup>。

B.英贝尔承认自己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是不好的，她说，她

① 阿布里卡西姆·拉胡蒂（1887～1957），苏联塔吉克诗人。曾参加1905～1911年的伊朗革命，1922年移居苏联，1924年加入俄共。时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

② 列昂诺夫，列昂尼德·马克西莫维奇（1899～？），作家。

③ 罗马绍夫，鲍里斯·谢尔盖耶维奇（1895～1958），苏联俄罗斯剧作家。

④ 波戈廷，尼古拉·费奥多罗维奇（1900～1962），原姓斯图卡洛夫，苏联剧作家。著有关于列宁的三部曲《带枪的人》、《克里姆林宫的钟声》、《悲壮的颂歌》。

⑤ B. A. 卢戈夫斯科伊（1901～1957），苏联俄罗斯诗人。

⑥ 奥廖沙，尤里·卡尔洛维奇（1899～1960），作家。

⑦ 特列尼约夫，康斯坦丁·安德列耶维奇（1876～1945），作家、剧作家。

是托洛茨基的亲戚，因此应该特别坚决地要求枪毙反革命杀人凶手。

其余的作家都一致表示拥护最高法院的判决。

然而，应该指出，奥廖沙的发言是很坏的，他庇护事实上没有签名要求枪毙反革命恐怖分子的帕斯捷尔纳克<sup>①</sup>，说帕斯捷尔纳克完全是苏维埃人，但他不能亲手签名要求判处死刑。奥廖沙属于那样一批作家，他们被托洛茨基恐怖分子施密特<sup>②</sup>给灌醉了，准备暗杀伏罗希洛夫同志（跟施密特一起喝酒的有巴别尔<sup>③</sup>、马雷什金<sup>④</sup>、瓦连京·卡达耶夫<sup>⑤</sup>、尼库林<sup>⑥</sup>、奥廖沙）。奥列沙没有从这个事实中为自己得出任何结论。他自我辩解，他一无所知，他只把施密特看成是一个以前建立过英雄战功的人，虽然他本人也指出，施密特身上强烈的虚荣心有时使他震惊。关于作协的事务，所有的党外作家在会上都发言批评了作协糟糕的工作。列昂诺夫谈到协会组织的不纯。罗马绍夫谈到他在协会里感到孤独。波戈廷说，他在《真理报》工作时通过《真理报》的集体感觉到了与党的联系，可是通过作家协会，他却感觉不到与党的联系。K. 特列尼约夫也谈到了这一点。他听说了审判之后，专程从沃罗涅日赶来。特列尼约夫特别无情地批评了剧作家部（责任书记是基尔雄）。波戈廷和罗马绍夫也严肃地批评了剧作家部。

特列尼约夫和波戈廷指出了协会内部政治工作的必要性，这不

① 帕斯捷尔纳克，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1890～1960），作家。1957年在国外发表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次年获诺贝尔奖金。

② A. П. 施密特（1886～1940），1931～1933年间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长。在大清洗中被镇压。

③ 巴别尔，伊萨克·埃曼努伊洛维奇（1894～1940），作家。在大清洗中被镇压。

④ 马雷什金，亚历山大·格奥尔基耶维奇（1892～1938），作家。死于大清洗。

⑤ 卡达耶夫，瓦连京·彼得罗维奇（1897～1986），作家。

⑥ 尼库林，列夫·韦尼阿米诺维奇（1891～1967），作家。

只是指在非常的情况下。

作家费定出席了协会主席团会议，但没有发言。大部分发言者指出，最近一个时期，苏联作家协会的工作有所改善。

联共（布）中央文教工作部副部长 A. 安加罗夫<sup>①</sup>

文学部主任 B. 基尔波京

1936年8月29日

---

<sup>①</sup> A. H. 安加罗夫（1898～1939?），联共（布）中央文教部副部长。1937年被控“参加右倾组织，在文艺领域进行敌对活动”，被判处枪决。

№02155

## 安加罗夫关于格隆斯基问题 致联共（布）中央的报告

（1937年3月27日）

联共（布）中央书记  
约·维·斯大林同志  
拉·莫·卡冈诺维奇同志  
安·安·安德列耶夫同志  
安·亚·日丹诺夫同志  
尼·伊·叶若夫同志

И. 格隆斯基自1932年开始任《新世界》杂志的责任主编和实际的领导者。

关于他在杂志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的问题，已经不止一次地在作家组织和党的监察委员会中提出。对此有足够的根据。

1. 格隆斯基在自己的杂志〔编辑部〕系统地收容包庇党的敌人。

受到格隆斯基特别关照的杂志的撰稿人有曾经给被流放的托洛茨基分子以物质帮助的皮利尼亚克、扎鲁京、伊·卡达耶夫，还有反革命分子—托洛茨基分子皮凯利和马卡罗夫，人民的敌人巴维尔·瓦西里耶夫<sup>①</sup>（格隆斯基直至最近一个时期还在刊登他的作品并且给他以资助）。所有这些都曾是杂志的骨干和主编格隆斯基

<sup>①</sup> 瓦西里耶夫，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1910～1937），苏联诗人。在大清洗中被镇压。

的个人朋友。

2. 《新世界》杂志在格隆斯基的领导下成了部分作家尾巴主义情绪的表达者，政治上愚昧无知和肮脏庸俗东西的策源地。

杂志在1935年刊登了拉伊萨·阿扎尔赫的长篇小说《第五军》，其内容严重歪曲了我们党的历史。1935和1936年，杂志刊载了谢尔文斯基有严重错误的诗和帕斯捷尔纳克、斯佩克塔托尔、瑟索耶夫政治上有害的作品。

党的监察委员会曾经就阿扎尔赫的小说做出专门的决定，要求格隆斯基坚决改正杂志的错误。可是格隆斯基却没有从这项决定中得出任何结论。

一些优秀的作家，其中包括阿·托尔斯泰和巴甫连科，退出了杂志。杂志对于非党作家没有开展任何工作。И. 格隆斯基在1936年的一次报告中把形式主义说成是反革命思潮，宣布说形式主义者乌克兰被逮捕了。这些有害的观点和不负责的谎言在非党作家中造成了恐慌和怀疑。杂志没有任何威信。格隆斯基和撰稿人罗日科夫垄断了杂志的批评栏，杂志上充斥有害的胡言乱语，鼓吹精心炮制的、常常是公开的异己的“理论”（柏拉图是美学之父，自然主义是艺术家必经的阶段，共产主义——这是自我牺牲，苏联艺术家不可能真实地描写资本主义，等等）。《新世界》杂志的每一期上都在宣扬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胡说八道。

联共(布)中央文教工作部认为必须立即撤消格隆斯基的职务。  
附上决定草案。

联共(布)中央文教工作部副部长 安加罗夫

1937年3月27日

发送 6 份

1. ——斯大林同志
2. ——卡冈诺维奇同志
3. ——安德列耶夫同志
4. ——日丹诺夫同志
5. ——叶若夫同志
6. ——存档

附录：联共（布）中央决定草案

### 联共（布）中央决定

撤消格隆斯基同志《新世界》杂志主编的职务。任命 В.Я. 基尔波京同志为杂志主编。<sup>①</sup>

A. 安加罗夫

1937年3月27日

---

<sup>①</sup> 这一决定最后未获通过。

№02156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关于谢尔文斯基剧本的决定

（1937年4月21日）

### 关于 И. 谢尔文斯基的剧本《白熊乌姆卡》

1. 莫斯科“革命剧院”上演的 И. 谢尔文斯基的剧本《白熊乌姆卡》是反艺术的，在政治上有损于苏维埃戏剧，应从演出剧目中撤消。

2. 向克尔任采夫<sup>①</sup>同志指出艺术事务委员会在监督莫斯科剧院演出剧目方面工作不力。

3. 在报纸上（新闻栏）报道关于从演出剧目中撤消 И. 谢尔文斯基的剧本《白熊乌姆卡》的消息。

---

<sup>①</sup> 克尔任采夫，普拉东·米哈伊洛维奇（1881～1940），历史学家、新闻记者。1904年入党。曾担任党报编辑。1919年起先后任俄罗斯通讯社领导人，苏联驻瑞典、意大利全权代表，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的无线电委员会主席，1936～1938年为艺术事务委员会主席。

№02157

**安加罗夫、塔马尔金  
关于作协理事会和书记处情况  
致联共（布）中央的信**

（1937年5月3日）

联共（布）中央书记  
约·维·斯大林同志  
拉·莫·卡冈诺维奇同志  
安·安·安德列耶夫同志  
安·亚·日丹诺夫同志  
尼·伊·叶若夫同志

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及其书记处对作家团体实施领导的状况令人担忧。

协会的责任书记是斯塔夫斯基、拉胡季和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同志。协会的实际领导权集中在斯塔夫斯基手中，因为拉胡季同志不能领导，而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同志不能而且也不愿意从事作家协会的事务。苏联作家协会在斯塔夫斯基同志的领导下由一个社会团体变成了官方的、建立在行政管理机构基础上的纯官僚主义的机关。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和理事会极少开会，即使开会，也只是研究组织的和日常生活的问题。提交给作家协会理事会的意见书和申请书搁置两年都得不到审理。

不邀请创作人员参加主席团的会议，而且也不准许他们参加。接纳会员和开除会籍的问题，采用“审问”的方法解决，只要有斯

塔夫斯基一人签字，就可以决定。协会的一切问题都由机关工作人员来解决，而他们大多数业务水平不高。

作协实际上并不研究创作问题；除了少数知名作家之外，对作家很少了解，不能在作家们的工作中帮助他们。这种状况自然造成了作协领导脱离作家群众。

斯塔夫斯基同志和他的机关工作人员跟没有“名气”的二流作家以及初学写作的青年作家谈话很粗暴。他们在作家协会中既得不到帮助，也不受重视。他们到协会来只是为了解决日常生活问题（钱、住房、医疗介绍信），即使是办这些事也不乐意来，因为他们每次向协会提出申请，都要排长队等上好几个小时，而且还要忍受长时间的挖苦、刁难以及对他们的困难和要求的粗暴和冷漠的态度。

除了少数接近领导并享受协会一切福利的文学巨匠之外，任何人都不知道协会的领导者们在忙什么，同样，协会的领导者们也不知道作家群众在忙些什么和想些什么。作家协会在作家中间不进行任何教育工作。漂亮舒适的作家之家几乎是闲置不用。一些分会（国防文学分会、电影戏剧分会）1936年的会议决议至今没有得到主席团审批，没有付诸实施。

作家协会的领导不了解也不研究每个作家的个性、他的写作风格、他的创作方法、他所关心的问题。因此作家协会的领导在批评某个作家的问题上没有自己的观点：他们受每一个评论家的支配，对“权威”亦步亦趋。

为了说明问题，只要指出这样一点就足够了：基尔雄的（《伟大的日子》）和阿菲诺格诺夫的（《向西班牙致敬》）反艺术的和肤浅的作品，在协会的领导手下受到赞扬；与此同时，维尔塔<sup>①</sup>（《孤独》）和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却是没有经过作

<sup>①</sup> 维尔塔，尼古拉·叶夫根耶维奇（1906—1976），作家。

协的领导而由杂志扶持起来的。

协会里对作品的批评带有片面性。评论家揭示某一部作品的错误，却不谈作家的整个创作，不提出改正错误的途径。这种批评的结果是作家的创作积极性受到损伤。有些作家完全放弃了写作，封闭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阿谢耶夫、斯维特洛夫）。在作家中间不开展教育工作，不善于把他们引上应该走的道路，结果使某些作家产生悲观主义，对自己的力量丧失信心，有时甚至导致其内心的怨恨。

人民的敌人（布哈林、拉狄克、阿韦尔巴赫等）曾把党员作家和非党作家对立起来，而现在，由于协会领导的削弱，这种做法也反映到作家中间来了。法捷耶夫同志在作家的会议上曾经谈到这一点，谈得有根有据。这一点还可以由这样的事实来证实：在彼列杰尔金诺住着40来位作家，其中有15名共产党员，非党作家经常避开党员讨论与他们的工作以及协会的工作有关的问题，商定在发言中采取一致行动，等等。另一方面，共产党员们对非党作家的生活、工作和情绪也很少有兴趣。某一个共产党员出现在非党作家的家里，通常都与开展某一运动有关。如果“彼列杰尔金诺居民”——皮利尼亚克和帕斯捷尔纳克也住在那里——的情绪中有许多异己的和诽谤性的东西，那是不足为奇的。这是协会无所作为的直接后果。直至目前为止，在协会中还没有消除宗派主义。宗派主义对协会的整个工作产生了有害的影响。一些小集团在反对协会领导的斗争中取得一致，认为必须取消协会而代之以围绕着各个杂志的小集团。无论是斯塔夫斯基，还是协会主席团，都不进行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不揭露其本质。

协会不做青年的工作，协会对他们不关心，不重视，不向他们提供建议。协会把这项巨大的工作转嫁给了国家出版社，可是国家出版社也只是形式上从事这项工作。由于缺少工作中的帮助，像阿

夫杰延科<sup>①</sup>（《我爱》）和舒霍夫<sup>②</sup>（《仇恨》）这样的有才华的青年，就不能前进，而在创作中退步了。

作家协会周围有一系列文艺杂志在工作（《旗》、《新世界》、《星》、《十月》等），可是作家协会却不领导这些杂志。由于协会放任不管，这些杂志的篇幅在很多情况下便让给了人民的敌人。

联共（布）中央文教工作部认为必须：

1. 加强作家协会书记处，委派帕·尤金<sup>③</sup>和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sup>④</sup>同志参加书记处的工作。

2. 作家协会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尤金同志担任，解除他在中央机关的工作。

3. 中央书记接见一批苏联作家，谈谈文学问题。

联共（布）中央文教工作部副部长 A. 安加罗夫

文学部主任 塔马尔金

1937年5月3日

发送6份

1. ——斯大林同志
2. ——卡冈诺维奇同志
3. ——安德列耶夫同志
4. ——日丹诺夫同志
5. ——叶若夫同志
6. ——存档

① 阿夫杰延科，亚历山大·奥斯塔科维奇（1908~?），作家。

② 舒霍夫，伊万·彼得罗维奇（1906~1977），作家。

③ 尤金，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1899~1968），苏联哲学家，社会活动家。

④ 维什涅夫斯基，弗谢沃洛德·维塔里耶维奇（1900~1951），作家。曾担任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工作。

№02158

## 沙布洛夫斯基关于作协领导机构问题 致安德列耶夫的信

(1937年12月17日)

联共(布)中央书记

安·安·安德列耶夫同志

今年12月24日将在第比利斯召开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会议，纪念绍塔·卢斯塔维里<sup>①</sup>。

作家协会责任书记B.П.斯塔夫斯基同志认为有必要利用这次全体会议来贯彻旨在加强苏联作家协会各管理机构组织措施，因此建议补选协会理事会主席团成员和协会书记处成员。

目前，作家协会各领导机构的状况是这样的：1934年作家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01名理事会成员中，剩下58人，其余的由于死亡、被开除理事会以及作为人民的敌人被揭露等原因而离职；属于最后一种情况的有33人；协会理事会主席团37名成员中，剩下21人；而且难以召集齐全，因此，主席团会议由于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效；协会书记处5名成员中，剩下3人——斯塔夫斯基、拉胡季和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因为谢尔巴科夫同志转到其他工作岗位而离职，而前书记处成员库利克<sup>②</sup>原来是人民的敌人。协会书记处在这种状况下很少能发挥工作效力。拉胡蒂和斯塔夫斯基之间关系紧张，拉胡季很少起

① 绍塔·卢斯塔维里，12世纪格鲁吉亚诗人，十六行诗的倡导者，近代格鲁吉亚标准语的奠基人。他的《虎皮武士》是世界著名的史诗之一。

② 库利克，伊万·尤里安诺维奇(1897~1941)，苏联乌克兰作家，社会活动家。在大清洗中遭到镇压。

作用。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物质状况困难，过于热衷创作工作，以便解脱债务。只剩下斯塔夫斯基一人，他实际上艰难地承担着全部工作。可是，把整个领导工作全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是不可能的。

斯塔夫斯基建议补选联共（布）党员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瓦·格拉西莫娃<sup>①</sup>同志，以及非党的H.波戈廷、K.特列尼约夫、列·索勃列夫<sup>②</sup>和巴·狄青纳<sup>③</sup>等同志进入协会主席团。根据我们的建议，斯塔夫斯基同志在作家协会党组会议上提出协会主席团和书记处候选人问题，取得党组同意之后，正式提出这些候选人。

斯塔夫斯基提出的候选人，据他推测，全体会议是能够接受的，选举不会遇到复杂的情况。惟一可能引起某些异议的，这就是列·索勃列夫。

关于这份候选人名单的问题尚须审查清楚。

联共（布）中央文教工作部认为斯塔夫斯基同志的建议是正确的，请您准予补选作家协会主席团和书记处成员，并且请您在12月19日作家们启程赴第比利斯之前接见斯塔夫斯基同志并就这个问题进行谈话。<sup>④</sup>

联共（布）中央文教工作部代部长 Ф.沙布洛夫斯基<sup>⑤</sup>

1937年12月17日

№335 1. 一份送交安德列耶夫同志  
2. 一份归档

① 格拉西莫娃，瓦列里娅·安纳托利耶芙娜（1903～1970），作家。

② 索勃列夫，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1898～1971），作家。

③ 狄青纳，帕夫洛·格利哥里耶维奇（1891～1967），苏联乌克兰诗人。

④ 1937年12月25日至29日在第比利斯召开的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全体会议决定，推迟讨论有关补选作协领导机构成员的问题。

⑤ Ф.И.沙布洛夫斯基（1896～？），1936年7月至1938年2月在联共（布）中央文教工作部任文学部主任。在大清洗中遭到镇压。

№02159

格拉西莫娃、卡拉瓦耶娃  
关于作协领导问题致安德列耶夫的信

(1938年3月2日)

亲爱的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

我们作为共产党员作家，不得不直接写信给您。《真理报》发表5名作家来信<sup>①</sup>之后，作家协会的领导表面上承认对协会缺点的批评是公正的和及时的。可是实际上却恰好相反。作协的领导牢牢地抓住自己的地位，已经开始跟批评他们的人算账了。B.斯塔夫斯基及其亲信千方百计地想要保住自己的领导地位，这种愿望促使他们采取了最轻率的、最终必然严重破坏党的威信的步骤。

最鲜明的例子：作协主席团最近几次会议本来应该用行动表现出协会工作的改进。然而，在这些会议上却发生了比领导人所采取的官僚主义措施彻底失败更加丢人的事。

党提出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联盟的口号，可是作协领导人对这个口号却极尽嘲弄之能事。在讨论改进协会的计划最热烈的时候，在挤满非党作家的大厅里，作协唯一的非党书记、作家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站起来大声宣布说，他对这个计划不能承担任何责任：第一，计划没有给他看过；第二，他没有对计划表示过赞同。根据这次主席团会议的议程，安排有文学基金会主席、非党作家 K. 费

<sup>①</sup> 1938年1月26日的《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作家协会工作中的缺点》的文章，其作者是阿·托尔斯泰、亚·法捷耶夫、亚·考涅楚克（苏联乌克兰剧作家，苏联科学院院士）、B. 卡达耶夫和 A. 卡拉瓦耶娃。

定的报告，这是全体作家都非常关心的。但就在会议开始前一个小时，在斯塔夫斯基同志的坚持下，报告却从议程上撤消了。我们不能对费定同志的报告做出评价，因为斯塔夫斯基不肯事先让理事会党组了解这个报告。请您推想一下，无缘无故地取消了关于作家们迫切关心的问题，这会给费定本人以及全体作家造成什么印象。等到要表决计划的时候，出席会议的250~300人中只剩下了30人左右，其中包括3位主席团成员，因此，实际上不能认为计划已被通过了。

第二天，主席团会议研究接纳新会员的重要问题，可是前来参加会议的……只有一位主席团成员。被接纳入会的人在表决的时候应该……自己投自己一票。

协会的领导习惯于把工作中经常发生的失败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企图在每个共产党员的警惕性上进行投机。毫无疑问，在我们作家阶层里还有一些没被揭露出来的敌人。然而，这一点并不使任何人有权把所有批评协会工作的或者对协会工作漠不关心的作家几乎全都打到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营垒里去，就像B.斯塔夫斯基的左膀右臂、剧作家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在最近一次党组会议上所做的那样。他提到一系列作家的名字（Bc. 伊万诺夫、Л. 列昂诺夫、H. 维尔塔、K. 费定），把他们说成是追求个人名利地位的人，几乎就是人民的敌人。这种不负责任的行径没有受到党组书记B.斯塔夫斯基的任何抵制。相反，党委书记奥斯金同志（文学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行政上归斯塔夫斯基管辖）不仅没有给以任何抵制，而且甚至随声附和维什涅夫斯基。

B.斯塔夫斯基只考虑私情，寻找一切方法来伤害批评他的人，排斥一切使他不安的因素。除了他自己的“亲信”，他对待作协中的党员也并不好些。在协会的工作实践中，这种事是绝对空前的：计划在主席团的会议上可耻地失败了，甚至事先都没有在作家协会

党组会上讨论过。在这之后，斯塔夫斯基竟然有勇气为协会一团糟的工作辩解，厚颜无耻地叫喊道，任何人都不能帮他的忙！

为了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他是不择手段的。在那次党组的会议上，他被共产党员评论家、《文学报》的编辑沃伊廷斯卡娅揭露得体无完肤：他企图迫害《红色处女地》杂志那些激烈批评他的同志，委派自己的助手涅姆钦科写了一篇诽谤中伤的文章，其中的引文断章取义，《文学报》核对了原文，拒绝刊登这篇文章。

我们本来可以告诉您更多的事实，可是我们认为这些也就足够了。在协会里支持B.斯塔夫斯基的人，或是那些在行政上归他管辖的人，或是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一类的贪图权势的人，或是政治上名声不好、不敢大胆地说真话的人。

如果要求我们所说的更确切一些或者还需要某些补充，那么我们请求您接见我们，亲自听听我们当面陈述。我们以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声明，我们协会里的状况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大多数作家不仅非常困难，而且简直是不可能过创作生活。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作协理事会成员 安娜·卡拉瓦耶娃

作协理事会成员 瓦列里娅·格拉西莫娃

莫斯科，1938年3月2日

电话：B 1-32-13（格拉西莫娃）

D 1-78-19（卡拉瓦耶娃）

№02160

## 沃伊廷斯卡娅关于作家协会 有关情况致日丹诺夫的信

(不晚于1938年3月15日)

日丹诺夫同志<sup>①</sup>！

我认为讲讲作家协会里的状况是自己作为党员的义务，这种状况是由于1932年4月23日的中央决定没有得到执行而造成的。

作家协会变成了一个文学事务行政管理机关，无尽无休地开会，而与文学创作问题则毫无关系。

事情已到了这种地步，斯塔夫斯基同志建议给维什涅夫斯基创作休假，以便维什涅夫斯基能够进行写作。众所周知，维什涅夫斯基并非在国家机关工作，因此“创作休假”便意味着摆脱无尽无休的、任何人都不需要的协会里的会议，而能得到空闲。

因此，一个作家应该做的要么是在协会里“工作”，亦即开会，要么就是写作。

这种状况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作家协会不正确的、非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工作。

而事实上，作家中间所发生的过程却要求协会认真地工作。

有一些作家两三年之前在政治上还很消极，现在却积极向党靠拢，密切关心党的路线斗争。

<sup>①</sup> 在这份材料的第1页上日丹诺夫作了如下批示：“送莫洛托夫、安德列耶夫、卡冈诺维奇。请阅沃伊廷斯卡娅关于作家协会状况的信。此信具有无可怀疑的意义。安·日丹诺夫。”

我可以举出某些大作家的情绪作为例子。

1. 列昂诺夫——我明白了，只有两条道路：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因此我就跟共产党走。有许多事情我还不明白。我不能局限于给报纸上的文章做图解。为了能够写出真正有价值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艺术作品，我需要帮助。

2. 波戈廷——我因福伊希特万格<sup>①</sup>的书而深感受辱，因此我就写了特写《斯大林同志》。斯大林——我们时代的骄傲。

3. 谢尔文斯基——以前我找过托洛茨基。布哈林曾能够吸引我。现在我是幸福的，因为我揭发了间谍，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举报了他。

我拥护党，因为不这样，法西斯主义就要取胜。

4. 我在基辅同狄青纳进行过多次谈话。狄青纳从前是民族主义者，作为一个诗人，在西乌克兰有很大影响。乌克兰作家协会闹纠纷，“没有时间”关心狄青纳。

我去找他谈乌克兰文学的状况。狄青纳对我说：“敌人企图挑拨我们跟苏维埃政权不和（他向我讲了很多关于赫维列沃伊<sup>②</sup>、森钦科<sup>③</sup>等人的挑拨离间活动），可是我却写了诗集《党指引道路》，诚然，党没有时间关心我们。”

我向他讲了斯大林同志给索勃列夫的信，那封协会领导未能从中为自己得出相应结论的信。狄青纳受到了震动：“既然像斯大林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有时间关心我们，那就是说，我们是需要的。”

类似这样的可以证明作家队伍基本核心的健康情绪的事例可以举出很多。在《文学报》为选举所做的工作中，有一批非党的大作

① 可能是指德国作家莱昂·福伊希特万格（1884～1958年）。

② M. 赫维列沃伊，作家。

③ 森钦科，伊万·叶菲莫维奇（1901～1975），苏联乌克兰作家。

家成了基本的鼓动员，撰文拥护候选人联盟，拥护党的路线。

与此同时，对于出版自由存在着明显的不正确的理解，把它理解为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把联盟<sup>①</sup>理解为让步。

例如，波戈廷就曾说过：“我们需要以费定为首的自己的非党的报纸。”（费定是个具有右倾情绪的人，在政治上非常滑头）。

列别杰夫-库马奇<sup>②</sup>曾经对我说：“我是这样理解的，联盟意味着我们都为党的总路线而斗争，可是许多作家却认为党让步了。”

在编委会内部，不得不坚持同那些非党编委作斗争，他们无疑是我们的人，可是对许多事情还不理解。

例如，彼得罗夫<sup>③</sup>曾经很严肃地向我证明，《文学报》不应该刊登中央全会的决议和莫洛托夫同志的讲话，因为这和文学没有关系。

福伊希特万格的书在一些作家中间得到很大的同情。“福伊希特万格说出了禁止我们说的话。”

所有这些事实证明，在文学界工作的共产党员肩负着巨大责任。

这里所说的是要对非党文学家发挥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影响，这是对党中央的政治责任。

我完全负责地断言，斯塔夫斯基、作家协会党的组织忙于闹纠纷，忘记了自己的这项基本任务。

恰恰是在选举前夕，爆发了诗歌分会和评论分会的“战争”，它是按照拉普的一切规则进行的。

我们在《文学报》上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反对无原则的宗派主

① 这里指的是在最高苏维埃选举中党员和非党员候选人组成所谓联盟一起参选。

② 列别杰夫-库马奇，瓦西里·伊万诺维奇（1898～1949），苏联俄罗斯诗人。是《祖国之歌》、《快乐青年进行曲》、《神圣的战争》等著名歌曲的作者之一。

③ E.П.彼得罗夫（1902～1942），作家。

义。

我问党委书记：“你们忙于各分会之间的战争，而党委会知道人们是如何看待福伊希特万格的书的吗？”——“我们没有来得及关心这件事。”“那好，作家们在选举前夕的情绪如何呢？我们是否能够谈谈列昂诺夫或者伊万诺夫的情绪如何呢？”——“我们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

这个事实是很典型的，足以证明工作作风。

作家组织中的党的组织不进行对非党作家的的工作。众所周知，许多共产党员文学家都受过严厉的政治处分（党的组织当时知道B.雅辛斯基与间谍有联系，却通过不记名投票选举他进入党委）。然而却不做任何工作来扩大和加强作家协会的党的核心。近几年来，没有一个作家人党。甚至就连A.考涅楚克都不是党员。可是在基辅，14名共产党员作家中间有不少人在政治上是不能让人信得过的，因此，看来加强党的核心惟一的途径就是从那些正派的忠于党的人中间发展党员。党员数量没有增加，是因为没有做非党员的工作。很能说明问题的是，莫斯科作家协会党委邀请非党人士参加党委会议，竟然没有一个人出席。

非党人士对党组织工作的态度具有很大的意义。乌克兰诗人巴让<sup>①</sup>曾经对我说：我们乌克兰的非党作家处境非常困难。我们不尊重共产党员作家，因为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与敌人有联系，我们在政治上不相信他们，此外，他们什么都不写。

我在格鲁吉亚所接触到的大致也是这种情绪。在一系列共和国，作家组织中的敌人被揭露出来以后，便没有共产党员了（在列宁格勒，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评论家）。

<sup>①</sup> 米科拉·巴让（1904～1983），原名尼古拉·普拉东诺维奇·巴让，苏联乌克兰诗人，社会活动家。

协会理事会的共产党员不是争取团结一切力量，而是忙于闹纠纷。

斯塔夫斯基为了反对法捷耶夫而进行了一场臭名远扬的斗争，斯塔夫斯基企图对所有批评他那些严重罪行的人进行报复，这是由于不理解或者不愿意理解目前的形势。对各民族文学的领导工作极其令人不满意。我熟悉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情况。

协会理事会曾经支持和重用一些原来是人民敌人的人。在乌克兰，米基坚科直至最近还得到支持，尽管莫斯科已经得到来自基辅的一系列警告。考涅楚克对我讲过，斯塔夫斯基是如何对待他提出的警告的。造成了这样一种气氛，竟然让我的一篇关于米基坚科的文章在编辑部里搁置了6个月。在格鲁吉亚，一切都委托给帕斯捷尔纳克和米尔斯基<sup>①</sup>，虽然他们与间谍亚什维利<sup>②</sup>的集团关系密切。这样的事例可以举出许多。问题不在于错误，而在于各民族文学的政治领导体制不正确。

这一切都委托给一些次要人物。

在主席团会议上，一次也没有听取过关于各民族作家的创作的报告，对这些作家的命运没有给以周到的关怀。协会理事会对狄青纳创作中的转变所持的不能允许的冷淡态度（狄青纳本来在与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斗争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会在西乌克兰产生影响），对考涅楚克的创作命运所持的绝对不闻不问的态度，都说明了这一点。

A. 考涅楚克是一位天才的剧作家，是个工人，现在写得不如他能够写的那样好，不如他以前写得好。

① Д. П. 米尔斯基 (1890~1939)，作家，文学评论家。在大清洗中被镇压。

② 亚什维利，帕维尔·齐布拉耶洛维奇 (1895~1937)，苏联格鲁吉亚诗人。因遭受迫害而自杀。

但在作家协会里，没有人为考涅楚克的文学命运感到不安。这样的事例可以举出许许多多。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协会里不讨论稿件，也就是说，协会不做它应该做的事情。作家们经常在家中聚会，而这往往被敌人加以利用。目前的工作状态促进了破坏分子的活动。难怪作家协会在政治上毒草丛生。由于害怕自我批评，我要说，由于害怕非党人士日益增长的政治积极性，作家协会的状况更加严重了。作家们极其不满意目前的状况，已经在公开地谈论这一点。如果中央能够召集一些共产党员和非党作家进行座谈，那就太好了。

《文学报》编辑部 O. 沃伊廷斯卡娅<sup>①</sup>

---

① O. C. 沃伊廷斯卡娅是文学评论家，《文学报》编辑。在当时的档案材料中发现了沃伊廷斯卡娅给斯大林的信的抄件，信的内容表明，她同时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负有在作家中揭露“人民敌人”的任务。这封给日丹诺夫的信也具有类似的性质。

№02161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关于《乌里扬诺夫一家》的决定

（1938年8月5日）

关于玛丽艾塔·沙吉尼扬的长篇小说《历史的人场券》第一部——《乌里扬诺夫一家》

在了解了玛丽艾塔·沙吉尼扬的长篇小说《历史的人场券》第一部（副标题是《乌里扬诺夫一家》）以及这部小说问世的背景之后，联共（布）中央确认，沙吉尼扬的书自命为一部关于乌里扬诺夫一家生活以及列宁童年和少年的传记性纪实小说，实际上是一部政治上有害的、思想上敌对的作品。认为《红色处女地》主编叶尔米洛夫同志以及国家文学出版社前领导人布尔舍缅尼科夫同志准许刊印沙吉尼扬的小说严重的政治错误。

对克鲁普斯卡娅<sup>①</sup>同志的行为予以谴责。她拿到沙吉尼扬的手稿后，不仅没有制止小说问世，反而尽一切力量鼓励沙吉尼扬，对手稿作出肯定的反应，并在乌里扬诺夫一家生活的事实方面给沙吉尼扬提供咨询，从而对这本书负有完全的责任。

克鲁普斯卡娅的这种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不妥当的，特别是因为克鲁普斯卡娅同志所做的这一切都未报告联共（布）中央，没有得到中央同意，从而把编写关于列宁的作品这样的全党的事业变成

<sup>①</sup>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遗孀。

个人和家庭的事业，充当解释列宁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以及工作情况的垄断者的角色，而中央任何时候都没有授予任何人以这种权利。

联共（布）中央决定：

- （1）撤消叶尔米洛夫同志《红色处女地》主编的职务；
- （2）对国家文学出版社前任社长布尔舍缅尼科夫同志给以警告处分；
- （3）向克鲁普斯卡娅同志指出她所犯的错误；
- （4）凡属未经报请联共（布）中央同意的关于列宁的作品，一律禁止出版；
- （5）查禁沙吉尼扬的书；
- （6）建议苏联作家协会给沙吉尼扬以警告处分。<sup>①</sup>

---

<sup>①</sup> 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于1938年8月9日决定对玛·沙吉尼扬给予“严厉谴责”，主要是因为她在自己的作品中“歪曲地表现了列宁的民族面貌”。

№02162

## 联共（布）中央关于苏联作家 协会工作的决定（草案）<sup>①</sup>

（1938年8月）

### 关于苏联作家协会的工作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肯定近几年来苏联文学的重大成绩。苏联文学作为苏联各族人民社会文化生活的最重要因素，促进了千百万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精神的形成和视野的开阔。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写成的苏联作家的优秀作品鼓舞人民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它继承了苏联各族人民古典文学的光荣传统，丰富了他们的文化宝库。苏联文学对苏联戏剧、电影和其他艺术种类产生了卓有成效的影响。

苏联作家协会是根据党的倡议，在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阿·马·高尔基的领导和密切参与下成立的，它团结了国家的一切文学力量，把他们引上了富有社会价值的创作工作的统一轨道，并促进了作家劳动条件的改善。苏联作家协会是自愿的创作组织，其主要宗旨是使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它的创建在实践中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sup>①</sup> 联共（布）中央后来未通过此项决定。

在肯定苏联文学的这些成就的同时，联共（布）中央注意到，苏联作家协会及其领导的工作中存在着歪曲党在文学领域的路线的问题，这些歪曲是党所批判过的有害的习惯势力和前拉普的工作“方法”的残余：

1. 苏联作家协会在工作中忽视苏维埃民主的方法、自我批评的方法、领导机关对作家们的责任和向他们报告工作的制度、领导工作中的集体负责制，而用命令、行政手段和书记“一长制”的方法来取代上述苏维埃民主的方法。

2. 在对待渗入苏联作家协会的人民的敌人方面，不是保持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式的警惕性，而是出于谨小慎微的考虑而对许多正派的苏联作家不加区分地进行政治攻击，结果在作家中间造成过分怀疑和互不信任的局面。

3. 作家协会不重视文学创作的具体问题，不善于根据每个作家的个人爱好和特点来做他们的工作；对待作家采取官僚主义的“总体”态度，不对他们进行思想的和艺术的教育，而代之以组织上不断的会议和忙乱、一般性的谈话、做决议、下命令和发公文。

4. 不关心对青年作家的培养，一方面，在吸收会员和把显露出创作才华的青年提拔到协会机关问题上表现出官僚主义的拖拉作风；另一方面，苏联作家协会一些人自己毫无创作建树，但又阻碍培养和提拔有才华的青年。

5. 不懂得苏联批评的思想教育作用，结果往往使批评从教育的手段变成了变态的行政奖惩。

为了巩固协会和改进其工作，苏联作家必须把苏维埃民主、领导工作中和解决问题时的同志式的集体性、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的友好合作等原则作为协会活动的基础。苏联作家协会是民主的创作组织，在这里绝对不允许一长制的行政领导方式。创作问题，帮助创造新的有充分价值的作品，提高它们的质量，把它们推广到群众

中去，这应该是协会及其领导主要的关心对象。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协会必须为作家的的工作提供良好的气氛，考虑每一位语言大师的个人的文学特点。

协会应该保证对文学杂志的日常领导，因为文学杂志是与作家在工作中保持联系的最重要的环节。协会应该坚决地为提高文学作品的质量、为以更严格标准评价作品而斗争，并以此杜绝那些平庸的、拙劣的和看风使舵的东西。协会应该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上，应该组织对作品进行认真的、不带偏见的讨论，坚持社会评价，永远抛弃公文批示、决议或者行政奖惩等危害极大的做法。坐在办公室里靠看记录和发指令来领导文学生活的种种想法都应该结束了。作家眼中的协会应该是创作的集体，而不是只会抓小事、发公文的衙门。

为作家提供物质生活条件问题，应该集中由作家协会下属的文学基金会负责。从事文学劳动的工作者的物质状况必须改善，将来也可通过修订著作权法和调整文学稿酬的办法来解决。

作家协会及其领导承担着对其成员进行政治—社会教育，使作家与共产党、与苏联文学的鼓舞者——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与苏联知识界各方面的队伍保持经常的创造性合作的责任。苏联作家协会在加强苏联人民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国际主义联系的同时，应该促进国外进步知识界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斗争。

协会有义务竭尽全力加强评论的教育作用，通过评论向广大劳动群众介绍古典的和当代苏联文学的优秀作品。评论应该以帮助作家创作和培养读者艺术趣味为自己的宗旨。

苏联作家协会及其领导承担着培养和提拔青年文学干部、向他们提供严肃认真的帮助的特殊责任。在涉及造就一批语言艺术大师、“灵魂的工程师”——苏联作家的问题时，尤其需要对人的布

尔什维克式的关心和爱护。

为了巩固苏联各族人民兄弟般的联盟，作家们应该竭尽全力促进苏联各族人民相互间的文化交流和精神发展，促进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民族文学的繁荣。

联共（布）中央号召苏联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正在建设共产主义的千百万人的斗争热忱和伟大劳动。苏联作家的创作应该是人类艺术发展中的新的篇章。

联共（布）中央  
1938年8月 [……]

№02163

法捷耶夫、巴甫连科  
关于奖励作家名单致安德列耶夫的信

(不晚于 1939 年 7 月 26 日)

亲爱的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

我们把下面几位大作家列入了奖励名单，但对他们的政治面貌有怀疑。留待中央审查：

巴别尔，伊萨克·埃马努伊洛维奇

帕斯捷尔纳克，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

奥廖沙，尤里·尼古拉耶维奇<sup>①</sup>

爱伦堡，伊里亚·格利哥里耶维奇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A. 法捷耶夫

П. 巴甫 [连科]

<sup>①</sup> 此处有误，应为尤里·卡尔洛维奇。

№02164

## 安德列耶夫关于拟奖励作家问题 致斯大林的报告（草稿）

（不晚于1939年7月26日）

联共（布）中央——斯大林同志

现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奖励苏联作家（由法捷耶夫和巴甫连科同志向中央提名）的命令草案送给您。呈请奖励的作家名单已经贝利亚同志审阅。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掌握的材料中，有些材料证明下列作家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有问题：

B. M. 英贝尔

阿·萨·伊萨基扬<sup>①</sup>

达·拉·贝格尔森<sup>②</sup>

米·谢·戈洛德内<sup>③</sup>

米·阿·斯维特洛夫（舍因斯曼）<sup>④</sup>

尼·尼·阿谢耶夫<sup>⑤</sup>

H. П. 巴让

B. П. 卡达耶夫

① 伊萨基扬，阿维季克·萨科维奇（1875～1957），苏联亚美尼亚诗人。革命前有诗集《歌曲与创伤》，长诗《阿布拉·阿拉·玛丽》。1911～1936年主要侨居国外。

② 贝格尔森，达维德·拉斐洛维奇（1884～1952），苏联犹太作家。

③ 戈洛德内（爱泼施坦），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1903～1949），苏联俄罗斯诗人。

④ 斯维特洛夫，米哈伊尔·阿尔卡季耶维奇（1903～1964），苏联俄罗斯诗人，剧作家。他的反映内战时期浪漫精神和青年激情的诗集曾广泛流传。

⑤ 阿谢耶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89～1963），苏联俄罗斯诗人。

雅库勃·柯拉斯<sup>①</sup>

扬卡·库帕拉

萨·雅·马尔夏克<sup>②</sup>

阿·西·诺维科夫—普里波伊<sup>③</sup>

П. А. 巴甫连科

Н. Ф. 波戈廷 (斯图卡洛夫),

尼·谢·吉洪诺夫<sup>④</sup>

弗·马·巴赫梅吉耶夫<sup>⑤</sup>

В. А. 拉夫列尼约夫

Л. М. 列昂诺夫

伊·奥·莫萨什维利<sup>⑥</sup>

费·伊·潘菲洛夫<sup>⑦</sup>

马·法·雷利斯基<sup>⑧</sup>

利·尼·谢芙琳娜<sup>⑨</sup>

А. Н. 托尔斯泰

К. А. 费定

- 
- ① 雅库勃·柯拉斯 (1882~1956), 原名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密茨凯维奇, 苏联白俄罗斯诗人。1929年出任白俄罗斯科学院副院长。
- ② 马尔夏克, 萨穆伊尔·雅科夫列维奇 (1887~1964), 苏联俄罗斯诗人, 翻译家。苏联儿童文学经典作家。
- ③ 诺维科夫—普里波伊, 阿列克塞·西雷奇 (1877~1944), 原姓诺维科夫, 作家。曾参加过革命运动。
- ④ 吉洪诺夫,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 (1896~1979), 作家, 社会活动家。1944~1946年间任作协理事会书记。
- ⑤ 巴赫梅吉耶夫, 弗拉基米尔·马特维耶维奇 (1885~1963), 作家。
- ⑥ 莫萨什维利, 伊洛·奥尼西莫维奇 (1896~1954), 苏联格鲁吉亚作家。
- ⑦ 潘菲洛夫, 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 (1896~1960), 作家。1931~1960年任《十月》杂志主编。
- ⑧ 雷利斯基, 马克西姆·法捷耶维奇 (1895~1964), 苏联乌克兰诗人, 社会活动家。
- ⑨ 谢芙琳娜, 利季娅·尼古拉耶芙娜 (1889~1954), 作家。

M. C. 沙吉尼扬

维·鲍·什克洛夫斯基<sup>①</sup>

彼·乌·布罗夫卡<sup>②</sup>

B. A. 格拉西莫娃

瓦·瓦·卡缅斯基<sup>③</sup>

B. A. 卢戈夫斯科伊

阿·亚·苏尔科夫<sup>④</sup>

和贝利亚同志一道审查了这些材料，我认为英贝尔、伊萨基扬、贝格尔森、戈洛德内和斯维特洛夫（舍因斯曼）无论是根据证明他们有问题的材料的性质，还是因为他们近年来在苏联文学中的声望完全微不足道，都应该从呈请奖励的名单中删除。

在我所列举的其他作家的有关材料中，证明下列作家有问题的材料值得注意：诺维科夫—普里波伊、潘菲洛夫、阿·托尔斯泰、费定、雅库勃·柯拉斯、扬卡·库帕拉、谢芙琳娜、雷利斯基、巴甫连科。必须指出，这些材料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联共（布）中央在此之前不了解的东西。

至于其他被提名奖励的作家，虽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材料证明在某种程度上有问题，但考虑到他们在苏联文学中的意义和工作，仍然可以奖励。

① 什克洛夫斯基，维克多·鲍里索维奇（1893—1984），作家，文艺学家。有论述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的专著。

② 布罗夫卡，彼得·乌斯季诺维奇（1905—1980），苏联白俄罗斯诗人。著有诗集、长诗、长篇小说等。

③ 卡缅斯基，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1884—1961），苏联俄罗斯诗人，俄罗斯最早的飞行员之一。首创“飞机”（самолёт）一词。著有描写俄国历史上三大农民起义的浪漫主义长诗《斯坚卡·拉辛》、《叶梅里扬·普加乔夫》、《伊凡·波洛特尼科夫》等。

④ 苏尔科夫，阿列克塞·亚历山大罗维奇（1899—1983），苏联俄罗斯诗人，社会活动家。除诗歌外，还写了一些流行歌曲的歌词。

№02165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  
关于《十月》杂志的决定  
(1939年8月4日)

关于《十月》杂志。

1. 据查，诗人И. 谢尔文斯基<sup>①</sup>在《十月》杂志上以“抒情诗”为幌子贩卖某种阿尔齐巴舍夫<sup>②</sup>的货色——在对待妇女态度问题上庸俗、无耻、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观点。И. 谢尔文斯基在《评论家——颠覆者的独白》一诗中歌颂“心口不一的诗”，美化特务和颠覆者。向《十月》杂志编委会指出，它在杂志1939年第5-6期合刊上刊登И. 谢尔文斯基一系列反艺术的和有害的诗，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2. 《十月》杂志编委会成员B. 伊利延科夫签字同意付印刊载谢尔文斯基诗的《十月》杂志第5-6期合刊，给予警告处分。

3. 向萨德奇科夫<sup>③</sup>同志指出，书刊总局的工作人员准许《十月》杂志第5-6期合刊刊。载伊·谢尔文斯基的诗，表现出腐朽的自由主义。

① 谢尔文斯基，伊利亚·利沃维奇（1899-1968），俄罗斯作家。

② 阿尔齐巴舍夫，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1878-1927），俄国作家，主要作品是自然主义的长篇小说《沙宁》，否认道德论。

③ 萨德奇科夫，（1904-1967），1938-1946年为苏联人民委员会负责报刊保密事务的全权代表、书刊出版总局局长。

№02166

## 波斯佩洛夫关于文学杂志的编辑工作

### 致联共（布）中央的报告

（1939年8月19日）

#### 关于文学杂志的编辑工作

翻阅一下1939年度出版的一系列文学杂志就会看到，杂志的领导工作不能令人满意。杂志就内容而言明显地落后于生活，落后于苏联读者的需求。《红色处女地》、《十月》、《星》、《文学学习》等杂志作为苏联作家协会的机关杂志和当代文学期刊，在6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刊载一部描写苏维埃国家当代现实的大型作品。这些号称是艺术和社会—政治文学、评论和政论性的杂志，在半年中没有刊登过一篇阐述我们社会生活问题的像样文章。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文学杂志对于像作家受奖这类苏联文学和苏联人民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没有做出反响。杂志对于十八大决议为我们苏联文学提出的问题保持沉默。

杂志的篇幅上几乎见不到对共产主义教育、共产主义道德、反对人们思想意识中资本主义残余、苏维埃爱国主义等问题的阐述，政论文章不阐述诸如在经济方面如何赶上和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问题以及联共（布）十八大历史性决议所提出的其他问题。

例如，在《红色处女地》杂志上，几乎没有论述党的十八大决议以及大会决议给文学和文化领域提出的任务的文章。杂志所刊载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描写过去的。杂志的编辑工作粗心大意。《红色

处女地》第5-6期合刊在关于诗人内扎米<sup>①</sup>的编辑注释中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众所周知，诗人内扎米是阿塞拜疆的人民诗人，阿塞拜疆人民正在广泛纪念他。毫无疑问，《红色处女地》杂志主编和苏联作家协会书记法捷耶夫同志对此是清楚的，他曾经向中央提交过纪念内扎米的活动计划。然而，在《红色处女地》杂志第5-6期合刊（第22页）上，在编辑注释中，内扎米竟然被说成是伊朗诗人。

《十月》杂志出现了严重的意识形态上的失误，刊载了И. 谢尔文斯基反艺术的和有害的诗，联共（布）中央组织局的决议已对这些诗做出了评价。

浏览一下1939年的《文学学习》杂志就可以看出，杂志现在脱离读者，脱离苏联文学生活。办杂志的不是作家劳动方面的优秀大师，而是一些外行人。因此杂志的篇幅充斥着反科学的奇谈怪论，诸如“作家职业的基本前提是专门的生物学的天赋”，“写作的艺术——这首先是生活的艺术”，或者是“无知比‘一知半解’更有优越性”，“我们至今还没有真正适用于作家的文学理论”，等等。

如何来解释杂志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失误及其落后状况呢？

问题在于杂志的编辑委员会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编委会实质上时常变成了徒有其名的一块招牌。作家把进入编辑委员会看成是某种荣誉，而不是看成必须做工作的职务。有些作家同时参加几个编辑部（例如潘菲洛夫同志既是《十月》的编辑，同时还进入《红色处女地》杂志编辑委员会；肖洛霍夫同志一身兼任《十月》和《新世界》两家杂志的编委）。在对杂志的领导中，编委会无所作为，缺乏应有的秩序和责任感，许多杂志实际上由非党的工作人员

<sup>①</sup> 内扎米（约1141--约1209），阿塞拜疆诗人，思想家。

主持，而他们通常又是在政治上未经审查的。

以《红色处女地》杂志为例。这家杂志编委会的成员是：В.И. 巴赫梅吉耶夫、Ф. 别列佐夫斯基<sup>①</sup>、Вс. 伊万诺夫、И. 卢波尔<sup>②</sup>、Ф. 潘菲洛夫、А. 法捷耶夫、М. 沙吉尼扬。可是这些同志在半年时间里没有一人为《红色处女地》写过一行文字：既没有写文艺作品，也没有写评论随笔，更没有就社会政治问题写过文章。例外的只有法捷耶夫同志，他正式签字批准杂志付印，可是正如关于诗人内扎米的编辑注释所表明的那样，法捷耶夫同志显然没有通读全本杂志。另外一些编委则更少参加编辑工作了。

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在《红色处女地》杂志编辑部里实际上起主要作用的是非党工作人员斯图普尼凯尔，他只是杂志的秘书，可是却成了杂志的实际主人。斯图普尼凯尔主持《红色处女地》的一切事务：他为每一期选择材料（也就是决定刊登什么和不采用什么问题），与作者洽谈，等等。

斯图普尼凯尔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请看他的自传中的某些情况。1902年出生在罗兹市（波兰），犹太人。父亲是商品推销员，在“新经济政策开始时出现的私营企业”里继续从事这种职业，直到1924年。斯图普尼凯尔入了党，可是过了一年之后——斯图普尼凯尔写道——“明显地感到自己对党的工作缺乏准备，退了党”。就斯图普尼凯尔的去而言，他是个很可疑的人，跟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他曾经在斯克良斯基的秘书处工作过。

后来，斯图普尼凯尔当上《共青团年鉴》杂志的秘书，那家杂

① 别列佐夫斯基，费奥克季斯特·阿列克谢耶维奇（1877～1952），作家，党的工作者。

② 卢波尔，伊凡·卡皮托诺维奇（1896～1943），文艺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有哲学史、美学和文学方面的著作。1939年起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志的编辑是另一个积极的托洛茨基分子拉·沙茨金<sup>①</sup>。从那时起，斯图普尼凯尔便成了“记者”，在基尔雄当主编的《在文学岗位上》、《罗斯塔》工作过，等等。现在，这个在政治上很可疑的人是苏联最大的中央一级的文学杂志之一——《红色处女地》的实际主人。还应该补充一点，斯图普尼凯尔没有受过任何政治的和文学的教育。

另一家大型杂志《十月》的一切事务都由恰科夫斯基<sup>②</sup>同志主持，他只是不久以前才提出了入党申请。恰科夫斯基开始以编辑部秘书的身分签字同意杂志付印，尽管只有编委才有这种权利。不久以前出版《十月》第5-6期合刊的时候，书刊总局的工作人员对于刊登谢尔文斯基的两首诗（《抒情诗》和《颠覆者的独白》）产生怀疑，恰科夫斯基动员一切力量对书刊总局的工作人员施加影响。恰科夫斯基跟谢尔文斯基一起到书刊总局去，终于达到目的，在杂志上发表了这两篇有害的和庸俗的诗。

为了消除当前文学杂志领导工作中的混乱和无人负责的状态，首先必须采取一系列组织措施（设立编辑部责任书记的职务，审批新的编委会成员，等等）。

附上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就这个问题的决定草案。<sup>③</sup>

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П. 波斯佩洛夫

1939年8月19日

① 拉扎里·沙茨金（1902~1937），曾任全俄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27~1930年间是联共（布）中央委员。

② А.Б. 恰科夫斯基（1913~?），作家。

③ 参见本专题文件№02167。

№02167

##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 关于文学杂志的编辑工作的决定

（1939年8月20日）

关于文学杂志的编辑工作（波斯佩洛夫、法捷耶夫、潘菲洛夫、马林科夫、谢尔巴科夫、日丹诺夫同志）

联共（布）中央决定：

1. 经证实，在《十月》、《红色处女地》等文学和政论杂志的最近几期上，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十月》杂志第5-6期合刊发表了И. 谢尔文斯基反艺术的和有害的诗，《红色处女地》第5-6期合刊中关于诗人内扎米的编辑注释）。这些思想方面的失误、宣扬意识形态上可疑和有害的倾向，以及杂志的内容落后于苏联的现实和苏联读者的需求，这一切都直接与杂志领导工作中的混乱和不负责任态有关，其表现为编辑部里实质上无人负责对杂志的思想政治领导。这种状态和严重错误在其他杂志（如《星》、《文学学习》等）中也存在。许多文学杂志实际上由非党的不负责的工作人员主持，他们常常在政治上未经审查；而编辑委员会成员经常是不作任何评论和检查，就在材料上盖章，或者甚至根本没有读过那些他们签字同意发表的东西。

2. 为了消除文学杂志编辑工作中无人负责的现象，必须由责任书记领导杂志编辑部，他应该对杂志的思想政治方向和内容负责，负责组织作者集体，负责做作者的工作，等等。责任书记应该

领导杂志的编辑委员会，主持其工作。

3. 建议中央宣传鼓动部会同中央干部管理局在 10 天之内提出各文学杂志编辑部责任书记人选交联共（布）中央审批。任命杂志责任书记以后，在他们参与下挑选和组建杂志的编辑委员会。

4. 责成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彻底改进对文学杂志的领导。

5. 责成中央宣传鼓动部报刊处监督本决定的执行并对文学杂志的工作进行系统的监督。

**№02168**

**波斯佩洛夫、波利卡尔波夫  
关于剧本《暴风雪》等问题  
致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0年8月30日)

联共（布）中央书记——安·亚·日丹诺夫同志

苏联人民委员会艺术事务委员会主席赫拉普钦科同志批准剧院上演列昂诺夫意识形态上有害的剧本《暴风雪》<sup>①</sup>。剧本的主题是苏维埃政权从前的敌人变成了人民的朋友。它的基础是一种不真实的想法，即一些从前的敌人是英勇和高尚的，是苏维埃现实中的渺小人物所不可比拟的，他们能够成为祖国的真正爱国者。剧本的正面英雄是从前当过白卫军官的流亡者波尔菲·瑟罗瓦罗夫，他体现了人的高尚品格。作为反面人物与他相对立的是他的亲兄弟，游击队指挥官、共产党员、工厂厂长——斯捷潘·瑟罗瓦罗夫。前者是英勇和高尚的典范，是个具有明确目的、意志坚强的人；后者则是个卑劣的小人，为了个人的渺小私利而准备出卖自己。

剧本的结局是：白卫分子努力向祖国赎罪，参加西班牙内战，站在共和派一方，最后返回苏联，而他的兄弟住在苏联，干尽了卑鄙下流的勾当，弄到了出国护照，想要逃脱罪责，但被揭露。

按照列昂诺夫的想法，资本主义现实甚至能把革命的敌人改造

---

<sup>①</sup> 1940年8月，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向斯大林奖金政府评审委员会推荐申报了24部作品，其中有列昂诺夫的这个剧本。

成社会主义的朋友。苏联的现实则是另一码事。在这里没有可能改造和重新教育人，他们处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得不掩盖自己的罪行，为免受良心谴责而出逃国外。剧作者通过斯捷潘·瑟罗瓦罗夫的形象把这一点概括成为典型的现象，概括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

《暴风雪》是对苏联现实的诽谤。剧中大量的影射和阴暗之处，显然是为了歪曲现实、给现实抹黑的。看吧，事情就是这样的：人们互不信任，彼此偷听偷看，这里“每扇门都是一只大耳朵”，而“对最主要的事情……却轻描淡写”，真正的人“没有安身立足之地”。甚至正面人物都说：“地上没有真理，真理在天上”，“找到埋藏的财宝比找到一个有用的人要容易”。

苏联的现实——这是一个蜂箱，“站在远处爱它更安全一些”，人们在这里上一所“互不信任的大学校”。

列昂诺夫究竟是从哪里弄来这一切的？剧中没有一个正常的苏维埃人。这里或是一些有道德缺陷的人，或是生理上的残疾者，或是笨蛋。惟一没有缺陷的人——是老布尔什维克波塔绍夫，可是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个公式。集体农庄的先进人物是以嘲弄的笔调来刻画的。这是一些小丑式的人物，与集体化的农民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这样的剧作出现在剧院里只会带来害处。本来应该禁止上演这个不真实的剧本，可是赫拉普钦科同志却批准了演出。剧本被 20 家剧院接受，其中包括像国立模范小剧院这样的剧院。

我们认为必须指出，赫拉普钦科同志不顾剧目委员会的反对，还批准上演其他一些不真实的剧本，例如，格列博夫<sup>①</sup>的《开诚布公》，卡扎科夫<sup>②</sup>的《当我一个人的时候》，卡达耶夫的《小房

① A. Г. 格列博夫 (1899--1964)，剧作家。

② 应为 M. Э. 科扎科夫，其主要作品有描写革命前俄国的长篇历史小说。

子》。

与此相关，便产生了关于剧目委员会的权力和作用的问题。目前，剧目监督机关隶属于艺术事务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它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剧目委员会关于剧本的意见没有任何决定性意义。

如果能让这些机关脱离委员会而独立，也就是把它们交给书刊总局管辖，是比较合适的。这将极大地提高对剧目监督的质量。

《苏联艺术报》的行为很值得注意。列昂诺夫有些剧本本来或多或少是可以接受的，而这家报纸却对这些剧本给予激烈的否定性评论；但对于这个不真实的剧本却备加赞扬，宣布它为戏剧中的重大现象。

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请求您下令禁止《暴风雪》一剧演出，以及允许把剧目监督工作移交书刊总局管辖。

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П. 波斯佩洛夫

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文化教育机构部主任

П. 波利卡尔波夫

1940年8月30日

No02169

## 库兹涅佐夫关于《暴风雪》问题 致联共（布）中央的报告

（1940年8月30日）

### 关于《暴风雪》

从戏剧的角度来看，剧本写得很好，很巧妙，——演员有戏可演，有许多能赢得观众的场面。可是从意识形态方面和情节上来看，剧本却引起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是强制你与一些不正常的病态心理的人一起坐了一个晚上，当这一切结束以后，可以走到外面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的时候，你就会痛痛快快地伸直腰，轻松地深深吸口气，急急忙忙地跑去洗手，希望有一种好的光明的东西，以便尽快地把刚刚看到的和听到的噩梦般的一切忘掉。

毫无疑问，剧本就其思想内容来说体现了最坏意义上的新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义。主题没有社会现实意义，没有提供能够反映我们现实的典型，充满政治上模棱两可和虚假的论点。

我建议这样做：出版剧本，但禁止在剧院演出。这是比较正确的做法，因为，第一，有可能对作者进行严肃的批判；第二，证明

并非任何剧本都可以搬上舞台（这种情况并不少，比列昂诺夫更大的作家也会发生，——这是合情合理的并且很适宜的批判形式）。

阿·库兹涅佐夫<sup>①</sup>

8月30日

---

<sup>①</sup> 库兹涅佐夫，阿列克塞·亚历山大罗维奇（1905～1950），时任列宁格勒州委和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

№02170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  
关于《开诚布公》等剧本的决定

（1940年9月14日）

关于剧本《开诚布公》、《小房子》、  
《当我一个人的时候》

剧本《开诚布公》——作者格列博夫，《小房子》——作者卡达耶夫，《当我一个人的时候》——作者卡扎科夫<sup>①</sup>，在意识形态上是有害的，也是反艺术的，禁止在剧院演出。

<sup>①</sup> 应为科扎科夫。

№02171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关于剧本《暴风雪》的决定

（1940年9月18日）

### 关于剧本《暴风雪》<sup>①</sup>

1. 列昂诺夫的剧本《暴风雪》在意识形态上是敌对的，是对苏联现实的恶毒诽谤，禁止在剧院演出。

2. 向苏联人民委员会艺术事务委员会主席赫拉普钦科同志指出，他批准《暴风雪》一剧演出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警告赫拉普钦科同志，他如果重犯类似的错误，将被解除职务。

---

<sup>①</sup> 在此之前，中央组织局已于1940年9月16日就这个问题做出了决定。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措词与组织局的决定完全相同。在9月18日当天，苏联人民委员会也做出了相同的决定。

№02172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  
关于苏联作家协会文学基金会和  
保护著作权管理局基金会的决定**

（1940年9月21日）

**关于苏联作家协会文学基金会和  
保护著作权管理局基金会<sup>①</sup>**

1. 撤消作家协会对苏联文学基金会及其一切机构和附属企业以及对保护著作权管理局的管辖，将其移交给苏联人民委员会艺术事务委员会管辖。

2. 与本决定相适应，责成艺术事务委员会在国家监察局的参与下：1) 在一昼夜的期限内接管文学基金会和保护著作权管理局基金会的现有经费；2) 从即日起停止从上述基金会支付经费；3) 在5天的期限内全部接管文学基金会和保护著作权管理局的一切业务，将结果上报联共（布）中央，并且在这个期限内向中央提出整顿两个基金会开支的具体建议，杜绝游手好闲者和懒汉利用基金的一切可能性。

---

① 组织局的这一决定由亚历山德罗夫、法捷耶夫和波利卡尔波夫起草。在草案的序言中说明了采取这一措施的原因：“联共（布）中央注意到了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工作中的严重缺点。……放弃了自己领导文学方面的基本任务。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协会没有及时发现如下事实：阿夫杰延科的反苏维埃作品、出现一些意识形态上有害的和反艺术的剧作如列昂诺夫的《暴风雪》、卡达耶夫的《小房子》、科扎科夫的《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格列博夫的《开诚布公》，而中央不得不禁止演出这些剧本”。日丹诺夫对草案作了修改，删去了序言。

No02173

## 克鲁宾关于阿赫玛托娃的诗集

### 致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0年9月25日)

联共(布)中央书记安·亚·日丹诺夫同志<sup>①</sup>

#### 关于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诗集

“苏联作家”出版了安娜·阿赫玛托娃1912~1940年的作品选集。主要是再版了她在革命前写的东西。

有十几首诗(集子中共有200多首)注明写于1921~1940年,但也都是“老调”重弹。

集子中没有表现革命和苏维埃主题和描写社会主义的人的诗作。这一切都被阿赫玛托娃给忽略了,“不值得”她注意。

出版者没有弄懂阿赫玛托娃的诗,可是她本人却于1940年对

---

<sup>①</sup> 日丹诺夫在报告第一页上批示:“送亚历山德罗夫和波利卡尔波夫同志。在出版邱里林的‘诗集’之后,‘苏联作家’出版社又出版阿赫玛托娃的‘诗集’。据说‘苏联作家’的主编同时还领导青年近卫军出版社。有这样的诗集问世,可以说,简直是耻辱。阿赫玛托娃的‘淫乱加上为上帝的荣耀祈祷’怎么能够问世呢?是什么人促成的?书刊总局的立场是什么样的?把问题查清,提出建议。日丹诺夫。”亚历山德罗夫,1940~1947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M.T. 邱里林(1885~1946),诗人。阿赫玛托娃,安娜·安德列耶芙娜(1889~1966),原姓戈连科,苏联俄罗斯诗人。擅长心理描写,表现出对历史的敏感。

自己的诗做了说明<sup>①</sup>：

“……在诗中一切都应不合时宜，  
而不像在人那里那样。  
但愿你有朝一日将会知道，  
诗从垃圾中长出，不知羞耻……”（选集第 42 页）

产生阿赫玛托娃诗的垃圾有两个来源，她的“诗歌”就是描写这两个来源的：上帝和“自由”爱情，为此而从宗教图书中借用“艺术”形象。

\* \* \*

“天使守护了我三年，  
在光和火中翱翔，  
我焦急地期待着甜蜜的一天，  
他将重新回到我的身边。”（选集第 53 页）

“我以天使的花园发誓，  
我以神奇的圣像发誓。”（第 61 页）

“而如今女主角是斯摩棱斯卡娅，  
草地上弥漫着蓝色的神香，  
追悼亡灵的歌声缭绕四方……”（第 63 页）

“在天堂的白色门槛上，

---

<sup>①</sup> 报告作者引用阿赫玛托娃的诗句时有很多错误。

我环视四周，高喊‘我等着！’  
他临死时遗留给我的  
是安乐和贫穷。”（第71页）

“上帝呀，我可是为此才歌唱，  
为此才领了爱情的圣餐。”（第124页）

“我祈祷……飞升到力量和光荣的圣坛……  
我直挺挺地躺着：天马可会碰到，”（第132页）

“你的年轻的六翼天使……  
用我的祈祷的供桌，”（第137页）

“自从梦见你的那时开始，  
黑色天使的翅膀尖尖，  
末日审判将很快到来。”（第139页）

“在空空的冰冷的屋子里，  
我不计算死人般的日子，  
我读着使徒的书信，  
我念着圣诗的话语。”（第140页）

“弗拉季米尔在河上，  
举起黑色的十字架……  
……宝石般的闪闪繁星  
向着上帝飞升而去。”（第142页）

“冬天的早晨，上帝的天使  
秘密地给我们举行了订婚礼……”（第 150 页）

“关于未卜先知的人和基督的未婚妻”（第 179 页）

“我们在何处举行了婚礼——我们不记得，  
但是这座教堂闪耀着  
那种疯狂的光辉，  
惟有天使才能用白色的翅膀  
带来这种光辉。”（第 183 页）

“第一缕光线——是上帝的祝福”（第 210 页）

“我应该等待着末日审判”（第 211 页）

“我不需要渺小的幸福”（第 215 页）

“无穷尽的只有蔚蓝的天空  
以及上帝的仁慈。”（第 216 页）

“我面前是金色的读经台，  
灰眼睛的未婚夫和我在一起。”（第 234 页）

“我学会了简朴而明智地生活，  
仰脸望天向上帝祷告。”（第 243 页）

“我死的时候渴望着不朽”（第 251 页）

“圣像下面铺着磨破了的毯，  
神灯的火苗不停地抖动。”（第266页）

“那时我曾在地上做客”（第271页）

“安葬”（第292页）

“切莫用人间享乐让心儿疲惫，  
不要贪恋妻子和家庭，  
从自己孩子手里把面包拿走，  
好把面包送给别人，  
做一个最温顺的仆人，  
侍奉曾是你的凶恶仇敌的人……”（第49页）

\* \* \*

“……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编造故事，  
地上常常会有爱情。  
由于懒惰或是寂寞，  
大家相信别人也这样生活。”（第200页）

“我只顺从上帝的旨意。  
我不愿意颤抖和痛苦，  
丈夫是刽子手，他的家是监狱。”（选集第78页）

“别人的东西我不需要，  
我自己的东西也懒得计算。  
因此才这样高兴

看见樱桃般的小嘴。”（第 88 页）

“……请原谅，请原谅，  
我为你吃尽了苦头。”（第 194 页）

“人间的光荣如烟云，  
我祈求的不是这个。  
我给我所有的情人  
带来过幸福。”（第 95 页）

“……我只是颤抖了一下：  
这个人能把我驯服”（第 219 页）

“……爱情的渴望已经满足。  
你是自由的，我也是自由的，  
明天将会比昨天更好……”（第 261 页）

必须禁止阿赫玛托娃的诗流传。

Д. 克鲁宾<sup>①</sup>

1940 年 9 月 25 日

<sup>①</sup> Д. В. 克鲁宾（1895～1982），1938～1958 年间任联共（布）中央总务部部长。

№02174

亚历山德罗夫、波利卡尔波夫  
关于《警告处分》致联共（布）中央的报告

（1940年9月26日）

联共（布）中央书记  
安·安·安德列耶夫同志  
安·亚·日丹诺夫同志  
格·马·马林科夫同志

关于鲍里索夫<sup>①</sup>的《警告处分》一书

车里亚宾斯克州立出版社准备出版鲍里索夫的《警告处分》一书。这本书（长篇小说）是对党、对社会主义、对苏维埃人肆无忌惮的恶毒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诽谤。作者造谣中伤，恣意歪曲地描绘了在粉碎托洛茨基—布哈林间谍匪帮时期党内和国家的状况。在鲍里索夫的小说中，事情被描写成这样：党和人民的敌人窃取了所有的党务和经济领导岗位，为所欲为地嘲弄人民，压迫人民，对人民使用恐怖手段。苏维埃人被置于绝境之中，进行诚实的活动和与敌人斗争的一切途径对他们都是关闭的。向党的最高机关投诉，只能使苏维埃人的处境更加恶化。在正直的人们中间，包括党员中间，笼罩着惊惶不安和不知所措的情绪。甚至先进的党员由于恐惧而产生了不可能与敌人斗争的想法。女共产党员薇拉·科姆列娃的女友娜佳·阿尔让诺娃无辜受到奸细迫害，薇拉劝说她不要投诉。薇拉

<sup>①</sup> 鲍里索夫，列昂尼德·伊里奇（1897—1972），作家。

说：“丢掉这个打算吧。什么结果都不会有……首先，不会撤消对你的警告处分，而麻烦的事却是要多少有多少。即使是撤消了，你今后也就别想在这里工作了……你也许是冤枉的。可是你知道，给你个警告处分，这要比把错误报到局里好一些。”

书中事件的进程被表现成这样：诚实的女共产党员娜佳·阿尔让诺娃最后被开除出党，含冤而死。

作者肆无忌惮到这种程度，竟公开地对苏联现实抹黑和谩骂，对资本主义大加赞扬。按照作者的意见，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证据是不可否认的，女共产党员薇拉·科姆列娃跟破坏分子奥尔列安斯基进行第一次谈话时就动摇了自己的信念。薇拉在同阿尔让诺娃谈话时宣称：“我们从哪里了解资本主义呢？也许这真的不那么可怕（她本来想要说‘很坏’，可是及时地缓和了语气，说了个‘可怕’）。”（第148~149页）

鲍里索夫的书恣意鼓吹托洛茨基的反革命观点。

请看小说《警告处分》的“主人公”的某些议论：“一个政治活动家，不管他多大年纪，在一定时刻只能依靠青年”，破坏分子奥尔列安斯基说。他又继续说：“政治是少数人的采邑。从事政治的是个别人，执行政治的是成千上万的人。而从事和执行可是天壤之别。从前，是哪些人从事政治呢？一小撮大臣，一部分高等贵族，甚至还有拉斯普廷。请想想看，拉斯普廷。而执行政治的呢？也就是如现在所说的，贯彻实施……执行者随时随地都能找得到……如果你本人没有能力从事政治，那么你就乖乖地执行吧。”（第135~136页）就是这个奥尔列安斯基说：“集体农庄庄员仍然是过去的农民，他们幻想回到旧时代去。优秀的人物——曾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从前的共产党员——最后终于相信，所做的事都是徒劳的。”（第142页）

在鲍里索夫的小说里，党的敌人、破坏分子的反革命言论既没

有从正直的党员方面，也没有从非党的苏维埃人方面得到严肃的还击。按照鲍里索夫的想法，人民的敌人周围是没有意志的愚昧无知的群众，都服从他们。根据下面一段议论可以看出鲍里索夫本人的观点：“这天，他们从无线电里听到一批最著名的党的工作者被逮捕，他们原来都是外国的特务。”（第124页）。对于鲍里索夫来说，祖国的卑鄙叛徒仍然是“最著名的党的工作者”。

鲍里索夫在小说中没有表现哪怕是一个完美的苏维埃人、布尔什维克。鲍里索夫在书中避而不谈党在国家生活中、在粉碎和消灭人民的敌人的斗争中的作用。可他在小说中却深情地把人民的敌人描写成勇敢的、强有力的、“有思想的”人。当然，在小说结尾，这些人都被揭露，可是这也没有改变书的反苏维埃性质。

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请求禁止出版鲍里索夫的反苏维埃的书《警告处分》。<sup>①</sup>

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 Г. 亚历山德罗夫  
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П. 波利卡尔波夫  
1940年9月26日

<sup>①</sup>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于1940年10月2日作出决定，禁止出版鲍里索夫的小说《警告处分》。

№02175

## 阿谢耶夫关于作协理事会工作问题 致日丹诺夫的信

(1940年10月9日)

安·亚·日丹诺夫同志<sup>①</sup>！

昨天，10月8日，在作家协会理事会上，为吉洪·邱里林的书<sup>②</sup>的问题，我被法捷耶夫同志置于极其难堪的境地。

法捷耶夫同志明知我对邱里林的才华总体上持肯定评价，但事先没有告诉我这本书受到了您的尖锐批评，又认为必须吸收我参加关于这本书冗长的争论，其目的显然是要把我的浅薄的文学见解与您的无可争议的政治威望对立起来。最后，这里谈论的已经不是吉洪·邱里林的书了。我并不想要维护这样的一本书，如它现在被拿出来的样子。可是一位不无才华的老诗人过着饥饿的生活，被大家所遗忘，因此在创作中难免有些发狂，——他的命运使我不安。法捷耶夫同志坚决认为邱里林毫无才华，完全无用。我所反对也正是这一点。支持我的意见的有趣味各不相同的人，如K.A. 特列尼约夫、B.Б. 什克洛夫斯基、С.Я. 马尔夏克。法捷耶夫同志向我们宣读了您在邱里林的书上所做的批语，从而使我以及别的一些同志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把自己的意见隐瞒起来，要么和您对这本书的反应进行争论。

① 日丹诺夫在这封信上批示：“转波利卡尔波夫同志。查清是怎么回事，然后汇报。日丹诺夫”。

② 即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邱里林的《诗集》。

可是问题已被替换了。本来任何人都没有维护这本现在这个样子的书。作家们发表意见并维护的是一个人，他们在他身上发现了才华的火花，尽管这种才华有些病态和被扭曲了，可是毕竟需要对他给以关注。

突如其来地遭到指责，我不知所措，但感到一个问题被另一个问题更换了，所以在争论的狂热之中没有找到所需要的论据，便大发脾气，因此心绪不佳，结果受到法捷耶夫同志一顿教训，他说应该尊重领袖的意见并且爱戴他们。我对此好像是回答说，我不习惯于把爱戴暴露在外表。总的来说，谈话具有不愉快的、对于成年人来说不体面的性质。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谈话转到这方面来，可能是为了暴露我的趣味和文学见解的不正确，并再一次表明我是不适合于做组织工作的。

然而，我从来也没有追求参与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工作。我本来就希望摆脱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工作，并非由于受到了委屈，也并非希望保持孤高自傲，而只不过是因为我非常愿意写诗，不想参与任何激情和虚荣的游戏——这在苏联作家协会领导周围沸沸扬扬，而我对此则深感不快和反感。

请求您在这方面给我以帮助。

尼古拉·阿谢耶夫

莫斯科艺术剧院胡同2栋55室

№02176

亚历山德罗夫、波利卡尔波夫  
关于出版阿赫玛托娃诗集问题  
致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0年10月19日)

联共（布）中央书记安·亚·日丹诺夫同志！

情况反映

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审查了出版阿赫玛托娃诗集的问题。书是今年5月由苏联作家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出版的，得到了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的同意和某些列宁格勒作家（特尼扬诺夫、斯洛尼姆斯基、萨亚诺夫等）坚决的支持。

检查材料说明，对于出版阿赫玛托娃的诗，苏联作家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社长布雷金同志、苏联作家出版社社长雅尔采夫同志和书刊总局的工作人员鲍伊钦科同志应该承担责任。苏联作家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社长布雷金同志想尽一切办法加快书的出版，竭力争取市书刊局对此书面世的许可。布雷金同志在提交给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解释中声称，他认为出版阿赫玛托娃的诗集对于他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因为作家们都怀着特殊的兴趣期待着这本书的问世。

出版社的一些编辑曾经建议从集子中删除相当一部分诗作，可是布雷金同志并没有注意他们的意见。

苏联作家出版社社长雅尔采夫同志了解阿赫玛托娃诗的内容，

也了解列宁格勒书刊局反对出版该书，尽管如此，他仍然批准了诗集的出版。

书刊总局的工作人员鲍伊钦科同志在这件事情上表现了不能容许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列宁格勒书刊局曾经就能否出版阿赫玛托娃的诗集向书刊总局的工作人员鲍伊钦科同志请求指示，并且对此表示过怀疑。

鲍伊钦科同志没有找到进行审查干预的根据，于是批准了该书的出版。

同时还查明，书刊总局工作薄弱。书刊总局各处主任对政治编辑不进行领导，对出版图书不负责任。

在书刊总局，对出版文学图书的政治监督委派给了二流的工作人员。

还应该指出，阿列克塞·托尔斯泰竭力鼓吹阿赫玛托娃的诗。在斯大林奖金委员会文学组的会议上，托尔斯泰曾经建议推荐阿赫玛托娃为斯大林优秀文学作品奖金的被提名者。法捷耶夫同志出席了小组会议。

《文学报》7月10日刊登了佩尔佐夫吹捧阿赫玛托娃的诗的文章。

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建议给布雷金、雅尔采夫和鲍伊钦科同志以党纪处分，因为他们对委派给他们的事业采取漫不经心的轻率的态度。

建议对书刊总局的工作进行专门的细致检查之后加强对文学作品出版工作的政治监督。

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 亚历山德罗夫

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瓦·波利卡尔波夫

1940年10月19日

№02177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  
关于出版阿赫玛托娃诗集的决定

（1940年10月29日）

关于出版阿赫玛托娃诗集的问题

1. 注意到，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工作人员雅尔采夫和布雷金、书刊总局的政治编辑鲍伊钦科同志出版了阿赫玛托娃在意识形态上有害的、宗教神秘主义的诗集，犯了严重的错误。

2. 苏联作家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社长 H.A. 布雷金同志、苏联作家出版社社长 Г.А. 雅尔采夫同志和书刊总局的政治编辑 Ф.С. 鲍伊钦科同志在出版阿赫玛托娃诗集过程中以不负责任和轻率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职责，给予警告处分。

3. 责成宣传鼓动部对书刊总局的工作进行检查，并且向联共（布）中央提出加强对出版书刊进行政治监督的措施。

4. 查禁阿赫玛托娃的书。

№02178

亚历山德罗夫、普京  
关于文学评论和图书评介状况  
致联共（布）中央的报告  
（1940年11月18日）

联共（布）中央书记  
安·安·安德列耶夫同志  
安·亚·日丹诺夫同志  
格·马·马林科夫同志

关于文学评论和图书评介的状况

宣传鼓动部了解了文学评论和图书评介的状况。检查表明，文学评论和图书评介工作处于极端的放任自流状态。最近一个时期，大多数一般政治性的和专业性的报刊几乎完全没有登载文学评论材料和图书评介文章。

文学评论领域的状况明显地不能令人满意。一系列意识形态上有害的文学作品不仅没有及时受到评论界的批判，反而得到称赞，被当作苏联文学的典范推荐给读者。

评论家们想方设法忽视苏联文学，宁愿从事以前数百年的文学史和抽象的文学理论问题的研究。他们脱离苏联读者，自我封闭在作家协会下属的、脱离作家而独立的评论分部里面。这个分部蜕化为脱离生活的固步自封的帮派。即便是这样一个事实就足以说明它

的面貌：今年全年，评论分部没有分析过一部苏联文学作品。

评论家脱离作家，这也反映在专门杂志《文学评论家》的相当一部分评论家的固步自封上。这家杂志主要从事文学史问题的研究。《文学评论家》3年内（1936—1938）共刊登563篇文章，其中只有8篇不大的文章论述苏联文学的问题。编辑部也承认，杂志没有就苏联文学提出过一个严肃的问题。

评论界存在着无原则的宗派主义。一群评论家（利夫希茨、卢卡奇等）集聚在《文学评论家》杂志周围，另一群（基尔波京、叶尔米洛夫、阿尔特曼等）集聚在《文学报》周围。长期以来，这两个集团相互攻击，在文学边缘上进行空泛的争论。

评论家们违背俄罗斯文学的传统，不参加团结作家的文学杂志。这些杂志变成了平庸的没有特色的文集，对作家的成长很少发生影响。这些杂志形式上都有文学评论栏，但这个栏目是在苟延残喘。《十月》杂志在1940年一年中只登了5篇书评和评论文章。《红色处女地》、《新世界》以及其他一些杂志的状况也是如此。只要说一点就足够了：1939年问世的文学作品只有23%在杂志上得到了反应……

一般政治性的和专业性的报刊实际上不开展文学评论和图书评介工作。如《消息报》和《共青团真理报》不仅不设文学评论和图书评介栏，甚至没有专门的编辑人员负责组织文学评论和图书评介工作。《共青团真理报》对共青团图书几乎没有做出反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在今年的前10个月只出版了55种书。《共青团真理报》仅对青年近卫军版的4种图书做出了反应。编辑部独特的解释是，青年近卫军版的图书质量不高，因此不值得评论……

1935年，联共（布）中央颁布了《关于文学评论和图书评介

事业的组织工作》的专门决定<sup>①</sup>。检查的材料表明，这个旨在彻底改善文学评论和图书评介工作的决定没有得到贯彻。这首先涉及到中央一级的报刊。《真理报》、《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等报纸以及《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指导》、《鼓动员手册》等杂志没有执行联共（布）中央1935年11月14日颁布的决定。

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拟定了改进文学评论和图书评介工作的措施，上报联共（布）中央批准。

附上联共（布）中央的决议草案<sup>②</sup>。

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 Г. 亚历山德罗夫

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А. 普京

1940年11月18日

① 指的是联共（布）中央组织局1935年11月14日的决定。该决定指出，报刊上的图书评介工作不能令人满意，中央关于改进中央一级报刊的图书评介工作的指示至今没有贯彻执行。决定要求，在所有中央、边疆区和州一级的报纸和科学、文艺及群众性杂志上设立文学评论和图书评介栏目；文学评论要有思想水平，图书评介既要指出其优点，也要指出缺点，必须对评论中的轻率和不客观行为展开斗争。

② 所收集档案中无此附件。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于1940年11月26日作出了《关于文学评论和图书评介》的决定。

№02179

普京关于执行中央  
《关于文学杂志编辑工作》决议的情况  
致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1年3月10日)

联共（布）中央书记安·亚·日丹诺夫同志

执行联共（布）中央1939年8月20日  
《关于文学杂志编辑工作》决议的情况报告

联共（布）中央在决定中指出了文学杂志《十月》、《红色处女地》等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杂志的思想失误与杂志领导工作中的混乱和无人负责状况有关。宣传部和干部部受命进行配备文学杂志的责任书记和编辑委员会成员的工作。

根据联共（布）中央的决定，宣传部采取了如下措施：

配备并经联共（布）中央批准《新世界》、《十月》、《旗》、《红色处女地》等杂志的责任书记以及编辑委员会成员：《十月》——И.В. 沙莫里科夫（责任书记）、Ф.И. 潘菲洛夫、В.П. 伊利延科夫、П.А. 巴甫连科、М.М. 尤诺维奇、С.П. 希巴乔夫；《新世界》——В.Р. 谢尔比纳（责任书记）、М.А. 肖洛霍夫、В.П. 斯塔夫斯基、А.А. 苏尔科夫、М.М. 罗森塔尔；《旗》——М.Р. 索科洛夫斯基（责任书记）、В.В. 维什涅夫斯基、В.И. 列别杰夫-库马奇、А.С. 诺维科夫-普里波伊、В.А. 卢戈夫斯科伊、

A. A. 伊斯巴赫、Л. И. 季莫费耶夫；《红色处女地》——Е. И. 科瓦尔奇克（责任书记）、А. А. 法捷耶夫、Н. Н. 阿谢耶夫、В. М. 巴赫梅吉耶夫、М. С. 沙吉尼扬、А. Т. 特瓦尔多夫斯基、В. В. 伊万诺夫。

各杂志责任书记的配备以及联共（布）中央对他们的任命，消除了文学杂志领导工作中以前存在的无人负责状态。

从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方面来说，对文学杂志的领导也有所改进。作协主席团为各个杂志配备了一批创作积极分子，讨论了各个杂志 1941 年度的工作计划。

联共（布）中央 1940 年 11 月 26 日《关于文学评论和图书评介》的决定给文学杂志的工作注入了巨大的活力。根据这个决定，各杂志都开辟了文学评论和图书评介栏。

联共（布）中央宣传部报刊局对文学杂志的工作建立了系统的监督。

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А. 普京

1941 年 3 月 10 日

№02180

法捷耶夫关于魏列萨耶夫的文章  
致联共（布）中央的信

（1941年5月7日）

№57 / C

绝密

联共（布）中央

约·维·斯大林同志

安·亚·日丹诺夫同志

亚·谢·谢尔巴科夫同志

魏列萨耶夫给《文学报》寄来一篇文章要求刊登，我不认为可以刊登这篇文章。现将这篇在政治上不无意思的文章寄上，请你们审阅。

这里存在着问题的两个方面。

1. 编辑独断专行的事实在杂志和出版社的实践中的确是常见的。一些愚蠢的半文盲的人感到自己背后有国家机关，便在一定程度上为所欲为，对稿件“不顾情面地”大肆窜改，往往改得面目全非。魏列萨耶夫的稿件在《三十天》编辑部里遭到修辞上的“改动”，这的确让人气愤。

2. 可是魏列萨耶夫的整篇文章却是别有用意——损害编辑们的威信，编辑是为苏维埃国家服务的工作人员，是我们国家政策的传播媒介，是捍卫国家利益的人。魏列萨耶夫不能公开地说书刊总

局的监督、我们杂志和出版社的政治要求使他感到“压抑”，于是便用修辞问题和事情的一般艺术方面做掩护。可是文章总的基调则是哀叫资产阶级意义上的“出版自由”。

魏列萨耶夫并不是孤立的。不久以前，评论家德尔曼寄给《红色处女地》一篇文章，写的是同一个题目，精神上绝对相同，我不得不拒绝采用。（顺便说一下，德尔曼是魏列萨耶夫的朋友，过去也曾持有孟什维克立场。）

我们没有准许评论家古尔维奇评论影片《瓦列里·契卡洛夫》的文章上《文学报》，因为他过分赞扬和美化契卡洛夫的淘气，认为这是“自由天性”的表现，并且用这种自由天性来解释他后来取得的成就，文章结尾指责整个苏联文学“拘谨僵化”和“受束缚”。

类似的声音来自各种各样的列维多夫之流的营垒，我觉得，未必应该给它们提供讲坛。

A. 法捷耶夫<sup>①</sup>

## 附 录

### 魏列萨耶夫《关于作者和编辑》一文（摘要）

这是两个敌对的阵营，他们彼此之间很难达成一致。……

我不知道，为什么近10年来，编辑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独断专行地按照自己的趣味修改和改动作者作品的倾向。因此，现在作

<sup>①</sup> 本文件附有一张未署名的打字便条：“魏列萨耶夫的信中毕竟有许多公正之处，不能让一小伙出版社的编辑和所谓书刊审查人员独揽真理的占有权，他们把自己的趣味和对文学要求的水平当成绝对真理。”便条的文本中有日丹诺夫的批示：“转波利卡尔波夫和普京同志阅并报上自己的意见。日[丹诺夫]”。

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了得不到保护的一方……

4个月以前，《三十天》杂志编辑部约我为杂志提供一篇篇幅不大的小说……编辑部让我看了他们在小说中随意做的某些修改。修改多半是这类性质的：我的原稿是：“她用手枪射击了两次”；编辑部改成：“她用手枪射击了两下”……

可以说，编辑是很辛苦的。小说总共只有3页多一点儿的篇幅，据统计，其中的修改达142处！……

我得到一种印象，如今的编辑假如不在作家的每一行文字里表现出自己的印迹，那么他就会感到自己的存在失去了意义……

我曾经在柯罗连科那里发表过作品，曾经在高尔基那里发表过作品。他们从来都不改动我的一句话。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他们在一系列情况下不肯提出修改的意见，尽管作品一经修改就会显得更好一些。但他们都是文化素养极高的人，承认作家达到一定的水平，自己会对读者负责。如今的编辑却把这种责任感转到自己身上，毫不客气地改动，惟有他一人认为这种改动会使作品变得更好……

我的文学生涯快到50年了。出版社提供给我60印张的篇幅编印一部《作品选》。我挑选了材料。送交……给O.列兹尼克审查。列兹尼克给弄得乱七八糟。某个短篇小说没有意思，——删掉了。某个中篇小说给人以阴郁的印象，——改动一下结尾……短篇小说《利扎尔》经过仔细加工之后可以刊登。可是关于这个短篇小说，A.П.契诃夫1903年曾经写信给苏沃林：“您现在阅读小说，正好，请您读读魏列萨耶夫的短篇小说。先从篇幅不大的《利扎尔》开始。我认为您读后会非常满意的。”相信谁呢，A.契诃夫还是O.列兹尼克？《作品选》一书问世了，总体上是列兹尼克编选的……

我从事文学写作已有50余年的历史，我有一定的名气，我有

可能提出坚决的抗议，——可是我仍然不得不克服愚蠢的不必要的阻碍才能维护按照自己意愿来写作的权利或者达到出版自己的书的目的。而对于那些没有名气的青年作家，编辑则完全不客气了……

但是，总的来说，编辑应该比现今大多数编辑更耐心一些，更文明一些，心胸更开阔一些……

## 【专题说明】

# 战时苏联的文学战线

(1941年9月至1945年4月)

本专题收录的文件概括地反映了战时苏联文学的基本状况和处境。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43年12月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关于对文学杂志的监督》的决定、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关于对图书出版的监督情况的报告等文件。部分文件与战时的法捷耶夫以及苏联作家协会的活动有关。有不少文件涉及一些作家及其作品遭受批判、封杀的命运,如多夫任科、左琴科、谢尔文斯基等。同时,也有某些作家得到当局支持帮助的事例。透过这些文件,有助于了解联共(布)领导人以及中央机关管理文学的机制和方式。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刁绍华、熊建国翻译)

№02181

洛佐夫斯基关于法捷耶夫在情报局的工作状况  
致谢尔巴科夫的报告

(1941年9月3日)

机密

联共(布)中央书记亚·谢·谢尔巴科夫同志

我提请您注意法捷耶夫<sup>①</sup>同志对待自己的职责所采取的完全不能容许的态度。他在情报局工作的整个期间，每隔一个时期都消失几天，对委派给他的工作完全置之不理。本来应该在文学处周围集合一批作家，吸引我们的音乐家、电影导演、作曲家和一切艺术工作者为外国报刊杂志撰稿，可是法捷耶夫却把从一开始就组织好的一切都丢掉了。现在，尤其是在战时条件下，已经不能继续容忍这种工作态度了。我建议：

1. 解除法捷耶夫在情报局的工作。
2. 任命叶甫盖尼·彼得罗夫同志为文学组组长。
3. 把党员布尔斯基<sup>②</sup>同志派给他当助手。

越快执行这项决定越好。

苏联情报局副局长 洛佐夫斯基<sup>③</sup>

① 法捷耶夫在1941-1944年期间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

② М.И. 布尔斯基，1941年任苏联情报局文学组编辑。

③ 洛佐夫斯基，索罗门·阿布拉莫维奇(1878-1952)，原名德里佐，1901年入党，曾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1937年任国家文学出版社社长，1939-1946年任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副部长)，1941-1948年任苏联情报局副局长。在战后的清洗中遭到镇压。

№02182

##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 关于给予法捷耶夫警告处分的决定

（1941年9月21日）

### 关于法捷耶夫同志

1. 批准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 1941年9月20日的决定：

“党的监察委员会受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的委托，审理了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和联共（布）中央委员 A.A. 法捷耶夫同志的情况，确认法捷耶夫同志从前线出差归来以后接受了情报局委派的工作，可是并没有完成，在 7 天的过程中一直处于醉酒状态，没有上班，并且隐瞒了自己所在的地点。经调查确认，酗酒是在女演员布尔加科娃的寓所里进行的。实际情况是，法捷耶夫同志一连几天处于醉酒状态，这不是惟一的一次。类似的事件在今年 7 月底就曾经有过一次。关于法捷耶夫酗酒的事，在作家阶层中是广为人知的。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鉴于 A.A. 法捷耶夫同志的行为有损于一个联共（布）党员、尤其是联共（布）中央委员的形象，给予他警告处分，警告他如果将来继续有这种不体面的行为，将要对他作出更加严厉的党纪处分。”

2. 报请政治局批准。

№02183

## 法捷耶夫关于擅自离开莫斯科问题 致联共（布）中央的信

（1941年12月13日）

联共（布）中央

约·维·斯大林同志

安·安·安德列耶夫同志

亚·谢·谢尔巴科夫同志

目前在莫斯科的文学家们中流传着一种谣言，似乎法捷耶夫“擅自”离开了莫斯科，几乎把作家们都扔下不管了<sup>①</sup>。

由于这种谣言得到了某些重要人物的支持，我特向中央汇报如下：

1. 10月15日白天，我从书记处接到洛佐夫斯基的指示：携带物品前去情报局，以便随同情报局一起离开莫斯科。

这是以谢尔巴科夫同志的名义下达的指示，由情报局的工作人员阿菲诺格诺夫、布尔斯基和彼得罗夫同志转告给我。

我没能随情报局一起离开，因为我正在按照中央宣传鼓动部拟定的名单安排作家们上火车，但还没有把所有的作家安排完毕，所以我亲自向米高扬同志和什维尔尼克同志保证，一旦接到疏散委员

---

<sup>①</sup> 一些作家于1941年10月19日写信给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柯西金，反映苏联作家协会领导疏散的同志在分四批疏散大约500人后，就惊慌失措地逃跑了，扔下许多作家不管，其中包括诺维科夫-普里波伊、沙吉尼扬、姆斯季斯拉夫斯基等。信中要求苏联人民委员会把留下来的人送到喀山和塔什干去。

会通过柯西金同志下达的指示，我马上就走。

经谢尔巴科夫同志批准，我必须耽搁几天。

10月16日凌晨，在把所有委托给我安排的作家全部送走之后，我接到了疏散委员会通过柯西金同志下达的指示，就离开了。

2. 我亲自收到中央（亚历山德罗夫同志）和疏散委员会（什维尔尼克同志、米高扬同志、柯西金同志）的指示，他们要求我把一批有某种文学价值的作家送走，并且承担个人责任。

这批作家的名单是叶戈林<sup>①</sup>（中央的工作人员）和我一起拟定的，后经亚历山德罗夫同志批准。名单相当广泛——120人，连同其中某些人的家眷——大约有200人（请注意，200名以上的积极的莫斯科作家正在前线，不少于100人在战争期间自行到后方去了，有700多个作家的家庭在战争开始时就疏散了）。

所有的作家及其家庭——不只是根据这个名单，而是增加了许多（271人）——都由我亲自送上火车，10月14和15两天离开了莫斯科（除了列别杰夫-库马奇，他早在10月14日就往火车站运了两小汽车东西，但在两昼夜时间里也没能装上火车，精神失常了；还有巴赫梅吉耶夫、谢芙琳娜、玛丽艾塔·沙吉尼扬和阿纳托利·维诺格拉多夫<sup>②</sup>——他们是由于自己的问题没有走成）。除了阿·维诺格拉多夫，他们都将在近日离开莫斯科。

为了保证作家协会的全体会员、候补会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作协机关（理事会、文学基金会、出版社、杂志、《文学报》、外事委员会、俱乐部）的工作人员的撤离，苏联人民委员会疏散委员会根据我的建议，责成交通人民委员部为作家协会提供能容纳1000人

① A. M. 叶戈林（1896～1956），1943～1944年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文学部主任，1944～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1946年出任文学杂志《星》的主编。

② 维诺格拉多夫，阿纳托利·科尔涅利耶维奇（1888～1946），作家。

的车厢（疏散时放弃了协会的某些物品和档案）。

10月14和15两天和16日夜，这些人大约有一半通过有组织的和没有组织的途径离开了。其余的一半（其中根据名单有186名协会的会员和候补会员）在10月16和17日陷入惊慌。众所周知，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在后来的几天里都离开了莫斯科。

3. 我在启程之前给我的助手（基尔波京同志）、《文学报》的书记（戈列利克同志）和我在外事委员会的助手（阿普列京同志）做了指示。党组书记赫瓦列勃诺娃<sup>①</sup>及其丈夫在得到克拉斯诺普列斯尼亚区委会的允许后也走了，行前当着我的面给自己的助手（赫马拉同志）和协会保密处主任（鲍利霍夫同志）做了必要的指示。

基尔波京没有执行我的指示，没到协会看一眼就一个人走了。这当然加重了留下来的人的惊慌情绪。其余的工作人员都完成了自己的职责。

4. 情报局离开莫斯科之前，布爾斯基同志向我传达了谢尔巴科夫同志的指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喀山和古比雪夫等城市建立作家小组并且开展工作。

在古比雪夫，建立了由情报局领导的这样的小组（15人）。在喀山和奇斯托波尔（120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30人）。其余的作家和他们的家庭（大部分是老人、病人，也有成年人，但相当一部分是吓破了胆的“有工作能力的人”）到塔什干、阿拉木图和西伯利亚的一些城市去了。

在喀山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组建作家小组，消除惊慌情绪，做好日常生活的物质安排，克服某些政治上有害的情绪——这些工作或多或少已经完成，这些小组已经建立并且开始工作。

<sup>①</sup> O.A. 赫瓦列勃诺娃，作家，时任苏联作家协会党组书记。

5. 在作家中间开展工作（15年的时间）给我树立了相当数量的文学对头。在这种时候，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正是他们现在企图把我说成是“惊慌失措者”。

这种情况迫使我不得不说几句关于我自己的情况。我是在高尔基时期秘密入党的，参加了两年内战（从列兵和机枪队政治指导员开始直到旅的政委），参加过1921年进攻喀琅施塔得的战斗，曾经两次负伤。

我有过不少错误、失误和过失。可是在革命的所有最艰难的阶段，包括现阶段在内，我不仅仅是个“支持者”和“追随者”，而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列宁和斯大林事业的积极战士。把我描绘成“惊慌失措者”——这是愚蠢的和卑鄙的。

跟许多布尔什维克一样，我会极其高兴地留在莫斯科保卫它，像许多布尔什维克一样，我的思想和愿望是到前线去。

批准我到前线去当个记者或政工人员，我能够带来的益处不少于其他的前线作家。

A. 法捷耶夫

1941年12月13日

№02184

梅赫利斯关于法捷耶夫上前线问题  
致安德列耶夫的电报

(1941年12月13日)

炸弹，发自绿宝石<sup>①</sup>

联共（布）中央

安·安·安德列耶夫同志收

作家法捷耶夫来电请求联共（布）中央同意派他到前线当记者<sup>②</sup>，似乎有人妨碍他。

请您把法捷耶夫交给红军总政治部使用数月，我们让他用艺术语言为军队服务。

梅赫利斯<sup>③</sup>

1941年12月13日

① 皆为代号。

② 法捷耶夫于12月14日给安德列耶夫发电报，请求允许赴西线。

③ Л.З. 梅赫利斯，时任国防副人民委员，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02185

**马哈诺夫关于法捷耶夫的工作问题  
致安德列耶夫的报告**

(1941年12月15日)

关于梅赫利斯同志的电报已报告谢尔巴科夫同志，他通过亚历山德罗夫通知说，不宜派法捷耶夫到总政治部去。

亚·谢·谢尔巴科夫同志指示：让法捷耶夫留在作家协会工作，组建新的报纸《文学和艺术报》。

法捷耶夫同志由宣传部召到古比雪夫。

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A. 马哈诺夫

1941年12月15日

№02186

## 洛马金关于疏散到塔什干的作家情况

### 致安德列耶夫的报告

(1941年12月17日)

绝密

联共（布）中央  
安德列耶夫同志

最近一个时期，一批莫斯科作家（阿列克塞·托尔斯泰、尼古拉·波戈廷、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尼古拉·维尔塔等）疏散到塔什干来。

乌兹别克共产党（布）中央和乌兹别克共和国人民委员会采取措施为作家们创造必要的生活条件并且吸引他们积极参加社会和政治生活。例如，阿列克塞·托尔斯泰写了并且在共和国的报纸上发表了很严肃的文章《我们宣誓绝不玷污祖国的神圣》，现在正在写一篇新的文章；尼古拉·波戈廷根据乌兹别克共（布）中央交给的任务，跟几位乌兹别克作家一起写一出关于动员乌兹别克人民群众与法西斯进行斗争的音乐剧；诗人乌特金、卢戈夫斯科伊和戈洛德内在工人和红军中演出，写作歌词，为军队的报刊写稿等等。

然而，最近一个时期，这些作家中间滋生了一种不健康的情绪，他们企图有组织地反对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譬如说，3天以前，阿列克塞·托尔斯泰来到乌兹别克共（布）中央，以全体住在塔什干的莫斯科作家的名义，提出必须“全盘改组和更新苏联作家

协会领导”的问题，想要在这个问题上取得我们支持。阿列克塞·托尔斯泰声称，法捷耶夫及其助手们惊慌失措了，与作家们失去了任何联系，不关心他们的命运，主要在奇斯托波尔料理个人的私事。他特别表示愤怒的是法捷耶夫同志在喝醉酒的情况下，不负责任地委托部分作家行使领导在乌兹别克斯坦各个部门作家工作的权利。据托尔斯泰同志称，法捷耶夫把领导工作委托给了基尔波京、斯科瑟列夫、马尔夏克和尼阿洛同志。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有阿列克塞·托尔斯泰参加的一批莫斯科作家（维尔塔表现出特殊的热忱）在会议上决定宣布这种委托是非法的事，立即从上述同志的手中，特别是从目前正在乌兹别克的基尔波京手中收回权力。这样做的结果是基尔波京同志不仅对莫斯科作家们的工作不能发挥任何影响，而且受到他们不加掩饰的蔑视。

近几天来，就连某些乌兹别克作家也开始加入这种派别性的阴谋活动。

莫斯科作家们这种明显错误的行为在他们写给联共（布）中央安德列耶夫同志和谢尔巴科夫同志的信的草稿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这封信由阿列克塞·托尔斯泰、尼古拉·维尔塔和约瑟夫·乌特金<sup>①</sup>起草，其中直接暗示必须撤消法捷耶夫的作家协会领导职务，并且提出成立新的“享有全权的作家协会机关，设在苏联的某个主要中心城市”的问题。这封信断言，“组织（作家协会）实质上已经瓦解，不再是一个完整的政治团体”。

尤苏波夫<sup>②</sup>同志建议托尔斯泰同志不要把这封信寄给联共

---

① 乌特金，约瑟夫·巴甫洛维奇（1903～1944），诗人。

② Y. Ю. 尤苏波夫（1900～1966），1937～1960年间任联共（布）乌兹别克中央第一书记。

(布)中央,停止写作这种“集体性的文献”,事先未取得乌兹别克共(布)中央的同意,不得召开任何会议,而要认真地引导全体作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布)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托尔斯泰同志同意了这些意见,表示写给安德列耶夫同志和谢尔巴科夫同志的信不会寄出,他将尽一切可能做好作家们的工作。

我们经过商议,决定向您汇报此事,并请建议法捷耶夫同志彻底改进自己的领导工作,加强与疏散到苏联各个城市的作家们的联系,特别是与目前正在塔什干的作家们的联系。

为了给作家们更有成效的创作工作创造条件,我们也认为必须支持托尔斯泰、波戈廷、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维尔塔以及其他一些同志的申请,把一个大型文学杂志迁到塔什干来。

联共(布)乌兹别克中央书记 H.洛马金

1941年12月17日

于塔什干市

№02187

亚历山德罗夫  
关于处理《文学和艺术报》的错误  
致谢尔巴科夫的报告

(1942年6月2日)

联共（布）中央书记

亚·谢·谢尔巴科夫同志

遵照您的指示，宣传部就《文学和艺术报》第21期的错误采取了如下措施：

1. 两次召开报纸编委会会议，详细地分析了错误，确定了改进报纸工作的组织措施；编委会的所有成员皆应事前得到每一期报纸的材料并且通读。报纸的大样应该在报纸出版的前一天印出来，以便宣传部能够从容地审查报纸的大样。

2. 撤消皮斯马尼克<sup>①</sup>的报纸编辑部主任之职，由于他的过错，第21期报纸有相当一部分流传出去。决定逐渐地更换编辑部的某些领导人员。

3. 就《文学和艺术报》的错误问题，宣传部召开了一次中央一级报纸的责任主编会议。

4. 宣传部召开党组会议，做了关于宣传部机关工作人员在战时条件下的工作问题的报告。在报告和讨论中谈到了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列别杰夫、叶戈林、奥尔洛夫）对所委派的事情不负责任的

<sup>①</sup> 皮斯马尼克，《文学和艺术报》编辑部主任。

态度。上述三位同志受到了我的严重警告。

5. 6月2日，联系到所犯的错误，就编辑部机关工作问题召开了报纸编辑部工作人员会议。

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 Г. 亚历山德罗夫

6月2日

№02188

## 洛佐夫斯基关于小说《围困》

### 致谢尔巴科夫的信

(1943年5月19日)

联共（布）中央书记和苏联情报局局长

亚·谢·谢尔巴科夫同志<sup>①</sup>

我愿意提请您注意，列宁格勒女作家 B. 凯特林斯卡娅<sup>②</sup> 写了一本关于列宁格勒的好书。书名叫《围困》，它提供了列宁格勒在战争最初几个月里非常有意思的鲜明的画面。除了 H. 吉洪诺夫<sup>③</sup> 的特写之外，关于列宁格勒战线的斗争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凯特林斯卡娅用自己的书填补了这一重大的空白，因为她不仅描绘了前线，而且也描绘了列宁格勒本身的状况。她在自己的书里涉及到一系列非常严肃的问题，而且从政治上来看解决得很正确。读着她的书，你会感觉到列宁格勒保卫战及其一切困难、苏维埃人的英雄主义及其对苏维埃国家和党的伟大忠诚。

遗憾的是凯特林斯卡娅只写成了第一部。根据开头来判断，作者显然是准备还写两部。虽然事件大约进展到 1941 年底，但书却具有独立的意义。

---

① 谢尔巴科夫将此信批转中央宣传部。6月5日，亚历山德罗夫向谢尔巴科夫报告，凯特林斯卡娅被召到宣传部，给她下达了如何继续加工《围困》的手稿指示。

② B.K. 凯特林斯卡娅（1906～1976），作家。

③ 吉洪诺夫，H.C.（1896～1979），诗人、作家。1944～1946年期间担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

我曾写信给凯特林斯卡娅，谈了自己对这本书的意见，并且指出了，第一部里面有哪些地方需要稍加修改，有哪些问题在以后的两部书中应该涉及到。

凯特林斯卡娅的工作值得对她加以重视。

如果您稍有可能，请读读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是很严肃的，值得认真对待。

苏联情报局副局长 A. 洛佐夫斯基

№02189

## 鲁宾施泰因关于法捷耶夫的表现 致亚历山德罗夫的报告

(1943年7月1日)

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

Г.Ф. 亚历山德罗夫同志

我认为有必要报告您，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书记法捷耶夫同志原定在6月21日对红军发表广播演说，可是由于他的过错而没有进行。

6月7日，法捷耶夫同志表示同意发表题为《俄罗斯作家——我们祖国的爱国者》的广播演说。法捷耶夫同志答应在6月17日把演说稿送来。

6月18日，法捷耶夫同志用电话通知红军广播电台的编辑西罗京少校，演说稿将在6月19日13点以前送来。

19、20和21日，想要与法捷耶夫取得联系的一切企图全都没有结果。无论是法捷耶夫同志的秘书、苏联作家协会的值班人员、所询问过的诗人和作家（基尔萨诺夫、安托科利斯基、卡达耶夫、阿利格尔、叶尔米洛夫），还是他的家属（红军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数次与他们通话），全都不知道怎样才能与法捷耶夫同志取得联系。

6月20日，叶夫斯季格涅耶夫少尉被派往法捷耶夫同志在彼列杰尔金诺的别墅，可是在那里也没有找到他。

只是到了6月21日14点，也就是离演说开始还有5个小时的

时候，法捷耶夫同志的秘书卡申采娃才通知说，法捷耶夫生病了，不能发表演说了。

法捷耶夫同志对待演说的态度是不负责任的，尤其是他早就知道，前线和各军区的政治部都接到了关于他的演说的通知，并且将要组织集体收听。

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鼓动局鼓动处处长 鲁宾施泰因

1943年7月1日

№02190

## 亚历山德罗夫关于中篇小说《胜利》问题 致谢尔巴科夫的报告

(1943年7月9日)

### 关于亚·多夫任科<sup>①</sup>的中篇小说《胜利》

亚·多夫任科的中篇小说《胜利》明显是他的不成功之作。其中有些篇幅、细节很鲜明，但小说总体上却很粗糙，写得漫不经心，充满虚假的论点。

1. 作者所描写的部队清一色由乌克兰人组成，这不符合实际并且人为地使乌克兰人民的斗争脱离开苏联各族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而独立起来。

2. 作者描写苏联士兵对死亡的蔑视，可是这些细节却缺乏分寸感。有些地方死亡过多，造成一种印象，仿佛胜利只有通过死亡才能取得。

3. 小说中马卡尔·涅奇波鲁克将军的形象刻画得十分荒唐。作者称他为“战略家”、“战神”和英雄。然而，将军的英雄主义和战略艺术表现在何处——作者却没有表现。

涅奇波鲁克将军惟一参与的一个细节，在多夫任科那里被描写成这样：

<sup>①</sup> 多夫任科，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1894—1956），乌克兰作家，电影导演。

“在军官们面前站着他们的威严的马卡尔·涅奇波鲁克将军。

‘叛徒！他娘的！卖国贼！他娘的！特务！他娘的！胆小鬼！他娘的！’

已经沉睡的那个团的军官们低低地垂下了头，沉重的呼气不时地从年轻的胸膛中冲出来。痛苦和悲哀笼罩着他们的心，许多年轻人的眼睛里含着泪水，他们由于复杂和痛苦的感情而攥紧拳头。沃夫克·米基塔中尉哭了。

‘送交法庭去！他娘的！我枪毙他！他娘的！’

军官们的头垂得更低了。大家都赞同将军的话。”

再如第14页，涅奇波鲁克将军说：

“‘闭嘴，……’将军终于突然高声喊道，团队醒了过来，军官们激动起来。”

就这样，涅奇波鲁克被描写得更像个骂娘的“高手”，而不像个“战略家”和“战神”。

4. 多夫任科违背健康的思想和现实的感情，过分地使用夸张手法。譬如团队大规模逃跑的场面（第6~7页）。

“什么人都在跑！什么人都在跑！都被卷进了渴望延缓死期的人群里。佩列亚斯拉夫的上尉苏霍维·基里洛在跑。他佩戴着两枚红旗战斗勋章。沃夫克·米基塔中尉在跑，功劳簿里记载着沃夫克消灭250个德国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芬兰人等等的战功。可他在跑。

来自卡缅涅茨-波多尔斯克的赫赫有名的反坦克手列夫科·斯托扬，一边跑着，一边骂着世上的一切人和物。来自波尔塔瓦的出色的机枪手加尔科文科·彼得罗、中尉奥尔留克、布里坦·卢卡和沃夫科、特鲁宾克·罗曼、乌斯京和安德列跑着，像是发疯的狮子冲进野牛群里一样。

可这些人曾经是什么样的人啊！他们进行过最困难的战斗、经

历了千辛万苦和令人难以忘怀的分离，走遍了整个乌克兰，成了战斗、伏击和可怕的进攻的能手。这都是些什么人啊！都在跑。

共和国的功勋拖拉机手和无情的特等射手韦尔尼戈拉·奥斯塔普也在跑。”

在第9~10页，多夫任科描写了炮兵营上尉克拉夫奇纳的军事“复活”，说他像童话里的魔法师一样，转瞬之间就让自己惊慌失措的队伍变成一个进行殊死战斗的英雄集体。

“不知道这场力量悬殊的决战的最后结局如何，也许克拉夫奇纳上尉控制不住自己那些东奔西逃的战士，也许他们会跨过他去，以后终生都将因为自己的可耻行为而在心里感到难过，可是这个时候却有两打250公斤重的炸弹从飞机上扔下来，迫使他们匍匐在地上。

‘起立！我们要是后退，就会遭到诅咒，’当5分钟以后大家都站起来的时候，克拉夫奇纳心平气和地重复说。‘明白吗，是谁将要诅咒我们？’

‘明白，上尉同志，’战士们说，环视着四周，看到了炸弹给刚才撤退的人造成多么惨重的损失。

‘战士列夫科·格年内，你说说，谁将诅咒我们？’

‘人民！’列夫科回答道，激动的泪水从他的眼睛里流淌出来。

‘进入火炮阵地！’克拉夫奇纳平静地下了命令。各组炮手各就各位，大家都突然明白了，不会后退了，已经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5. 小说中有许多夸大其词的细节、草率的和模棱两可的用语。多夫任科刻画小说的一个人物、来自扎波罗热的伊万·卡弗恩时写道：“他是个士兵。他是个伟大的士兵，曾经数次被赶出扎波罗热的共青团……”再如：“……突然收到了一封信表达他——伊万·卡弗恩——的决心，他要把自己的整个生命献给保卫祖国、反对资本主义压迫的斗争，成为苏联英雄。这个消息转眼之间就传遍了几条

街。老卡弗恩从工厂回来的时候知道了儿子的决心，他说：‘那好啊，既然大家都说我们的伊万干什么工作都不合适，那就让他出息成个英雄吧。’”

照现在这个样子，亚·多夫任科的中篇小说不宜出版。

Г. 亚历山德罗夫

1943年7月9日

№02191

## 帕斯捷尔纳克关于自己的境遇

### 致谢尔巴科夫的信

(1943年7月16日)

亲爱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

我很长时间一直克制自己，本来不想向您求助。我要对您讲的，有一部分去年已经有机会向您讲过了，那时您如此宽宏大量地对我的请求做出了答复，尽管那项请求不是关于我自己的事，而是关于别人的事。当时我只身一人，能够对付，可是现在我带来了季娜·尼占<sup>①</sup>和孩子们，他们寄居在特列尼约夫和波戈廷家里，处于不完全合法的受赡养者的地位。

我在拉夫鲁申诺的住宅彻底毁坏了，它本来就很寒酸，一看就知道并不是什么名门所在，没人保护它。

房子里没有住人，里面的陈设没有保存下来。我父亲——他是位院士，目前还健在，住在英国牛津——多年以来的劳动成果——素描、画稿和绘画原本全都被毁掉了。他的绘画摹本被运出雅斯纳亚波良纳，落到军人手里。这一切都怪我自己。

父亲当年与老莫斯科以及列夫·托尔斯泰一类坚强的大人物关系亲密，正是他的榜样从童年起便不可抗拒地造就了我的性格。按照我的道德准则，我不能从自己以前的成就（如在作家代表大会上，在国外等等）中得到好处，而任何人要是处在我的地位上都会

<sup>①</sup> 季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

利用这些成就。可是时光流逝，人也变了。现在人们可能会觉得，我自愿的默默无闻是迫不得已的，带有受惩罚的痕迹。

在协会和文学基金会里，人们对待我不够信任，缺乏善意，惟有赫拉普钦科<sup>①</sup>和恰金<sup>②</sup>除外，他们从来都不曾剥夺我参加活动的权利。我觉得我所做的并不少于那些奖金和勋章的得主，可是我却被置于比他们更低下的地位。

我觉得用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去打扰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实在是太卑微、太不可思议了。

爱您的 Б.帕斯捷尔纳克

---

① 赫拉普钦科，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奇（1904—1986），文艺理论家。1938—1948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的艺术事务委员会主席。

② П.И.恰金（1898—1967），1939—1946年任国家文学出版社社长。

№02192

## 亚历山德罗夫关于处理中篇小说 《战火中的乌克兰》致谢尔巴科夫的报告

(1943年11月22日)

遵照您针对多夫任科的中篇小说《战火中的乌克兰》所作的指示，宣传部采取了以下措施：

1. 用电话给利特维诺夫同志（乌共（布）中央主管宣传的书记）下达了指示：不准在乌克兰的出版物上发表多夫任科的中篇小说。

2. 从书刊总局的系统给乌克兰的和所有中央一级出版社的书刊审查人员以及州和边疆区书刊局下达了秘密指示。

3. 也事先通告了中央一级文学出版社和杂志的领导：不准发表多夫任科的中篇小说。

4. 宣传部召开了所有中央一级报纸、文学杂志和出版社的编辑会议，就多夫任科的中篇小说下达了相应的指示。

检查中发现，多夫任科已把小说稿寄给一系列出版社和文学杂志（国家文学出版社、苏联作家出版社、《旗》、《十月》、《接班人》等杂志）的编辑部。杂志和出版社的编辑部批判地对待多夫任科的小说，没有采用刊登，只有《接班人》杂志例外，一个月以前发表了一个不大的片断（杂志第18期）。

Г. 亚历山德罗夫

11月22日

**№02193**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  
关于谢尔文斯基创作中错误的决定（草案）**

（不晚于1943年11月26日）

**关于谢尔文斯基创作中的错误**

联共（布）中央注意到，И. 谢尔文斯基的诗《献给俄罗斯》、《俄罗斯给谁唱催眠曲》和《插曲》包含着严重的政治错误。

谢尔文斯基在《俄罗斯给谁唱催眠曲》中诽谤俄罗斯人民，断定俄罗斯人民的灵魂似乎具有某种“怪僻”，怜爱关怀畸形的人。《献给俄罗斯》一诗粗制滥造，对于我们的祖国发表种种荒诞无稽的奇谈怪论（“我爱你，爱到发出呻吟和喃喃细语的程度”）。《插曲》一诗最低级下流，与苏维埃人的精神是敌对的，对战争进行诽谤和歪曲的描写。

联共（布）中央认为谢尔文斯基写出这种政治上有害的和卑鄙下流的诗，只能用他缺少对苏联人民的责任感和忘记了对苏联人民的义务来解释。联共（布）中央警告谢尔文斯基同志，他如重犯类似的错误，必将被清除出苏联文学界。

Г. 亚历山德罗夫

No 02194

## 左琴科关于《日出之前》一书致斯大林的信

(1943年11月26日)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sup>①</sup>！

只是一种极端的情况才促使我给您写这封信。

我写了一本书——《日出之前》。这是一本反法西斯的书。它是为了维护理性及其权利而写的。除了对生活的艺术描写之外，书中还包括关于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的科学主题。这个理论在动物身上基本上通过了检验。看来，我得以证明这个理论用在人的生活上也是有益的。

这明显地暴露了弗洛伊德严重的唯心主义错误。

这也在更大程度上证明了巴甫洛夫理论的巨大真理和意义——这一理论朴素、准确和可信。

在我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和写完以后，《十月》杂志编辑部不只一次地把我的书拿给 A. Д. 斯佩兰斯基院士征求意见。这位学者承认书写得符合当代科学结论，值得刊印和重视。

开始印刷了。然而，没等到印完，批评界就对它表示否定了。印刷也就停止了。<sup>②</sup>

我觉得根据书的前半部来评价作品是不公正的，因为在前半部

<sup>①</sup> 1943年11月26日，中央特别工作处（斯大林的秘书处）收到了这封信。据推测，斯大林可能没有看到左琴科的这封信。

<sup>②</sup> 《十月》杂志1943年第6-7期合刊和第8-9期合刊发表了《日出之前》的第一部。小说的第二部名为《关于理性的故事》，当时未能发表，直到1972年才在《星》第3期上刊登。

里问题还没有解决。那里只是引用了材料，提出了问题并且部分地展示了方法。只是在后半部里才展开研究的艺术和科学部分，也会做出相应的结论。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如果不是深信我这本证明理性的强大及其对低级力量的胜利的书是当今所需要的话，我决不会打扰您。这本书对于苏联科学来说也是需要的。

为了科学的主题，我允许自己写得比通常更坦率一些。但这对于我的证明来说是必要的。我想，我的坦诚只加强了讽刺方面——嘲笑虚伪、卑鄙和道德败坏。

我不揣冒昧地请求您了解我的作品、或者下令比较仔细地审查它、或者全面审查它。

所有可能做出的指示，我都以感激的心情来考虑。

衷心地祝愿您健康，

米哈·左琴科<sup>①</sup>

1943年11月26日

莫斯科，“莫斯科”旅馆1038号房间，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左琴科

<sup>①</sup> 左琴科，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1895—1958），作家。

№02195

## 亚历山德罗夫关于诗集《雷鸣的年代》

### 致谢尔巴科夫的报告

(1943年11月26日)

联共(布)中央书记亚·谢·谢尔巴科夫同志

宣传部收到国家文学出版社寄来的已签署付印的尼古拉·阿谢耶夫的新诗集《雷鸣的年代》(1941~1943年)。书中收有H.阿谢耶夫写于卫国战争时期的诗作。

这本诗集收入了一系列在政治上有错误的诗。H.阿谢耶夫在其中诽谤性地描写了苏联的后方。H.阿谢耶夫在《莫斯科—卡马》一诗中这样讲述了自己乘轮船从莫斯科赴奇斯托波尔的旅行(1941年秋疏散的时候):

“……这是人们? 这是乌合之众,  
他们淹没了整座整座的城市。  
还需要几个百年  
世界才能友好相处?  
他们到何处去? 确切地说来自何方?  
逃避邪恶并不能拯救善良……”如此等等。

诗的第一部分以这样几行结束:

“轮船后边——翻滚着波浪,

轮船后边——战争逞起凶狂。”

在诗的第二部分里，H. 阿谢耶夫欣赏着“卡马河的美景”，“出神片刻”，可是很快又回到关于“乌合之众”的思虑上来，在诗的结尾作出这样的结论：

“河上漂着一块块薄冰，  
结冻之前一直在漂流。  
走吧，眼下还不算太晚，  
走吧，还没有受到委屈，  
严寒还没降临卡马河，  
血液暂时还没有冷却。

……

它们全都从这里给卷走，  
被雨水从岸边冲刷掉——  
人们相互之间的敌视  
结成永不融化的冰霜。

只有一个念头：返回莫斯科！”（第41—42页）

我们苏联后方的生活，在H. 阿谢耶夫看来，是一种“庸俗的生活”，是亚洲式的野蛮和愚昧。再譬如《卡马河畔的小镇》一诗。尼·阿谢耶夫是这样来描写这个“小镇”的：

“……如果说在自然界中，  
在奇异的植物上  
每一个主干和枝茎  
都被悉心照料，

那么看来，——  
累得腰酸腿疼  
愁眉不展的人身上  
就连一个幼芽  
也没有开放  
……  
你看到：  
英勇的人群  
衣着褴褛，  
在人行道上  
一边吐痰，  
一边骂娘。  
他们疾走如飞，  
疾走如飞，  
但没有明确方向，  
痛苦得话音不清，——  
希望生活  
按照自己的意志。  
……  
烟雾蒙蒙，  
天刚拂晓，  
忧愁悲伤，惊恐不安，  
破衣烂衫，肮脏不堪。  
一些濒临灭亡的  
部落的残余  
在码头和车站上游荡，  
污垢的碎片，

无用的垃圾，  
不是在谈话，  
而是本能地叫唤。  
酒气熏人，  
小偷们打着口哨，  
少妇们破口大骂——  
好一幅城市风景画！

……

白天燃烧着  
委屈之火，  
依次映照在  
人们的脸上。”（第58—63页）

在H.阿谢耶夫的描写中，甚至莫斯科人的战时生活也带有“庸俗生活”和市侩习气的难以置信的顽强生命力的痕迹。

“这是难以置信的：  
路上血迹一滩滩，  
洗衣房里锈迹斑斑，  
而人们——去而复来，  
去而复来，  
犹如什么都没发生，  
像是一群蚂蚁！  
这——是难于表达的：  
眼前是爆炸掀起的烟柱，  
而人们——走过去，无动于衷  
对于自己的命运

视而不见，  
不知其不可避免。  
无人哀悼的尸体一堆堆，  
无所用心的日子一天天，——  
人们不喜欢奇迹：  
没有清洗的餐具一摞摞，  
流言蜚语接连不断，  
只是一些传闻，带来恐惧。  
还是这样剃须，  
还是这样拉车，  
还是这样举杯喝酒，  
豪饮海量，各不相让，  
还是这样读着战报，  
好像战争非常遥远。  
爆炸的声浪涌来，  
笼罩着四方，震耳欲聋，  
钢铁跟砖头一样，  
把房盖掀翻，——  
而金丝鸟却飞出牢笼  
这是很少有的情况——  
轻盈地飞出，纵情地歌唱！”（《战争的日常生活》一诗）

《期望》一诗（第39页）也是不正确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阿谢耶夫在这里断言，对敌人的憎恨是暂时的，我们只要解脱它就会重新成为人。请看这首诗的全文：

“暴力产生暴力，

谎言增加谎言。  
当人抓住您的喉咙——  
您自然而然地拿起刀。  
把刀称作圣物，  
可是仔细察看刀锋，  
就会开始发现，  
刀锋里有你自己的影像，——  
不，我不会这么做，  
我不能这么做：  
我由于狂怒而说不出话来，  
可是也不因狂怒而说谎！  
人人都被战斗所吸引，  
每个人都怀着期望：  
我洗掉手上的鲜血，  
刮掉脸上的污垢，  
又跟从前一样，  
不是愤怒到骨髓：  
而是怀着巨大的期望，  
向着死亡的分界线走去！”（第39页）

这本书是国家文学出版社的编辑 B. 佩尔佐夫和主编 A. 米亚斯尼科夫签字付印的。

我认为必须禁止 H. 阿谢耶夫的书如现在的样子出版。  
请求您的指示。<sup>①</sup>

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 Г. 亚历山德罗夫

11月26日

---

① 本文献原件的第1页左上角有谢尔巴科夫的批示：“送马林科夫同志。书已查禁。但为了了解阿谢耶夫的情绪，请您谈谈这份报告。A. 谢尔巴科夫。12月30日”。在1943年，阿谢耶夫关于“战争的日常生活”的几乎所有的诗作都遭到批判。

№02196

## 阿谢耶夫关于出版作品问题

###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43年12月2日)

亲爱的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

号称一个作家，而又没有可能及时地刊印自己的作品——真是一种痛苦的嘲弄。我在这半百的年纪里不得不相信，写一本书比设法出版它要容易得多。即使在作品获得了无可争议的成功的情况下，由于某些无法猜测的原因，要让它真正流传也超越了作者的可能。譬如说我的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故事获得了斯大林奖金一等奖，可是却没能有幸再版，尽管第一版问世后几个小时就销售一空。

现在，我的桌子上堆满了写于战争年代的诗。然而，我挑选了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编成一本篇幅不大的书，得到国家文学出版社的赞许，已经捡字排版，全都准备就绪，可是无论如何也轮不上印刷，被搁置了半年之久。

没有对我讲清耽搁的原因，只是推托客观情况。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是在最困难的年代就最困难的问题顽固地保持沉默。是什么人和为什么需要造成这种印象——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继续写作的愿望将会逐渐消失，产生一种无所追求和徒劳无益的感觉。诗中不由自主地充塞着痛苦和注定失败的感情。

没有发表的诗就像没有收割的田地一样，不能给新的提供地盘。

我在写作的整个实践中已经习惯于对事件做出反响。莫非现在需要重新学习，把自己的诗放进桌子里留待死后发表吗？

或许您认为有可能帮助我吐出这块哽在喉咙里的骨头？

尼古拉·阿谢耶夫

莫斯科艺术剧院胡同2栋55室

电话 K 3-87-38

No 02200

## 亚历山德罗夫、普京、叶戈林 关于《十月》等杂志问题致马林科夫的报告

(1943年12月2日)

联共（布）中央书记格·马·马林科夫同志

最近一个时期，文学杂志《十月》、《旗》等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其表现是发表了一些反艺术的和政治上有害的作品。

《旗》（1943年第7—8期合刊）刊载了谢尔文斯基的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我的人民的灵魂  
与俄罗斯大自然一样：  
它怜爱关怀畸形的人  
抚养他就像小鸟一样。

它不会把他从世上撵走，  
而保持自己的怪癖和倔强——  
它那里有很多空气和阳光，  
也有许多真理和爱心。”（第111页）

几个月之前，《十月》杂志编辑部决定刊登谢尔文斯基的《插曲》一诗，谢尔文斯基在这首诗里歌颂战争是因为战争给了他幸福，让他占有了库班的一个年轻姑娘：

我面前坐着一个浅发女郎，  
    她以哥萨克的力量吸引着我；  
海一样的眼睛闪着强烈的欲火，  
    虽然带着轻蔑，却给我以爱抚……  
我还没有看够这梦幻的景象，  
    没有猜出这里的奥秘，  
突如其来的洪水，  
    淹没了乡村的居民区！  
炸弹！一瞬间我扑倒在地，  
    扑倒在玻璃上——血泊里……  
在探照灯疯狂的亮光中，  
    照明弹愤怒地划破天穹。  
她被机枪扫射的火光照亮，  
    全身被战火映得通红——  
女主人的女儿躺在我的身边  
    赤身裸体就像来自波浪中，  
“您？”  
    我幸福地笑起来，  
    像是一个年轻的猎手。  
炸弹越来越响，射击越来越密，  
    蒸汽机车发出呼唤的长鸣……  
我像在幽会时那样吻她，  
    吻着她的肩、后脑勺和嘴。  
她麻木了，微微地喘息；  
    她在那轻轻地呻吟——  
她爱我。噢，真是乱套！  
    战争简直不可思议。

有谁能够想到？不，  
    这重重夜幕并非枉然……  
但愿，但愿这危险能够延长，  
    但愿你不会离开。  
明天你会重新“禁忌”，  
    来回答这爱情的声音……  
突然，灵魂中燃起火焰，  
    向内心的声音投来。  
我在自己的嘴唇下感觉到  
    由于中弹而湿漉漉的额角。

诗中还有下面这样低级下流的句子：

“她的样子高傲而又委屈，  
    询问妻子的事，  
    女儿  
        度过  
        自己的童年，  
如同再好不过的  
    勋章。  
我从一股热气后面望着她。  
    啊，你多么美呀，罗斯！  
可是很清楚——我同她不是一对：  
    我已经结婚而且不会离异。”

宣传部禁止发表这首诗。

进一步加重这些杂志编辑部的错误的是，联共（布）中央已就

谢尔文斯基一系列诗作的反艺术的和有害的性质不止一次地发出过警告。《十月》杂志（1943年第2期）发表了B. 卡达耶夫极不成功的粗制滥造的剧本《蓝色小手帕》。在剧本中，苏维埃人看上去是平庸乏味的，他们的思想感情很原始，相互间的关系是简单和庸俗的。剧本中的主要人物——坦克兵——通过通信的方式与姑娘们相爱。苏联的姑娘们被作者描写成某种没有个性的玩偶。坦克兵们也不像是苏联士兵。这是一些小锡兵。苏联的实在剧本中是以被歪曲的形式出现的。

《十月》杂志（1943年第6-7期合刊和第8-9期合刊）发表了左琴科卑鄙下流的反艺术的和政治上有害的中篇小说《日出之前》。

左琴科的中篇小说与我们人民的思想感情是格格不入的。左琴科宣称，他的小说的材料“说明人的理性的胜利和科学、意识的进步”，而实际上整部小说却是建立在个人的市侩的世界观上的。左琴科对我们人民的生活描绘了一幅极其歪曲的画面。主人公们的心理、他们的行为都带有变态的性质。

左琴科只关心自己。读者在小说中始终感到作家顽强地突出他的“我”。左琴科依据生理学的材料来解释生活的事件，而忘掉了社会因素的影响。这种解释不仅天真，而且违背科学世界观的基本原理。“生活在社会中，要想离开社会而自由是不可能的。”（列宁）

左琴科从一岁开始讲述自己的生活。

“我努力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一岁的婴儿，”左琴科写道，“嘴里含着奶嘴，手里拿着‘哗啦棒’，向上举起两只小脚……经过一番紧张的思想之后，在我那激动的头脑里闪现出一些遗忘了的情景。这是某种被子的折裯。从墙里伸出的一只手。高大的摇摇晃晃的影子。还有一个影子。还有一只手。一些白色的泡沫。又是一个长长的影子摇摇晃晃”，等等（第8-9期合刊第122页）。

对幼年时代的描写在小说中占有相当的地位。专门有两章描写这个时期：《从二岁到五岁》和《两岁以前》。毫无疑问，苏联读者对于这些“回忆”没有任何兴趣。作者企图以这些“回忆”为基础得出某些科学结论，这简直是可笑的。左琴科板着严肃的面孔，企图通过个人幼年生活的例子“在行为中发现条件反射的规律、暂时的神经联系的规律”。

左琴科在小说中特别注意性的描写，品味自己跟许多女人的关系。小说第一部共有63个小故事，其中有17个描写了左琴科的艳遇。左琴科在一个故事中描写了他如何在电影院里跟一个姑娘接吻，在另一个故事里讲述了自己的嫖娼，在第三个故事里讲了自己跟一个将军的情妇的暧昧关系——说这是个“健壮的儿子几乎没有文化的女人”，她的手“在教堂的穹隆下经受过三个男人”。

题为《想要睡觉》的故事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我阴郁地，愁眉不展地坐着。摇着头。‘想要睡觉吗？’她问道。‘那就到我家去吧。’我俩走进她的房间。房间里有一盏中国式的吊灯。中国式的屏风。中国式的长袍。这很可笑。可笑。我俩躺下睡觉了。”（第6-7期合刊第70页）

在《我爱》和《你明天来吧》等故事中，左琴科描写了自己休假时的经历——与“他非常爱”的未婚妻娜佳的会面以及与T.塔塔在她丈夫不在时的幽会：

“塔塔站在镜子前整理自己的头发。我走到她身边，拥抱她。她笑着。感到奇怪的是我为什么变得如此大胆。她拥抱着我，就像有一次在楼梯上那样。我俩亲吻着。与这相比，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很渺小。

……然后，她看了看时钟，惊恐地叫喊起来。她说，我丈夫马上就回来。就在这功夫，门开了，她的丈夫走进来。塔塔刚好来得及把自己的头发整理好。”（第6-7期合刊第74页）

在故事《麂皮手套》中，左琴科讲了自己内战时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生活。他在那里向未婚妻求婚，同时又常到一个海军军官的“机灵的和娇媚的”寡妻那里去：

“我按约定的时间到她家去。她不放我走，我俩在她的小客厅里喝茶。喝完茶以后，她把自己的脑袋贴到我的胸上。过了3个小时以后，我离开了她。”（第6~7期合刊第78页）

在故事《我自己的过错》中，左琴科描绘了自己在列宁格勒跟一个女人的艳遇，如他所说的，这个女人过着一种“复杂的生活。丈夫很嫉妒，情夫更加嫉妒”。整篇故事充满下流的场面。

左琴科谈到自己的结婚时写道：

“一个曾经爱过我的女人对我说：‘您的母亲去世了，您搬到我这里来吧。’我跟这个女人一起到民事登记局去了。我俩登记了。现在她是我的妻子。”（第6~7期合刊第83页）

左琴科的故事是自然主义的，粗野的。作者描写列宁格勒动物园的动物时，用这样一个场面结束故事：“棕熊在笼子里狂暴地来回走着……公熊吼叫着把母熊压在身子底下。”（第6~7期合刊第90页）

根据中篇小说来判断，左琴科在生活中一个正派的人也没有遇到。他觉得整个世界都是庸俗的。左琴科所写的人差不多都是酒鬼、骗子和堕落之徒。

左琴科写道：“有一次在索契，我结识一个人，他的苦恼比我的多得多……我怀着极大的敬意与这个人攀谈起来”。然而，他继续写道，“这是个智力有限的人，没有教养，甚至丝毫没有知识。他在整个一生中读过的书没有超过两本。除了金钱、饮食和女人，他对任何别的事都没有兴趣……后来我看出来，这只不过是个傻瓜。只不过是个木头疙瘩，跟他谈话超过3分钟都是不可能的。”（第6~7期合刊第62页）

在另一篇故事里，左琴科回忆自己在基斯洛沃茨克时的情景时，只提供了两个形象：一个当出纳的骗子，另一个是妓女。

在故事《铁青色的影子》中，左琴科描绘十月革命以后斯摩棱斯克州一个农民的形象：

“我走近这个农民。他是个上了年岁的人。穿着树皮鞋和破烂的粗布衣服。我问他，为什么在十来步远的地方就把帽子摘下来，深深地向我鞠躬。

农民再次鞠躬，想要吻我的手。我把手拿开。

‘我怎么惹您生气了，老爷？’他问道……‘老爹，’我对农民说，‘工人和农民掌握政权已经一年了。可是你还想要吻我的手。’

‘没有传到我们这里来，’农民说，‘不错，老爷们都从自己的院子搬了出去，现在住在草房里……可是有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第6-7期合刊第80页）

在这个故事和小说的所有其他故事中一样，左琴科谈到我们人民时不加掩饰地流露出轻蔑和嫌恶，诽谤我们的人民、故意歪曲他们，诋毁他们的生活。譬如在故事《濒死的老人》中，左琴科描绘了一个野蛮的场面：在一所农民的房屋里，桌子上躺着一个濒死的老人。他的身边站着亲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老人。突然，

“老人睁开眼睛，用暗淡的目光扫视着周围的人。

一个面孔黝黑的年轻女人向着老人弯下腰去，一声不响地听他嘟哝着。

‘他怎么样？’一个老太太问道。

‘要奶头，’女人回答道。她迅速地解开自己的短上衣，拿起老人的手，放到自己裸露的乳房上。

我看见老人的脸容光焕发起来，他的嘴唇上像是掠过一丝微笑。他呼吸平稳了，均匀了。

大家都一声不响地一动不动地站着。突然，老人的身体抖动一

下。他的手无力地垂下来。脸变得严肃和完全安详了。他停止了呼吸。他死了。”（第6-7期合刊第80页）

在故事《在团部》中，左琴科不知为什么要描写一个让人厌恶的麻风病患者；在故事《面包》中，左琴科谈到一个小而贪婪的农民青年：

“我对面的床铺上坐着一个穿一条长裤的年轻小伙子。刚刚从村子里给他送来两个大圆面包。他用削笔刀把面包切成小块，抹上奶油，送进嘴里。他无尽无休地这么做着。病人中间有一个人请求说：

·‘斯维杰罗夫，给一小块儿。’那人回答说：‘让我自己先吃够了。等我吃够了再给你。’吃足了以后，他把小面包块扔到各个床铺上去……”（第6-7期合刊第81-82页）

谈到与高尔基的会见，谈到高尔基与作家们的谈话——“关于文学、人民、关于作家的任务”，左琴科只是回忆了下面这个细节：

“最近几天，有一次高尔基乘坐汽车出行。卫兵挡住了他。他说，他是高尔基。可是卫兵却说：‘你是苦的还是甜的，这对于我们来说无关紧要。请出示通行证。’”（第6-7期合刊第85页）

在故事《会见》中，左琴科说，在全苏人口普查的时候，他担任了调查员的工作，为的是“看看人们是怎样生活的”。他看见了什么呢？

“我在走廊、厨房走动，走进了房间。我看到昏暗的灯，破乱的糊墙纸，挂在绳子上的内衣，惊人的拥挤，垃圾，破烂东西……

我走进一个半明半暗的房间。床上铺着肮脏的垫子，上面躺着一个人……

‘您在何处工作？’我问道。

‘驴和马才工作，’他说，‘我本人并不工作，而且也不准备工作。请您就这么填写您那可恶的文件吧……’

过了几分钟，我坐到他的床上，跟他谈了起来……

‘说起这段历史够叫人讨厌的了，’他说。‘老婆跟一个骗子走了。我开始酗酒。所有的东西全都喝光了。丢掉了工作……’”（第6-7期合刊第85页）

在另一篇题为《演说》的故事里，左琴科把苏联观众描写得麻木不仁和粗野愚昧：

“给个‘澡堂’……‘女贵族’……你在胡诌些什么呀！……咳，要是我现在被人抬着从舞台上经过或者骑着独轮车——晚会就能秩序井然……我可以自慰的是这些观众会怀着相同的兴趣去参加任何一个丑角或杂耍的晚会。”（第6-7期合刊第89页）在故事《又是胡说八道》中，左琴科也同样诋毁我们的人民。

他写道：

“上帝保佑他们，”我想道，“没有大型杂志，我也过得去。他们需要的是某种‘平凡’的东西。他们需要的是与古典相像的东西。这会让他们喜欢。做到这一点非常容易。可是我却不想给那些不存在的读者写作。人民对文学有另一种概念……”（第6-7期合刊第86页）

左琴科的整部小说都是对我们人民的诽谤，丑化了他们的感情和他们的生活。

左琴科在考察俄罗斯古典作家——“我的伟大同行”（如他所说的）的时候，他从他们的传记中抄录了“属于苦闷的一切”，尽力表现“他们像我一样苦恼”。左琴科片面地把事实串连起来，一个比一个更可怕，造成曲解一些伟大俄罗斯作家的观念。所有的俄罗斯作家在他那里都成了悲观主义者和颓废派。果戈理，——左琴科写道，——离开苦恼便不能给自己找到位置，涅克拉索夫一直打算投河自尽，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想要开枪自杀，列夫·托尔斯泰想要上吊，等等。这种状况，——左琴科写道，——对于作家们来

说是典型的。他写道，“我尽力列举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典型的、在他的生活中经常重复的、并非偶然的、并非瞬间的表现和突发性的东西。”

就作者的构思来说，左琴科的中篇小说《日出之前》应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他（左琴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不幸的，并且应该提供一个获得幸福生活的验方。他想要当的不仅仅是作家，而且还是学术研究家。他谈论条件反射并且答应在实践中检验巴甫洛夫院士的“铁的公式”，以一个无知者的天真断言：“可以而且应该借助于狗和手术刀来研究人的行为。”

发表左琴科的中篇小说《日出之前》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1942年底，《旗》编辑部决定刊登政治上错误的和有害的中篇小说《胜利》（作者多夫任科），其中明显地表露出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格格不入的民族主义性质的观点。多夫任科描绘红军在苏德战线乌克兰地段进行过的和正在进行的战斗时，顽固地企图让读者相信，为乌克兰而斗争的似乎只有乌克兰人。小说描写了红军数十名战士的战绩，但其中没有一个不是乌克兰名字。

小说的主人公之一，克拉夫奇纳上尉说：

“我们为什么而战斗，为什么而死亡？……我们是在为世上的无价之宝——乌克兰而战斗……为了乌克兰，为了正直的乌克兰人民！为了4千万的人民，这是在欧洲数百年的历史上惟一没有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找到人的生活的人们。为了这个受尽折磨的、被瓜分的人民！”

就欧洲和乌克兰发表一通混乱的议论（在这通议论中，与在整部小说中一样，乌克兰一次也没被称作苏维埃乌克兰）之后，克拉夫奇纳上尉宣布说：

“请你们记住，不管我们今天在哪条战线上作战，不管斯大林把我们派往何方，——北方、南方、西方，派往世界的四方，——

我们都是为乌克兰而战斗！”

中篇小说《胜利》的毛病还在于不正确地解释了战争开始时红军撤退的原因。多夫任科认为撤退的原因是“我们过去没有关于生活的文化和理解，我们现在也没有战争的文化”。在多夫任科的小说里，胜利是以大多数战斗参加者的牺牲为代价而获得的。他们是因为不会战斗、指挥员指挥不力和军事专家的官僚主义才牺牲的。

宣传部禁止发表这部中篇小说。多夫任科在新的中篇小说《战火中的乌克兰》中犯了更加严重的政治错误。

文学杂志的所有这些错误证明，杂志编辑部对待所发表作品的思想政治内容和艺术价值抱着不负责任的态度。

在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质量极差的作品，例如普拉东诺夫<sup>①</sup>的短篇小说《谢米德沃里耶保卫战》（《旗》杂志1943年第5-6期合刊）、Г. 费什<sup>②</sup>的中篇小说《反击》（1942年第12期）、芬克<sup>③</sup>的长篇小说《可怜的法兰西》（1943年第4期、第5-6期合刊）、斯塔罗斯京<sup>④</sup>的特写《空降兵》（1942年第9期）、卢克尼茨基的短篇小说《胜利的力量》（1943年第1期）、拉甫列尼约夫<sup>⑤</sup>的《老太婆》（1943年第1期）、潘菲洛夫的特写《乌拉尔的人们》（《新世界》杂志1943年第2-3期合刊）、斯廖兹金<sup>⑥</sup>的短篇小说《老头们》（1942年第9期）、比斯緬内<sup>⑦</sup>的中篇小说《大地的边缘》

① 普拉东诺夫、安德列·普拉东诺维奇（1899-1951），作家。其抒情散文和讽刺散文的风格独特。

② 费什、根纳季·谢苗诺维奇（1903-1971），作家。

③ 芬克，维克多·格里戈里耶维奇（1888-1973），作家。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著有反对军国主义的长篇小说。

④ A. B. 斯塔罗斯京（1919-1980），作家。

⑤ 拉甫列尼约夫，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1891-1959），作家。

⑥ Ю. П. 斯廖兹金（1885-1947），作家。

⑦ A. Г. 比斯緬内（1909-1971），作家。

(1942年第11、12期)、德利加奇的诗(《十月》杂志1942年第7期)等。出现这种情况只能用杂志责任编辑对编辑部收到的稿件缺乏严格的批判态度来解释。

普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谢米德沃里耶保卫战》是用糟糕的矫揉造作的语言写成的,主人公——苏联战士和军官——的形象被丑化了。小说中有许多荒唐的议论,普拉东诺夫把它们强加给苏联军官和战士:

“士兵应该会永久地和严肃地死,如果需要这样而且这能给人民带来好处”,班长瑟切夫说,“否则他算个什么士兵呢?那么他也就懒得死了。”(第21页)

“当个死人很无聊而且不合算,”一个战士说。“我被打死了,但是既然我在生活中还有一段没活完的时间,那么我就应该活到头。”(第14页)

阿盖耶夫中尉看不起通常的武器,用拳头打击敌人:“如果说刺刀是好汉,那么你就得把拳头看做是亲爹……”阿盖耶夫说,“它用不着你维修,没有给养也能活——它一次长出来,就总是挂在你身上,随时都准备战斗。如果给打掉了——也不倒霉……给打掉了——你就当个左撇子吧。”(第9页)

整篇小说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荒谬的箴言:“德国人的头脑是有发条的,我们的头脑虽然不尽好用,但是活的……”(第15页)“战争,这是高产量地生产产品,具体地说就是敌人——占领者的死亡以及对所有相互作用的部分的最好组织……”(第11页)

杂志上发表的许多作品的编辑工作草率,语言很糟糕。譬如芬克的长篇小说《可怜的法兰西》中有如下的语句:

“上帝呀,在这种时刻圣母哪能睁大眼睛。”

“我在哪里看见了这个咖啡壶?”(说的是人的面孔)“我梦见了这个红头发的女人……胡萝卜很漂亮。”

“小姑娘，用小脚走路。”

“你好，老窟窿。”

“告诉我，她出嫁了吗？出嫁了？——我不知道。可是，在我看来，米舍尔给她套上笼头了。”

“你在死人国里有没有富裕一些的人，他们能为去那个世界作好准备。”

“可是当首长过分逼迫他的神经系统时，他抬起了头。”

“……里列塔患了梅毒。她早就死啦……蛆虫在坟墓里吃她，它们感到恶心。”

《旗》发表了拉甫列尼约夫反艺术的和虚假的短篇小说《老太婆》。小说的内容如下：一群海军陆战队的战士驻扎在一个被德国人洗劫一空的村庄，那里只剩下一个老女人。后来弄清了，这是个年轻的女人，但在德国人占领下的7个月的时间里变老了。请看拉甫列尼约夫是如何描绘苏联水兵跟这个女人相见的：

“红海军敬礼，带着绿豌豆，老奶奶！我们奉命在这个居民点停泊。看来这里只有您一家的院子，居民也只有一个人……您接受住客吗？”“你们就住吧，我没什么”，女人回答道。（第85～86页）

一个水兵继续耍活宝：

“看见您对待战士这么冷淡，老奶奶，甚至很奇怪……您面前是9名1942年型的不幸的小水兵，他们在战争的风暴中失去了爸爸和妈妈。而结婚的失去了妻子。难道您的心里对这些孤儿不能产生母亲的怜悯来取代那种硬心肠吗？”（第86页）

接下去讲了水兵们对女人的关怀：

“我们给奶奶的机体里注进一些过剩的珍品，她还会跟我们一起跳舞哩。”（第88页）

小说描绘了如下一个下流的场面：

“喂，老奶奶，”维诺格拉多夫叫道。“别打官腔了，友好相处

吧。给我的脊背擦擦肥皂吧，亲爱的。我怎么也够不到……”“不好意思，亲爱的，”她——终于——说，“我是个女人。”“噢，噢，”维诺格拉多夫笑着打断她说，“别不好意思。你算计算计自己的年纪，是个什么女人呀？我对于你来说相当于一个吃奶的孩子……你瞧，”军士自言自语地说，“我们这个老人倒害起羞来了。看来女人到死也还是个女人。”

文学杂志在战争时期刊载了苏联文学所有的优秀作品（《旗》——爱伦堡<sup>①</sup>的《巴黎的陷落》、西蒙诺夫<sup>②</sup>的《俄罗斯人》、阿利格尔<sup>③</sup>的《卓娅》等等；《新世界》杂志——谢尔盖耶夫-岑斯基<sup>④</sup>的《塞瓦斯托波尔激战》、扬<sup>⑤</sup>的《拔都》、列昂诺夫的《侵略》、索博列夫的《海魂》；《十月》杂志——万达·华西列夫斯卡娅的《虹》、希什科夫的《叶梅里扬·普加乔夫》、戈卢博夫的《巴格拉季昂》、戈尔巴托夫的《不屈的人们》等等），促进了许多作家的创作成长。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杂志也发表了很多平庸的、没有深入加工的作品。在艺术方面最差的是《新世界》杂志，刊载了许多平庸的无足轻重的作品。

杂志中的批评和书评栏完全不能令人满意。苏联作家的许多大型作品获得了斯大林奖金，可是至今还没有在杂志上得到应有的评价。譬如《旗》至今没有发表一篇评论万达·华西列夫斯卡娅的中篇小说《虹》、列昂诺夫的剧本《侵略》、A. 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扬的《成吉思汗》和《拔都》，以及狄青纳、库帕拉、萨梅

① 爱伦堡，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1891-1967），作家，社会活动家。

② 西蒙诺夫，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1915-1979），作家，社会活动家。

③ 阿利格尔，玛尔佳丽塔·约瑟福夫娜（1915-?），诗人。

④ 谢尔盖耶夫-岑斯基，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1875-1958），原姓谢尔盖耶夫，作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43年）。

⑤ 扬，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1874/75-1954），原姓扬切韦茨基，作家。

德·乌尔贡、雷利斯基等作家的作品的文章。《十月》杂志没有发表过评论谢尔盖耶夫—岑斯基的《塞瓦斯托波尔尔激战》、西蒙诺夫的《俄罗斯人》、巴若夫<sup>①</sup>的《宝石匣》等作品的文章。杂志中发表的多数批评文章极其一般化和肤浅，对文艺作品的分析常常脱离其思想政治内容。

杂志的编辑部没有充分评价文学评论对于苏联文学发展以及教育劳动者的意义。

文学杂志是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的机关杂志，可是作协主席团完全不领导其工作。文学杂志的编辑委员会不开展工作。作协主席团对此不闻不问，不采取措施整顿其工作。虽然联共（布）中央不止一次指出必须从根本上改进文学评论的状况，可是从主席团和法捷耶夫同志个人方面来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提高文学评论的作用和意义。

法捷耶夫同志在作家大会上就文学评论问题的几次讲话，内容单薄，抽象，有时还有错误。譬如在今年10月召开的作家会议上，法捷耶夫同志激烈地反对戈尔巴托夫的中篇小说《不屈的人们》和戈卢博夫的长篇小说《巴格拉季昂》。法捷耶夫同志把戈尔巴托夫的中篇小说称作“小说式的政论”，“平面图”，从而把这部小说抛到文学的范围之外去了。

“我们的青年在成长，”他说，“而我们因主题，因政治而一味称赞，却不严格要求。年轻人以后成长起来就会发现，除了戈尔巴托夫和戈卢博夫之外，还有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和屠格涅夫……”

事实上，世界上曾经有过托尔斯泰、列奥纳多·达·芬奇，而我们却絮叨着：巴格拉季昂、巴格拉季昂、巴格拉季昂，仿佛是这不应该受到某种艺术的批评。”

① 巴若夫，帕维尔·彼得罗维奇（1879—1950），作家。

显而易见，法捷耶夫同志在这里反对戈尔巴托夫和戈卢博夫的作品在联共（布）中央得到的肯定评价。

最近几年，联共（布）中央就改进文学杂志的工作以及作家和评论家的创作工作问题不只一次地给作家协会下达直接的指示：斯大林同志 1940 年与作家的谈话；联共（布）中央 1939 年《关于文学杂志》的决议；联共（布）中央 1940 年《关于文学评论和图书评介》的决议；联共（布）中央 1942 年关于卡普列尔<sup>①</sup>发表在《真理报》上的短篇小说的决议，等等。

然而，作协主席团以及法捷耶夫同志个人都没能从这些指示中做出必要的结论，在作家当中不进行教育工作，不对他们的创作工作施加任何影响。作家协会的各部——诗歌部、小说部、戏剧部不开展工作。作家协会偶尔组织对这些或那些作品的讨论，可是通常都没有得到来自主席团方面的领导<sup>②</sup>。

主席团的党组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许多问题本来需要事先在党组会议上进行讨论，却直接拿到主席团的会议上，而主席团的会议常常由于主席团成员缺席而变成偶然到来的一些人的会议。

这一切无疑对作家和文学杂志的工作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

宣传部认为，联共（布）中央有必要就文学杂志通过一项专门的决定。

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 Г. 亚历山德罗夫  
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А. 普京  
文学部主任 А. 叶戈林

<sup>①</sup> 卡普列尔，阿列克塞·雅科夫列维奇（1904—1979），电影剧作家。

<sup>②</sup> 在此之后不久，1944年2月6日，苏联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选举 H.C. 古洪诺夫为作协主席。

№02197

##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 关于对文学杂志进行监督的决定

（1943年12月2日）

### 关于对文学杂志的监督

应该指出，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对杂志、尤其是对文学杂志的监督很不得力。只是由于监督不力的结果，诸如左琴科的中篇小说《日出之前》或谢尔文斯基的诗《俄罗斯给谁唱催眠曲》这样的在政治上有害的、反艺术的作品才能渗透到杂志中来。

责成亚历山德罗夫同志和普京同志组织对杂志内容的监督，杜绝可疑的和反艺术的作品在杂志上出现。

在宣传部内部实行对杂志监督的分工负责制——亚历山德罗夫同志负责《新世界》，普京<sup>①</sup>同志负责《旗》，费多谢耶夫<sup>②</sup>同志负责《十月》。确定对这些杂志进行监督的同志应在杂志的内容上对联共（布）中央承担全部责任。

① A. A. 普京（1904 - ?），1940 - 1944年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② 费多谢耶夫，彼得·尼古拉耶维奇（1908 - 1990），哲学家。1943 - 1946年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No 02198

##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 关于提高文学杂志责任书记的责任感的决定

（1943年12月3日）

### 关于提高文学杂志责任书记的责任感

联共（布）中央注意到，各文学杂志的责任书记——《十月》（尤诺维奇同志）、《旗》（米哈伊洛夫同志）、《新世界》（谢尔比纳同志）——是中央委员会为了改进文学杂志的工作、为了改进对杂志编辑委员会的领导和对作者集体的工作而任命的，可是他们履行交给他们的职责却很不得力。杂志的编辑委员会没有开展工作，不讨论杂志编辑部收到的稿件，对作者集体的工作开展得不能令人满意。杂志的责任书记不能批判地对待编辑部收到的稿件，对所发表的作品质量及其政治思想内容没有表现出高度的要求。杂志责任书记对发表作品不负责任，其结果是让一些粗制滥造的、没有精心加工的、有时是有害的作品渗透到杂志中来。《十月》杂志发表了左琴科反艺术的卑鄙下流的中篇小说《日出之前》。《旗》发表了谢尔文斯基政治上有害的诗《俄罗斯给谁唱催眠曲》。

联共（布）中央决定：

1. 责成各文学杂志的责任书记提高对杂志上发表的作品的质量要求，建立对杂志编辑部收到的稿件进行处理的工作秩序，以便

完全杜绝在杂志上出现反艺术的和政治上有害的作品。

2. 警告各文学杂志的责任书记，他们在领导杂志以及杂志的思想政治方向和内容上对联共（布）中央承担个人责任。

No02199

## 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 关于《十月》杂志的决定

(1943年12月22日)

### 关于1943年的《十月》杂志 (苏联作协主席团1943年12月22日的决定)

作家协会主席团注意到《十月》杂志1943年的工作中有严重的失误和缺点：

1. 在发表思想艺术意义很高的作品如C. 戈卢博夫<sup>①</sup>的《巴格拉季昂》、维亚切斯拉夫·希什科夫<sup>②</sup>的《普加乔夫》、鲍里斯·戈尔巴托夫<sup>③</sup>的《不屈的人们》等的同时，杂志在1943年也刊登了B. 卡达耶夫低级下流的剧本《蓝色小手帕》和M. 左琴科的低级下流的和反艺术的中篇小说《日出之前》。左琴科的中篇小说《日出之前》追求所谓的“科学”研究，实际上把读者引向狭隘的渺小的市侩感受领域，远离苏联人民的生活，尤其是在战争岁月里。杂志刊登左琴科有害的小说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2. 与此同时，杂志上时而出现一些作品，它们或是没有生命

① 戈卢博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1894—1962），作家。

② 希什科夫，维亚切斯拉夫·雅科夫列维奇（1873—1945），作家。

③ 戈尔巴托夫，鲍里斯·列昂季耶维奇（1908—1954），作家。

力的、凭空臆造的（K. 帕乌斯托夫斯基<sup>①</sup> 的短篇小说《琴弦》），或是粗制滥造、需要进一步加工的（M. 斯洛尼姆斯基<sup>②</sup> 的短篇小说《统一》），或是公式化的（Л. 德利加奇<sup>③</sup> 的诗《致妻子》）。

3. 杂志上出现一些质量很差的、公式化的、有时是有害的作品，其原因是对所发表作品的质量，首先是对其思想政治内容，缺乏必要的严格要求；同时也因为这家杂志也与其他杂志（《新世界》、《旗》）一样，领导工作中组织方面的状况不能令人满意。杂志的编委会事实上没有开展工作。杂志没有形成能够积极参与杂志工作的作者集体，对准备刊登的稿件事先没有系统地进行讨论。

4. 虽然在1943年评论栏曾发表过某些有价值的文章（M. 格尔凡德<sup>④</sup> 评论万达·华西列夫斯卡娅<sup>⑤</sup> 的《虹》的文章、B. 佩尔佐夫<sup>⑥</sup> 的《作家及其战争日子里的英雄》等），但杂志评论栏总的状况应该认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评论界普遍的缺点在《十月》杂志的评论栏里也完全存在：缺乏思想政论性的、有艺术针对性的、面向读者的、为文学提出人民生活基本问题的评论。引人注目的则是许多文章和书评的肤浅或表面的赞颂。书评没有包罗所有问世的出版物。尤其对兄弟民族文学作品和年轻作者的作品的评价和介绍开展得很差。

5. 杂志编辑部对年轻作者的工作做得很差，没有充分地提拔有才华的青年力量到杂志中来。

① 帕乌斯托夫斯基，康斯坦丁·格奥尔基耶维奇（1892～1968），除中短篇小说外，擅长抒情散文。

② 斯洛尼姆斯基，米哈伊尔·列昂尼多维奇（1897～1972），作家。

③ Л. М. 德利加奇，诗人。

④ М. С. 格尔凡德，文学评论家。

⑤ 华西列夫斯卡娅，万达·里沃夫娜（1905～1964），波兰和苏联作家。

⑥ 佩尔佐夫，文艺学家，评论家。

6. 虽然杂志发表了 K. 皮加列夫<sup>①</sup> 论苏沃洛夫、M. 加拉克季奥诺夫论斯大林格勒战役、П. 卡皮察<sup>②</sup> 论提出科学问题的文章，但缺乏经常性的政论栏目应该被认为是杂志工作中的严重缺点。缺乏有关苏联文化、从法西斯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的地区文化生活的恢复、对青年、特别是对工人阶级的青年一代进行教育、苏联知识界在卫国战争中的工作、艺术发展等最重要问题的政论文章。

7. 建议《十月》杂志编辑部：

1) 整顿编辑委员会的工作。

2) 组织作者集体，使其能够参与杂志工作，参与制订各期计划和内容，参与讨论和评价大型作品，参与广泛讨论各期杂志和苏联文学任务的会议和晚会。杂志编辑部应该对文学的思想和艺术质量及其教育和动员作用提出高要求，并且在这个旗帜下成为创作的中心，成为组织作家工作的核心。

3) 《十月》杂志的编辑部的注意中心应该是社会现实的、有明确目的性的文学，它应该服务于取得战胜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事业，反映卫国战争时代我们人民的英勇斗争和劳动。应该造成一种创作环境，为作家和批评家直截了当地提出严格的不顾情面的公正的批评要求。

4) 组织评论积极分子队伍，使其经常参与杂志的政论和评论栏目，吸引作家参与评论，必须让杂志的责任书记和各个栏目的编辑亲自撰写有关文学基本问题和现象的文章。开展对与文学相关连的艺术领域——戏剧、音乐、绘画的批评。恢复政论栏，提出上述苏联生活和文化的最重要的问题。在杂志上进行苏联知识界感兴趣

① K. B. 皮加列夫 (1911—?)，文艺学家、博物馆学家。

② 卡皮察，彼得·列昂尼多维奇 (1894—1984)，物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 (1939)。

的科学问题的宣传。

5) 坚决改进对青年作者的工作,更大胆地把成长中的力量提拔到杂志中来。

6) 在杂志中组织一个发表札记、回忆录、战争参加者的艺术作品的专栏。

7) 分出更多的篇幅刊登兄弟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

8) 对于比较重要的或者典型的作品,在杂志刊载之前通常应该事先在主席团会议上进行讨论。每一期杂志问世之后,主席团应立即组织讨论。

№02201

## 左琴科关于《日出之前》一书 致谢尔巴科夫的声明

(1944年1月8日)

党中央，亚·谢·谢尔巴科夫收

作家 M.M. 左琴科寄

### 声 明

我认为我的书《日出之前》在当今是有益的和需要的。我虽然认为这本书是大众化的，但由于其极端复杂我并没有急于刊印。许多内行人一致高度称赞，改变了我的初衷。

后来激烈的批评使我困惑不解——这是出人意料的<sup>①</sup>。

我仔细地检查了我的著作，发现书中有重要的缺陷。这些缺陷是由于我这本书所采用的体裁而产生的。在科学和文学之间没有建立起应有的结合。出现了含糊其辞、语焉不详和疏漏。这些问题有时歪曲了我的构思，让读者迷惑不解。这种新的体裁是有毛病的。把如此各不相同的因素结合在一起，需要更加谨慎，更加准确。

举两个例子：

---

① 在中央宣传鼓动部乃至中央书记处有关领导的直接干预下，1943年底和1944年初，在《文学和艺术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对左琴科《日出之前》第一部的否定性批判。此外，在1943年12月6日召开的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也遭到了批判。

1. 对生活的阴郁见解是主人公的一种疾病。摆脱这种阴郁是基本主题。这一点在书中表达得不够明确。

2. 劳动和与集体的联系在许多情况下比研究精神状态能带来更多的益处。然而，用这种方法是无法治愈病势沉重的精神病的。这就是为什么展示了临床治疗的方法。书中对此没有事先说明。

书的复杂性没有让我（以及别人）立刻发现错误。现在我应该承认，这本书像目前这个样子本来不应该刊印。

我进行这项试验是不合时宜的，这也使我心情十分沉重。这不是我的基本著作，这一点对于我来说是某种安慰。在战争年代，我用别的体裁还写了许多东西。我衷心地请求原谅我的过失——这种过失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所引起的，看来我对这个任务是力不胜任的。

我在文学界工作了23年。我的一切想法都是为了让我的文学完全被大众读者所理解。我力求让我的工作今后成为人民所需要的和对人民有益的。我一定改正自己无意中犯下的错误。

11月底，我考虑不周，给斯大林同志写了一封信。

如果我的信已经转交，那么我不得不请求也能让斯大林同志了解我这封认错的书信。当然是在您认为需要这么做的情况下。我不好意思而且也不便于第二次鼓起勇气打扰斯大林同志和中央。

米哈·左琴科

1944年1月8日于莫斯科

如果需要对所犯的错误做更加详细的解释，我一定这么做。现在我害怕用冗长的声明使您为难。M.3.

莫斯科旅馆1038号房间，米哈·左琴科

№02202

## 马哈诺夫关于批判左琴科致日丹诺夫的信

(1944年1月11日)

安·亚·日丹诺夫同志<sup>①</sup>

现将一群读者写的《关于有害的中篇小说》一文寄给您。文章表达了对左琴科的中篇小说的愤怒和抗议。请允许在《列宁格勒真理报》上发表该文。

A. 马哈诺夫

1944年1月11日

---

① 日丹诺夫在本文件上批示：“1. 最好是说：关于一部有害的中篇小说。2. 最好是大大压缩维护我们伟大作家的那一部分，因为并没有人指责他们缺乏爱国主义和对祖国的爱，这样可以进一步加强对左琴科的批判，应该狠狠地批判他，批得体无完肤。3. 这不应该登在《列〔宁格勒〕真理报》上，而应该登在《真理报》上。日〔丹诺夫〕。”

№02203

## 谢尔巴科夫关于多夫任科问题 给谢尔比纳的指示

(1944年2月8日)

《新世界》杂志编辑部任书记谢尔比纳同志<sup>①</sup>

联共(布)中央提醒您注意,乌克兰作家和电影导演 A. II. 多夫任科近来写的一些作品(《胜利》、《战火中的乌克兰》)中,存在着反列宁主义性质的严重政治错误。

因此,中央责成您,非经联共(布)中央宣传部特殊批准不得发表多夫任科的作品。

联共(布)中央书记 阿·谢尔巴科夫

1944年2月8日<sup>②</sup>

① 谢尔比纳,弗拉基米尔·罗季奥诺维奇(1908~1989),文艺学家,评论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76年)。

② 本文件同时分别发给全苏主要报纸、文学杂志、出版社主编,苏联人民委员会电影事业委员会主席和书刊总局局长,乌共(布)中央和乌共(布)各州委。

№ 02204

## 乌共（布）中央政治局 关于撤消多夫任科职务的决定

（1944年2月12日）

绝密

### 关于 A. П. 多夫任科

乌克兰作家和电影导演 A. П. 多夫任科最近写的作品（《胜利》和《战火中的乌克兰》）存在着反列宁主义性质的严重政治错误。有鉴于此，乌共（布）中央决定：

1. 建议全斯拉夫委员会任命 M. Ф. 雷利斯基同志取代多夫任科代表乌克兰共和国进入该委员会。

2. 建议苏联人民委员会斯大林奖金委员会任命 Г. П. 尤拉<sup>①</sup>同志取代多夫任科进入该委员会。

3. 撤消 A. П. 多夫任科的《乌克兰》杂志编辑职务。任命乌克兰作家安德列·马雷什科为该杂志编辑委员会成员，以取代多夫任科。

① 尤拉，格纳特·彼得罗维奇（1887/1888—1966），演员，乌克兰弗拉基科剧院总导演。

4. 解除 A. П. 多夫任科的基辅电影制片厂艺术指导职务。

请求联共（布）中央批准本决定。<sup>①</sup>

乌共（布）中央书记 尼·赫鲁晓夫

---

① 本文件附有一个便条：“归档。送交亚历山德罗夫。（签名）2月22日。  
所有问题都已解决。Г. 亚历山德罗夫，3月8日。”

№02205

**萨德奇科夫签发的  
关于禁止发表多夫任科作品的通告**

(1944年2月23日)

通 告

1944年2月[23日]

莫斯科市

各书刊审查机关

凡事先未经我特殊批准，不得在非军事的和军事的报刊上发表乌克兰作家 A. П. 多夫任科的作品。

苏联人民委员会、负责报刊保守军事机密的全权代表、  
书刊总局局长 H. 萨德奇科夫

№02206

## 波利卡尔波夫关于作协理事会 全体会议情况致马林科夫的报告

(1944年2月23日)

机密

联共(布)中央书记

格·马·马林科夫同志<sup>①</sup>

现在向您汇报1944年2月5-9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全体会议的情况。全体会议批准了理事会主席和书记的任命并且讨论了吉洪诺夫同志题为《在卫国战争日子里的苏联文学》的报告。有关组织问题的建议受到作家们的欢迎。讨论报告非常积极和认真。有54名作家在讨论中发了言,其中有费定、索博列夫、沙吉尼扬、卡拉瓦耶娃、爱伦堡、马尔夏克、巴赫梅吉耶夫、苏尔科夫、雷利斯基、普罗科菲耶夫、戈尔巴托夫等。

全体会议的某些参加者就报告进行发言时,尖锐地提出了作家在卫国战争的条件下提高自己对人民的工作责任感问题。譬如A.苏尔科夫尖锐地批评了有些人在战争中无所事事,不帮助人民。

<sup>①</sup> 本文件第1页有3个批示:

“送交赫鲁晓夫同志本人。请了解并且注意作家雷利斯基、巴让、潘奇同志在全体会议上的行为。2月24日。马林科夫”;

“送交安德列耶夫同志本人。请了解情况。马林科夫”;

“归档。抄件送尼·谢·赫鲁晓夫和安·安·安德列耶夫同志。(签名)。1944年2月25日。”

Б. 戈尔巴托夫异常尖锐地批评了苏联作家协会的工作，他宣称，协会像现在这种样子已不再是创作团体，协会主席团变成了分配食品供应卡和购买工业品票券的机关。各加盟共和国的作家们对协会和出版部门表示强烈不满，因为协会不了解各加盟共和国的作家们在做些什么，不领导各加盟共和国的协会；各出版社不用俄文出版兄弟民族的文学作品。特别指出了国家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这个出版社接受了亚美尼亚、哈萨克、吉尔吉斯作家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多年来一直放在那里，每年都列入出版计划，可是却不出版。提到了下述情况：出版社本来有纸张，却毫无理由地停止了《各民族友谊》文集的出版，这个文集在为俄罗斯读者介绍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文学方面曾经起过重要作用。还指出，某些加盟共和国（乌兹别克）在战争期间关闭了文学杂志。这样一来，这些共和国的作家们便没有可能用其母语发表自己的作品。

关于全体会议工作的缺点和某些不健康的情绪。

吉洪诺夫同志的报告详尽地评述了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文学，但报告的重要缺点是报告人没有特别突出地引导全体会议参加者注意文学中那些政治上有害的现象。

如果说左琴科卑鄙下流的中篇小说是批判的对象，那末阿谢耶夫和谢尔文斯基诽谤性的诗却没有受到尖锐的政治批判。这一点在相当程度上也解释了如下现象：在全体会议上发言的作家们几乎没有涉及左琴科、阿谢耶夫、谢尔文斯基、多夫任科对苏联现实的诽谤性攻击。

更有甚者，谢芙琳娜在发言中企图为左琴科辩护，她援引我国现在的言论自由，认为作家似乎有权在苏联报刊上发表类似左琴科荒唐的中篇小说那样卑鄙的胡言乱语。这些有害作品的作者本人保持沉默。阿谢耶夫作为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成员，只出席了两次全体会议，而 А. 多夫任科只参加了一次全体会议。

一些乌克兰作家在全体会议上所持的立场引起人们的注意。乌克兰苏联作家协会责任书记马克西姆·雷利斯基知道 A. 多夫任科在其战时中篇小说中所犯的错误及其在电影剧本《战火中的乌克兰》中对我们党的政策的攻击，然而他在发言中却断言：“亚历山大·多夫任科那些热情洋溢的短篇小说在我们的文学中是一种新的现象”，而对多夫任科的错误则只字未提。出席全体会议的作家们，其中包括乌克兰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H. П. 巴让，都没有纠正雷利斯基的发言，并且对多夫任科的政治错误闭口不谈。乌克兰作家 П. 潘奇在全会上的发言是不正确的，跟多夫任科的错误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虽然报告相当尖锐地提出了文学批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全体会议上却没有得到必要的阐述。批评家们的发言或是无的放矢和混乱不堪，例如叶尔米洛夫在发言中提出关于“弹性美学标准”的论点；或是蛊惑人心的，如德尔曼<sup>①</sup>的发言。德尔曼在发言中企图让全体会议相信，我们没有战斗的苏联文学批评，似乎是因为报刊不发表文学批评著作。就是这个德尔曼抱怨说，批评家们没有可能批评获得人民奖励的和被授予斯大林奖金的作品。德尔曼及其类似者看来是想要得到无限的可能来诋毁和谩骂优秀作品。

作家博罗金的发言是错误的，对于各加盟共和国的作家来说是带有侮辱性的。他以激烈的形式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各兄弟共和国的文学家们横加指责，说什么俄罗斯读者所看到的翻译后的这些文学家的作品，是翻译家给重新加工过的。如果鼓励这些作品，博罗金宣称，那末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鼓励翻译家，而不是鼓励作者，虽然作者的名字印在书上，但作品的真正作者似乎是译者。

C. 基尔萨诺夫在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以独特的方式提出关于

<sup>①</sup> A. Б. 德尔曼 (1880~1952)，文艺学家。

前线报刊使用作家的的问题。基尔萨诺夫反映了许多在前线报刊工作的作家的情绪，认为对作家使用不当，强迫他们在军队报纸工作，而这样似乎是把作家变成了通常的报纸记者，使他们没有可能从事文学创作。

应该指出，希望离开前线报刊的工作，这在许多前线作家中间很流行。他们向作协主席团提出申请，要求作协向红军总政治部为作家们请创作假。

Л. 波利卡尔波夫<sup>①</sup>

1944年2月23日

---

<sup>①</sup> Л. А. 波利卡尔波夫 (1905 - 1965)，1944 - 1946 年期间担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會书记。

No 02207

## 关于电影故事 《战火中的乌克兰》的批判发言

(不晚于1944年2月26日)

多夫任科同志写了一篇名叫《战火中的乌克兰》的电影故事。这篇电影故事，说得和缓一些，修正了列宁主义，修正了我们党在一些基本的、根本的问题上的政策。多夫任科的电影故事包含有反列宁主义性质的严重政治错误，——这就是对党的政策公开露骨的攻击。任何一个人只要把多夫任科的中篇小说读上一遍，就会确信的确是这样。多夫任科为自己的电影故事写了一篇不长的，但非常说明问题的前言。前言里有这样一些话：“如果说由于我强烈的感受、怀疑或心灵的迷误而使我的某些议论不合时宜，或者过于痛苦，或者与别人的论点不够协调，那末可能正是这样。”

不难看出这篇前言的写作目的何在。看得出来，多夫任科清楚地懂得，他的电影故事里从政治观点来说远非尽如人意。显而易见，如果他的修正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作品一旦被揭露，他企图用这个不说明任何问题的附言来保护自己。

首先，特别奇怪的是多夫任科的电影故事本来应该表现列宁主义的全面胜利，红军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如今已经成功地从德国侵略者手中解放了乌克兰，可是故事里却对我们的伟大导师列宁只字未提。

这不是偶然的。

这并非偶然是因为，多夫任科在修正和批评我们党在粉碎苏联

人民的阶级敌人方面的政策和工作。众所周知，这项工作是以列宁主义精神进行的，是与列宁的不朽学说完全一致的。

多夫任科的电影故事中的主人公扎波罗热茨曾经给德国人当过村长，他对准备审判他的游击队员们说：

“我们像是酒鬼习惯喝家酿酒一样，习惯了阶级斗争。咳，阶级斗争把我们引向毁灭！打死我吧，我请求你们。打死我吧，啊！你们让克劳兹上校高兴吧。请你们保持路线的纯洁吧！”

“我们尽力相互耍花招，用铁笞帚，用烧红的铁，我们相互间一个把另一个连根拔掉，让敌人看笑话。只要路线纯洁，哪怕大地荒芜！看，我们超额地完成相互残杀的任务，就会让德国人开心！”

“打他，这个坏蛋！”

“闭嘴，傻瓜！……我今天不知道阶级斗争，而且也不想知道。我知道祖国！人民在毁灭！我是德国工人和农民的奴隶！”扎波罗热茨突然威严地喊道。“我的女儿也是奴隶！开枪吧，阶级上纯而又纯的人！喂，你怎么啦？”

所以说，多夫任科在这里反对阶级斗争，他企图把政治、把党消灭富农阶级的实践活动庸俗化。多夫任科竟然嘲笑对于每个共产党员来说、对于真正的苏维埃人来说如此神圣的概念——反对剥削者的阶级斗争和党的阵线的纯洁。

多夫任科认识不到那个对于所有的苏维埃人来说平凡的和显而易见的真理：不消灭我们国家的剥削阶级，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国家就不会如此强大、富有战斗力和团结一致，他们在目前这场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艰苦战争中正是这样的。多夫任科不明白，目前的卫国战争也是一场阶级战争，因为德国帝国主义分子在世界一切帝国主义分子中间是最野蛮的和最贪婪的，他们进攻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其目的就是征服、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奴役和消灭我们的人民。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而不是别的什么情况，才使得

已被粉碎的、与工人和农民为敌的剥削阶级的残余在战争进程中同我们凶恶的敌人——德国侵略者——站到一个阵营里去了。彼得留拉分子以及其他一些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站在德国侵略者一边反对乌克兰人民以及整个苏联人民，任何一个人人都清楚这些事实，而多夫任科也应该清楚。这些祖国的卑鄙叛徒、苏联人民的出卖者紧紧跟随着希特勒分子，屠杀我们的儿童、妇女和老人，洗劫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他们完全站到德寇方面，成了乌克兰人民的刽子手，为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红军而拼命挣扎。假如多夫任科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写一部真实的作品，他就应该在自己的电影故事里痛斥这些叛徒。可是多夫任科显然是跟真理背道而驰。否则如何理解多夫任科在自己的电影故事里没有揭露乌克兰人民的这些卑鄙的叛徒呢？

他们在多夫任科的电影故事里并不存在，仿佛是他们根本就不存在似的。多夫任科没有勇气，而且也没有能力来把他们钉在耻辱柱上。

多夫任科竟然胆敢批评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政府旨在使苏联人民、红军和我们国家为目前这场战争做好准备而实行的政策和采取的实践措施。

在多夫任科的电影故事里，集体农庄庄员库普里扬·胡托尔诺伊对自己当了逃兵的儿子们说：

“我保卫过沙皇，没有逃跑！你向谁宣誓效忠了？”他朝着帕夫洛转过身来。

“如今没有上帝了！”一个逃兵喊道。

“胡扯，有！是祖国！”

“没有这么说过。教我们的是阶级。再说大家全都跑了，”帕夫洛申辩说。

“我不准！我曾保卫过沙皇，没有退却，而你们连自己的政权

都不能保卫。”

“装甲太薄，爸爸！”

“装甲太薄”——这句话在多夫任科的电影故事里重复了数次。它——这句话——是多夫任科杜撰的，目的是要说明：“苏维埃国家对战争没有准备，苏联人民手无寸铁。”

多夫任科不明白这样一个平凡的和显而易见的真理：德国帝国主义分子的目的是占领别国的土地和奴役别国的人民，他们在战前很早就使自己的经济、国家和军队全面地为侵略战争做好了充分准备，在战争开始之前的数年时间里就把自己的整个工业转到战争的轨道上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准备占领别国的土地、征服别国的人民，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准备发动侵略战争。必须学会看到这种区别，只要对待事业忠心耿耿，就不难看到这种区别。

然而，苏维埃国家在希特勒德国背信弃义的突然进攻面前根本不是被解除了武装。这是因为我们在这方面也遵循列宁的遗训，他曾告戒我们党和我们人民，帝国主义国家或早或迟必定要进攻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们应该为保卫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认真做好战争准备。我们为这种自卫战争做了准备。不言而喻，准备这场自卫战争时，我们不可能像希特勒德国准备这场战争那样进行准备，而且不可能达到希特勒德国的那种准备程度，因为希特勒德国建设自己的军队和工业是打算侵略所有的欧洲国家，而且不只是欧洲国家。我们党，苏联政府在发展我国的武装力量和国民经济时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使苏维埃国家和苏维埃人做好准备，在战争的第一个阶段单独地扼制德国帝国主义战争机器的打击力量，阻止敌人数百万装备精良的侵略军的进攻，然后动员人民的力量并且按照战争的需要改造经济，成功地打击占领者并且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土。

卫国战争已经进行两年半多的时间，它的经验说明，在所有不以侵略为目的的人民中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最充分地准备了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战争，甚至超过了英国和美国。假如多夫任科以写一部真实的作品为自己的目标，他就应该在自己的电影故事里谈到这一点。可是多夫任科竟然与真理背道而驰。列宁早就告诫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应该做好准备，以便对付帝国主义国家联盟对它的进攻。列宁是党的领袖和导师，是我们人民智慧的化身，他最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国家间的关系，让我们党做好准备……迎接最坏的……

由于已经形成的历史情况，当然，首先是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政策，我们有可能及时地粉碎初具轮廓的旨在反对苏联的帝国主义国家军事联盟，使日本、土耳其、保加利亚在目前的战争中保持中立，而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不是站到与我们相敌对的阵营（这是可能发生的），而是现在与我们一起结成军事同盟反对德国帝国主义。众所周知，德国帝国主义是最具有掠夺性的、阴险狡猾的、恐怖主义的、最坏的一种帝国主义。英国和美国的资本家们在德国帝国主义的强盗掠夺性质中看到了对自己国家明显的巨大危险。我们党充分而正确地考虑到这一点，通过自己的对外政策保障了强大的反希特勒国家联盟的建立。英国和美国与我们站在一个阵营里反对德国人。就这样，我们党的列宁主义政策在这方面也取得了胜利。

假如多夫任科想要写出真理，那么他就应该写到这一点。然而，很遗憾，真理不是多夫任科创作的特点。因此他宁愿掩盖这种真理，更有甚者，他宁愿批评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政策。

多夫任科在自己的电影故事中批评党在集体农庄建设领域的政策。他把事情描写成似乎是集体农庄制度扼杀了人们身上的人格尊严和民族自豪感，削弱了苏联人民的力量和顽强精神。在多夫任科

的电影故事里，女集体农庄庄员赫里斯佳成了一个意大利军官的姘妇，她在游击队法庭面前说：

“我知道我不能活着离开这里。”她把手按在心上，“这里在说，我的死期到了，我干了禁止干的不合法的坏事，我没有你们所说的民族自豪感、荣誉感和尊严感。在我死之前请你们告诉我，我为什么没有这些？人们啊，它在哪里呀？我们的家族是正派的。我为什么没有出息成为一个有自尊心的女人，而成了一个不体面的卑劣下流的女人？为什么战争以前你们在我们区里主要是用劳动日和粮食收成量来衡量我们姑娘的品德？我是民族主义者？是什么样的？”

多夫任科在这里否定了那个平凡的和显而易见的真理，这就是集体农庄制度从经济上和道德—政治上巩固了苏维埃国家，没有集体农庄，我们就不能成功地进行战争。请设想一下，假如我们的农村还保留着富农，没有集体农庄，那会怎样。每个人都明白，粮食和工业用的农业原料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富农手里。富农投机取巧，在食品和原料上向我们漫天要价，让我们的军队和工人得不到粮食和给养。富农竭力用饥饿来窒息人民，从背后打击苏维埃政权。如果说这一切都没有发生，那只是因为我们消灭了作为阶级的富农并且成功地建立了集体农庄。而多夫任科显然是对富农怀着强烈的同情心。多夫任科不明白而且也不愿意明白，只有集体农庄才真正解放了苏联妇女。苏联妇女只是由于集体农庄才感到自己是真正的主人，是社会主义国家自由的、享有一切权利的公民。遭到多夫任科嘲弄的劳动日，却使妇女成了真正的人。由于劳动日，女集体农庄庄员在经济上才不再依附于家庭和丈夫。女集体农庄庄员挣到很多的劳动日，才成了经济上独立的人。这也就是真正的妇女解放，而不是资产阶级政治家过去和现在都非常热衷的关于妇女解放的空谈。

再者，我们党在人民中间为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发展他们的

文化进行了巨大的教育工作，这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显而易见的，可是民族主义的裹尸布完全遮盖住了多夫任科的思想，他看不到这项工作。只有从反列宁主义的立场上先入为主地观察我们党和我们国家创造性的、进步的工作的人，才会看不到苏联人民的团结、政治积极性、思想意识和文化素质的巨大成长，这种成长只有在我们普遍的成就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多夫任科写道：

“萎靡不振的天性使他们习惯于典型的不负责任，体验不到禁止和号召的严肃性，也达不到理解历史进程的高度，而历史则号召他们进行大规模的战斗，完成非凡的使命。他们没有任何先例——无论是他们历史上的光荣祖先，伟大战士……因为村里的人不缅怀他们。他们在命运的第一批打击中忘掉了自己效忠的誓言，因为‘神圣的’这个字眼儿对于他们几乎不说明任何问题。他们在思想上被解除了武装，是天真的和目光短浅的。”

多夫任科用敌人——一个德国军官——的话这样评价苏联人民：

“这个人民有阿喀琉斯之踵，从来都不用任何东西遮盖起来。这些人绝对丧失了相互原谅的能力，甚至为了共同的崇高利益都不能取得意见的一致。他们没有国家的本能……你知道，他们不研究历史。真奇怪。他们靠着否定上帝、私有财产、家庭、友谊等否定的口号生活已经25年了！在他们那里，‘民族’一词只剩下了形容词。他们没有永恒的真理。因此在他们中间有许多叛徒……这就是打开小箱子的钥匙，小箱子里面藏着他们的毁灭。我们没有必要把他们全部消灭。你知道，如果我和你都很聪明，他们就会相互消灭。”

在这之后，多夫任科在自己的电影故事中没少费力气来证明和肯定这种评价的正确性。

多夫任科何以滑到对苏联人民进行如此骇人听闻的诽谤的地步呢？

多夫任科批评我们党和政府在教育人民方面所进行的工作时，为了达到诋毁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政策的目的，并没有停留在对乌克兰历史的歪曲上。

在多夫任科的电影故事中，被德国人戴上枷锁的乌克兰农民相互交谈：

“听说，从前在历史上也曾不只一次地给我们弟兄戴上。”

“是谁给戴的？”

“鲍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噢，这可是个大坏蛋！战争以前，在切尔尼戈夫博物馆里挂着他的战刀。那里用大字写着一段解说词：‘屠杀乌克兰人民的著名刽子手鲍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战刀，他鲍格丹在一千六百多少多少年镇压了人民革命。’战刀放在玻璃底下，而他的12幅画像锁在地下室里。不让任何人看。据说那些画像会使人陷入浓雾之中！噢！”

电影故事的主人公扎波罗热茨说：

“我们是糟糕的历史学家吗？不善于相互原谅吗？在我们那些阶级斗争的书里不闪耀着民族自豪感吗？”

不用说，这一切都是对真理肆无忌惮的嘲弄。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显而易见，正是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神圣地保存着乌克兰人民以及苏联各族人民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民族意识。

多夫任科也诋毁我们党的和苏维埃的积极分子和红军的指挥干部，把他们描写成追求名利、损人利己和脱离人民的愚钝的人。

多夫任科关于我们的干部写道：

“他们中间也有许多毫无用处的人，不能理解人民的悲剧。通常的人际关系不发达，形式主义枯燥乏味，对人采取衙门式的漠不

关心态度，或者只不过是缺乏人的想象能力，愚钝的利己主义，使他们对躺在国家胶轮车上的伤员视而不见，不闻不问。

“同志们，可怜可怜吧！……”伤员们请求道。“站住，我要开枪啦！”受伤的罗曼·扎波罗热茨喊道。

“站住！”

“咳，这是怎么回事？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这样让人厌恶？”一个被打断了腿的年轻伤员哭泣了。“指挥员同志，这算是什么节目？是世界上最高级的。瞧瞧吧，我们都是些什么人！把伤员给运走，日你娘的，让他们去吧！”他哭了起来。

汽车飞驰而去，如秋天的落叶。”

关于红军的指挥干部：

““我们的将军失踪了，爸爸！开枪自杀了，他妈的，潮湿的大地不接受！我们都慌神了。”

“去找上校吧！”

“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让他见鬼去吧！”

“追上去吧。”

“桥都给炸了，爸爸。我们不会游泳。””

关于苏维埃工作人员：

“他酷爱各种秘密文件、秘密案卷、秘密指示、决定、决议。这在市民的眼里抬高了他的身价，长期以来给他造成一种特殊的威望。他用这些东西给自己那种外省人的愚蠢和对人完全的漠不关心保住了秘密。他失去了想象力，就跟每一个迷迷糊糊萎靡不振的人一样。他习惯了自己的岗位。他一次也没有想到过，说实在的，他惟一保守住了秘密的东西，就是他自己的愚蠢。”

“他没有对人的爱。他爱他自己和指示。”多夫任科说，被德国人占领的苏联土地获得解放以后，我们“将不会有教师、技师、农艺师。都让战争给挤掉了。一些人只是追随者，审判员会留下来。

像熊一样健壮的，受到锻炼的会回来！”

多夫任科没有看见而且也不愿意看见那个显而易见的和平凡的真理。这就是我们党的、苏维埃的和军事的干部与人民血肉相关，他们站在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战士的最前列，在红军的队伍里和游击队的队伍里奋不顾身地英勇地斗争着。多夫任科在这里也与真理背道而驰。真理在于苏联人民信任我们的军官和将军们、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并且热爱他们，因为他们都是优秀的人物。况且，这就是我们苏维埃制度的力量和牢不可破的源泉之一。

多夫任科在自己的电影故事中反对苏联政府的军事政策，诋毁我们的干部，批评苏维埃制度的基础和集体农庄，他也就是在批评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多夫任科写道：“教育所有的人让他们温顺驯服……人人都胆小怕事。别顶撞，别反驳！只有一种手段——相互间写告密信，他妈的，胆战心惊！你不知怎么办才好……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化。你瞧，流动起来了。审判员在前面。”

多夫任科能够说出这种东西来，是从哪里获得了勇气或者是放肆？也许是二者兼而有之。

谈到列宁主义，谈到我们党的理论时，为了表示尊敬，多夫任科本来应该脱帽，可是他作为富农的应声虫和公开的民族主义分子，竟然胆敢攻击我们的世界观并修正它。

多夫任科在自己的电影故事中诋毁乌克兰人民。事实上，很久以前就众所周知，况且整个俄罗斯的和乌克兰的文学都谈到这一点，说乌克兰少女的性格如何纯洁、富有诗意和高尚。

可是多夫任科是怎样描写乌克兰少女的呢？

乌克兰少女奥列霞在路上遇见一个素不相识的坦克兵，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说，’奥列霞说，‘你跟我一起过夜吧。天已经快黑了……’

要是可以，你听见了吗？’

她放下水桶，走到他面前。‘我是个黄花闺女。我知道，明天或后天，德国人来了，会糟蹋我，污辱我。我非常害怕。我请求你……哪怕你……跟我睡一夜……’”

多夫任科在乌克兰什么地方见到过这样的少女？非常清楚，这是对乌克兰人民、对乌克兰妇女的无耻诽谤。

多夫任科在电影故事里公然表现出来的露骨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于苏维埃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和不能接受的。

多夫任科这样写道：

“‘请你们记住，不管我们今天在哪条战线上作战，不管斯大林把我们派往何方，——北方、南方、西方，派往世界的四方，——我们都是为乌克兰而战斗！你看，它就在我们面前，在大火中冒烟，我们亲爱土地受尽折磨！’

‘我们是在为世上的无价之宝——乌克兰而战斗！为乌克兰！’战士们轻声叹息道。

‘为了乌克兰！——为了正直的乌克兰人民！为了4000万的人民，这是在欧洲数百年的历史上一没有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找到人的生活的人们。为了这个受尽折磨的，被瓜分的人民！’克拉夫奇纳沉默片刻，仿佛是没有继续说下去，而是有声地思索着：

‘告诉我，我们是乌克兰人民的儿子，能够不因为这数百年而憎恨欧洲吗？’”

很清楚，诸如此类的观点是多么站不住脚和多么不正确。假如多夫任科想要讲真理，那么他就应该说：不管苏联政府把你们派往何方，——北方、南方、西方、东方——你们都要记住，你们是在与苏联各个兄弟民族的人民一起在战斗，和他们齐心协力地保卫我们的苏联，我们大家共同的祖国，因为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也意味着保卫苏维埃的乌克兰。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只

有在苏联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完好无损，才能巩固并且繁荣起来。

多夫任科与真理背道而驰，因此他把一切都颠倒了。然而，多夫任科的看法不是惟一的，多夫任科所不理解的，乌克兰的劳动人民却清清楚楚地懂得。乌克兰人在我们巨大战线的各个战场上英勇地与敌人斗争着。他们与敌人斗争得很出色，他们懂得，为苏联而斗争就意味着为他们亲爱的乌克兰而斗争。他们懂得多夫任科所不理解的，这就是苏联各族人民都在为乌克兰而斗争。在这场斗争的进程中，乌克兰的一些地区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曾被敌人占领，如今已经获得解放。这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和白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哈萨克人和摩尔达维亚人，土库曼人和乌兹别克人——苏联各族人民的战斗团结。

如果根据多夫任科的电影故事来判断战争，那么参加卫国战争的便不是苏联各族人民的代表，而只有乌克兰人。这就是说，多夫任科在这里又与真理背道而驰了。他的电影故事是反苏维埃的，是民族主义、狭隘的民族局限性的鲜明表现。

多夫任科的电影故事是狭隘的目光短浅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的讲坛，这种民族主义是与列宁主义相敌对的，是与我们党的政策以及乌克兰和全体苏联人民的利益相敌对的。

多夫任科企图从自己的民族主义立场来批评和教训我们党。多夫任科的这种追求来自何处呢？他反对我们党的政策，反对列宁主义，反对全体苏联人民的利益，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我们不同意他，乌克兰人民也不同意他。只消把多夫任科的电影故事刊印出来，让人民读读，所有的苏维埃人都会跟他绝交，狠狠地收拾他一顿，把他批判得体无完肤。这是因为多夫任科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宗旨是削弱我们的力量，解除苏维埃人的武装，而多夫任科公然

批评的列宁主义，亦即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其宗旨是进一步巩固我们在与敌人斗争中的立场，战胜苏联各族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德国帝国主义分子。<sup>①</sup>

---

① 此发言稿作者不详。本文最初由 A. 拉吉舍夫发表在《电影艺术》1990 年第 4 期上，标题是《约·斯大林 1944 年 1 月 30 日在政治局的讲话》。但俄国历史学家巴比钦科在查阅了有关档案后认为，缺乏直接的材料证明这是斯大林的讲话。多夫任科后来在日记中写道：“1944 年 1 月 31 日，我被拉到克里姆林宫。我在那里被砍成碎块。”根据赫鲁晓夫回忆录的说法，斯大林在有多夫任科在场的情况下把他“彻底击溃了”，但这是在谢尔巴科夫“起诉性的讲话”之后。此外，谢尔巴科夫后来在 1944 年 2 月 26 日的联共（布）莫斯科市委全体会议上讲话时使用了这个文稿，但作了重大改动。而如果这篇文稿确是斯大林所作的话，谢尔巴科夫未必会作这样的改动。

No 02208

## 洛佐夫斯基关于《围困》 一书出版问题致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4年3月7日)

亲爱的安德列·亚历山德罗维奇<sup>①</sup>

我想提请您注意下面一个奇怪的事实。列宁格勒女作家B.凯特林斯卡娅一年半以前完成了关于列宁格勒的书的第一部。这本题为《围困》的书送交各主管部门。可是已经一年多时间过去了，这本书仍然在各杂志、国家文学出版社、党的机关传来传去，无论如何也不能送到印刷厂，更不用说送到读者手中了。况且，这本书表现的是列宁格勒人真正的、而不是徒有其表的英雄主义。我知道，出版社和杂志社有这样一些编辑，他们审阅文学作品时，想的主要是别出什么事。如果他表示反对，那么书就不能问世，自然也就不会出什么事；如果他表示赞成，书问世以后，要是突然在书里找到一句不正确的话呢！我认为《围困》一书遭受的磨难只能用害怕承担责任来解释。现在围困已经解除，苏联的和外国的读者会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这样的书。因为书被卡住了，所以作者没有写作续篇。难道列宁格勒人不关心写一本真实的关于列宁格勒的书吗？为什么要把这本书长期搁置起来？莫非是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关于列宁格勒的书，因此可以轻视这部用心血写成的著作吗？关于列宁格勒的书需求之大，可以用下面这个事例来证明。苏联情报局寄往

<sup>①</sup> 本文件第1页上有日丹诺夫的批示：“送马哈诺夫。处理此事。日〔丹诺夫〕。”

英国一本关于列宁格勒的报纸文章汇编，这本汇编就出版了。美国和英国都向我们索要关于列宁格勒的材料。我刚刚和两个列宁格勒人谈妥，让他们编一本关于列宁格勒的文章选集。目前可能而且应该、甚至是必须在国外出版10~15部描写列宁格勒英勇斗争的书。列宁格勒为自己，也为整个苏维埃国家增了光。

我请求您干预此事，扫除障碍，让列宁格勒作家有可能出版关于列宁格勒的好书。

A. 洛佐夫斯基

莫斯科，1944年3月7日

No 02209

## 楚科夫斯基关于童话《战胜巴尔玛列伊》 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1944年3月14日)

致编辑部

3月1日《真理报》刊登了И.尤金评论我的童话《战胜巴尔玛列伊》的文章，迫使我认真地审查了这篇童话，我开始清楚我所犯的文学的和政治的错误。

这个错误就在于我企图用我所习惯的、我的旧的儿童童话的形象来表现我们时代的伟大事件，没有感觉到这些形象对于这个目的来说是完全不合适的。

正如我现在怀着深深的遗憾所看到的那样，用我在20年前写的童话的那种语调来谈论具有全世界历史重要性的事件，就意味着歪曲和混淆了儿童关于现实、关于我们人民所完成的伟大功勋的概念。

我非常明确地声明：我的童话在客观上是不好的。

与此同时，我也坚决驳斥关于我“有意识地把用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儿童的伟大任务庸俗化”的任何推论。

作为一个儿童作家，我多年来的全部活动排除了这类推论的可能性。当然，我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将来的工作来挽回苏联社会舆论

界的尊敬。如果没有这种尊敬，我作为一个作家既不可能生活，也不可能工作。

K. 楚科夫斯基<sup>①</sup>

1944年3月14日

---

<sup>①</sup> 楚科夫斯基，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1882～1969），作家、文艺学家、评论家、翻译家。

№02210

## 费多谢耶夫关于长诗《俄罗斯》 致谢尔巴科夫的信

(1944年3月31日)

### 关于 A. 普罗科菲耶夫的长诗《俄罗斯》

《十月》杂志编辑部把 A. 普罗科菲耶夫的长诗《俄罗斯》作为主导性的首篇作品收入即将问世的一期杂志。这部作品具有毋庸置疑的诗歌优点。可是就其内容来说，它不符合如此重要和责任重大的主题。作者主要描绘国家的大自然。俄罗斯，如作者所描写的那样，是一个白桦树和稠李树、宽阔河流和茂密森林的国度，是一个童话、歌曲和夜莺的国度。俄罗斯人，俄罗斯的保卫者，在长诗中通过舒莫夫五兄弟体现出来，但被刻画得很无力。

在这部关于“俄罗斯”的长诗中，作者实际上回避了如今在俄罗斯存在的并且保障它取得胜利的新的社会主义的东西。结果，俄罗斯的形象是片面的，因此也是不正确的。作者明显没能提供一部与其主题意义和重要性相适应的作品。

请您允许把作者叫来，跟他商量在他的这篇长诗中更全面地反映当代生活和卫国战争的问题。

II. 费多谢耶夫

1944年3月31日

№02211

叶戈林、约夫丘克关于文学杂志《旗》的文章  
致谢尔巴科夫的报告

(1944年4月4日)

联共(布)中央书记亚·谢·谢尔巴科夫同志

《旗》1944年第1—2期合刊由编辑部送交宣传部审批，其中Ю.尤佐夫斯基<sup>①</sup>、E.乌西耶维奇<sup>②</sup>、列夫·奥泽罗夫<sup>③</sup>的文章包含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Ю.尤佐夫斯基的长文《批评日记》(第245~282页)是以这样一段声明开始的：

“是该思考一下的时候了，战争实际上带来了什么，在哪些方面使我们比战前更聪明和更精明了，以便从这个角度审视我们的观点和某些经验，我们从前对这些观点和经验的真和美曾是如此深信不疑。”(第245页)

他断言，在我们整个战前的艺术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描绘和反映的标准”(216页)。他这样指责战前的艺术：“英雄人物——大家都知道他是拥护而不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既已着手做一件事情，那就一定是某种自鸣得意的、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必然成功的预定结局。这在我们的文学中产生了粉饰现实和盲目乐观的现象。”(第250页)

① 应为约瑟夫·伊里奇·尤佐夫斯基(1902~1964)，戏剧和文艺评论家。

② 乌西耶维奇，叶列娜·费利克索夫娜(1893~1968)，文学评论家。

③ 奥泽罗夫，列夫·阿多里福维奇(1914~?)，原姓格尔德贝格，诗人，评论家。

尤佐夫斯基分析了战前剧院演出的几个剧本，以此为根据得出结论说，我们战前的艺术不是动员而是瓦解人民。他以放肆的语调写道：

“……你不信，观众处于兴奋之中，为了未来的反法西斯斗争，观众被动员起来了！不对。我们是见证者。观众没有被动员起来，而是被瓦解了。数万人从剧院里走出来，对胜利抱着盲目乐观的情绪，这就被称作对未来战争的教育。”（第252页）

尤佐夫斯基为了证明战前苏联艺术的状况如何糟糕，不惜端出人民的敌人基尔雄的《伟大的日子》进行分析（对读者隐瞒了剧名）。

评论战前莫斯科苏维埃剧院演出的H.波戈廷的剧本《银沟》时，尤佐夫斯基写道：

“戏剧为我们展示了主角：一个在意识形态方面很有修养的年轻英俊的指挥员，并且立刻就指出了他在落幕前必将达到的目的。首先，一个姑娘应该在他的追求下屈服，其次，敌人应该在他的战斗经验面前投降……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回头看看——主角已经在我们面前炫耀自己的战利品了。”

Ю.尤佐夫斯基接着渲染道：

“既然他如此轻而易举地战胜了敌人，那么姑娘还有什么可说的，她本来就是自己人！她难道是他的敌人，会进行抵抗吗！因而也就用不着名声不好的追求了，也就是说，甚至在这个对于作者来说更熟悉的领域里也就用不着斗争和争取了。于是，在两个方面他都达到了目的，只因为他是苏维埃人，而不是什么异己分子了，大可不必担心，作者绝不会让异己分子取得胜利，也不会让他得到姑娘。”（第252~253页）

分析莫斯科室内剧院在战争最初几个月演出的姆季瓦尼<sup>①</sup>的

<sup>①</sup> 姆季瓦尼，格奥尔基·达维多维奇（1905—1981），苏联格鲁吉亚作家、剧作家，主要用俄文写作。

剧本《营队向西方前进》时，Ю. 尤佐夫斯基完全丧失了分寸感：

“演出是急切需要的——因为战争开始了。剧本有一个点题性的能说明结果的名字《营队向西方前进》。我们应该说，这不免让人懊丧，但还是有教育意义的。当剧本《营队向西方前进》搬上舞台时，作者却和演员们一起向东方疏散。我们看了演出。营队为什么向西方运动，不清楚，惟一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我们的人是苏维埃人，而敌人却不是这种人，——因此前者才取得了胜利，而后者则逃跑了，只是因为这一点。”（第253页）

Ю. 尤佐夫斯基意味深长地指出，“剧本由于客观情况而从演出剧目中取消”。他指的是这类剧本得到我们报刊和舆论界“过分的赞扬”，对它们的“任何否定都回避了”。（252页）

Ю. 尤佐夫斯基激烈地批评了Ф. 潘菲洛夫的剧本《生活》，认为它似乎象征着艺术的基本缺点——粉饰现实。Ю. 尤佐夫斯基断言：

“剧本失败了，可是它在报刊中却得到成功。演出如所说的那样，得到过分的赞扬。我仔细地阅读了为数众多的剧评：为什么赞扬？请看为什么：为的是一切都正确。”（第268～269页）。“在战争的背景下，这个毛病是有目共睹的，甚至就连认为它是美德的人也看到了。”（第270页）现在，“我们在文学和戏剧中也摆出了暴露者的架势。以前就应该这样！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而不是等着发现疾病，并且板着严肃的面孔吞下自己的苦药。”（第254页）

Ю. 尤佐夫斯基专门强调：

“我应该说，这种自尊心很强的自吹自擂的观点至今还没有消除，既然英雄人物是苏维埃的，那么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就必定会取得胜利。”（第253页）

Ю. 尤佐夫斯基转到我们的政论上来，指责它的种种毛病和缺点：

“我们许多记者虽然很有才华而且具有爱国主义，可是他们的政论涉及到人的感情和理智时却非常肤浅。他们断言：‘反正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反正法西斯注定得灭亡’，可是这些话不是凭着给人以力量的那种信心说出来的，而是出自于只能削弱力量的傲慢。无论德国佬怎么挣扎，他们终究要输掉。无论我们如何疏忽大意，我们总会取得胜利……”（第 270 页）

然后，作者教训道：

“如果正视真理，就应该说：我们可能打输战争，法西斯可能打赢它。假定是这样，我们的胜利和我们的失败都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我们除了自己便没有什么人可以指望。这是现实。一个幼儿地念咒语‘历史站在我们一边，历史反对法西斯，……’，也无法躲避这个现实。即便你指望历史而不是指望自己，你也躲不到历史的背后去。”（第 270 页）

在 IO. 尤佐夫斯基看来，爱伦堡是第一个懂得这一点的人。（第 270 页）

IO. 尤佐夫斯基毫无根据地批评正面描写政治委员在军队中的作用及其对指挥员的影响的苏联文学的优秀作品，竭力贬低和指责政治委员。他认为“我们的许多作品都以富尔曼诺夫为榜样，表现完美的、当之无愧的、优秀的英雄人物，引起人们对他的好感、善意、同情和称赞，可是却不能（在读者中）引起‘我也愿意当个那样的人’的欲望”。（第 257 页）

对于在瓦西里耶夫兄弟的影片中的富尔曼诺夫，他说道：

“在他的微笑里，您不能摆脱开某种过于自信的感觉，某种书本气，他事先就预见到了‘结果’。他的党的智慧没有当着我们的面在现实生活的经验中受到考验和锻炼。这种预先的决定性在艺术上降低了富尔曼诺夫的形象。”（第 257 页）

B. 格罗斯曼因为在中篇小说《人民是不朽的》中正面描绘了

政治委员鲍加列夫和切列德尼钦科而特别受到尤佐夫斯基的指责。

尤佐夫斯基写道：

“为什么作者把鲍加列夫并不具备的优点强加给他？是出自对自己的主人公的热爱？是出自对政治委员称号的尊敬？是由于希望支持他的威信！坦率地说，难道威信——尤其是军事威信——是这样造成的吗？……鲍加列夫的优势并不是他自己挣来的，而是利用熟人关系得到的。由于他是正面英雄，是苏联英雄……熟悉的公式！后来，鲍加列夫成了惟一的一个指挥员，他指挥得很英明，很正确，很有创造性，可是已经晚了，我们不能摆脱那样一种印象——每一次都不是完成任务，而是针对情况的现成答案。不是发挥创造精神，而是机械配合。”（给《旗》第3期的文稿第41~42页）

相反，尤佐夫斯基赞扬作家E.加布里洛维奇<sup>①</sup>，因为他在中篇小说《莫斯科城下》中把政治委员图卢欣描写成一个不动脑筋的人，“他属于那种类型的人，他们在听到上级解释之前顽固地坚持错误，听到上级解释之后，却很乐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尤佐夫斯基就此指出：“对于图卢欣来说，提出的计划是正确的，因为它与上级的意见一致，这并非因为计划的确是正确的，而只是因为计划得到了上级的批准。相反，任何一项计划未经批准和彻底遭到怀疑以前都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这项计划被撤消，那也并非因为他真的认为它不正确，而只是因为它没有被批准。”（文稿第27~28页）

与此同时，Ю.尤佐夫斯基嘲笑加布里洛维奇在中篇小说里塑造的苏联军官。

“好！”他写道。“请看，这就是我们文学的英雄人物，年轻活动家的典型。他无论是在何处，是在后方还是在前线，都将用双手修筑一条通向祖国向他提出的目标的道路，不管他为此要付出多大

<sup>①</sup> 加布里洛维奇，叶夫根尼·约瑟福维奇（1899~?），作家、编剧。

代价！……他没有养成责任感，也许他已完全丧失了这种感觉——据说史册上写着‘希特勒进不去莫斯科’，——于是他也就等待着预言的应验！他指望着‘上级’，那里一切都知道，都替他想好了，都替他决定了，‘他的事无足轻重’——这是一句具有普遍意义的名言。”（文稿第24页）

谈到我们艺术的思想性时，尤佐夫斯基宣称：

“思想性——这是一种需要会使用的武器，而不是用它武装到牙齿，眼珠子乱转，用‘思想性’来恫吓我们。这是武器的叮当响声，——我们没有少听这种叮当声、这种哒哒声、这种空洞的响声。从形式上看是思想性，而从实质上说……从实质上说是规定性。不是让你阐释和揭示生活隐秘的深处的思想性，而是要你按规矩办事的僵死命题。”（第247页）

E. 乌西耶维奇的文章是评论 B. 戈尔巴托夫的《不屈的人们》一书的。E. 乌西耶维奇在这篇文章中说明共青团员帕夫利克的性格特点时写道：

“帕夫利克不是一个出于升官考虑而混进共青团的年轻人。他经历过的动摇和他所走上的那条英勇的道路证明，他是一个优秀的苏联青年。战争爆发时，他在思想上还没有充分武装起来，战前他机械地呆在共青团的队伍里——这不光是他的过错。战争也应该把这一点记在并且将要记在我们的意识里。‘战争会记下’许许多多的事，我们每一个人都将不得不纠正和重新考虑自己关于和平的想法中的许多东西。需要更深刻、更勇敢、更诚实地对待思想性。读者从戈尔巴托夫的书中能做出这样的结论，也正是这一点使这部书成了我们文学中的一个事件。”（第292页）

关于暂时留在敌人占据的领土上的苏联人的情绪，E. 乌西耶维奇说：

“留下来的人不得不独自经受这最初的可怕时刻，悲剧性的困

惑不解的时刻：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希望和爱——没能坚守住，没能保卫住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劳动、我们经过多年艰苦努力建设起来的整个生活。千百万普通的苏联人经受了这种难以表达的痛苦的悲剧性的困惑，因此描写他们的英雄主义、他们的斗争时，不能掩饰这一点，不能对此闭口不谈。对此闭口不谈——这意味着缩小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留下来的人不得不自己孤立无助地经受这种困惑，没有人做指示，没有人给解释。他们不得不自己来确定对待侵略者的态度，考虑自己在侵略者统治下的生活。”（第286～287页）

接下去，乌西耶维奇发挥这些想法，声称：

“撤退的不是与他无关的人，不是在他上面、为他负责的人。不，是自己人，是他的儿子，是他的孩子们，是他应该为之负责的人。在这个时刻，他孤单地一个人，感到最可怕的孤独，可是他知道，对这个阶段的生活将要有个交代——在自己的人面前，在自己的孩子们面前，在自己的政权面前（这政权是他塔拉斯过去争取来的，这政权是依靠他的），在所有那些人面前（他曾终生对这些人负责，他也曾要求并且将要求这些人负责）。（黑体字是E. 乌西耶维奇的文章中原有的）。

塔拉斯感到自己是故土上现存的一切的主人，感到他，技工塔拉斯，要对一切负责，可是也应该有人对他负责……这也就是……塔拉斯的爱国主义中的基本特点。”（第287页）

与此同时，乌西耶维奇还毫无根据地给所有留在敌占区、但由于这些或那些原因而没有在敌人后方积极进行斗争的苏维埃人抹黑：

“为了能在法西斯长期统治下保住肉体的生存而不与法西斯作斗争，必须在道德上死亡，或是必须变成积极的刽子手，变成拿自己弟兄们的鲜血做交易的出卖者，每天用成千上万自己从前的亲

戚、朋友、邻居、同事——过去的全部生活都是与他们一起度过并且与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一——的生命来换取自己的卑鄙生命；或是变成没有心肝的、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机器，变成不仅不知道追求和渴望自由、而且忘记了个人的生活、个人的依恋、忘记了家庭、对女人的爱、对孩子的爱以及忘记了关心他们的奴隶。”（第 284 页）

E. 乌西耶维奇抨击一些政论家的观点，他们说：

“俄罗斯人民……一向以勇敢、豁达、蔑视死亡、坚忍不拔著称。这些特点是他自古以来就具有的，始终与他自身的价值相等的。这些特点使他有可能在这场战争中摧毁整个欧洲都没能对付得了的敌人。这种解释，说实在的，很少能说明什么，甚至也许会使问题更加模糊不清，但遗憾的是某些苏联作家和政论家却满足于它。”（第 285 页）（乌西耶维奇没有说是什么样的政论家允许以这种反历史的态度评价俄罗斯人民）。

最后，列夫·奥泽罗夫在《论战争年代的乌克兰诗歌》这篇混乱不清的文章中这样说明日前乌克兰文学面临的任务：

“我们回到乌克兰问题上来。诗歌接触到经受过希特勒奴役的人民，接触到它曾如此思念的人民，接触到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关系。这给乌克兰诗歌提出了新的、更加复杂的任务。在希特勒统治乌克兰的年代，人民经受了太多的苦难，以至用新闻报道的态度对待现实未必能解释它。如果乌克兰少女玛丽娅开始把自己叫做玛尔塔，而一个肮脏的小伙子在回答‘你几岁了？’时说：‘费尔’，那么在那些‘日常的’事实的后面隐藏的复杂的内心斗争、痛苦、悲剧，是伟大的艺术家有能力为我们表现出来的。

如果一个艺术家为这个乌克兰少女展现出，这些年里在世界上和人心里发生了什么……，那末她，乌克兰少女玛丽娅，就会开始思考自己的命运。她将想要成为一个无愧于乌克兰诗歌所塑造的祖国母亲的形象的人。”（第 299~300 页）

列夫·奥泽罗夫对乌克兰苏维埃文学任务的理解是与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乌克兰土地从德国侵略者手中获得解放与恢复苏维埃乌克兰国民经济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中确定的乌克兰苏维埃文学的任务完全矛盾的。

综上所述，《旗》第1-2期合刊中一系列得到编辑部赞许的文章在有关党的政策的根本问题上宣扬不正确的观点。

我们认为，《旗》的责任书记米哈伊洛娃同志决定刊用这些文章，犯了政治性错误。Ю. 尤佐夫斯基和 E. 乌西耶维奇的文章，在我们看来，应该从准备付印的这一期杂志中撤掉；对于 Л. 奥泽罗夫的文章，我们建议做必要的修改。

A. 叶戈林

M. 约夫丘克<sup>①</sup>

---

<sup>①</sup> 约夫丘克、米哈伊尔·特里丰诺维奇（1908--1990），哲学家。1944--1946年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No 02212

## 帕斯捷尔纳克关于本人处境 致谢尔巴科夫的信

(1944年5月5日)

亲爱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sup>①</sup>

请原谅，我又一次给您写信。我很困难，很困难。举个例子：季娜的长子由于患骨结核被截掉一条腿，现在正在结核病研究所里死去。我的家庭被克里姆林「宫」医院注销医疗权利已达一年，我无论如何竭尽全力，也还是不能从布萨洛夫那里重新弄到这种权利。这样的事情还有许多，这只是沧海一粟。但我并不是为此才给您写信的。

请您读读附上的诗。我不能想象它不能向您说明任何情况。《真理报》和《劳动报》曾经准备在5月1日之前刊登它。前者没有刊登，因为《劳动报》拒绝转让，而《真理报》——由于我请求把它让给《真理报》而生了气。像是对待一个孩子似的对待我。的确，我对于它们来说又算得上什么呢？

近来，我工作得很多。我觉得，写大型的东西，戏剧和散文，为时尚早。可是我写了许多文章和诗，而且完全是按照新的方式写的。

在那些成功的美好年头，我由于意识到所做出的事有争议和不

---

① 在帕斯捷尔纳克这封信的打字稿第1页上有谢尔巴科夫的批示：“亚历山大·德罗夫同志，请了解一下，帕斯捷尔纳克具体地想要什么。A. 谢尔巴科夫。5月7日。”

完整而筋疲力尽。这是很自然的。那些在勃洛克<sup>①</sup>那里是合乎时宜的大型的東西，在马雅可夫斯基<sup>②</sup>、叶赛宁<sup>③</sup>和我身上却只能是逐渐没落和失掉意义。这是一个沉痛的过程。它杀死了我的两个同志，使我的生活变得难以想象的困难，使它不再能够令人满足。我们那些模仿者并不了解这一点。不管他们的处境如何，这一切都是文坛琐事，没有受到将要燃尽的心灵变化、死亡和再生之火的触动。

我已经把所有这些旧的东西抛弃了，我是自由的。战争和莎士比亚使我再生了。也许现在我在梦境中已经掌握了形式，但没有意识到它，没有察觉到它。我被所看到的和感受到的内容、时间的历史内容、构思的内容所占据了。

我一无所求。但是，在这决定性的时刻里，不要让我难以工作，因为我不能无限地活下去，应该抓紧时间。一个演员正在用我新写的战争题材的作品准备一台晚会，却不给晚会张贴海报，《文艺报》和《莫斯科〔晚〕报》不刊登晚会的预告：我没有分量。应该提醒一下，我即便得奖以前或没有得奖的时候都不是吃闲饭的。波利卡尔波夫和古洪诺夫不了解这一点，而离开他们，我怎能喘气和活动（度夏，金钱，搬家，菜园）！！应该向“苏联作家”的雅尔采夫<sup>④</sup>提醒这一点，我想要在他那里为真正的读者，而不是为彩票爱好者，把《早班火车》中较好的东西以及今年写的诗、文章和特写出版（一本小书）。最好能在国家文学出版社和剧院里让文集和翻译有所进展，那里对我的莎士比亚很赞赏并且为之惋惜，但目

① 勃洛克，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1880—1921），俄国诗人。

② 马雅可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1893—1930），诗人，诗歌语言的革新者。

③ 叶赛宁，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1895—1925），诗人。

④ Г. А. 雅尔采夫（1904—1956），1938—1949年间是苏联作家出版社社长。

前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好处，等等。

请您原谅，占用了您很多时间，并且向您谈得很坦率。惟有给您写信，才不会伤害我的自尊心。

矢志不渝地忠实于您的和热爱您的 Б. 帕斯捷尔纳克

№02213

**亚历山德罗夫、费多谢耶夫  
关于出版监督问题给谢尔巴科夫的报告（摘录）**

（1944年5月5日）

联共（布）中央书记亚·谢·谢尔巴科夫同志

**关于对出版图书的监督**

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为了尽可能合理地使用缩减了的纸张储备以出版战争条件下必需的图书，防止质量不佳的以及缺少现实意义的书籍和文章问世，宣传部规定，季度出版选题计划必须经过批准，所有政治的、科学的和文学的图书以及所有的杂志的出版须经预先审查。

由于贯彻这些措施，许多质量不佳的乃至有害的书籍曾被禁止或没有被批准问世。仅1943年一年就有432种书籍和小册子因没有现实意义或没有做好付印准备而从中央一级出版社的计划中撤销。许多坏书在审查书稿或大样时被查禁。例如玛丽艾塔·沙吉尼扬的《乌拉尔的人们》一书被禁止，因为该书诋毁性地描写了苏维埃乌拉尔。全书主要描绘“骇人听闻的道路难行”，燃料、电力、住房、食堂、幼儿园、剧院和俱乐部不足，甚至用水不足（人们没有水喝，而喝“发绿的混浊泥浆”）。作者到处“看见”的只是“骇人听闻的缺点”——无计划性，没有经济预算，不实行合理化建议，“缺少统一的领导核心”。战前，据作者的意见，乌拉尔距离社

会主义很遥远。只是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战争才“把这个最富裕的辽阔地区拉向社会主义”。

许多被禁止的书籍和杂志文章的作者崇拜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科学和文化……

根据宣传部的指示，曾禁止出版《法西斯德国经济资源的枯竭》一书，其作者们在阐述法西斯德国战时经济问题时，没有看到它的最主要基础——对被占领国家的掠夺。希特勒德国必定失败，可是按照作者们的意见，并不是由于对它进行军事摧毁的结果，而是由于其经济的枯竭。作者们对法西斯德国军事资源作了不正确的分析，误导读者，贬低红军在粉碎德国法西斯军队中的作用和意义。该书进行两次修改以后问世，但即使这样也还不无严重的错误。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国家社会主义历史概论》一书也不适于出版。文章的作者们迷恋于不加批判地引用法西斯首领们的话，使论文集充斥着法西斯胡言乱语的复述……

许多有害的和质量不佳的招贴画和版画被禁止。艺术出版社被禁止出版不少“我们能轻易取胜”的招贴画。艺术宝库出版社被禁止出版E.索科洛夫反人民的绘画，卫生教育研究所被禁止出版40多种传单和宣传画，这些画把我们的人民画成生虱子的、肮脏的、没有文化的人民，达到了野蛮的程度。

宣传部对将要付印的材料进行审查的结果是：1942年阻止了283种书籍和小册子、163种招贴画和版画的出版；1943年——142种书籍和小册子以及215种招贴画和版画。还禁止了相当数量的报刊文章。宣传部预先审查将要付印的材料，得以防止许多错误的书籍和文章出版或出现在杂志中。

然而，出版社以及杂志和报纸编辑部的领导者们已习惯于这种状况：书籍、杂志和比较重要的报纸文章通常事先在宣传部审查和

修改。因此，出版社和报纸编辑部领导者对所出版图书的思想质量的责任感也随之降低。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认为宣传部应该防止他们犯错误，便不采取措施来杜绝重犯错误的可能性。

宣传部对材料的审查也延长了材料的出版周期。大型的著作（20—40印张）审查的时间为两周到两个月。此外，宣传部对将要付印的材料预先审查，给文学评论造成困难。报纸和杂志的编辑部认为不便于评论已经宣传部审查过的书籍或杂志。

有鉴于此，宣传部请求您允许采取以下措施：

1. 取消现行的必须把所有政治的、科学的和文学的图书文稿或大样送交宣传部预先审查的体制。允许所有的中央一级出版社付印已经过出版社工作人员和书刊审查机关审查的书籍和小册子。宣传部审查最重要的书稿。通过书刊审查机关受理书稿，对书稿的意见也通过书刊审查机关传达。

保留宣传部审查和批准出版社的选题计划的职权。

2. 改变杂志审查的体制。只保留对《旗》、《十月》和《新世界》这3种杂志编辑部的稿件的直接受理，所有其余的杂志编辑部在获得书刊审查机关付印许可后可独立自主地把材料交付排版。宣传部通过书刊审查机关受理和审查11种杂志的大样（附上清单）<sup>①</sup>。对这些杂志内容的意见只通过书刊审查机关传达。

3. 宣传部组织对所有图书（书籍、小册子和杂志）出版后的审查。系统地（每月不少于一次）召集各出版社社长和主编以及杂志主编讨论出版社和杂志最重要的问题。

4. 鉴于中央一级报纸和杂志几乎停止发表评论和书评文章，将于今年5月召开各报纸和杂志文学评论和图书评介栏主任会议，

<sup>①</sup> 这11种杂志是《旗》、《新世界》、《十月》、《历史杂志》、《农妇》、《鳟鱼》、《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星火》、《女工》、《斯拉夫人》和《接班人》。

听取《新世界》、《旗》和《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关于执行联共（布）中央《关于文学评论和图书评介》的决议情况的报告。综合政治性的、文学的和技术的杂志每一期皆应刊登评论和书评材料。

所有上述措施将提高作者、出版者和杂志编辑以及书刊审查机关工作人员对出版物质量的责任感。

Г. 亚历山德罗夫

И. 费多谢耶夫

1944年5月5日

№02214

## 亚历山德罗夫关于出版帕斯捷尔纳克作品问题 致谢尔巴科夫的报告

(1944年6月24日)

联共（布）中央书记亚·谢·谢尔巴科夫同志

遵照您的委托，把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召了到宣传部。他要求出版他的新诗集并且与国家文学出版社签订出版一卷莎士比亚译本的合同。此外，帕斯捷尔纳克要求促使《真理报》和其他报纸刊登他的文章、诗歌和特写。

宣传部给雅尔采夫同志（苏联作家出版社）下达了指示，令其准备帕斯捷尔纳克一本不大的新作品集，并指示恰金同志（国家文学出版社）签订出版一卷莎士比亚译本的合同。至于在报纸上发表诗作，已通知帕斯捷尔纳克同志，中央一级各报纸编辑部将根据质量自行决定是否发表他的诗作、文章和特写的问题。帕斯捷尔纳克信中所附的一诗经过某些修改，在《真理报》上发表了。

Г. 亚历山德罗夫

6月24日

No02215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  
关于《日出之前》等问题与  
左琴科的谈话情况

(1944年7月25日)

今年7月20日与M.M.左琴科谈话时，向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反映了他的情绪和观点。

1. 最初反对您的中篇小说《日出之前》的原因是什么？

答：“……明确地让我知道，这里的问题不只是一部中篇小说。曾经企图把我作为一个作家‘打倒’。”

2. 什么人关心这件事？您的文学敌人吗？

答：“……不，这里说的可能是‘上面’的相应情绪。问题在于我的许多作品在国外被转载或重印。这些转载或重印常常是不正当的。我很久以前写的一些短篇小说被注上新的写作时间。这从‘转载者’方面来说是很不正当的，可是我又不能与之斗争。因为现在对俄罗斯人的描写不同于我那些短篇小说里所描写的，这也就引起了‘打倒’我的愿望，因为我的整个作家工作，而不仅仅是中篇小说《日出之前》，都受到‘上面’的批判。然后，对待我的态度便出现了转变。”

3. 您如何对待《布尔什维克》刊登的叶戈林的文章？

答：“……我认为这篇文章是不正派的，因为在报刊发表批评之前，叶戈林对待我的中篇小说持有另一种观点。尤诺维奇（《十月》的编辑）可以证明这一点。叶戈林对中篇小说曾经是称赞的。开始对这部小说进行谩骂以后，叶戈林胆怯了。他害怕我在作家协

会主席团会议上挨骂时讲出他的意见而‘出卖’他。看到我并没有‘出卖’他，叶戈林在会后向我走过来，小声说：‘小说很好’。”

4. 您后来有没有对别人讲过叶戈林的行为？

答：“对波利卡尔波夫讲过。”

5. 波利卡尔波夫如何看待您的话？

答：“他对我说的话异常感兴趣，说他也有另一些材料能证明我的话并且能证明某些党的领导工作者实行了不正确的路线。波利卡尔波夫要求我不要公开写文章谈论这一点，而就叶戈林的行为提交一个声明。”

6. 他为什么要求您写个书面声明？

答：“他说他要转给谢尔巴科夫。”

7. 您提交了声明吗？

答：“没有，因为我可怜叶戈林。”

8. 波利卡尔波夫仍然坚持要您提交声明吗？

答：“他对我叫喊，要求我提交声明，可是我没有这么做。”

9. 您打算如何对待叶戈林？

答：“我要写一部中篇小说，讲讲我的中篇小说《日出之前》的全部历史。我要在这部中篇小说里让叶戈林出场——我要把他的全部丑恶行径都展示出来”

10. 他在这部小说中能认出自己来吗？

“毫无疑问地会认出来，因为我要坦率地写他。”

11. 这样两面讨好地评价您的作品，还有别的例子吗？

“有过。我特别要指出什克洛夫斯基<sup>①</sup>——我们文学界的布尔

<sup>①</sup> B. B. 什克洛夫斯基（1893～1984）作家，文艺学家，写有关丁列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马雅科夫斯基等著名作家创作的专著以及历史故事、回忆录等。

加林<sup>①</sup>。在我的中篇小说‘被摧毁’以前，他赞扬过它，后来在协会主席团会议上又非常凶狠地谩骂它。我揭穿他是在撒谎，也是在会议上。”

12. 吉洪诺夫如何评价您的小说？

“他赞扬过小说。后来在主席团会议上向我解释说，有‘命令’要骂它。他骂了，但骂得不很厉害。后来速记稿在《布尔什维克》上刊登出来了，我看到吉洪诺夫残酷地批判我，很吃惊。我问他是什么引起了‘战线的变化’？吉洪诺夫开始表示‘歉意’，自相矛盾地解释说，‘要求’他加强批判，‘命令’他残酷无情地批判，于是他被迫执行命令，进行批判，尽管并不同意这种命令。”

13. 您如何评价您的一些短篇小说从《列宁格勒》<sup>②</sup>中被撤掉这件事？

“这一切只能用列宁格勒看莫斯科的脸色行事来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是根据叶戈林的文章，而并不知道莫斯科对待我的真正态度。”

14. 现在莫斯科对您持什么态度？

“很好。我是根据吉洪诺夫的话这样判断的。我在莫斯科看见吉洪诺夫，他对我说，我已经走出了‘漩涡’。后来，我最近一次来莫斯科的时候，他又对我说，叶戈林的文章不值一谈，对待我的态度并没有受到这篇文章的影响，非常好。”

15. 指的是作家们的态度还是官方的态度？

“吉洪诺夫暗示是‘上面’的态度。”

16. 有事实可以证实吉洪诺夫的话吗？

① Ф.Н. 布尔加林 (1789 - 1859)，记者，作家，保守报纸《北方蜜蜂》的出版人。与沙皇秘密警察机构第三厅合作，执行监视文学界人士的秘密使命。

② 《列宁格勒》是文学双月刊，苏联作家协会列宁格勒分会机关杂志。1940年开始出版，1946年根据联共（布）中央的决定停刊。

“是的，有。最近一个时期，《消息报》约我定期提供尖锐的讽刺小品，像我的旧风格那样的。很明显，这是取得中央同意的——否则就不能解释每天都打电话来催促快些交稿。”

17. 您准备提供什么样的材料？

“非常尖锐的，是我的旧的讽刺风格，抨击我们的缺点。这些小品中有一篇刻薄的故事，讲述一个初学写作的作家和编辑的故事，这位编辑很糟糕，把作品给毁了，由此论述到艺术及其任务。”

“这个初学写作的作家的短篇小说讲的是一艘轮船如何沉没了，可是编辑却害怕写我们轮船沉没的事，把稿件给改了，把轮船沉没的故事换成了小艇沉没的故事，使小说变得没有意义了。”

18. 这种小品能通得过吗？

“要是在列宁格勒就不能通过，因为那里不了解莫斯科执行的方针：猛烈抨击我们的缺点。”

19. 您如何评价我们文学的总的状况？

“我认为目前苏联文学的情况很可怜。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公式化，大家都按照一定的公式写作。因此，甚至一些有才华的作家都写得很不好，枯燥乏味。”

20. 您如何评价党对文学的领导？

“领导工业和铁路运输要比领导艺术容易。领导者往往对艺术的任务缺乏深刻的理解。”

21. 您是如何认识作家们在革命年代的命运的？

“诗人们不如散文家坚强，诗人中间有许多人悲剧性地死了。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茨维塔耶娃<sup>①</sup>——都是自杀身亡的；克

① 茨维塔耶娃，玛林娜·伊万诺夫娜（1892 - 1941），诗人。1922 - 1939年间侨居国外。

柳耶夫<sup>①</sup>、曼德尔施塔姆<sup>②</sup>——死于流放中；赫列布尼科夫和勃洛克（他在死前患病的时候把药倒掉，因为他不想活了）死得很悲惨。年轻的中间，科尔尼洛夫、瓦西里耶夫等也都悲惨地自杀了不能‘适应时代’。”

22. 您是否认为马雅可夫斯基死亡的原因如今已经清楚了？

“将来也还是个谜。马雅可夫斯基用来自杀的手枪是著名的肃反工作人员阿格拉诺夫给他的，这很新奇。”

23. 这是否会让人猜测，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是受人挑唆的？

“有可能。起码是事关女人。关于薇罗尼卡·波隆斯卡娅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猜测，她告诉我，她与马雅可夫斯基并不亲密。”

24. 如果谈到现在还健在的作家，您觉得谁的命运最悲惨？

“让我特别不安的是尤里·奥廖沙的命运，他曾住在阿什哈巴德。他曾说过，等待着他的的是毁灭——我是正确的。”

25. 您对自己今后的生活有何想法？

“我需要等待。很快，战争结束以后，文学的环境就会改变，为我设置的一切障碍都将消除。到那时我又能出版作品了。目前我在哪方面都没有变化，我将保持自己的立场。尤其是因为读者了解和喜欢我。不久以前我与普罗科菲耶夫和米罗什尼琴科一起在军队的晚会上演出。我受到热烈欢迎，鼓掌和欢呼声震耳欲聋。

此外，应该考虑到，挨骂的不只是我一个人。有人安慰我，譬如列昂诺夫和瓦·别德内。列昂诺夫说：‘一切都会过去。两年没让我出版书，后来，闸门一下子就冲开了。’

别德内说：‘四年没让我出书，后来一切都变了。只觉得可惜

① 克柳耶夫，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1887—1937），诗人。

② 曼德尔施塔姆，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1891—1938），诗人，阿克梅派的代表人物。

的是我的藏书都不得不卖掉了。’

是的，只是在钱的问题上有些困难。但我一向钱紧，我出书的印数总是受限制。惟一能减轻压力——是印数。”

26. 除了《消息报》您还打算在别的地方发表作品吗？

“我的几篇短篇小说被戈卢别娃<sup>①</sup>接受，准备在《星》<sup>②</sup>上发表。她把小说寄往莫斯科，但目前莫斯科还没有答复。可是，我想它们是得不到通过的，因为戈卢别娃的修改把它们给弄糟了，她想要弄成这个样子，以为能够通得过。”

27. 您是否认为您为了保护自己的中篇小说《日出之前》已经做了一切？

“我做了一切，可是我‘命运不佳’。我和斯佩兰斯基院士一起给斯大林同志写了信，可是寄这封信的那些日子里斯大林同志到德黑兰去了，信落到了代替斯大林同志的谢尔巴科夫手里。可以理解，谢尔巴科夫的处理方式不同于斯大林同志的处理方式。”

28. 您如何评价目前作家协会的领导？

“事情很奇怪，从前很多人攻击法捷耶夫，可是现在莫斯科的一切都变了：法捷耶夫在莫斯科毕竟还是受到爱戴的，而吉洪诺夫却得不到，因为法捷耶夫是个热爱苏联文学的人，而吉洪诺夫为人冷淡，漠不关心。

波利卡尔波夫——为人激烈和直率，这从一件事可以看出来，他要求我就叶戈林的两面派行为写一个声明。”

29. 您如何评价今天一般的政治形势？

“来自前线的消息令人高兴。德国将军霍夫迈斯特的声明表明，

① A. Г. 戈卢别娃 (1899 ~ 1989)，1944 年担任《星》杂志责任编辑。

② 《星》是文学和社会政治月刊，苏联作家协会的机关杂志。从 1922 年开始出版。

德国毁灭的日子临近了。斯大林天才地看见了一切。他的信心在最困难的时候让人震惊，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苏联人都认为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国家毁灭为期不远了。”

30. 您是否以为战后文学界的政治形势会发生变化？

“是的。将会要求文学更尖锐和更无情地写我们的缺点。”

31. 您是否打算在近期内去莫斯科？

“不。”

谈话时涉及的基本问题就是这样的。

№02216

## 亚历山德罗夫等关于文学杂志《旗》的问题 致马林科夫的报告

(1944年8月7日)

联共（布）中央书记格·马·马林科夫同志

### 关于文学杂志《旗》

文学杂志《旗》的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旗》编辑部贯彻联共（布）中央关于改进文学杂志工作的指示很不得力。

1940年建立的《旗》编委会没有开展工作。编委会成员 A. J. 伊斯巴赫、B. 列别杰夫—库马奇、B. 卢戈夫斯科伊、M. 索科洛夫斯基<sup>①</sup>没有参加杂志的任何工作。战争期间，他们没有在杂志上发表过一篇作品。

经验表明，杂志的责任书记米哈伊洛娃同志没有能力保证杂志保持应有的思想和艺术水平。

在各期杂志的准备和出版过程中，宣传部不得不纠正杂志编辑部所犯的严重错误。譬如禁止了由编辑部签署付印的尤佐夫斯基和乌西耶维奇在政治上不正确的文章。尤佐夫斯基在其《批评日记》中实际上是反对艺术中的思想性，嘲笑苏联文学对现实的正面描写：

<sup>①</sup> M. P. 索科洛夫斯基，作家，担任过文学杂志《旗》的责任书记。

“英雄人物——大家都知道他是拥护而不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既已着手做一件事情，那就一定是某种自鸣得意的、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必然成功的预定结局。这在我们的文学中产生了粉饰现实和盲目乐观的现象。”

尤佐夫斯基在文章中断言，我们战前的艺术没有为将要发生的战争而武装人民的思想。他写道：

“你不信，观众处于兴奋之中，为了未来的反法西斯斗争，观众被动员起来了！不对。我们是见证者。观众没有被动员起来，而是被瓦解了。数万人从剧院里走出来，对胜利抱着盲目乐观的情绪，这就被称作对未来战争的教育。”

分析姆季瓦尼的剧本《营队向西方前进》时，尤佐夫斯基做了如此恶毒的攻击：

“演出是急切需要的——因为战争开始了。剧本有一个点题性的能说明结果的名字《营队向西方前进》。我们应该说，这不免让人懊丧，但还是有教育意义的，当剧本《营队向西方前进》搬上舞台时，作者却和演员们一起向东方疏散。”

乌西耶维奇在评论戈尔巴托夫的《不屈的人们》的文章中把我们遭受德国人统治的那些人的苦难归咎于苏维埃政权：

“留下来的人不得不独自经受这最初的可怕时刻，悲剧性的困惑不解的时刻：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希望和爱——没能坚守住，没能保卫住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劳动、我们经过多年艰苦努力建设起来的整个生活……撤退的不是与他无关的人，不是在他上面、为他负责的人。不，是自己人，是他的儿子，是他的孩子们，是他应该为之负责的人。在这个时刻，他孤单单地一个人，感到最可怕的孤独，可是他知道，对这个阶段的生活将要有个交代——在自己的人面前，在自己的孩子们面前，在自己的政权面前（这政权是他塔拉斯过去争取来的，这政

权是依靠他的)，在所有那些人面前（他曾终生对这些人负责，他也曾要求并且将要求这些人负责）。

塔拉斯感到自己是故土上现存的一切的主人，感到他，技工塔拉斯，要对一切负责，可是也应该有人对他负责……这也就是……塔拉斯的爱国主义中的基本特点。”

编辑部准备在杂志第5-6期合刊（5-6月号）发表E.多尔马托夫斯基<sup>①</sup>的长诗《领袖》，这部长诗不正确地描写了红军在战争最初几个月的撤退。根据这部长诗，红军不停地撤退，不对德国人进行反击，从我们的边境一直撤到莫斯科。

杂志中继续出现质量差的、艺术上平庸的特写、短篇和中篇小说。例如1943年第11-12期合刊发表了B.什克洛夫斯基内容空洞、矫揉造作的短篇小说《关于分别和损失》，1943年第11-12期合刊刊载了Я.基谢廖夫下流的反艺术的短篇小说（《平等者中间的平等者》、《他的义务》、《医院之夜》）。

《旗》的文学评论栏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许多文学评论文章不具有政论的和学术的价值，尤其是其中有一些明显是错误的。《旗》1943年第9-10期合刊发表了Л.波利亚克<sup>②</sup>的《关于伟大卫国战争的抒情史诗》一文，作者对战前苏联诗歌发展的特点和条件表达了不正确的论点。波利亚克写道：“在开始建设的艰苦年代，存在着一种不成文的诗歌规章，这并非任何人提出的，但却是大家所默认的，否定了个人抒情题材。”接下去：“今天的苏联诗人们从禁欲主义的羁绊下，从苦行僧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了，他们不久以前还用这些羁绊和枷锁束缚自己。”然后，Л.波利亚克断言：“伟大的卫国战争加强、强化了苏维埃人的爱国主义感情，并且用新的内

① E.多尔马托夫斯基，叶夫根尼·阿罗诺维奇（1915-？），诗人。

② Л.М.波利亚克（1899-？），文艺学家。

容充实了它，从而彻底消除了个人的‘自己的’利益与民族的祖国的利益之间的矛盾。”由此得出结论，战争以前存在着苏维埃人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严重矛盾，只是战争才消除了这些矛盾。杂志的工作人员显然清楚，Л. 波利亚克的论断是不能接受的。因此编辑部说不同意文章的某些论点，以此来打掩护，但却没有说明不同意哪些论点。Л. 波利亚克的文章发表以后，已经出版了3期杂志，可是编辑部至今也没有表明自己对文章错误论点的态度。波利亚克在同一篇文章中还吹捧作为诗人的И. 谢尔文斯基，说他“探索新的、但又是平凡的、真正有充分价值的词语”。写这些东西已是在联共（布）中央批判了И. 谢尔文斯基的错误以及发表И. 谢尔文斯基的《俄罗斯给谁唱催眠曲》一诗的杂志编辑部的错误之后。И. 安托科尔斯基<sup>①</sup>热情称赞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文章（《旗》1943年第9-10期合刊）也很引人注目。И. 安托科尔斯基竭力夸大和鼓吹帕斯捷尔纳克在苏联诗歌中的地位和意义，他写道：“帕斯捷尔纳克终生与‘自然性’打交道，追求其极度的紧张。诗人的真诚令人感动，他以自己的悟性的闪光让我们震惊……他就这样生活在我们中间，对于这位了不起的抒情诗人来说，每个春天都是世界性的事件，如同在青春的年华一样。”接下去：“……他的一切都能唤起遐想，引人入迷，虽不给人最后的答案，但一次又一次地吸引着人。”

《旗》编辑部很情愿地刊登B. 什克洛夫斯基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就文学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废话。

《旗》编辑部没有工作计划，没有在自己的周围团结一批作家，没有促进出现一批需要的当代题材的文学作品，以适应我们人民在反对德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对于要发表的作品稿件

<sup>①</sup> 安托科尔斯基，帕维尔·里戈哥里耶维奇（1896-1978），诗人，翻译家。

在编辑部里不进行讨论。

由于编辑部工作不负责任和粗心大意，相当一部分材料没经仔细加工就送往印刷厂，校对大样的过程中不得不进行修改加工，影响了印刷厂的工作，导致杂志出版期限的混乱。最近几个月以来，发生了完全不能容许的杂志拖期：第1·2期合刊（1—2月号）的样本出版于5月9日，发行本则于6月12日问世；第4期（4月号）的样本出版于7月8日，而发行本则于7月20日问世。

为了改进《旗》的工作，宣传部认为建立新的编委会是适宜的，其组成是：吉洪诺夫、维什涅夫斯基、西蒙诺夫、爱伦堡、季莫费耶夫<sup>①</sup>、特瓦尔多夫斯基<sup>②</sup>、托尔钦诺夫、奥尔洛娃<sup>③</sup>。

作家吉洪诺夫、西蒙诺夫、爱伦堡和托瓦尔多夫斯基在这家杂志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吉洪诺夫在这里刊登了诗作，西蒙诺夫刊登了诗、特写和中篇小说《日日夜夜》，爱伦堡也从很早以前就跟《旗》有联系，战前在这里刊登了《巴黎的陷落》，战争期间发表了一系列特写，特瓦尔多夫斯基发表过短诗和长诗，托尔钦诺夫能就军事问题给杂志当顾问。任命B.B.维什涅夫斯基为杂志的责任主编。

鉴于米哈伊洛娃不能胜任交给她的任务，解除她在杂志的工作。任命奥尔洛娃同志为杂志的责任书记，她目前在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文学部任指导员。

《旗》是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的机关刊物，因而把它的出版工作从国家文学出版社转交给苏联作家出版社。

《旗》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团结一批写作红军和海军题材的文学

① 季莫费耶夫，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1903—1984），文艺学家。

② 特瓦尔多夫斯基，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1910—1971），诗人，社会活动家。

③ B.Я.奥尔洛娃，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文学部指导员。

家。《旗》应该促进出现一批关于卫国战争和我们人民军事历史的文学作品，刊登进行军事教育的政论文章。

附上联共（布）中央的决议<sup>①</sup>草案。

Г. 亚历山德罗夫

И. 费多谢耶夫

Д. 波利卡尔波夫

1944年8月7日

---

<sup>①</sup> 参见本专题文件№02217。

№02217

## 联共（布）中央关于 《旗》编委会成员的决定

（1944年8月23日）

### 关于《旗》

联共（布）中央注意到，《旗》编委会现在的组成不能保障该刊物保持应有的思想和文学艺术水平。

联共（布）中央决定：

1. 任命 B. B. 维什涅夫斯基同志为《旗》的责任主编，K. M. 西蒙诺夫、A. K. 塔拉先科夫、Л. И. 季莫费耶夫、H. C. 吉洪诺夫、M. П. 托尔钦诺夫同志为编委会成员。

2. 责成《旗》编委会制订杂志近期的工作计划，并送交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审查。

No02218

亚历山德罗夫、费多谢耶夫  
关于《旗》发表的作品问题  
致谢尔巴科夫的报告

(1944年10月18日)

联共(布)中央书记亚·谢·谢尔巴科夫同志

《旗》编辑部(责任主编B.维什涅夫斯基)准备并且印制了本期的杂志(第7期)。这一期里发表了一系列包含有严重错误的材料。

在杂志首要位置上发表了达吉斯坦作家艾芬季·卡皮耶夫的札记手稿(《前线日记摘抄》)。但是这些零乱的札记没有任何艺术价值,而关于战争的个别札记则表现了不适当的情绪和观点,充满深刻的悲观主义、绝望和无出路的感情。

请看几个例子:“道路铺设在穿过沼泽的土堤上。两边都是高高的干枯的芦苇。芦苇像无情的墙,发出簌簌的响声。道路泥泞,被汽车碾得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车辙里的烂泥干涸了,像是浪峰。第一只春天的青蛙在苇塘里发出单调的呱呱鸣叫。好像那里坐着一个长着扇形胡须的衰老而愉快的地精,只听见他冷静地发出老人的哈哈笑声——唏—哈—嘿——是在嘲笑这个春天,嘲笑他们,嘲笑这战争的荒漠……

唏—哈—嘿——这是人!唏—哈—唏——这也是人!”艾·卡皮耶夫描绘了对于他来说永远不变的寂静无声的荒原及其黄昏时的景色(“白天在熄灭。远处伫立着几座废弃了的草房,没有房顶,没

有窗户，只剩下断墙残壁，无声无息，孤苦伶仃……”诸如此类等等)，然后用这样一段话结束了札记：“青蛙孤零零地像以前一样，愿意冷静地用这衰老的笑声鸣叫。唏—哈—嚯——嚯—嚯—嚯！这就是战争给你们带来的！这就是春天给你们带来的！人们也是这样！……”（第13页）

另一段札记：

“一座巨大的教堂的废墟奇形怪状。周围是一个烧焦了的哥萨克村镇，只剩下几棵光秃秃的树和一片荒漠。教堂的穹窿有一部分完好地保留下来，裸露着，那上面绘着壁画，一个大胡子的使徒把手伸向基督。好像是在祈求他从天上走下来。在这被毁坏的被焚烧的哥萨克村镇的背景上，在这前所未有的战争荒漠的背景上——这些向高处飞翔的天使、举起双手进行祈祷的大胡子老人，从四面都能看得见，身材高大，穿着非人世的衣裳，他们具有特殊的意思。看起来他们是在向上帝呼唤：

上帝呀，你看看，地上发生了什么事！上帝呀，你阻止吧，惩罚吧！”（第4页）

这个札记的前面有这样一首诗：

“你想要蜂蜜吗，我的儿子？  
那么你就不要怕针刺。  
想要胜利的桂冠？勇敢地战斗。  
你渴望珍珠吗？你就下到  
河底，那里有鳄鱼张着大嘴。  
别害怕，听凭上帝安排。  
惟有勇敢者才能当父亲。  
惟有勇敢者才能得到蜂蜜或珍珠，  
要么是毁灭，要么是桂冠。”

在这里作了如下的沉思：

“诗人痛苦地感受到人民的期望，他燃烧着热情，想尽快地为人民解忧。可是只有真正的领袖才不慌不忙，像上帝一样，知道什么时候需要行动。从诗人的观点来看，通常这似乎是不允许的，不能慢慢腾腾，晚了是不合人性的。”（第3页）

第8页上：

“这样一天天过去了。没有希望的沼泽，芦苇，掩体。黑色的乌鸦群在我们头顶上盘旋，夜里的月亮通红，自动步枪嗒嗒地响，火箭……

……轰隆声打破了宁静。已经看不见乌鸦群、大火、小小的岛屿，只有乱蓬蓬的黑灰色的烟的波浪在周围翻滚，周围全都变成了沸腾的海洋……大炮寂静下来，但硝烟还在无声无息地四处弥漫，一团团地遮住了视线。这一瞬间，步兵一跃而起。

冲啊！前进！

现在你试试看，试试阻止他们，——他们已不能控制自己，他们被充上了电，像熊扑向猎矛一样，奋不顾身地扑向火力点……”

关于野战医院的故事也反映了这种典型的情绪。Э.卡皮耶夫指出，在医院里，伤兵的病历记在K.西蒙诺夫诗集的书页上，记在“印刷的文字上面”，特别是记在《冰上大战》一诗上面。Э.卡皮耶夫一边观察一边思索：“……冰上大战的历史是用诗写成的，这上面用散文记载了当今的血腥日子；我们这个时代普通士兵的‘病历’，‘人民的病历！’”

这篇故事是这样结束的：

“我望着窗上黑乎乎的玻璃，只见上面映着闪动的烛光。窗外，这烛光映像的后面，可以看到光秃秃的黑色树枝和天上孤零零的月亮……我凝视着，紧紧地盯着夜色，好像是看着世世代代的深处

“夜是黑暗的，夜是黑暗的——没有新的发现。”（第21—22页）。

《文学评论和图书评介》栏刊登了马茨金<sup>①</sup>的文章——《战争日子里的爱伦堡》。文章的作者没有分析和评价爱伦堡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文学优点，而是不负责任地胡言乱语一通，把一种新的战争学说强加给爱伦堡。马茨金在第159页写道：

“在爱伦堡看来，战争——这是自我牺牲精神、狂暴行为和憎恨情绪。”（第158页）“他（爱伦堡）认为战争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精神状态，不管战争持续多久，它任何时候都不能成为日常生活。”再如第158—159页：“我们在这里接触到爱伦堡创作的本质方面，他对当代战争性质的理解”以及对文学任务的理解。“他否认战争是骑士的决斗，是血腥的竞争，而热烈地维护自己的道德观念——只有对卑劣敌人的深仇大恨才能为战争辩护。战斗时不可能无动于衷，杀人时不可能心情冷漠……没有憎恨的战争是可耻的事情，就像没有爱情的同居一样。”接下去说，爱伦堡在战争日子里的政论“提出了纲领性的”和论战性的要求。它提醒文学家们，“战争在人民的生活中——这不是间歇，战争中有许多邪恶的和黑暗的东西，但这里也有忘我精神，这是在和平与幸福的日子所见不到的……”（第160—161页）

联共（布）中央的决定中要求新组建的杂志编委会制订工作计划，并要求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该杂志是作协的机关杂志）审查这个计划。然而，《旗》编辑部和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却没有严肃地对待这一期杂志的准备工作。

我们认为必须：

---

<sup>①</sup> A. П. 马茨金（1906—？），文学评论家。

1. 禁止《旗》第7期流传。
  2. 责成作家协会主席团讨论《旗》第7期。
  3. 要求编委会重新编辑《旗》第7期。
- 请求您的指示。

Г. 亚历山德罗夫

И. 费多谢耶夫

1944年10月18日

№02219

## 伊万诺夫关于《围困》的出版问题

### 致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4年11月20日)

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书记

安·亚·日丹诺夫同志

#### 对洛佐夫斯基同志关于出版B.凯特林斯卡娅的 长篇小说《围困》的信的答复

女作家凯特林斯卡娅的长篇小说《围困》引起了《星》杂志前编辑部方面(戈卢别夫、阿夫拉缅科、吉洪诺夫)的尖锐批评。

编辑部在长篇小说里几乎没有发现任何文学优点,否定了对1941年夏秋的事件的描写。国家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拒绝在B.凯特林斯卡娅完成小说第二部之前刊行她的书。批评意见主要是针对1941年夏秋我军的撤退的描写,这种意见在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局也曾提出过,该局的约夫丘克同志读了这本书。

当前,《星》新的编辑部和作者一起着手对这部作品进行加工。国家文学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把小说列入1945年的出版计划,建

议作者进行必要的加工。这样，B. 凯特林斯卡娅就完全有可能在1945年出版自己的长篇小说<sup>①</sup>。

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宣传书记 B. 伊万诺夫

1944年11月20日

---

<sup>①</sup> B. 凯特林斯卡娅的长篇小说《围困》是在1948年出版的。

№02220

吉洪诺夫、波利卡尔波夫  
关于调整作协领导机构问题  
致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的报告

(1945年1月9日)

联共(布)中央书记

安·亚·日丹诺夫同志<sup>①</sup>

格·马·马林科夫同志

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呈请联共(布)中央批准于1945年4月5日召开协会理事会例行的全体会议,吸收各地方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参加。自从苏联作协最近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以来,已经过去了半年。在过去的一年里,实现了对各共和国作家协会的改组。一些新的同志走上各协会的领导岗位,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以前没有参加过作家组织的领导工作。

非常需要讨论文学领域的年度总结,并且就各共和国苏联作家协会领导创作工作的实际问题交换意见。

全体会议拟讨论H.C.吉洪诺夫题为《1944年的苏联文学》的报告,还有一些副报告:A.苏尔科夫——关于诗歌,H.波戈廷——关于戏剧,C.马尔夏克——关于儿童文学。

在过去的几年里,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的组成发生了重大变

<sup>①</sup> 本文件第1页上有日丹诺夫的批示:“送亚历山德罗夫同志。1.请审定并提出建议。2.我觉得按照增补原则确定作协理事会和主席团成员的限额是不妥的。我认为这里应该考虑人员组成,而不是数额。日丹诺夫。1945年1月14日。”

化。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选出的总共 101 名理事会成员中，由于各种原因而离职的有 49 名理事，剩下 52 名。

看来必须以增补程序补充一批卫国战争年代在文学中崭露头角的新同志进入理事会。

特呈请联共（布）中央批准在即将召开的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全体会议上以增补程序选出 25 名新的理事。

为了吸收在文学中崭露头角的同志参加苏联作家协会创作生活的领导工作，还必须把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的组成从目前的 15 人扩大到 21 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协会理事会的某些原有的成员不积极参与协会的生活，况且他们由于创作的失败及其所犯的思想政治错误在作家中间已经丧失了从前的威信。

呈请联共（布）中央批准将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定为 21 人，并且在即将召开的理事会全体会议上进行增补。

Н. 吉洪诺夫  
Д. 波利卡尔波夫  
1945 年 1 月 9 日

№02221

## 波利卡尔波夫关于发表英贝尔的作品

### 致《旗》编委会的信

(1945年2月9日)

《旗》杂志各位编委

亲爱的同志们！

《旗》的编委会打算在1945年第1期发表B.M.英贝尔的《列宁格勒日记》。

我确信，编委会倘若发表该著作，必将会犯错误。

因此，我不得不请求各位编委再次讨论关于发表B.M.英贝尔日记的问题。薇拉·英贝尔的列宁格勒日记（《将近三年》）无论在文学艺术方面还是在思想方面都不会引起并且也不可能引起广泛的社会兴趣。毫无疑问，《旗》发表这部日记定会引起许多读者困惑不解以及一些人自然而然的气忿，因为他们阅读著名女作家十多印张描写列宁格勒的散文时，希望首先感受经受住德国人围困的光荣城市的英雄主义气氛——劳动方面的和军事方面的——和体验普通的列宁格勒人的情绪和思想。

可是在日记中，列宁格勒劳动和战斗的日子却表现得很琐碎，被局限于室内。如果有人将要研究薇拉·英贝尔的《普尔科沃子午线》创作的历史，这部日记无疑是有意义的。它能让人了解薇拉·英贝尔——跟所有的列宁格勒人一样——生活和劳动的日常环境的艰难困苦，但是却歪曲了对列宁格勒人在被围困的城市里的现实生活的认识。

薇拉·英贝尔在1942年1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家务占据了越来越多的时间。炉子、茶壶、洗餐具、烧菜汤或煮饭、织织补补和洗洗涮涮，占去了半天的时间。”

很遗憾，女作家个人家务的描写——在日记中占有中心的地位，大约有三分之二，掩盖了对被围困的城市生活和斗争的一些有价值的细节和观察，并把这些排挤到次要地位上去。

无动于衷地记录大的和小的、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事件和事实，是不妥当的。

“我温情地回忆起我那把放在列宁格勒医院花园窗前的深座皮安乐椅。非常为伊甲亚·达维多维奇担心。收到让娜一封电报，她，可怜的孩子，幻想我能到奇斯托波尔去，或者她到我这里来。我的文学上的事很顺利，可是24日那天列宁格勒发生一次大的空袭，这让我很痛苦。昨天到爱伦堡那里去了。我想起了年轻时去过的十分遥远的巴黎。旅馆的房间、汽车、‘游荡’的舒适……”

这样的摘录可以引上几十段。女作家不断地记录自己文学上的事、自己的家务琐事和列宁格勒生活的困难，结果是掩盖了大事，而不是通过小事展现出大事。

薇拉·英贝尔仿佛是深深地坐在皮安乐椅里，从自己那所坐落在沙滩街上的住宅的窗子观察着列宁格勒的生活，她的住宅里有“不凋谢的伊丽莎白和叶卡捷琳娜玫瑰”，有“蓝里带着金色的尼古拉玫瑰”，那里有“浅灰色的瓷器，易碎的器皿”。

她引用和自己的清洁工叶芙罗西尼娅·伊万诺芙娜以及自己的熟人的谈话，可是从这一切却看不出列宁格勒生活的广阔画面，也听不到对这种生活的深刻理解。

女作家谈到自己的《普尔科沃子午线》时，她的声音里才出现热情。这时，日记里处处都是惊叹号。

“终于完了！我自己也不相信，然而的确是完成了。第四章写

完了，更确切些说，几乎全章都是重新抄写的，经过了充实和删节。

但这是英雄的工作。我本来决定推迟这一章。可是突然解决了：我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把诗放下，全力以赴地投入这一章。结果怎样！……”（1942年10月27日）

作者写作《普尔科沃子午线》的过程，在日记中被描绘得相当细致和耐心，可是读者却想要通过日记感受和了解列宁格勒更广大的居民阶层英勇工作的伟大气魄和内心的紧张。可是日记恰恰没有表达出这一点。

日记中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自我陶醉的调子，这是不妥当的，因为女作家在这里谈的是死亡，记录的是被围困的列宁格勒的场面。

“我睡得不熟，睡得很浅，只要我迷迷糊糊地醒来，立即在自己的头脑里找到一个诗句，甚至找到一个诗段。它们好像就是夜间躲在门后，等待着把它们放进来，只要轻轻地动一下——它们已经在这里了。娜塔莎在一家医院的门口看见了两具拥抱在一起的尸体。已经确切得悉，拉宾和哈茨列文在基辅牺牲了。”女作家在同一篇日记里一直在谈论不让她睡熟的两句诗句或一个诗段以及两具拥抱在一起的尸体，这很肤浅，很不深刻。

不管薇拉·英贝尔愿意与否，但这将有损于苏联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在广大读者眼里所确立的形象。

在日记的另一个地方，薇拉·英贝尔讲到她如何准备去参加文学界的会议，写道：

“又开始了编织毛线袜和手套的伟大工程以及积存食品。”

不管英贝尔写到“编织袜子的伟大工程”时是否带着讥讽的口吻，这的确有意要造成一种伟大事业的印象，因为这些细节在日记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凡是涉及到个人的（日常生活的和文学的）活

动的一切，都被薇拉·英贝尔突出到首位上来。

《旗》编辑部若发表薇拉·英贝尔的日记，就会给她帮倒忙，因为在她的日记里，个人的私事和狭窄的文学细节掩盖了重大的题材。读者爱上薇拉·英贝尔是由于她的《普尔科沃子午线》——这篇长诗以异常精炼和准确的形式表达了被围困的列宁格勒的气氛。何必用一些烦琐的日常生活的和心理的细节来给这部长诗做注脚呢？纯属多余，这会破坏薇拉·英贝尔业已完成的一项优异工作给人带来的印象。英贝尔留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此为基础，她完全可能写出一部优秀的书来讲述战争日子里的英雄的列宁城。既然对于这本可能写出来的并且是人们所希望的书来说，这些是未经加工的准备材料，那末有必要把它们提前发表并且用它们来取代这样一本书吗？

从前，另一位女作家提前发表了日记，曾经引起很坏的印象以及困惑莫解和忿怒的感觉，苏联社会舆论界对此记忆犹新。重复这种尝试，用本来未经加工的、杂乱无章的日记来表现像卫国战争日子里的列宁格勒这样责任重大的题材，是不能允许的。

Д. 波利卡尔波夫

1945年2月9日

No02222

## 塔拉先科夫关于《旗》的编辑出版问题 致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5年2月22日)

联共(布)中央书记安·亚·日丹诺夫同志<sup>①</sup>

最尊敬的安德列·亚历山德罗维奇

1944年8月,根据您的倡议,在联共(布)中央召开会议研究文学杂志的状况,并且建立了《旗》的编委会,我也是其成员之一。维什涅夫斯基同志被任命为责任主编,我是他的副手。日常实际工作的全部重担自然就落到我的身上。半年的工作过去了。它们对于杂志各个方面来说是如此沉重,我认为向您讲述一切是自己的党员义务。

我不准备详细地涉及纯生产性的困难,虽然这些困难是很大的(电力不足,印刷厂无尽无休地停工,没有交通工具运输纸张,等等,等等)。

书刊审查程序上的困难远远超过这些困难。和以前一样,有无数的主管部门负责对杂志进行监督。首先,清样寄给书刊总局4份。审阅的有书刊总局的全权代表,高级首长也审阅。可是他们本人又无权批准付印。他们在等着宣传鼓动部的工作人员——叶戈林、奥尔洛夫提出意见,他们也都审阅每一期杂志。与此同时,苏

<sup>①</sup> 本文件第1页上有日丹诺夫的批示:“送亚历山德罗夫同志。塔拉先科夫同志的汇报看来值得注意。为改变目前的状况,能够建议做些什么?日丹诺夫。2月28日。”

联作家协会责任书记波利卡尔波夫同志也审阅每一期，当然，他也要提出自己的意见。

除此之外，所有涉及到军事问题的作品，须送交军事书刊审查机关签署意见；所有与国外题材有关的作品，送交外交人民委员部书刊处签署意见；所有关于海军的作品，送交海军书刊审查机关。结果形成了多层次的监督，简直是使杂志止步不前了。常常有这种情况，一部作品经军事审查机关通过了，却被书刊总局给撤下来，而得到外交人民委员部肯定的，却引起宣传鼓动部方面的反对，于是也被撤掉。

也还有这样的情况：一期杂志已经印好，可是开始重新审阅，建议从已经准备发行的杂志中抽掉某些东西。例如已故作家艾芬季·卡皮耶夫优秀的前线札记和批评家 A. 马茨金关于爱伦堡的文章就是如此。刊登这些作品的第 7-8 期合刊出来之后，Г. Ф. 亚历山德罗夫把尼古拉·吉洪诺夫、波利卡尔波夫同志和我叫去，“建议”把这些东西从准备就绪的这一期抽掉。

亚历山德罗夫同志说：“否则你们将遇到很大的麻烦。”

不知为什么他在艾芬季·卡皮耶夫的作品里看出了“对战争的神秘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解释”，而把关于爱伦堡的文章从准备就绪的这一期里抽掉，是因为马茨金称赞爱伦堡，用亚历山德罗夫同志的话来说，“不对劲儿和不是地方”。

抽掉旧的和加进新的材料，这一过程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花费数万卢布。

在苏联作家协会责任书记波利卡尔波夫同志的坚持下，从下一期杂志中撤掉了作家 Л. 乌斯宾斯基关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的几篇短篇小说。

第 11 期引出了许多困难（直到今天尚未解决），我们在这一期里刊登了英国共产党员作家詹姆斯·奥尔德里奇的优秀长篇小说

《海鹰》的前半部（关于希腊人民1940年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起初，书刊总局和宣传鼓动局都已批准刊登这部长篇小说。后来，醒悟过来了，要求外交人民委员部签署意见。虽然这一期已经印好，我们呈请外交人民委员部签署意见并且得到批准。洛佐夫斯基同志也批准刊登这部长篇小说。然而这一期问世两周之后，维辛斯基同志要去了奥尔德里奇的长篇小说以便重新审查。给他寄去了已经问世的第11期以及第12期的大样。与这部长篇小说相关的问题，从而也就是与两期杂志相关的问题，还悬而未决。

我们在第12期要刊登И.谢尔文斯基的剧本《立沃尼亚战争》（关于伊凡雷帝）。这一期已经由书刊总局批准付印，可是过了3周以后，宣传鼓动部的叶戈林同志却要求对剧本进行补充修改。伊凡雷帝在盛怒之下用牙咬铁链子并且使用鞑鞑语的骂人话“见鬼”，他觉得这是不能允许的。与此同时，叶戈林同志从这一期中撤掉了西尔伯法布教授的文章《亲德国的新和平主义》。这篇文章批驳了维护德国人的英国记者布列斯菲尔德，曾经得到洛佐夫斯基同志赞同。叶戈林同志声称这篇文章在克里米亚会议之后显得陈旧了，但我觉得其基本思想——为从道德上和政治上彻底粉碎法西斯主义而斗争——即使在今天也还有现实意义。

1945年第1期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决定在这一期上刊登薇拉·英贝尔在列宁格勒整个被困期间的日记。可是波利卡尔波夫同志不喜欢这部日记。他建议编委会撤掉它，因为他认为这篇东西内容太狭窄，是属于个人的。编委会不同意波利卡尔波夫同志的意见，第二次做出决议刊登薇拉·英贝尔的日记。于是波利卡尔波夫同志把薇拉·英贝尔叫去，建议她本人拒绝发表日记。薇拉·英贝尔没有退让。波利卡尔波夫同志向宣传鼓动部告状。我们这一期的大样在那里扣压了两周多的时间，翻来覆去地审阅，最后终于同意对薇拉·英贝尔的日记进行删改之后刊登。

在《旗》新编委会半年的工作期间内，诸如此类的例子积累了数百个。

结果是每一期杂志生产周期都长达3~4个月。杂志拖延出版这种丢人的事已经变成了慢性病。现在是2月末，可是去年的12月号至今还没有印好。

我恳切地请求您，安德列·亚历山德罗维奇，允许我去面谈，让我更详细地向您讲讲杂志的状况以及那种无限度的谨小慎微和交叉监督体系，这非常影响我们杂志的工作。1944年8月建立的编委会的确是有威望的，的确是有工作能力的。它甚至在生产困难的条件下也能出版一本有意思的、有战斗性的、能按时出刊的文学杂志。编辑部的手头有一系列质量好的、有鲜明特色的文学作品，可是在目前这种状况下，它们何时才能问世——无从知晓。

我恳切地请求您的帮助，安德列·亚历山德罗维奇。

致以同志式的敬礼

《旗》副责任编辑 A.塔拉先科夫

工作电话：KO 52.93

家庭电话：И 3-10-20 转 241

№02223

## 爱伦堡关于在《真理报》受到批评

### 致斯大林的信

(1945年4月15日)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sup>①</sup>

我不得不为一个涉及我个人的问题占用您在这些伟大的日子里的时间，我感到很沉重。读过Г.Ф.亚历山德罗夫的文章<sup>②</sup>以后，我思考了自己在战争年代的工作，没有看出自己的过错来。我不是政治工作人员，不是记者，但我却把全副身心都奉献给了报纸工作，履行自己的作家义务。在4年的过程中，我每天都写文章，愿意把工作进行到底，直至胜利，到那时我就能够回到小说家的写作上来了。我表达的不是某种自己的路线，而是我们人民的感情，别的一些在政治上更负责任的人也都这么写。无论是编辑们，无论是报刊处，都没有对我说过我写得不正确。就在指责我的那篇文章出现的前一天，《真理报》[出版]社通知我，他们要再版《够了》这篇文章，大量发行。

《真理报》上的文章说，一个反法西斯战士号召逐个地消灭德国人民，这是不能理解的。我没有号召这么做。在侵略者践踏我们土地的那个年代，我写过，应该打死德国占领者。可是即便在那个时候我也强调，我们并非法西斯，与摧残是格格不入的。而从东普

<sup>①</sup> 本文件第1页有波斯克列贝舍夫签署的意见：“送马林科夫同志。波[斯克列贝舍夫]。”

<sup>②</sup> 指亚历山德罗夫1945年4月14日在《真理报》发表的批评爱伦堡的文章。

鲁士回来以后，我在一些文章（《正义的骑士》等）中强调，我们对待普通居民与对待希特勒分子有所不同。我的良心是纯洁的。

在胜利的前夕，我在《真理报》上看到了对我的工作的评价，使我深感痛心。您能理解，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感受到什么滋味。文章是刊登在党中央机关报上的，自然而然地在我的周围造成了一种受谴责和在精神上被孤立的气氛。我相信您的公正，因此请求您决定我是否应该受到这种对待。

我也请求您决定我是否应该把政论作家的的工作坚持到胜利，还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应该中断它。

请原谅我用个人的事打扰您，也请您相信，我由衷地忠实于您。

И. 爱伦堡

1945年4月15日

## 【专题说明】

# 战后苏联的文学战线

(1945年7月至1946年10月)

本专题收录的文件反映了联共（布）中央意识形态部门直至斯大林对战后苏联文学的监督和控制，涉及的主要问题有：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及其下属的文学部对苏联作家思想情绪的分析和报告；对一些作家及其作品的审查、批判和斗争；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事件的前因后果，其中包括上述问题发生的背景、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的速记记录及决议文本、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作家大会上的报告提纲、对日丹诺夫报告的反映等。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熊建国、卢康华翻译）

№02224

吉洪诺夫、波利卡尔波夫  
关于更换《十月》杂志主编  
致马林科夫、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5年7月12日)

联共(布)中央书记  
格·马·马林科夫同志  
安·亚·日丹诺夫同志<sup>①</sup>

《十月》杂志编辑委员会中形成了一种极端不健康的状况，影响工作。

编委会成员之间没有相互谅解。编辑部责任书记尤诺维奇<sup>②</sup>同志没有表现出促进编辑部状况健康化的愿望。更有甚者，她以不正确的态度对待编委会成员，从而加重了不和。尤诺维奇不考虑作家—编辑委员会成员们的意见。

再也不能容忍编辑部的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了。为了在《十月》杂志编辑部工作中建立必要的秩序，我们呈请联共(布)中央任命Ф.И. 潘菲洛夫同志为杂志的主编，Ф.И. 潘菲洛夫、Б.Н. 波列伏伊<sup>③</sup> (副责任编辑)、В.И. 伊利延科夫、Ю.Б. 卢金<sup>④</sup>、П.А.

① 本文件第1页上有日丹诺夫的批示：“送亚历山德罗夫同志。审阅并向中央提出建议。日丹诺夫。”

② М.М. 尤诺维奇(1899—1976)，文学评论家。

③ 波列伏伊，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1908—1981)，原姓卡姆波夫，作家，社会活动家。

④ Ю.Б. 卢金(1907—?)，作家。

巴甫连科、A. A. 佩尔文采夫<sup>①</sup>、С. П. 希帕乔夫<sup>②</sup>等同志为新的编辑委员会成员。

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 H. 吉洪诺夫  
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 Д. 波利卡尔波夫  
1945年7月12日

---

① 佩尔文采夫，阿尔卡季·阿列克谢耶维奇（1905～1981），作家。

② 希帕乔夫，斯捷潘·彼得罗维奇（1898/1899～1979），诗人。

№02225

## 尤诺维奇关于《十月》编委会工作 致日丹诺夫的信

(1945年7月14日)

亲爱的安德列·亚历山德罗维奇<sup>①</sup>

我不得不就《十月》杂志目前的处境问题打扰您。

联共（布）中央的决议责成各文学杂志的责任书记改进编辑委员会的工作，可是现在在《十月》杂志里并没有贯彻执行。

下列同志进入杂志编辑委员会：B. П. 伊利延科夫、И. А. 巴甫连科、Ф. И. 潘菲洛夫、И. В. 沙莫里科夫<sup>②</sup>、С. П. 希帕乔夫、М. М. 尤诺维奇。在他们中间：沙莫里科夫同志从战争开始到现在一直在红军部队里，巴甫连科同志从1944年秋开始不参加工作，吸引他回来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潘菲洛夫同志将返回莫斯科参加编委会的工作，他提出的条件是：从杂志的领导中把巴甫连科同志清除出去。

这样一来，我就应该协调留下来的几位编辑委员会成员的工作，他们是：伊利延科夫、潘菲洛夫、希帕乔夫同志。但只是在诗歌方面达到了这个目的——在组织、评价、讨论诗歌作品方面得到希帕乔夫同志很好的帮助。可是我跟伊利延科夫和潘菲洛夫却不能达到协调一致，因为在评价许多作品和解决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存在

<sup>①</sup> 本文件第1页有日丹诺夫的批示：“送亚历山德罗夫。日丹诺夫。1945年7月21日。”

<sup>②</sup> И. В. 沙莫里科夫（1899—1976），《十月》杂志责任书记。

着尖锐的分歧。举几个例子。

讨论 A. 科普佳耶娃<sup>①</sup> 的长篇小说《培养感情》和 C. 谢尔盖耶夫 - 岑斯基的关于 И. 列宾的回忆录之后，编辑委员会分裂了。潘菲洛夫和伊利延科夫同志坚持要刊登科普佳耶娃的长篇小说。其内容——是一出家庭悲剧，丈夫背叛了妻子，然后冲突解决。这个难于驾驭的题材对最关键的时刻描写得软弱无力，小说歪曲了我们知识界的智力和道德水平，有些地方给人造成下流作品的印象。刊登这部作品，意味着降低杂志的文学艺术水平。潘菲洛夫同志坚持刊登 C. 谢尔盖耶夫 - 岑斯基关于列宾的回忆录。这篇回忆录里有直接的反革命言论：关于 1905 年革命，关于流亡的白卫作家什梅廖夫、扎伊采夫、列米佐夫、奇里科夫等，说由于他们流亡国外，“文坛荒芜了”。列宾被表现成一个狂妄的老人，一个作画时像鸟鸣一样不假思索、没有任何社会性构思的艺术家。未必需要证明，这样描写列宾是对伟大画家的诽谤，暴露了谢尔盖耶夫 - 岑斯基本人的丑恶。

潘菲洛夫同志不同意我的理由，在讨论科普佳耶娃和谢尔盖耶夫 - 岑斯基的作品之后便不再来杂志编辑部，拖延刻不容缓的问题的解决，给事业带来不小的损害。

我只是举了几个例子，不希望扰乱您的注意力，没有列举许多别的例子来说明潘菲洛夫同志对待年轻作者的稿件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些稿件本来是他推荐刊登的，但他却不要求他们进行相应的加工。

我于 1944 年秋接到指示与现在的编委会共事，为此尽了一切努力。我对潘菲洛夫同志本人的长篇小说《为和平而战》付出了巨大劳动，努力修正其思想政治错误。这部作品写得漫不经心，很粗

<sup>①</sup> 科普佳耶娃，安东尼娜·德米特里耶夫娜（1909~1991），作家。

糙，我把它加工到可以接受的文学水平。

潘菲洛夫和伊利延科夫声称，他们是杂志的“主人”，而我是“仆役”，因此应该服从他们的决定。可是执行他们的决定，则意味着杂志上出现有害的作品和杂志的文学艺术水平急骤下降，从而破坏联共（布）中央指示的实质。在这方面不能让步，不能以这种代价达到和谐一致和专给别人看的和睦。

我曾请求苏联作家协会的支持，可是吉洪诺夫同志一次也没有和我谈过杂志的状况，而波利卡尔波夫同志用一些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话来敷衍搪塞，直到最近一个时期还不认为有必要跟我谈谈编委会的工作。而杂志的责任书记不能经常扮演一个难以共事的人和经常请求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解决杂志的冲突的祈求者的角色。关于编辑委员会的分歧，我报告了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叶戈林同志和费多谢耶夫同志。

然而，杂志有自己的积极作者队伍，我们许多知名的和年轻的作家与杂志结下了友谊，很乐意参加它的会议和在这里发表作品，他们是：列奥尼德·索博列夫、Вал. 卡达耶夫、Арк. 佩尔文采夫、Ф. 革拉特科夫、Вас. 格罗斯曼、В. 卡维林、Бор. 戈尔巴托夫、В. 华西列夫斯卡娅、Вал. 科热夫尼科夫、В. 奥维奇金、С. 马尔夏克、С. 米哈尔科夫、Мих. 伊萨科夫斯基、Анат. 索夫罗诺夫、Арк. 库列绍夫、М. 雷利斯基、С. 奇科瓦尼；军事特写作家——Б. 波列伏伊、В. 韦利奇科；批评家——Л. 苏博茨基、В. 佩尔佐夫、М. 格尔凡德、В. 亚历山德罗夫、Д. 扎斯拉夫斯基、М. 罗森塔尔、Е. 乌西耶维奇等。М. 肖洛霍夫答应把自己的新作品提供给杂志。杂志与学者、苏联技术的杰出活动家、设计师 А.С. 雅科夫列夫和 В.Г. 格拉宾建立了联系。

杂志的日子过去和现在都很艰难：我们挤在两个房间里，同时还有许多文学家访问杂志编辑部。我们没有印刷厂，严重影响杂志

的出刊，但是有可能成功的保证，即杂志集体与作家集体的友好合作。

我曾经犯过严重错误——刊登了 M. 左琴科的中篇小说《日出之前》，在杂志的工作中有不少缺点。只是坚信潘菲洛夫和伊利延科夫同志的评价不正确——服从他们的决定可能导致更大的错误并且使杂志落后——我才给您写信，安德列·亚历山大罗维奇。您是否认为有可能指示有关人员熟悉一下有关造成分歧的原因的那些材料？近几年来，杂志周围形成了一个作者集体，他们爱上了杂志，您是否认为有可能从他们中间挑选一些人建立《十月》新的编委会？

亲爱的安德列·亚历山德罗维奇，请接受热情的敬礼和良好的祝愿，祝您健康。

杂志责任编辑 M. 尤诺维奇

1945年7月14日

№02226

## 叶戈林关于战时苏联文学状况

### 致马林科夫的报告

(1945年8月3日)

联共（布）中央书记格·马·马林科夫同志

受您的委托，呈上与苏联作家出版社给联共（布）中央组织局的报告有关的文学材料。

苏联作家的绝大多数与全体人民一起参加了战争。卫国战争期间，涌现了一批符合人民思想愿望的重要作品。苏联人在战争期间精神上成熟了，道德上受到了锻炼，苏联作家们的生活经验也丰富了。许多作家目前正在写作大型作品。肖洛霍夫正在写作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法捷耶夫正在完成中篇小说《青年近卫军》。B. 格罗斯曼正在写作长篇小说《斯大林格勒》，Л. 索博列夫将发表长篇小说《绿光》。文学界现在涌现出一批在此之前尚不知名的新人：卡利宁（长篇小说《在南方》）、奥维奇金（中篇小说《致以前线的敬礼》）、诗人扎哈尔钦科、古德坚柯、尼古拉耶娃等等。

有一切根据可以期待苏联文学新的高涨和繁荣的到来。在战争结束以后召开的全体会议上，苏联作家们宣布，他们有丰富的印象并希望在艺术创作中把自己的经验体现出来。可是，如果以为光是凭借直接的经验、经验主义的观察就能创造出伟大的人民的文学，那就错了。如果不能深刻地历史地理解卫国战争的各种事件的相互联系以及多方面的发展，那只能写出肤浅的、价值不高的作品。惟有艺术家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武装起来，才能洞悉生活现象的本

质，看到其运动和发展的源泉和前景。

然而，某些作家在思想上的落后和在哲学上的一知半解导致他们去构造杜撰的非科学的有害的“理论”。譬如不久以前（1945年4月6日），共产党员作家И. 谢尔文斯基在讨论艺术问题的全俄会议上发言时宣称，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目前艺术面临的任務之間存在着矛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框束缚着当代艺术，因此应该用社会主义象征主义来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了给自己的观点寻找根据，这位作家把所有的俄国古典作家宣布为象征主义者，而普希金，按照新出现的“理论家”的断言，是“象征主义的顶峰”。社会主义象征主义“理论”的炮制者接着断定“当代苏联戏剧的危机”。危机的原因似乎是在于剧作家们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狭窄框框给束缚住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限制了他们的创作能力。毋庸置疑，想要重新审查我们美学的基本原理的企图是错误的和反动的。苏联作家们应该用真实的和最现实主义的形象为我们的人民和全世界表现出我们胜利的源泉。

很遗憾，我们某些作家没有站在这些任务的高度上。在战争最困难的各个阶段，他们本来应该表现苏联社会的先进部分，在道德上使人民坚定起来，号召人民争取胜利，可是他们却自己陷入惊慌失措，悲观沮丧。一些人被困难给吓住了，在1941—1942年间撒手不干了，什么都没写。例如，К. 费定、Вс. 伊万诺夫、В. 卢戈夫斯科伊在这几年没有发表一部文学作品，“苟且偷安了”。另一些人创作的作品加剧了苏联人本来就很沉重的感受。Н. 阿谢耶夫、М. 左琴科、И. 谢尔文斯基、К. 楚科夫斯基创作了没有思想性的、有害的作品。阿谢耶夫在诗中诽谤性地描写了我们苏联的后方，把劳动者的生活表现成“鄙俗的生活”、“亚洲式的野蛮”和“愚昧”。在战争最困难的各个阶段，这些作家忘记了自己作家的义务，忘记了自己在人民面前的责任。

某些苏联作家离开了我们的意识形态，开始重新审视对现实、对社会关系的苏维埃观点。在整个乌克兰被德国人占领的年代里，多夫任科在电影脚本《战火中的乌克兰》和中篇小说《胜利》中指责苏维埃政权与阶级敌人斗争的政策，说这种斗争似乎是分裂了人民，使他们忘却了民族感情和民族思想。作家 H. 什潘诺夫在剧本《嵌有相片的饰物》中企图把沙皇军队上层军官理想化，号召苏联指挥员在义务和荣誉感方面向旧军官学习。

B. 维什涅夫斯基在未刊印的剧本《列宁格勒城墙下》中描写了一个从前的白卫军分子、公爵，现在的后备役指挥官。当德国人已经到了列宁格勒城墙下的时候，他来找一个苏联共产党员军官。他自称“像许多别的人一样，其中包括大人物，是个犯过错误的俄罗斯人”。这个从前的白卫军分子在维什涅夫斯基那里成为一个正派的、高尚的爱国主义者。他教训布尔什维克要憎恨德国人，他的憎恨看来比布尔什维克更是本性所固有的，因为他所有的祖先都跟德国人斗争过。“我已故的父亲，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公爵说过，‘你们得留心德国，要留心’。”这个以前的公爵埋名隐姓生活了 25 年，共产党员军官对他的夸夸其谈和教训回答说：“您为什么没有在 20 年代就来找我们呢？您可真是个怪人。”

苏联作家出版社 1945 年出版了 E. 雷斯在思想上有错误的书《在城门旁》。

曾经及时地给苏联作家出版社下达了指示：对叶夫根尼·雷斯的中篇小说《在城门旁》必须进行本质的改动，可是该社只局限于一些微不足道的修改。雷斯的书反映了作者在战争初期惊慌失措的情绪。书的主人公是个 15 岁的少年工人，却被赋予了一个被吓得要死的知识分子的心理：“我直到现在还记得那种痛苦的无限悲伤的感觉，这种感觉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我”（第 28 页）；“……悲伤几乎把我弄到恶心的程度，生理上感觉到虚弱和头晕”（第 30 页），

如此等等。在危险的时刻，雷斯的主人公的行为举动像是一个可怜的胆小鬼：在遭到扫射的时候，把同志抛在荒野；分发武器时也给了他一支步枪，他对此害怕得甚过世上的一切；在德国人进攻的时刻里，“将要发生什么事他都无所谓了”，等等。这个15岁的无骨气的可怜虫在战争最紧张的日子里无所事事，完全陷入忧愁的预感而不能自拔，这个形象跟我们的少年一代实际的心理状态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雷斯饶有兴味地沉醉于分析主人公在怯懦、恐惧、惊慌失措时的灵魂，一旦他们克服了这些感觉，他也就对他们失去了一切兴趣。在《德国人的游乐场》的几章（第129—141页）里，作者详尽地描绘了工人营的战士在德军空袭时所感到的恐惧，渲染了这种动物式心理的各种细枝末节。按照雷斯的描写，人们在遭到空袭时变成了羊群。铸工们离开了塹壕，“没有思想，没有判断，没有力量抗拒逃跑的愿望”。（第136页）“我们没有明白德国人开始进攻了。可是即使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反正我们也是完全无能为力，只能无意义地呆呆地等待着。”（第139页）“我看见一些苍白的和麻木的面孔、无力地垂下来的手臂、失去了视力的暗淡无光的眼睛。我站起来。将要发生什么事，我已经不在乎了……我冷漠地想道，现在德国人就要渡河了，越过塹壕，占领城市……我的想象不能再往前走了，我的思想萎靡了，我感到无所谓了……”（第140页）作者使用大量笔墨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一个人如何在恐惧的影响下甚至想要钻进地下，丧失了人的面貌。可是他完全没有揭示是什么力量帮助人们从地上站起来，打退敌人的进攻。假如相信雷斯，这时主宰战士们的只是纯粹的机械动作，还有指挥官的叫喊：“快，快，”卡尔梅科夫说，“还躺着干什么。”（第139页）“卡尔梅科夫又走过去了，不知为什么谩骂着。人们走向掩体，把枪放到胸墙上。”（第141页）雷斯在卫国战争的第一阶段看到的只是混乱、惊惶和无政府状态。

列宁格勒的文学杂志《星》刊登了弗拉季米尔·利夫希茨、米哈伊尔·杜金、弗谢沃洛德·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奥莉加·别尔戈利茨等当地诗人的一系列充满苦难、死亡和绝望情调的诗作。譬如《星》1944年第3期刊登了利夫希茨的《反坦克壕》一诗：

“一场肉搏在战壕里结束，  
死者的躯体横躺竖卧。  
尸体堆成了一片，  
把战壕分成两段。

子弹在空中呼啸，  
犹如数不清的蜜蜂，  
噼里啪啦地打在  
夜间冻僵的尸体上……

晚点名时没有站起来，  
死后还在威胁着敌人！

躺在冰冻的连接部位，  
他们是我的战友。  
他们相互抱在一起，  
机枪扫射着躯体……  
我也想要这种荣誉，  
当轮到我的时候！

夜间在战壕里悄悄地走，  
你满可以准备好战斗，

你得以完好无损，  
全凭我死后把你掩护。”（第38页）

另一个诗人M. 杜金在长诗《十字路口的篝火》的前言（《星》1944年第1期）中思考我们苏联青年及其在卫国战争日子里的命运。他描绘了一幅阴郁的绝望画面：

“一条小径爬上山坡，  
青草里有几颗发黄的骷髅，  
战壕里长满了飞蓬，  
弹坑里积着铁锈色的水，  
青春在这里永远悲哀，  
小径难行并且到了尽头。

……

我了解一切。我啃过士兵的面包。  
我见过太多痛苦。我丧失了视力。  
我已经不再相信复活。  
进入没有刨光的棺材之前，  
我用任何尺度都无法衡量  
犹如腐水一般的痛苦和哀伤。  
我的朋友们，我的同志们！  
对于你们来说战斗已经结束！  
你们已完全清账。你们已不欠什么。  
只有良心告诉我‘不要熄灭  
烧焦的心灵的炽热的光，  
你在这里只身一人’。垂柳  
在坟墓中间不摇晃枝叶。

噢，这宁静的空气多么可爱！  
我不想把它的宁静破坏。”（第 15 页）

青年诗人 A. 梅日罗夫描写列宁格勒被围困的诗《在边界上》（《旗》1945 年第 5-6 期合刊）也充满这种情绪。A. 梅日罗夫在这首诗中断言，在卫国战争期间，

“从忘川里流出这样一些  
字眼儿，  
如卖淫、  
肺结核、  
封锁。”

接下去，他固执地多次重复同一个调子：

“我将死于哪次战斗？  
哪块土地将把我埋葬？  
被围困之夜！  
你讲讲，  
我将死于哪次战斗？  
哪一段俄罗斯的边界  
将由于  
我的骸骨  
而巩固？”（第 28，30 页）

玛尔加丽塔·阿利格尔写了大型长诗《你的胜利》。长诗的片断曾在广播电台播出，长诗全文计划刊登在《旗》1945 年第 5-6 期

合刊上。长诗里存在着一系列严重的政治错误。例如，阿利格尔讲到1942年夏季的情绪和感受时写了如下一些诗行：

“……我的优秀的人民，我的勇敢的人民，  
怎么弄成这样，为何竟是这样？  
我想要一个简单的答案，  
根据权利我应该知道。  
我不希望放弃罗斯托夫，  
不希望让敌人渡过顿河。  
我由于阴晦的天气而难过，  
能想出什么办法？还不算晚。  
怎么办？矿泉水……  
难道这可能吗？威严的……”

接下去，阿利格尔对虚假的、她杜撰出来的关于苏联人民、特别是莫斯科人对所发生的事件无动于衷、漠不关心的态度表示不满：

“……曾经长满粮食的田野  
如今变成了厮杀的战场。  
为什么天空能够容忍？  
它这般湛蓝是为谁人？  
我们凭什么活着，用什么  
来回答未来的几个百年？  
为什么人们容忍这些？  
他们怎么能与此共处？  
要知道他们不断地听到

炮弹的呼啸、呻吟和诅咒。  
而他们照常吃饭，呼吸，  
开玩笑，争论，交换衣裳。  
多多少少已经习惯，  
甚至这样也能忍受。  
最好在莫斯科能发出警报！  
没有警报也就不会有安宁。”（第33页）

众所周知，H. 阿谢耶夫曾经由于在《雷鸣的年代》一书中对苏联人民进行诽谤而受到我们整个社会舆论界的谴责。M. 阿利格尔在这里却跟他一唱一和。

另一个场面也是非常能说明问题的。玛尔加丽塔·阿利格尔首先写道：

“秋天我去了卡马，  
一个遥远的鞑靼小镇。  
妈妈被疏散来到这里，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她。”

然后，她跟阿谢耶夫一样，沿着同一条路线旅行，讲述了自己的旅行印象：

“……我记得我在卡马河口睡醒，  
轮船从伏尔加驶进卡马。  
……  
轮船上满是快乐的要闹，  
码头上一片喧哗和忙乱。

经历了战火，也见过世面，  
受到过敌人的伤害和摧残，  
来到故乡的土地寻求保护，  
伤残战士踏上亲切的河岸，  
依靠拐杖也还不能站稳。  
一群风华正茂的孩子  
健康有力地走来迎接他们。  
忽然河岸上有人哭喊，  
跟随着向他们伸出手来。”

M. 阿利格尔一边“观察”一边发表如下的议论：

“噢，时间的联系伟大而又直接，  
世世代代都无法把它根除。  
从成吉思汗和马迈的沉网岁月开始，  
就是在这卡马河的河岸，  
健壮的体魄和黑脸膛世代相传。  
唱歌和劳动都很欢快，  
哭丧妇用同样的声调放声大哭，  
把仪式跟心灵的冲动联系起来。  
卡马河平缓的岸边，世世代代  
不变换眼睛的表情，  
举行仪式、哭诉并且相信——  
这一次已经是最后一回。  
这就是给人们留下来的一切，——  
告别，相信，含糊不清地说话……  
这一切被称作为历史，

实际上惟有它才正确。”（第 25 页）

M. 阿利格尔回忆起前几个五年计划，她宣称：

“我们知道什么？全体突击和惊惶不安，  
还有装着一切的心扑通扑通地跳。  
动员的路程十分遥远，  
分离的预感令人痛苦。  
我们唱着歌分手握别，  
直达，中转，火车行驶在  
漫长的俄罗斯路途上，——  
白茫茫的原野上空有一颗洁净的星。

……

我们这一代人这样急于  
迎接不可避免的战争。”（第 13~14 页）

M. 阿利格尔在长诗的结尾写到战胜敌人以后等待着苏联青年  
的是什么。她断言：

“未来是清一色的日常琐事，  
需要付出许多力气和长期劳动。  
需要许多信念和勇气，  
才能够把这劳动完成。  
音乐停了，旗帜落下……  
降临了新的苦难……  
……未来还有酷暑和严寒，  
千万次负伤和遭受损害……”（第 38 页）

长诗《你的胜利》是这样结束的：

“不会有持续不断的节日，  
我们把它推迟了多年。  
我们在途中，在行军，在进攻。  
远方的战火熊熊烧。  
准备好，我们这一代人，  
长久地勒紧皮带吧。”（第38页）

不久以前，H. 阿谢耶夫把自己写于1942~1944年的长诗《胜利的火焰》交给《旗》编辑部发表。作者在这篇长诗里谈了许多问题：关于战前苏联的社会生活，关于战争的最初几个月、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战役，对美国、对战后的世界进行了议论。H. 阿谢耶夫用市侩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事件。他评价战前的和平生活是根据晚会、足球比赛、时装商店等等。阿谢耶夫把德国人在莫斯科城下的溃败看做是靠着严寒的冬季而实现的奇迹。他崇拜美国，热情地描写它的民主秩序，幻想着未来某种荒诞的福音书中的生活，那里将要“为各国的合作制订一个生产计划”。

阿谢耶夫谈到战争的原因时写道：

“只需要一件不足道的小事，  
一个狂人野蛮的跳跃，  
这种生活的苹果枝就会折断，  
大火的灼热就会把树皮烧焦！”（第9页）

长诗的第6和第7章（《各个大陆之间心平气和的谈话》）是描  
— 248 —

写美国的，用这样的话开始：“在合众国生活很好……”H. 阿谢耶夫对林肯、罗斯福和丘吉尔、大西洋宪章赞叹不已：

“从那时起  
这一支歌  
就让敌人胆寒：  
‘我们跟随着您，  
祖先亚伯拉罕！’  
听到这个名字，  
人们容光焕发，  
高唱热爱自由的国歌，  
奋起与敌人斗争。  
岁月流逝，  
年复一年，  
而自由的斗士  
却活在记忆里。”（第54～55页）

“写了许多颂歌，  
赞颂各种各样的  
自由：  
集会自由、  
决定自由、  
敢作敢为的自由、  
采取行动的自由。  
可是您说的话：  
关于恐惧的自由，——  
迫使死者的遗骸

站立起来。”（第59页）

“这场战争的  
两件大事  
同样高尚地  
永垂青史。  
一件  
大西洋宪章  
如百万克拉钻石，  
光芒四射，  
另一件——  
在我们苏维埃  
国家  
短暂而庄严的  
十月阅兵式。”（第60-61页）

“凶猛的敌人  
疯狂地企图  
用钢铁的巨轮  
把一切碾碎；  
罗斯福和邱吉尔  
走进船舱，  
决定世界命运。”（第61页）

“……两位天才  
相互握手，  
仿佛是在

完成功勋。”（第 62 页）

H. 阿谢耶夫这样表现未来的世界：

“你们有亚伯拉罕，  
我们有约瑟夫；  
心连着心，  
架起一座桥梁，  
跨越死亡，  
跨越腐朽，  
超越黑暗，  
跨越毁灭。  
让我们来创造  
一部新的福音。

圣经中两个  
始祖的名字，  
在晴空中辉煌眩目，  
让世界发出光辉。”（第 55—56 页）

“这一决定  
不可动摇，  
共同抬起  
空前的重担，  
我们的胜利——  
是人们的和谐一致，  
它将走向

永久的同盟。”

“将会制订一个  
生产计划，  
为了所有国家的  
相互合作……”（第62页）

最后，我认为谈谈下面的情况是适宜的：作家中间不少人谈论来自书刊审查人员和编辑方面的压制，认为这些人决定着文学作品能否问世。一个剧本在刊印或搬上舞台以前应该通过下面这些机关的审查：剧目委员会、艺术事务委员会、共和国管理局、“艺术”出版社、书刊总局、军事或海军书刊审查机关。这些机构中的每一个都要对剧本进行修改或者要求作者改动原文。

书刊审查机关或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本来应该从原则上判断艺术作品的思想本质，可是有时所做的修改具有对作者吹毛求疵的性质。有些书刊审查人员企图把剧本或长篇小说改成决议，而不考虑这是艺术作品，修改可能破坏作品的完整性，降低感染力。作家们对书刊审查人员和编辑的意见有一部分无疑是正确的。很遗憾，我们有些编辑粗暴地和无知地对待文学创作问题。然而，这未必能成为一些放肆的言论的理由，如《旗》主编、党员维什涅夫斯基同志在作家协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维什涅夫斯基同志在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是极不妥当的，他实际上是要求资产阶级的言论自由。维什涅夫斯基同志声称：

“我在这个冬季和春季在莫斯科各种会议上做了数次发言，在发言中涉及到一个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很现实的问题——言论自由。成千上万的人都正确地理解了我所说的、我所维护的、我所想的和我所赖以生存的东西。而我谈的正是斯大林宪法的基本条例。”

接下去，B. 维什涅夫斯基异常混乱地解释他说的“言论自由”

指的是什么。言论自由，“这是对自己的最高要求。如果你有困难，你就发表见解，就和自己斗争。和自己争论，但把你心灵中一切全都倾吐出来——这就是我们的要求。尊重，并且深深地尊重同志说的话，尊重作家、创造者、艺术家同志的思想感情。想想看，他创作一部作品要付出多大努力。永远从善良的、好的方面来理解他。你得明白，这对你也有好处”。

B. 维什涅夫斯基在全体会议上发言之前，协会主席团举行会议，B. 维什涅夫斯基在这次会议上表现得很有挑衅性，他断言：“我们战斗过，我们斗争过，给我们言论自由吧。”虽然这次发言在作家全体会议上受到一致的反驳，可是维什涅夫斯基的蛊惑性宣传却在文学界留下了一定的痕迹。

这就是能够说明苏联作家最近几年来的情绪的一些事实。

A. 叶戈林

1945年8月3日

№02227

## 利科文科夫关于沙吉尼扬的 言论致波波夫的报告

(1945年8月23日)

联共(布)莫斯科州委和莫斯科市委书记

Г. М. 波波夫同志<sup>①</sup>

### 情况反映

关于 M. C. 沙吉尼扬同志在苏联作家协会党的会议上发言

1945年8月21日,苏联作家协会举行党的会议:讨论联共(布)[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的总结“关于1945年上半年党员发展工作的结果和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组织对共产党员的教育工作。”

1942年的党员 M. C. 沙吉尼扬在这次会议的讨论中没有谈党组织的工作,而发表了如下的见解:

“请注意!我要讲一些我们这里正在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我去了乌拉尔,那里基洛夫工厂15000名工人暴动了,这是真正的暴动,因为条件太糟糕。联共(布)区委和州委只是在暴动时赶巧来到这里才知道了这件事。厂长两个月没到工厂来了。暴动以后,他拨出2百万卢布改善公用设施。给卫国战争的残废军人吃掺假的食

<sup>①</sup> 本文件第一页上有波波夫的批示:“只面交亚历山德罗夫同志。根据约定,送上供了解情况。8月23日。Г.波波夫”。

品。他们在挨饿。

有许多童工在工厂里做工，这些孩子受剥削，累得精疲力竭，会给毁了”（意思还没完）；她向与会者们说：“你们看看，这是什么事？”接下去又说：“我去了阿尔泰，那里发生的事叫人不寒而栗。州委、区委吃得撑破肚皮，吃了工人的口粮，而工人们却在挨饿，一个个像是幽灵，疲惫不堪，精疲力竭。列宁的学说在哪里，斯大林宪法在哪里？”

她继续说道：“我曾在古比雪夫铁路旅行。给你们说一些将军们做的一些令人气愤的事。”她报了站名，说：“一位将军在另一名军人陪同下走进软席车厢。你们都知道，我们当作家的旅行时都乘软席车厢。检查证件，看到一个年轻的妇女，于是建议她把位置给将军让出来。难道这能容忍吗？旁边坐着一位负伤的中校，他把位置给将军让出来了。

哪见过这种事情？这是干什么？我们的将军们四处旅行，到处散心，还受到欢迎和尊敬。我们这里是什么秩序，我们这里在干什么？

即使如此，我们这里还是在写赞歌。但正是这些情况才是我们作家应该看、应该写的。”

沙吉尼扬令人愤怒的非党性的发言本来应该受到谴责，可是却得到一部分（数量不多）共产党员支持，他们给她鼓掌。

在沙吉尼扬之后发言的是列夫·尼古林，他回避了沙吉尼扬的发言。

佐里奇<sup>①</sup>同志在发言中对沙吉尼扬的发言表示同情。

波利卡尔波夫同志发言揭示了党组织工作中以及个别共产党员在自我修养方面、在学习理论和布尔什维克党史方面的缺点。他对

<sup>①</sup> Н.Б. 佐里奇（1899—1959），女作家。

沙吉尼扬的发言做了评价，认为是不正确的和非党性的。可是波利卡尔波夫的发言却没有得到整个党组织一致的支持。一部分共产党员仍然坚持己见，同意沙吉尼扬的观点。

在波利卡尔波夫之后，共产党员罗多夫<sup>①</sup>的发言就是这样。他说：

“沙吉尼扬的发言是号召我们作家如何写和写什么，波利卡尔波夫同志没有正确地理解她。”

会上共有8个人发言。大多数发言者谈得不具体，很空泛。没有涉及到党组织的生活。

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以上情况特向您汇报。

说明：

发言没有全文引用。

对发言没有做速记记录。

如果您允许，我可以当面向您详细讲述党组织的情况。

联共（布）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书记 利科文科夫

1945年8月23日

---

<sup>①</sup> C. M. 罗多夫（1893—1968），诗人，文学评论家。

№02228

亚历山德罗夫、叶戈林  
关于沙吉尼扬在作协党组织会议上的发言  
致马林科夫的报告

(不早于1945年8月23日)

致联共(布)中央书记格·马·马林科夫同志

关于 M.C. 沙吉尼扬同志  
在苏联作家协会党组织会议上的发言

今年8月21日,苏联作家协会党组织会议讨论了联共(布)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的总结问题。列兹尼克<sup>①</sup>同志就全体会议“关于1945年上半年党员发展工作的结果和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组织对共产党员的教育工作”的决定问题作了报告。

1942年入党的联共(布)党员、女作家 M.C. 沙吉尼扬同志作了发言。

她开始发言时先向会议表示,希望开诚布公地谈谈她所进行的观察,并将说出除了对党组织以外在任何地方都没下决心说出的事实。然后指出,虽然作家们的职责是反映真实,但出版物和作家们却又常常以玫瑰色彩来反映现实。沙吉尼扬同志说,她在南乌拉尔

<sup>①</sup> O.C. 列兹尼克(1904—1986),文艺学家。

出差期间知道了一些“惊心动魄的事实”。基洛夫工厂不久前有15000名工人罢工，抗议恶劣的日常生活条件。连共产党员们也参加了罢工。工厂的领导脱离了工人们，厂长两个月没有到厂里来。工人们吃得很糟，住在没有设备的棚子里。只是在“造反”（沙吉尼扬这样说）之后，才拨出200万卢布用以改善住房条件。

沙吉尼扬同志把战时在工业中使用童工称之为“剥削未成年人”，指出这使得他们——其中有许多是病人和残疾人——精疲力竭。她说她是古比雪夫铁路上“令人愤慨事件”的目击者。铁路管理局企图把一位女医生从软席车厢撵出去，只是因为要把座位让给一位将军。沙吉尼扬同志援引了与车厢列车员们的谈话后肯定地说，在这条路上每夜都对乘客进行这种“检查”，因为有好多将军从住在城里的家返回时在古比雪夫火车站上车。

沙吉尼扬同志说，阿尔泰边疆区好多地区的区委会工作人员吃掉了所有的凭单拨给的粮食，而卫国战争的残废军人和居民们却在挨饿。由于这些反常行为，40名联共（布）区委书记被撤了职。

她用激昂高亢的语气叙述了所有这些事实。沙吉尼扬同志在其发言结束时作出结论：“我们很少想到人民”，“作家们看不见真相”。

波利卡尔波夫同志和联共（布）区委书记利科文科夫同志在讲话中正确地批评沙吉尼扬同志的发言是有害的和反党的。

在会上发言的Л. 尼库林同志和佐里奇同志对沙吉尼扬同志的讲话未作出任何反应，而罗多夫同志甚至为她辩护，断言她的结论中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出席会议的一部分共产党员在沙吉尼扬同志发言结束时对她鼓掌。

会议通过的关于联共（布）区委会第5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中没有对沙吉尼扬同志的发言作出任何评价。

所有这些事实说明，苏联作家协会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缺点。

上述情况报请您审查。

Г. 亚历山德罗夫

A. 叶戈林

№02229

## 列兹尼克关于文学评论问题

### 致马林科夫的信

(1945年12月1日)

致联共(布)中央书记格·马·马林科夫同志<sup>①</sup>

亲爱的马林科夫同志!

向您,我们党的领导人之一,提出一个在我看来已经成熟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关于文学评论的状况。虽然我指的主要是文学,但我认为,许多想法在某种程度上也与艺术的其他领域(戏剧、电影、绘画)的状况有关。

关于评论的不如人意已经谈了许多年,对评论的指责形成了某种公式,说文学整体上(或者现时某些体裁)落后于生活,而评论落后于文学。甚至无须争论就可以指出这种说法在逻辑体系上的原则性缺陷。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这样的议论如同某种公理一样根深蒂固,成了老生常谈的偏见。然而,这个“公式”的基础是对评论的本质和作用的不正确的观点。真正的评论不是文学的附属分支,而是文学的一种独立而复杂的体裁。因此它应当不是衍生的,而是跟艺术本身一样与生活直接有关。

关于没有普希金或列夫·托尔斯泰就不会出现别林斯基的令人厌烦的老生常谈并不比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由来已久的争论中的论战花招更多些什么。作家在抱怨任何一篇文章时(这种现象完全常

<sup>①</sup> 在本文件第一页上有马林科夫的批示:“转亚历山德罗夫同志。马林科夫。”

见)。从来不承认他向来反对批评，而总是埋怨没有别林斯基。评论家则针锋相对地进行回击：“你们自己就不是普希金。”实质上，这种文学上的互相争吵是没有分量的。众所周知，俄国评论界的巨匠们甚至对三流的文学现象都善于写得生动、有趣、完美。他们善于在普通寻常的评论中提出重大的具有社会意义的问题，提出某些要求和艺术发展的规律。而我们的评论，甚至对最有声望的苏联作家（如B. 马雅可夫斯基、A. 托尔斯泰、M. 肖洛霍夫）进行评论的著作，也还是描述性的、引证的、平庸的。这里的过错不是艺术创作——不管它有时是如何严重地不完善，而是评论本身。毛病不在于它跟不上文学，而在于评论家们回避对这部或那部作品中最复杂的现实矛盾发表意见，换句话说，他们拒绝以战斗的政论来干预用文字描绘生活的过程。

评论的萎靡不振、保持中立，无疑正在阻碍艺术的发展，虽然另一些艺术家气愤地断言，评论的监护束缚着他们的创作。然而，大艺术家们非常清楚，情况并非如此。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在其六十寿辰那天在苏联作家协会演讲时说，他怀念严肃聪明的评论，批评对作家来说不可或缺。当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指的不是赞扬或者申斥，而是艺术地作出评论。

这样的评论我们的确没有。但要想弄清这种状况的原因并纠正它，一方面需要关于批评的任务和目的的权威提醒，另一方面需要对评论的要求和态度的决定性转变，最后还需要对事情的组织干预，否则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的评论的目的是为了苏联艺术的质量而斗争。思想性、真实性、认识价值、艺术的生动性、精神上的激情——文学的所有这些特性都居于评论家注意的中心。但是无论这类提法怎样正确，对它表面上的遵循并没有产生良好的结果。评论家们写评论文章往往像开药方，按上述各点判分：题材——优秀，思想性——良好，语

言——及格，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如同试味师或者检验员那样行事。可是，要知道，评论家的使命是给艺术以任务，建立关于艺术作品的社会舆论，培养鉴赏力，在读者的意识中确立先进的政治思想和美学原则。评论家应该善于把艺术视为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历史、人们的社会关系、道德准则和心理的艺术反映。对于这一切，评论家应该有自己的态度。这里就不应当害怕主观性，而它是如此地吓坏了我们的报刊杂志的编辑们。看待艺术现象的方法的主观性、评论家的个人风格、他的审美力的特点和水平，完全不会摒弃评价艺术现象的客观性。当艺术家按照他所见到的那样描绘生活，以其对题材、主人公、现实生活的态度在作品中为一切染上色彩时，是有世界观作指导的；评论家也要依据指导艺术家的世界观的那些原理。评论家在其文章中应该像他在艺术中意识到的和想看到的那样描绘生活。

然而，个人的风格在评论中消失了。许多文章的作者避开了它，而编辑部对此不无鼓励。

我的所有这些预备性的议论并非故意的开场白，而是——我觉得——为转入分析我们当前评论状况的必要前提。应该说，联共（布）中央1940年通过的关于文学评论和图书评介状况的决议指出了这一工作安排上的严重缺点，决议至今仍全部保留着它的意义。可是，这一情况本身就说明，在5年期间我们的报刊杂志没有做到，或者说没能实际地执行中央决议提出的结论。最近一年来，《文艺报》分成的两个独立的机构之后，评论活动的阵地扩大了。可是这并未带来根本的转折。中央1940年决议中所写的一切，到今天仍然符合1945年的状况。这一事实说明，评论中出现了多年的停滞。如同任何停顿一样，特别是在我们现实生活条件下，这是倒退。

今天，我们的评论中最严重的缺点如下：

1. 见解统一。通常，对大多数作品只有一个评论或一篇文章。但即便是有几篇评论文章，那也只是同一见解的变体。没有关于作品的争论，没有讨论，没有尝试超出叙述内容再加上不多注释的框框、利用作品来概括发生在艺术中的过程并提出新的问题。

谈到讨论，我们指的决不是政治上的争论。须知就是在共同的世界观之下，无疑也会而且应该发生涉及当前社会政治问题和美学的辩论。

2. 通常，评论已不再履行其最根本的任务——建立关于艺术现象的社会舆论。评论家们主要的工作与其说是建立这种舆论，不如说是试图从大作家那里、从领导国家事务的活动家那里猜测对作品的评价，以便收集这些意见，用某种综合形式介绍出来。

问题完全不在于评论家一定要把自己对作品或作者创作的见解同社会上的议论对立起来。他们的见解可以表达这些议论并且与它们一致。问题也完全不在于某种侮辱性的优先地位，而在于这样的工作方法不正确。在其中可以感觉到为自己留退路的惰性，害怕落个不合拍不合调的名声。这就使得文章失去独创性。这迫使评论家放弃许多悟性。最后，这会导导致不相信自己个人的能力，无助于审美力的养成，无助于获取那种由对艺术本质的忠诚、勇敢和深刻的洞察力而产生的内在威望。

3. 无疑，由于评论变得庸俗了，严肃的、提出问题的文章越来越少了，导致近些年来形成了社会舆论对评论家的不平等态度。对于作家非常友善的鼓励态度有时转变为某种个人的不可侵犯性。有代表性的是，当一家报纸或者一家杂志为作家辩护时（按照他们的看法，评论家对这个作家评价不公正），那么，总是敬重地谈到作家某某人，而评论家的姓名如果被提及的话，就附以“某个”一词。同时暗示，这位“某个”人怕是不敢批评这位某作家。实际上，这导致不良现象。例如，至今在报刊上没有指出谢尔盖耶夫—

岑斯基最近几部长篇小说在历史概念上的本质缺点；西蒙诺夫抒情诗中的谬见和不正确的主题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对费定的关于高尔基的书没有给予有足够深度和原则性的尖锐批评。

在列举这些事实时，我完全不是在埋怨没有骂到某人。我觉得，一个真正的评论家与打算使艺术家丧失声誉、动摇他应有的威望的想法是格格不入的。然而，正因为评论不是分配耳光或者奖金，而是从社会生活发展的观点来审视艺术过程及其活动，所以对错误或谬见的任何掩盖都会妨碍提出对艺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令人有所期待的各种问题，贬低具有教育意义的、思想和政论性的评论。

4. 评论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它的教条主义。评论家试图把自己的每一个见解都用几行引文防护起来。顺便说说，这完全受到各杂志编辑部的鼓励。相反，在文章中如果不习惯于听话听音，而超出社会舆论重复和强调的声调的范围，引起的就不仅仅是警惕，而且还有直接的畏惧。

在编辑部里经常有这样的议论：“最好不要这个。”推测、想象、虚构、幻想，千方百计地被从文章中清除。它们被润色加工，被清除掉论战的尖锐性。结果，书评和文章成了公益广告。实际上这是内容的转述加评价：“好”，“坏”。而且“好”被大量溢美的修饰语表达，“坏”用否定的形容词加压。

教条主义表现的最严重之处是对文学中反映的各种矛盾避而不谈。通常，编辑部竭力要求评论家选取个别事例进行分析，而不是综合和对比各种各样的艺术现象。许多长篇大论甚至专著都变成了作家的优点清单，那里一切全都是人民性的、民主性的、天才性的。这已经成为一再重复的陈词滥调。一句话：“所有的猫都是灰色的”。这样的带有偏见的赞扬妨碍理解产生艺术家的历史进程的特殊性，妨碍理解历史进程的演进，往往也妨碍看出其中先进的革

命思想影响的作用。例如，写阿·托尔斯泰的评论家们，避而不谈他的复杂的创作道路，他的侨居时期。而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在迎接革命时已是一位成熟的艺术家，写了许多表现其世界观和对艺术的态度作品。阿·托尔斯泰如何摆脱了他的艺术迷误，像他那样的人是如何走向真正的苏联爱国主义的，这难道不是特别有趣和重要的吗？众所周知，阿·托尔斯泰是最先结束侨居生活回国的人之一，他在理解俄国人民历史命运的过程中走过了异常复杂的道路，这一点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例如以彼得为题材的作品，从小故事《拷刑架上》开始，到历史长篇小说《彼得大帝》结束。

这仅仅是一个个别的例子。也可以说说马雅可夫斯基的演变。对伟大作家和艺术家创作的各方面矛盾的真正分析将能表明苏联及其意识形态所取得胜利的深度和力量。这不但不是对艺术家某种不尊敬的表现，不是贬低他的功绩，相反，能够表现他的力量、独具一格、卓越的才能、对人民生活召唤的敏感、善于深入社会进程的核心并看透和领悟其中最重要和先进的东西。要知道，谁也不会想到去指责作出世界发明的伟大学者，说他某个时候是从学字母开始的，或者指责他在最初的实验中做错了。

5. 力求把一切都展示为现成的、百分之百完成的、好到无以复加的——这是教条主义的枯燥乏味和脱离评论真正任务的后果。

我们的评论不善于弄清一个根本的问题——关于描绘我们当前现实中的艺术真实的内在方法问题。

事实上，许多作家在努力表现苏联制度的力量时，丢开了生活所产生的尖锐矛盾与冲突。

在散文、诗歌和戏剧中常常充满非常感人的富足康乐。情节是呆板的，主人公们是矫揉造作的。作家们在辩解中推出了无冲突戏剧理论作为我们时代以及人民在政治、道德上团结一致的标志。

康·西蒙诺夫的《将会如此》一剧中，所有的主人公在相等程

度上富有同情心、高尚、有觉悟和内心一贯正确——从上校工程师到房屋管理员莫不如此。在中篇小说《第三病室》和其他许多作品中同样表现出内心平衡的倾向。

给人一种印象：斗争完全停止了。可是，实际上斗争正在进行，虽然与前几年相比用的是另一些形式。

存在着先进与落后的斗争，高尚与渺小的自私自利的斗争，献身精神与消极无为的斗争，等等。

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冲突，但是我们社会制度的特殊性能够解决这些冲突，保证先进和高尚的最终胜利。

关于苏维埃制度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现实的优越性，我们的文学应当表达得更人声些和更富感染力些。

而我们的评论应当帮助作家和读者弄明白这一点，并且表明苏联艺术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回避表现困难，而在于真实地展示困难被人民克服——由于我们的制度、世界观、教育和道德基础。

可是，评论家们日前在这方面还置身局外。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以为，这里有与文学发展的性质有关的一系列原因，也有一些问题是习惯使然。

众所周知，在拉普时代，评论曾具有独立的作用，过分地运用大棒子，使作家们经常处于紧张甚至恐惧之中。这引起了对各种各样的评论见解的戒备。然而，拉普时代早已过去了，拉普的错误已被党纠正，在统一的作家协会范围内情况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不过，某些事情仍然按照惯性继续着，有意把评论视为书刊检查在作家组织内部的一种补充形式。这样的观点该是消除和摒弃的时候了。

然而，如果说这是某种心理情感的话，那么这不是主要的障碍。更重要的是伴随而来的体裁——文学、评论和新闻报道——的某种混淆。没有文学科学的提高，评论的发展是不可思议的。评论

家，别的且不说，应该具有广泛全面的文学—政治的素质。认真的评论工作应该具有科学价值。一切都应如此。然而，在审视文学过程时，文学研究、教学参考书要求的毕竟是不同于文学评论的另一种角度和方法。

作家协会大约有200名会员是评论家，但经常是一个月难以凑出10篇杂志上的文章。对此一些同志困惑不解。无须多说，评论家们工作得不好，不太紧张。然而，另一方面，大多数列入评论干部的人，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所里那些有用的和需要的人，不能够对评论的发展给予本质上的影响。

评论要求特殊气质的智慧和天赋，而不仅仅是科学知识的渊博。评论家承担的是特殊的使命，对当代生活的一切现象、对其发展的一切趋势予以强烈的、激动焦虑的关心。评论家不是编撰者——哪怕是最诚恳的编撰者，也不是科学资料、学术研究和见解的系统分类者，而是某种程度上的发明者、革新家，作品的新的性质、特点、特殊性的发现者，是一个善于看到并且评价艺术反映真实的本质，能够具体、明确而又令人信服地对艺术提出新而又新的任务的人。评论家应该运用艺术的手段——其中包括科学的逻辑学，但又超出其范围——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不可以把评论与文学研究以及与新闻报道混为一谈的理由。

我们的文学评论文章似乎成了报纸体裁之一。报纸上对文学作出评价是绝对合理和非常有益的现象。但是它不能代替评论本身，因为它有专门的功能，主要是宣传报道。报纸的威信越高，读者对报上刊登的作品评论就越信任。然而，由于报纸的功能本身和报纸的容量的限制，它只能作出一般的结论，而通常就排除了详尽的分析。这就是为什么（如果这里说的不是一般的报道，而是推荐的话）有时可能最权威报纸的见解应当引出评论文章的评价总结，而不是预告。

我举两个例子来非常明确和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近一年来，《真理报》表扬了刊登在杂志上的两部新作品——奥维奇金的中篇小说《致以前线的敬礼》和B.列昂尼多夫的中篇小说《第三病室》。评论家兹拉多夫同志和卢金同志在两篇评论文章中肯定地评价作品，把它们推荐给广大读者。可是，在两篇评论文章中除了说明主题的重要性之外，没有任何论据来维护好评的本质。这两篇评论文章——其实同各报上的其他许多评论文章一样——让读者产生了一种印象：所写的东西在创作上绝对千篇一律，仿佛是同一个作者写出来的。在报纸的评论文章中，艺术评价的功能丧失了，对作为艺术现象的作品的见解没有了。

一切都是如此相似，以致于读完评论文章之后去读作品本身，有时连添加给它的优点的百分之一都找不到。我认为B.列昂尼多夫的中篇小说就是如此，作品选取了非常重要的生活题材，但在许多方面挂上了糖浆，过于甜蜜，不像是真实的。须知像《真理报》这样的权威报纸上刊出评论，就具有社会承认的性质，通常会杜绝任何严肃的文学论战发生。

我多次有机会出席各种读者讨论会和会议，听到较之报纸评论提供的要更广泛和更全面的作品分析。应该坦率地说，就其实质而言，这种分析有时完全是公正的，它改变的正是报纸对作品的评价。

报纸上的评论文章以其权威性的分量决定着读者的审美力，然而绝对不会培养它，因此不能代替文学评论。同时，报纸的评论体裁造成一种印象：写关于艺术的文章是件简单容易的事，不要求什么特殊的天赋或才能。也许，这能部分地说明完全没有新干部加入评论界的原因。很典型的情况是，近几年来在各种各样的高等院校里答辩了上百篇关于苏联文学的学位论文，并为此而授予学位，然而在我们的评论中却看不到新名字。年轻人显然看不见这里是广阔

而诱人的创作天地。只能如此解释。如果以为我们的国家、天才的人民——它在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各个领域都在推出新人——没有孕育在艺术的这一范围内具有独特的鲜明的表达能力的人，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那么，是什么在起妨碍作用呢？

这里应当谈到，近几年来评论似乎失去了国家的奖励。在我们的国家里，评论家为了有成效的工作，应该具有像作家作为国家的活动家所具有的那种内在感觉，即对自己社会使命重要性的信任和意识。但这没有。不但如此，我们都感觉到对待我们行业的态度有某种冷漠。它不鼓励职业化，而在某些评论家中间甚至产生改行的情绪和想法，往往想改行到文艺学研究园地，那里既安稳些又简单些，而工作成果又有分量。众所周知，关于莱蒙托夫、契诃夫或高尔基的新著受到人们相当的关注。

缺乏国家对评论体裁发展的鼓励和关心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来。如所周知，在苏联文学存在的整个期间，没有任何一个评论家因文学评论活动而被授予勋章。在电影事务委员会、艺术事务委员会下属的各艺术委员会，在斯大林奖金委员会，那里有各个艺术门类、各种体裁、各种审美和流派的活动家的代表，惟独没有评论家。连我们各文学杂志的编委会也不奖赏他们。由作家来领导杂志或者最重要的报纸的文学部，被认为是最为适宜和正确的。然而，很久以来，正是作家们和评论家们创作上的团结合作，曾是古典文学然后是俄苏文学最富成果的基础和泉源。

我说这一切的目的并不是埋怨或指责，只是为了真实客观地提供在评论家中经常激动地议论的现状。也不能闭口不谈我们评论的威信的降低反映在作家们对它的态度上。下面的情况往往带有藐视的味道：一个作家坦率地声称他不打算考虑与评论发生关系，而在与这个或那个评论家“友好”谈话时却这样解释他的不情愿：我是作家，可以写我想的东西，写我的感觉，而您却做不到，因此我指

靠的不是评论，而是上司。无论我们怎样厌恶这类恬不知耻的话，但不能不在它后面看到一部分真相，它与评论的状况和它的压低了声调有着必然联系。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简单地扩大报刊杂志用于刊登评论文章的版面并不能给评论事业的发展带来根本转变。为了实现转变，需要一系列重大的领导措施。

首先，有必要在党中央委员会内就我们艺术发展的一切根本问题进行慎重的公开谈话。不但评论家对此有强烈要求，作家也是如此。重要的是各报纸和杂志的领导应参加这样的谈话。这种协商的成果应该是能够产生一些原则的、实际的决定。

我并不想象我能成功地触及所有最重要的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我感到，我还未能对有关这里所涉及问题的所有思考作出总结。这些想法可以发展得更加广泛和——可能的话——更有说服力。但是我想，即便这些临时想到的意见也将在某种程度上有益于分析问题，有利于事业。

О. 列兹尼克

1945年12月1日

奥西普·谢尔盖耶维奇·列兹尼克

莫斯科，赫尔岑大街54幢31宅

电话：K 4-81-23

№02230

## 波利卡尔波夫关于潘诺娃作品发表问题 致《旗》编委会的信

(1945年12月24日)

《旗》编委会

我已了解 B. 潘诺娃的《旅伴》（《救护列车》）手稿的内容，手稿已被你们采用，好像将在 1946 年杂志的第 1 期上刊登。

我认为这部作品是错误的，歪曲了苏联人日常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真实情景。

B. 潘诺娃的长篇小说里多半是陷入日常家庭生活纠纷的小人物。就其实质而言，这一切谈的都是被战争彻底摧毁了立足基础的不幸的人们。作者所勾勒的一系列人物在精神方面是贫乏的。

刊登这样的作品将是个不可宽恕的错误。我表示坚决反对发表 B. 潘诺娃的长篇小说，并坚持召开编委会专门会议，会议应请作者参加并宣读我关于这部作品的声明。

A. 波利卡尔波夫

1945年12月24日<sup>①</sup>

<sup>①</sup> 在该文件上有格·马·马林科夫签署的意见：“光是恩准好作品的出版是不够的。对领导者应该要求更多！对于不是用诗歌写的东西的态度就不那么关爱了。”

№02231

## 塔拉先科夫关于作协领导人的 工作作风问题致马林科夫的信

(1946年3月19日)

致联共（布）中央书记马林科夫同志

尊敬的马林科夫同志！

作为《旗》的副主编，我与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责任书记波利卡尔波夫同志在十分紧密的联系中工作了一年半多。在这一年半期间，我的看法不断地加强：波利卡尔波夫同志不正确地、不是以布尔什维克的方式领导作家协会。近来这种感觉如此强烈，以致我认为给您写这封信是我对党的义务。

在作家协会的整个生活中，波利卡尔波夫的所作所为就好像他是个掌握大权的独裁者。协会主席——众所周知的作家 H.C. 吉洪诺夫处于靠边站的地位，他明显地畏惧波利卡尔波夫，认为他想必是某种特别委派的政委。作为党外人士，吉洪诺夫不敢对波利卡尔波夫提出异议。而波利卡尔波夫忘记了党关于应当体贴、爱护作家的所有方针，越来越习惯于指挥、吆喝、命令的腔调。作家协会机关的工作人员不敢说个不字，小心翼翼。是的，工作人员算什么，连全国闻名的作家也几乎从来下不了决心说出反对波利卡尔波夫的话，——反正都一样，早就知道他们将被公开敲打……波利卡尔波夫好多次用粗暴的方式企图把自己的口味强加给我在那里工作的《旗》编辑部。他禁止我们刊登薇拉·英贝尔的《列宁格勒日记》。只是因为给中央写信才救了这部有才华的手稿。叶戈林、约夫丘

克两位同志读了这部作品后批准刊登。波利卡尔波夫第二次又试图禁止我们刊登青年女作家薇拉·潘诺娃有才华的爱国主义中篇小说《旅伴》。他给《旗》寄来这样一封信：

“致《旗》编委会成员。我已了解 B. 潘诺娃的《旅伴》（《救护列车》）手稿的内容，手稿已被你们采用，好像将在 1946 年杂志的第 1 期上刊登。我认为这部作品是错误的，歪曲了苏联人日常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真实情景。B. 潘诺娃的长篇小说里多半是陷入日常家庭生活纠纷的小人物。就其实质而言，这一切谈的都是被战争彻底摧毁了立足基础的不幸的人们。作者所勾勒的一系列人物在精神方面是贫乏的。刊登这样的作品将是个不可宽恕的错误。我表示坚决反对发表 B. 潘诺娃的长篇小说，并坚持召开编委会专门会议，会议应请作者参加并宣读我关于这部作品的声明。波利卡尔波夫。1945 年 12 月 24 日”。

波利卡尔波夫在与我谈话时声称：“我就是到中央书记们那里也不会让你们刊登这个东西。”

《旗》编委会开了会，在波利卡尔波夫出席的情况下重申了刊登薇·潘诺娃作品的决定。又是在约夫丘克同志和叶戈林同志的帮助下，我们总算发表了这部富有才华的爱国主义作品，作品受到了文艺界的好评。

可是，我们在《旗》内部尝试着与波利卡尔波夫斗争。很遗憾，大多数作家宁愿不介入，不参与同波利卡尔波夫的争斗，尽管在“私下里”谈论他时言词都十分尖锐。在《文学报》内，波利卡尔波夫确立了恐怖制度。一切不适合他口味的东西都被无情地砍掉、撤消、禁止。《文学报》副主编科瓦尔奇克同志多次对我和其他同志说，她对波利卡尔波夫的行为极为气愤，但无可奈何。

特别令人气愤的是波利卡尔波夫在苏联作家协会党委会、在苏联作协党员会议、理事会会议上的行为。到处是他的话，他的口气

不容争辩。个人的口味、个人对作品的评价成了法律。就拿昨天来说。波利卡尔波夫主持有积极分子参加的理事会会议，讨论推荐申报斯大林奖金的作品。波利卡尔波夫预先准备了一份名单。如果发言者说的不合乎他的心意，他就开始喊叫，用极粗暴的反驳打断，不准发言。愤怒的特瓦尔多夫斯基离开了会场，波利卡尔波夫竟然像对待孩子那样呵斥他。波利卡尔波夫在合乎自己心意的时候中止了讨论。对作家们喊叫、呵斥，像个宪兵。不！真的，这样的情况甚至在臭名昭著的阿韦尔巴赫时期都未曾有过！……

阿谢耶夫、安托科尔斯基、基尔萨诺夫和我推荐1945年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选》为斯大林奖金的候选作品。波利卡尔波夫直接阻挠这个建议的讨论，宣布这个集子里收入了往年的诗篇，因此讨论不合法。他干脆中断了会议，宣称这个问题不该讨论。

阿谢耶夫、基尔萨诺夫（都是党外诗人）事后说：

“得了，我们干嘛发言？反正都一样，看来波利卡尔波夫事先就同上面商量好了……这只是民主的幌子……没什么可讨论的……”

波利卡尔波夫用这样的方法使得党内党外的作家们对作家协会的工作、对编辑部的工作只能是极其反感。苏联作家协会真的被他的刚愎自用吓住了。这一切，依我看，带来直接的政治危害并且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相抵触。

我知道，马林科夫同志，许多文学家所想的同我给您写的很相像。我可以提到评论家苏博茨基、勃罗夫曼、科瓦尔奇克、诗人阿利格尔、阿谢耶夫、特瓦尔多夫斯基、基尔萨诺夫。然而大多数人都害怕高声反对波利卡尔波夫的政策。可是，我以为，最好直截了当地说出内心郁积的不满：波利卡尔波夫对我们的文学有害，他压制一切新生事物、新颖的思想，他打着正统思想的旗号扼杀有才华

的青年，不许发展原则性的文学批评，在文艺界搞阿谀奉承、谄媚逢迎的一套。在我看来，该是把波利卡尔波夫从文学界赶走并授权一个由人民熟悉的党内和党外作家组成的小组来领导作家协会的时候了，没有波利卡尔波夫吓唬人的马鞭子他们将完全能够胜任。

请原谅我用这封信占去您的时间，但是我认为有义务给您写出真相，仅仅是真相而已。

《旗》副主编 苏联作家协会会员 АН. 塔拉先科夫

莫斯科，1946年3月19日

工作电话：K 0-52-93，家庭电话：Д 2-08-76

№02232

## 马斯林关于作协党组讨论文学批评的情况 致马林科夫的报告

(1946年4月2日)

致联共（布）中央书记格·马·马林科夫同志

连日来苏联作家协会党组就执行联共（布）中央1940年关于文学批评的进展情况举行了非公开会议。作家恰科夫斯基同志作了报告。讨论中（3月27日和4月1日）有17名共产党员评论家和作家发了言。会议定于4月8日结束。

报告中作了正确的结论：文学批评的思想水平低下，至今没有如联共（布）中央的决定所要求的那样，成为宣传和共产主义教育的十分重要的工具。但是，报告人没有揭示和分析造成批评不能令人满意状况的原因。结论无可争辩、但材料贫乏的“由引文组成的”报告，不能成为广泛讨论当代文学批评迫切问题的基础。发言者在讨论中主要谈了报告的不足之外，而不是评论家的工作实质。在第二次会议上（4月1日），这一不足在评论家和作家如列日涅夫<sup>①</sup>、恰尔内<sup>②</sup>、沙吉尼扬、苏博茨基等的发言中部分地得到弥补。指出了一系列批评著作的有害趋向：把列宁对列·托尔斯泰创作的理解庸俗化（在梅拉赫的著作中），艺术至上主义和形式主义（在泽林斯基和尤佐夫斯基的关于诗歌和戏剧的许多文章中）。在会上，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的工作因用行政手

<sup>①</sup> Н.Г. 列日涅夫（1891～1955），文艺学家、政论家。

<sup>②</sup> М. 恰尔内（1901～1976），作家，文艺学家，评论家。

段领导文学和评论而遭到尖锐的批评。报告人和在讨论中发言的人都把行政命令的实际运用同作家协会书记波利卡尔波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作为例子，报告人举出理事会讨论《文学报》编委会工作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波利卡尔波夫同志在回答有关就创作的各种问题在报纸上开展广泛辩论的要求时说：“《文学报》不是在理事会之上的、而是理事会的报纸。”塔拉先科夫同志在发言中谈到了波利卡尔波夫同志对《旗》编辑部施加“行政压力”的事实。波利卡尔波夫同志不顾编委会对B.英贝尔的《列宁格勒日记》和B.潘诺娃的《旅伴》的一致好评，断然要求拒绝这些作品。他以此理由传唤编辑部工作人员，写了不少信，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B.英贝尔的《列宁格勒日记》在杂志上发表之后，单行本仍然没有出版。据在会上发言的B.英贝尔说，“苏联作家”出版社也是在波利卡尔波夫同志的压力下认为手稿不合格。

另一些共产党员评论家们没有直接在会上谈到波利卡尔波夫同志的命令主义和粗暴吆喝，但实际上赞同那些尖锐提出这个问题的同志们。例如，努西诺夫<sup>①</sup>同志和苏博茨基同志要求作家协会理事会在领导文学和评论的事务中运用广泛、明智而又干练的处理方法，这里指的就是波利卡尔波夫同志。

沃洛热宁<sup>②</sup>同志也在会上发了言，他指出反对波利卡尔波夫同志的那些发言腔调下流无耻。他声称波利卡尔波夫同志是党中央委员会派到作家协会来做领导工作的。其他的发言没有为波利卡尔波夫同志辩护。

<sup>①</sup> И.М. 努西诺夫 (1889~1950)，文艺学家。

<sup>②</sup> А.П. 沃洛热宁，文学评论家。

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文艺部〕主任

Н. 马斯林<sup>①</sup>

1946年4月2日

---

① Н. Н. 马斯林（1909—？），1946年1—11月在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担任文艺部主任。

No 02233

## 亚历山德罗夫关于潘菲洛夫的文章

### 致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6年4月30日)

在《十月》杂志第3期上，编辑部拟刊登作家Ф.潘菲洛夫题为《论小瓦罐和小小瓦罐》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潘菲洛夫同志描述了苏联文学的状况，并试图确定其当前的任务。他在文章中涉及诸如艺术的真实、题材、当代文艺作品的语言、青年作家的教育等等问题。

潘菲洛夫同志关于文艺创作及其特征的某些想法虽然是肤浅的，但没有引起本质上的异议。然而，文章的主要之处则是有害的和错误的论断，其总的意思可归结为苏联文学似乎已由不学无术、没有专业知识的文学官僚们控制。作者给他们起名为“小瓦罐”和“小小瓦罐”。

潘菲洛夫同志认为现在“瓦罐们”在文学中通行无阻地灌输有害的、愚蠢的观点。他肯定地说，“瓦罐们”要求作家粉饰现实，号召把卫国战争表现为“我们红军战无不胜的进军，而且是在‘乌拉’的欢呼声中，还要加上高唱歌曲，甚至还连蹦带跳……”（第2~3页）。他们反对在文学中表现任何艰难困苦，建议作家们在描绘卫国战争的事件时忘掉战争最初阶段红军曾经后退。潘菲洛夫同志在批评这一观点的同时，甚至怀疑红军的撤退使敌人精疲力竭的事实（第2页）。按照潘菲洛夫同志的看法，文学官僚们不让作家把文学主人公们的语言个性化，限制作家选择题材的自由，在描写

法西斯分子的问题上不正确地指引方向，给青年新作者们不正确的劝告，等等。

潘菲洛夫同志强调指出，这些“小瓦罐们”和“小小瓦罐们”在艺术的根部剥夺其生气勃勃的浆液。“橡树的根”——潘菲洛夫同志写道——“利用完瓦罐之上的所有养料之后，没有能力透过瓦罐往深处去，不再滋养树木，于是树木开始从顶部枯萎”（第1页）。“瓦罐们”，按潘菲洛夫同志的看法，是“作家、演员、画家与人民、生活、党……之间的”障碍物（第1页）。<sup>①</sup>潘菲洛夫同志宣称，要是在工厂、在集体农庄，这样的官僚早就会被立即赶走，可是在文学中没有触动他们，他们“执行路线”，竭力按照自己渺小的毫无价值的公式，“让作家们坐下，像坐进儿童用的小盆。要是作家反抗，不愿坐在这样的小盆里，他们就开始狠劲地抽打他”（第4页）。就这样，“瓦罐们”被潘菲洛夫同志说成是非常有势力的一股力量，它给文学定调子，确定文学的方向。可见，潘菲洛夫同志的文章不是别的什么，而是隐蔽地试图批评党对文学艺术的领导。

潘菲洛夫同志企图用引证斯大林同志尚未发表的关于文艺的意见来加强其混乱和错误的看法，这也未必恰当（第5，8，9，10页）。

根据潘菲洛夫同志的请求，宣传部两次审阅了他的文章。但是作者不认为有必要对文章多少作些认真的修改，而坚持要发表它。

我认为可以准许在《十月》刊登潘菲洛夫同志的文章，同时让

《布尔什维克》杂志或者《真理报》发表对它的详尽批评<sup>①</sup>。

请您指示。

Г. 亚历山德罗夫

1946年4月30日

呈送：安·亚·日丹诺夫同志

格·马·马林科夫同志

---

<sup>①</sup> 潘菲洛夫的这篇文章发表于《十月》1946年第5期。6月24日《真理报》刊登署名文章，批驳潘菲洛夫的观点。

**No 02234**

**亚历山德罗夫、叶戈林  
关于《星》和《列宁格勒》的问题  
致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6年8月7日)

致联共（布）中央书记安·亚·日丹诺夫同志

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

文学艺术杂志《星》和《列宁格勒》的状态完全不能令人满意。这两家杂志最近两年来刊登了许多思想意识上有害的、艺术方面很差的作品。

1945年在《星》上刊载的主要是历史长篇小说。关于苏联人民生活的作品在这家杂志上刊登得很少。《星》正在散布颓废没落的情绪。这一点在A.阿赫玛托娃、И.萨多非耶夫<sup>①</sup>、M.科米萨罗娃<sup>②</sup>的诗中表达得特别明显（1946年第1期）。

A.阿赫玛托娃的《仿佛独白》一诗充满悲观情绪和对生活的绝望。现实生活被阿赫玛托娃写成阴森的、不祥的，令人想起“黑色的花园”、“秋天的景色”。城市的声音被女诗人感觉为“从阴间”听到的……“永远陌生的”。阿赫玛托娃的爱怜和依恋归向过去。

阿赫玛托娃写道：

<sup>①</sup> 萨多非耶夫，伊里亚·伊万诺维奇（1889—1965），诗人。

<sup>②</sup> M.H.科米萨罗娃（1904—1988），诗人。

“我的玩具小城已被焚毁，  
通往过去的小路不复存在。  
那里有喷泉，绿色的长椅，  
偌大的沙皇公园已在远处。  
油画上——春饼、洼坑、载客马车，  
四月里——霉湿和泥土的气味，  
还有初吻……”

И. 萨多菲耶夫的诗同阿赫玛托娃的诗一样，充满那种无穷的忧郁。在 M. 科米萨罗娃的诗《心的呼声》中，基本主题是哀悼过去，预感死亡。科米萨罗娃写道：

“忧伤将会平息，爱情将会过去，  
鲜花将枯萎在雾中的草地……

……

我的花园将被大雪掩盖，  
园里一切都将悄悄入睡……

……

我的声音将被埋进土里，——  
于是我听不到任何声息……”

在 C. 斯帕斯基<sup>①</sup> 的长诗《骑士》（1946 年第 2—3 期）中，不正确地描述了苏联的爱国主义。从长诗的内容可以得出结论：苏联人对祖国的爱与过去俄国人的爱国感情毫无区别。这种错误观点导致作者美化彼得大帝的形象，甚至把他当作苏维埃国家的象征。长

① C. И. 斯帕斯基，诗人。

诗的作者是这样写彼得大帝：

“他永远与列宁格勒结为一体，  
成了城市的青铜的心脏……  
在我看来他就是俄罗斯，  
他已成为俄罗斯的化身。”

许多作品不负责任地反映卫国战争和英勇保卫列宁格勒的题材，艺术水平很低。这些作品展示的人物圈子十分狭窄，主要局限于描写在苏联现实中并非典型的、倾向于唯美主义的知识分子。作者表现的知识分子是脱离国家生活的，并赋予他们并不是他们特有的特征。

例如，在Г.戈尔<sup>①</sup>的中篇小说《莫霍瓦亚的房子》中主要角色是一位画家，他在战争的日子里担忧的只是他的绘画作品的命运。这部中篇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是位园艺学家，他只关心保全他的仙人掌。在А.施泰因<sup>②</sup>的短篇小说《天鹅湖》中写了一个飞行员，他感兴趣的与其说是航空，不如说是他一直不断回忆的芭蕾舞。

保卫列宁格勒的真正的英雄在杂志上没有描写。

在В.克涅赫特<sup>③</sup>的中篇小说《在涅瓦河阵地上》（1945年第2期）中，被围困的列宁格勒人对法西斯分子的斗争只是作为惊险情节的背景。中篇小说里占中心地位的不是红军的士兵和军官，而是艺术摄影师和圣像收藏家的形象。战无不胜者格奥尔基在这部中

① Г.С. 戈尔（1907～1981），作家。

② 施泰因，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1906～？），剧作家。

③ В.А. 克涅赫特（1890～1950），作家。

篇小说中被宣布为俄国军队的象征。中篇小说的主人公这样说：“战无不胜者格奥尔基是最受喜爱的俄罗斯题材”；“在战无不胜者格奥尔吉身上有着传奇的俄罗斯战士的特征。”

与军事题材有关的作品还有Л. 马柳金的剧本《老朋友们》(1946年第5-6期)。剧中人物是在列宁格勒熬过围困的苏联小伙子和姑娘们。Л. 马柳金创造的形象对于我们的青年来说并不是典型而有代表性的。在这个剧本里青年被描写成思想上贫乏的人。一些姑娘在军医院工作，小伙子们在前线，但祖国的命运很少使他们激动，战争几乎没有在他们的意识中留下任何痕迹。他们仍然无所用心地生活着，轻率地对待生活。青年弗拉基米尔·多罗欣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战争中变得道德上粗野了。多罗欣对一个同学说：

“……不只是有过炮火和土地，还有过很多好东西。连风流韵事都有，真见鬼！说得准确些，不是风流韵事，而是短篇故事。我可以告诉你——有过。只是我求你别对冬妮娅嘀咕。娘儿们不明白也不饶恕这个。比方说，我是不爱吃醋的。可是女人，你碰到的秃头的也比不吃醋的多。什么事都曾经有过……舒尔卡，知道吗，生活，士兵的生活，是沉重的。欢乐——无论什么样的都没有。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说不定会在另一个世界，你还是得借酒浇愁，得过且过……这时有个古怪的女人缠上了你——简直舍不得分手……”

Л. 奥斯特罗夫的短篇小说《和平》和《逃亡》着重强调德军官兵的坚强。短篇小说《逃亡》描写被红军部队包围的德国部队的顽强抵抗。德国人坚强的原因是他们那里有大量储存的酒和给他们定期空运来的……妓女。

这个短篇小说的主人公萨乌林上校谈到被包围的德国人说：“要是你们以为他们害怕得发抖，你们就大错特错了。他们现在对

什么都满不在乎。想像一下吧，这些注定要灭亡的家伙有3千瓶法国酒，那可不是什么臭狗屎，而是真正的陈酒。喝它几大杯试试，你们甚至在坟墓里也会唱起歌来……以后，我说，我可不对妓女们讲客气了。你们自己都很清楚，德国人每天都从普斯科夫有组织的妓院用降落伞空投20个姑娘来支撑被包围的同胞的士气。我们干嘛跟她们讲客气？为什么，我说，我们的高射炮兵只打飞机而不打这些有翅膀的美女？”

作者把领导歼灭被包围敌军部队的苏联指挥员的任务归结为消灭德国的酒库和侍候德国士兵的妓女。

《星》第5-6期合刊在“儿童文学新作品”的专栏标题下刊载了米·左琴科的短篇小说《猴子奇遇记》。左琴科描写的事件发生在战争时期后方的一个城市里。城市遭到轰炸的时候，一只猴子从动物园逃了出来，落到了城市的大街上，经历了一系列的冒险。作者描写猴子的奇遇只是为了挖苦地强调在战争的日子里我们人民生活的困难（粮食不足、排长队，等等）。猴子饿了，开始寻找食物。左琴科这样写道：

“在城里，它在什么地方能吃到东西呢？大街上什么吃的也没有。它不能带着尾巴进食堂，或者去合作社。何况，它没有钱，没有优惠卡。它也没有食品供应证。真是糟透了……它钻进了……商店。一看——好长的队。不，它可不去排队。它不是推开人们挤到柜台去，而是干脆从顾客们的头上跑到女售货员跟前。跳上了柜台。也不问胡萝卜多少钱一公斤，就抓了一把，然后，如常言所说，溜之大吉。跑出商店，对自己买到的东西心满意足。瞧这猴子。什么也不明白。看不出没有食物留下来有什么意思。”

在短篇小说的结尾，作者厚颜无耻地声称，训练有素的猴子很快就习惯用手帕擦鼻子，不拿别人的东西，用勺子吃饭，可以当人们的榜样了。

左琴科的短篇小说是不道德的、凭空虚构的作品。在左琴科的描述中苏联人的头脑十分简单，眼光短浅。作者故意歪曲我们的人。

《星》宣扬对艺术的唯心主义观点。Л. 鲍里索夫的中篇小说《来自盖尔基尤的魔法师》（1946年第4期、第5-6期合刊）整篇充满了离开现实生活到“甜蜜传奇”的地方，“到幻想的和纯粹想象的世界去”的呼唤。作家格林是这个中篇小说的主人公，他被理想化地塑造成幻想家、“非现世的”人，沉浸在自己无穷尽的幻想里。《星》刊登的许多评论文章也在客观上为宣扬唯心主义美学效劳。С. 斯帕斯基在《关于诗歌的一封信》一文中谈到一系列苏联诗人时，避而不谈他们创作的思想内容，而只是从形式方面分析文艺作品。这篇文章的形式主义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 \* \*

文艺杂志《列宁格勒》充斥着偶然挑选出来的稿件。近几年来杂志上没有发表过一部有很高价值的文艺作品。常常刊登一些长篇小说的片断，但由于零散不全，不能引起读者的任何兴趣。

《列宁格勒》上刊登的是艺术性不高、思想上有毛病的作品。杂志上倒是刊登了不少关于卫国战争的作品，但是苏联人民对法西斯分子的英勇斗争在杂志上却未能得到当之无愧的艺术描绘。《列宁格勒》最近两年来刊登的许多有关这一题材的短篇小说是凭空虚构的，把红军战士的形象歪曲和庸俗化了。

在С. 瓦尔沙夫斯基和Б. 列斯特的短篇小说《柏林上空的事件》（《列宁格勒》1946年第3-4期合刊）里写了一个中士科罗特科夫，他乘坐飞机去执行战斗任务时随身带了一瓶酒。随后描写了被科罗特科夫藏在连衫裤里的这瓶酒如何在飞行时破裂了，玻璃碎片刺入了他的腿。吓坏了的中士以为自己受伤了，将此事通知指挥员。飞机返回机场后，“受伤者”被送进军医院，只是在那里才弄

清楚一切误会。

在 M. 斯洛尼姆斯基的短篇小说《在边防哨所》（1946 年第 3-4 期合刊）里，苏联军官的形象写得太寻常了。描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军官于 1941 年同撤退的部队一起离开边防哨所时，在房子的地窖里藏了一瓶酒，希望以后回来再喝掉它。如作者所说，这个希望没能实现——战争结束后军官回到了哨所，可是瓶子已经打碎了。为什么讲述这一切——不得而知。

杂志上刊登了许多诗，但大多数艺术水平十分低劣。在《塞瓦斯托波尔》（1946 年第 1-2 期合刊）这首诗中，И. 谢尔文斯基描述了他访问被红军解放的英雄城市的印象。可是诗人关于城市的英勇保卫者什么也没说；他只记起了革命以前年代的某个时候他在街上邂逅了一个姑娘。诗人用下流的腔调描写这个姑娘的外貌：

“您不喜欢晒得  
比她们的橙黄色头发  
更黝黑的姑娘？  
眼睛就好像两个  
小小的海湾，  
粼粼地闪着光。  
她的双肩  
比臀部略宽！啊！  
还有尖尖的鼻子。”

1946 年第 1-2 期合刊上刊登了 A. 弗利特的讽刺性作品《我的涅克拉索夫》，作者企图嘲笑发表在《星》上的 E. 卡捷尔利关于涅克拉索夫的中篇小说。然而，作品本身却成了对伟大诗人的嘲弄。A. 弗利特写道：“涅克拉索夫醒来得很晚，打着嗝。胃灼痛和沙皇的书刊检查

折磨着他。整夜梦见溃苹果和书刊检查员尼基坚科。心口疼。内心里酸酸的。从晚上起就打嗝——我该对农夫说些什么呢!? ——尼古拉·阿历克谢耶维奇忧郁地想着，吸着昂贵而芬芳的卷烟。受着良心和地主—农奴主们的折磨。涅克拉索夫无精打采地把疲惫的发黄的后跟伸进已经磨损得很厉害的便鞋，步履蹒跚地走近窗户。由于意识到在沙皇及其走狗们面前无能为力，也由于昨夜喝下的法国白兰地酒，他感到恶心。涅克拉索夫透过窗子看到了正门入口和一群农夫，叹了口气，用一只黄色的手把蘸水笔放进墨水里蘸了一下，一边禁不住地不时打哈欠、搔痒，一边写下《大门前的沉思》。想去看屠格涅夫，但他在国外。涅克拉索夫躺在沙发上，转身把精神萎靡的脸朝着外层剥落的墙。熟睡，他不能。农奴制在压迫。”

1946年的第10期在讽刺性作品部分刊登了A.哈辛作的一首诗，题为《奥涅金归来。第十一章。片断》。这首诗以恶毒的挖苦和讥笑描写现代列宁格勒的日常生活。哈辛笔下的叶夫盖尼·奥涅金仿佛访问了列宁格勒：

“我们的叶夫盖尼坐上了电车，  
啊，可怜而又可爱的人！  
他那个不文明的世纪  
还不知这种交通工具。  
命运不忘叶夫盖尼，  
他仅仅被人踩了脚，  
只有一次被撞了肚皮，  
有人对他说：‘蠢货’！  
他想起了古老的风习，  
决定用决斗来结束争吵，  
把手伸进衣袋里……不知是谁

早已偷走了他的手套……”

杂志的评论部分完全不能令人满意。评论列宁格勒作家的作品的文章具有几乎是异常的颂扬的性质。

在杂志的1946年各期中，B.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И. 阿弗拉缅科、拉赫曼诺夫的作品被百般吹捧，过分赞扬，而与此同时，像B. 英贝尔的《列宁格勒日记》这样的作品却遭到粗鲁的讥笑（1945年第13-14期合刊，A. 弗利特的讽刺性作品）。

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缺点曾在报刊上发表过几篇批评文章（《旗》1945年第11期，1946年第2-3期合刊，《文学报》1945年9月8日）。然而，就在这些警告之后，两杂志的质量仍然没有改进，这证明《星》和《列宁格勒》两个编辑部不能胜任托付给他们的任务。

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和作协列宁格勒分会把这两家杂志交给一群文学家操纵，没有领导他们的工作，也没有给过他们任何帮助。

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没有对文艺杂志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注意到发表在《星》和《列宁格勒》上的作品在内容上的重大思想错误，没有领导编辑部的工作。

必需批准《星》新的编辑委员会班子以根本改进杂志的工作。

至于《列宁格勒》，那么应该认定它的继续存在是不适宜的。

附上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sup>①</sup>草案。

Г. 亚历山德罗夫、А. 叶戈林

1946年8月7日

① 参见本专题No02239文件。

No 02235

##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讨论《星》和 《列宁格勒》问题的会议速记记录

（1946年8月9日）

（开始部分未作速记记录<sup>①</sup>）

萨亚诺夫<sup>②</sup>：我的错误很大，显然我没有明白党和国家对我们的杂志关心到什么程度。

斯大林：你们的这本杂志是为儿童出版的吗？

萨亚诺夫：不是。

斯大林：那为什么不在儿童杂志上刊登<sup>③</sup>？

萨亚诺夫：这是为孩子们刊登的。

斯大林：你们连起码的要求都没有。这是一篇不值一提的短篇小说。

萨亚诺夫：现在意识到了。

① 出席8月9日会议的有联共（布）中央组织局成员亚历山德罗夫、安德里阿诺夫、布尔加宁、日丹诺夫、A. 库兹涅佐夫、B. 库兹涅佐夫、马林科夫、梅赫里斯、米哈伊洛夫、帕托利切夫、波波夫、罗季奥诺夫、斯大林、苏斯洛夫；中央委员瓦赫卢舍夫、扎季昂钦柯、波斯克列贝舍夫、波斯佩洛夫；中央候补委员古萨罗夫、扎沃隆科夫、卡夫塔诺夫、波普科夫、斯托罗热夫；中央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斯基，监察委员会委员伊格纳捷夫，以及中央委员会机关的一些负责人和部分著名作家

② 萨亚诺夫，维萨里昂·米哈伊洛维奇（1903—1959），作家，文学杂志《星》的主编。

③ 这里指的是左琴科的短篇小说《猴子奇遇记》，发表于《星》1946年第5—6期合刊。

斯大林：大家都是这样，后来才明白，原来什么也没意识到，结果都写琐事。您读了短篇小说吗？

萨亚诺夫：读了。

斯大林：这是最无聊的玩意儿，没有任何意义。是某种粗俗的市井笑话。真不明白，毫无疑问，为什么一个好杂志要把自己的篇幅用于刊登不值一提的粗俗东西。你们对自己的作家们没有要求，可是读者们有要求。

萨亚诺夫：我觉得，这里问题在于我们在作家中开展思想教育不够，在作家群众中存在着某种错误观念，有时候作家们不够理解原则批评的意义，某些作家过分热衷于西方——美国的文学，他们有时候对我们俄罗斯和苏维埃文学遗产中的那些创作财富估计不足，有时候在一些作家圈子里有那么一种对西方当代作家的仰慕。这是因为一些作家曾有一种见解：意识形态上具有现实意义的题材的作用降低了。

我们退回了一些稿子，一些在思想意识上歪曲我们正确观念的稿子。我们给作者指出了他们的错误，但是有些作家有这样的意见：战争已经结束了，现在他们要休息，现在应当让苏联读者开心，应该给他们读起来感到愉快的作品。我们的错误在于我们没能使一部分先进的作家疏远这种情绪，我们不善于真正地做他们的工作。这就是我觉得现在应该说的最主要的内容。

利哈廖夫<sup>①</sup>：《文化与生活》报上的文章是完全公正的，甚至还太软弱，文章指责《列宁格勒》，说它是尚无自己专业特点的杂志，患无个性毛病的中性杂志。我们自己在编辑委员会里也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曾经努力并且正在努力采取一切措施，以求使我们的杂志更有趣些，使冠以这样伟大的名称的杂志名副其实。这一点我

① B.M. 利哈廖夫（1906—1962），诗人。文学杂志《列宁格勒》的主编。

们暂时还没能做到。

我们的杂志是薄薄的杂志，应该建立在主要是短篇小说体裁的基础上。这很复杂。文学的这一体裁的状况并不完全尽如人意。我们的杂志《列宁格勒》在整个被围困期间都出版了，它在整个战争时期都出版了，而现在对我们来说突然变得有点儿复杂了。那时候我们曾有个小集体。那时候有不多几个作家，然而优秀的善于创作的作家，有极大的才能。现在工作有些扩展了，从别的战线上回来一些同志，这是我们很大的积极分子集体，但是他们没能明了列宁格勒发生的事，他们曾经在别的战线上，对列宁格勒的题材没有能领悟到应有的程度，这就使他们不可能拿出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关于列宁格勒的作品。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采取哪些办法呢？首先，我们同我们的作家们谈话，找到了能说到作家心里去的语言。然后，我们转向不断地注视着城市脉搏的我们的报纸工作人员。他们提供给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因为我们是特写杂志，而这样的杂志应该用特写展示今天的列宁格勒。我们感到我们的专业特点现在比以前已经更充实了。

亚历山德罗夫同志完全公正地给我们指出了缺点方面。我真的不能更详细地……

斯大林：可您读过那些东西吗？怎么会忽略这个？

利哈廖夫：我现在就说说为什么会这样。演员拉伊金把这篇作品带到了列宁格勒。在剧院朗诵了两个月，在电台也广播了。总剧目审查委员会批准的。

斯大林：谁批准的？

利哈廖夫：总剧目审查委员会，在这里，莫斯科。

斯大林：总剧目审查委员会批准刊登还是朗诵？

日丹诺夫：这是个游艺节目吗？

利哈廖夫：是的。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忘记了，印刷出来的文字比口头说出来的语言更有力量。关于涅克拉索夫。这是针对有关涅克拉索夫的著作的讽刺性作品。

亚历山德罗夫：要是您大声诵读这个讽刺性作品，您会被拽下台来。针对涅克拉索夫的讽刺性作品。

斯大林：您能肯定这是针对讽刺作品的讽刺作品吗？

利哈廖夫：有这样的一本小书，是本坏书。

斯大林：这是诡计，作者隐蔽起来了。

利哈廖夫：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作品，我可以继续举出例子来。

日丹诺夫：你们也有许多左琴科的作品，例如《奥林波斯之游》<sup>①</sup>，这跟《猴子奇遇记》一样吧？

斯大林：你们那里对外国作家阿谀奉承。苏联人对外国人阿谀奉承，值得吗？你们以此鼓励卑躬屈膝的感情，这是个大罪过。

利哈廖夫：刊登了许多翻译作品。

斯大林：你们用这个来养成对外国人过分尊敬的鉴赏力。你们使人们习惯于这样的感情：我们是次等人，那边的人是头等人，这不对。你们是小学生，他们是老师。这在本质上是错误的。

利哈廖夫：我想只指出一点……

斯大林：请说得口齿清楚一些。您这是糊涂了还是总的来说同意批评？

利哈廖夫：现在我试试。

斯大林：什么试试，应当更有力地说。

利哈廖夫：谢尔文斯基的《在塞瓦斯托波尔》里有结论，他回忆他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少年时代，回忆他在那里见到的一个姑娘，

<sup>①</sup> 正确的名称应是《奥林波斯山经历》，载于《列宁格勒》1946年第3-4期合刊。

她叫他亲爱的。他记住了一辈子。这就是他的诗。

斯大林：这是诡计。

利哈廖夫：我爱我们的杂志，我希望这份杂志能保留下来。

斯大林：杂志应该领导作家们还是应该成为他们的尾巴？

利哈廖夫：应该领导。

斯大林：能领导还是不能？

利哈廖夫：它应该而且能够领导的。

斯大林：暂时还得出不出这样的结论。

利哈廖夫：我想让同志们相信，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从下一期起杂志将会是另一个样子。我有一些按新方式思考的东西，不过要知道我们工作得并不那么轻松。

斯大林：您希望一切都好。这一点我看得出。不过应当能够做到让一切都好。

利哈廖夫：一定做到。

斯大林：是的。一定要做到。

利哈廖夫：让我们城市失去杂志是很痛心的。我们应该保留它。没有杂志不行。

斯大林：大家都要求我们改进产品质量：生活日用品、金属产品等等。不过，应当使文学产品的质量也得到改善。我们希望刊登优秀的作品，希望在质量上加把劲。

普罗科菲耶夫：同志们，应该考虑到，列宁格勒的苏联作家队伍曾处在特殊情况中，在这支队伍（现在列宁格勒的苏联作家队伍计有 274 人）中有很多人是真正的作家，即直接创作苏联文学的，算起来将近有一半。

斯大林：怎么你们只刊登列宁格勒作家的作品，其他城市的可以吗？

普罗科菲耶夫：一定刊登。我认为我们的杂志是联盟的杂志，

就像列宁格勒是联盟的城市一样。所以我认为，不能仅仅局限在列宁格勒的范围内。

斯大林：乌拉尔人的作品你们刊登吗？

普罗科菲耶夫：我们刊登，西伯利亚的同志和乌拉尔人的诗会刊登的。我们还想吸收莫斯科的作家们，因为需要提高我们列宁格勒杂志的作用。

斯大林：仅仅有自己的作家是不够的，看来，作品很少？

普罗科菲耶夫：要是我们能拿到莫斯科或者乌拉尔作家们的优秀作品，那么我们可以放弃我们对列宁格勒的钟爱，把列宁格勒的作家挤到第二位去。

斯大林：你们的亚格德费利德<sup>①</sup>是谁，是列宁格勒人？

普罗科菲耶夫：我不知道，他才进作家协会不久。

斯大林：怎么，你们喜欢他的作品，能把它们搬上舞台吗？

普罗科菲耶夫：我在读它们的时候，认为这是浪漫主义的作品。

斯大林：是些幼稚的作品，这不是已经成熟的作家。是个小学生。你们应该看看你们的杂志，从中汲取教训。

普罗科菲耶夫：显然，我们的鉴赏力也不够。

斯大林：看来作品还没有多到弄不清的地步，而您把它们混为一谈了。

普罗科菲耶夫：我们的杂志不是垃圾堆，我们希望我们的杂志无愧于我们的城市，但显然没有搞成这样。

斯大林：稿件看来不够，所以，看来，在《星》上有时出现过特别好的作品，简直是钻石，可是跟钻石一起的是——大粪。

普罗科菲耶夫：我回答您的插话。我们的错误加在一起是一半

<sup>①</sup> Т.Б. 亚格德费利德 (1908~?)，作家。

或者四分之三（笑声），因为我们的工作毕竟没有白干。我们也提供了好作品。

斯大林：那当然。

普罗科菲耶夫：对此我十分高兴。我认为列宁格勒作家队伍的缺点并不是列宁格勒才有的。

斯大林：很遗憾，不是列宁格勒才有，而是更多。

日丹诺夫：这不能使您得到安慰。

斯大林：他毕竟在心里暗自高兴。

普罗科菲耶夫：要是我们知道召我们来回答问题，我们就不会在第5期和第6期里犯这样的错误了。我们不知道会来开这样的会议。我认为现在这个会议的目的是这样的：对我们的杂志《星》和《列宁格勒》给予帮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们需要帮助。我想，这种帮助应该是现实和有效的。我认为应该给列宁格勒的杂志提供跟莫斯科的杂志一样的条件。如果《星》的发行量是1万份的话，如果《星》和《列宁格勒》给国家带来大约一百万卢布的亏损的话，有哪个好作家会到杂志来？

斯大林：由此看来，商品不佳（笑声）。

普罗科菲耶夫：书摊上没有我们的杂志。

斯大林：纸张没有给你们吗？

普罗科菲耶夫：是的。要是拿《十月》杂志来说，那么它的编制是这样的：除了5个部主任，除了一个文学顾问、一个群众部负责人等等，编委会有7个编委。而我们这里只有一个主编，如常言所说，他是多面手听差。接下来是：一个文学顾问，一个女打字员，一个编辑部主任。我认为应该给我们提供同等条件。

斯大林：关于《列宁格勒》没有什么要说的吗？

普罗科菲耶夫：《列宁格勒》有悠久的传统。它源自《车刀》杂志，这个杂志原是工人通讯员的机关刊物，后来由它发展成了

《列宁格勒》。我们想把它办成群众性的杂志，以刊登短篇小说为方针，有时根据编辑部的意见也刊登一些从大作品中选出的片段。

斯大林：这一点您赞同吗？

普罗科菲耶夫：不。苏联作家协会应当重视短篇小说。短篇小说体裁在我们这里非常不受作家们的尊敬。我们在作家协会讨论我们这两家杂志的问题不是一次两次。不过我们的批评不像现在这么严厉。显然，我们还是没有足够的勇气在许多场合说出真相，这里指的是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他们与我们在一起，他们会感到委屈，并且永远不会谅解的。我们有些人受不得半点委屈。

斯大林：多疑而又善感的人们？

普罗科菲耶夫：是的，有时候甚至连小小的批评都会留下很深的伤痕。

斯大林：这一点不应该害怕。没有批评怎么教育人？

普罗科菲耶夫：有过批评，但不怎么有效。

斯大林：害怕让人受委屈。不能怕委屈。

马林科夫：连受委屈的都收留了。左琴科挨了批评，可你们收留了他。

普罗科菲耶夫：这里要注意到别的因素。现在左琴科的第三部喜剧正在上演。

斯大林：整个战争过去了，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可是他连一行字也没写。他写的是些鸡毛蒜皮的事，简直是嘲弄。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他没有一个字——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却写各种各样的无稽之谈、鸡毛蒜皮，根本不能令人信服、令人感动。他到处游荡，不是往这儿钻，就是往那儿钻，而你们太听人摆布了。想把杂志办得有趣一点，就给了他地方，为此你们挨训，我们的人的作品又不能刊登。我们建立苏维埃制度不是为了教人们去做琐碎的小事。

普罗科非耶夫：下面我想提出关于人员从列宁格勒流失的问题。减少了大约 20 人。

斯大林：您给莫斯科报个数字。人们可能会回来的。走了，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不是农奴。看来在莫斯科情况要好些。

普罗科非耶夫：凭良心说，对作家来说莫斯科的机会要比列宁格勒更多。可现在，如果中央宣传鼓动部关于削减列宁格勒的杂志的建议被中央委员会通过的话，那么我不知道列宁格勒的文学队伍将会落到何种境地。不能把要洗的东西连水一起泼掉。我认为对列宁格勒这样的城市不能「只」保留像《星》这样的杂志。应当尽一切可能让这两家杂志真正地工作起来。为此我们会找到力量和人员让这两家杂志存在下去。

我认为，我们列宁格勒的杂志能够真正深入地、内行地胜任列宁格勒题材，具有重大世界意义的题材。我们大家都曾经在列宁格勒，同列宁格勒人一起经历过一切灾难，而我们的任务，苏联作家协会列宁格勒分会和两家杂志的任务，是使这个题材真正地响彻世界。我们没有足够的宏篇巨著叫响这个题材。我们有吉洪诺夫的《苏联人的特征》和楚可夫斯基的《这发生在列宁格勒》，但是我们没有找到能真正地提高这一题材的作品。不过，这样的尝试在我们列宁格勒正在进行。这不，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萨亚诺夫写出了关于列宁格勒战线三部曲的第一部。我想，这将是一部囊括各种事件的作品。

马林科夫：干嘛预先赞不绝口，要是还没读过的话。

普罗科非耶夫：我是说题材。列宁格勒的作家们正抓住这个题材。薇拉·凯特林斯卡娅写了一部关于列宁格勒的长篇小说。我认识她的时候，我说她应该多写。事实是作家们都开始做了。

斯大林：这使得你们有很大的优势。材料非常多，可是这些优势你们利用得不好。《猴子奇遇记》这算什么写列宁格勒！能提高

列宁格勒的威望吗？

普罗科菲耶夫：不能。对批评有一些反对意见。我们很小心地对待鲍里索夫的中篇小说《来自盖[尔基尤]的魔法师》。我们摘登了第一部。《文学报》发表了Л.拉赫曼诺夫推荐这部中篇小说的文章，我们认为这不对。现在鲍里索夫正在写第三部。我们在市委会议上说了，不需要写第三部，一部就够了。

斯大林：作为一个作家，鲍里索夫写得好，很雅致，掌握了文学语言。这不是亚格德费利德。

普罗科菲耶夫：他抓住关于格林的题材就够了。这是我的看法。

关于诗歌。我认为刊登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诗不是大过错。这个女诗人细声诉说忧愁，它们也是苏联人所固有的。

斯大林：安娜·阿赫玛托娃，除了她有个古老的名字，还能在她那里找到什么呢？

普罗科菲耶夫：在战后时期的作品里可以找到许多好诗。这里是一首写列宁格勒的诗：《最好的远射程炮兵》。

斯大林：一、二、三首诗就完了，再多就没有了。

普罗科菲耶夫：具有现实意义题材的诗很少，不过，她是个有着已经公认的旧的生活准则的女诗人，并且已经不能，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提供什么新的东西了。

斯大林：那就让它发表在别的什么地方好了，为什么在《星》上？

普罗科菲耶夫：应该说，我们在《星》上不能接受的就刊登在《旗》上。

斯大林：我们连《旗》也要弄明白，搞清楚一切。

普罗科菲耶夫：这将非常好。我要请求您和中央的各位书记，把我们的《列宁格勒》给我们留下，不要关闭我们的《列宁格勒》，

让我们以应有的方式办好这些杂志，让《星》有更多的钻石，让垃圾被消灭。

Бс. 维什涅夫斯基：今天的座谈会使我非常激动，非常感兴趣。谁也没有忘记我们，而现在列宁格勒在文学方面需要认真的帮助。没有单一的列宁格勒文学。只有统一的俄苏文学。今天会议的教训之一是我们所有的编辑应该寻找作者并发现他们，要在全国范围内发现和选择青年、中间一代。这些作者将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等。对于我本人来说，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不遗余力地工作，在全国各地紧张地寻找，不怕推举年轻的同志。这是第一。

第二。应该向作家队伍提出明确的任务。我们刚从战争走出来，在好多方面我们自己还没能搞清楚。新人向我们走来了。向我们的杂志投来许多稿件，许多人来找我们，要同每一个谈话。来的人都很有意思。前几天来了一个年轻的诗人找我。他有一双明亮漂亮的眼睛。我看着他，考虑着他需要什么。原来他在思考青年一代的命运，请求说明一系列词的词义，说他负过伤，没有能去西方，因此不能感受胜利。人们提出成千上万的问题。不得不跟他们做工作，不得不解释。我想，列宁格勒的同志们，我们全体，还有普罗科菲耶夫、有萨亚诺夫、列沃涅夫斯基<sup>①</sup>、有利哈廖夫，他们应该更迫切地开展这一工作，走出列宁格勒的范围。列宁格勒没有停下来，当需要帮助别的战线时，它帮助过。应当向作家们提出任务：召集大小团体的人们进行座谈、举行会议，看看下面在做什么。我们不太了解读者们的反应。这是我们的评论的一大罪过。我们的出版物着手这件事越快越好，迫使作者们读一读那些了解生活、能对作家的作品说真话的人们的反应，没有这一点无法工作。

---

① Д. А. 列沃涅夫斯基（1907—1988），作家。文学杂志《列宁格勒》的责任编辑。

关于小短篇小说。如果我们应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应当说，需要往短篇小说投入的力量、劳动、精力多得简直难以说清。刊登的短篇小说不应超过10页，短篇小说应该在中央的出版物上刊登，在无线电台广播……

斯大林：好的短篇小说，像契诃夫那样的，通过无线电广播人们会很乐意收听。

维什涅夫斯基：斯大林同志，以您的名字命名的奖励给了不少，但哪怕有一篇短篇小说被注意到也好。

斯大林：都不愿意写短篇小说。

维什涅夫斯基：也因为有经济方面的问题。10页，对于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来说，是一千多卢布。

斯大林：报酬区分得不好？

维什涅夫斯基：是的。我想引证下面的资料。我们有8600个为戏剧、电影、小型文艺节目、俱乐部等等工作的作者，其中93%的人收入是一千卢布甚至更低。这不是工程师的工资额，这不是教授的工资额，这一点应该考虑一下。我接着说，如果仔细分析各方面的因素，更深入地仔细分析一切，那么我应该说，我有从列宁格勒被围困第一天起的资料。我可以立即用它们来进行创作吗？不，不能，因为要深入考虑一系列问题。当薇拉·英贝尔发表她的《日记》时，你们做了什么？你们对薇拉·英贝尔——一个在整个围困期间同你们站在一起的人——讽刺挖苦，你们这么猛烈地打击她，以至于她差点没倒下去。现在她得了奖，现在谁也不会批评她了，不过，这样的局面同样不正确。

斯大林：对。

维什涅夫斯基：报刊应该率先起示范作用，对作品开始真正的、广泛的、民间的讨论。这将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1943年对左琴科写的东西曾给过他警告，那是他的自白《日出之前》。这个

人连自己肮脏的内衣都脱掉了，也脱掉了他自己的亲人的衣服。我读完这篇故事后，写过一篇对这部作品的分析。这个人于1923—1924年开始写作。他那里的人物到处是醉汉、不健全的人、残废人，到处是斗殴、喧闹。就拿他最近的短篇小说《猴子奇遇记》来说，你们可以拿来分析分析。你们将会看到，又是残废人，又是醉汉，又是吵闹……

斯大林：还有澡堂。

维什涅夫斯基：澡堂。完全正确。他那里结果就是如此。瞧，你们批评了我，你们就收下吧，尊敬的。这里需要非常深刻而认真的谈话，要对他说，你往下想干什么。

斯大林：他是个缺乏思想的鼓吹者。

维什涅夫斯基：他最近的作品既无思想又无主题。

斯大林：恶意吹毛求疵的玩意儿。

维什涅夫斯基：1942年人们由于营养不良而身体虚弱，杂志第一期真的是我们的同志精心做出来的。那时我去列宁格勒看看那里在干什么，于是看到了杂志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出版的。应当说，这些杂志对我们列宁格勒来说是无比珍贵的，我个人请求考虑这个因素和我们对这个杂志依恋的因素，以及现在的问题和传统，不要关闭这些杂志。

斯大林：这是左琴科的事。

维什涅夫斯基：对左琴科和其他人应当管一管，可是杂志本身应该保留。我想，列宁格勒人鼓足劲，有我们的莫斯科的支持，一定能改变现状。

我想提一个问题，那里应该任命新的领导，包括《星》。我认为我们苏联作家协会是主人。这是我们的杂志，列宁格勒人应当把我们算在内。我想，去这家杂志的应该包括：普罗科菲耶夫、凯特林斯卡娅、别尔戈利茨，应该有青年。应该使之成为战斗的编委

会。可以把莫斯科人也列入，这将有利于联系。

我想，你们将会考虑今天的会议的教训，并向前推进。

这里说了《旗》的坏话。但我们的《旗》给人民大约一百万卢布的利润，而你那里将近一百万的亏损。接受这个资料并把它记录下来吧。

总的文学过程进展缓慢，当人们描写国内战争的时候——我们是在1928~1929年着手解决这个任务的。现在这个过程快多了。手稿来得更多，内容更广泛。我们看到这一点。这里有一些数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出版了3600种文艺书刊，而美国出版约1800种，我们出版的文艺书刊多了两倍。这个进程无疑将会加强。

我请求把对我们来说是无比珍贵的杂志《列宁格勒》保留下来，但是要选择新的人手进入编委会，帮助它。这将是一件最令我们高兴的事情。

斯大林：要是杂志没有了，列宁格勒也仍将存在。

波普科夫<sup>①</sup>：说几点意见。第一，我认为亚历山德罗夫和许多同志在这里的发言对列宁格勒杂志的批评是正确的。杂志工作缺点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认为必须指出如下问题。主要的原因在于，无论是党的市委会方面，还是苏联作家协会方面，都没有〔对〕这些杂志实施领导。在这半年期间，我们，市党委会，一次都没有顾得上向编辑委员会提出要做总结或汇报，或看看他们的工作计划。我指的是党的市委机关，无论是《星》还是《列宁格勒》的编辑部工作计划都没有一次提交过。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从苏联作家协会方面，斯大林同志，我应该提供情况。出版的最近一期杂志封面上

<sup>①</sup> 波普科夫、彼得·谢尔盖耶维奇（1903-1950），时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和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在所谓列宁格勒案件中遇害。

印着，这个杂志不是苏联作家协会的，它每次出版，封面上都印着这是列宁格勒作家协会的机关杂志。1946年的各期杂志都在封面上印着列宁格勒作家协会，而不是苏联作家协会。曾经是苏联作家协会机关杂志，可后来突然成了列宁格勒的，这是怎么搞的呢？谁在这件事上错了，这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是我们的过错，忽略了这一点。第二，谁是这事的发起人？发起人是吉洪诺夫同志和萨亚诺夫同志，可是关于这一点他们什么也没说，而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实际的结果是，苏联作家协会对这个杂志撒手不管，不再领导它，也不再帮助它。这是从领导的观点看。

为什么改变了，是否有过中央关于此事的通知，我还特别要求查明此事是怎样发生的，是谁提议的。就此我曾向库兹涅佐夫同志查询，为什么、从什么时候起文学杂志《星》成了列宁格勒作家协会的杂志？结果弄清楚了，关于这一点什么决定也没有，而是根据萨亚诺夫和吉洪诺夫之间的一次谈话，就把它称作了列宁格勒作家协会的机关杂志。这是这个杂志的作用为什么会这样大为下降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我认为是编辑委员会的、特别是萨亚诺夫同志和编辑部过去的全体成员的「过错」。左琴科在他们所有的人那里享有很高的威望，顺便说一句，关于这一点谁也没有说，遗憾的是今天仍然如此。讨论编辑部的最后组成的时候我不在，他们全都推荐左琴科。要知道，为什么在《星》上刊出了左琴科最近一些作品？因为他们，编辑部成员，谁也不敢不做这件事，因为你们认为他是沙皇和上帝，甚至如果他写的是一派胡言，你们也不认为自己出于作家的荣誉和责任应该制止他。没有任何人做这件事，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对谁说过这一点。维什涅夫斯基同志现在的发言很好，可是在《真理报》刊出对他的好评之前，在此之前，谁也没有说过什么，甚至没有批评过。

关于阿赫玛托娃。这里也是这样的结果：这是个这么有声望的人物，这样的女诗人，我们怎么能不在我们的《星》上登她的作品呢？要知道，问题就在这里，斯大林同志。他们对他俩卑躬屈膝，害怕理直气壮地说话。他们那里没有真正的自我批评或者批评，而就其实质而言，他们把这个杂志变成了那些似乎是不能批评的人物的自己的狭小圈子。由于这一点，结果是我们这里无论在哪个杂志上，包括《列宁格勒》上，都不曾有过真正揭露这部或那部作品缺点的批评。

喊声：《列宁格勒真理报》赞扬了格尔曼<sup>①</sup>。

波普科夫：对，有这事，赞扬归赞扬，可批评——没有批评过，所以我们这里才搞成这样。

马林科夫：为什么批准左琴科<sup>②</sup>？

波普科夫：我应该承担责任，我忽略了市党委会的这个决定，这是我不在时发生的，卡普斯京<sup>③</sup>同志主持的会议。我不推卸自己的责任，不过我知道得太晚，只在前几天才知道。我跟希[罗科夫]<sup>④</sup>同志商定，建立一个工作组检查各杂志的工作并把这个问题拉交党的市委会。这样的工作组正在工作，可是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赶在了市党委会的前头，这我也应该负全部责任。第二，为什么市委会批准编辑部组成，要知道这不是市委的事。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杂志封面上印着列宁格勒作家协会出版。在市委会，我们无权批准编辑部，我们可以提交党中央审查和批准。而结果是我

① 格尔曼，尤里·帕夫洛维奇（1910～1967），作家，电影编剧。

② 1946年6月26日列宁格勒市委批准了《星》编委会组成，左琴科也在其中。

③ Я.Ф.卡普斯京（1904～1950），1945～1949年是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在所谓列宁格勒案件中遇害。

④ Н.М.希罗科夫（1899～1984），1945～1946年间是列宁格勒市委负责宣传工作的书记。

们批准了，因为它成了列宁格勒作家协会的机关杂志。

最后，关于《列宁格勒》。正如亚历山德罗夫同志提出的，我认为，为了把《星》杂志提高到应有的水平，有必要取消《列宁格勒》这家杂志，在列宁格勒只保留一家杂志，以便给作家们更多的机会更广泛地参加，并在这家杂志上刊登从艺术角度来看更专业的文章。

最后，安德列·亚历山大罗维奇，我认为有必要认真地解决《星》的主编的问题。究竟可以任命谁呢？如果从我们列宁格勒的作家中选，我认为，例如，我们的作家中最适合的候选人是普罗科菲耶夫同志。

日丹诺夫：萨亚诺夫怎么样？

波普科夫：他是个文化水平高而且通晓业务的人，但是个优柔寡断的人。我应该坦率地说，他竭力处在一个谁也不得罪的位置上，我觉得杂志的利益因此而损失很多，结果我们的《星》就走到了这样的境地。我认为有必要给杂志的编辑部派一名我们党的工作者担任副手，比方说从我们的《列宁格勒真理报》或者从《宣传与鼓动》杂志派去，作为这个编辑部工作的组织者。

马林科夫：格尔曼应当留下吗？

斯大林：他是个好作家，但是他们认为作家们不要从事政治，鼓吹不问政治。

吉洪诺夫同志在1946年8月9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上就《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问题的发言

列宁格勒的杂志当然不是省城的、小城市的杂志。确实，这样的杂志应该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刊物。

我们大家都对苏联文学而首先对列宁格勒的杂志负责，因为我们不能把我们苏联作家的列宁格勒队伍与我们作家的其他队伍分

开。当我想起列宁格勒文学的光辉时期——那个时期出现了许多被载入苏联文学史的优秀作品，便觉得这是我们共同的欢乐。而现在却痛心地看着，我们的列宁格勒人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更主要的，杂志不是那种新的、积极的因素的核心，而这些因素它们甚至在围困时期都是拥有的。可能那时候更困难些，杂志要差些，不过，真的，它们是有思想的，是坚强的。我们要对那里发生的事负责。真不明白，儿童故事体裁为什么会进入这个杂志。如果是作为儿童作品来分析，它们也并不典型到应该在杂志的特别专栏中刊用。

至于列宁格勒作家们的特殊情况，那里形成了下述局面。一部分作家牺牲了。牺牲了35位作家。我们感到这是巨大的损失。牺牲者之中有一些有才华的人，他们曾答应写许多作品。此外，许多作家离开了列宁格勒，留下的部分也疏散了。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列宁格勒的主题，他们不知所措，他们开始说——我们怎样去写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呢。让我们想想吧。他们不知所措。于是他们每一个人开始继续以前自己走过的路线。拿鲍里索夫来说。我认为鲍里索夫是个有才华的人，然而他最近的一部作品白写了，因为他挑选的格林不需要这样的作品，因为格林自己写自己的自传更好。而格林如此受欢迎，甚至不需要再重复写他。如果鲍里索夫能考虑这一点，他能写出很好的作品来。

安娜·阿赫玛托娃，这是件特殊的事，这不仅是列宁格勒的问题。青年一代以为她死了，但突然又看到了早就走完了自己政治生活道路的女作家。如果她不顾年纪写出了普罗科菲耶夫谈到的那些诗，那么这也并不意味着此后她会恢复原有的地位。新东西阿赫玛托娃什么也写不出来。所以，我们想，不必去安排她写什么东西，这不会是对制度的颂扬，她不可能对这样的制度抱有希望。

当列宁格勒的传统开始混杂的时候，当开始从装甲车转向青铜骑士的时候，这就为导致另一种错误状态打下了基础。

因此，所有这些错误源自软弱无力的状态。甚至从道德方面来说，甚至有非常差的作品。此外，有崇洋媚外的现象。有这种现象。谢天谢地，现在这种现象正开始消失，人们开始明白，不能容忍盲目仿效普利斯特列<sup>①</sup>，他近来占据了我們所有的杂志和舞台。然而，现在作家们明白了，普利斯特列不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名人，而是兴起于快速、轻松的文学重商主义的产物。这一点现在已经弄清楚了。

在推荐巴尔扎克和其他外国作家的時候，杂志也犯了错误。当然，我们的新作者们的短篇小说经受不住批评，不过毕竟不可这么做。

我觉得应当帮助列宁格勒的杂志。这里进行的讨论和对它们的批评，是崇高的荣誉，这不仅给列宁格勒的杂志、也给其他杂志压了大得多的责任。杂志应该成为伟大政治生活中的一支真正的文学队伍。

斯大林：它们应该教育我们的青年。

吉洪诺夫：所以应当大力加强编委会的工作。应当用政工人员，也许，甚至用哲学方面的工作者充实加强编委会，他们可以当责任主编，或者副手，或者书记。毫无疑问，这个工作应该提高。而《列宁格勒》不能停办，因为这将是我们文学战线的—一个损失。这就是说，我们不放弃这个“5戈比硬币”，如我们以前说的——列宁格勒防线的特殊地段，哪怕很小，却有重大意义。如果我们失去《列宁格勒》，这将意味着我们失去了一小块苏联文化。

希罗科夫同志在1946年8月9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上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问题的发言

① 普利斯特列，生于1894年，英国作家，文艺学家。

亚历山德罗夫同志对《星》和《列宁格勒》作了正确的评价。不能不同意这个评价。为什么《星》和《列宁格勒》会落到这么难堪的状态呢？可以有双重解释：共同的原因是杂志的编辑部工作不力和列宁格勒市委宣传部对杂志领导不够。杂志的编委会没有组织好作者团体。编委会的工作中没有计划。到编辑部的稿件在相当程度上是自由来稿。编委会收到的稿件不是他们应该预先组织的，而是投到编辑部的。杂志编辑部自由主义地对待作者们。选择稿件时遵循的不是原则性的考虑，而是怕得罪人，不愿破坏与同志们的友好关系。这妨碍工作，太妨碍了。

萨亚诺夫同志在这里的发言很好，指出了杂志工作中最大缺点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作家们的思想政治水平不够高。这也可以说明一个可悲的事实：许多作家，大部分，正在抛弃苏联的题材。

如果一个人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思想武装自己方面做得不够的话，他在战后复杂的环境中辨别方向的能力就很弱，因此他对于成功地写出当代激动人心的题材就没有信心，他害怕失败，害怕批评。

编委会工作不力的结果是，好的作品和坏的作品在杂志上常常和平共处。我不能说《星》和《列宁格勒》刊登的只是坏作品。也有好的短篇小说。例如，《星》1946年第4期登载了索洛维约夫的一篇不坏的短篇小说《航海者纽莎大婶》。短篇小说的主人公是列宁格勒的一个妇女，她积极参加保卫列宁格勒的斗争。与这个短篇小说一起，刊登了另一短篇小说，德米特里·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莉莉·马尔涅特》。这个短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妓女。或者拿1946年《星》第5-6期合刊为例。在这一期杂志上登载了索科洛夫-米基托夫的短篇小说《潜水员》，写的是水下特种作业队员们为列宁格勒而斗争的事。依我看，这是一篇不坏的短篇小说。与这个短篇小说一起的是左琴科的「短篇小说」《猴子奇遇记》。这里已经对

这个短篇小说作出了评价。是的。在这个短篇小说里战争题材被庸俗化了。战时的苏联人被描写成游手好闲的人物。在杂志上好作品与坏作品就是这样结合的，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编辑部没有组织稿件，来稿放任自流，结果是杂志失去了自己应有的面貌。如果不对稿件作出计划，那么决定杂志面貌及其方向的就不是编委会，而是偶然的作者们。这非常危险。

我不能说列宁格勒市委宣传部对杂志一点不重视，不关心杂志。我们关心过，当然，我们没有能揭露这里指出的所有严重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还是揭露了一系列错误和缺点，五月份在市委宣传鼓动部里召开的《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编委会会议上讨论过这些缺点。6月，市委宣传鼓动部召集了作家积极分子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也大体上讨论了列宁格勒作家们的工作问题，但更多地注意到了杂志的工作问题。我们谈到了这些杂志的缺点。那么列宁格勒市委宣传部有什么没有做到，以及它要承担什么责任呢？我们未能在列宁格勒的各家报纸上组织对我们杂志缺点的批评。我们的列宁格勒报刊很少注意这些杂志。我们未能及时地解决编辑部的组成问题。编委会工作不得力。例如，在《星》编委会工作的是两个人——萨亚诺夫和普罗科菲耶夫。

斯大林：不会安排工作。在列宁格勒不可能没有人。

希罗科夫：有人，但工作组织得不好。主要的错误就在这里。《列宁格勒》编委会按其组成来说人数不少，但按产生的原则来说编委会的组成就不对：那里有画家，那里有作家，那里还有建筑师，可是工作只有两个人——利哈廖夫和列沃涅夫斯基。我应该说，利哈廖夫工作得少，他在很大程度上把工作委托给列沃涅夫斯基。我不能说列沃涅夫斯基任何坏话，他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但负责杂志的是利哈廖夫。

口丹诺夫：列沃涅夫斯基是书记吗？

希罗科夫：是书记，但实质上是拉工作来自己承担。为了帮助杂志，列宁格勒市委宣传部应该做些什么呢？最好是组织大规模地对作家们的思想政治培训。这方面我们暂时做得少。的确，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学开设了艺术工作者班，其中也包括为作家办的班，不过应该坦率地说，作家们并不总是乐意去那里在这个班学习。现在我们正在招收大学一年级的学员，计划招收300人。我们必须更多地向作家们提供上马克思主义大学的机会。

斯大林：要把他们拉到学校去。这将会很困难，他们是成年人。给他们教科书，他们会读的，自己会懂的。干嘛往学校拉？

希罗科夫：他们搞不成的。

斯大林：有了兴趣，他们会读的。

希罗科夫：还应当解决《星》和《列宁格勒》编辑委员会的班子问题。

马林科夫：现在主编是谁？

希罗科夫：萨亚诺夫。

马林科夫：关于编辑部的班子有过决议吗？

斯大林：推举了谁当主编？

希罗科夫：推举了青年作家卡皮察。我们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也许是错误的。我们出于下面的考虑：萨亚诺夫同志在作家中间是知名人士，但他不大具有组织才能，很少对作家提出要求。

斯大林：怎么没听说过这位作家？

希罗科夫：卡皮察是个青年作家，他现在出版了作品《在公海上》。

马林科夫：作家们承认他吗？

斯大林：他在作家们中间会有威信吗？

希罗科夫：在列宁格勒，讨论过主编问题，列宁格勒作家中间没有反对意见。

斯大林：也许，采取这种态度是因为，对弱者不用害怕。在旧时代曾让外人、软弱的人当沙皇，以便比较容易对他施加压力。也许，情况就是这样？

希罗科夫：我不这么想。

马林科夫：行吧，现在是这个编辑部还是老的编辑部在工作？

希罗科夫：暂时是老的。

马林科夫：新编辑部两个月以前就任命了，可在工作的却是老的。

希罗科夫：第6期是老编辑部准备的，决定让它把已开始的工作做到底。

日丹诺夫：到时候列宁格勒人会让左琴科彻底完蛋。

斯大林：可是像左琴科这样的人，他们有权支配杂志。这是列宁格勒的杂志还是苏联作家协会的杂志？

希罗科夫：不，不是列宁格勒的。

斯大林：您希望批准你们的决定吗？

日丹诺夫：您签字同意了新编辑部，还是两者都存在？

希罗科夫：是我们自己通过决定的。

马林科夫：通过了批准编辑部的决定，吸收了左琴科。

斯大林：你们关于新编辑部的决定通知列宁格勒委员会了吗？

马林科夫：这是列宁格勒委员会决定的。

斯大林：您是要求我们批准这个？

希罗科夫：按中央提出的问题看来，《星》的主编应当由让更重要的人来当，这个人应该不但在列宁格勒而且在全国都有名气。卡皮察在列宁格勒都知道，但全国不知道。

斯大林：宣传鼓动部不知道关闭〔杂志〕的意向？

希罗科夫：不。

№02236

## 阿巴库莫夫关于左琴科问题

### 致库兹涅佐夫的报告

(1946年8月10日)

绝密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A. A. 库兹涅佐夫同志

送上苏联国家安全局保存的有关作家 M. M. 左琴科的资料。

附件：见文本。

B. 阿巴库莫夫<sup>①</sup>

### 作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左琴科的情况(资料)

左琴科，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1895年生于波尔塔瓦市，无党派人士，俄罗斯人，出身贵族，曾任沙皇军队上尉，苏联作家协会会员，勋章获得者。常住列宁格勒市。

左琴科在其自传中写道，他生于艺术家家庭，其父贵族出身。

---

<sup>①</sup> 阿巴库莫夫，B. C. (1908~1954)，1946~1951年期间担任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1951年6月被开除出党并被逮捕，1954年12月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庭判处枪决。

1913年中学毕业，入大学法律系；1915年初离开大学上前线，在前线直到1919年春——一起先是在沙皇军队，后来在国内战争中加入红军。在前线负伤，中过毒气。1919年4月因心脏病解除兵役，此后三年期间变换过约10种职业。曾任刑事侦查员（奥拉宁包姆市），家兔养殖业和养鸡业指导员（斯摩棱斯克省曼科沃），边防警卫部队话务员、民警（利戈沃）等等。1921年开始写短篇小说，首篇短篇小说刊登于1921年12月的《彼得堡丛刊》。

多年来，左琴科是以具有反苏维埃观点、批评党在艺术和文学方面政策的作家为自己的特征的。左琴科直到最近在创作活动中仍然置身于苏联现实生活之外，不参加反映我们当代现实的文学作品的创作。

过去（1921年），左琴科曾是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sup>①</sup>的成员。就其思想体系的性质而言，该文学团体是有害的集团。它在1921年发表的《宣言》中说：

“在兵营式生活的规定和条例的时代、在建立铁的和枯燥的章程的时代，我们被迫组织起来。我们受到左右夹攻。人们问我们跟谁一起——跟保皇党，跟社会革命党人抑或跟布尔什维克？”

我们——不跟谁，我们只是俄罗斯人……没有一个政党大体上使我们满意。艺术没有社会功能。社会功能会毁掉艺术，扼杀天才。我们写作不是为了宣传……”

在这个时期，左琴科是反苏短篇小说的作者，这些作品在其亲近的文学圈子里阅读。

左琴科经常流露出对苏联书刊检查的敌视态度，抱怨无法从事

<sup>①</sup> 1921年产生于彼得格勒的文学团体，名称取自于德国浪漫主义作家E.T.A. 霍夫曼的同名小说集。其宗旨是探索新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进行形式方面的实验。有些成员提出了不同政治的主张。著名作家B. 伊万诺夫、B. 卡维林、K. 费定、H. 吉洪诺夫、M. 斯洛尼姆斯基等都曾是该团体的成员。

创作。

早在1927年他就宣称：

“我们是软弱无力的幽默作家，不准我们接触非常重要的各种问题。任何批评都被禁止。意识形态的必定要求剥夺了客观反映日常风习和生活的可能性。”

1940年就此问题左琴科说：

“我全然不知我应该写什么、能够写什么，写得尖锐吧——不允许，写得简单吧——我很难。我看到周围是一片混乱……工人们和职员们不关心自己的工作，况且也不可能关心，因为为此应该付给他们赖以谋生的金钱，而不应该使他们依附于工作……总之，印象是这样的，好像一切机构的核心全瓦解了，因为大多数好的领导人被除掉了，而新的又没有。”

1942年，那时德军还在进攻，左琴科表露出对苏联取得对德战争的胜利没有信心。

1943年，左琴科写了《日出之前》一书，书中以粗鲁庸俗的腔调描写苏联的现实生活。苏联人被描绘成道德低下、卑微和自私自利的。文学评论和社会舆论斥责这部作品在思想意识上是有害的。

M. M. 左琴科认为，对他的中篇小说《日出之前》的批评和指责不是针对作品而是针对他本人的。

“我曾被明确地示意，这里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中篇小说。总之是试图‘打倒’作为作家的我，因为我的全部作品，不仅仅是中篇小说《日出之前》，是受到‘上面’指责的。”

左琴科说，他的中篇小说引起了普遍的赞赏，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称赞过它；科学院院士斯佩兰斯基和精神病学家季莫费耶夫同意左琴科的“科学的”论断。联共（布）中央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准许它出版，而在“严厉批判”期间这些人物大多数“出卖了”

他，出来反对这本书。

因此，左琴科对苏联文学的状况作了如下的评价：

“我认为，苏联文学如今是一片悲惨景象。在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陈规旧套。因此甚至有才能的作家们也写得不好，很枯燥。领导者往往对艺术的各项任务没有深刻的理解。”

“创作应该自由，可我们——一切按照命令，按照任务，在压力之下。”

关于自己的未来计划问题，左琴科说：

“我须要等待。在战后，文学的环境很快就会改变，给我设置的一切障碍将会倒塌。那时我将重新发表作品。暂时我不会有任何改变。坚守自己的阵地。何况读者是知道我和喜欢我的。”

1944年左琴科回到了列宁格勒永久住所。他在这里写了一组短篇小说《关于战争》，其内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表面上强调要努力改变他的创作，写具有现实意义的题材，但实际上，左琴科仍然在写并在听众面前朗诵反映他的和平主义世界观的作品（短篇小说《战略任务》、《菜汤》等等）。

左琴科在最近时期只限于创作一些艺术性不高的喜剧，其内容是别有用心的，如《帆布公文包》、《十分愉快》。

现在，左琴科仍然批评检查制度的严格规定，以及没有条件真正搞创作。左琴科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作家中间有着相当广泛的联系。

列宁格勒方面与之亲密的有作家斯洛尼姆斯基、卡维林、H. 尼基京（都曾是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成员）。

苏联国家安全部第二总局局长 舒勃尼亚科夫

1946年8月10日

**№02237**

## 谢尔巴科夫关于左琴科短篇小说集 致库兹涅佐夫的报告

(1946年8月12日)

致联共（布）中央书记 A. A. 库兹涅佐夫同志

在应当出版苏联作家优秀作品的《星火》杂志丛书里竟发行了米哈伊尔·左琴科的短篇小说集，印数为100千册。这本集子收入了诽谤性短篇小说《猴子奇遇记》，该作品在联共（布）中央对列宁格勒杂志的评论中已遭到谴责，并在最新一期《文化与生活》报上受到公正的批判。

在集子的其他短篇小说中，不同程度地可以见到与《猴子奇遇记》同样的对苏联现实生活进行庸俗讽刺的主题。

短篇小说《过了三十年》叙述作者如何来到他的亲姐姐那里，并“送给她的孩子们每人一百卢布买玩具。把自己的一个写着‘祝君幸福’金字的烟盒给了她的丈夫——一个保健医生。后来我又给了她的孩子们每人一百卢布看电影和买糖果。”

短篇小说的寓意是：“应该爱和怜悯人们，哪怕是你亲近的人。”

每个读者都会明白，按照左琴科的看法，在苏联不爱惜和怜悯人们——不但对坏人，而且也对好人。而为了使大家都幸福——应该给大家送礼物。

短篇小说《火钩子》讲了一件“滑稽可笑的事”，一个烧炉工烧6个炉子……但只有一把火钩子。他的这把火钩子烫伤了一个女

职员。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念头——让每个炉子都有一把火钩子。一层层提出申请，可是……仓库里没有火钩子了。

这个小短篇可能被刊登在任何一家外国报纸上作为反苏宣传的样板：在苏联甚至连火钩子都成了稀缺的了！

如此臆造出来的还有短篇小说《一张照片》，讲的是作者的苦恼，他因为在8天里没能照上相而昏倒了。除了通行证要照片，可怜的作者“还要为乘车船的证件，为会员证，为寄照片给我的亲戚们而拍照。”

在短篇小说《蜜蜂与人》中左琴科用下面手法写我们的铁路运输：

“——尊敬的，请问，我们要在您的车站呆很久吗？”

——说实话，我不知道，也许得呆到晚上吧。

……是呀，有一些蜜蜂总算来得及赶上车，而大部分就留在田野里和小树林中了。

……蜜蜂和野兽绝对受不了对它们命运的冷漠。您对待它们大概像对待人那样……”

从列举的例子可以看到，米哈伊尔·左琴科的整本集子是歪曲地反映苏联现实的粗鄙庸俗之作。

M. 左琴科低级庸俗、缺乏思想性、反艺术的短篇小说在莫斯科也找到了靠山，被收入诗人 A. 苏尔科夫主编的《星火》丛书出版，印数十万册。

联共（布）中央干部部部长 M. 谢尔巴科夫

1946年8月12日

№02238

## 叶戈林关于左琴科背景材料 致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6年8月14日)

致联共（布）中央书记安·亚·日丹诺夫同志

### 关于 M.M. 左琴科的资料

1895年出生于彼得堡贵族家庭。曾在彼得堡大学学习、毕业，在沙皇军队中当过军官。国内战争年代在红军服役。以后左琴科更换了一连串职业；做过办事员，当过刑侦处侦查员，家兔养殖业和养鸡业指导员等等。1921年起开始发表短篇小说。曾经是宣扬文学不问政治，作家独立于社会生活的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的成员。

新经济政策时期，左琴科是无聊的幽默短篇小说的作者，作品的主要人物是小市民，市侩。左琴科的短篇小说没有严肃的揭露性质，是一种低级趣味的取笑逗乐，常常转为对苏联人的挖苦（短篇小说《澡堂》、《贵妇人》等）。左琴科的幽默作品具有思想性很差而粗俗拙劣的特点，既与俄国古典的讽刺文学传统（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契诃夫），也与苏联的讽刺文学背道而驰。

在随后的年代里，左琴科也没有创作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左琴科仍然是个思想性很差的、不问政治的作家，他看不见苏联生活发展中的好的一面。左琴科直到今天还在其短篇小说中顽固地宣扬

这样的思想：在苏维埃政权的年代里苏联人的面貌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仍然是小市民和市侩（参见例如短篇小说《一张照片》，1944年；《如果他 50 岁》，1946 年，等等）。卫国战争时期，左琴科写了一部平庸的中篇小说《日出之前》和一些思想上有害的关于战争的短篇小说，其中红军战士被描写成目光短浅、蒙昧无知的人（短篇小说《女教师》、《贫瘠的土地》等等）。

在其最近的短篇小说《猴子奇遇记》中，左琴科彻底暴露出自己是具有反动倾向的作家，是苏联文学中的异己分子。

A. 叶戈林

1946 年 8 月 14 日

№02239

##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 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

（1946年8月14日）

### 关于《星》和《列宁格勒》

联共（布）中央注意到，在列宁格勒出版的文学艺术杂志《星》和《列宁格勒》的工作完全不能令人满意。

最近一个时期，在《星》上刊登苏联作家意义重大和成功作品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思想性很差的、意识形态上有害的作品。为作家左琴科——其作品与苏联文学背道而驰——提供文学园地是《星》的不可容忍的错误。《星》的编辑部知道，左琴科很早就专门写作空洞无物和低级趣味的作品，宣扬腐朽的无思想性、低级趣味和不问政治，蓄意使我们的青年迷失方向并毒害他们的意识。左琴科最近发表的短篇小说之一《猴子奇遇记》（《星》1946年第5-6期合刊）是对苏联日常生活和苏联人的下流诋毁。左琴科以荒唐的漫画方式描绘苏联制度和苏联人，诽谤性地把苏联人描写成无知、落后、愚蠢并且具有庸俗的爱好和习俗的人们。左琴科对我们现实生活恶毒的流氓式的描写带有反苏攻击性质。

《星》将篇幅提供给像左琴科这样的文学界庸俗之辈和败类，更不能容忍的是，《星》编辑部清楚地知道左琴科的面目和他在战争时期的不体面行为，当时左琴科非但没有给苏联人民反抗德国侵

略者的斗争任何帮助，反而写了如《日出之前》这样的极其恶劣的作品，对这部作品党刊《布尔什维克》已作出了评价，如同对左琴科的全部文学“创作”作出评价一样。

《星》还千方百计地推广女作家阿赫玛托娃的作品，她的文学和社会政治面貌早已为苏联社会舆论所知晓。阿赫玛托娃是那种与我们的人民格格不入、空虚无聊而又缺乏思想的诗歌的典型代表。她的充满悲观主义和颓废心理的诗表达的是往昔沙龙式诗歌的审美情趣，停留在资产阶级—贵族阶级的唯美主义和颓废派“为艺术而艺术”的立场上，不愿与自己的人民步调一致，给教育我们青年的工作带来危害，也为苏联文学所不能容忍。

容许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在杂志上发挥积极作用，无疑带来了在列宁格勒作家中造成思想分歧与组织涣散的因素。杂志上开始登载宣扬那种不合乎苏联人本性的、对西方当代资产阶级文化卑躬屈膝的作品，开始登载充满忧郁、悲观和对生活绝望的作品（1946年第1期萨多菲耶夫与科米萨罗娃的诗，等等）。由于刊登这些作品，编辑部加重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更加降低了杂志的思想水平。

容许那些思想意识方面异己的作品渗透杂志的结果是，编辑部降低了对所刊登文学稿件的艺术质量的要求。杂志开始充斥艺术性不高的剧本和短篇小说（亚格德费利德的《时间之路》，施泰因的《天鹅湖》，等等）。对稿件不加选择地刊登，导致杂志的艺术水平下降。

中央注意到，《列宁格勒》的表现特别恶劣，它经常给左琴科的低级下流的诋毁言论、给阿赫玛托娃的空虚和不问政治的作品提供篇幅。同《星》的编辑部一样，《列宁格勒》的编辑部也犯了重大的错误，发表了许多宣扬对一切外国的东西卑躬屈膝的作品。杂志发表了许多错误的作品（瓦尔沙夫斯基与列斯特的《柏林上空事件》，斯洛尼姆斯基的《在边防哨所》。哈辛的《奥涅金归来》一诗

以讽刺性文学仿作形式诋毁现代的列宁格勒)。《列宁格勒》上刊登的稿件多半内容空洞、质量低劣。

在英雄城市列宁格勒——这个以先进革命传统而著名、向来是先进思想与先进文化发祥地的城市——出版的《星》和《列宁格勒》，居然容许与苏联文学格格不入的无思想性与不问政治的东西混了进来，这怎么能够发生呢？《星》和《列宁格勒》编辑部的错误说明了什么？杂志的领导人，首先是它们的主编萨亚诺夫同志和利哈廖夫同志，忘记了列宁主义的一条原则：我们的杂志，无论是科学的或者文艺的，都不能成为不问政治的。他们忘记了我们的杂志是苏维埃国家在教育苏联人尤其是青年的事业中的强大工具，因此必须遵循构成苏联制度的重要基础——它的政治。苏联的制度不能容忍用对苏联政治不感兴趣、用冷漠和缺乏思想的东西来教育青年。

苏联文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学，其力量在于它除了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利益。苏联文学的任务是帮助国家正确地教育青年，回答他们的要求，把新一代培养成为朝气蓬勃、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不畏障碍、准备克服任何困难的人。

因此，无思想性、不问政治、“为艺术而艺术”的任何说教，都与苏联文学格格不入，危害苏联人民与国家的利益，因而在我们的杂志上不应有其地位。

由于《星》和《列宁格勒》的领导工作人员缺乏思想性，导致这些工作人员不是以正确教育苏联人以及文学家活动的政治方向的利益，而是以个人的利益、朋友的利益作为自己与文学家相互关系的基础。因为不愿搞坏朋友关系，批评变得迟钝了。由于怕得罪朋友，就放过明显不适用的作品予以刊登。这种自由主义使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正确教育我们青年的利益成了朋友关系的牺牲品，批评

被压制，使作家不再提高自己，失去其对人民、对国家、对党的责任感，不再前进。

上述一切证明，《星》和《列宁格勒》的编辑部不能胜任交给他们的工作，在对杂志的领导中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中央查明，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特别是其主席吉洪诺夫同志，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改善《星》和《列宁格勒》的工作，不但没有对左琴科、阿赫玛托娃以及与他们类似的非苏联作家对苏联文学的有害影响进行斗争，甚至纵容与苏联文学相悖的意向与风气渗入杂志。

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忽略了杂志极其严重的错误，放弃了领导，使苏联文学的异己分子如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之流有机会占据杂志的领导地位。不但如此，列宁格勒市委（卡普斯京同志和希罗科夫同志）明明知道党对左琴科及其“创作”的态度，仍越权批准今年6月26日市委关于《星》编委会的新班子的决定，使左琴科成为其中的一员。正是这样，列宁格勒市委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列宁格勒真理报》也犯了错误，它在今年7月6日的一期上刊登了尤里·格尔曼吹捧左琴科创作的令人可疑的评论文章。

联共（布）中央宣传部没有保障对列宁格勒杂志工作的应有的监督。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

1. 责成《星》编辑部、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和联共（布）中央宣传部采取措施无条件地清除本决议中指出的杂志的错误与缺点，纠正杂志的方针并保证杂志的思想艺术水平，禁止左琴科、阿赫玛托娃之流的作品进入杂志。

2. 鉴于目前没有适当的条件在列宁格勒出版两种文学艺术杂志，停止出版《列宁格勒》，把列宁格勒的文学力量集中于《星》的周围。

3. 为了整顿《星》编辑部工作的制度和认真改善杂志的内容，

设杂志主编及其属下的编委会。确定杂志的主编对杂志的思想政治方向和所刊登作品的质量负全部责任。

4. 批准 A.M. 叶戈林同志为《星》主编，保留其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职务。

5. 委托中央书记处审查和批准杂志各部门编辑和编委会的组成人员。

6. 撤消列宁格勒市委今年6月26日关于《星》编委会的决定，此决定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市委第二书记 Я.Ф. 卡普斯京同志应对通过这一决定负责，给予警告处分。

7. 解除 И.М. 希罗科夫同志的列宁格勒市委分管宣传的书记、宣传鼓动部部长的职务，调回联共（布）中央分配工作。

8. 委托列宁格勒州委负责《星》的党的领导。责成列宁格勒州委以及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波普科夫同志本人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改进杂志，加强在列宁格勒作家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9. 因对《列宁格勒》领导不力，对 B.M. 利哈廖夫同志给予警告处分。

10. 注意到《星》的出版已有相当大的延误，装帧极其草率（封面不美观，没有标明每一期出版的月份），责成《星》编辑部保证及时出版并改进其外观。

11. 委托中央宣传鼓动部（亚历山大罗夫同志）监督中央本决议的执行。

12. 3个月 after 在中央组织局听取《星》的主编汇报执行中央决议的情况。

13. 派日丹诺夫同志出差列宁格勒以阐明联共（布）中央的本决议<sup>①</sup>。

<sup>①</sup> 参见本专题 No02241 文件。

№02240

## 叶戈林关于左琴科情况的简要报告

(不晚于1946年8月15日)

苏联作家协会列宁格勒分会中与左琴科有密切关系者有：萨亚诺夫、普罗科菲耶夫、斯洛尼姆斯基、卡维林和尼基京。萨亚诺夫和普罗科菲耶夫与左琴科的关系是他们定期在彼此的住宅会面，讨论苏联作家协会列宁格勒分会的工作。在进行这些谈话时，照例要喝酒。

利哈廖夫与作家左琴科的关系不详。必须指出，普罗科菲耶夫和萨亚诺夫千方百计地支持左琴科，主要是推荐他的文学作品。

苏联作家协会列宁格勒分会的领导想方设法支持左琴科作为写现代题材的作家的创作活动。尽管左琴科的作品中存在着一系列不可宽恕的政治错误，且内容的艺术质量低劣，但他们仍然竭力促成左琴科的作品问世。

1943年左琴科写了《日出之前》一书。就其内容而言，这本书在思想上是有害的，遭到了文学界和出版界的严厉指责。

在与亲密小圈子里的人谈话时，左琴科对自己的作品受到指责一事声称如下：“不能对文学实行集中化管理。这在生活中可以做到，但在文学中不行。这不是正确的体制，它将导致我们不会有真正的文学。也不能进行斗争，对手谢尔巴科夫太强大（谢尔巴科夫同志对此作品给了否定的评价）。谁都不想看到自己完蛋。全是平庸之辈。在这部作品里我伤了许多人，就有了这样的结果。”

1944年从莫斯科回到列宁格勒后，左琴科写了一组关于战争

的短篇小说，其目的是在《日出之前》一书失败后争取苏联国家和党的领导机关方面的肯定评价。但即便是他新写的关于战争的短篇小说，其内容也有一系列政治错误。在这些短篇小说里，作者和主人公对德国人过于自由主义，没有充分展开俄国人对德国人的仇恨。

左琴科最近时期的创作只限于写作一些内容上别有用心的、艺术性不高的喜剧，例如《帆布公文包》、《十分愉快》。

左琴科、斯洛尼姆斯基和卡维林之间的良好关系可联系到1926年，联系到这些人创立的“谢拉皮翁兄弟”团体存在的时期，那是文学界的一个思想和政治上有害的反对派。（关于“谢拉皮翁兄弟”参见《苏联小百科全书》，第7卷第805～806页。）

No 02241

## 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作家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不晚于 1946 年 8 月 16 日)

### 在作家会议上的报告提要

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定。我受委托在列宁格勒解释这个决定。请允许宣读它。关于《星》的缺点。

最严重的错误是为左琴科提供杂志的篇幅。

左琴科的《猴子奇遇记》。他把人们写得游手好闲、畸形丑陋。在日常生活中磨磨蹭蹭。没有一个正面人物。

猴子扮演了制度的审判官角色。它进行说教。“在笼子里生活更安宁”。

左琴科是何许人？他的面目。“谢拉皮翁兄弟”。鄙俗之徒。他的作品是催吐剂。他所代表的眼光短浅的小资产者、小市民登上舞台。

令人气愤的流氓中篇小说《日出之前》。

这个背叛信仰者和败类操纵列宁格勒的文学鉴赏力。他有一帮保护人。

坏蛋，垃圾，可怜虫。

战争时期的左琴科。

没有道德、没有良心的人。

他不喜欢我们的制度。他向往的是另外的制度。

怎么，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制度、日常生活、道德去迁就左琴科？从苏联人向后转，转向左琴科〔式的〕猴子。让他自己来适应吧。要是他不愿意，就让他从苏联文学中滚出去。

第二号人物，“大红人”，是阿赫玛托娃。一个与苏联文学格格不入的、空虚的、缺乏思想的诗歌的代表人物。

高尔基说过，1907~1917的十年可以说是俄国知识分子历史上名声最卑鄙最可耻的十年。

阿赫玛托娃是资产阶级—贵族阶级诗歌的代表。

发狂的女贵族。她的诗歌题材——介于小客厅和祈祷室之间。

10000米高度的诗歌。

嘴唇加牙齿，胸脯加膝盖。

忧愁。孤独。兽性的个人主义。为艺术而艺术。

对自己的激情作无谓的分析。内心的空虚。

没有对当代生活的任何一种现象作出反应，置身于人民之外。  
她是战友……

她的诗歌是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文化没落衰亡的表现。

被即将到来的革命吓破了胆的高峰派<sup>①</sup>诗人高呼自己的口号：  
“不对生活作任何修正，不热衷于批判生活。”

毒化意识。绝不容许推广阿赫玛托娃。

我们这里不是私人企业。

3)<sup>②</sup>也毒害了其他人。

4) 鼓吹无思想性成了权利平等。左琴科成了列宁格勒文学的领导力量。

① 又称阿克梅派，1900—1919年间俄国诗歌流派之一，主张为艺术而艺术。

② 原文如此。

5) 迷恋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并非偶然。开始把自己看成是小学生了。

6) 远离了当代的题材。

7) 《列宁格勒》杂志。就是那个阿赫玛托娃，那个左琴科。对奥涅金的讽刺性模拟作品。

针对关于涅克拉索夫的讽刺作品的讽刺性模拟仿作。

一则国外的趣闻。

8) 作品的艺术质量下降。亚格德费利德的《时间之路》。施泰因的《天鹅湖》，等等。

9) 这一切都表明，那些思想性很差的文学的代表人物，空虚、空洞的诗歌以及软弱无力、低级趣味的鼓吹者，在《星》和《列宁格勒》上为自己构筑了坚固的巢穴。

10) 列宁主义认为，我们的文学应该是党的文学，应该成为用人民、国家和党的利益教育苏联人的强大工具。

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学，苏联文学是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础上形成的。

它被公认具有巨大的革新意义。

我们的作家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列宁论文学是党的文学。

我们的文学吸取了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传统。人民性。艺术为人民服务。

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致果戈理的信》。

札布罗留波夫。

杂志的领导人忘记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

我们要求服从政治。

苏联的制度不能容忍用无思想性来教育我们的人们。假如我们不是用对自己事业的信仰来教育我们的人，那么我们就摧毁不了德

国人。

我们的杂志是人民的杂志，无权迁就那些不愿承认我们发展任务的人的审美口味。

我们的利益只是：用对自己事业的信仰、用朝气蓬勃的精神教育青年。

11) 朋友关系与批评。自由主义关系到人民。没有批评什么也做不成。没有批评就会腐败。毛病会加重。只有这样才可以改进。

12) 消灭不负责任的现象。不清楚谁应负责。

13) 人民成熟了。渴求文化。要求提高了。

不是任何东西都可吞咽。

在质量上下工夫。

14) 恢复列宁格勒的光荣传统。

15) 加强思想性和艺术性。别落后。

当代的选题。

什么时候写它呢？

现在人们还只是在理解战争的意义，而两年之后将会理解复兴的意义。

16) 苏联文学的作用。我们的文学与人民亲近了。你们的每一项成就都是人民的喜事。每一次挫折都是痛苦和遗憾。

没有思想性的人想使我们的艺术丧失意义和使命，使艺术失去革新的作用，把它变为目的本身或者消遣之物。

这是返回石器时代。

这是重新回到野蛮和愚昧。

这是颓废和堕落。

你们站在意识形态的前线。

你们在哪里能找到像我们这样的人民和国家？

你们必须发展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你们必须向我们的人民指

明他们明天应该是什么样的人。

要知道我们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们了。

俄罗斯人成了另一样的人了。

关于足球赛。

应当清除什么。

坚信和歌颂社会主义。

关于质量，关于技巧，关于作品的创作。

资产阶级文化最严重的危机和衰败。

暴徒，酒吧女郎。

不是学习，而是教导。

进攻，而不是防守。

我们希望，文学不脱离现实问题，积极地干预苏联人社会意识形成的各个方面。

希望它巩固我们人民在政治—道德上的团结一致。

希望它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我们希望精神文化丰富多彩，希望苏联文化——全人类文化的先锋——繁荣昌盛。

我们希望列宁格勒恢复其先进思想发祥地的作用。

我们相信，这个任务你们一定能胜任。

No02242

## 左琴科关于个人情况致斯大林的信

(1946年8月27日)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sup>①</sup>

我从来不是个反对苏维埃的人。1918年我志愿加入红军队伍，在前线半年，与白卫军厮杀。我出身贵族家庭，但在我该跟谁走——跟人民还是跟地主——的问题上，我从来不曾有过两种观点。我总是跟着人民走。这一点任何人也不能不承认。

我的文学工作开始于1921年。怀着为人民带来利益的热烈愿望开始写作，嘲笑由过去的的生活所形成的人类性格中一切应予嘲笑的东西。

无疑，我犯过错误，有时候写出了20年代讽刺小报要求的那种讽刺作品。但如果说的是我的那些幼嫩的短篇小说，那么应当校正一下时间。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甚至对文字的态度都改变了。我在苏联杂志《捣蛋鬼》工作过，这个名称那时候好像既不鄙俗，也不下流。

我在讽刺作品方面的工作从来没有使我满意。我总是努力去反映生活的积极方面。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就像一个喜剧演员扮演英雄角色那样困难。

---

<sup>①</sup> 本文件第一页左上角有波斯克列贝舍夫签署的意见：“转日丹诺夫同志。波斯克列贝舍夫。”下面是日丹诺夫的批示：“请中央书记 A. A. 库兹涅佐夫同志、H. C. 帕托利切夫同志、Г. М. 波波夫同志、Г. Ф. 亚历山德罗夫同志传阅。日丹诺夫已阅。”

不过，我一步一步地开始避开讽刺。从30年代开始，我的讽刺性短篇小说越来越少。

我这么做还因为意识到讽刺是一种危险到什么程度的武器。白卫出版物常常刊登我的短篇小说，有时歪曲它们的意思，有时还把我没有写过的东西冒称是我写的。此外，还不给这些短篇小说注明写作日期，而我们的生活方式在这25年间完全改变了。

这一切促使我谨慎从事，于是从1935年开始，除了用具体的材料写的报纸上的小品文之外，我不再写讽刺短篇小说了。

卫国战争年代，从最初的日子起我就积极地为报纸和杂志工作。我的反法西斯的小品文常常被电台广播。而我的反法西斯讽刺时事短剧《在柏林的伪造物下》曾于1941年9月在列宁格勒“喜剧”剧院上演。

以后，我被疏散到中亚<sup>①</sup>，那里没有杂志和出版社。不得已我开始给那里的一个电影制片厂写电影剧本。

至于我的《日出之前》一书（是在疏散时开始写的），那么我觉得这本书在战争的日子里是需要的、有益的，因为它挖掘了法西斯“哲学”的根源，揭露了那个复杂总和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时常怂恿人们拒绝文明、拒绝高尚的意识和理性。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想。数十人讨论了我已着手的书。1943年6月，我被召到中央委员会，指示我继续写这部得到一些学者和权威人士很高评价的作品。

这些人后来否认了自己的意见，因此我不认为我的抱怨会加深他们的怯懦或者疑虑。而如果我现在说出这一点，那么也根本不是打算抱怨，我惟一的愿望是：表明是什么样的情况导致我犯错误，这错误大概是由我同现实生活的某种脱离引起的。

<sup>①</sup> 1941年秋至1943年春，左琴科被疏散到阿拉木图。

经《布尔什维克》的严厉批评之后，我决心为孩子们、为剧院写作，我素来有志趣于此。

这篇小小的逗乐的短篇小说《猴子奇遇记》是在45年初为儿童杂志《穆尔齐尔卡》写的。就在那里发表了。我并没有把这个短篇小说给《星》，那里的转载我事先不知道。

当然，我任何时候都不会在大型杂志上发表这个短篇小说。脱离了那些为儿童写的幽默故事，这个短篇小说登在大型杂志上无疑会引起怪诞的印象，就如同无论什么样的儿童笑话或者漫画刊登在严肃的文章中间那样。

不过，我的这个短篇小说里没有任何伊索寓言式的语言，也没有任何言外之意。这仅仅是一幅为了让孩子开心的图景。我并没有丝毫恶意。这一点我保证。

而假如我想要讽刺性地描写人们指责我写的东西，那么我可以更巧妙地做到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曾利用这种隐蔽讽刺的不道德方法，这种在19世纪就已被完全用尽的方法。

同样的，即使在我的其他短篇小说中能发现这一方法，那我也没有明确的讽刺倾向。而如果有时人们在我的文章中竭力看出某种似乎掩饰起来的描写，那么这可能仅仅只是偶然的巧合，其中没有我的任何恶意或者企图。

我不谋求任何东西，也不请求对我的遭遇作任何改善。而我还是写信给您，惟一的目的是稍许减轻我的痛苦。我非常难过，在您的眼里我竟成了一个文学滑头，一个卑劣之徒，或者是一个为地主和银行家的利益卖力的人。这是个错误。我向您保证。

米哈伊尔·左琴科

1946年8月27日

№02243

## 波诺马廖夫关于回击国外报刊 致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6年9月21日)

致联共(布)中央书记安·亚·日丹诺夫同志<sup>①</sup>

国外报刊上出现了对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关于剧院的剧目和电影《伟大的生活》等决议所作的敌视我们的评述(例如《埃及人报》，在维也纳出版的同盟国报纸，伦敦《每日邮报》，布拉格《人民权利报》等等)。

另一方面，一些同情苏联的报刊试图自负其责地解释这些决议的精神实质并予以肯定的评价。

美国杂志《新群众》给我们发来一份电报，内容如下：

“我们急需一篇题为‘关于苏联对列宁格勒两杂志、戏剧与其他艺术的批评’的详细文章。”

与我们友好的报刊需要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信息和我们的述评，以便对敌人的攻讦予以回击。

作为尝试，苏联新闻局委托作家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写了一篇文章。

请您指示，是否应该在国外报刊上阐明这一问题，以B.维什涅夫斯基文章所含原则的精神对有关言论予以回击。

<sup>①</sup> 在本文件第一页上有日丹诺夫的批示：“转亚历山德罗夫同志。日丹诺夫。”

附件：B. 维什涅夫斯基的文章<sup>①</sup>

苏联新闻局副局长 B. 波诺马廖夫

---

<sup>①</sup> 维什涅夫斯基的文章见本专题No02244文件。

No02244

## 维什涅夫斯基 给《新群众》的答记者问（草稿）

（不晚于1946年9月21日）

送新闻局<sup>①</sup>

现交上我给美国左派杂志《新群众》的答记者问的文本。

你们的杂志在苏联作家中以严肃和饶有趣味的言论而著名，特别是在文化和文学问题方面。杂志请我就有关苏联文学事业的现状答记者问，我十分乐意做这件事，特别是因为某些美国和英国的反动报纸给读者提供极不客观而且往往是不符合事实的消息。近来我在纽约的、伦敦的、甚至开罗的报纸上读到了这类消息。那些不了解苏联、不了解我们、我们长期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兴趣的记者们或者评论家们，胡编乱造地炮制有关“迫害知识分子”、颁布“法令”使我们的整个艺术变成宣传等等诸如此类的报道。所有这些敌对的胡言乱语只能引起苏联作家的抗议。任何写这些题材的人应该首先了解我们的意见。

我的短文涉及四个问题：

1.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文学做了什么，如今在战后时

---

<sup>①</sup> 本文件附有一张打字便条。内容如下：“转 Д. И. 费多谢耶夫同志。Вс. 维什涅夫斯基同志的文章，特别是涉及到批判左琴科作品的部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有些事实，如左琴科是‘沙皇军队的军官’、是‘一个尝试过好多种职业而没有成功和效果的人’、是‘闭塞、阴郁、衰老的’人等等，未必会使维什涅夫斯基文章的读者信服。文章以目前这个样子不能实现其目的。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顾问谢尔吉耶夫斯基。”

期面临什么样的任务，以及它与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有什么联系。

2. 中央的决定将对苏联文学有什么影响？对我本人有什么影响？

3. 摆在苏联作家协会新领导面前的任务是什么？

4. 我本人在1946~1947年间的文学创作情况如何？

我的回答：

1. 1941~1945年的卫国战争时期，苏联作家协会挑选了约1千名作家参加红军奔赴前线，这占了作家协会现有会员的三分之一。在这个“千人团”——我们这么称呼上前线的作家们——中，有242人死亡，137人受伤，475人受到战斗奖励。在战争中工作的作家们为所有的军事报纸和杂志服务，为莫斯科的和被围困的列宁格勒的无线电广播提供稿件，写个人的札记并不断从斯大林格勒前沿阵地发出通讯稿，剧作家们写了对德国法西斯主义作不妥协斗争的题材，出版了总结战斗经验的小册子，编制了传单和告敌军书，成功地粉碎了戈培尔的宣传……我们在战后总结出作家参加武装斗争的数十种方式。作家们曾不止一次地不得不指挥独立的团、营或者在大部队司令部工作。上面所引的数字，我认为，说明了工作曾是紧张和危险的。

作家们后来在首都的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日记。甚至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也从1942年春天起恢复了小说、剧本和插图文学杂志的出版。在这里我顺便指出，苏联出版物总的水平、其出版数量是很高的。战争前夕，例如在1940年，我们国家出版了3600种各种各样的文艺书籍。我想，你们自己也知道你们美国在这方面的统计情况。

工作的紧张程度、速度和规模在伟大的战争时期并没有下降。除1千人之外，还有其他三分之二的苏联作家在后方紧张地工作。他们描述了莫斯科、乌拉尔、西伯利亚、高加索、中亚细亚、远东

和北方的生活和劳动。对作家们所做过的全部工作的总计、分析和评价目前正在进行……我们在不久前——1946年5月——才得以举行作家—前线战士的第一次会见，并且草拟了研究1941~1945年各方面经验的方法问题。

我不打算在这里列出成千上万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戏剧、日记等等的名称。这件事将由评论家来做。不过，我要告诉美国朋友们，仅仅在上一年里我们国家就出版了70种参加过战争的诗人们的作品。现在，我们正在忙中抽空讨论所有这些作品。正在进行关于苏联诗歌的道路、关于战争对诗歌风格和题材的影响等等问题的广泛讨论。争论在有序、健康、热烈地进行……经历过从伏尔加到南波罗的海、到巴伐利亚的人们有的是话要说。

我们的文学杂志充满新的稿件。我在莫斯科编辑的杂志——《旗》，在最近三个月里就收到700份手稿。新而又新的作者不断脱颖而出。在我们的杂志上，约有百分之五十发表作品的诗人是经历过战争的青年。他们具有新的感受，新的思维……

整个苏联文学面临着十分明确的任務，即综合地描绘列宁和斯大林的时代。我们经历了30年非常复杂和艰苦的不间断的斗争……你们可以根据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阿列克赛·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以及我们许多优秀的电影等等来想象这一斗争的某些特征。经受了許多艰难困苦苏联作家给自己提出了新的目标，要在战后新的条件下，在国家面前，在全世界面前，更加广泛地揭示俄国建设的经验、苏联社会的新的心理特征、我们的道德与习俗、我们人民的内心精神世界、他们的智力水平，以及他们与外部世界的人们相比较的相似与区别。我认为，在最近几年里你们会读到许多非常有趣的书，它们将揭示苏联社会与众不同的特征。你们已经知道K·西蒙诺夫关于斯大林格勒的人们的作品。你们很快就会读到更广阔、更深刻的作品——A·法捷耶夫描写我们

的青年与德国人进行地下斗争的《青年近卫军》。不久前我见到了M.肖洛霍夫。他没有放下长篇小说《他们为祖而战》。这部长篇小说构思广阔……仅发表了6个印张就已经能够据此判断作者的一些意图。他描写了在俄国经历的最严酷考验中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1942年夏季战役时期，在南方酷热的草原上。

我感到我想要给你们讲的越来越多。假如我在你们中间，我们的谈话无疑会通宵达旦……我有过这样的经验，就在不久前，在纽伦堡，当美国人和法国人同我们俄国作家坐在一起时，大约一连12个小时他们倾听关于俄罗斯的一切，它的斗争，它的生活……

不过，电报文章应该紧凑。请相信，3000人的苏联知识分子的队伍，作家的队伍，还能够给予自己的人民和国外的读者更多的东西……我们充满向前进的执着追求，充满近几年来明显增强的精力。战争时期，我们从内心最深处感到自己与我们的先驱——与俄罗斯著名的老作家们，与我们的祖祖辈辈——有着血肉联系，他们把文学遗产传给了我们……我们认识高尔基，我们之中几乎每一个人——我说的是现在站在最前列的45—50岁的苏联作家——都是高尔基亲自领入文坛的。我们与马雅可夫斯基有过直接交往，他在自己不可遏止的全部革命激情中没有丢失俄国古典诗歌宝贵经验中的任何东西。我们怀着深厚的继承感继续自己的工作。

2. 联共（布）中央的决定对我们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在中央的三个文件中十分清楚而具体地揭露了我们文学和艺术发展进程中的障碍，指明了会使某些作家误入歧途和迷乱的有害的倒退倾向……我们喜欢说得直率、明确、直截了当……对我们来说，不容置辩的是“胜利者也要受评判”……这是战后斯大林说的。而在必要的时刻我们着手了这样的评判，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这样的分析。在战争的喧嚣声中，文学界中某些落后的和居心不良的人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开始复活“为艺术而艺术”的无益的思想、脱离斗争的

思想、神秘主义等等。所有这些垃圾，所有这种颓废风气早已从俄罗斯文学中被清扫了出去。要知道，在那些走正确的现实主义道路的作家们中间，在那些按生活本来面貌描绘生活的作家们中间，忧郁的宗教-性德的诗歌或者对霍夫曼的摹仿是不合情理的。在中央的决定中还揭露了某些作家身上局部复发的1907年（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后的反动时期）的审美和“时髦”的毛病。

人们谈论左琴科……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沙皇军队的军官，一个尝试过好多种职业而没有成功和效果的人，1922年开始写讽刺短篇小说……这些短篇小说在那时曾鞭挞了小市民、市侩……然而，后来国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的工业潜力增加了9倍。国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其意义与十月革命相仿的农业革命——集体化……国家产生了一千万新知识分子。国家教育了这样的一代青年，他们用胸膛粉碎了希特勒的坦克部队……而左琴科，闭塞、阴郁、衰老的左琴科，仍然继续写他的讽刺作品，年复一年地重复着1922年的手法。这令人腻烦。他继续写着。这就激怒了大家。评论界指出了他的胡言乱语和杂乱无章，指出了他对现实生活的无知……但左琴科继续做他的事……战争开始的时候，他抛弃了列宁格勒，跑到5000公里之外，开始写他的《忏悔录》……我从未见到过如此阴暗如此肮脏的作品。这是无聊乏味、恬不知耻的自我暴露，扒掉亲近的人的衣服……我还得继续说下去……读了这个《忏悔录》的第一部之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愤怒了。这是1943年的事。

列宁格勒抗议这个诽谤者、造谣者……在德国人的炮火下工作了730个昼夜的无线电厂工人们写了一封坚决的抗议信。我本人整个战争时期都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深知此事。我认识无线电厂的一些工人，他们常来找我。看来，这些真正的战斗的人们的抗议似乎应该对左琴科起点作用……然而，他还是阴郁地、极端个人主义

地不予理睬。他不理解或者不想理解读者的愤怒。他在他的中篇小说里诋毁列宁格勒，而列宁格勒亲自回答了他……左琴科仍然继续写他的东西。他的道德堕落到如此地步，竟没有一行字是写伟大的战争的。他对自己人民的最大痛苦和牺牲都不加理睬。我不禁记起他的自传的某些细节。1922年，他和他的朋友们自称“冒险家”……他们谈论生活没有意义，对政治斗争不感兴趣，他们把文学看做仅仅是游戏……但是，一边游戏一边诽谤俄罗斯，诽谤自己的家乡——从1941年9月到1944年1月在德军围困中巍然屹立的列宁格勒，这未免太过分了……于是我们跟这个老诽谤分子、非苏联人分手了。苏联作家协会章程（我们同高尔基在1934年制定的）说，苏联作家协会的会员是站在苏联的立场并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左琴科的所作所为远远超出了违反一致通过的章程。我想，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

使文学避免倒退的因素，深刻分析俄罗斯文学历来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统，研究颓废派、象征派的反动根源，向青年一代说明左琴科、阿赫玛托娃等人带来的危害——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很有价值的事情。

作家们的思考从来没有这样集中。开诚布公的谈话从来没有这样热烈。我们的一切力量从来没有这样积极活跃。祖国文学的全部经验从来没有被这样深思熟虑。为了理解中央的指示和建议是如何被以健康的感激的心情接受的，应该看到和听到在作家、电影工作者、戏剧工作者、艺术家中间以及在全苏联举行的各种集会。确实，这是从战争实践向战后时期各项任务的深刻转变。确实，在批判地分析全部经验、谈论成绩和揭露错误的同时，我们会比过去更有信心地前进。

我们不希望那种对革命和人民诋毁中伤者的什么“流派”或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沙皇的花园、湖泊、天鹅和各种古旧琐事、令人不

解的东西的 60 岁老女诗人的“流派”与文学中久经考验的革命流派、与伟大的高尔基为之献出毕生精力的流派、与马雅可夫斯基的名字为之增色的流派、与战斗的人民的流派一起并存。我们不愿意在我们的背后产生这类“流派”，不愿意让怯懦地从英勇的城市逃跑的人们去创造这类流派，而那些英勇的城市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地承受了德国的骇人听闻的打击——不但承受了，而且把它们击退了……还记得吧，列宁格勒人曾走在攻打柏林的部队的前列。这种光荣也落到了我的身上……

现在扼要地谈第三个和第四个问题。苏联作家协会新领导面临的任务是巨大的。我们要使协会活跃起来，吸收数十名积极而专业水平高的评论家、文学家及其他人。我们要协调作家们的工作。我们将孜孜不倦地阅读，阅读，再阅读，推出最有才能的人，把有天赋的青年推向前进。我们还要继续自己个人的创作工作，利用所有可能的时间来工作。我个人的计划是开始润色我的日记。我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写日记直到今天。积累了 45 册。这是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强攻维堡、塔林、里加，这是进军但泽，这是攻克斯德丁<sup>①</sup>，这是强攻柏林，这是胜利日子里的莫斯科，这是纽伦堡审判，这是与美国人会见，这是从战争归来和 1946 年苏联人的生活、思想和事业。

我要结束了。感谢你们的关心并读完我的报道。紧握美国读者的手。

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

<sup>①</sup> 波兰城市，即什切青。

№02245

## 亚历山德罗夫关于发表 维什涅夫斯基的文章致日丹诺夫的报告

(不早于1946年9月21日)

致联共(布)中央书记安·亚·日丹诺夫同志

苏联新闻局副局长波诺马廖夫同志在给您的信中请求批准在美国杂志《新群众》上发表维什涅夫斯基谈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决议的文章。

维什涅夫斯基的文章远未概括联共(布)中央决议的内容,不过,文章写得生动,经过某些修改和补充后在外国报刊上发表可能是有益的。在文章的第2点里作者试图说明联共(布)中央决定的意义,这里须要作重大修改。应当更明确、更有条理、更充分地说明苏联作家如何理解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使命,说明“为艺术而艺术”理论的反动本质以及早在革命前俄国进步社会舆论就对形形色色的象征主义作家、意象派诗人、高峰派分子、颓废派分子持蔑视态度,就如同对待政治和艺术中的黑暗势力和背叛行为的代表人物那样。

文章中说到左琴科的地方也应予以修改。不应写成1922年左琴科的讽刺短篇小说“鞭挞了小市民、市侩……然而,后来国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反,应该说,左琴科诋毁地描写苏联人——社会主义的英雄建设者,嘲弄苏联的日常生活和苏联的制度,翻腾生活中的细碎琐事。

苏联新闻局最好不局限于维什涅夫斯基的文章,还应在国外发

表熟悉外国报刊的最著名的苏联作家的文章和答记者问，对含有敌意的言论予以应有的反击。

Г. 亚历山德罗夫

**№02246**

## 费多谢耶夫关于文艺界 对日丹诺夫报告的反应给日丹诺夫的材料

(1946年9月25日)

作家、戏剧家、电影艺术家们热烈地讨论了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sup>①</sup>，认为它是明确苏联艺术和文学进一步发展道路的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

女作家 A. 卡拉瓦耶娃说：“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使我们的思想布尔什维克化了。他的讲话具有巨大的意义。十分重要的是，第一次揭穿了‘谢拉皮翁分子’，揭露了他们的本质。报告一定要大量发行。”

作家 Ф. 潘非洛夫：“我真心诚意地接受报告。这个报告将长期管用。我们应当在它的基础上详细制定积极的纲领，调整我们的一切工作，调整苏联作家协会的和文艺杂志等等的一切工作。”

评论家 Л. 苏博茨基：“报告中提出了文学的根本问题，揭示了文学的独特任务。报告给我们的文学评论指出了方向。党现在如此重视文学，使文学界深受鼓舞。”

评论家 O. 列兹尼克：“至今为止我们还未曾有过对苏联文学诸问题如此深刻的科学分析。我们，工作在苏联文学领域的评论家们，有责任重新认识我们一切工作的意义，无论是文学工作还是教师的教学工作。”

<sup>①</sup> 1946年8月15日和16日，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和作家会议上作了报告。报告的速记稿摘要刊登在9月21日的《真理报》上。

文艺学家 Д. 勃拉戈伊教授：“报告具有特殊的充分的价值。对我们的文学史科学来说尤其重要的是，报告中提出了对过去文学中反动流派的评价。”

苏联人民演员亚布洛奇基娜：“我们原先不知道怎样说出我们对戏剧、对文学的看法。日丹诺夫同志表达了我们共同的想法和感觉。我们很少有机会演出描苏联人的苏联剧本。我演穆尔扎维茨卡娅已经不止一个十年了。腻烦了。渴望演一个苏联妇女的角色，可是我做不到，尽管我想得要命。”

苏联人民演员帕申纳娅：“读了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之后我想，我们正准备上演列昂诺夫的《金色的马车》。要是我们上演它，我们就会失败。这完全不是日丹诺夫同志所说的，也不是党现在所要求的。”

电影导演 Г. 亚历山德罗夫：“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分析了苏联文学及其发展远景，其深刻性和最大的说服力令人叫绝。报告是艺术领域原则性批评的典范。它指出了近年来评论的贫乏和粗浅。应该学习报告，而更主要的是要把它作为评论和分析艺术作品水平的标准。”

电影摄影师叶凯利奇克：“报告可以载入苏联文学史的教科书。直到现在还从未对文学流派作过这样认真的原则性的分析，还从未对文学在苏联国家生活中的各项任务作过这样明确的结论。”

电影导演 В. 彼得罗夫：“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是许多不眠之夜的成果。看来，在报告准备付印时，日丹诺夫同志还特别仔细地作了修改。”

电影导演 А. 达维德松：“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从内容到形式都非常好。我从来不怀疑他对文学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我读了报告，而且反复读了好多遍。不仅应该读报告，而且应该研究它，首先是我们‘可怜的评论家们’应该研究它。”

电影剧本作者 E. 波梅希科夫和 H. 罗日科夫：“要是我们的影评有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那种水平的话，关于《伟大的生活》、《纳希莫夫》、《伊凡雷帝》以及其他电影的任何决议都不用作出了，因为这些错误完全不会产生。我们的报纸经常刊登的简直就是电影的复述，以此冒充影评。在这之后你就等着评论界的帮助吧！一切都得自己担风险。报告特别好，现在评论家们诉起苦来了，他们将很难写作。”

导演 H. 佩里耶夫：“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解决了一切困惑莫斯科的问题。我在读这个报告，反复地读。报告应该成为每一个艺术家的案头必备书。关于文学流派历史的精细知识、各种专门艺术问题的知识令人吃惊。报告是真正科学的学位论文。”

与上述意见同时发表的还有其他一些意见，说明某些文艺工作者没有从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中作出应有的结论，采取“观望的”立场。

据《真理报》文学部编辑 B. 科热夫尼科夫说，作家 H. 帕乌斯托夫斯基在回复请他写一篇文章的要求时说：“我现在正在研究党史，还将长期地研究下去”；作家 H. 波戈廷说：“现在大火烧起来了，而因为剧本是纸张，我不愿用它来烧这场火”；作家 JI. 斯拉温声称：他“在没有建立起秩序之前将不再写作。”据 B. 科热夫尼科夫说，某些作家正在等待“大规模的鞭挞运动过去。”

《共青团真理报》文艺部负责人 B. 日丹诺夫指出：“在青年诗人中，那些倾向于马雅可夫斯基政论诗的热烈赞同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而那些倾向于纯抒情诗的则十分惶惑不安。”

据《苏联艺术报》责任书记 H. 阿多夫说，有些剧作家感到自己“陷入了困境”。例如，H. 格拉特科夫、图尔兄弟说：他们“将什么也不能给剧院，因为要求太高了”；作家 B. 卡达耶夫说：“我给剧院写什么呢？我给过《白色孤帆》。这部作品经受了一切考

验。更多就没有了。等一切都平静下来再说。”剧评家博亚杰夫声称：“现在写剧评真难。抨击小人物，不感兴趣；而批评大人物——未必能刊登。”<sup>①</sup>

---

① 本文件附有一张打字便条，其内容如下：“日丹诺夫同志。送上文学家和艺术家对您列宁格勒党员积极分子和作家会议上所作报告的部分意见的汇总。П. 费多谢耶夫。1946年9月25日。”

№02247

## 莫斯科市委关于文艺工作者 对日丹诺夫报告的意见的通报

(1946年9月28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星〉和〈列宁格勒〉》、《关于剧院的剧目及其改善措施》、《关于电影〈伟大的生活〉》等决定和安·亚·日丹诺夫同志报告的发表,引起了艺术、文学和科学工作者强烈的兴趣和最热烈的讨论。

在莫斯科举行了全市作家大会,各戏剧团体党的会议,然后是戏剧工作者的各种会议,会上讨论了联共(布)中央决定中提出的各项任务。

在大量的发言和交谈中,作家、演员、导演和艺术家们都谈到了联共(布)中央的决定中和日丹诺夫同志报告中提出的对戏剧、电影和作家组织的活动所作的分析。

联共(布)中央的决议和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被认为是改进剧院、电影制片厂对苏联青年的教育、以文学、戏剧和电影等艺术手段积极反映苏联现代生活的工作纲领。

这些发言和意见的特点,特别在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发表之后,是真诚地希望清醒地分析戏剧、文学和电影的现状,以及意识到自己在苏联艺术和文学的思想内容方面对党和人民所负的责任。

讨论中十分重视日丹诺夫同志在报告中阐述的指示,强调必须尽快地消除剧院工作中的缺点,提高创作人员的工作的思想水平。

发言人引用了日丹诺夫同志报告的一些摘录,指出他提出的问

题具有高度的深刻性和明确性。

现列举最有代表性的发言：

功勋艺术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巴拉托夫（党外人士）在党的会议上发言说：“我十分激动地读了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党中央确实非常及时地通过了一系列旨在纠正艺术路线的历史性决定。我们将执行党中央的决定，对新的苏联人的思想形成给予应有的影响。只要我们创作出有高度艺术性的、歌颂人类最高尚的感情的戏剧，就能完成这个任务。戏剧工作者应该经常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和文化水平。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是苏联艺术家工作和生活的纲领。”

苏联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 B. B. 巴尔索娃在其发言中说：“我们党中央的决议揭露了艺术领域里许多不可宽恕的错误，这些错误我们这儿也有。我们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而不为我们年轻的观众着想。日丹诺夫同志给我们艺术家指明了苏联艺术应当走的正确道路。我们的剧目中没有一部苏联歌剧能以理想来为新一代服务。

我们有责任创作出苏联歌剧。这一点我们能够并且一定会做到。必须要求剧院的艺术指导进行新的创作，而不是靠戏剧的旧功劳活着。我希望，我们将创作出与我们英雄时代相称的苏联歌剧来回答党中央的决定。”

俄罗斯联邦功勋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 A. H. 巴图林说：“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促使我们以新的方式回顾整个创作道路，改进自己的工作，把艺术提高到教育我们苏联人民的政治任务的水平。我们应该不惧怕大小行家的批评。”

芭蕾舞剧导演、斯大林奖金获得者扎哈罗夫说：“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使我内心深处感到激动。我们有时候的确忘了，世界上两种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正在斗争。我们，苏联艺

术活动家，并不十分明白这一点。党中央和日丹诺夫同志指出我们目光短浅，并把行动纲领直接交到我们手里。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还给我们指出，我们为什么落后了，我们应该如何多做工作，以免落在社会发展的后面。”

俄罗斯联邦功勋演员卡图利斯卡娅在发言中指出：“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指出，我们有责任为自己的人民服务，提高人民的文化和审美水平，号召人民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理想。我们应该创作关于英雄主义和为人民利益献身的高尚的苏联歌剧。这是我们对人民的责任和义务。”

戏剧工作者说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是艺术领域的重大事件，是关于艺术的宝贵科学著作，应该认真而深入地学习。

在剧院的侧厅交谈时，芭蕾舞女演员戈卢布科娃说：“在我们生活的这样严重的时刻，大人物们抽时间深入而严肃地研究艺术的各种问题。日丹诺夫同志不是艺术工作者，可是他用如此渊博的知识来分析艺术，并且确定了它应走的道路。”乐队演奏员 T. 占列维奇说：“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应当促使我们学习，否则我们就会很快封闭于自己的职业中，经常看不见和不了解在它以外的东西。”

芭蕾舞演员瓦尔拉莫夫说：“读完这篇报告，为自己感到羞愧，知道得太少了。”

芭蕾舞女演员克雷洛娃明确表示：“在日丹诺夫同志报告和联共（布）中央作出决定之后，逐渐明白了，像我们以前那样工作是不行的。应该以新的方式工作。这一点剧院的领导会懂得吗？他们会改变自己的领导作风吗？”

9月24、25日，小剧院的演员大会讨论了联共（布）中央《关于剧院的剧目及其改进措施》的决议。

讨论中发言的有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亚布洛奇基娜，帕申纳亚，俄罗斯联邦人民演员祖博夫，俄罗斯联邦功勋演员安年

科夫，梅任斯基，察廖夫等。发言人都提到了日丹诺夫同志报告的重大政治意义，引用了报告的一些内容。

俄罗斯联邦功勋演员梅任斯基在会前与小剧院党组书记谈话时说：“我本来不打算在会上发言，但是读了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之后决定发言。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在其深度和重大意义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激动。好多东西我开始完全明白了。”

苏联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亚布洛奇基娜说：“这是具有巨大力量的文件！决定是英明、公正和必要的，对我们全体戏剧工作者非常必要！在29年的苏维埃政权时期，我连一个正面苏联妇女角色都没有扮演过。今年我开始了自己为艺术服务的第六十一个演出季节，又是以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狼与羊》一剧中的穆尔扎维茨卡娅这个角色开始的，可是在苏联的剧目中我什么也没演过。我要强调一下主要之点：党中央委员会说出了关于我们剧院应该受到谴责的严酷真相。而我们的义务是接受它，并且做好一切工作来尽快改正自己的错误，完成党、我们的苏联人民、我们的祖国所要求的任务。”

苏联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帕申纳亚说：“要像边防战士捍卫我们祖国那样，我们应该用艺术工具来保卫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这一思想充满了我的整个身心。在联共（布）中央对文学、电影、戏剧问题的三个决定中，在日丹诺夫同志的讲话中，我找到了对所有引人关注问题的英明回答，这些问题早就激动着每一个意识形态战线工作者。教育那些将会看到共产主义曙光的青年——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任务之一。”

俄罗斯联邦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 K. A. 祖博夫在其发言中指出：“对中央的决定和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知道得很少，应该理解并从组织上接受它们，因为它们照亮每一个戏剧工作者的道路，要求每个人仔细检查和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工作。”

俄罗斯联邦功勋演员 M.И. 察廖夫指出：“不必讳言，我们戏剧家之中许多人自我满足了，不再寻求新的道路，不再夺取艺术上的胜利，而这样的胜利，按照日丹诺夫同志很恰当的比喻，可以与战争和经济战线上的巨大胜利相提并论。”

这些天来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是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创作人员严肃交谈的话题。在后台，在排练休息时间的侧厅里，时常聚集着一群群演员和导演，自发地谈论着日丹诺夫同志在其报告中提出的某些问题。

在谈到自己对日丹诺夫同志报告的感想时，苏联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卡恰洛夫说：“我仔细地读了报告。理解了日丹诺夫同志严肃而又深刻地分析文艺现象的意义。报告推动我们思考艺术在国家生活中、在人民走向远大前途过程中的作用。促使我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思考艺术，而不仅仅从某些个别的理由出发。我领会这个报告是指导性的，指出了创作工作的正确道路。”

俄罗斯联邦人民演员叶尔绍夫读了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后说：“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深深打动了，我比过去更深切地懂得了一个苏联演员在思想上武装起来的必要性。我现在开始每天都系统地阅读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问题的基本著作。”

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的艺术指导 M.И. 凯德洛夫说：“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提出上演剧目的质量和剧院创作新作品的深度问题。每一部新剧，如果它符合人民的情绪，如果它讲的是伟大的苏联现实生活、普通苏联人的非凡事业，就能被人民接受。现在什么是最主要的呢？应当以工作来回答党的指示，否则我们光是说很多话，开很多会。我们现在应该多做工作，只有用工作才能报答党和政府的关心和照顾。”

俄罗斯联邦人民演员泰罗夫在剧院党的公开会议上指出：“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是一份出色的文献，在艺术工作者面前开辟了一

条改造我们剧院一切工作的道路。”同时，A.Я. 泰罗夫同志详细地讲述了1910—1922年他领导剧院工作期间他本人的错误和有害的颓废派倾向。泰罗夫同志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莫斯科室内剧院免于堕落和消亡，指引莫斯科室内剧院的创作走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为伟大的苏联人民的利益服务的道路。

功勋艺术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戈尔恰科夫在党的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非常清晰地揭露了苏联文学、戏剧、电影以及总的苏联艺术发展中的严重错误，指出了消除这些错误的途径。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是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和艺术的深刻的哲学性的理论文献。这是每一个艺术家和文化活动家在以共产主义教育人民的日常工作行动中的行动纲领。它将帮助我们创作具有高度思想性、在艺术方面完全合乎要求的戏剧。”

俄罗斯联邦功勋演员克拉斯尼扬斯基强调说：“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是完全现代化的，这是一份政治上异常重要而理论上十分深刻的文献。我们应当以思想性强、艺术性强的戏剧来教育苏联青年，以此来实际回答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

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创作部，导演Г. 亚历山德罗夫在其发言中赞扬中央的决定，他同时提出，决定中谈到的关于电影部艺术委员会的事实同样也与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有关系。亚历山德罗夫同志说：“在艺术委员会的会议上，我们经常不得不对被讨论的电影采取一点儿自由主义，因为不是我们所有从事创作工作的同志都能善意地接受批评。他们之中许多人把门关得砰砰响，离开委员会而去，以此回报健康的批评，这就迫使我们以后在电影评价问题上更加软弱。这种环境造成了批评不知不觉地被自由主义所代替的局面。”

导演M. 罗姆谈到了电影艺术大师们已经露头的脱离当代重要政治题材的趋势。例如，瓦西里耶夫兄弟想要拍《黑桃皇后》，И.

佩里耶夫要执导托尔斯泰的《复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尤金拍《列夫·古雷奇·西尼奇金》，巴尔涅特执导《狼与羊》。

这一切，按照罗姆同志的说法，是创作人员错误认识的结果，他们认为和平时期已经来临，艰苦的战争之后应当给人民的就是休息。由此而来的是要求轻松的、娱乐性的电影。

动画片摄制厂工作人员卡尔宾科说：“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揭露了文化工作者中间思想工作落后的现象，与我们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这儿曾筹拍一部粗制滥造的电影《醉醺醺的兔子》。筹备过程中我们都默不作声。只是在电影拍好了最后审片时才被我们认为是废品。日丹诺夫同志正确地提出了对创作人员进行思想教育的任务。”

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画家博戈罗茨基教授指出：“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将帮助许多造型艺术大师创作有高度艺术性的、反映苏联人高尚思想和感情的绘画作品。日丹诺夫同志把艺术问题讲得非常清楚。希望把报告的某些内容抄录下来，像标语那样置于显著的地方。”

斯大林奖金获得者、雕塑家马尼泽尔说：“我们的工作中也有严重的缺点。要是我们的党中央也作出有关造型艺术方面的决定该有多好。我们多么希望召集我们讲讲造型艺术的前途。现在有些同志不知所措地往后看，不肯展览自己的作品，在等待另一个时刻。”

俄罗斯联邦人民美术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约甘松肯定说：“我潜心阅读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意识到这是完整的、哲学的、理论的、能帮助我们理解许多东西的学说。”

作家戈卢博夫说：“我很高兴，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充满文学工作特性的知识，深刻而全面地指出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与他们过去的资产阶级文学货色的联系。”他接着提出了一个问题：“历史长篇小说还有存在的权利吗？创作历史长篇小说的作家是否需要转向

写苏联的选题？”

作家戈尔巴托夫说：“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在我们作家面前展示了创作的新视野，报告向我们指出，作家应该向前看，走在人民的前面，看到远景。”

作家特瓦尔多夫斯基说：“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是对创作特性的深刻洞察。日丹诺夫同志对作家提出的要求可以杜绝见风使舵者利用文学来推销其思想性很差的、不问政治的劣作。”

作家维什涅夫斯基说：“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报告详尽无遗地揭示了文学过程的全部实质，表明了我们党的立场。日丹诺夫同志的讲话是对苏联文学的理论和历史的贡献。日丹诺夫同志的讲话是关于发展苏联文化的充满激情的光辉的讲话。”

作家维什涅夫斯基接着说，有些作家提出各种问题，并且把日丹诺夫同志对《黄色女工衣》的批评与马雅可夫斯基的名字直接联系起来，并认为这是否准备重新审查马雅可夫斯基的文学立场。

K.B. 乌斯宾斯卡娅在莫斯科国家音乐学院党的会议上发言时指出说：“我觉得，我们全体意识形态战线上的工作者在最近的将来应该遵循的主要文件就是日丹诺夫同志出色的报告。报告给我们的创作活动以理论基础。”

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在工业和科学工作者中间也同样引起了非常活跃的反应。

莫斯科铁路运输电机工程学院的电工学教研室主任彼得罗夫教授说：“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超出了文学和艺术的范围，说的是我们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原则与水平。虽然我们并不在艺术和文学部门工作，然而这个报告中说的是思想性和原则性，工作中坚定的目标和诚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苏联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波利亚科夫同志说：“联共

(布)中央的决议和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虽然针对文学部门，然而与各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有直接关系。各科学研究所的选题应当贯彻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性。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揭露了意识形态战线上的种种缺点，我们应该吸取教训，使我们的一切科研工作与我们祖国面临的各项任务相适应。”

第318中学的校长马利采夫说：“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向我们教育工作者提出了重新审查教育工作和教学参考书的一系列重大的任务。”

苏联科学院土壤研究所研究员、科学博士科夫达同志在座谈时说：“联共（布）中央最近的决定和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说明，现在对文学艺术的要求，同时也意味着对科学的要求，已不是一年或者一年半以前的那些了。现在，在战后，开始了苏联发展的新阶段，它要求我们的艺术、科学和党的生活的思想水平提高到新的更高的台阶。谁不理解这一点，不重新改变自己的工作，谁就脱离了人民的利益。”

第451工厂的设计师、联共（布）党员库什涅尔同志指出：“左琴科的作品不是别的，而是恶毒的、包含敌意的嘲笑和咒骂。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被接受为苏联作家协会会员。日丹诺夫同志说得对，只有政治上目光短浅的领导才会容许左琴科的东西登在列宁格勒的杂志上。至于阿赫玛托娃的诗，人们能说的只有一点，即这是个年老昏聩的‘贵妇人’、腐朽的旧知识分子的残渣，她完全看不见现今的生活，由于无所事事而思叹过去，妨碍别人工作。党中央的决议和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及时地揭露了我们文学中的这些破坏分子和下流胚。”

“海燕”厂总工程师泽纽克同志说：“我记得阿赫玛托娃革命前时期的诗。这个颓废派女诗人在诗中写的是缺乏信心和必遭灭亡。现在，当我在杂志上重新看到她的诗的时候，这些诗还是像以前那

样充满极端个人主义并具有悲观主义性质。最近我读了几个剧本，没有发现其中有深刻的思想内容。我们的剧作家至今很少提供真实反映我们的时代的剧本，没有全面地揭示我们的前辈经受的那些历史事件。联共（布）中央对文学问题的决议毫无疑问必将是苏联作家重新调整他们的工作和加强意识形态战线的促进因素。”

联共（布）党员、铁路区的皮亚特尼茨卡娅同志说：“我十分满意地读了日丹诺夫同志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错误的报告。日丹诺夫同志令人信服地指出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作品的全部庸俗性。联共（布）中央及时地揭露了我们文学中对苏联人的诬蔑，做得完全正确。

把我们的戏剧、电影也置于监督之下是件好事，因为时常有一些粗制滥造的东西而不是艺术开始渗透进这些领域。不妨也整整画家们，他们在《星火》杂志上把妇女画成畸形人，还以此冒充艺术。”

与此同时有一些不正确的言论。谢尔文斯基在作家协会党的会议上的讲话中评论说，中央关于文学的决定原则上没有新的东西，这是策略，不是战略，等等。

莫斯科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巴热诺娃同志是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她在一群赞扬日丹诺夫同志报告的大学生中说：“报告对我不起作用。我现在喜欢、将来也喜欢阿赫玛托娃的作品。你们改变自己的观点太快了，就在不久前你们还跟我一起迷恋那些诗作。”

导演因登包姆曾跟导演爱森斯坦一起拍过《伊凡雷帝》（第2集），他在发言中说：“……但是要知道，电影剧本曾经过审阅，还受到赞扬。如果说我们这里在克服爱森斯坦的形式主义方面缺乏思想性的话，那么还不如说是外面的某些人缺乏这种思想性。”

在个别交谈中，一些大导演，特别是佩里耶夫，以某种挖苦的

态度对待联共（布）中央决定中关于将不诚实的艺术工作者免职的那部分内容。他们认为在电影导演方面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没有适合的人来替代他们。

一小部分电影导演，包括导演斯托尔佩尔，把联共（布）中央的决定视为“对创作人员的骑兵突袭”，是“暂时的现象。”

艺术工作者在各剧院党的会议和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提出了由联共（布）中央的决定和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而产生的各种重大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剧院的艺术领导和经理们的发言就显得比讨论的总的水平低得多。

照例，经理、艺术领导和导演们在发言中都试图回避他们剧院的剧目不顺利情况，并为自己从事苏联戏剧方面的疏忽大意进行辩护。

还必须指出，由于在提高演员、导演的思想水平方面缺少斗争，由于剧院的剧目采用西方戏剧的剧本，苏联部长会议所属艺术事务委员会的工作在各种会议上遭到了激烈的、公正的批评。

在首都的戏剧、电影、文学工作者中间，正在开展对联共（布）中央决定和安·亚·日丹诺夫同志报告的进一步讨论和学习。

联共（布）莫斯科市委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H. 西兰季耶夫

1946年9月28日<sup>①</sup>

<sup>①</sup> 本文件附有一张打字便条，内容如下：“送联共（布）中央。联共（布）莫斯科市委向你们呈上戏剧、文学、电影和科学工作者对日丹诺夫同志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的意义的通报。联共（布）莫斯科市委书记 B. 帕夫柳科夫，1946年9月28日。”

No02248

## 左琴科关于如何看待其作品

### 致日丹诺夫的信

(1946年10月10日)

联共（布）中央书记安·亚·日丹诺夫同志

亲爱的安德列·亚历山大罗维奇！

我写幽默短篇小说已有25年多了，我认为，我以此给苏联读者带来益处和欢乐。我们这里未曾有过能正确地帮助作家辨明方向的批评，因此，我用下面的证据来证实我对自己作品的益处的见解：

1. 阿·马·高尔基（1930年10月13日）写信给我说：“我高度评价您的幽默作品，对我以及对许多有文化的人来说，它的别具一格是不容争辩的，同样不容争辩的是它的社会教育意义。”

2. 我保存了数千封读者来信。几乎每封信里的感谢言词都肯定了我的认识：我的作品不但对社会有益，而且还带来欢乐。

3. 我在1939年由于文学上的功绩而被授予劳动红旗勋章。可见，作家协会在呈请授予我勋章的时候是赞同高尔基和读者们的意见的。

4. 讽刺杂志之多（我在其中工作过的就有大约12个）和我的作品大量发行告诉我，讽刺体裁是需要的，是受到鼓励的。

这一切都使我确认我的作品是有益的。我自己也以为，我运用自己的体裁写作是在帮助揭露各种缺点，帮助与往昔生活的残余作斗争。

我现在很难确定我的错误究竟何在。不过，我设想，是讽刺体裁有时把我引到了夸张手法。虽然我常常觉得这样的方法是合法

的，它存在于文学传统之中（谢德林、果戈理、斯维夫特）。何况我写的是各种否定的现象。为了唤起读者的笑声或微笑，为了更清晰地强调所写的事物，有点儿夸张手法是必要的。

虽然运用这样的方法，但我没有任何恶意。何况恶毒从来不曾滋养过我的文学。

相反，我常常感到，描绘生活中正面典型人物的光辉面貌会更有益和更愉快。我经常渴望写这样的正面题材。尽管实现这样的转换极其不易，就像一个喜剧演员转而扮演英雄角色那样不易。但是从30年代起，我开始在别的体裁上试试自己的能力。于是我写出了许多正面题材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

我的遭遇使我极为沮丧。我正在非常困难地重返生活。不过，我还有一些力量去工作。

我很惭愧地承认，在中央的决议之前我并不完全明白文学被要求什么。而现在我想重新对待文学，重新审视文学。

我请求您和中央委员会准许我把不久前开始写作的我的新作品送交审查。我希望在一年之内能够完成两部大的作品并送交审查。同时，在艰难和复杂的处境中，我当然不是请求任何优待或者宽大。我惟一需要的是您哪怕默许此事，好让我有点信心：我的新作品将予以审查。

我明白灾难的全部作用。我并不想象能够恢复自己的名声。也不是为此而工作。我不能也不愿处在反动阵营中。

请求您给我为苏联人民工作的机会。我认为自己是个苏联作家，无论人们怎样责骂我。

米·左琴科

1946年10月10日

No 02249

**阿巴库莫夫关于驻德苏军  
对日丹诺夫报告反应致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6年10月23日)

绝密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安·亚·日丹诺夫同志：

苏联国家安全局检查机关登记了来自苏联驻德占领军集群司令部直属部门现役军人的109封信件，内含对日丹诺夫同志关于《列宁格勒》和《星》的报告的各种反应。

兹呈上最有代表性的信件的摘录。

B. 阿巴库莫夫

摘 录

**摘自苏联驻德占领军集群司令部  
直属部门现役军人的信件**

对日丹诺夫同志关于《列宁格勒》和《星》两杂志报告的反应  
1946年9月27日。“……日丹诺夫同志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使我不得不思考起来。试想一下，我们之中大多数人虽曾在高等院校学习，却不能对这个或那问题形成自己个

人的见解，对于书就更不必提了。引起我们大多数人感兴趣的是故事的梗概。可是难道一个20岁或更大一点的人——也许这是一个先进青年的代表，也许这是个共产党员或者共青团员——就这样生活吗？作出决议并非无缘无故，该是提高我们的思想意识水平的时候了。关于这一点过去只是说说，什么也没有做。想想看，用这种没有任何价值的散文和诗歌去教育人。我没有读过左琴科最近的作品，但是我知道他，还知道许多这样的作家。”

1946年9月29日。“……读了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他对文学的作用和任务的评价是多么正确啊。研究、体会并思考这些决议和报告吧。要严格要求自己的每一句诗，首先是对它的内容。要经常问问自己：‘这首诗为什么服务？’你的创作应当为人民、为我们的战斗的国家、为我们的美好未来服务。一首歌只有在它是纯朴、聪慧、优美、人民性的，而首先是健康的、有血有肉的、富有激情的、号召前进的时候，才是好歌。”

1946年10月5日。“……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你读了吗？顺便说一句，非常有力和正确，我完全同意这个报告。特别是关于左琴科，我早就想过，为什么允许这样思想性很差的家伙进入我们的文学。”

1946年9月24日。“……日丹诺夫同志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我非常喜欢，因为近来在当代文学中确实有很多思想性很差的东西。甚至连这些开始发表与我们的制度格格不入观点的人也钻进了文坛。”

1946年9月25日。“……读了日丹诺夫同志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及其缺乏思想性与具有颓废倾向的报告。有些作家落后于当代现实，而历史已经向前进了，新的事件排挤了一切旧的，开辟了远大的前景。因此，展示人们生活中的庸俗市侩方面就会败坏人民为胜利和未来所做出的伟大事业的名誉。现在需要热

烈的前进号召，以鲜艳的色彩描述未来和现代生活。这些作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要是不能改变，那就扔掉笔吧。”

1946年9月29日。“……现在文学起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完全正确。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如此清楚地指明了我们现在的工作是执行指示，不能容许用西欧庸俗轻浮的劣作——这些作品经常在我们的俱乐部里出借——来教育青年。必须有大的改变。叶赛宁还抱着他那陈旧的道德训诫：‘我需要利润，没有钱我们什么都不会有’，但我们不需要。”

1946年9月26日。“……日丹诺夫同志着实狠批了左琴科。后者从来没有引起我多大的兴趣。他的一切都是片面的，他的确没有阐述过那些我们这里的好的东西。这就是对文学应有的立场和批判的态度。日丹诺夫同志极好地阐明了我们的文学的任务。”

1946年9月29日。“……读了日丹诺夫同志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非常及时地提出了问题。左琴科快要完蛋了，他没有一行字是好的。我们的作品没有好题材是不行的。我读过他的很多文章，全是那样一些粗制滥造的货色。”

1946年9月23日。“……战争是对整个生活的总检验，它给生活带来具有进步意义的纠正。联共（布）中央关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是对意识形态战线上存在的偏差进行纠正的声音，是显示理智、全人类的真理、我们的不可动摇的逻辑的声音。”

苏联国家安全局“B”处处长 M. 格里博夫

## 【专题说明】

# 关于建立柴可夫斯基纪念碑的问题

(1940年5月至1954年6月)

本专题选编了1940~1954年间与建造柴可夫斯基(1840~1893)纪念碑有关的文件,包括中央政治局关于纪念柴可夫斯基的决定、雕塑家穆欣娜给斯大林、莫洛托夫的信,联共(布)中央文学艺术部部长关于对穆欣娜创作的纪念碑的反应意见的报告,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建造柴可夫斯基纪念碑的决定等。这些文件反映了苏联领导人对于艺术问题的关注、他们的见解以及干预方式。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赵静男、赵国版翻译)

№0623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纪念  
柴可夫斯基百年诞辰活动的决定**

（1940年5月5日）

关于举行纪念彼·伊·柴可夫斯基百年诞辰活动  
以及永久纪念他的措施  
批准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决定草案（见附件）。

中央书记

附 件

**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关于举行纪念彼·伊·柴可夫斯基  
百年诞辰活动以及永久纪念他的措施》**

（1940年5月5日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

为了纪念伟大的俄国作曲家彼·伊·柴可夫斯基百年诞辰，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

1. 在莫斯科竖立彼·伊·柴可夫斯基纪念碑<sup>①</sup>——1942年由苏联人民委员会艺术事务委员会负责征集纪念碑设计方案。

<sup>①</sup> 从1940年中央政治局决定建造柴可夫斯基纪念碑起，这一计划就一再拖延。直到1954年，才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楼前竖立了雕塑家穆欣娜设计创作的柴可夫斯基纪念碑。

2. 责成苏联人民委员会艺术事务委员会出版彼·伊·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和文学作品全集（在1940年8月以前出版头三卷）以及选集。

3. 准许苏联人民委员会艺术事务委员会用彼·伊·柴可夫斯基的名字为如下机构命名：沃特金斯克市音乐学校、克林市音乐学校以及新近建成的莫斯科音乐厅。

4. 建议莫斯科市执委会将诺温斯基林阴道更名为彼·伊·柴可夫斯基大街。

5. 在各音乐学院作曲系设彼·伊·柴可夫斯基奖学金，人数为10名，每名400卢布：

- 莫斯科音乐学院 3名
- 列宁格勒音乐学院 3名
- 基辅音乐学院 2名
- 第比利斯音乐学院 2名

6. 责成通信人民委员部于1940年发行带有彼·伊·柴可夫斯基肖像的邮票。

确认：

1. 为此目的，1940年第二季度从苏联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的库存中调拨25吨优质印刷纸和50吨优质书写用纸。

2. 责成苏联人民委员会艺术事务委员会和纪念彼·伊·柴可夫斯基百年诞辰全苏委员会于1940年5月7日在荣获列宁勋章的苏联国立大剧院举行彼·伊·柴可夫斯基百年诞辰纪念大会及其作品演奏会。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 维·莫洛托夫  
苏联人民委员会事务局长 M. 赫洛莫夫

№06233

## 穆欣娜关于纪念碑竖立问题致斯大林的信

(1951年3月14日)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奇！

我哪怕有最微小的一点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也不会给您写信。

我已经给您写过一封信，写到我所设计的大量纪念碑的大部分模型放在艺术事务委员会的仓库里处于半毁坏的状态。从那时起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设计模型现在仍然被丢弃在那里，继续受到毁坏。

我今天给您写信要谈的已经不是设计模型的事，而是关于已经完成的纪念碑。我一共制作了三座，可是一座也没有竖立起来。看来我没有力量和本事通过非正式的途径来推动事情的进展。

一座是根据沙德尔<sup>①</sup>的设计方案为莫斯科市制作的高尔基纪念碑，维·米·莫洛托夫主持的委员会已经通过。已经确定了竖立的日期，可是一再地拖延。它已经全部完工，至今还放在工厂里，不知何时能够面世。<sup>②</sup>

第二座是为高尔基市制作的高尔基纪念碑，早已经审定并且浇铸完毕，现在还没有组装起来，分散地放在高尔基市。拨给建造底座和碑基的经费是4百万，可是开采建造底座用的巨大石料

① 沙德尔（原姓伊万诺夫），И.Д.（1887-1941），雕塑家，1952年获苏联国家奖。

② 高尔基纪念碑于1951年安放在莫斯科的白俄罗斯车站广场。

竟然花了这么多时间，以至财政年度过去了，余款（二百多万）被销掉，一切都停了下来。与此同时，高尔基市苏维埃的领导变了，新的领导看来完全不想看见自己的伟大同乡的纪念碑竖立起来。

第三座是为莫斯科市制作的柴可夫斯基纪念碑，准备立在音乐学院前面。我从1944年开始从事这项工作。已经完成连同底座的石膏模型。经过五个委员会的审查，没有一致的意见……它已经在我的工作室里放置两年了，等待着第六次审定和安装。现在委员会的造型艺术管理总局希望我把它移到院子里，因为它占地方，妨碍为莫斯科大学制作的急用的雕塑。

我不能允许把石膏放在泥泞之中任凭风吹雨淋，把我多年的工作毁掉。我已经61岁了，我不能再等待十年。我很痛苦，因为我的劳动和我的创造全都落空了。

我还为莫斯科完成了弗·伊·列宁纪念碑的设计方案。我不能像许多人那样“连续地”着手塑造这个伟大的形象，我只能胆战心惊地孕育它。我觉得它刻画得很好。我对自己的作品很少有自信，可是对这项工作却信心十足，就像我对组雕《工人与女集体农庄庄员》充满信心一样。我希望把我有生之年的劳动贡献给这座纪念碑。如果有第一流的组织工作，两年之内就可以完成。

莫斯科在33年的时间里没能够为弗拉季米尔·伊里奇·列宁竖立一座全体人民的纪念碑，我觉得这是可耻的。

我请求您帮助我完成我的纪念碑：规定在莫斯科竖立高尔基纪念碑的日期；给高尔基市的纪念碑拨款并且下达完成这个纪念碑的指示；尽快指派验收柴可夫斯基纪念碑的委员会，并且指示它同时审查列宁纪念碑的模型，或者允许把它运到克里姆林宫去给您看看，恳切地请求您召我去接受审查。

我非常需要跟您谈谈我们艺术的某些不如意的问题。如果我没

关于建立柴可夫斯基纪念碑的问题

---

有可能见到您，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那么请允许我再次给您写这样的信。

请原谅，这封信太长了，未能写得简短一些。

深深地尊敬您的 穆欣娜<sup>①</sup>

1951年3月14日，莫斯科

---

<sup>①</sup> 穆欣娜，B.И. (1889—1953)，雕塑家，苏联人民艺术家。

№06234

## 穆欣娜关于纪念碑方案致斯大林的信

(1952年3月5日)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很遗憾，我在夏天寄给您的信和画册都没有到达您的手中，因为您离开莫斯科了，看来是因为这一点我至今没有收到回信。

因此我决定再一次打扰您，因为这里所说的柴可夫斯基纪念碑是我五年的劳动成果，我不愿意不经战斗就向艺术事务委员会反复无常的意见无条件地投降。

1951年夏，我给您寄上一本照片册，情况是这样的：纪念碑是根据艺术事务委员会的订货于1946年开始的，草样被批准之后，让我按照原设计尺寸制作，1950年初连同底座一起完成了。纪念碑的石膏模型无条件地通过了五次审查，其中包括艺术事务委员会、音乐界和莫斯科市苏维埃建筑管理局艺术委员会的审查（委员会的这些意见都记在相应的记录里，这些记录现在保存在艺术事务委员会）。寄给您照片册的目的是让您了解纪念碑，加快批准其建造。

1951年11月，我向别斯帕洛夫<sup>①</sup>同志提出请求，想弄清楚纪念碑未来的命运。他对我说，中央委员会有一种意见，认为柴可夫斯基的形象缺少“人民性”（？），委员会要求我提交一个新的纪念碑方案，地点还是在音乐学院的前面，但必须是立式的（为什么？），更具有“人民性”，而第一个方案可以竖立在克林的柴可夫斯基故居纪念馆的花园

<sup>①</sup> H.H. 别斯帕洛夫，苏联部长会议所属的艺术事务委员会主席。

里。我坚决地提出问题,已经完成的纪念碑的非人民性表现在哪里,新的方案的人民性又应该表现在哪里,但无论是别斯帕洛夫,还是他的主管造型艺术部的副手瑟索耶夫同志,都不能给我任何回答。

此外,后来弄清,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前面竖立柴可夫斯基纪念碑的地点没有得到任何主管部门批准,委员会再次要求制作的新方案也可能是不需要的。我认为,委员会以这种态度对待在自己的作品上付出了多年劳动的正派的雕塑家,最起码是官僚主义的和轻率的,而对待年老的艺术家采取这种态度简直是不能允许的。委员会要求只建造站立式纪念碑的倾向看来是在高尔基纪念碑获得成功之后出现的。我不能理解这种倾向,因为纪念碑的多样性只会使城市建筑丰富多彩。

我恳切地请您审查寄上的这些照片,如果您认为有必要,可以指派一个有权威性的委员会,让他们审查放在我的工作室里的已经完成的纪念碑模型。

我构思的柴可夫斯基的形象抓住了创作高度紧张的时刻:他在倾听他心中产生的美妙旋律;他的左手仿佛是在触摸节奏,右手记下所发现的东西。(最初的方案里,在底座的后壁上有一个牧人在吹奏芦笛,用以体现柴可夫斯基音乐的民间源泉;在批准这个设计方案时,根据艺术事务委员会的指示,把这个人物撤掉了)。

我觉得,我表现创作状态中的柴可夫斯基并没有错,正是这种状态才能说明伟大作家、音乐家和学者的生活。它给了我们所有那些美好的东西,人民因为这些才尊敬自己伟大先辈。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请您帮助我把多年的工作进行到底吧,这座纪念碑虽然不大却也不坏,配得上莫斯科。

真诚地尊敬您的 穆欣娜

№06235

## 克鲁日科夫关于重新设计纪念碑方案 给波斯克列贝舍夫的报告

(1952年3月10日)

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

联共（布）中央文学艺术部受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的委托，于1951年8月会同苏联部长会议艺术事务委员会主席别斯帕洛夫同志审查了雕塑家穆欣娜关于彼·伊·柴可夫斯基纪念碑的报告。

雕塑家穆欣娜于1947年完成了彼·伊·柴可夫斯基纪念碑的设计方案。该方案于1949年在苏联部长会议艺术事务委员会的会议上进行了审议并且得到认可。

由于雕塑家穆欣娜把纪念碑的方案放大到了实际尺寸，对它重新进行了审查。

审查表明，彼·伊·柴可夫斯基的形象处理得不正确，本来应该刻画出伟大俄国作曲家的形象，而雕塑家却揭示了一般作曲创作的个别时刻，这使作者对纪念碑采取了室内艺术的处理办法。左手的姿势做作，体态具有偶然性，这贬低了彼·伊·柴可夫斯基的形象。

纪念碑的方案引起了一些艺术活动家如赫连尼科夫<sup>①</sup>、扎哈罗夫<sup>②</sup>、斯维什尼科夫<sup>③</sup>、丘拉基<sup>④</sup>、托姆斯基<sup>⑤</sup>、扎莫什金的反对和

① 赫连尼科夫，Т.Н.（生于1913年），作曲家，苏联人民演员。

② 扎哈罗夫，B.Γ.（1901—1956），作曲家，苏联人民演员。

③ 斯维什尼科夫，A.B.（1890—1980），合唱指挥，苏联人民演员。

④ 丘拉基，M.H.（生卒年不详），作曲家。

⑤ 托姆斯基，H.B.（1900—1984），雕塑家，苏联人民艺术家。

批评意见（见附件）。

就这个问题向马林科夫同志呈送了报告。为此通过了如下建议：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楼前建造这样的柴可夫斯基纪念碑是不合适的。建议把这座纪念碑安放在莫斯科或列宁格勒某个音乐厅的休息室里或安放在克林市柴可夫斯基故居纪念馆的院子里。与此同时，建议雕塑家穆欣娜为莫斯科市重新制作一个纪念碑方案。

克鲁日科夫<sup>①</sup>

附 件

### 关于穆欣娜的雕塑“彼·伊·柴可夫斯基”

伟大俄国作曲家的纪念碑虽然在制作上具有高超的一般技巧，可是我们觉得，它不能形成大多数音乐家和广大听众已有的关于他的那种印象。形象的外在动感、大幅度的动作、紧张的令人陌生的脸，传达不出我们所看到的柴可夫斯基的形象。这里浪漫的激情过多。我们认为柴可夫斯基更稳重和温柔，更内向，充满崇高精神。穆欣娜所构思的作曲家的体态和面部不能令人满意。可以理解，雕塑家竭力通过这个形象传达自己对于柴可夫斯基音乐的理解。但在实现这一想法的时候，未能找到源于音乐的印象与作曲家面貌之间的协调一致，不像我们根据对他的全部了解所想象的那样。我们认为，也许，彼得·伊里奇本人会激烈反对这种解释。

赫连尼科夫、利瓦诺娃、斯维什尼科夫

1951年10月16日

<sup>①</sup> B.C. 克鲁日科夫，时任联共（布）中央文学艺术部部长。

## 关于彼·伊·柴可夫斯基纪念碑的设计方案

我觉得，穆欣娜的彼·伊·柴可夫斯基纪念碑的设计方案总体上是不能接受的。

作者似乎是在天才的作曲家进行创作的时刻来刻画他。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我认为没有取得这种效果，主要的是这种构思没有必要性。

作曲家的面部表情也令人反感。缺乏宝贵的朴素感、思想的明确性、平静的思索，以及最主要的，缺乏彼·伊·柴可夫斯基作品所特有的那种感情的深度。

方案中几乎没有天才作曲家的民族性特征——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我觉得，这样的纪念碑不会让热爱彼·伊·柴可夫斯基的人民满意。

我觉得，需要一个充满真实、严谨和朴素的纪念碑，它应能够表现出俄罗斯的民族性，把天才的作曲家刻画成温柔的、善良的、稳重的和非常敏感的。

扎哈罗夫

## 对于雕塑家穆欣娜制作的 彼·伊·柴可夫斯基纪念碑的意见

纪念碑的优点在于它揭示了音乐创作的激情。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来，这正是作曲家在创作音乐作品的时刻。可以感觉到，他用内心的感受捕捉到了音乐形式，马上就要把它记录在纸上。

外貌是相像的，尽管这种相像由于柴可夫斯基的眼神不够自然——“目光犀利”——而受到了一点破坏。椅子靠背上的帷幔是多余的，这使纪念碑具有一种外在的摹仿某种风格的性质。

总体上来看，纪念碑具有室内艺术的性质，而不具备宏伟的气势。它刻画的似乎是单独进行创作思考中的柴可夫斯基的形象。因此它不适合于放置在广场、街道上，甚至不适合于放置在音乐学院的建筑物前。但它放在某个主要音乐厅的休息厅里却正合适，因为在这里作者的才华及其解决问题的独创性（至于其技巧就不必说了）便一目了然。

我认为，如安放在休息厅里，应该撤掉高大的底座，只保留不大的基座。

M. 丘拉基

雕塑家穆欣娜完成的彼·伊·柴可夫斯基塑像是为建造伟大的俄国作曲家纪念碑而设计的，尽管具有很高的技巧，但却没有真实地揭示出作曲家的形象。塑像的手势凌乱，它同时表现了创作与指挥的时刻，因此在结构上给整个塑像带来一种不安的感觉。作曲家的眼神呆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破坏了柴可夫斯基的面貌，使作曲家——他创作了充满诚挚和纯朴的作品——的形象具有虚假性。

托姆斯基

### 关于雕塑家穆欣娜制作的 彼·伊·柴可夫斯基纪念碑设计方案的意见

柴可夫斯基纪念碑的设计方案尽管具有很大的雕塑的职业性优

点（处理的技巧性、解释的情节性），但却不符合最基本的一点：没有真实地刻画出伟大作曲家的形象。

穆欣娜所塑造的作曲家的形象缺乏人文主义的乐观精神，没有表现出伟大俄国艺术家深邃的精神气质。

情节过于集中在外部的姿势上。对形象的解释具有某种狂热性，缺少内涵深刻的纯朴和性格刻画的完整。

扎莫什金

No06236

## 穆欣娜关于造型艺术等问题

###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53年9月26日)

亲爱的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sup>①</sup>！

当您收到这封信时，我将不在人世了。<sup>②</sup>这是我的最后一次请求。有几天我感觉好些了，可是现在我的病情好像又开始恶化了。我急忙口授这封信，趁现在还有力气签字。

我的最后请求是关于艺术的：

1. 请不要忘记造型艺术，它能够提供给人民的并不少于电影或者文学。在艺术中不要害怕冒险：如果没有不间断的、常常是错误的探索，我们就不会有新的苏维埃艺术成长起来。

2. 请整顿一下艺术的管理机构——许多领导者不是帮助艺术家，而是使他们疲于奔命，直到死亡；有时还接受贿赂。

3. 请把我的柴可夫斯基竖立在莫斯科，也许您记得，审查《工人和女集体农庄庄员》时，我和您是如何争论的，您最后相信了我，相信了艺术的感觉。我向您保证，我的这件作品是配得上莫斯科的，请您相信我，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辜负过党和政府的信任。

4. 我身后留下一些非常好的草样——四个雕塑：《水》、《大地》、《丰收》和《粮食》。我非常希望它们能够被放大，两个一对

<sup>①</sup> 在这封信上有莫洛托夫的如下批示：“请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阅。建议授权中央书记处审查 B. 穆欣娜的报告。维·莫洛托夫。1953年10月8日。”

<sup>②</sup> 穆欣娜于1953年10月6日逝世。

地放置在伏尔加河的某段堤坝上，譬如斯大林格勒。我的学生们没有我的帮助也能够完成这项工作。

5. 请指示把我留下的一些不大的作品浇铸成青铜的，主要的是要指示拨给青铜。

还有最后一项私人的请求：我曾经住过的住宅兼工作室，至今由于没有办理法律手续而既不属于文化部或莫斯科市苏维埃，也不属于我。恳请您把它留给我的孩子们，不要让他们为此承担他们无力支付的费用，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长大成人。

死后仍将像活着时一样永远属于您的 穆欣娜

(1953年9月26日)

№06237

##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建造 柴可夫斯基纪念碑的决定

(1954年6月10日)

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1. 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 1940 年 5 月 5 日第 665 号《关于举行纪念彼·伊·柴可夫斯基百年诞辰活动以及永久纪念他的措施》的决定和苏联部长会议 1953 年 11 月 9 日第 2775 号《关于永久纪念苏联人民艺术家、苏联艺术院院士穆欣娜》的决定，1954 年内在莫斯科市莫斯科彼·伊·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建筑物前建造雕塑家穆欣娜制作的彼·伊·柴可夫斯基纪念碑。

2. 批准在彼·伊·柴可夫斯基纪念碑底座刻上如下铭文：

纪念伟大俄国作曲家

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

3. 责成苏联文化部：

(1) 两周内向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提交彼·伊·柴可夫斯基纪念碑底座工作图纸；

(2) 5 天内从自己的储备中向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拨付 5400 公斤青铜、1 吨红铜锭、100 公斤锡和 500 公斤铅，用于浇铸彼·伊·柴可夫斯基纪念碑青铜雕像和建造纪念碑底座。

4. 责成苏联建筑材料工业部根据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要求的规格为建造彼·伊·柴可夫斯基纪念碑准备并提供（不晚于 1954 年 8 月 15 日）14 平方米花岗岩板材和 25 立方米新达尼洛夫出产的装

修用花岗岩。

5. 责成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根据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要求的规格准备并提供（不晚于1954年8月15日）30立方米新达尼洛夫出产的抛光花岗岩部件。

6. 责成莫斯科市执委会：

（1）1954年9月25日前制成彼·伊·柴可夫斯基纪念碑的青铜雕像以及纪念碑和围栏的细部青铜铸件；

（2）5天内向苏联建筑材料工业部和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提交用于制作彼·伊·柴可夫斯基纪念碑的花岗岩板材、装修用材和部件的工作图纸和规格要求；

（3）保证1954年10月25日之前完成建造彼·伊·柴可夫斯基纪念碑底座以及纪念碑附近地带的美化和绿化；

（4）制定和批准举行彼·伊·柴可夫斯基纪念碑揭幕仪式的有关支出预算，从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1954年度财政预算中支付。

7. 青铜浇铸、修建以及美化彼·伊·柴可夫斯基纪念碑附近的环境等项费用，从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1954年度财政支付。

8. 彼·伊·柴可夫斯基纪念碑揭幕仪式于1954年11月举行。

9. 委托苏联文化部和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在1954年10月25日前向苏联部长会议提出关于彼·伊·柴可夫斯基纪念碑揭幕式的日期和程序的建议。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Г. 马林科夫

苏联部长会议事务局局长 А. 科罗博夫

## 【专题说明】

# 斯大林谈电影《伊凡雷帝》

(1947年2月)

本专题是斯大林与电影《伊凡雷帝》创作人员的谈话记录。伊凡四世(1530~1584),是俄国第一个改称沙皇的罗斯大公,用残酷手段剪除专横的大贵族,改革吏治,镇压起义,因此史称“雷帝”。这份谈话记录表明斯大林对这一历史人物给予的特别关注。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赵国颢翻译)

No06448

## 斯大林与电影《伊凡雷帝》

### 创作人员的谈话记录

(1947年2月25日)

谢·爱森斯坦，尼·契尔卡索夫记录整理

我们应召来到克里姆林宫时已将近11点钟。10点50来到会客室。11点整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出来领我们去办公室。

在办公室的最里边坐着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同志。我们进屋后同他们打过招呼就坐到了桌边。

斯大林同志说：

你们写了一封信。今日答复有些迟了。本想作书面答复，但觉得还是谈谈好，由于我很忙，没有时间，所以拖了很久才决定在这里会面。我收到你们的信是在11月份。

日丹若夫：是的，您在索契就收到了这封信。

斯大林：你们对历史有研究吗？

爱森斯坦：多少有点儿。

斯大林：多少有点儿！我对历史也知道得不多。你们对禁卫军的刻画是不正确的。禁卫军是沙皇直辖的军队。为有别于随时可能卷旗罢战的封建主军队，成立了正规的军队，进步的军队。你们把禁卫军演得像是三K党。

爱森斯坦：三K党戴的是白色尖顶帽，而我们的禁卫军戴的是黑色尖顶帽。

莫洛托夫：这没有原则区别。

斯大林：你们把沙皇演成了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就像是哈姆雷特。总是别人告诉他应当做什么，而不是他自己作出决定。

沙皇伊凡是一个伟大而英明的统治者，如果把他同路易十一作比较（你们读过有关路易十一为路易十四奠定专制制度基础的书吗？），那么伊凡雷帝同路易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伊凡雷帝的英明之处在于，他始终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不允许外国人进入自己的国家，从而防止了外来影响向国内渗透。

在刻画伊凡雷帝时，这方面有些偏差和失误。

彼得一世也是一个伟大的君主，但他对外国人过分纵容，国门开得过大，听任外来影响向国内渗透，听任俄国德意志化。叶卡捷琳娜在这方面走得更远。再往后看，难道亚历山大一世的宫廷是俄罗斯的宫廷吗？难道尼古拉一世的宫廷是俄罗斯的宫廷吗？不，他们的宫廷是德意志的宫廷。

伊凡雷帝采取的一个令人称道的措施是，他第一个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制。实行这种制度，伊凡雷帝是第一个，列宁是第二个。

日丹诺夫：爱森斯坦塑造的伊凡雷帝成了一个神经衰弱的人。

莫洛托夫：总的来说影片注重心理描写，极其强调内心矛盾和个人感受。

斯大林：应当正确地表现历史人物的风格。例如，在第一集中，伊凡雷帝长时间地与妻子接吻，这是不真实的。在那个时代这样做是不容许的。

日丹诺夫：影片带有拜占庭倾向。而这在当时也是没有的。

莫洛托夫：第二集中处处可见拱顶建筑和地下室。既看不到莫斯科的繁华，也不见人民的影子。表现阴谋、镇压是可以的，但不应局限于此。

斯大林：伊凡雷帝是一个极其残酷的人。表现他的残酷是可以

的。但应当说明为什么要残酷。伊凡雷帝的一个错误就是没有彻底铲除五大封建家族。如果他消灭了这五大家族，那就根本不会出现混乱时期了。而伊凡雷帝不管是处死谁，过后总是后悔不已，忏悔个没完。在这方面妨碍他的是上帝。应当更果断一些。

莫洛托夫：应当正确地反映历史事件。例如，就拿杰米扬·别德内的剧本《勇士们》来说吧。杰米扬·别德内在剧本中对罗斯受洗加以嘲弄，而实际上接受基督教在那个历史阶段是进步的现象。

斯大林：当然，我们不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不能否定基督教在一定阶段的进步作用。这个事件具有极大的意义，因为这表明俄罗斯国家开始同西方接轨，而不是向东方发展。

斯大林同志在谈到与东方的关系时说，伊凡雷帝急于把刚刚摆脱了鞑靼人桎梏的俄罗斯统一起来，是要使其成为抗击鞑靼人可能发动的侵袭的堡垒。阿斯特拉罕虽被征服，但随时都可能向莫斯科进犯。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也可能这样做。杰米扬·别德内对历史前景的估计是不正确的。当我们动工将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纪念碑移到瓦西里升天大教堂近旁时，杰米扬·别德内表示反对并写信给我（斯大林同志指指自己），说根本就不应当保留纪念碑，应当彻底忘记米宁和波扎尔斯基。我在给他的复信中称他为“数典忘祖的伊万”。历史我们是无法删除的。

接着斯大林同志就伊凡雷帝的形象处理谈了几点意见，他说马柳塔·斯库拉托夫是一位杰出的军官，在与立窝尼亚的战争中英勇牺牲。

契尔卡索夫同志在谈到批评有益、普多夫金经过批评拍出了一部好影片《海军上将纳希莫夫》时表示：“我们相信我们会干得同样出色，因为我不仅在银幕上而且在舞台上都塑造过伊凡雷帝的形象，我已爱上了这个形象，我认为我们改编的电影剧本可以说是准确和真实的。”

对此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好吧，那就试试看。

契尔卡索夫：我相信改编定会成功。

这时斯大林同志说：“愿上帝保佑我们万事如意”（笑）。

爱森斯坦问斯大林对影片还有哪些专门指示。

斯大林同志回答：“我不是向你们作指示，而是作为一个观众谈谈看法”。

日丹诺夫同志说，爱森斯坦过于喜欢阴影，他用伊凡雷帝的大胡子转移了观众对剧情的注意力，伊凡雷帝为了使人看清他的大胡子，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抬起头来。

爱森斯坦答应日后把伊凡雷帝的胡子剪短。

斯大林同志在谈到《伊凡雷帝》第一集中的一些演员时说：“库尔布斯基演得极为出色。斯塔里茨基（由卡多奇尼科夫扮演）演得也特别好。他逮苍蝇的技术特别高。都要当沙皇了，还用手逮苍蝇。这些细节是需要的，它们有助于揭示一个人的本质。”

斯大林同志说：好吧，问题到此可以说已经解决了。至于完善主题思想、把影片拍好，就由契尔卡索夫同志和爱森斯坦同志去做吧。

他又补充说：请将这个意见转告博利沙科夫。

契尔卡索夫同志询问对于影片细节和对伊凡雷帝外貌的意见。

斯大林：外貌符合实际，没有必要改变。伊凡雷帝的外貌很好。

契尔卡索夫：影片中可不可以保留斯塔里茨基被暗杀的情节？

斯大林：可以保留。暗杀在过去是常有的事情。

契尔卡索夫：我们的剧本中有马柳塔·斯库拉托夫勒死都主教菲利普的情节。是否需要保留这个情节？

斯大林：要保留这个情节。这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正确的。

莫洛托夫说：对于镇压总的来说是可以也是应当予以表现的，

但应当表明为什么要进行镇压，原因是什么。为此应当表现国务活动，不要光是地下室和密室中的情节，而要表现英明的国务活动。

契尔卡索夫就今后剧本的改编谈了自己的设想。

斯大林询问影片的结尾将如何处理。怎样拍得更好些，因为还有两集即第二集和第三集，或者说我们对此有何通盘考虑。

斯大林：你们的影片将如何收尾呢？

契尔卡索夫说，影片的结尾将处理为：立窝尼亚被击溃，马柳塔·斯库拉托夫壮烈牺牲，向海洋进军，伊凡雷帝站在海边，对周围的将士们说：“我们已经立足于海上，我们将要继续这样做”。

斯大林：这样结尾符合事实。恐怕还有点儿不够。

契尔卡索夫询问将来剧本的草稿需不需要拿到政治局审读和批准。

斯大林回答：剧本用不着送审，你们自己处理好了。一般来说光看剧本作出评判是困难的，还是谈拍成的影片容易些。

斯大林对莫洛托夫说：您一定特别想看剧本吧？

爱森斯坦说，如果摄制这部片子时没人催促就好了。

这条意见引起了在座的所有人的热烈反响。斯大林同志说：“无论如何你们都不要急于求成，而且凡是匆忙搞出来的影片我们都将扣住不发。列宾的《扎波罗热人》这幅画整整画了11年”。

大家一致得出结论：只有付出长期劳动才能真正拍出好的影片。

斯大林同志针对《伊凡雷帝》这部影片说，如果影片需要拍一年半到两年，甚至三年，那你们就按这个期限去做好了，只要影片能拍得好，只要影片能做到“精雕细刻”就行。

斯大林同志说：总之，我们现在应当提高质量。影片可以少拍一些，但质量要高。

他说，采利科夫斯卡娅演其他角色演得很好。她的表演很出

色，但她是个芭蕾舞演员。

我们说，无法把另一个女演员从莫斯科请到阿拉木图。

斯大林同志说，导演应当有股子韧劲，要求做到他需要的一切，而我们的导演往往过于轻易地就放弃了自己的要求。

爱森斯坦同志说，找阿纳斯塔西娅找了两年。

斯大林同志指出，演员扎罗夫对其在影片《伊凡雷帝》中扮演的角色态度不端正、不认真，不像一个威严的军官。

日丹诺夫同志：这不是马柳塔·斯库拉托夫，而成了随便一个戴大礼帽的人。

斯大林同志说，伊凡雷帝是一位民族意识较强的沙皇，是一个较有远见的人，他不允许外来影响渗入俄国，而“彼得鲁哈却打开了通往欧洲的大门，放进了太多的外国人”。

谈话结束时斯大林同志祝大家成功并说：“愿上帝助你们一臂之力”。

我们互相握手并告辞。谈话于零时 10 分结束。

以下是几点补充：

日丹诺夫同志还说，影片中宗教仪式出现得太多太滥。

莫洛托夫同志说，这造成了某种神秘色彩，而这是不应当如此大加渲染的。

日丹诺夫同志接着说，大教堂里的“炉中得救记”那场戏场面拍得过大，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

斯大林同志说，跳舞时的禁卫军拍得像是野人，并使人觉得和腓尼基人和巴比伦人有某些相似之处。

当契尔卡索夫同志谈到他已经多年在电影中和舞台上扮演伊凡雷帝这个角色时，日丹诺夫同志说：“我已安安稳稳当了 5 年多沙

桌了”<sup>①</sup>。

契尔卡索夫同志伸手去烟盒拿烟时问斯大林同志：“可以抽烟吗？”

斯大林同志说：“禁止吸烟的决定好像还没有。我们是不是要举手表决呢？”他示意可以抽烟。

补遗（关于剧本）。

当谈到剧本不需要报批时莫洛托夫同志说：

剧本不需要报批，再说爱森斯坦同志在这段时间内大概已经对有关伊凡雷帝的所有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考虑。

斯大林询问了爱森斯坦的心脏病情况并说他的气色看起来非常好。

---

① 这是普希金的剧本《鲍里斯·戈杜诺夫》中鲍里斯·戈杜诺夫的一句独白。

## 【专题说明】

# 《苏联大百科全书》等著作的出版

(1949年7月至1953年10月)

本专题所收录的档案主要涉及《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的编撰和出版问题。文件反映，在战后筹备出版《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的过程中，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有关部门对一系列具体问题的处理进行了直接的干预，甚至词条篇幅长短，照片尺寸大小，都需要中央有关部门来决定。另外，一本关于德国将领的著作，也是在苏共中央书记处的直接干预下，才得以出版的。足见苏共对出版问题的重视到了何种程度。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王英杰、李禄翻译)

No01555

## 斯大林关于《苏联大百科全书》问题与 瓦维洛夫的谈话

(1949年7月19日)

斯大林同志于7月13日晚10时接见了我们；谈话时在座的有马林科夫同志。谈话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以上。谈话的前半部分由我报告科学院的一些事情，讨论和审核科学院的各种问题。在谈话的后半部分我才把话题转到《苏联大百科全书》上来。我向斯大林同志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我代表主编们请求允许在第二版《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七卷的“联共（布）”词条中刊印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的著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同时还就这一问题呈上了一封信。斯大林同志笑起来，说道：“怎么好印上整本书呢？干嘛要这样？谁要看整本书呢？要说值得印的嘛，也超不过全书的二十分之一，其余的部分是写给党的工作者的，感兴趣的人很少，许多内容也过时了，况且也缺乏近十年的东西。”

我请斯大林同志指示，近十年的东西可以委托谁来写，斯大林同志却说：“总而言之不必印了，尤其是你们不见得非要印到‘联共（布）’词条中去不可。因为我打算在代表大会上建议将‘联共（布）’更名为‘苏联共产党’，到时候你们又要改排到字母‘K’里去了，现在还有一段时间，请您考虑一下。”

显而易见，要真的更改党的名称，那么很大的篇幅就不得不归到其他词条里去了。

我向斯大林同志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样本问题。应当提一下，

还在我和斯大林同志谈话之前我就曾和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谈过。他那儿已经有一大堆样本。波斯克列贝舍夫对我说，斯大林同志不同意你们主张的百科全书的开本，他不喜欢那么大开本的书，而更喜欢小开本的。我向斯大林同志报告此事，他果然一开口就说：“太大了！”我当时向他报告了我们选择这种开本的初衷：其一，是要让书完全舒展开，不会倒页，书页显得自然、平整；其二，每一页上的两栏都可以宽一些，这样看起来舒服些，安排插图也方便，而且比较漂亮。斯大林同志同意这个意见。他还说，可以用蓝色。阿纳托利·阿列克谢耶维奇<sup>①</sup>，在这，在样本上，我直接写上了：样本是得到了斯大林同志本人赞同的。马林科夫同志也赞成样本。

接着我向斯大林同志报告了部长会议决议草案。当时草案就在我手边。我边读边解释，斯大林同志和马林科夫同志都给我提了一些问题。总的说草案未遭到任何异议，因此我就让这个草案维持原状了。斯大林同志对所有内容——包括高频通信和增加自动电话机<sup>②</sup>——都表示同意。问题处理得很干脆。说到书的定价，我说定50卢布，斯大林同志说：“不低吗？要定得有点利润。”我说：“这一点考虑到了。”斯大林同志说：“50卢布，这很好，可是否应该再高一点？”我说不用。随后又谈到给国家出版社图书贸易管理局的提成问题。我说，国家出版社图书贸易管理局因为负责书的推销，要拿25%，我们请求确定15%。斯大林同志就这个问题说：“10%是应当给的，再多就不应该了。”我还汇报了纸张的问题，我们请求组织生产专用纸和漆布，斯大林同志和马林科夫同志支持这样做。之后，谈决议的第五点——改变付给作者报酬制度的问题。我马上解释说，我们这儿已经批准了提高短篇文稿酬的制度。对

<sup>①</sup> 瓦维洛夫的谈话对象，身份不详。

<sup>②</sup> 指的是政府通讯电话。

两万字符以下的文章，每页手稿我们可付高达一万卢布的稿酬。对两万字符以上的文章，我们请求允许每页手稿只付五千卢布的稿酬。斯大林同志说：“长篇文章每页手稿稿酬低一点是对的。”谈到房子问题，斯大林同志问，事情进展如何。我说，我们正在得到房子。在这个问题上马林科夫同志帮助了我们。于是马林科夫同志说了话，说原来房子的困难现在已经解决了。就是还有一个新编辑部问题。对组建这些编辑部的问题，斯大林同志也表示同意，并且同意增加人员编制。总的说，对决议各点都同意了。

然后我又转而谈到了一个惹祸的问题——关于像托洛茨基这类的反面人物的问题：应不应当给我们的敌人和对手立词条？斯大林同志说：“我个人认为，应当给反面人物立词条，反对这样做的编辑是些什么样的人？”他说，应当囊括一切，不这样做是愚蠢的。“其实，你们的书里是会有拿破仑的，可他是大坏蛋。”关于反面人物的问题就这样被完全肯定地解决了。

之后，又谈那些其作品受到严厉批判的作者的问题。我说，我们国家有一些这样的作者，他们是很权威的，近来时不时地被人骂几句，让不让他们撰写词条呢？“啊，怎么啦，当然，让他们写，假如他们能写出好文章的话。”斯大林同志说。我也认为，必须让他们写。于是在我谈到反面人物的时候，我就提到了阿列克辛斯基。斯大林同志说：“当然，要让写。”因此你们可以放心地刊登了。

我问，从人民民主国家邀请外国作者是否妥当。斯大林同志说：“当然妥当。”我说可能会有障碍。“不会的，有什么障碍呀，”——斯大林同志说，“完全可以商量”。

后来斯大林同志又问我们能否胜任。我说但愿能够胜任。对我们来说，前三卷最困难。这三卷今年就要交稿，可我们还处在开工阶段。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笑了起来。他说，“你们自己想这

样，这是科学院的倡议。”我没有加以反驳，但依我看，说倡议是科学院提出的，这不符合实际。嗯，其实也就谈了这么多。是的。态度毫无疑问是非常赞许的。从整个谈话对答和插话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我们是在巨大的保护下上马的。

对，还有一个材料的性质问题。斯大林同志惟一的一条意见是：“你们尽量努力吧，不要搞出过时的东西，要多些科学中的现代东西。”这项指示对我们很重要。要有新的有创见的文章，而不是翻印的东西。所有陈旧文章都应当现代化，引证新的文献。

全部谈话内容就是这样。

C. 瓦维洛夫<sup>①</sup>

① 瓦维洛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1891—1951），苏联物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45年起任苏联科学院院长，1949年起是《苏联大百科全书》总编。1949年7月13日，斯大林与瓦维洛夫就《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谈话。本文件是瓦维洛夫在7月19日对谈话情况所作的叙述。1966年10月29日，《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一副总编Л.С. 邵武勉将此文件上报给苏共中央书记П.Н. 杰米切夫，同时附有如下便函：

“最尊敬的彼得·尼洛维奇！”

给您寄去瓦维洛夫口述的他同约·维·斯大林在1949年7月13日就《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问题谈话的记录。记录保存在我们的卷宗中，未曾发表过。也许，它会引起您的兴趣。

有一个情况：同约·维·斯大林的所讲的话相反，在第二版《苏联大百科全书》中，没有关于托洛茨基和其他“反面活动家”的词条，因为后来曾通过波斯克列贝舍夫接到不发这类词条的指示。

Л. 邵武勉

1966年10月29日”

№01556

**斯捷潘诺夫和福米乔夫**  
**关于大百科词条篇幅致米哈伊洛夫的便函**  
(1953年1月10日)

致苏共中央书记 H. A. 米哈伊洛夫同志<sup>①</sup>

受您的委托，我们研究了《苏联大百科全书》党组书记邵武勉同志关于要在《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9卷发表《历史与历史编纂学》一文的便函。被召到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谈话的有《苏联大百科全书》代理副总编列文同志，总编助理阿尔巴托夫同志（词条作者之一）和《苏联大百科全书》党组书记邵武勉同志。

在研究邵武勉同志的便函时已经查明：在百科全书中往往有超出规定的《苏联大百科全书》词条篇幅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处理《历史与历史编纂学》词条的篇幅问题时也有反映。过分地拉长这篇文章的篇幅（从8万字符增加到56万字符）是没有必要的。通常其他学科的词条均不超过10万字符。

---

<sup>①</sup> H. A. 米哈伊洛夫，1952~1954年任苏共中央书记。

通过交换意见，认为把《历史与历史编纂学》词条压缩到5万~8万字符是适宜的。建议列文同志向《苏联大百科全书》总编室提出压缩《历史与历史编纂学》词条的篇幅的问题。<sup>①</sup>

B. 斯捷潘诺夫<sup>②</sup>

B. 福米乔夫<sup>③</sup>

---

① 本文件上注明：“便函于1953年1月14日送马林科夫同志。”

② B. П. 斯捷潘诺夫，时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③ B. C. 福米乔夫，时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出版研究室主任。

№01559

## 韦坚斯基关于大百科全书 编辑问题致赫鲁晓夫的信

(1953年3月21日)

致苏共中央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同志<sup>①</sup>

最尊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今年《苏联大百科全书》总编室拟写两个长篇词条——《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鉴于这两个词条的特殊责任并考虑到大百科全书的许多国内外读者都极有兴趣地期待着它们面世，我们请求中央委员会帮助我们确定两个词条的写作提纲、内容和篇幅。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总编室会议上已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两个词条的一些基本原则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总编室部分成员认为，与所有其他的关于各加盟共和国的词条不同，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一词条中不必总括地、历史地概述和评价俄罗斯科学、文化、哲学和艺术的发展。这些同志认为，一切关于俄罗斯各族人民历史、俄罗斯文明史的材料都应当集中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词条中去。

而总编室多数成员却认为有必要提供完整的题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词条，其中应包括十月革命以前俄罗斯

<sup>①</sup> 本文件上有赫鲁晓夫的批示：“转 П. Н. 波斯佩洛夫同志。尼·赫鲁晓夫。1953年3月27日。”

民族和俄罗斯国家历史的篇章，十月革命以后直至当代的俄罗斯联邦发展的历史概述的篇章，以及俄罗斯各个文化部门的发展简介。反过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词条也应当在阐明俄罗斯民族及其科学和文化的决定性、主导性作用的同时，概述苏联各族人民政治史的总的轮廓和苏联各族人民文化和艺术的发展。

我们恳求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如果您认为可能的话，就委托宣传鼓动部、经济学和历史学部、哲学部、文化和艺术部<sup>①</sup>讨论所有与撰写上述词条有关的问题。

附上关于我们的建议、关于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两词条的结构与内容方面有争论的问题、关于“共产党”部分、关于选拔干部困难以及关于上述两词条的篇幅的材料。<sup>②</sup>

《苏联大百科全书》总编、院士 Б. 韦坚斯基<sup>③</sup>

① 这些都是苏共中央的下属部门。

② 所收录的档案中无此附件。

③ 韦坚斯基，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1893～1969），无线电物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51～1969年任苏联大百科全书主编。

№01561

## 斯捷潘诺夫等关于大百科全书词条篇幅 致波斯佩洛夫的报告

(1953年4月9日)

苏共中央书记 П. Н. 波斯佩洛夫同志<sup>①</sup>：

《苏联大百科全书》总编韦坚斯基同志在写给苏共中央的信中请求帮助确定拟在《苏联大百科全书》上发表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两词条的结构、内容和篇幅。

韦坚斯基同志告知：总编室成员对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两词条有关的一些问题存有分歧。《苏联大百科全书》总编室的多数成员认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词条应当按这样的原则组稿：如同有关其他各个加盟共和国的词条一样，应该包含有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发展的内容，还要概述俄罗斯科学、文化、哲学与艺术的发展情况。另一部分总编室成员则认为，既然有关俄罗斯民族及其文化的所有问题都将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词条中详细阐述，那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词条就应当尽可能简明扼要，不再重复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词条中将要谈到的那些有关俄罗斯民族的内容。

<sup>①</sup> 本文件上有波斯佩洛夫的如下批示：“同意。П. 波斯佩洛夫。1953年4月10日。”另有沃龙佐夫所签意见：“送 П. Н. 波斯佩洛夫同志的秘书处。已将批复告知韦坚斯基同志。В. 沃龙佐夫。1953年4月13日。”

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已经研究了韦坚斯基同志在信中提出的问题。我们认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两词条应以总编室规定的篇幅（《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200万字符，约35个印张；《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90万字符，15~18个印张）依次刊登在大百科全书的相应卷内。

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词条的结构和内容，应当遵循与撰写其他加盟共和国的词条同样的原则，区别只是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词条中将没有共产党、共青团和工会的章节，但将有百科全书相关词条的引文资料。《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词条除了一般资料外，还应当包含俄罗斯联邦历史发展的概述和俄罗斯的科学、文化和艺术发展的历史述评，但要考虑到，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词条中将对这些问题作哪些阐述。

请您同意将此意见告知韦坚斯基同志。

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B. 斯捷潘诺夫  
出版、印刷、纸张局局长 B. 沃龙佐夫  
出版研究室主任 B. 福米乔夫

№01562

## 波斯佩洛夫关于 大百科全书词条篇幅致赫鲁晓夫的报告

(1953年4月14日)

尼·谢·赫鲁晓夫同志<sup>①</sup>：

《苏联大百科全书》总编韦坚斯基同志请求帮助确定拟在《苏联大百科全书》上发表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两词条的结构、内容和篇幅。

韦坚斯基同志告知：总编室成员在与以上两词条有关的一些问题上意见分歧。《苏联大百科全书》总编室的多数成员认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词条也应当遵循与撰写其他加盟共和国的词条同样的原则，应包含有关该共和国历史发展的章节，并且概述俄罗斯科学、文化、哲学和艺术的发展情况。总编室的另一些成员则认为，既然有关俄罗斯民族及其文化的所有问题都将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词条中详细阐述，那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词条就应当尽量短些，并且不重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词条中将要阐述的关于苏联人民的那些内容。

我认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两词条以总编室规定的篇幅（前者为200万字符，约35个印张，后者为90万字符，15~18印张）依次刊登在

① 本文件上注明：“赫鲁晓夫同志已阅，同意。4月14日。”“同意。И. 波斯佩洛夫。1953年4月20日。”

《苏联大百科全书》相应卷内为宜。

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一文的结构与内容，最好是遵循与撰写其他加盟共和国的词条同样的原则，所不同的只是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词条中将没有党、共青团和工会的章节，但将有百科全书相关词条的引文资料。该词条除了含有一般资料外，还应包含俄罗斯联邦历史发展的概述和俄罗斯科学、文化和艺术发展的历史述评。

II. 波斯佩洛夫

№01564

## 莫斯科夫斯基、沃龙佐夫关于大百科全书 词条致波斯佩洛夫的报告

(1953年4月22日)

苏共中央书记 П. Н. 波斯佩洛夫同志<sup>①</sup>：

《苏联大百科全书》总编韦坚斯基院士请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审查百科全书拟订的打算在《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3~50卷发表词条的反面人物名单。

韦坚斯基同志提交的名单曾被审定过，《苏联大百科全书》副总编兹沃雷金同志和《苏联大百科全书》总编室责任秘书维斯科夫同志曾参加审定。从名单中删去相当一部分反面人物是适宜的。

呈上拟发表其材料的反面人物名单和我们认为可以不在百科全书中专门写、而只在一般材料中写的人物名单，供您审阅。

请您审阅韦坚斯基院士提出的上述名单。

B. 莫斯科夫斯基<sup>②</sup>

B. 沃龙佐夫

附 件

可在《苏联大百科全书》中作简短介绍的反面人物名单

<sup>①</sup> 本文件上有波斯佩洛夫的批示：“同意。П. 波斯佩洛夫。1953年5月6日。”

<sup>②</sup> B. П. 莫斯科夫斯基是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 А.Ф. 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人，临时政府首脑  
А.В. 高尔察克——白匪海军上将  
Л.Г. 科尔尼洛夫——白匪将军  
П.Н. 克拉斯诺夫——白匪将军  
Г.Е. 李沃夫——临时政府总理  
К.К. 马蒙托夫——白卫将军  
Н.Е. 马尔柯夫第二——黑色百人团领导人  
П.Н. 米留可夫——立宪民主党人，临时政府成员  
В.К. 普列韦——沙皇政府内务大臣  
К.П. 波别多诺斯采夫——正教院总监  
С.Н. 普罗柯波维奇——临时政府成员  
В.М. 普利什凯维奇——保皇党人，黑色百人团分子  
Г.Е. 拉斯普廷  
П.К. 连年坎普夫——镇压 1905 年革命的将军  
М.В. 罗将柯——十月党人，国家杜马主席  
П.П. 里亚布申斯基——进步党首脑  
В.В. 萨文柯夫——社会革命党人  
С.Д. 萨宗诺夫——沙皇政府外交大臣  
М.И. 斯柯别列夫——孟什维克，临时政府成员  
П.П. 斯科罗帕茨基——乌克兰盖特曼，德国的傀儡  
П.А. 斯托雷平——沙皇政府内务大臣和大臣会议主席  
Д.Ф. 特列波夫——沙皇政府时期的莫斯科警察总监和彼得堡  
总督  
Н.В. 乌斯特里亚洛夫——高尔察克政府部长  
И.Г. 策列铁里——孟什维克，临时政府成员  
Н.Н. 尤登尼奇——白卫将军  
吉斯林——挪威法西斯党党魁

- 凯特尔——德国法西斯将军  
凯洛格——美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寇松——英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乔治·克列孟梭——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近卫文麿——日本反动政治活动家  
克里普斯——英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B. 顾<sup>①</sup>——中国反动外交家  
柯立芝——美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赖伐尔——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法国人民的叛徒  
库诺——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叛徒  
孔祥熙——中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拉尔戈·卡瓦列罗——西班牙国务活动家，西班牙人民的叛徒  
勒布伦——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李承晚——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傀儡  
利亚卡特·阿里·汗——巴基斯坦反动政治活动家  
劳合·乔治——英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麦克阿瑟——美国反动军事和政治活动家  
麦克唐纳——英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马兰——南非反动政治活动家  
曼讷林——芬兰反动国务活动家  
马歇尔——美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麦塔克萨斯——1936—1941年的希腊法西斯独裁者  
米勒兰——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摩根索——美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莫里森——英国反动活动家

---

<sup>①</sup> 即顾维钧。

- 莫斯利——英国法西斯党魁  
莫希齐茨基——波兰反动活动家  
墨索里尼——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  
牛赖特——德国法西斯外交家，战犯  
诺斯克——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摧残工人运动的刽子手  
阿里奥尔——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巴本——德国法西斯分子，战犯  
潘勒韦——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贝当——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战犯  
毕苏斯基——1926～1935年的波兰法西斯独裁者  
普利文——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普利茅斯——英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保罗·彭吉尔——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M. 普里莫·德里维洛——西班牙法西斯独裁者  
X. 普里莫·德里维洛——西班牙法西斯党创始人  
彭加勒——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溥仪——日本在满洲国的傀儡  
拉马季耶——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雷诺——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伦纳——奥地利反动政治活动家  
列诺得尔——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罗克·德利亚——法国法西斯党魁  
B. 雷茨-斯米格里<sup>①</sup>——1935～1939年间的波兰法西斯独裁者  
西蒙——英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sup>①</sup> 应是：爱德华·雷茨-斯米格里。

- 西特林——英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史末资——南非反动政治活动家  
Φ. 索福利斯<sup>①</sup> ——希腊反动政治活动家  
斯巴克——比利时反动政治活动家  
斯佛尔查——意大利反动政治活动家  
田中义一——日本反动国务活动家  
唐纳——芬兰政治活动家，战犯  
塔夫脱——美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蒂骚——斯洛伐克反动活动家，希特勒的傀儡  
铁托——南斯拉夫法西斯集团首领  
东条英机——日本将军，战犯  
杜鲁门——美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吴佩孚——中国反动的直系首领  
法格尔霍利姆——芬兰反动政治活动家  
福煦——法国元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联的组织者  
裕仁——日本天皇，战犯  
霍尔蒂——1919—1944年的匈牙利法西斯独裁者  
扎尔达利斯——希腊反动政治活动家  
仓科夫——保加利亚法西斯政变的领导人  
蒋介石——中国反革命的国民党制度的首领  
内维尔·张伯伦——英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约瑟夫·张伯伦——英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温斯顿·丘吉尔——英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张学良——中国将军，满洲的统治者  
谢德曼——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工人阶级的叛徒

<sup>①</sup> 应是：杰米斯托克利斯·索福利斯。

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德国反动国务活动家  
舒马赫——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工人阶级的叛徒  
舒什尼格——奥地利反动国务活动家  
艾伯特——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工人阶级的叛徒  
艾森豪威尔——美国反动军事和国务活动家  
埃里奥——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艾德礼——英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休斯——美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不应在百科全书上发表其资料的某些反面人物名单

A. M. 卡列金——白卫将军  
Л. Б. 加米涅夫——人民的敌人  
H. M. 基什金——立宪民主党人，临时政府成员  
B. H. 科科夫佐夫——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  
Ф. Ф. 科科什金——立宪民主党人，临时政府成员  
柯诺瓦洛夫——临时政府成员  
A. M. 克雷莫夫——白卫将军  
A. C. 卢柯姆斯基——白卫将军  
B. H. 李沃夫——正教院宗教事务大臣  
H. H. 李沃夫——立宪民主党人  
B. A. 马克拉柯夫——临时政府驻巴黎大使  
H. A. 马克拉科夫——沙皇政府内务大臣  
卡多干——英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卡利奥——芬兰反动国务活动家  
安东尼奥·卡尔莫纳——葡萄牙法西斯活动家  
片山潜——日本反动政治活动家  
C. A. 马斯洛夫——右翼社会革命党人，临时政府成员

Н.В. 涅克拉索夫——立宪民主党人，临时政府成员

А.В. 佩佩利亚耶夫——高尔察克分子

А.В. 彼舍霍诺夫——临时政府成员

Н.Н. 波克罗夫斯基——沙皇政府最后一位外交大臣

А.Д. 普罗托波波夫——沙皇政府内务大臣

Ф.И. 罗季切夫——临时政府成员

А.И. 李可夫——人民的敌人

Г.М. 谢苗诺夫——高尔察克分子

М.А. 斯皮里多诺娃——社会民主党人，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叛乱的参加者

Н.Н. 苏汉诺夫——孟什维克

М.И. 捷列先科——临时政府成员

Л.Д. 托洛茨基——人民的敌人

Р. 温甘伦——高尔察克分子

В.Б. 弗雷德里克斯——尼古拉二世宫廷事务大臣

А.Н. 赫沃斯托夫——沙皇政府内务大臣，极端反动分子

Н.В. 柴可夫斯基——阿尔汉格尔斯克白卫政府首脑

С.И. 施德洛夫斯基——十月党人，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

А.И. 盛加略夫——立宪民主党人，临时政府成员

Д.Н. 希波夫——十月党人

А.Г. 什库罗——白卫将军

В.В. 施秋梅尔——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和外交大臣，极端反动分子

В.В. 舒利金——临时政府成员，黑帮报纸的编辑

卡扬杰尔——芬兰反动政治活动家

克尔——英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基维米亚基——芬兰反动政治活动家

- 克尼格——加拿大反动政治活动家  
小矶邦昭——日本将军，战犯  
科斯格雷夫——爱尔兰反动政治活动家  
克拉玛什——捷克斯洛伐克反动政治活动家  
库纳——德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达夫·库珀——英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兰格——挪威反动政治活动家  
赖伊——挪威反动活动家，美帝国主义在联合国的帮凶  
勒鲁斯——西班牙反动政治活动家  
利普斯基——波兰反动政治活动家  
李宗仁——国民党中国桂系首领之一  
罗安格·比布尔·索格拉姆——暹罗反动政治活动家，美国傀儡  
卢舍尔——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马尼乌——罗马尼亚反动政治活动家  
马伦——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麦肯吉——加拿大反动政治活动家  
米科拉伊奇克——波兰反动政治活动家  
米哈伊洛维奇——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  
莫克——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摩勒——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内伊——美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纳吉——匈牙利反动政治活动家  
奈迪奇——德国占领时期塞尔维亚傀儡政府首脑  
巴维利奇——德国占领时期克罗地亚法西斯政府首脑  
帕尔默·米切尔——美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潘加洛斯——希腊反动国务活动家  
佩尔涅尔斯托费尔——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工人阶级的叛徒

- 普利斯托——西班牙反动政治活动家  
皮埃罗——比利时反动政治活动家  
兰科维奇——南斯拉夫法西斯集团魁首之一  
勒姆——德国法西斯分子  
里宾特洛甫——德国法西斯外交家，主要战犯之一  
罗森伯格——德国法西斯头子之一，战犯  
罗克萨斯——1946~1948年期间的菲律宾总统，美国傀儡  
赖提——芬兰政治活动家，战犯之一  
西园寺公望——日本反动政治活动家  
费伦茨·萨拉希——匈牙利傀儡政府头子  
萨拉盖特——意大利反动政治活动家  
萨罗——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斯温胡武德——芬兰反动政治活动家  
塞西尔——英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辛克莱——英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斯卡韦尼乌斯——丹麦反动政治活动家  
斯兰斯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敌人  
斯皮尔曼——红衣主教，纽约大主教，美帝国主义天主教神职  
人员最反动的代表之一  
斯汤宁——丹麦反动政治活动家，工人阶级的叛徒  
斯廷森——美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斯托尔伯格——芬兰反动政治活动家  
斯托亚季诺维奇——南斯拉夫反动政治活动家  
斯特林——英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德钦努——缅甸反动政治活动家  
M. 泰勒——美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Γ. 泰勒——美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季托尼——意大利反动政治活动家

蒂图列斯库——罗马尼亚反动政治活动家

东乡——日本外交官，战犯

威尔基——美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梅津——关东军司令，战犯

温间——瑞典反动国务活动家

伍尔加——美国反动工会运动活动家，工人阶级的叛徒

沃德——1918～1919年武装干涉时期英国在西伯利亚的探险队队长

韦尔斯——美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菲格尔——奥地利反动政治活动家

费洛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保加利亚法西斯政府头子

弗兰坚——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福里斯特尔——美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弗兰林-布伊翁——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弗朗索瓦-邦赛——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弗雷泽——新西兰反动政治活动家

佛罗耶萨尔——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霍格伦——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工人阶级的叛徒

霍德托夫特——丹麦反动国务活动家

希尔科特——美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希尔·罗布利斯——西班牙法西斯分子

平沼——日本国务活动家，秘密委员会主席

K. 广田——日本战犯

何应钦——国民党人，国民党中央军事部长

霍尔斯吉——芬兰反动政治活动家

曹锟——直系首领之一，北京政府首脑

- 茨韦特科维奇——南斯拉夫反动政治活动家  
采尔吉贝尔——德国社会法西斯分子  
奇夫利——澳大利亚反动政治活动家  
陈立夫——反动的国民党活动家  
陈炯明——中国军阀头子  
舍利巴——意大利反动政治活动家  
施莱歇尔——德国反动国务活动家  
肖当——法国反动国务活动家  
舒曼——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埃瓦特——澳大利亚反动政治活动家  
埃伊纳乌迪——意大利反动政治活动家  
埃伦博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工人阶级的叛徒  
埃兰德——瑞典反动国务活动家  
休斯——澳大利亚反动政治活动家

№01565

## 韦坚斯基关于大百科全书词条篇幅

### 致赫鲁晓夫的信

(1953年4月24日)

苏共中央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同志<sup>①</sup>：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打算刊登下列篇幅相同的词条：

《苏联共产党》——20万字符

《弗·伊·列宁》——20万字符

《约·维·斯大林》——20万字符

就其内容而言，这几个词条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重复的。

最好对这几个词条的篇幅作如下规定：

《苏联共产党》——20万字符

《弗·伊·列宁》——10万字符

《约·维·斯大林》——10万字符

最好也把为《百科辞典》撰写的上述词条的篇幅相应地减少三分之二。

请您就此问题作适当指示。

同时请您允许把为《苏联大百科全书》撰写的《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两词条均缩短到10万字符，为《百科辞典》撰写的上述两词条均缩短到3万字符。

Б. 韦坚斯基

<sup>①</sup> 本文件上有赫鲁晓夫的如下批示：“转 П. 波斯佩洛夫同志。Н. 赫鲁晓夫。1953年4月25日。”

№01567

## 沃龙佐夫和克鲁日科夫关于压缩大百科全书 词条篇幅致波斯佩洛夫的报告

(1953年5月7日)

苏共中央书记 П. Н. 波斯佩洛夫同志<sup>①</sup>：

《苏联大百科全书》总编韦坚斯基同志在致苏共中央的信中请求允许压缩《苏联大百科全书》中有关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的生平的词条的篇幅。

根据早先总编室批准的语汇表，《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等生平词条规定每条刊登的篇幅为20万字符（约4个印张）。

鉴于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的革命活动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共产党》两词条中详细阐述，现在《苏联大百科全书》总编室认为有必要把这些词条压缩1/2。

韦坚斯基同志被告知：这个问题可以由百科全书总编室自行解决。

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 B. 克鲁日科夫  
出版、印刷和纸张局局长 B. 沃龙佐夫

<sup>①</sup> 本文件上有波斯佩洛夫的批示：“同意。П. 波斯佩洛夫。1953年5月8日。”

№01568

## 韦坚斯基关于大百科全书 所配照片问题致波斯佩洛夫的信

(1953年5月14日)

苏共中央书记 П. Н. 波斯佩洛夫同志<sup>①</sup>：

关于为介绍民主阵营一些国家领导人的词条所配照片的尺寸问题，我曾征求过 M. A. 苏斯洛夫同志的意见。我们严格地按照苏斯洛夫同志下达的关于照片尺寸的指示，已经安排了贝鲁特、哥特瓦尔德、萨波托斯基、道比、格罗查、乔治乌-德治、Г. 达米扬诺夫、金斗奉、金日成和格罗提渥等同志的照片。

现将外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些著名活动家的总名单<sup>②</sup>呈送给您，我们恳请您指示，我们设计的照片尺寸是否妥当。

用红铅笔标出的一些人的姓名，其照片在已经问世的或尚在印制中的百科全书各卷中已经刊印或付排。

苏联大百科全书总编 Б. 韦坚斯基

<sup>①</sup> 本文件上有波斯佩洛夫的如下批示：“转 B. П. 莫斯科夫斯基同志。П. 波斯佩洛夫。1953年5月16日。”

<sup>②</sup> 收集的档案中无此名单。

№01569

## 韦坚斯基关于大百科全书 所配照片问题致苏斯洛夫的信

(1953年5月22日)

苏共中央书记 M. A. 苏斯洛夫同志<sup>①</sup>：

我曾就为介绍民主阵营一些国家担负领导工作的活动家的词条所配照片的尺寸问题征询过您的意见。我们严格遵循您对照片尺寸的指示，已经安排了贝鲁特、哥特瓦尔德、萨波托斯基、道比、格罗查、乔治乌-德治、格·达米扬诺夫、金斗奉、金日成和格罗提渥等同志的照片。

现将外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些著名活动家的总名单<sup>②</sup>呈送给您，我们恳请您指示：我们设计的照片尺寸是否妥当。

用红铅笔标出的一些人物姓名，其照片在已经问世的或尚在印制中的百科全书各卷中已经刊印或付排。

《苏联大百科全书》总编 B. 韦坚斯基

① 本文件上有苏斯洛夫的批示：“转克鲁日科夫同志和斯捷潘诺夫同志。M. 苏斯洛夫。5月25日”

② 收集的档案中无此名单。

№01570

**莫斯科夫斯基、沃龙佐夫关于大百科全书  
所配照片问题致波斯佩洛夫的报告**

(1953年5月25日)

苏共中央书记 И. Н. 波斯佩洛夫同志：

《苏联大百科全书》总编韦坚斯基院士把拟在百科全书中刊登其照片的外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著名活动家的名单呈送给您审阅并请您就上述活动家的照片尺寸问题作指示。

正如韦坚斯基同志所告知的那样，在拟订准备在百科全书中刊登其照片的外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名单时，《苏联大百科全书》总编室人员漏掉了一些人的名字，另外也有一些不准确之处。现在，对名单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正，在这之后总编室又就这一问题向苏共中央提出了新的建议。鉴于这种情况，韦坚斯基同志请求不要审阅他送审的名单。

B. 莫斯科夫斯基

B. 沃龙佐夫

№01571

## 莫斯科夫斯基、沃龙佐夫关于《简明教程》 词条的问题致波斯佩洛夫的报告

(1953年6月16日)

苏共中央书记 П. Н. 波斯佩洛夫同志<sup>①</sup>：

《苏联大百科全书》总编室已将新的一稿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的词条呈送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审阅<sup>②</sup>。

新词条仍有严重缺点。其中没有展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内容，没有指明这部著作对苏共党史所作的科学的、符合共产党所历经的各个主要历史阶段的历史分期。词条中甚至没有提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有科学阐述了共产党理论基础的专门一章——《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展开对苏联共产党走过的历史道路作了基本总结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的内容，没有指明这本书对外国共产党的意义。

我们认为，该词条是不能按这个样子刊登的。

B. 莫斯科夫斯基

B. 沃龙佐夫

① 本文件上有波斯佩洛夫的批示：“同意。П. 波斯佩洛夫。1953年6月16日”。此外文件上还有沃龙佐夫所作的说明：“《苏联大百科全书》总编室对《简明教程》词条的结论已通报给 П. Н. 波斯佩洛夫同志的秘书处。B. 沃龙佐夫。1953年6月18日。”

② 该词条未发表

№01572

## 沃龙佐夫、博戈柳博夫关于《简明教程》 词条的问题致莫斯科夫斯基的报告

(不早于 1953 年 6 月 16 日)

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B. П. 莫斯科夫斯基同志：

《苏联大百科全书》副总编兹沃雷金同志把为百科全书撰写的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的词条的新的—稿（此稿是按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的意见写成的）呈报给了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

我们了解了词条新一稿的内容，认为有必要指出：词条的结构和内容提纲没有引起不同意见。

同时似应建议《苏联大百科全书》总编室在做最后加工润色时注意对词条作如下修改：

- （1）词条的开头应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书名页一致；
- （2）在第 8 页上不必列举斯大林的著作名称，因为这些著作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没有被提到；
- （3）在介绍该书专门阐述苏共历史第二阶段的章节时，似应谈列宁和斯大林对社会问题的充分研究。

请您同意将本答复转给《苏联大百科全书》副总编。

B. 沃龙佐夫  
K. 博戈柳博夫<sup>①</sup>

<sup>①</sup> K. M. 博戈柳博夫，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指导员。

№01573

## 别利亚科夫关于大百科全书照片问题 致苏斯洛夫秘书处的报告

(1953年6月17日)

呈 M. A. 苏斯洛夫同志秘书处<sup>①</sup>

《苏联大百科全书》总编韦坚斯基院士请求对拟在《苏联大百科全书》和《百科辞典》上刊登的某些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的照片的尺寸问题作出指示。

对此报告的意见已经以建议的形式转告总编室（兹沃雷金同志），并指出对各种个别情况应由《苏联大百科全书》总编室自己作出决定。

A. 别利亚科夫<sup>②</sup>

---

① 本文件上注明：“此问题已向 M. A. 苏斯洛夫同志本人报告。B. 斯捷潘诺夫。1953年6月16日。”

② A. C. 别利亚科夫，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部长助理。

№01574

**兹沃雷金关于《简明教程》词条  
致莫斯科夫斯基的信**

(1953年6月26日)

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B. П. 莫斯科夫斯基同志：

兹将斯列波夫同志和巴赫希耶夫同志撰写的、Г. Д. 奥比奇金同志（《苏联大百科全书》总编室成员）签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词条的最后一稿呈上。

此稿是根据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的意见拟就的。

恳请告知：对此稿有无意见。

《苏联大百科全书》副总编 A. 兹沃雷金

**№01576**

**莫斯科夫斯基和普图什金关于《简明教程》词条  
致苏共中央书记处总务部的报告**

(1953年7月8日)

致苏共中央书记处总务部

对№36668 函的答复

《苏联大百科全书》副总编兹沃雷金同志把为百科全书撰写的有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的词条的新的一稿呈报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此稿是根据宣传鼓动部的意见拟就的。

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已审阅该词条新一稿的文本，有关撰写拟发表的这个词条的必要指示已传达给兹沃雷金同志。

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B. 莫斯科夫斯基

出版与印刷局副局长 Г. 普图什金

№01578

## 梅利尼科夫等关于《希特勒的将军们为美国服务》 一书出版问题致马林科夫的信

(1953年8月12日)

尊敬的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

1952年，根据同军事出版社的合同，我们撰写了一本很受欢迎的书，该书揭露了一批前法西斯主义将官，这些人如今又重新成为西德军队的头目。书中大量采用了法西斯将官本人的回忆录和其他文章、德国帝国主义的英美帮凶的各种书籍、小册子和文章，这些书籍、小册子和文章表明：德国军国主义分子根本没有放弃自己的侵略目标，而只是幻想着要“故伎重演”。正如我们所认为的，书中引用的实际材料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因为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至今还未曾在苏联文献中被采用过。此外，我们还力求赋予我们这本小书以最受欢迎的形式，以使其不仅让专家们感兴趣，而且也让广大读者喜闻乐见。

受军事出版社之托，本书曾由五位评论家审阅，他们均对本书给予肯定的评价。在这几位评论家中，有军事工作者、外交人员、政治工作者和作家。在遵照评论家们给我们提出的意见修改后，该书即付印。今年2月，我们收到了大样。换句话说，如果此书继续正常地历经各道工序的话，那么它早就可以面市了。

然而，令我们感到奇怪的是，2月底我们收到了出版社的一份通知，说我们这本书的题目（已经完全定好了的！）被从出版计划上取消了。正如有人向我们口头解释的那样，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

在目前国际形势下，这本书的题目失去了现实意义。尽管我们作了努力，但我们仍然未能说服编辑部相信，我们的著作的现实意义不仅没有减弱，而且还大大增强了；如此不珍惜作者们、评论家们、编辑们和为本书排字拼版的技术人员的劳动未必合适。

不言而喻，我们距离能够写出没有丝毫缺点和不足之处的作品的理想还很遥远。所有旨在改进本书的意见我们都已在作品中考虑了，当然今后也会考虑的。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那种说法：在目前形势下，那些揭露美国和西德军国主义分子力图把西德变为反对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进攻基地的阴谋的书，是我们苏联读者不需要的。在我们看来，这样的书越多越好。

尊敬的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

我们恳请您作出指示，以便重新研究这个问题。如果您能抽空亲自浏览一下我们的拙作，我们将不胜荣幸。随信附寄本书大样一份。

Л. 梅利尼科夫<sup>①</sup>

Л. 乔尔纳亚<sup>②</sup>

① Л. Е. 梅利尼科夫，历史学家，有德国现代史方面的著作。

② Л. Б. 乔尔纳亚，翻译家，文艺学家。

№01579

**莫斯科夫斯基等**  
**关于《希特勒的将军们为美国服务》**  
**一书出版问题致苏共中央书记处总务部的报告**  
(1953年9月11日)

送苏共中央书记处总务部

对№42084 函的答复

梅利尼科夫和乔尔纳亚两同志在致格·马·马林科夫同志的信中说：根据同军事出版社的合同，他们撰写了《希特勒的将军们为美国服务》一书。出版社把这本书从1953年的出版计划上删掉了。写信人请求了解一下该书的内容并允许此书出版。

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了解了梅利尼科夫同志和乔尔纳亚同志的书的内容。书中揭露了前法西斯将军，把他们同美国统治集团在准备新的战争方面的联系曝了光。

同时，在书中个别地方作者过分热衷于暴露德国将军们的生活细节，对美英领导人说了一些不正确的话。

鉴于该书写的是现实题材，故建议军事出版社和该书作者把书中的次要材料和不确切说法删去，继续进行该书的出版准备工作。<sup>①</sup>

<sup>①</sup> 该书后来改名为《希特勒的将军们在准备复仇》，由军事出版社于1954年出版。

该书作者梅利尼科夫同志被召到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已向他作了必要的解释。书的大样已退还作者。

B. 莫斯科夫斯基

B. 福米乔夫

№01580

韦坚斯基关于词条《列宁和斯大林的陵墓》  
致波斯佩洛夫的信

(1953年10月20日)

苏共中央书记 П. Н. 波斯佩洛夫同志：

《苏联大百科全书》总编室请您审阅所附的词条——《列宁和斯大林的陵墓》——并就可否在《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上发表该词条作指示。

附件：词条（共两页）。<sup>①</sup>

Б. 韦坚斯基

<sup>①</sup> 所收集档案中无此附件。

№01581

克鲁日科夫等  
关于词条《列宁和斯大林的陵墓》  
致苏斯洛夫的报告  
(1953年10月22日)

苏共中央书记 M. A. 苏斯洛夫同志：

《苏联大百科全书》总编韦坚斯基院士请求准许在《苏联大百科全书》上发表他随信所附的词条《列宁和斯大林的陵墓》。该词条是列宁博物馆副馆长伊格纳季耶夫同志和建筑艺术史与建筑艺术理论研究所科研人员斯托亚诺夫同志撰写的。

我们认为，呈送的《列宁和斯大林的陵墓》这一词条似应在《苏联大百科全书》上发表。

B. 克鲁日科夫

B. 叶夫格拉福夫<sup>①</sup>

B. 福米乔夫<sup>②</sup>

① R. E. 叶夫格拉福夫，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助理。

② 本文件上有如下说明文字：“送 M. A. 苏斯洛夫同志秘书处。已于1953年10月27日通知《苏联大百科全书》主编韦坚斯基同志。B. 福米乔夫。”

## 【专题说明】

# 苏共中央书记处对历史研究所的关注

(1953年2~7月)

本专题选编的档案是关于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工作和干部安排问题。对于作为苏联历史学的最主要研究机构的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共中央书记处和意识形态部门参与了其工作任务的确定和人员配备问题的解决。从这些文件可以看出苏联对意识形态部门的控制手段和管理方式。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李祿翻译)

№01557

## 潘克拉托娃和西多罗夫关于历史所工作 致苏斯洛夫和鲁缅采夫的信

(1953年2月17日)

致苏共中央书记 M. A. 苏斯洛夫、经济与史学部主任 A. M. 鲁缅采夫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工作无论在报界还是在我们党的十九上都遭到了理所当然的、正义的批评。在历史所学术委员会，在工作人员大会上，我们都极力让全体人员认清所犯的错误，动员大家去纠正这些错误。研究所的工作计划已经重新制订，拟定了新的迫切的课题。今年，在为大学编写五本苏联历史和通史教科书的同时，要开始研究“斯大林同志的天才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与历史科学”的问题、“斯大林的和平政策”和“同英美史学骗子作斗争”的问题。同时，还要进行《世界史》（10卷）和《苏联史》多卷本的编纂工作。

为了实施已拟订的实际任务，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以进一步加强苏联科学院历史所领导班子和加强对最重要的研究室（近代史和苏联社会史研究室）的领导。

直到不久以前，研究所的领导班子都是由清一色的封建社会早期史专家组成的，近代史和现代史研究室是由封建制度方面的专家领导的。在这种条件下不可能重建研究所并使之转而解决一些迫切任务。现在，已经加强了对现代史室的领导（菲利波夫同志主持工

作)，任命西多罗夫同志为副所长。必须把加强研究所领导班子和研究室领导的工作做到底。

我们请求中央委员会委派历史学副博士 Л.С. 加波年科（中央科学部工作人员，苏联史专家）任副所长。我们认为，他是一位朝气蓬勃的、有理论修养的工作人员。在通史方面，我们请求任命 Н.С. 加尔金教授为副所长。加尔金同志在社会科学院主持一个教研室的工作并在大学兼任教学工作。我们请求解除加尔金同志在大学的工作并将他派到历史所来。他将可以身兼社会科学院和历史所的两项工作。

我们请求委派现任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主编的历史学副博士 Л.А. 丘加耶夫担任苏联社会史研究室主任职务。目前该室由基姆教授临时主持工作。我们请求批准 Ф.В. 波将金教授任近代史研究室主任。波将金同志是我所编制内工作人员，但他在历史所的工作是挂名的，因为除此之外他还主持高级党校通史教研室的工作，还是社会科学院通史教研室的成员。超负荷教学工作使历史研究所不可能根据他的专长使用他。我们请求让波将金同志摆脱在高级党校教研室的领导工作，在通史方面颇有造诣的专家干部是如此有限，让他们脱离科研工作乃是不可容忍的浪费。

我们请求中央委员会派 В.М. 赫沃斯托夫教授来所工作（兼职）。波将金和赫沃斯托夫是近代史方面的大家，因此他们应当积极帮助历史研究所编纂《世界史》，帮助领导这一领域的科研工作。

我们请求中央科学部帮助我所从军事机关吸收一些苏联社会史方面的专家——Г.Н. 戈利科夫上校（伏龙芝学院）、Г.В. 库兹明上校——参加苏联史研究室的科研工作。我们向伏龙芝学院首长及政治部提出的请求没有得到任何支持。

我们认为，上述措施是研究所必需的起码的帮助。

苏共中央委员 A.M. 潘克拉托娃<sup>①</sup>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A.И. 西多罗夫<sup>②</sup>

---

① 潘克拉托娃，安娜·米哈伊洛夫娜（1897～1957），苏联历史学家，1953年起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② 西多罗夫，阿尔卡季·拉夫洛维奇（1900—1966），苏联历史学家，历史学博士，教授。1953～1959年任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01558

**涅斯梅亚诺夫和托普契耶夫  
关于历史所问题致苏斯洛夫的信**

(1953年3月21日)

秘密

致苏共中央书记 M. A. 苏斯洛夫同志<sup>①</sup>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是苏联科学院历史和哲学学部的一个最大的单位，理应在全国的历史科研单位中占据主导地位。

可是，苏联科学院历史所办得不好，没有完成它所面临的各项任务。在党的十九大上以及在我们的党报上，该所工作都曾受到严肃的批评。

造成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和缺点的原因是没有为该所配备足够的既有学术造诣、又有马克思主义修养的干部。

直到最近，研究所对工作人员的选择和对干部的培养都是不正确的：主要的注意力都放到了从事古代史、封建制度和中世纪史研究的研究室补充和配备干部上去了。结果，历史研究所在苏联社会史和近、现代史方面的专家严重不足。在历史研究所及其列宁格勒分所的定员中，有7位苏联科学院院士、4位通讯院士、43位博士和105位副博士。

<sup>①</sup> 本文件上有苏斯洛夫的批示：“转普绍采夫、斯捷潘诺夫、E. 格罗莫夫同志。M. 苏斯洛夫。1953年3月23日”

可是，其中从事苏联社会史研究的只有18人，从事现代史研究的只有19人。

在历史研究所现有的11位苏联科学院院士和通讯院士中，没有一位是在社会主义时期苏联各族人民史研究室工作的。此外，应当指出的是，大多数院士和通讯院士一般都不积极参与历史研究所的工作。

为了改进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工作，必须为该所增派干部，以便加强研究所领导班子和一些研究室的领导。

为此目的，我们请求：

1. 把A.Л. 西多罗夫教授和Ф.В. 波将金教授的工作集中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此请求解除波将金同志在高级党校的教研室领导职务、解除西多罗夫同志在国立莫斯科大学的教研室领导和《苏联大百科全书》总编室成员职务。

2. 派下列同志来研究所工作：

派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教研室主任、莫斯科大学教授伊利亚·萨维奇·加尔金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解除他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的工作。

派伏龙芝军事学院教研室副主任格奥尔基·纳扎罗维奇·戈利科夫任研究室主任。

派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主编德米特里·阿格耶维奇·丘加耶夫任研究室主任。

派苏联情报局工作人员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沙罗夫来所任研究员。

3. 派1953年毕业于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来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

- (1) 研究方向为现代史的研究生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叶尔莫拉耶夫、塔季扬娜·基里洛夫娜·科舍廖娃、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

马尔琴科；

(2) 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时期苏联各族人民史的尼古拉·马克西莫维奇·梅什科夫、伊万·莫伊谢耶维奇·马特维延科、尼娜·谢苗诺夫娜·涅奇普尔诺娃、安德烈·马克西莫维奇·西尼钦、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尤金。

苏联科学院院长、院士 A.H. 涅斯梅亚诺夫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总学术秘书、院士 A.B. 托普奇耶夫

№01560

邦契—布鲁耶维奇  
关于历史所机构变动问题致赫鲁晓夫的信

(1953年4月5日)

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同志<sup>①</sup>

最尊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为了一个令我不安的原则性问题，我再次给您写信。我要告诉您：历史研究所的宗教史与无神论史研究室要被撤销了。这个问题没有和我商量。

我写给您的第一封信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只是在和利霍拉特<sup>②</sup>同志通电话时我才弄明白，原来问题已经事先定了。

这个问题令我焦虑不安，因为这是要取消我国科研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在我们这个大国中，有大量的科研机关，但却没有一个单位从事过对宗教史和无神论史的科学的、深入的研究。利霍拉特同志跟我谈了列宁格勒宗教史博物馆的情况。但这个博物馆起码要在5年之后才能陈列自己的材料，5年之内不能从事宗教史和无神论史方面的研究工作。具体研究这个问题的基层科研组织恰恰应当在莫斯科，因为莫斯科有党的领导机关和在人文科学领域中起指导作用的科学研究所。此外，我们科研工作的材料基地——档案馆和最大的藏书库也都在莫斯科。

<sup>①</sup> 本文件上有赫鲁晓夫的批示：“转 П.Н. 波斯佩洛夫同志。请您审阅邦契—布鲁耶维奇同志的报告。尼·赫鲁晓夫。1953年4月6日。”

<sup>②</sup> А.В. 利霍拉特，苏共中央科学与文化部的指导员。

我们这个研究室是1946年12月根据政府决议建立的，历史研究所总是极力要取消这个研究室，不给予它帮助，现在干脆要关闭它了。

在我国，同宗教残余的斗争任务并未结束。

为了正确地宣传与此有关的问题，必须科学地、仔细地研究这些问题。为此，必须保留历史研究所的宗教史和无神论史研究室，保留该研究室现有的这一领域中有造诣的学术干部。

我同利霍拉特同志谈到，哪怕只是成立一个“研究小组”也好。但仔细考虑之后，我得出结论：这很不明确。按规定历史所应设研究室和委员会，但不设研究小组。这在实际上是取消这一部分工作，因为“研究小组”在研究所里根本没有法人身份。而工作人员则将隶属于各个研究室，而不属于“研究小组”。

我恳请您审查这个问题，因为这里涉及的是要撤销一个虽然不大、但却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宗教史和无神论史的科研中心，而这个中心理应完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的纲领性文章《论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嘱咐我们要完成的任务，我们是把这篇文章作为我们科研活动的基础的。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宗教史和无神论史研究室主任

弗拉基米尔·邦契-布鲁耶维奇<sup>①</sup>

<sup>①</sup> 邦契-布鲁耶维奇，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1873—1955），189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任《火星报》、《前进报》、《真理报》记者。1917—1920年任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后从事学术活动。

№01563

## 鲁缅采夫和利霍拉特关于历史所机构问题 致波斯佩洛夫的报告

(1953年4月15日)

苏共中央书记 П. Н. 波斯佩洛夫同志<sup>①</sup>：

历史学博士 В. Д. 邦契-布鲁耶维奇请求苏共中央重新考虑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已于今年3月20日批准的历史研究所的新结构，保留所内原有的宗教史研究室。历史研究所领导班子和党组织认为所内设宗教史研究室是不合适的。

1946年在历史研究所内建立的宗教史研究室未能保障对宗教史和无神论史的各种问题进行科学的、深入的研究。该室的科研工作总体上脱离社会史研究，其科研人员分散地进行研究工作，彼此隔绝，同其他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也缺乏应有的联系。该研究室存在期间只搞了一本集体作品——关于宗教史和无神论史问题的文集。

历史所领导班子和党组织认为，为了改进宗教史和无神论史问题的研究，把这一领域的所有现有的科研干部集中安排在本所有关的研究室是必要的。为了协调宗教史和无神论史方面的科研工作和讨论准备出版的科研著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历史学博士 В. Д. 邦契-布鲁耶维奇领导该委员会的工作。

邦契-布鲁耶维奇同时还是苏联科学院宗教史博物馆馆长，该馆除了做陈列展览工作外，还进行科研工作。现在，由于历史研究

<sup>①</sup> 本文件上由波斯佩洛夫的如下批示：“同意。П. 波斯佩洛夫，1953年4月16日。”

## 苏共中央书记处对历史研究所的关注

所正在改组，前宗教史研究室的一些科研人员将被调到博物馆去。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涅斯梅亚诺夫同志和托普奇耶夫同志）同意历史研究所的建议，不认为有必要重新审查自己于1953年3月20日就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

在电话交谈中，邦契-布鲁耶维奇同意这样处理问题。

我们认为，对邦契-布鲁耶维奇同志的来信的审理可以到此结束。

A. 鲁缅采夫

A. 利霍拉特

№01566

## 鲁缅采夫等关于加强历史所领导力量 致苏斯洛夫的报告

(1953年4月30日)

苏共中央书记 M. A. 苏斯洛夫同志：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涅斯梅亚诺夫和托普奇耶夫二同志）以及 A. M. 潘克拉托娃同志和 A. П. 西多罗夫同志（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代理所长）请求苏共中央提供帮助，以加强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领导力量，该所近年来不能胜任赋予它的任务。他们请求派遣 И. С. 加尔金（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教研室主任）、Г. Н. 戈利科夫（M. B. 伏龙芝军事学院教研室副主任）、П. А. 丘加耶夫（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主编）、M. С. 沙罗夫（苏联情报局工作人员）到历史研究所工作；把西多罗夫教授的工作集中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解除他在莫斯科大学和《苏联大百科全书》总编室兼任的工作；解除波将金教授在苏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工作以便让他担负历史研究所的基本工作，并请求把一批今年毕业于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派到所里来。

应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和历史研究所领导班子的请求，派遣原在苏共中央马恩列研究院工作的 И. Н. 萨莫鲁科夫同志（现被批准担任现代史研究室主任）和毕业于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的 T. K. 科舍廖娃同志去该所工作。此外，一俟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毕业，还将派遣几名专修苏联社会史和现代史的研究生去历史研究所。

经与苏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米特罗诺夫同志协商，波将金教授

在高级党校担任的与领导通史教研室无直接关系的各项任务将被解除，以使他可以同时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开展工作。

经与国立莫斯科大学副校长雷巴科夫同志协商，西多罗夫教授将被解除该校苏联史教研室的领导职务。

关于派遣丘加耶夫同志去历史研究所工作的问题，在向苏共中央呈报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主编一职的候选人之后再定。

鉴于加尔金、戈利科夫和沙罗夫等同志在其他单位的工作负担很重，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涅斯梅亚诺夫同志和托普奇耶夫同志）撤销将上述几位同志派往历史所的请求。

我们认为，对涅斯梅亚诺夫同志和托普奇耶夫同志的信件进行审核可以到此结束了。

B. 鲁缅采夫

B. 克鲁日科夫<sup>①</sup>

E. 格罗莫夫<sup>②</sup>

<sup>①</sup> B. C. 克鲁日科夫，时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

<sup>②</sup> E. H. 格罗莫夫，苏共中央党、工会和共青团机关部部长。

№01575

## 西多罗夫关于历史所任务致波斯佩洛夫的信

(1953年7月4日)

苏共中央书记 П.Н. 波斯佩洛夫同志：

尊敬的彼得·尼古拉耶维奇！

请您帮助解决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一系列重要的工作问题。科学院主席团在其1953年3月20日的决定中向历史研究所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任务，诸如：

1. 完成撰写《世界史》的工作；
2. 为高等院校编写历史学各部分教科书；
3. 完成《苏联史概要》、《莫斯科史》和《列宁格勒史》等著作。

从加强苏联史以及通史的一些最迫切问题的专题研究的角度来看，历史研究所领导必须改组所内工作。

所有这些任务的实现都遇到了一系列困难，对这些困难历史研究所克服得很慢或根本克服不了。

必须加强研究所及其各研究室的领导。这个问题无论是在科学部还是在主席团都已谈论很久了。但至今仍毫无结果。我和 A.M. 潘克拉托娃请求您派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 Л.С. 加波年科任副所长，但这个问题没有得到科学部的支持，虽然也有人向我转达说您是给予肯定的。

苏维埃时期苏联史研究室主任问题拖了一年半。史学博士 M.П. 基姆是代理室主任。已经向科学部反映了另找适当人选的

正当要求。我曾不止一次地提过合适的人选。在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工作的史学副博士 Д. А. 丘加耶夫，还有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工作的史学副博士 Г. Н. 戈利科夫，都可以作这样的人选。然而这个问题的解决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尽管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社长 С. М. 科瓦廖夫同意 Д. А. 丘加耶夫来历史所，丘加耶夫本人也在力争这一调动。苏联社会史研究室（该室现有 40 余人）的固定的室主任问题不解决，全部活动就难以组织。这个研究室现在面临一系列最重要的任务，尤其是要为高等院校编写两卷本的苏联苏维埃社会史教科书。历史研究所领导预定 Д. А. 丘加耶夫为这套教科书的责任编辑。但不言而喻，只有解除他在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的日常工作他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М. П. 基姆早就请求解除他的代理室主任职务。

恳请帮助解决这一人事问题。

下一个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就是完成撰写《莫斯科史》一书的工作。历史所对此问题已研究多年。《莫斯科史》首卷已印好，二卷印刷即将完成并在最近一个月内即可问世。三卷和四卷已在出版社付排。历史研究所正集中精力写作《莫斯科史》第六卷（1941 年之前的苏联时期）。但现在却反复向历史研究所提出必须把《莫斯科史》压缩成三卷的问题。已经写成了《莫斯科史》前五卷的内容，又让用三卷的篇幅叙述《莫斯科史》，这就意味着要放弃全部已经完成的工作而着手重写这部著作，也就是要再占去整个历史研究所 2~3 年的时间。这样的工作将导致重新考虑历史研究所的整个工作计划，特别是将不得不放弃创作教科书的工作。

我觉得，最好的解决办法似乎是尽快地完成六卷本《莫斯科史》的出版工作。在创作《苏维埃时期莫斯科史》这一卷的问题上，莫斯科市委所属的党史研究所可以给历史所切实的帮助。莫斯科市委书记米哈伊洛夫同志对我说，他将给所长科斯托马罗夫同志

下达这样的指示。把科学院历史所的工作人员和党史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联合起来，我们就能在1954年完成《莫斯科史》第六卷的写作任务。

恳请您在这个问题上支持历史研究所领导班子，因为已经产生的信心不足的心态会妨碍历史研究所的全部工作。

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历史研究所领导曾于1952年向高教部提出建议，建议为高等院校编写一个系列的历史教科书。今年6月，斯托列托夫同志那里曾决定同意历史研究所的建议。我们应于今年完成中世纪史教科书第二部，而1954年要重写近代史教科书第2卷（1789~1870年），苏联史教科书第1卷（从古代至1860年），苏联史教科书第二卷（1917~1934年）。此外，还将进行撰写苏联社会史第二部和现代史的工作（1918~1953年）。在撰写苏联社会史和现代史教科书时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恳请您和中央委员会审阅有关教科书编撰计划以及写作班子和编委会组成等方面的问题，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关于10卷本《世界史》问题。最近两年，1954~1955年，历史研究所应完成《世界史》的撰写任务。1954年，历史研究所将要出版不少于5卷的作品交付出版社。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科学院出版社如何完成《世界史》的印刷任务，印数应当是多少？现在已很明显，出版社没有能力迅速完成一系列大部头著作的印刷任务。关于《莫斯科史》的出版，出版社一年只能出两卷，而《苏联史概要》一年只能出1~2卷。科学院出版社刊印的图书印数都不大，因此这些书都很贵。似应实际解决这部由科学院一系列研究所参加创作的集体著作的印刷准备工作问题。必须解决地图问题并实际动手筹备这些地图。应当催促科学院的一系列研究所，例如东方学研究所和斯拉夫学研究所，以便让它们如期完成全部工作并提交高思想水平的作品。

苏共中央书记处对历史研究所的关注

---

我只谈了一系列最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您作出权威决定并给予帮助。此外，我在历史所工作的一年中，对研究所和科学院其他研究历史的单位的结构有了一系列的看法，我想和您谈谈这些看法并得到您的指示。

考虑到上述情况，我恳请您找个机会同我进行一次个别谈话。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代理所长 A.И. 西多罗夫

№01577

## 赫鲁斯托夫等关于历史所的问题

### 致波斯佩洛夫的报告

(1953年7月29日)

苏共中央书记 И.И. 波斯佩洛夫同志：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代理所长西多罗夫同志在写给您的信中请求您接见他，以便进行谈话，并请求帮助解决下列问题：派苏共中央科学与文化部指导员加波年科同志去历史研究所任副所长职务，物色苏维埃时期苏联史研究室主任一职的人选，准许出版发行历史研究所编撰的六卷本《莫斯科史》而不再进行压缩，审核历史教科书编撰计划及其写作班子和编辑人员的组成问题，向东方学研究所和斯拉夫学研究所施加影响，使其如期为多卷本世界史提供材料。

今年7月，西多罗夫同志曾被召到科学与文化部就上述问题进行谈话，托普奇耶夫同志和潘克拉托娃同志也参加了谈话。

应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历史和哲学部以及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领导的要求，科学与文化部向苏共中央提出了关于派遣加波年科同志去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和允许历史研究所出版六卷本《莫斯科史》的建议。

关于历史教科书编撰计划以及作者和编辑班子的组成问题，今年7月曾在苏联文化部部务会议上研究过，在此之前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也曾研究过。文化部和科学院主席团都批准了莫斯科大学校长和历史研究所领导提出的关于历史教科书的写作期限和写作班子的

建议。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总学术秘书托普奇耶夫同志通知说，科学院主席团将在写作《世界史》多卷本以及在遴选历史研究所苏维埃时期苏联史研究室主任和其他领导成员等问题上给予历史研究所领导以必要的帮助。

我们认为，对西多罗夫同志来信的处理可以到此结束了。

Ф. 赫鲁斯托夫<sup>①</sup>

И. 赫利亚比奇<sup>②</sup>

A. 利霍拉特

---

① Ф. Д. 赫鲁斯托夫，苏共中央科学与文化部副部长。

② И. А. 赫利亚比奇，苏共中央科学与文化部局长。

## 【专题说明】

# 《历史档案》杂志的命运

(1953年10月至1962年11月)

《历史档案》杂志是专门刊登苏联和苏共历史档案文件的专业历史学刊物，创办于1955年。1962年12月，苏共中央书记处下令停止出版该杂志。杂志的创办以及杂志存在期间的全部工作，包括拟发表文件的准备、刊登，都受到苏共中央有关部门的密切关注。而刊物在1962年底被关闭，虽然看起来有些突然，但实际上与政治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1992年，在停刊30年之后，《历史档案》杂志重新出版。本专题收录的文件反映了出版该杂志的申请和审批程序、编委会人员组成的确定、党的机关对杂志工作的监督和干预，以及苏斯洛夫等中央书记对这一学术刊物的编辑出版事务的直接控制。《历史档案》存在的这段时间是“解冻”的时期，因此，杂志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个时期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特点。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李禄、高增训翻译)

№01582

## 克鲁格洛夫关于创办《苏联档案》杂志 给波斯佩洛夫的报告

(1953年10月28日)

苏共中央书记 И. И. 波斯佩洛夫同志：

1941年，由于开始了伟大卫国战争，1922年和1923年创刊的刊物《红色档案》和《档案工作》停止出版了。

《红色档案》是苏联唯一的一份刊登历史档案文件的杂志，很受苏联学者、党和苏维埃活动分子的欢迎。《档案工作》杂志发表了如何确保文件文献资料的完整无损以及科学地实际利用苏联国家档案馆的文件问题方面的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文章和学术著作。

现在我们感到，在报刊上系统地阐述所有这些问题是极端必要的。

为此目的，苏联内务部认为，以《苏联档案》的名称恢复出版唯一用于发表苏联社会史、俄国革命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史、俄国军事史方面的文件，关于俄罗斯学者和发明家在科学技术各个领域的优先权、关于俄罗斯文化艺术进步作用的文件和其他历史文件，以及档案管理问题方面的材料的杂志是适宜的。

发表有关上述各种问题的文件，将使苏联研究工作者、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能够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更广泛地利用历史资料，并且对苏联科学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有助于揭露形形色色的歪曲历史事实的资产阶级伪造历史者。同时，这将有可能改善保存和利用文件资料的组织工作。

科学界舆论在各种大会、讨论会和报刊上都曾反复强调过出版这样一种杂志的必要性。出版上述杂志对于在人民民主国家推广苏联档案事业的经验也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苏联内务部认为，《苏联档案》杂志的出版工作应由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各种历史问题方面的科学思想中心——直接负责，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和苏联内务部中央档案管理局<sup>①</sup>参与。

据此，苏联内务部请求苏共中央：

准许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和苏联内务部中央档案管理局的参与下出版《苏联档案》杂志，以发表有关苏维埃国家史、俄罗斯革命运动史、俄国军事史以及有关祖国科学技术优先权的文件和其他文献史料。

应准许在《苏联档案》杂志上发表关于苏联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于工作经验交流的文章和官方文件、对文件汇编的评论、苏联档案机关和国家档案馆公布的目录和一览表以及国外出版的文件。

用杂志三分之二的篇幅刊登文件，三分之一的篇幅用于发表关于苏联档案事业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材料。

苏联内务部长 C. 克鲁格洛夫

<sup>①</sup> 正确的说法应为“管理总局”。

№01583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  
关于出版《历史档案》的决议（摘录）  
（1953年12月11日）

苏共中央

科学部

И. А. 赫利亚比奇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决定：

21. 向领导机关申请恢复出版杂志《历史档案》，与苏联内务部档案管理总局联合出版此杂志，以便保证定期地刊登苏联历史方面的历史文件。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主席、院士 A. H. 涅斯梅亚诺夫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总学术秘书、院士 A. B. 托普奇耶夫

**No01584**

**克鲁日科夫和鲁缙采夫给波斯佩洛夫的报告**

(1953年12月15日)

苏共中央书记 П. Н. 波斯佩洛夫同志：

苏联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同志在给您的信中请求苏共中央允许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和苏联内务部档案管理总局的参与下出版杂志《苏联档案》以便系统地发表苏联社会史、俄国革命运动史、俄国军事史方面的文件以及其他文件资料。

曾于1922~1942年出版的杂志《红色档案》在发展苏维埃史学和揭露资产阶级伪造历史者的事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伟大卫国战争之前，《档案工作》杂志也一直存在，杂志阐明了档案事业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近些年来，发表档案文件、尤其是苏联社会史方面的历史文件的工作实际上停止了，这种情况给苏联历史科学的发展带来了毋庸置疑的损失。

由苏联内务部档案管理总局和科学院联合出版的专题文件汇编，出版次数极其稀少，不能代替专门的杂志。编纂和出版专题汇编需要大量的时间，并且要吸引研究这个狭窄问题的著名专家来参加这项工作。即便如此，也并非总能够完成。况且，实践证明，通常都是根据多少已有些研究的问题来出专题文件汇编，在研究这些问题方面已经有了一些专家（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在专业上熟练地筹备出版这类汇编）。近几年来，苏联内务部档案管理总局和科学院出版了一系列关于苏沃洛夫、库图佐夫的统帅活动和阐述与封建时

期苏联历史有关的其他一些问题的专集。在苏维埃时期的苏联史方面，近10年来只出了一本文件汇编《苏联教育》（1949年出版）。

近几年来，科研工作者和高等院校教师不断地向苏共中央提出请求，希望恢复发表档案文件的做法。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于今年3月20日作出决定，请求苏共中央准许恢复出版《历史档案》杂志，以期确保定期发表苏联历史方面的文件。

苏联科学院能够保证与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联合出版《苏联档案》杂志并为此给杂志编辑部拨出相应的纸张和必需的工作人员。

《苏联档案》杂志的发行量不会低于15000份，20~25个印张，每年出六期，因而不会给出版社造成亏损。

我们认为可以支持苏联内务部和苏联科学院关于出版《苏联档案》杂志的建议。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院长奥比奇金也同意这一建议。

似应责成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会同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和苏联内务部档案管理总局在一周时间内就《苏联档案》杂志编辑委员会人选、印数、篇幅、周期和编制等问题提出建议并报苏共中央。

请您指示<sup>①</sup>。

A. 普缅采夫<sup>②</sup>

B. 克鲁日科夫<sup>③</sup>

① 苏共中央总务部工作人员在文件上注明：“归档。已责成拟定关于出版《历史档案》杂志的建议。1954年11月3日。A. 索洛维约夫”。

② A.M. 普缅采夫，时任苏共中央经济与史学部主任。

③ B.C. 克鲁日科夫，时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

№04043

## 苏联内务部中央档案管理局等部门 关于创办《历史档案》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4年2月29日)

苏共中央书记 П.И. 波斯佩洛夫同志：

苏联内务部中央档案管理局、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和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请求苏共中央批准出版《历史档案》杂志。

在1941年前，苏联曾出版过两种杂志：《红色档案》和《档案工作》，这些杂志发表的材料有：历史资料、有关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理论及研究方法的文章。1941年，在伟大卫国战争时，这些杂志被关闭。

现在感到很有必要创办《历史档案》杂志，打算在这个杂志上发表苏联社会历史方面的文件，有关苏联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领导作用的文件，俄国工农运动史、俄国军事史、有关俄国学者和发明家在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里的优先地位以及俄国文化艺术的进步作用等方面的文件。

除了刊登文献资料外，《历史档案》杂志还打算发表有关苏联档案管理的文章。科学教学指导、文件汇编评论、苏联以及在国外出版的档案资源的目录及概述。

苏联内务部中央档案管理局、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认为，《历史档案》杂志的出版应由三个组织提供保障，但是杂志将是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

正式机关刊物，将由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印刷。

杂志将每年定期出6期，每期15印张，印数15000份，每份15卢布为宜。

根据苏联科学院出版社所作的初步预算，《历史档案》杂志的出版每年可盈利132250卢布（预算附后）。

我们请求批准由下列人员组成的《历史档案》杂志编委员会：

主编——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M. B. 涅奇金娜；

副主编——苏联中央国家历史档案馆馆长 B. Ф. 舍甫琴柯上校；

杂志责任书记——苏联内务部中央档案管理局科学出版处副处长安东尼娜·伊万诺芙娜·洛吉诺娃；

编辑委员会成员：

1. Б. И. 穆萨托夫——苏联内务部中央档案管理局局长；

2. И. С. 纳辛——苏联内务部中央档案管理局负责科学研究工作的副局长；

3. Н. Р. 普罗科宾科——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央国家档案馆馆长；

4. В. В. 马克萨科夫——苏联档案工作组织教研室主任、历史档案研究所教授；

5. К. П. 阿布罗先科——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档案室主任、副所长、历史学副博士；

6. Т. В. 谢佩列娃——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档案室副主任；

7. В. Т. 罗加京——苏联内务部中央档案管理局副局长；

8. М. Н. 季霍米罗夫——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秘书、院士；

9. А. Л. 西多罗夫——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代理所长、历史学博士；

10. A.A. 诺沃谢利斯基——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料发表部主任、历史学博士；

11. P.H. 莫尔德文诺夫——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社会主义时期苏联史部副主任、历史学副博士；

12. И.Н. 泽姆斯科夫——苏联外交部档案管理局副局长、历史学副博士；

我们请求批准的还有杂志编辑部的机构及编制（方案附后<sup>①</sup>）。

苏联内务部中央档案管理局副局长   Б. 穆萨托夫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代所长   А. 西多罗夫

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院长   Г. 奥比奇金

---

<sup>①</sup> 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

No 04044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关于同意出版  
《历史档案》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4年4月26日)

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 B.C. 克鲁日科夫同志：

苏联科学院支持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苏联档案总局和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关于在苏联科学院系统出版专门发表历史文件的史学刊物《历史档案》（其篇幅为15印张、每年6期）的报告。

我们建议批准历史学博士、莫斯科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基础图书馆馆长 B.И. 顺科夫兼任该杂志的责任主编。

科学院将为该杂志在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的印刷以及编辑委员会的用房提供保障。

苏联科学院副院长、院士 K.B. 奥斯特罗维佳诺夫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代理总学术秘书、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H.M. 西萨基扬

**№04045**

**苏共中央科学与文化部和宣传鼓动部  
关于出版《历史档案》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4年4月30日)

苏共中央：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奥斯特罗维佳诺夫同志和西萨基扬同志）请求批准出版《历史档案》杂志，每年定期出版6期，每期15印张。

在1941以前，为了发表档案文件和材料，苏联曾出版过两种杂志：《红色档案》和《档案工作》。目前没有关于这方面问题的杂志出版。没有用于系统发表共产党历史、苏维埃国家的历史和苏联科学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文件的杂志给苏联的文献资料工作造成了困难。

《历史档案》杂志所需文件和材料将由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内务部中央档案管理局和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准备。除了文件外，杂志还将刊登一些有关苏联档案管理和档案资料概述的文章。

我们支持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的请求。我们认为规定《历史档案》杂志每年定期出版6期、每期15印张、发行1万份是比较适宜的。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请求批准B.И. 顺科夫同志担任《历史档案》杂志的主编。

维克托·伊万诺维奇·顺科夫同志1900年生，俄罗斯人，1942

年起为苏共党员，历史学副博士，具有学术和编辑工作经验。1949年起担任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基础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党组织对顺科夫同志评价很好。

苏共中央科学文化部曾召见顺科夫同志，他同意担任《历史档案》杂志的主编。

今年年底前为出版《历史档案》杂志需要7吨印刷纸，苏联科学院出版社有这种纸张。

苏共中央决定的草案附后。<sup>①</sup>

苏共中央科学与文化部部长 A.P. 普缅采夫

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 B. 克鲁日科夫

---

<sup>①</sup> 见本专题No04046文件。

№04046

**苏共中央书记处  
关于出版《历史档案》杂志的决定**  
(1954年5月15日)

绝密

接受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的建议：

(1) 《历史档案》杂志每年定期出版6期，每期15印张，每期发行1万份，纸张的来源由苏联科学院出版社负责；

(2) 批准B.И. 顺科夫同志为《历史档案》杂志的主编。

No 04047

谢佩列娃  
关于“库班游击队运动”文献专辑  
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7年7月9日)

苏共中央科学、高校和中小学部：

1956年春天，《历史档案》杂志编辑部收到了“库班的游击队运动”文献专辑，是由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委会党务档案室主任库岑科同志和科学研究员拉特金同志选编的。

寄给我审阅的这个专辑客观地证明了游击队与残酷迫害被占地区苏联人民的法西斯占领者之间在库班展开的那场激烈斗争。

从占领者对和平居民和对游击队所使用的野兽般斗争手段的角度来看，我没有特别指出第23号和第31号文件中所列举的事实不适合发表。我知道，我在这方面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因为我当时没考虑到在反苏宣传中可能会利用这些事实。整个文献资料专辑是经我仔细审阅过的。撤掉了一些文件，因为从斯大林个人崇拜以及说明党组织地下工作等等的观点来看，它们的发表会引起疑虑。至于其他一些文件，我都作了肯定的评价。

此外，“库班的游击队运动”这个文献资料专辑曾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地方党务档案部由P.A.拉夫罗夫同志（部主任和中央党务档案馆副馆长）和H.M.米罗诺娃同志（高级研究员）审阅过，他们对专辑的评价很好。

C.M.克利亚茨金同志（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部研究员）和

B. B. 马克萨科夫同志（编辑委员会成员）也对文件作了肯定的评价。

我信赖这些同志对呈送发表的材料所作肯定的评价，在连续多日患病后于1957年1月返回工作岗位后，未能抽出时间再一次仔细地读完《历史档案》第3期发表的所有文件资料。

上述事实证明，我同编辑委员会成员一起，应该对《历史档案》第3期发表有关库班的游击队运动的文件方面所犯的错误负责。

T. 谢佩列娃

No 04048

苏共中央科学、高校和中小学部  
关于“库班游击队运动”文献专辑  
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7年7月23日)

苏共中央：

《历史档案》杂志1957年第3期在关于1942~1943年库班游击队运动的文件专辑中公布资料可能会被资产阶级的报刊用来诽谤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游击队运动。一份游击队队长的报告说：“……他们（游击队小组）炸毁了敌人的载有伤员和有生力量的列车”（见第31页）。另一份报告说：“用爆炸的方法炸毁了走在机车前面的4节车厢，其中有一节是装甲车厢。机车和载有伤员和警备队的23节车厢被颠覆”（见第33页）。在阿普谢隆斯克区党委书记向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员会所作的关于游击队1942年8月至1943年1月战斗行动的书面报告中指出：“12月份，在迈科普—阿普谢隆斯克公路上，行驶的车队中有两辆载重量7吨的汽车被击毁，车上73名德国士兵和军官被击毙。汽车连同车上挤得满满的死尸及伤兵均被烧掉。只有两个士兵跑掉……1943年1月，窄轨铁路的一列火车被炸毁，炸死14人，有7人在逃跑时被打死，有6名伤兵被打死，另外还俘虏一名列兵和一名上等兵”（见第41页）。

刊登这些消息的本期杂志共出版发行4400份，有636份寄到国外，其中有67份寄到资本主义国家（其中的13份寄到西德，14

份寄到美国)。

发表上述消息是编辑部的一个愚蠢的错误。杂志编辑委员会成员 T. B. 谢佩列娃同志(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党务档案馆副主任)以及杂志主编 B. И. 顺科夫同志在准备这批材料过程中表现出不负责任的态度。谢佩列娃同志在没有注意到上述事实的情况下就作出了肯定的结论。

我们认为必须:(1)因在准备刊印这些文件过程中表现轻率而给予杂志主编 B. И. 顺利夫同志、副主编 H. A. 伊夫尼茨基同志和编委会成员谢佩列娃同志警告处分;(2)将《历史档案》杂志的错误通报各科学和社会政治杂志的全体编辑人员。

应采取措施停止公开出售《历史档案》杂志第3期。

苏共中央科学、高校和中小学部副部长 П. 库金  
处长 К. 库兹涅佐娃

No04049

苏共中央书记处  
关于《历史档案》杂志的决定  
(1957年8月2日)

《历史档案》杂志主编 B.И. 顺科夫同志、副主编 H.A. 伊夫尼茨基同志和编委会成员 T.B. 谢佩列娃同志在《历史档案》杂志1957年第3期发表有关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游击队运动的材料问题上表现出不负责任的态度，给予他们警告处分。

№04050

## 《历史档案》杂志关于发表列宁的 新材料致苏共中央的信

(不晚于1958年11月4日)

苏共中央书记 E. A. 福尔采娃同志：

为纪念1919年10—11月英勇保卫彼得格勒和最后粉碎尤邓尼奇40周年，《历史档案》杂志编辑部打算发表一些新找到的材料。这批说明弗·伊·列宁直接领导保卫城市的作用的材料的基础是弗·伊·列宁的4封电报，它们过去曾部分发表过，但没有全文发表。

编辑部请您批准全文发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提供的文件——列宁的这4封电报。

文件附后。<sup>①</sup>

主编 B. 顺科夫

---

① 这里指的是列宁于1919年10月17、20、23(24)日和11月1日从莫斯科给在彼得格勒的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发去的电报。

№04051

苏共中央对加盟共和国宣传鼓动部  
关于发表列宁的新材料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8年11月4日)

苏共中央

为纪念1919年10~11月彼得格勒英勇防御40周年,《历史档案》杂志编辑部请求苏共中央批准发表弗·伊·列宁的文件——关于彼得格勒防御的4封电报。根据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得到的证明,所有这些文件,除第1个文件外,都曾全文公布过。第1个文件也曾于1941年公布过,但只是一部分(前两条)。

苏共中央对加盟共和国宣传鼓动部和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认为,可以批准《历史档案》杂志编辑部全文发表第1个文件。至于其他几个文件,由于都已公布过,不需苏共中央的批准。<sup>①</sup>

我们请求你们同意。

苏共中央对加盟共和国宣传鼓动部部长   И. 伊利切夫  
苏共中央对加盟共和国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B.C. 尼斯京

<sup>①</sup> 苏共中央书记 M. A. 苏斯洛夫在此处作了如下批示:“我认为是不合适的。M. 苏斯洛夫。”

№04052

苏共中央意识形态、  
文化和国际政党联络事务委员会  
关于发表列宁的新材料的决定

(1958年11月19日)

绝密

《历史档案》杂志编辑部请求批准发表弗·伊·列宁关于1919年10~11月彼得格勒防御的电报(10月17日第124号、10月20日第130号、10月23日第134号和11月1日第147号电报)。

发表上述电报是不合适的。<sup>①</sup>

---

① 在这一文件上有如下文字：“苏斯洛夫、库西宁、波斯别洛夫、福尔采娃——赞成”。

№04053

苏共中央科学、高校和中小学部  
关于更换《历史档案》主编  
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0年5月11日)

苏共中央：

苏联科学院请求苏共中央批准 Д. А. 丘加耶夫为《历史档案》杂志主编；由于 В. И. 顺科夫已被选为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副学术秘书，根据他个人的请求而解除他担任的该杂志主编职务。

Д. А. 丘加耶夫，1899年出生，科米族人，1918年起为苏共党员，1937年毕业于苏共中央红色教授学院。在苏军服役后（1941～1946年）又毕业于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训练班，1948年答辩了副博士论文。1951～1955年，丘加耶夫同志担任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主编，自1955年起作为高级研究员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自1956年起任苏联社会史文献资料部主任。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行政和党组织对丘加耶夫同志的评价是：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具有编辑工作的经验。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В. М. 赫沃斯托夫同志通知说，在批准丘加耶夫同志为该杂志主编后，他将被免去苏联社会史文献资料部主任的职务。

苏共中央科学、高校和中小学部认为可以同意苏联科学院关于免去 В. И. 顺科夫同志《历史档案》杂志主编的职务和批准 Д. А. 丘加耶夫担任这一职务的建议。

这一问题已同苏共中央对加盟共和国宣传鼓动部协商。  
决定草案附后。<sup>①</sup>

苏共中央科学、高校和中小学部副部长 Д. 库金  
处长 К. 库兹涅佐娃

---

<sup>①</sup> 参见本专题№04054文件。

№04054

苏共中央书记处  
关于更换《历史档案》主编的决定  
(1960年5月17日)

绝密

通过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的建议：

(1) 根据个人请求，免去 B.И. 顺科夫同志《历史档案》杂志主编的职务；

(2) 批准 И.А. 丘加耶夫同志为《历史档案》杂志主编。

№04055

**苏共中央意识形态、  
文化和国际政党联络事务委员会  
关于审查亏损的历史杂志的决定**

(1961年1月4日)

绝密

委托伊利切夫同志、基里林同志、奥斯特罗维佳诺夫同志和卡兹明同志审理那些发行量不大且又亏损的历史杂志问题，对其中某些杂志要合并或停止出版。请于今年1月20日前呈报自己的建议。

No 04056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  
关于减少苏联科学院各历史杂志的  
亏损问题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1年3月3日)

苏共中央：

为了减少各历史杂志的亏损，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认为必须首先重新考虑杂志的选题，使之更现实，更吸引人，更多地提出有争论的问题，提高文章的理论水平。

此外，采取一系列措施减少开支。

在1960年，苏联科学院各历史杂志亏损17.19万卢布，两个东方学杂志亏损13.66万卢布。总共亏损30.85万卢布。

通过减少编辑部机关工作人员和领工资的编委会成员数量，减少作者稿酬和评论开支25%，那么各种历史杂志即可节约6.46万卢布，而东方学杂志则可节约2.94万卢布（参见说明材料2<sup>①</sup>）。

这样，亏损额减少9.4万卢布，即总亏损额只有20.34万卢布。但是应当考虑到，这种亏损从整个国家的大局来看是有条件的，因为我们的杂志通过国际书店和苏联报刊发行总局并按照图书交换程序出口国外将使国家创收21.74万卢布（参见说明材料1<sup>②</sup>）。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认为，关闭或者合并一些历史杂志是不合适

① 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材料。

② 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材料。

的，理由如下：

在历史科学领域，世界各国都走明显的专业化的路子。近代和现代历史学家绝不会订阅考古学或古代史杂志，反之也一样。我们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和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我们这里每一个专业的杂志不超过一种。关闭它们之中的某种杂志只能使我们庞大的学者、高校和中小学教师队伍失去系统的材料、学术文章和科学专业的信息，增加某些历史领域的科学讨论和发展的困难。

而且，这也会给我们在国外的意识形态斗争、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工作的宣传、我们同敌对的意识形态和歪曲历史的现象的斗争带来极大的危害。

国际会议的经验 and 日常工作说明，在历史科学的所有时期和问题上都有尖锐的斗争。即便是从下面的情况看，我们的杂志对此也显然是有帮助的：《苏联民族志》杂志发行量的一大半、《古代史通报》杂志的44%，3300份《历史问题》、1000多份《近现代史》是销往国外的。杂志的文章系统地被翻译成法文、德文、英文和其他语言并刊印（我方未花一分钱）。《近现代史》杂志中关于拉丁美洲的所有文章都被拉丁美洲国家用西班牙文发表。进步出版社已把各种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拉丁美洲的文章汇编成集。现在正就用西班牙文系统出版这份杂志的问题进行谈判（我们仍然是不花一分钱）。这将意味着我们的思想不仅要推向拉丁美洲的20个国家，而且还要推向我国文化几乎还未传到的西班牙和葡萄牙。

关闭某些专业性很强的历史杂志只能意味着对历史科学整个部门的宣传及意识形态斗争的打击。

苏联科学院副院长、院士 K. 奥斯特罗维佳诺夫

No04057

##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历史类杂志的决定

(1961年5月16日)

绝密

(苏斯洛夫、叶留金、基里林、穆希金诺夫同志)<sup>①</sup>

1. 为了消除某些历史杂志上的选题重复现象和减少出版这些杂志的费用，现决定自1962年1月起停止出版《历史科学》杂志、《历史档案》杂志和《世界文化史通报》杂志，同时决定这些杂志的选题将被列入继续出版的杂志的选题计划。

确定《历史问题》杂志为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和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的机关刊物。

2. 委托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和苏联文化部图书出版管理总局整顿各高等学校及科学研究所出版的有关历史问题的学术著作、报告、札记和述评，以便改善其思想内容并提高其教育意义。

3. 批准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的报告，由他们采取措施削减各种历史杂志的开支9.407万卢布，其中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削减30014卢布，编委会成员的工资削减8726卢布，作者稿酬削减52916卢布，书评费削减2413卢布（按新价计算）。

<sup>①</sup> 本文件上写有如下文字：“苏斯洛夫同志——赞成”。

№04058

## 斯塔索娃关于保留《历史档案》 致苏斯洛夫的信

(1961年7月1日)

亲爱的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

经人介绍我读了最近两期的《历史档案》杂志，我完全支持M.И. 古别利曼同志和P.П. 卡塔尼扬同志关于保留这一作为专业机关刊物的杂志，它是完全用于发表有关我们党和国家历史的文件及回忆录的。

我之所以给您寄去该杂志的第2和第3期，是希望您，亲爱的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能确信这个请求是有根据的，并请您采取措施保留杂志。

我认为您有必要注意的是，杂志的目录有英文译文。问题在于该杂志要寄到国外150份，尽管不算多。我认为在研究要不要继续出版这个杂志的时候应该记住这一点。把杂志寄往国外当然有宣传作用并能使各兄弟党改善自己的工作。

紧握您的手！

您的 叶连娜·斯塔索娃

注：附上卡塔尼扬同志和古别利曼同志给我的信。<sup>①</sup>

<sup>①</sup> 收集的档案中无此附件。

№04059

## 萨莫鲁科夫关于保留《历史档案》

### 致苏斯洛夫的信

(1961年7月6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M. A. 苏斯洛夫同志：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今年6月4日发出第49-836号指示，自1962年1月1日起停止出版《历史档案》杂志。关闭该杂志的理由是为了“消除选题的重复”和“减少开支”。

然而《历史档案》是国内惟一的专门用于发表苏联历史文件的杂志，就其专业性而言，它不会重复任何一种现有的历史杂志。

这本杂志的存在不是偶然的，而是基于国家的重要考虑和科学的利益。早在1922年，即在我们的国家经受最大的财政经济困难的年代，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创办了《红色档案》杂志，并在这个杂志上公布了许多有关苏共历史、革命运动史、俄罗斯内外政策史方面的最珍贵文件。《红色档案》发表的材料至今仍保持着它的科学和政治意义。这些材料在国际上也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揭露帝国主义国家的秘密外交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只是由于战争，《红色档案》于1941年停止出版。考虑到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宣传历史知识的重要政治意义，以及为了创造应有的条件以便富有成效地发展苏联的历史科学，苏共中央于1954年通过决议，创办了《历史档案》杂志，从而恢复了这本曾经增强了苏联科学威望的重要历史杂志的活动。

这本新杂志在其存在的7年间发表了大量极其重要的材料，其

中包括有关弗·伊·列宁的活动、苏共党史、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史、伟大卫国战争史等方面的文件。现在，这些材料对于任何一个研究人员来说都是绝对不能没有的。

不仅专业学术出版物，就连我国的报纸如《真理报》、《共青团真理报》、《经济报》等也都使用该杂志发表的材料。

该杂志发表的许多材料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中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得到了翻译和详细介绍，从而大大提高了我国科学在国外的威信。这些材料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得到了肯定的评价，被认为是对各国人民和平合作、反对战争贩子的斗争事业的宝贵贡献。例如，牛津大学的一些出版物对《历史档案》发表的有关俄国与印度文化联系的材料作了高度评价。

现在，约有40来个国家的科学工作者和机关订阅《历史档案》杂志。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感到停止出版该杂志是不正确的。我们认为，节约纸张的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比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考虑更为重要。我们认为还应该注意到下述情况，即世界各大国都有一些用于发表历史文件的专业杂志。停止出版这种我国惟一的历史专业杂志会被外国的反苏宣传所利用。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组织请求苏共中央重新审议就此问题已通过的决议。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 H.И. 萨莫鲁科夫

No04060

## 赫沃斯托夫等关于保留《历史档案》

### 致苏斯洛夫的信

(1961年7月6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M. A. 苏斯洛夫同志：

自1922年起，我国曾出版专门用于发表文件的历史杂志——《红色档案》。尽管当时还出版一些历史杂志，如《无产阶级革命》、《红色年鉴》、《苦役与流放》、《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等，并都发表文件，但是《红色档案》得到了世界的承认，其存在时间超过了所有这些杂志。它所发表的材料至今有用，不仅在苏联，甚至在美国都出版了该杂志发表的材料简介索引，可见人们对它们的兴趣之大。《红色档案》的印数不超过2000份。

只是战时形势才停止出版该杂志（它于1941年被关闭）。

1954年苏共中央的决议满足了对于恢复出版这类专业杂志的迫切需要。正是根据这个决议，开始出版《历史档案》杂志。目前它的印数是3450份。

新杂志在其存在的7年间发表了大量重要的材料，任何一个研究人员没有这些材料都是不行的，其中包括有关弗·伊·列宁的活动、苏共党史、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史、伟大卫国战争史等方面的文件。

不仅专业学术出版物，就连我国的报纸如《真理报》、《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经济报》等都使用该杂志发表的材料。

该杂志发表的许多材料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保加

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中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得到了翻译和详细介绍，从而大大提高了我国科学在国外的威信。这些材料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得到了肯定的评价；被认为是对各国人民和平合作、反对战争贩子的斗争事业的宝贵贡献。例如，牛津大学的一些出版物对《历史档案》发表的有关俄国与印度文化联系的材料作了高度评价。

尽管《历史档案》杂志的价格较高，但现在约有40个国家的科学工作者和机构订阅《历史档案》杂志，这样每年收入达6000金卢布（按新价格）。

众所周知，所有大国都有不是一种、而是几种发表历史文件的杂志。《历史档案》被认为是这类科学出版物中最好的一种，反映美国最公正的历史学家和档案专家观点的《美国档案》杂志也不得不这样评论。

我们请求苏共中央保留这一宝贵的定期出版物，因为它是任何其他出版物所不能替代的。

为了节约经费，我们建议削减开支，就像那些尚未停止出版的杂志所作的那样。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B. 赫沃斯托夫

苏联部长会议所属档案总局局长 Г. 别洛夫

苏共中央所属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副院长

H. 马特科夫斯基

№04061

## 苏共中央科学、高校和中小学部 关于继续出版《历史档案》的报告

(1961年12月28日)

苏共中央：

为了消除某些历史杂志的选题重复并削减其出版开支，苏共中央1961年5月16日第Ст183/6~с号决定自1962年1月起停止出版《历史科学》、《世界文化史通报》和《历史档案》杂志。

在作出上述决议后，苏共中央收到了许多请求保留《历史档案》杂志的信件，来信的有：E.Д. 斯塔索娃、M.И. 古别利曼和P.П. 卡塔尼扬同志，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B.M. 赫沃斯托夫同志，苏联部长会议档案总局局长Г.А. 别洛夫同志，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副院长H.B. 马特科夫斯基同志，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H.И. 萨莫鲁科夫同志。关于其他杂志，苏共中央尚未收到这样的来信。

此外，由于决定关闭了不仅用于发表文件，而且也是国内惟一的有关档案管理问题的学术杂志的《历史档案》杂志，苏联部长会议档案总局（别洛夫同志）向苏共中央请求批准出版一个新的、专门谈档案管理问题的杂志。

《历史档案》杂志是根据苏共中央的决议自1955年起出版的。它的前身《红色档案》杂志曾自1922年至1941年出版。只是由于战时状况，杂志才停止出版。

参与出版《历史档案》的除了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以外，还

有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和苏联部长会议档案总局。杂志每年定期出6期，1960年的印数为3000份，1961年是3425份。

《历史档案》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25个资本主义国家发征订单。1960年向国外发行650份，1961年是728份。

杂志继承了《红色档案》的好传统，发表了与弗·伊·列宁的活动、1905~1907年的革命和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有关的文件。杂志主要刊登党史方面的文件。

此外，杂志的使命是通过发表关于档案管理和公文处理问题的文章来改善档案工作和公文处理工作。

1960年，杂志得到出版费补贴19815卢布（按新价格）。1961年编辑部计划通过适当增加发行量、减少作者稿酬和对外介绍的开支而使杂志的亏损下降到约1.5万卢布。

注意到《历史档案》杂志的科学和政治意义，注意到它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外国都是众所周知的通俗性以及它是惟一的一个专门用于发表历史党务文件的杂志这一情况，苏共中央科学、高校和中小学部认为，支持斯塔索娃同志、古别利曼同志和卡塔尼扬同志以及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部长会议档案总局和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关于继续出版《历史档案》杂志的请求是适宜的。由于已提出保留《历史档案》的建议，我们认为，对于苏联部长会议档案总局关于创办一个新杂志的建议可以不予考虑。

苏共中央科学、高校和中小学部副部长 П. 库金

№04062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  
继续出版《历史档案》杂志的决定

(1962年1月4日)

绝密

拟部分修改苏共中央 1961 年 5 月 16 日“关于历史类杂志”的决定，认为可以继续出版《历史档案》杂志。

№04063

## 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 关于《历史档案》的错误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2年11月4日)

苏共中央：

《历史档案》杂志1962年第2期发表了此前鲜为人知的材料：“K.C.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B.И. 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的通信(1902~1917年)节选”和C.C. 波多利斯基写的前言。

发表这些材料和波多利斯基同志的文章是一个严重错误。波多利斯基同志挑选发表的信件突出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丹钦科之间本来并不太大的分歧。波多利斯基同志竭力使这些信件具有艺术思想对立的意义。他写道，正是艺术剧院“成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丹钦科之间所进行艺术思想内部斗争的舞台”。文章指出，在艺术剧院里，1917年十月革命前就有两个不同的剧团，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在发展舞台艺术方面的作用被降低了。波多利斯基同志指责伟大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保守，不理解创新探索。文章的作者违背事实，把梅耶尔霍利德称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艺术革新中的亲密战友，此人与涅米罗维奇—丹钦科不同，他当时在舞台艺术上坚持形式主义的原则。

发表“K.C.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B.И. 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的通信节选”这个材料，特别是C. 波多利斯基歪曲荣获列宁勋章和劳动红旗勋章的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历史的文章引起了苏联演艺界的强烈抗议。

我们认为，必须向《历史档案》杂志主编丘加耶夫同志指出他和编委会不负责任的态度。

决定草案附后。<sup>①</sup>

苏共中央对加盟共和国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阿·叶戈罗夫

处长 K. 博戈柳波夫

---

<sup>①</sup> 见本专题 No04064 文件。

**№04064**

**苏共中央书记处  
关于《历史档案》杂志的错误的决定（草案）**

（不晚于1962年11月4日）

绝密

1. 必须指出，《历史档案》杂志编委会发表了片面挑选的“K.C.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 B.H. 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的通信（1902—1917年）节选”和波多利斯基同志为这些材料写的歪曲莫斯科艺术剧院革命前历史的前言，因而犯了严重错误。

2. 必须向《历史档案》杂志主编 П.А. 丘加耶夫同志指出杂志编委会在选择发表材料时所表现出的不负责任的态度。

3. 责成《历史档案》杂志编委会采取措施改进杂志的内容，杜绝类似的错误。

No 04065

苏共中央书记处  
关于《历史档案》停刊的决定  
(1962年11月12日)

绝密

《历史档案》杂志自1963年1月起停止出版。

## 【专题说明】

# 图哈切夫斯基与 “法西斯军事阴谋案”

(1937年2月至1964年6月)

1937年春天，大清洗开始在苏联红军内部进行。在6月召开的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斯大林要求彻底粉碎军队中的阴谋，于是，全军范围内的清洗加快进行。所谓“反革命军事法西斯组织案”，就是当时军队大清洗的著名案件。通过这一审判，以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大批苏联高级将领受到牵连，并被处以死刑。苏联红军的指挥力量从此遭到严重的打击。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1893～1937），国内战争期间任集团军司令、方面军司令，1925～1928年间任红军参谋长，1931年起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起任副国防人民委员、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晋升为苏联元帅。

本专题选编的文件包括伏罗希洛夫在联共（布）1937年2～3月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和1964年苏共中央特别委员会对图哈切夫斯基案的复查报告。前一个文件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处于工农红军派别斗争中心的图哈切夫斯基难逃厄运；后一个文件则全面揭示了这一所谓“案件”炮制出笼的真相。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刘明翻译）

№04569

## 伏罗希洛夫在联共（布） 中央全会上的发言（速记记录）

（1937年2~3月）

绝密

会议主持人（安德烈耶夫）：现在由伏罗希洛夫<sup>①</sup>同志发言。

伏罗希洛夫：同志们！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的报告，以及叶若夫<sup>②</sup>同志昨天所作的十分明确的发言像探照灯一样揭示了我们的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并表明他们是多么深入地渗透到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国家机关的机体里。

敌人总是选择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最重要、最为敏感的部门，不择手段地破坏它们，颠覆国民经济体系，给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带来危害。遗憾的是，工业建设人民委员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轻工业人民委员部、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以及其他各人民委员部，所有这些部门显然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受到德—日间谍分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间谍和破坏分子的敌对活动的危害。

人民委员同志们以及各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在自己的发言中认真分析并揭露了敌人渗透进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核心之中的原因。所

① 伏罗希洛夫，克利缅特·叶弗列莫维奇（1881~1969），苏联元帅，1934~1940年期间担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

② 叶若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1895~1940），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干部部部长，1936年任内务人民委员，1938年11月被撤消内务人民委员，1939年被捕，1940年被枪决。

有的发言报告都保证今后将按另一种方式工作，以便不仅不让敌人渗入国民经济和国家机关最重要的部门，而且要坚决杜绝任何危害和干扰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

同志们，如果我们在这里对中央全会的承诺能够实现哪怕是百分之九十五，那也将是非常好的。我想，在我们真正实现这些承诺之前，已经会过去很多时间。温情、自高自大、总是安于既得的成就，就像斯大林同志常常对我们所说的那样，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的许多东西都像沉重的包袱一样压迫着我们。这一切遮住了我们的双眼，妨碍了我们认清自己周围的事情，认清作为一名领导人和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认清的一切。除了这些，还存在着其他一系列原因——这些原因有助于敌人渗入我们党的队伍里、有助于他们进行卑鄙的破坏活动——以及我将提到的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但却有着很大意义的问题。

所有人民委员部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定货者和定货的完成者。在完成定货的过程中，各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员之间的关系经常出现不可容忍的摩擦，甚至是直接的争吵。

这种情形对于敌人、破坏分子、危险分子和间谍来说都是最好的掩护，是他们的挡箭牌，对于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喊声：正确。

伏罗希洛夫：我不是空口无凭地这样说。帕夫卢诺夫斯基同志今天也出席了会议，他曾经负责为部队生产炮兵武器的工作。我同他在各个具体问题和重要问题上发生过很多争论。时至今日，我们之间仍然存在着多年来所产生的对于列宁格勒“布尔什维克”火炮厂所生产的8英寸重榴弹炮的争论。我们的接货人、工程师以及炮兵管理局其他工作人员的所有要求、所有对这种榴弹炮生产过程中的缺点以及没有完成定货合同中规定的条款和技术要求的指责，这一切都引起工厂的工作人员极端仇视。除此之外，他们还要证

明，恰恰是军方的接货人和炮兵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是导致榴弹炮生产进行得不好的原因，说他们提出新的要求，对系统进行修改等等。结果出现了政府不得不进行干预的情况。但是，事情被有意搞得很复杂，以至于弄清全部原因非常困难。

这里暴露了什么问题呢？这里暴露出：领导这项工作的总设计师，不仅是在“布尔什维克”工厂的炮兵武器生产工作方面进行大规模破坏活动的组织者，同时还是老牌的德国间谍。现在这位先生本人对此已经全部供认。他还宣称，如果保全他的性命，他可以改正所有的有害的文件，无论是关于重榴弹炮的，还是关于其他炮兵武器的。

看到了吧，同志们，我们当时是怎样同“布尔什维克”工厂的管理部门、同帕夫卢诺夫斯基同志争吵和摩擦的，以及间谍和破坏分子是怎样进行破坏活动的。这一点已经很明确了。对于危害分子、破坏分子和间谍来说，我们各个部门之间的摩擦和争斗是他们最好的挡箭牌。敌人非常巧妙地利用“局势”，观察领导人的脸色，对最敏感的环节进行阴险的攻击。

类似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

同志们，现在，当我们已经承诺按照另一种方式、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进行工作，那么我们就应该考虑到这个因素。今后，定货人向执行订购任务者提出的要求必须不是被看成令人不快的责难，而应被看成是在履行党和国家的赋予的责任。我们没有权利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党任命的岗位上实现着党的意志。因此，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仅应该是正常的工作关系，还必须是同志的、共产党员的关系。在这样的条件下，不会再出现部门之间的争斗。在这样的条件下，敌人就很难渗入不能允许渗入的地方。

喊声：正确。

伏罗希洛夫：我认为，在今后，这一点应该成为我们大家在确

立新的布尔什维克的、列宁—斯大林的工作方式和方法时所必须遵循的原则。这也是有力阻止敌人渗入我们的国民经济部门和国家机关的条件之一。

现在请允许我将话题转向军事部门。

在我登上这个讲台之前，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曾对我说：“我们要看看你是怎样批评自己的，这很有意思。”（大笑）我对他说，让我自己批评自己是很困难的，但这绝对不是因为我个人不喜欢进行自我批评，顺便说一句，特别热衷于进行自我批评的人在我们中间并不多见（笑声）。可以说，我不是特别热衷于这一点，但我是一名布尔什维克，是一名中央委员，我不应该害怕我们党的批评。

但是，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我的情况却有些特别。这是因为我代表军队，这多少有“某种”意义；此外还因为，目前在军队里，很幸运，还没有揭露出那么多的敌人。我所说的“幸运”，是希望军队中敌人少一些。

这样也是应该的，因为党把自己最优秀的干部派到部队；国家把自己最健康、最可靠的人材选送到部队。

军队中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揭露出来的敌人、日本—德国法西斯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匪帮的代表，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这绝大部分是一些高级指挥人员，是一些位居高级领导岗位的人。除了以上这一小批人以外，还在军事部门各个机构的高级和低级主管人员之中揭露了个别的人数不多的破坏分子小集团。自然，我并不是说军队里的一切状况都很好。不，完全不能排除，渗入军队的卑鄙敌人的数量比我们目前已知的多得多。

目前的工农红军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工业化组织，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军队拥有庞大的汽车和坦克工厂，有大量各种各样的机器。我们拥有强大的空军和装备了充足火炮的各个兵种。军队拥有人数众多的工程部队和化学部队。我就不说建立在技术装备基础上

的海军了。在各个兵种中，有各种各样的军事专家。自然，敌人不可能不想方设法钻进那里去进行捣乱和破坏活动。我再重复一遍，到目前为止，在工农红军中暂时只揭露了为数不多的一小股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人（稍后我再说总共有多少人）。

同志们！请不要见怪，我将对不久以前所发生的事情作一下简短的说明，以便更加明确：目前已经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红军队伍中的这些卑鄙叛徒是出自于哪个部门。

还在1920~1921年间，当托洛茨基公开向列宁、向我们党宣战时，他曾试图依靠军队的干部。当时，托洛茨基认为，在军队中他有牢固的阵地和足够数量的拥护者，可以同我们的党在军事艺术的所有原则问题上进行论战。托洛茨基打错了算盘，他也不可能不失算，他远未理解我们的党，他刚刚入党不久，不了解党也不相信党的力量，不相信工人阶级，不理解党和列宁原则的巨大威力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

在这个阶段的反党反列宁的进攻中，托洛茨基遭到了失败。但是他并没有放下武器，而是继续进行破坏活动。临近1923年时，他获得了成功，这一点应该坦率地承认，他在他的间谍的帮助下获得了不小的成功。

在1923~1924年间，正如你们所记得的和应该记住的那样，托洛茨基分子掌握了几乎整个莫斯科卫戍部队。军事学院、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校、炮兵学校以及莫斯科卫戍区其他大部分部队，在当时都是拥护托洛茨基的。

加马尔尼克<sup>①</sup>：还有穆拉洛夫所在的莫斯科军区参谋部也是拥

<sup>①</sup> 加马尔尼克，扬·鲍里索维奇（1894~1937），内战时期在乌克兰担任党务领导工作和军队政治工作，20年代先后在西伯利亚、白俄罗斯党组织的领导人。1929年10月任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0年起任副国防人民委员、苏联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护托洛茨基的。

伏罗希洛夫：是的。当时，托洛茨基向病重的列宁，实际上是向斯大林同志发起了进攻。但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主要的是斯大林同志的力量——使托洛茨基这一次又遭到迎头痛击。

不妨提醒一下，同志们，因为现在在场的很多同志在当时还不是联共（布）中央委员，在1923年底和1924年初，即托洛茨基试图对我们党进行背叛性的打击时，红军还不是一支能够同外部敌人进行战争的斗争的武装力量。当托洛茨基还是陆海军人民委员时，他和他在军内外的间谍们考虑最多的不是军队和军队所面临的任任务，而是怎样更方便地安插自己的亲信以便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如果你们翻阅一下联共（布）中央1924年2月和4月的会议记录，那么，从研究军队现状问题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会主席古谢夫<sup>①</sup>同志的报告、斯大林同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的讲话中，你们可以了解到红军被瓦解的全部情况。军队在当时是不具备战斗能力的，这是中央委员会全体军事委员和军事负责人员的一致意见。各军区的所有指挥人员也持有这种观点。因为，在军队里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托洛茨基分子集团，他们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同党和党的领导人展开了残酷的野蛮的斗争。

列宁在世时，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的托洛茨基曾两次试图推翻党的领导，把自己的政治路线和领导强加于党，结果两次都遭到了无情的失败。但他仍然不想放下武器，特别是在伟大的列宁去世之

<sup>①</sup> 古谢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1874-1933），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1896年参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内战期间在红军中做政治工作，1921-1923年间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政治部主任，1923年出任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后。

1925~1927年期间，托洛茨基领导自己的组织完备训练有素的小集团最后一次向党发起了进攻。而这时，所有的军事卫戍部队都已经坚决拥护党，反对托洛茨基了。只有列宁格勒例外。当时列宁格勒党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及其亲信叶甫多基莫夫<sup>①</sup>、巴卡耶夫、扎鲁茨基<sup>②</sup>等人——已经背叛了党。他们站在反革命分子托洛茨基一边。在这最后一次，托洛茨基同自己的新帮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起不仅遭受了失败，而且还作为公开的敌人被开除出我们的队伍，但是，他还仍然留在国内，在军队中还存在着一一些与他观点一致的干部。是的，这样的干部在数量上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质量上他们却起着很大的作用。那些作为公开的、卑鄙的敌人，被雇佣的杀手，目前在军队中又以新的方式出现的先生们，均属于这一类干部。

这些叛徒和阴谋家到底是什么人，他们究竟是谁？他们首先是：军级干部普里马科夫<sup>③</sup>和普特纳<sup>④</sup>，他们两人都是原托洛茨基分子最著名的代表。其次是军级干部图罗夫斯基，过去他并不是托洛茨基分子，尽管目前他还否认自己的罪行，但显然他也是隐藏的托洛茨基匪帮的成员。

① 叶甫多基莫夫，格利戈里·叶列梅耶维奇（1884~1936），曾在彼得格勒担任领导职务，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主要成员之一。

② 扎鲁茨基，彼得·安东诺维奇（1887~1937），曾是社会革命党人，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内战期间在红军中工作，1921年起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兼秘书。1925年开始积极参加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

③ 普里马科夫，维塔利·马尔科维奇（1897~1937），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内战期间在乌克兰红军中担任指挥职务。1925~1926年曾作为军事顾问来到中国，回国后先后任军长、驻外武官、军区副司令等职。

④ 普特纳，维托夫特·卡济米罗维奇（1893~1937），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内战期间曾先后在东线和西线作战，20年代担任过军长和驻外武官。

接下来是师级干部施密特和萨布林<sup>①</sup>，旅级干部久克，上校卡尔佩里以及少校库兹米切夫。

这样，到目前为止，军队中有6名“将军”级的指挥员被逮捕，他们是：普里马科夫、普特纳、图罗夫斯基、施密特、萨布林、久克。此外还有上校卡尔佩里和少校库兹米切夫。除了这些指挥人员之外，还逮捕了一些工程师、教师以及其他一些“级别和职位”稍低的指挥人员。

从其政治和道德面貌的角度来看看这些先生们代表的是什么，将是不无意思的。为了从这方面来描述他们，我想读两封这些厚颜无耻的家伙写的信。你们将会清楚，这些人都善于干些什么样的勾当。

例如：航空旅参谋长库兹米切夫。他只是—名少校，按以前的说法是中校，“军衔”并不高，但若按照与党斗争的年限来算，他可是—个非常老资格的托洛茨基分子了。库兹米切夫曾在普里马科夫那里担任过秘书，与普里马科夫关系密切，并积极参与了托洛茨基分子1923~1927年期间对党的进攻行动。

就是这个库兹米切夫，他在被逮捕后曾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给我写信，试图证明自己是无罪的。他写得甚至连你们的铁石心肠也不能不……

喊声：不动心。

伏罗希洛夫：是的，不能不动心。你们看吧，这封信都写了些什么。他写道：

“致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同志

我受到指控，似乎我是托洛茨基反革命恐怖小组的成员并准备

<sup>①</sup> 萨布林，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1897—1937），曾是俄国旧军队下级军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了1917年10月莫斯科的武装起义，1919年加入俄共（布）。曾任团长、旅长、师长，1931年起担任乌克兰军事工程管理局局长。

暗杀您。

我声明我对于此事一无所知，但这被看做是矢口抵赖和不愿招供。

不相信我是有理由的，因为 1926—1928 年期间，我曾参加过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

这已经是在撒谎了。他在 1923—1924 年期间就参加了托洛茨基的反革命组织——你们看，关于这一点，库兹米切夫却只字不提。

库兹米切夫继续写道，“自 1929 年开始，我竭尽全力向党赎罪。我认为您不仅是一位红军领袖，还是一位极其富有同情心的人。我以 1929 年返回工农红军的队伍这个事实来回报您的信任……”

这一点是事实。

“1929 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经过您的批准，我被授予了二级红旗勋章。我觉得，我没有辜负您的信任。”

这也是事实。

库兹米切夫继续写道：“在 1931 年，您的指示使我获得了进入军事学院学习的机会。

1934 年，由于我妻子有病，再一次承蒙您的关照，把我调到条件较好的地方，使我的妻子和孩子在那里很快恢复了健康。

多亏您的决定才使我能从事近年来一直在做的有意义的工作。正是您使我成为一名真正的党员。

除了崇敬和深深的感激之情以外，我对您不可能再有其他的感情了。

但我被列入了法西斯杀人匪帮中，这是怎么回事？

1935 年，我从远东到扎波罗热，途经德列伊采尔处并在那里逗留，——当时他是联共（布）党员，获得过勋章，并担任克里沃罗格地区工程建设的负责人。他在电话中通知我说，图罗夫斯基在

他那里做过客，刚刚离开，德列伊采尔本人过一两天也要离开，因此，我可以住在他的住宅里。我这样做了。与德列伊采尔见面的时间很短，我们谈了一些工作方面的事情：我讲了自己的情况，他也介绍了他的一些情况，就这些。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只是在监狱里进行对质的时候，我才从他那里听到，似乎是我亲自向他建议要暗杀您。

我无法推翻这种托洛茨基分子的诽谤之言，我的所有关于这种可怕诽谤是荒诞无稽的声明以及对之间谈话的情况进行调查的全部请求都毫无结果。很快就要开庭了。显然，我将被枪决，因为我已经不可能证明我同德列伊采尔之间没有进行过任何反革命活动。

也许，过了若干年以后，这些托洛茨基分子会讲出，他们为什么要诽谤这些没有犯罪的人。只有到那时才能弄清事实的真相。我请求您让我的家人知道我的清白。请原谅我写得很潦草，他们不再给我纸张了。

1936年8月21日，库兹米切夫。”

这位库兹米切夫先生在1936年8月21日给我的信中就是这样写的。然而9月1日，即写这封信之后正好过了10天，也是这位先生，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受审时却作了以下交待。

侦查人员的问题：“您是1935年2月份从德列伊采尔那里接受了刺杀伏罗希洛夫同志的任务，并为此暗杀行动做了实际准备工作的？”

我非常抱歉，同志们，在此不得不用这样一位人物来占用你们的时间。读这封信只是为了更加充分地说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喊声：正确。

伏罗希洛夫：以下就是自愿承担完成恐怖行动的库兹米切夫对于侦查员提出的问题的答复：

“在演习场我没能见到伏罗希洛夫，因为我们的部队在白教堂地

区，而演习是在基辅郊区，在科罗斯坚市方向上。因此，暗杀行动不得不拖延到演习结束时，在预计伏罗希洛夫要出现的地方进行。”

“演习闭幕式在什么地方进行？”

“在基辅市歌舞剧院。”库兹米切夫回答说。

“您是怎样去歌舞剧院的？”侦查人员问库兹米切夫。

库兹米切夫回答说：“我乘坐飞机抵达基辅后得知，我们部队没有入场券。剧院的警卫队长建议使用后面的空坐位。因为我打算在进行闭幕式的时候对伏罗希洛夫实施暗杀行动，所以我采取措施寻找离讲台比较近的位置，伏罗希洛夫将继亚基尔<sup>①</sup>之后上台发言。见到图罗夫斯基后，我请求他给我弄一张票。几分钟后，图罗夫斯基给了我一张包厢的票。”

接着又问他（指库兹米切夫）：“您离讲台的距离有多远？”库兹米切夫回答说：“大约15米，不会更远。”随后他又讲述了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手枪射击，为什么他没有开枪——因为似乎有什么人干扰了他，因为包厢里的人都认识他，因为前面的两个包厢里有武官和外国客人……

柯秀尔：这个包厢稍微靠后些。

伏罗希洛夫：是的，这个包厢稍微靠后些，有外国客人的这两个包厢挡住了“枪手”所在的那个包厢。

同志们，看到了吧，这就是这些坏蛋的真实面孔。当我最初看到库兹米切夫这封信时，我还不由自主地想：可能人们确实是在诽谤这个年青人，可能这个年青人是无辜的。但总共只过了10天，这个年青人就这么详细地讲述了他是怎样进行自己的卑鄙勾当的，他是怎样筹备暗杀行动的。难道他真的讲出了一切，难道他最后坦

<sup>①</sup> 亚基尔，约纳·埃马努伊洛维奇（1896—1937），内战期间曾任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师长等职，战后担任过红军军校部部长、军区司令。

白了自己的下流勾当和叛变行为？当然不是。

下面是另一个人——施密特·德米特里，他已是“将军”级的人物，是个师长。他也给我写了信，也想引起我的同情。

以下就是他的信。

“亲爱的克利缅特·叶弗列莫维奇！我被逮捕了，并受到了荒谬的指控，仿佛我是托洛茨基分子。我向您及所有的人发誓，对于我来说最珍贵无比的是党，是红军，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罪过，我的全部热血，我的全部思想只属于党的事业，属于斯大林的事业，并将为此献身。我的亲人，请您弄清事实真相，为了您领导下的未来的残酷战争，请保留我的生命。”

你们看到了吧，在这封尽管是很短的信里，却说明了一切，什么也没有漏掉。这个叛徒施密特，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竟然还厚颜无耻地关心，我将是“未来残酷战争”的领导。而一个月后，这个下流坯就被事实揭穿了，招认了自己的全部卑鄙勾当，讲述了自己反革命活动的全部细节。

我这里还有其他罪犯写来的信件：有图罗夫斯基的，还有普里马科夫的。他们写的都是这个意思。但是，无论是普里马科夫，还是图罗夫斯基，目前还都没有承认自己的罪行，尽管对于他们的犯罪活动已经有了大量的供词。他们承认最多的是，他们不喜欢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sup>①</sup>，并忏悔说，直到1933年他们还十分放肆、十分尖刻地批评我和布琼尼。普里马科夫说，他把我们看做是竞争对手，他自己是一个骑兵，我和布琼尼也都是骑兵。（笑声）你们看到了吧，他普里马科夫没有得到晋升的机会，是由于布琼尼和他的

<sup>①</sup> 布琼尼，谢苗·米哈伊洛维奇（1883～1973），苏联元帅（1935），1924～1937年期间担任工农红军骑兵总监，1937年起担任莫斯科军区司令，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委员。

骑兵军的人在军队中占据了所有重要岗位等等，因此他极其不满，并进行反抗。

当然，这是厚颜无耻的谎言，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事情的真相是：正是这个普里马科夫——库兹米切夫的教育者和鼓动者——是无可争议的托洛茨基忠实的间谍，是托洛茨基在军队里的重要代表。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匪帮的所有主要成员的供词都说明了这一点。谈到这一点的还有拉狄克、索柯里尼科夫、皮达可夫、斯米尔诺夫和德列伊采尔。他们所有的人都向侦查机关详细地交待了普里马科夫的行为和作用。尽管如此，他仍然矢口否认这个客观事实，不承认自己卑鄙的犯罪行为。

对于同样也是红军中著名工作人员的图罗夫斯基，我不能不说几句话。图罗夫斯基也像普里马科夫一样矢口否认，不承认自己的罪过。他只承认自己在保持与德列伊采尔和整个匪帮集团（施密特、久克、库兹米切夫等人）的联系这一点是有罪过的。

应该公正地说，1927年，当我同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和其他一些同志在列宁格勒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进行斗争的时候，图罗夫斯基还是我们队伍里的人。当时，他曾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同季诺维也夫分子进行过真正的战斗。尽管这样，我仍然认为，他深深地陷入了托洛茨基分子的泥潭里，他的同伙对他的供词是以事实为根据的。

这个德日间谍—托洛茨基匪帮在红军中的目标和任务是什么呢？

作为军人，他们既提出了战略性的任务，也提出了战术性的任务。他们的战略目标是：组建托洛茨基分子的各种组织，招募某些人员，将原托洛茨基分子、各个反对派和红军中怀有不满情绪的人召集起来，组成自己的干部队伍，并等待时机，准备在发生战争的时候采取行动搞垮红军，使红军有可能将武器对准自己的政府。战

术目标是：加快准备和实施对党的领袖和政府成员的恐怖行动。

皮达可夫，这个阴险的匪徒，在自己的供词中谈到托洛茨基在红军中的计划时说：

“托洛茨基强调说，特别重要的是与红军的联系。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我毫不怀疑，这种冲突的结果将是不利于斯大林的国家的。我们应该准备在这个时候把政权夺到自己的手里。”

皮达可夫继续交待说：

“托洛茨基在谈到战争时讲得很明确。按照他的观点，战争在近期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战争中‘斯大林国家’将逃脱不了失败。他，托洛茨基，认为，在这场战争中持鲜明的失败主义立场是绝对必要的。战争的失败将意味着斯大林制度的崩溃，正因如此，托洛茨基才坚持在军队里建立组织，扩大与军队指挥员的联系。他认为，战争的失败将在军队里造成使他托洛茨基重新掌权的有利形势。他认为，军事上的失败将毫无疑问地加快他的联盟夺取政权的行动。”

请看已被处决的托洛茨基分子、曾担任过季诺维也夫秘书的皮凯利是怎样说的。

侦查员问皮凯利：“在1936年7月4日审讯时，您曾交待存在着一个军事组织，与德列伊采尔有联系的普特纳和施密特都参加了这个组织。他们的工作任务是什么？”

皮凯利对此回答说：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为了组织反对国家的重大阴谋活动。军事组织的任务是：通过在部队中的秘密工作，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计划成功地完成时，将军队的指挥权立即转移到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方面，并要求部队的指挥员们排除伏罗希洛夫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预计在下述情况下实行的计划：如果德米特里·施密特不能在刺杀斯大林之

前成功地杀死伏罗希洛夫。”

这些先生们就是这样计划在军队中开展阴谋活动的。如果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不能通过以恐怖行动铲除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的途径掌握政权的话，那么就必须等待战争并为之作好准备。而在战争中就按照他们的“战略”计划行动。

在自己的供词中，德·施密特交待了军队中的托洛茨基分子的犯罪活动，说的基本同皮凯利交待的一样。

施密特交待道：“在向我阐明军队中的托洛茨基各基层军事组织的任务时，德列伊采尔向我通报了已经拟定的夺取政权的两个方案：

1) 打算在实施暗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几次主要恐怖活动之后，要成功地挑起剩下的领导人的慌乱，以便于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夺取政权；

2) 在不成功的情况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组织就打算借助于军队中的托派基层机构组织的军事力量的帮助。从这些目标出发，德列伊采尔在与我交谈时主张，必须在军队中建立托派基层机构。”

同志们，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这里已经有更加充分的根据说明必须在军队中建立托洛茨基的基层组织，着重强调了这些基层组织在军事政变时、在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中的意义。

皮达可夫和拉狄克在自己的供词里也谈了军队的工作。他们几乎都排除了在和平条件下进行军事政变的可能性。因为他们认为，红军中有铁的纪律，红军是忠于党、忠于政府和自己的国家的。但是，在军队中，他们已经安插了托洛茨基反革命小组，并将其视为瓦解红军的基地和自己在战争时期的牢固据点。你们接着可以从他们的供词里看到，这伙败类执行的是在未来战争中使红军遭受失败的方针。

普特纳关于这个问题的供词是很重要的。你们之中的很多人都认识这个人。最近一段时间他在国外工作。1927~1931年期间，

普特纳曾是驻日本、芬兰和德国的武官；接着，他又在基辅军区和远东军区工作了一段时间；此后，又被任命为驻英国的武官。在最后的这个职位上，他终于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揭露了。

还在1931年，普特纳在柏林担任武官时就通过斯米尔诺夫与谢多夫<sup>①</sup>建立了联系，并制定了托洛茨基分子在红军中的工作计划。下面就是他在回答侦查人员提出的关于他同谢多夫谈了什么内容的问题时所作的交待。

普特纳说，“当时谈话涉及两个方面，第一，围绕我从斯米尔诺夫那里得到的关于恐怖行动的指令，第二，关于红军中的情绪以及在工农红军中加强托洛茨基影响的前景。谢多夫详细地向我询问，军队指挥员中还有谁是托洛茨基分子；他表示坚信，军队和指挥员们将记住托洛茨基。”

关于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从托洛茨基本人那里得到的关于托洛茨基军事组织的目标和任务以及在红军中的工作等方面的指示，普特纳说：

“在得知我即将返回苏联时，谢多夫指示我说，托洛茨基认为，必须将所有托洛茨基分子—军事工作人员重新组织起来。谢多夫还向我介绍了穆拉奇科夫斯基，说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还在1927年的时候，他就是托洛茨基分子军事小组的领导人，并与这个小组的其他成员保持着联系。当时，谢多夫还向我转达了托洛茨基本人的意见，托洛茨基认为强大的托洛茨基军事组织在与联共（布）领导人的斗争中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下面还有：

“我们托洛茨基军事小组总的和基本的任务是：与联共（布）领导人和红军领导人进行斗争，以期最终改变这个领导层。我所指

<sup>①</sup> 谢多夫，列夫·利沃维奇（1906～1938），托洛茨基的儿子。

的首先是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上面我已经交待了在柏林时谢多夫向我阐述的托洛茨基的观点，即必须有强大的托洛茨基军事组织，以便在需要时——在托洛茨基分子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被授权在红军中组织托洛茨基支部的久克作了如下叙述：

“我给自己提出了在军队中建立自己的基础和支柱的任务，并在这方面开展了实际工作，对此我已在今年8月29日的审讯中作了交代。我们所考虑的人选并不仅仅局限于托洛茨基分子。我们自然明白，在这方面要想指望军队中比较广泛的阶层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认为，对于由于这样或那样的个人原因而心存不满的军人，对于‘受委屈’、不守纪律的以及作风恶劣等等的人，从利用这些人对我们服务的角度来看，认识他们并将他们吸引过来是适宜的。从这个原则出发，我们认为绝不能让这些人在离开军队，形式上的借口是，这些人可以再教育，国家在他们身上已经花了很多钱，他们已经掌握了军事技术，等等。无论是我，还是德列伊采尔和普里马科夫都同意这个原则。”

接着他说出了一些打算招募、也可能是已经被招募的人的名字。这些叛徒指望，在军队中那些原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杂种中，始终都能找到可以依靠的“对象”并吸收他们参加自己卑鄙的组织。

从敌人的观点来看，把希望和打算寄托在军队中的某些人身上是正确的。同志们，正如你们所看到的，不能把那些人——国家在他们身上花费了很多钱——轻易地赶走，他们能够改过，应该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在新的工作中证明自己，等等，这不仅仅是我们的观点，同时也被凶恶的敌人巧妙地利用了。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总是说不应该苛求、应该关心人、应该进行再教育，为了军队、为了党、为了国家、应该爱惜他们。总之，这是正确的。不应该不加

区分地就毁掉人才。但是，也不应该忘记，敌人为了达到自己的卑鄙目的，会很阴险很狡猾地利用每个机会的。

我已经讲了，根据皮达可夫和拉狄克的供词，托洛茨基中心是不相信在和平的条件下可能进行军事政变的。但这并不表明托洛茨基中心不赋予其在红军中的工作以特殊的意义，这一点你们能从他们的供词中看到。拉狄克在自己1936年12月4~6日的供词中是这样写的：

“以前我已经交待了，德列伊采尔指挥第一个中心小组的一系列恐怖行动，他还吸收了留在红军指挥岗位上的托洛茨基分子参加恐怖活动。平行中心也与红军中的组织成员保持着联系，其中包括我拉狄克与普特纳和施密特的联系。

这也说明了托洛茨基及其联盟的中心赋予托洛茨基分子在红军中的活动以特殊的意义，而这仍然是从苏联在将要发生的与法西斯国家的战争中会遭到失败的立场出发的。无论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中心都很清楚，红军指挥人员中的托洛茨基分子在和平条件下不可能进行任何广泛或有效的实际发动来反对政府。

同时，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中心都注意到红军的觉悟和纪律以及它对党的忠诚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并认为正因如此不能指望广大的红军战士。

但是，如果苏联在战争中遭到了失败——我们主要是从这一点出发并且指望发生这种情况——红军指挥员中的托洛茨基分子就可以利用某些战斗的失败来证明联共（布）中央的政策是不正确的，对这场战争来说是毫无意义的、致命的。

他们还可以利用这些失利以及红军战士的疲惫，号召他们抛弃战场，甚至将枪口对准自己的政府。

这有可能使德国军队不经战斗就能占领无防卫的地段，并造成

摧毁整个前线的现实威胁。在德国军队进攻的情况下，这个联盟将指望借助于由指挥员中的托洛茨基分子领导的部队夺取政权，而在此之后他们将成为护国主义者。”

关于这个问题索柯里尼科夫大致也是这样交待的。在回答侦查员提出的托洛茨基对于法西斯德国承担何种义务以及托洛茨基联盟在战争中采取何种战术的问题时，索柯里尼科夫是这样说的：

“托洛茨基答应希特勒政府，联盟将奉行积极的失败主义路线……托洛茨基还指出，联盟组织应该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促使苏联遭受失败。正如托洛茨基所指明的那样，主要手段应该是：在工业中组织阴谋和破坏活动，托洛茨基分子指挥员在前线直接叛变。”

同志们，我认为必须让你们了解，在这些坏蛋的大量供词中又出现了新的情况，这就是皮达可夫于1936年10月26日所交待的东西。

在交待与索柯里尼科夫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见面及谈话的情况时，皮达可夫对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倾分子工作中的所有重要问题都作了说明，其中包括：

“在此索柯里尼科夫还对我讲了自己的行动计划，归结起来说是：在莫斯科、乌克兰以及苏联其他地区进行恐怖活动的同时，应该使用列宁格勒防区的部队。但是，应该说，在列宁格勒防区，除了维塔利·普里马科夫以外，我没有任何关系，也不认识其他人。对于索柯里尼科夫打算使用军队的计划，我认为不切合实际，但是我仍然明白，应该拥有一个协同行动的现实计划。因此，我建议召集四人小组会议——对此我上面已经交待了——再加上托姆斯基，以便总结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为今后制定一个真正现实的计划。”

同志们，从我在这里讲述的这一切中已经弄清楚，托洛茨基法西斯匪徒是怎样竭力使自己的组织渗入红军中，这个卑鄙的联盟是

怎样竭力利用工农红军来达到自己的反革命目的的。

这些法西斯匪徒的全部活动都集中于在军队中建立自己的组织和网络，拉拢某些怀有不满情绪的人，并将他们招募到自己一边来。

这些叛徒的计划是如此的简单，又是如此的卑鄙。他们一方面策划对于中央委员会和政府成员的恐怖行动，一旦时机成熟，就立即付诸于实施；另一方面则等待战争，等待对于国家来说更加困难的时机，然后通过背叛、卑鄙的阴谋和招募的途径来帮助敌人反对自己的祖国和军队。

由此应该得出相应的结论，正如同志们在这里已经很正确地说过的那样，吸取应有的教训。我已经说过，但是还想再重复一次：目前在军队中只逮捕了一小批敌人；但这并不排除，相反甚至是毫无疑问地，在红军队伍里存在着数量不小的还没有被发现、没有被揭露的充当日本—德国的间谍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破坏分子和恐怖分子。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为了防止卑鄙和阴险的敌人对红军——这是一个最脆弱的工具，也是一个最为敏感最为重要的国家机器——的渗透，红军的整个领导工作应该更加严格，我还想说，应该按照新的方式来进行。

现在，我认为不能误导中央，也可能这么说不完全恰当，但是必须说，我们红军工作人员不管怎样应该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阻止凶恶的敌人钻进军队。

我们不事声张地——没有必要张扬——排除了大量的不良分子，其中包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以及各种可疑的、品质不好的人物。自1924年起，即托洛茨基被赶出军队以来的这段期间里，从军队里清除了大量的指挥人员。我希望我在这里说出的数字别吓住你们，因为这个数字包括的不仅仅是敌人，还有少量对于军队不太适合的人和一部分属于缩编的好同志。在12年时间里，从部队中退伍的指挥人员大约有47000人。（在此期间，有

21000人从预备役中应征入伍。)仅在最近这三年里,1934~1936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主要是由于品质不良和政治上不可靠,大约有22000人从部队退役,他们之中有5000人是公开的反对派分子。

同时,同志们,我应该说一说,无论是我,还是我最亲近的助手们,在进行这项工作时都是非常小心谨慎的。我本人在决定将某人从部队中解除军职的问题时总是持非常谨慎的态度。甚至即便某人在过去曾参加过反对派,你也应该对他持关心的态度。我认为,始终以最仔细的方式弄清事情的真相,全面地了解 and 审查一个人,只有在此之后才能采取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决定。这样做是必须的、正确的——斯大林同志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关于某些属于应该从红军队伍中清除的人的问题,我与叶若夫同志的机关经常进行沟通。有时候也不得不维护某些人。是的,现在可能遇上非常不愉快的事情:你维护某个人,并相信他是清白的,但后来却弄清楚,他是一个真正的敌人,法西斯分子。但是,尽管有这种危险性,我今后仍将执行我自己的这条路线,在我看来这是正确的路线,是斯大林的路线。我认为,以这种态度来对待如此重要的问题是最为正确的,最具有党性的。关于这一点,莫洛托夫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讲得完全正确。应该了解人,应该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的才能以及不良习惯,通过事实,在工作中、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检验他们;应该了解他们周围的人,他们所处的环境。只有真正地了解了这个人,同他——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建立亲密的关系,同志式的关系,深入到他的内心世界,在小的细节方面了解他的工作,才能或多或少作出正确的判断:某人具有什么样的才能,他是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种人。我们这里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只相信口头上的说法或者别人的评价或者他的自我介绍,而对他本人根本不了解,不知道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斯大林同志多次讲过这一点，并提醒我们：干部决定一切。这是非常深刻的真理。干部，这就是一切！斯大林同志在工农红军干部身上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他们是特殊的干部。我们应该经常不懈地开展工作，以便增加这样的干部的数量，完善他们的品质，不断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以及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才干。

军队在编的干部有206000人，其中指挥人员有107000人，其余的是政治工作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医务人员、兽医、行政管理以及其他管理人员。这个巨大的群体需要军队领导机关巨大的、认真的经常的关注。

为了真正地按布尔什维克的方式组织和教育这些指挥人员和管理人员，使他们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发展，使他们无愧于党、国家和苏联人民赋予工农红军的崇高荣誉和使命，我们是否非常善于开展我们的工作呢？很遗憾，同志们，虽然已经做了一切努力，但我们应该做得比迄今为止所做得更好，我们的领导应该成为最优秀的，我们应该更善于管理人。

我们是怎样培养我们的干部的，我们是如何做他们的工作的？对此我有责任告诉你们，以免造成这样的印象：红军中的工作进行得非常不好，因此需要采取某些非常的和紧急的措施。

在红军中当然还存在着某些不尽人意的情况和缺点，但是军队已经拥有了一批指挥干部和管理干部，他们不仅能够保证军队具有必需的战斗力和忠诚于我们的党和无产阶级国家。

我们加倍努力地培养我们的大批干部。军队拥有12所军事学院，1所有11000名学员的兽医学院，75所军事学校，有65000人在此学习。在12年期间里，军事学校为部队输送了134700名指挥人员和各类管理人员——现在的尉官、军事技术员和其他人员。在同一时期，军事学院为部队提供了13000名指挥员、工程师以及其他专业人员。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那样，红军中指挥人员和管理人员的配备情况还不错。但是，对于这些指挥人员还须进行大量的教育工作，对他们要进行不断地培养，要善于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要有组织地进行工作。我们知道很多事实，由于我们的疏忽，由于我们对他们不关心，放纵，一些受过良好军事教育、诚实的、在部队服役了很长时间的人，最后堕落了，变成了毫无用处的人，甚至是有害的人。

1933~1934年期间，我们同全党一起对红军队伍中的党员进行了清洗。在军队里——正如许多州以及各民族地区党委书记都知道的那样——被清洗人数的百分比是最低的……

柯秀尔：应该是这样的。

伏罗希洛夫：是的，因为国家给军队的都是最优秀的人材。假如对于工农红军中的各级党组织清洗的结果同地方各级组织的一样，那情况可就糟了，因为我们拥有的都是在各方面经过仔细挑选的人材。尽管我们这里被清洗人数的百分比不是很大，但是被清洗的人数也是够多的——3328人，其中赞成托洛茨基主义和反革命宣传的是555名。这555人之中，有400人被立即清除出军队。

在更换党证时，有244名原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被开除出党。

原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以及在各个时期被开除出党的人员之中，有155人还留在军队里。除此之外，还有545名曾参加过反党联盟、但获得了新党证的人还在部队中担任着各种职务。

这样，目前在军队里没有党证和有党证的原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倾分子的人数总共是700名。

我们知道这些人，他们全都处于我们的直接监督之下。但是，最近发生的事件表明，对于这些人应该进行更加严密的监督和党务方面的观察。显然，应该加强对这些同志的工作，以便使他们从“过去的身份”转变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以使他们的党性以及对

于我们事业的忠诚没有任何可疑之处。应该与可疑分子断绝关系。

总之，我们的军队拥有的是出色的红军战士。优秀的人材是不可能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的指挥员是如此优秀、意志坚强，如果他们体魄健康，真正忠诚于我们的党和国家，那么，拥有了目前良好技术装备的我们的军队，无疑将是不可战胜的。军队的指挥干部——这就是一切。

这些指挥干部都是些什么人？

我已经说过，206000名干部之中，有107000名是指挥人员。指挥人员中有67%是党员，除此之外，大约有8%的人是共青团员。

这107000名指挥人员中，工人出身的有50942人，占指挥人员总人数的47.5%；受过军事教育的有96390人，占指挥人员总人数的90%。

军事技术人员。我们的军事技术人员中有60%以上是党员，大约15%是共青团员。工人出身的大约占军事技术人员总人数的65%。90%以上的军事技术人员拥有专业学历。

军队中的军事政治干部是22000人，全部是党员，有58%是工人出身，50%的政治干部拥有军事或者是政治专业学历。这里还有很多人没有学历。不应认为59%的政治干部没有军事或政治专业的学历是正常的现象，况且这些人还要经常在士兵和管理人员中开展政治工作。

军事医务人员。这里的情况要糟糕得多。医务人员之中党员只占总人数的27.2%，共青团员占5%，工人出身的大约是14%，有学历的是90%。

军事兽医人员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党员占总人数的29%，共青团员占4%，工人出身的占13.5%）。

情况最糟的是军事经济和行政管理人員。军事经济和行政管理人員是整个管理人員中最大的部分——差不多有26000人，而在这

26000人中，只有9331名党员，占总人数的36%，共青团员占3.8%。这些管理人员之中，工人出身的占总人数的23%，拥有军事或者专业学历的占总人数的43%。

因此，不能说军事经济管理人员——很多军事经济事务、正确装备军队、及时供应军队日常所需都取决于这些人员——的组成是符合目前对这类人员提出的要求的。正如你们所看到的那样，这里还有完全没有经过培训的人员，党员成分也还不够。

我不再一一列举使大家感到厌倦的、反映工农红军管理干部特点的有关其他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方面的数字。

我只想就教育军队管理人员的工作问题说几句话。

国防人民委员部有可能也应该按照有别于其他某个人民委员部的方法开展干部工作。国防人民委员部——这是一个特殊的人民委员部。

在大多数人民委员部，都不开展或几乎不开展党务—政治工作，所有的党务—政治工作都由各级党组织、工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来承担。而在国防人民委员部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国防人民委员部里，在干部机关的领导下，部队通过日常工作——部队的指挥、训练等等——本身也在不断地学习。他们必须进行政治课程的学习，普及学校教育，开设专门的军事和技术科目。例如，去年和今年，对管理干部的政治教育课程每月进行三次，每次4个小时。普通课程的学习（对于那些需要学习这些课程的人）每月进行六次，每次2个小时。对于中高级人员，外语课程的学习每月进行六次，每次2小时。军事训练每月进行五次（35个小时）。这是所有的军事部门以及部队都必须完成的最低标准。这种牢固的学习体系不仅能够教育、培养人材和干部，还可以系统地观察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成长，捕捉他们的情绪和了解他们的要求。

到1937年1月1日止，在军队里共有学习小组5475个，在这些

小组里学习的管理干部有 102000 人。这大约占了指挥人员和管理人员总数的一半。但是，应该考虑到，绝大部分高级指挥人员是以单独的方式进行自学，或者是作为已经有了相应学历的人而完全摆脱接受教育。正如你们所看到的，对军队干部进行政治教育和普及知识教育的覆盖面很广。但是，必须承认，一部分干部还在这个范围之外。为了红军政治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不断完善和成长，还要加大力度，使所有人百分之百地加入到这个教育和再教育的体系中来。

同志们！从这些报告和发言的内容中，从所有这些敌对、破坏、间谍活动的可怕事实中，从这些卑鄙的叛徒对党、国家和人民所进行的欺骗活动中，我们，红军的工作人员们，应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我觉得，这个结论正是其他所有同志做出的那个结论。我认为，我们有责任不仅要更加关注在军队全体人员中的政治和党务工作，而且要更加深入地考察并时时监督我们的专业部队——海军、空军、坦克部队、炮兵部队、化学部队、工程兵部队、通讯部队以及院校的全部活动。

敌人（如果他还没有更深地渗入到军队的核心中）将把自己贪婪的魔爪伸入红军，伸入它最重要的部门。

而最应该担心的是，在这次联共（布）中央全会散会以后，在日常工作中做了某些事情——可能是许多事情——之后，又会重新出现不安定。这将是不能令人原谅和容忍的轻率行为。那时敌对分子和间谍将重新乘隙而入，并给我们造成比现在还要大的损失。不，我们今后应该按照另一种方式工作。

斯大林同志经常提醒我们，阶级斗争不仅没有结束，而且还采取了更加尖锐的方式。我们并不是手持武器进行战斗，但我们同阶级敌人——他们在工人阶级中、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很多很多——进行着残酷的斗争。同时应该注意到，我们的阶级敌人有大量的、

多种多样的斗争武器。当我们表现出一点点的自我满足、健忘和粗心大意的情绪时，敌人就会给我们制造麻烦，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停止这样做的。这种情况将会始终存在，直到“我们消灭他们，或者他们消灭我们”为止。当然，正如彼季卡在《夏伯阳》中所说的那样，是“我们消灭他们。”但是，当他们对他们进行消灭时，当工人阶级用铁扫帚清扫西方资本主义的垃圾时，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将利用我们的任何一点疏忽，特别是软弱、马尼洛夫习气<sup>①</sup>和马虎大意，打击我们的社会主义，破坏我们的事业。还没有一道障碍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与其他世界隔开。这个其他世界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我们的阶级敌人的世界。破坏活动、间谍活动以及暗杀活动的组织者都是从“那个世界”来到我们国家的。托洛茨基法西斯分子从那里控制着自己的匪帮，这些匪徒们分布在苏联的领土上，目前还没有被我们抓获。

在与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进行公开的战争之前，阶级敌人将会竭尽全力地进行破坏活动，削弱我们祖国的力量。因此，我们永远都要感觉自己是在战斗的岗位上，采取一切措施，使敌人感到恐慌；如果他落入我们的组织中，应该让他感到窒息，最后，必须让他因窒息而死。这对于我们，军人共产党员，军队的负责人员来说是最主要的办法。我们不能，也没有权利成为“窝囊废”，软骨头。要有警惕性，对工作认真、忠诚，并有组织能力，具备政治的、布尔什维克的、列宁—斯大林的坚韧不拔的毅力——这些都是我们全体军事工作人员所必须具备的，如果他不想成为粗枝大叶的人、被敌人耻笑的人的话。

目前，对于工农红军干部的教育工作应该比以前更有力度。我

<sup>①</sup> 马尼洛夫是果戈里《死魂灵》中的人物，他沉迷于幻想、夸夸其谈而不务实际。

们应该更加顽强地和理智地进行工作，以使大批非党指挥员和管理人员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对于军队干部政治性、阶级性以及党性的培养工作应坚持不断，考虑周密。军队的干部应该成为百分之百的有觉悟的、忠于斯大林的坚强的布尔什维克。但是，我们不能不允许在红军队伍里有非党员干部。在红军的干部队伍里，非党员人数目前占有很大的比例，今后也仍会是这样。但是，任何一个非党指挥员都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对苏维埃制度、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漠不关心的人。我们不能允许非党管理干部成为不问政治的人。今后，我们不能允许非党指挥员对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不能允许对我们党、对它的任务和目标不了解也不感兴趣，要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参加者。如果非党人员以不问政治、漠不关心的面貌出现，那么他就是半个敌人，或者是敌人的间谍。这样的非党人员我们这里目前还没有，也不应该有，何况我们也不可能允许我们的党员指挥员和红军战士（很遗憾，由于停止吸收党员，目前我们这里的党员红军战士很少）成为在各方面都不合格的、不是名副其实的党员—布尔什维克。在军队工作的所有党员，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岗位上，都应该不断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用必备的知识来充分地武装自己，有责任成为一名模范的党员、列宁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

目前，在红军中所进行的不仅仅是军事训练，还进行着对指挥员和普通干部的大量政治教育工作。我们有责任在今后更加努力、更加周密地以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思想教育战士和指挥员。乌博列维奇<sup>①</sup>同志，这是您应该负责的工作，以便使全体红军战士

<sup>①</sup> 乌博列维奇，叶罗尼姆·彼得罗维奇（1896—1937），曾是俄国旧军队下级军官，国内战争期间曾任师长、集团军司令等职，后任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长兼人民革命军总司令，北高加索军区、莫斯科军区、白俄罗斯军区司令。

和指挥员成为真正有知识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这是使我们红军队伍免遭敌人渗透的最基本最主要的保证，第一位的条件。

我们还应该做到使各级管理干部之间的关系、年长的与年青的干部之间的关系、管理干部与广大红军战士的关系更加密切，使这种关系成为务实的、同志式的、布尔什维克的，而不是形式上的或不拘礼节的，遗憾的是目前在我们这里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

我们的党员和非党员指挥人员和管理干部经常脱离红军战士，不了解战士们日常生活的真实状况，不关心他们的情绪和要求。由此而导致了红军战士的不满情绪。敌人就利用这一点，他们也不可能不利用这一点。因为敌人很清楚，从这些心怀不满的人里能够很容易地制造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我们这里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红军战士在自己的部队里搞破坏活动，毁坏机械和飞机，还做出其他一些害人的事情。还发生过放火烧毁飞机库的事件。是的，这些红军战士都是富农、牧师以及旧警察的子女。但是，问题显然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做好对红军战士的教育工作，问题还在于我们的指挥人员和政治工作者不了解战士、各部队政治机关的工作做得不好。应该向我们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者郑重地强调指出，他们必须立即改进自己的政治工作，密切与广大红军战士和指挥人员的联系，加强对于非党干部的教育工作，不断地研究和充分地了解全体官兵。

同志们！非常遗憾的是，红军也被牵扯进了这种卑鄙的反革命勾当之中。我和我的亲密助手们对此应承担全部责任，尤其是所有像普里马科夫、普特纳、久克和施密特等等的那些人，我们曾经非常了解他们。确实，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人能够想得起来，这些先生们曾经有过反苏表现，有过哪怕是值得怀疑的情形。正相反，这些人一边进行秘密破坏工作以使军队在即将发生的战争中遭到失败，一边在部队里表现得又很好——正如现在已经查明的那样。无论是

普里马科夫、普特纳，还是图罗夫斯基，甚至还有施密特，所有这些人在进行自己的工作时，都没有引起过任何人的怀疑。

问题究竟在哪里？问题在于，同志们，我们的管理体系和监督体系对于这些人是毫无用处的。我们应该采取另一种办法来观察他们，比现在更多地了解他们，比现在更好地认清他们。我们曾经使用的考察人的方法、衡量其政治素质的方法已经不适用了，这是有缺陷的方法，是一种失败的方法。需要以另外的措施、另外的方法、另外的对人进行管理和领导的形式，特别是对于这一类人。

这是些什么措施呢？为了彻底清除在工农红军健康的——无疑是健康的——漂亮的肌体上的有害脓疮所造成的后果，必须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应该最大限度地提高对于所有管理干部和广大红军战士进行政治和党的教育工作的质量。

必须实现指挥机关、政治机关、特别处和党组织的工作协调一致。

应该对工作进行系统的检查和监督，在实践中考察人，纠正其错误，使其养成对欺骗、阿谀奉承、自以为是、自我陶醉以及其他一切不良行为和缺点绝不容忍的态度，并毫不留情地与这些现象作斗争，而不论军衔和领导地位的高低。

最后，必须在管理干部之间、在各级干部与广大群众以及那些应该团结的人之间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必须真正了解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人，以及他们的期望、要求和情绪。

所有这一切以及一系列其他旨在加强列宁—斯大林式的警惕和领导的措施，将使红军摆脱凶恶阴险的破坏分子——毫无疑问，在红军的队伍里仍然存在着这些人——并保证今后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不再出现来自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以及右倾分子的可耻阵营的两面派、变节者和叛徒。

№04570

## 什维尔尼克关于图哈切夫斯基案 复查情况致赫鲁晓夫的报告

(1964年6月26日)

现呈上对1937年司法机关和党的机关指控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和其他军事活动家背叛祖国、搞恐怖活动和军事阴谋的问题进行复查的报告。

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1961年5月6日决定成立的委员会研究了关于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军事活动家一案形成的原因和条件的材料。

什维尔尼克<sup>①</sup>

1964年6月26日

---

<sup>①</sup> 什维尔尼克，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1888—1970），苏联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曾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联共（布）中央书记、乌拉尔州委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等职。1956年起为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附 录

绝密

关于 1937 年司法机关和党的机关指控  
图哈切夫斯基同志、亚基尔同志、乌博列维奇同志  
以及其他军事活动家背叛祖国、搞恐怖活动和  
军事阴谋的问题的复查报告

1937年6月11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厅根据被控犯有背叛祖国（根据俄联邦刑法典《6》第58~1章）、进行恐怖活动（第58~8章）、策划军事阴谋（第58--11章）等罪名，判处以下红军军事活动家死刑：

1. 苏联元帅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1893年生，1918年起为联共（布）党员，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

2. 一级集团军级干部约纳·埃马努伊洛维奇·亚基尔，1896年生，1917年起为联共（布）党员，联共（布）中央委员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基辅军区司令；

3. 一级集团军级干部叶罗尼姆·彼得罗维奇·乌博列维奇，1896年生，1917年起为联共（布）党员，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白俄罗斯军区司令；

4. 二级集团军级干部奥古斯特·伊万诺维奇·科尔克，1888年生，1927年起为联共（布）党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

5. 军级干部罗伯特·彼得罗维奇·埃德曼，1895年生，1917年起为联共（布）党员，苏联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6. 军级干部鲍里斯·米罗诺维奇·费尔德曼，1890年生，1919年起为联共（布）党员，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干部管理局原局长；

7. 军级干部维塔利·马尔科维奇·普里马科夫，1897年生，1914年起为联共（布）党员，列宁格勒军区副司令；

8. 军级干部维托夫特·卡济米罗维奇·普特纳，1893年生，1917年起为联共（布）党员，苏联驻英国武官。

1956年，苏联军事总检察院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图哈切夫斯基和同他一起被判刑者的刑事案件进行了复查，并查明：对于他们的指控是虚构的。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于1957年1月31日审核了苏联总检察长的结论，并裁定：取消苏联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厅于1937年6月11日对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埃德曼、普里马科夫、普特纳和费尔德曼的判决，因缺乏犯罪事实而终止对案件的审理。

也是在1957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为以上人员平反昭雪并恢复了他们的党籍。

稍早，1955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就为1937年被毫无根据地被指控为策划军事阴谋的领导人之一和军事阴谋“中心”的成员之一的原联共（布）中央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扬·鲍里索维奇·加马尔尼克彻底平反昭雪并恢复他的党籍。

但是，在1956~1957年的复查工作之后，仍有许多问题没有弄清：关于这一案件产生的原因和条件；关于斯大林对待军队领导人的态度；关于大规模非法镇压军队干部以及个人崇拜对军事工作和军事历史科学所产生的其他后果。

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1961年1月5日的决议（第313/XXIII），我们审理了对所谓军事阴谋案件的侦讯和审判过程的材料，审理了保存在苏共中央书记处和苏共中央主席团档案馆的文献资料，审理了苏共中央党的委员会的档案文件，党、苏维埃和军事档案馆的档

案文件，苏联部长会议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的工作记录，国防部、总参谋部、苏联外交部的工作记录和涉及这个问题的一些国外的原始资料，以及来自于一系列原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和与此案有关人员的说明文件。

现将对于以上资料的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 一、在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和其他军事活动家被捕之前对他们的虚假指控

所谓红军中的法西斯军事阴谋案件是在1937年联共（布）中央2~3月全体会议召开之后不久出现的。在这次全会上讨论了与粉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倾分子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叶若夫在联共（布）中央的这次全会上分别作了报告。

关于军队干部的状况问题，伏罗希洛夫和加马尔尼克在全会上分别作了报告。根据他们的说法，军队中人员的政治道德状况目前还不至于使人担忧。按照伏罗希洛夫的话说，军队已经系统地清除了自己队伍中的坏分子。自从将托洛茨基逐出军队至今已经过去12~13年了，在此期间，从军队中清除了大约47000人，其中有5000人是反对派分子。

伏罗希洛夫称，“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军队是一支忠于党和政府的、具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选送到军队的人都是优秀的。国家给予我们的都是最优秀的人材。”

但是，莫洛托夫对于军队干部的状况却完全是另一种评价：

他说，“军事部门是一个很大的部门，对其工作的检查不是现在、而是将在稍晚一些时候进行，检查将是严格的……如果我们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都存在着敌人，我们能否想像只有军队里没有敌人呢？这是没有道理的，这是温情的表现……我们对于军事部门的

看法不能只是听取一份特别的报告，然后就放过了。我们这里指的是事情的实质。”

还在中央2-3月会议之前，对许多党员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镇压就已开始了。但是在会议之后，镇压的规模空前地扩大了。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叶若夫在全会上的发言使国内的形势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直接给党和行政机关规定了目标，要在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机关里找出所谓人民的敌人。结果普遍出现了大量的假供词、伪造的告密信等等。党员过去的任何错误、试图对斯大林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提出批评意见以及由此产生的全部结果，都被看成是反党反苏维埃的行动。

中央全会以后，在国内展开的镇压行动广泛地触及到了军队。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关于“检查”军事部门工作的要求被国防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作为清洗军队、消灭那些仿佛在军队中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人民的敌人”的直接命令所接受。

中央全会后出现的所谓的法西斯军事阴谋案件是以如下形式发生的。

1937年4月，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取消图哈切夫斯基前往伦敦参加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加冕仪式的旅行。这个决议的依据就是叶若夫于1937年4月21日提交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的一份特别通报。这份通报的内容如下：

“今天，我们收到了国外一个十分可靠的情报机关提供的一份情报，内称德国侦察机关拟在图哈切夫斯基前往伦敦参加加冕仪式期间对他实施恐怖行动。为了实施恐怖行动，还成立了一个4人行动小组（3个德国人和1个波兰人）。情报机关不排除，德国打算以这一恐怖行动来挑起国际争端。为了充分保障图哈切夫斯基同志的人身安全，我认为取消图哈切夫斯基的伦敦之行是适宜的。请审议。”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得到关于准备对图哈切夫斯基同志实

施类似恐怖行动的任何情报资料，因此，这份特别通报是虚构的。

在这份特别通报上，斯大林写道：

“送政治局各委员。不得不同意叶若夫同志的建议，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事情。应该建议伏罗希洛夫同志再推荐一名候选人。约·斯大林。”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这份“特别通报”上，还有伏罗希洛夫的指示：“交米·尼悉知。1937年4月23日。克·伏。”在这份特别通报上还有米·尼·图哈切夫斯基的签名，这证明他已经知道了1937年4月22日这份文件的内容。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

“1. 鉴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通报，即图哈切夫斯基同志在前往伦敦参加英国国王加冕仪式期间将面临德、波恐怖小组——这个由德国人和波兰人组成的恐怖小组负有刺杀图哈切夫斯基同志的使命——的严重威胁，中央政治局认为，取消中央关于派图哈切夫斯基同志前往伦敦的决定是适宜的。

2. 批准国防部关于派奥尔洛夫同志作为苏联军方的代表前往伦敦参加加冕仪式的建议。”

在表示了对图哈切夫斯基人身安全的“关心”之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同时又在叶若夫的指挥和直接参与下开始积极地从被捕人员中收集针对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军事领导人的各种挑唆性的供词。例如，1937年4月22～25日，从当时已被逮捕的苏联内务部特别局原局长盖伊和原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普罗科菲耶夫口中获得了关于图哈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科尔克、沙波什尼科夫<sup>①</sup>、埃

<sup>①</sup> 沙波什尼科夫，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1882--1945），苏联元帅（1940）。曾是俄国旧军队上校，内战期间在最高军事委员会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任职。战后担任过几个军区的司令、红军参谋长、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时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

德曼和其他人与亚戈达<sup>①</sup>有犯罪联系的虚假供词。

但是，试图从已被逮捕的亚戈达口中获得关于军方领导人的这类供词没有成功。在1937年4月26日的审讯中，亚戈达交待说：

“确切地说，我与军队领导人没有私人关系，只有工作关系。我从来没有招募过他们之中的任何人。”

为了获取关于图哈切夫斯基的供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对于被逮捕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某局的副局长沃洛维奇同样也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对沃洛维奇的审讯受到极大的关注，这一点从叶若夫在私人笔记本上所作的记录中可以看出。根据部分笔记的特点，可以确知，他记录的是从斯大林那里得到的指示。在一本这样的私人笔记本上写有这样文字：“对沃洛维奇的特别审讯。”

1937年4月27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成功地从沃洛维奇口中得到了关于图哈切夫斯基参与了 this 阴谋并保证用军队的力量来支持这个阴谋的供词。

从盖伊、普罗科菲耶夫以及沃洛维奇案件的材料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供词的共同特点是不具体，而且很矛盾。此外，这些供词都是借助于欺骗、挑唆以及暴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这些供词没有经过法庭的验证，因为普罗科菲耶夫、盖伊和沃洛维奇已经于1937年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按“特别的程序”被枪决了。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二局副局长、当时已被逮捕的扎尔佩捷尔在1939年2月10日所作的记录暴露了盖伊和普罗科菲耶夫的供词是利用非法手段获取的：

---

<sup>①</sup> Г.Г. 亚戈达 (1891~1938)，1907 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 年起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会务委员，1924 年任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1934 年 7 月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是 30 年代大清洗的直接组织者。1936 年 9 月被免去内务人民委员职务，改任邮电人民委员，1937 年被免职并开除出党，1938 年 3 月在“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中被判处死刑。

“第二侦查局原局长尼古拉耶夫授权茹帕欣……审讯普罗科菲耶夫。根据尼古拉耶夫的授权，茹帕欣未对普罗科菲耶夫进行审讯……就编造出实际上是他自己写的普罗科菲耶夫的供词……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茹帕欣将这些‘供词’带到尼古拉耶夫的办公室交给了他，说：‘请看看弄得怎样’……尼古拉耶夫将这些‘供词’又修改了一下，使它们显得更加真实些……”

我和尼古拉耶夫‘开导’了在临近交出第一批供词的日期时仍然没有‘认罪’的盖伊。尼古拉耶夫对他说（当时我也在场）：‘您应该像普罗科菲耶夫那样做。审讯时叶若夫来到他面前，对他说：‘要提供证词’。普罗科菲耶夫像军人那样立正，回答说‘是’，并立即开始交待……’。”

“……在一个休息日，在列福尔托沃监狱审讯完一些犯人之后……尼古拉耶夫说，‘应该打盖伊的嘴巴，好让他交待些什么’，并命令将盖伊带来审讯。在将盖伊带来后，叶夫根耶夫没等盖伊回答，实际上根本还没有向他提出的问题……就开始打他……。”“在就亚戈达的案件审讯盖伊的过程中，有时是我提审盖伊，有时同尼古拉耶夫一起进行审讯。对待亚戈达案件基本上就如同对待斯大林的‘社会定货’一样，在第一次业务会议上，我就是这样理解叶若夫所说的，他在这次会议上给侦查员作了指示……在叶若夫答应保全盖伊的生命、向他宣称‘我保护你’之后，盖伊开始提供有关间谍活动方面的证词。”

从扎尔佩捷尔 1939 年的供词可以看出，他在被逮捕之前就表达过自己对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制造挑唆性案件的原因问题的看法。他写道：

“对各人民委员部的主要领导人（其中包括人民委员）的大规模镇压说明，斯大林是用专政的手段来管理国家，所有的问题都由他一个人来决定，他不能容忍对他的反对意见，不考虑其他人的意

见，并对反对他的人（对他提出批评的人）采取大规模的行动。这些人绝对不是反革命分子。关于这一点，在托洛茨基分子的文件，即所谓的《列宁遗嘱》之中，对斯大林进行了正确的评价，认为他容不得不同观点的人……这就是发生的事情，大批党员干部被无辜逮捕，最后他们自己诋毁自己，也提供虚假供词来诬陷别人。我认为这一点只能这样来解释……实际上这些人的命运在他们被逮捕之前就已在中央预先作出了决定，他们明白这一点并且认为，他们的处境是毫无希望的……（既然政治生命已经死亡，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说，肉体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他们实行了绝对的隔离（这一切都取决于侦查人员），主要采取刑讯逼供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可以提供任何针对自己的供词，并在侦查人员声称他们的同案人已经作了交待的情况下，把他们也写进了自己的供词中。”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原工作人员苏罗维茨基曾于1937年4~5月期间亲自审讯过沃洛维奇。他讲述了审讯沃洛维奇的情况。

在1961年12月20日致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解释报告中，苏罗维茨基（自1929年起为苏共党员）是这样写的：

“当时，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里所做的一切自始至终都是经过周密考虑和准备的挑拨行为……沃洛维奇在审讯时的表现证明，他已经事先被训练好准备提供需要的供词……叶若夫审讯了沃洛维奇……绝大部分姓名都是由雅尔采夫或者是根据他的指示由我提示给沃洛维奇的……罪犯供词的‘合理性’也由侦查人员来操纵。无论是对图哈切夫斯基，还是对阴谋的参加者，即准备由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阴谋的参与者，沃洛维奇的供词都是这样……我和雅尔采夫从沃洛维奇处‘获得了’关于图哈切夫斯基作为策划由军队来保障军事政变的阴谋的参加者的详细供词，也就是得到了存在着军事力量的证明并确认了叶若夫所需要的阴谋的‘可靠性和严重性’”。

尽管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能够证明在军队领导干部中存在着阴谋者，斯大林在五一阅兵式之后出席在伏罗希洛夫处举行的午宴时——当时有许多军事领导人在场——仍公开发出了对于似乎存在于军事领导人之中的敌人的威胁。关于斯大林的这个声明，工农红军侦察管理局原局长、军级干部乌里茨基在1937年9月27日给伏罗希洛夫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乌里茨基写道，“1937年5月1日阅兵式之后，在您的家里，领袖说，敌人将被揭露出来，党将把他们碾成粉末，我提议为那些忠诚的人干杯，为那些配得上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的庆典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干杯。”

为实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关于揭露军队中的敌人的指示，叶若夫极其希望获得关于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其他前托洛茨基分子、早在1936年8月就被逮捕的军级干部普里马科夫和普特纳、以及1934年由于浪费国家资金而被开除出党的工农红军对空防御管理局原局长军级干部梅德维杰夫的犯罪活动的供词。在叶若夫的一个笔记本里有这样的记录：“1. 攻击：利用亚基尔攻击普里马科夫。2. 梅德维杰夫对亚基尔。”

1937年5月6日被逮捕的梅德维杰夫在受审时承认，自己是托洛茨基军事组织的参加者，该组织的目的是在国内实现军事政变。1937年5月10日，梅德维杰夫在审讯记录上签了字。记录中说，他从军级干部瓦西连科<sup>①</sup>和斯莫林处得知，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普特纳、图罗夫斯基和普里马科夫是托洛茨基军事组织的领导人。

被逮捕的瓦西连科和斯莫林尽管遭到了毒打，但仍然没有承认

<sup>①</sup> 瓦西连科，马特维·伊万诺维奇（1888～1937），军级干部，自1935年起担任乌拉尔军区副司令。

梅德维杰夫的供词。梅德维杰夫本人提供的供词也是由于对其采取了肉体措施的结果（在法庭上他推翻了自己以前的供词）。

曾经参加审讯梅德维杰夫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莫斯科州管理局副局长拉济维洛夫斯基后来也被逮捕了，在1939年4月16日接受审讯时，他对叶若夫为制造工农红军中的军事阴谋案件所进行的活动是这样交待的：

“叶若夫授权我立即着手审讯被逮捕的工农红军防空管理总局原局长梅德维杰夫，并从他那里尽可能获取关于工农红军中的军事阴谋组织的参加者的口供。同时，叶若夫还直接指示我对梅德维杰夫采取肉体惩罚的手段，不必顾虑。叶若夫还特别强调说，在审讯梅德维杰夫的过程中，我应该使梅德维杰夫尽可能说出最大数量的军事领导人的名字。在对梅德维杰夫进行审讯时，我从他的供词中得知，他在被逮捕前三、四年就从工农红军中退役了，并担任某医院建筑工程副主任直到被逮捕。梅德维杰夫坚决否认进行了任何反苏活动，否认与工农红军中的军事集团有联系，说自从退役后就中断了与军队的关系。但是，我仍然完成了叶若夫和弗里诺夫斯基的命令，从梅德维杰夫的口中得到了关于存在军事阴谋、关于他是军事阴谋的参加者的供词。在接下来的一系列审讯过程中，特别是在遭到弗里诺夫斯基的毒打之后——当时叶若夫也在现场——梅德维杰夫提到了一大批著名军事领导人的名字。随着案件的进行，我看到并知道梅德维杰夫说出的这些关系都是他编造的。他多次对我、然后是对叶若夫和弗里诺夫斯基声明，他的供词是虚假的，与事实不符。但尽管如此，叶若夫还是将这份审讯记录上报给了苏共中央……根据叶若夫的命令逮捕梅德维杰夫……计划从他身上开始扩大工农红军中的军事阴谋案件。”

莫斯科对空防御兵团特别处原侦缉人员И.А. 萨洛夫（自1931年起为苏共党员）供认，他在列福尔托沃监狱里看到侦查人

员是怎样用橡胶棒毒打被逮捕的梅德维杰夫的。

1936年8月14日被逮捕的军级干部普里马科夫被关押在莫斯科的列福尔托沃监狱里，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他没有承认自己的任何罪行。在斯大林的档案中保存着普里马科夫的几份声明书，他在声明书中抗议对自己的非法逮捕。但是，他没能忍受住严刑拷打。1937年5月8日，他在列福尔托沃监狱写了给叶若夫的如下声明：

“在9个月的时间里，我在侦查人员面前拒不承认参加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这种拒不认罪的行为甚至达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即在政治局和斯大林同志面前也继续进行抵赖并千方百计减轻自己的罪过。斯大林同志说得非常正确：‘普里马科夫是胆小鬼。否认在这个案件中的罪过，就是怯懦的表现’。确实，从我这方面来说，这是怯懦的表现，也是对于欺骗行为的虚伪羞耻感。我以此信声明，在1930年从日本返回之后，我就同德列伊采尔和施密特建立了联系，而通过德列伊采尔和普特纳，又与穆拉奇科夫斯基建立了联系并开始进行托派活动，关于活动情况我已经向侦查人员做了充分的交待。”

普里马科夫对于侦查人员的强求和斯大林的愿望做出了妥协，开始走上了欺骗和提供假证词的道路。在1937年5月14日的审讯中，普里马科夫在提到自己的“同谋者”的名字时，供出了亚基尔：

“托洛茨基组织认为，亚基尔最适合取代伏罗希洛夫担任人民委员的职务……他们还认为亚基尔是极其隐秘的托洛茨基分子，允许他——亚基尔——与托洛茨基直接联系，并认为他可以完成对于我们来说是完全绝密的独立任务。”

在当天，叶若夫就将对普里马科夫审讯的记录转呈给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在所附的信函中，叶若夫写

道：

“呈上今年5月14日对普里马科夫的第一次审讯记录。兹通报：已逮捕加尔卡维、瓦西连科、图罗夫斯基、久克、加夫留申科、韦列热夫、萨维茨基、斯莫林、拉宾和奥利尚斯基。请求批准逮捕：1) 恰内谢夫（鞑靼第一师师长）；2) 科舍廖夫（第13军参谋长）；3) 凯尔贝纳（第75师师长）；4) 卡赞斯基（原第5步兵军军长）；5) 布特尔斯基（原高加索军区参谋长）；6) 克雷舍伊科（航空旅旅长）；7) 克洛奇科（原驻土耳其武官）；8) 泽涅克（列宁格勒坦克技术学校校长）。”

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继续对普里马科夫进行“加工”，于1937年5月21日成功地从他那里得到了“亲笔供词”，内称军事阴谋的首脑人物是与托洛茨基有联系的图哈切夫斯基。除此之外，在这次审讯中，普里马科夫还指供40名著名的军事工作者是军队中托洛茨基军事阴谋的参加者。

对于被逮捕的军级干部普特纳进行了昼夜不停的残酷审讯。1937年5月14日，普特纳被从布迪尔斯克监狱转移到列福尔托沃监狱，在那里对他进行了整夜的审问。最后普特纳招供，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9位著名的军事工作者是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的成员。

1937年5月16日，叶若夫将这份审讯记录呈给了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在所附信函中，叶若夫写道：

“呈上今年5月15日对于B.K.普特纳的审讯记录。普特纳交待，1935年，他将托洛茨基的一封信交给了图哈切夫斯基本人，信中公开建议其参加托洛茨基分子的阴谋。在看了这封信之后，图哈切夫斯基委托普特纳转告，托洛茨基可以信任他。普特纳供出的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的成员普里马科夫、库兹米切夫、施密特、拉宾均已被捕。被逮捕的还有：泽涅克——列宁格勒坦克技术学校

原校长；克洛奇科——原驻土耳其武官；戈罗泽斯基——滨海集团军物资供应局原局长；科尔涅尔——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外事局工作人员；阿达莫维奇——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

关于普里马科夫和普特纳在审讯期间曾遭到肉体刑罚，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局原工作人员、苏共党员布达列夫在1955年6月3日受审讯时是这样交待的：

“副局长卡列林和局长阿夫谢耶维奇命令我和其他工作人员同普里马科夫一起呆着，直到他提供供词为止。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他睡觉，逼迫他供认自己参加了托洛茨基组织。当时，每天只允许他睡2—3个小时觉，而且就睡在审讯他的办公室里，给他的食品也送到这个办公室里。就这样，不让他一个人呆着……在调查普里马科夫和普特纳的案件期间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人都是在列福尔托沃监狱遭毒打之后才提供了参加军事阴谋的供词。”

苏联国家全部原副部长、1932年入党的苏共党员的谢利瓦诺夫斯基在1962年12月10日向苏共中央做了如下通报：

“1937年的4月，普特纳和普里马科夫的案件移交给了阿夫谢耶维奇。阿夫谢耶维奇使用了极其野蛮和残酷的审讯手段，逼迫普里马科夫和普特纳提供关于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和费尔德曼的供词。普特纳和普里马科夫的这些供词成为1937年5月逮捕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费尔德曼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军事工作者的依据。阿夫谢耶维奇所领导的特别局的工作成为其他侦查人员的榜样。在此之后，阿夫谢耶维奇成为进行审讯罪犯工作的标准。军队中的军事阴谋就这样出现了。此后，根据斯大林和叶若夫的命令，大规模逮捕著名的军事工作者、苏共中央委员、著名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家的运动开始了。”

审讯普里马科夫和普特纳的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阿

夫谢耶维奇在致苏共中央的解释报告中是这样写的：

“……我同其他许多工作人员一样，在1937—1938年期间，即大规模逮捕军事工作人员期间，正好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局工作，并参加了审讯工作，毒打罪犯……在审讯时，问题和答案都是由列普列夫斯基<sup>①</sup>制定的，而写入审讯记录中的姓名都是由普里马科夫说出来的，普里马科夫所说的见面和交谈的意义被加重了，并被上升到阴谋活动的高度。

就这样，伪造出来了普里马科夫的供词，它涉及一大批著名军事工作者。”“罪犯普里马科夫和普特纳的意志被摧毁了……长期的单独监禁，监狱里极差的饮食……他们穿的不是自己的衣服而是破旧的布军服，不是皮靴而是破草鞋，长时间没有理发、刮胡须，转入……列福尔托沃监狱，最后被带到叶若夫面前，进行折磨，他们开始招供了。”

1937年5月中旬，开始了对著名军事工作者的新的逮捕。在被逮捕的人中有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二级集团军级干部科尔克和被任命为莫斯科军区副司令的集团军级干部费尔德曼。

科尔克是1937年5月14日夜间被逮捕的，在第一次审讯时，他否认自己参加了反苏活动。但在5月16日，他的反抗被摧毁了。科尔克写了两份给叶若夫的声明。在声明中科尔克写道，他是被叶努基泽<sup>②</sup>吸收参加右倾组织的，而右倾军事组织还包括普特纳、普里马科夫和图罗夫斯基的托洛茨基军事小组。与右倾军事小组有联系的还有图哈切夫斯基。接着，科尔克又写道，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在克里姆林宫发动军事政变。负责领导右倾军事小组的是他科尔

① 列普列夫斯基，时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局局长。

② 叶努基泽，阿韦尔·萨夫罗诺维奇（1877—1937），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18年起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1923—1935年间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

克、图哈切夫斯基和普特纳。

集团军级干部费尔德曼是1937年5月15日被逮捕的。在自己的声明中，他请求让他了解侦查人员手头的材料，并表示准备根据这些材料提供供词。他给侦查人员乌沙科夫写道：

“您和已经同我谈过话的特别局局长列普列夫斯基同志向我出示了参加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的指控，并建议我走上真心悔过的道路。请让我了解那些表明我参加上述组织的事实。此后，我就会很容易搞清楚这个问题。”

费尔德曼开始提供的有关军事阴谋的供词是极其矛盾的。例如，他在1937年5月16日供认，他是1934年被普里马科夫吸收参加托洛茨基军事组织的。过了3天，费尔德曼改变了自己的供词，确认托洛茨基军事小组的领导人是图哈切夫斯基，是图哈切夫斯基在1932年初吸收他参加这个托洛茨基军事小组的。

叶若夫于1937年5月20日将这份审讯记录呈报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叶若夫同时写道：

“呈上今年5月19日对原工农红军干部管理总局局长费尔德曼的审讯记录。”

费尔德曼供认，他是托洛茨基军事阴谋的参加者，是在1932年初被米·尼·图哈切夫斯基招募的。费尔德曼还说出了参加军事阴谋的其他人员：外高加索军区参谋长萨维茨基，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副司令库季亚科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党校原校长叶戈罗夫，工农红军工程学院院长斯莫林，工程管理局原局长助理马克西莫夫，装甲汽车坦克管理局原副局长奥利尚斯基——以上人员均已逮捕。请求讨论逮捕费尔德曼供出的其他阴谋参加者的问题。”被列入“其他阴谋参加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逮捕的人员有：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埃德曼以及其他干部。逮捕他们的行动是在1937年5月20日左右进行的。在1937年5月19、21、23日审讯费尔

德曼的记录中，有40多名指挥员和军队政治干部作为托洛茨基军事组织的参加者被提到。

侦查人员乌沙科夫（乌沙米尔斯基）表现出自己是讹诈和挑唆方面的能手，他与费尔德曼建立了信任关系，在监狱里给他创造了较为轻松的监禁制度，唆使费尔德曼提供一系列虚假的供词。

在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费尔德曼的以下短信：

“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5局局长助理乌沙科夫同志。季诺维·马尔科维奇！我所写的声明完全是根据本人的决断。我相信，您会召见我并亲自给我下指示。改写不会花太多时间……感谢您的关心和照顾——29日我收到了饼干、苹果、香烟，今天又收到了香烟。没说这些东西是谁送来的，但我知道是谁。费尔德曼。1937年5月31日。”

在费尔德曼短信提到的那个声明中，他再一次强调，准备满足侦查人员的要求、提供任何供词：

“请您，乌沙科夫同志，亲自召见我。我希望通过您，或者是列普列夫斯基同志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同志转达：如果红军需要，无论在谁面前，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准备发言并讲出我所知道的关于军事阴谋的一切。我准备经受这种涤罪（就像您把我与图哈切夫斯基的当面对质称为涤罪一样）。我要向你们——全体为把我救出泥潭而向我伸出帮助之手的人们——表明，您在第一次审讯时所作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即费尔德曼不是顽固不化的和不能改悔的敌人，为了使他认罪并帮助侦查人员打击阴谋集团，是值得对他做工作、花力气的。请您向伏罗希洛夫同志转达我的最后一个请求。费尔德曼。1937年5月31日。”

1938年，侦查员乌沙科夫本人也被逮捕。他在1938年10月11~12日的亲笔供词中谈到了审讯费尔德曼的情形：

“只有一份梅德维杰夫的间接供词涉及费尔德曼……在审讯费

尔德曼的第一天……他写了关于参加托洛茨基军事组织的一份声明，是普里马科夫招募他加入该组织的……根据仔细研究个人案情以及罪犯之间关系的原则，我从总部取出了费尔德曼的卷宗，并开始进行深入研究。最后我得出结论，费尔德曼与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以及其他一系列著名的干部有亲密的关系，并且同在美国的家庭还保持着联系。我明白了费尔德曼与图哈切夫斯基在军事阴谋方面的联系，并于5月19日清晨把他叫来进行审讯。同一天，我又被通知前往列普列夫斯基处参加业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大约30名参加审讯的工作人员。我被允许就审讯费尔德曼的结果进行发言，发言顺序大约是第10名。我介绍了费尔德曼的供词后，进行了分析并开始给侦查人员确定方针，即在审讯时应致力于揭露在工农红军队伍里无疑存在着的军事阴谋……协商会议一结束，我就叫来了费尔德曼。5月19日傍晚，费尔德曼给我写了一份众所周知的关于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埃德曼和其他人参加军事阴谋的供词。正是以这一供词为基础，联共（布）中央于5月21或者是22日作出了逮捕图哈切夫斯基以及其他一系列人员的决定。”

在逮捕图哈切夫斯基和亚基尔之前，国防人民委员部方面曾制定了“组织措施。”

1937年5月9日，伏罗希洛夫致函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请求批准新的任命。1937年5月1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

“批准：1. 苏联元帅亚·伊·叶戈罗夫同志为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2. 列宁格勒军区司令、一级集团军级指挥员鲍·米·沙波什尼科夫同志担任工农红军总参谋长；3. 基辅军区司令、一级集团军级指挥员约·埃·亚基尔同志担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8. 苏联元帅米·尼·图哈切夫斯基同志担任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同时解除他的副国防人民委员职务。”

1937年5月13日——这一日期可以根据办公室登记簿确定——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亲自接见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档案中没有发现任何记录斯大林与图哈切夫斯基谈话内容的资料。

在这方面具有一定意义的是，图哈切夫斯基的老同事、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H.И.库利亚布科在1937年6月所提交的报告，当时党组织在审查他的人事档案。库利亚布科是1918年图哈切夫斯基入党的介绍人，他向党组织说明了他从报纸上得知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的消息后前往他的住所探望他的情况。图哈切夫斯基对库利亚布科说，他被调到古比雪夫去的原因是他的熟人库兹明娜和他以前的办事人员是间谍并已被逮捕——在党中央委员会里就是这样通知他的。

就这样，在直接逮捕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以及其他军事活动家之前，就开始伪造对他们的虚假指控。

## 二、逮捕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及侦查和审讯

如上所述，在叶若夫的档案中发现了笔记本，其中记录了有关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各种指示。在其中的一个本子里有这样的笔记：“1. 图哈切夫斯基，2. 叶菲莫夫，3. 埃德曼，4. 阿波加<sup>①</sup>。”这些姓名的右边都有一个标记号“(a)”，这极有可能是代表“逮捕<sup>②</sup>。”在每一个姓名下面都打了勾号，代表已经完成这个命令。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军级干部叶菲莫夫、埃德曼和阿波加是同一天，即1937年5月22日被捕的。其中，图哈切夫斯基已经抵达新的工作地点，这天他已经在古比雪夫市，并在那里被捕，5月25

<sup>①</sup> 阿波加，恩斯特·弗兰采维奇（1898～1937），时任红军军事交通部部长，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委员。

<sup>②</sup> 俄文“逮捕”的第一个字母是 a。

日被押送到莫斯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监狱，狱中监禁号为94号。

图哈切夫斯基被逮捕的两天之后，1937年5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如下决议：

“将以下建议提交联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表决：‘联共（布）中央得到情报，表明联共（布）中央委员鲁祖塔克<sup>①</sup>和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参加了托派—右派反苏阴谋集团并从事反对苏联、帮助法西斯德国的间谍活动。鉴于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建议将鲁祖塔克和图哈切夫斯基开除出党，并将他们的案件移交内务人民委员部处理。以上建议提交联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表决。’”

1937年5月25~26日，联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进行表决，并形成了由斯大林签署的以下决议：

“根据揭示联共（布）中央委员鲁祖塔克和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参加托派—右派反苏阴谋集团并从事反对苏联、帮助法西斯德国的间谍活动的情报，将鲁祖塔克和图哈切夫斯基开除出党，并将他们的案件移交内务人民委员部处理。”

没有足够的资料说明图哈切夫斯基被押送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第一天在受审时的表现。对图哈切夫斯基的最初审讯记录或者是根本没有，或者是被侦查人员销毁了。但是，保留下来的侦查文件证明，在审讯的最初阶段，图哈切夫斯基否认自己参加了阴谋活动。

费尔德曼的声明可以证明图哈切夫斯基在这个阶段的表现：

“我很有把握地猜到，图哈切夫斯基被逮捕了。我还想，如果他落入侦查人员的手里，他就会讲出一切——这样做或许在国家面

<sup>①</sup> 鲁祖塔克，扬·埃内斯托维奇（1887~1938），1923年起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26~1937年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

前多少还能赎回自己深重的罪恶。但在当面对质时我见到他并听到他说他否认一切，说这一切都是我捏造的……。”

有一份图哈切夫斯基在1937年5月26日写的关于同普里马科夫、普特纳以及费尔德曼当面对质的声明：

“我同普里马科夫、普特纳以及费尔德曼进行了当面对质，他们指控我是托洛茨基反苏军事阴谋的领导人。我请求向我提供阴谋的其他参加者指控我的供词。我有义务提供坦率的供词。”

在图哈切夫斯基的案卷侦查资料中以及其他的卷宗中，均未发现记录图哈切夫斯基与普里马科夫、普特纳和费尔德曼对质的材料。

在注明日期为1937年6月1日的图哈切夫斯基的亲笔供词和审讯记录中，图哈切夫斯基在评论自己在侦查开始时的表现时证实：

“我曾坚决地、多次地试图否认自己参加军事阴谋以及进行反苏活动的某些事实。”

有关侦查工作的档案资料表明，图哈切夫斯基的这种表现相当短暂。所采取的全部措施摧毁了他的抵抗能力。叶若夫直接领导了对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侦查工作；他还使用了受过严格训练的造假者列普列夫斯基、乌沙科夫等人作为侦查人员。这些人已经丧失了人的概念，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采取了各种各样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拷打以摧毁犯人的意志力，从而得到假供词。图哈切夫斯基落入了这种境地，被关押几天后，便明白自己的处境是毫无希望的，遂于1937年5月26日写了以下声明：

“……我声明，我承认存在着托洛茨基反苏军事阴谋，我是这个阴谋的领导人……这个阴谋开始于1932年。”

1937年5月29日，叶若夫审讯了图哈切夫斯基。这次审讯的结果是产生了图哈切夫斯基的以下供词：

“还在1928年，我就被叶努基泽吸收到右倾组织中。1934年，我本人与布哈林建立了联系。自1925年起，当我去德国参加学习和演习时，我就与德国人建立了间谍关系……在1936年，我去伦敦旅行时，普特纳安排我与谢多夫见面……在军事阴谋方面，我还与费尔德曼、加米涅夫、亚基尔、埃德曼、叶努基泽、布哈林、卡拉汉<sup>①</sup>、皮达可夫、斯米尔诺夫、亚戈达、奥谢皮扬等人建立了联系。”

接着，自1937年6月1日到10日期间，他们迫使图哈切夫斯基亲笔描述了阴谋的组织情况以及使红军遭受失败的计划。这些供词都提交给了斯大林。只是在诉讼程序之后，这些供词才被归入案宗。

这些材料揭示了图哈切夫斯基被迫提供假供词的原因。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1956年入党的苏共党员费尔通报说：

“在2号楼的走廊里，我亲眼看到了图哈切夫斯基，他被带到列普列夫斯基处进行审讯。他穿着漂亮的灰色制服，而外面却套着囚犯的粗呢号衣，脚上穿着树皮鞋。正如我所理解的那样，给图哈切夫斯基穿上制服是为了污辱他。对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案件的全部侦查工作很快就结束了……除了采取肉体刑罚措施以外，侦查人员的劝说对于得到供词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研究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过程中，发现他的供词中有几页上面有深褐色的点，因此对卷宗里的这几页进行了法医鉴定。苏联国防部军医管理局中央法医实验室1956年6月28日的结论报告中说：

“在第967581号卷宗的第165~166页上的斑点被查明是血迹

<sup>①</sup> 卡拉汉，列夫·米哈伊洛维奇（1889~1937年），苏联外交家。曾任副外交人民委员，驻中国全权代表，驻土耳其大使。

……一些血点还带有惊叹号的形状。这种形状的血点通常是血从运动着的物体上落下而形成的，或者是水滴以……角度落在纸面上。”

上面提到的侦查员—造假者乌沙科夫本人也于1938年9月被逮捕。乌沙科夫试图证明自己“有功”，吹嘘说：“我挖出了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和其他人。”在1938年9月23日的供词中，乌沙科夫写道：

“我同列普列夫斯基一同调到莫斯科，那是在1936年12月……从最初的日子我就明确断定，在工农红军和海军中存在着托洛茨基军事组织，我认真地制定了揭露这个组织的计划，第一次就从里海军区舰队原指挥员扎库普涅夫口中获得了这样的供词……。我……充满信心地进行揭露反苏军事阴谋的工作。同时，我还在另一个部门坚定地做埃德曼的工作，这里我也同样没有错。还得说一说，鲍·米·费尔德曼也是在我这里承认参加反苏军事阴谋的（见1937年5月19日审讯费尔德曼的记录）。正是根据他的供词，才于该月的22日开始逮捕叶菲夫和其他人的行动。5月25日，指定由我来审讯图哈切夫斯基，26日他就招供了，而30日我又获得了亚基尔的供词。我独自一人对付这三个人，没有助手（或者是‘同伴’），只有给我的指示，即过几天案件必须结束审讯。为了从他们身上获取更多的事实、更多的阴谋者，我几乎没有睡过觉。甚至在进行诉讼程序的当天清晨，我还从图哈切夫斯基口中问出了关于阿帕纳先科<sup>①</sup>等其他人的补充供词。”

在这“其他人”之中，就有铁木辛哥<sup>②</sup>。

集团军级干部埃德曼是在1937年5月22日被逮捕的，同图哈

<sup>①</sup> 阿帕纳先科，约瑟夫·罗季奥诺维奇（1890—1943），1935—1937年间担任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

<sup>②</sup> 铁木辛哥，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1895—1970），苏联元帅（1940）。国内战争期间任骑兵旅长、师长，1935—1937年间任基辅军区副司令。

切夫斯基一同被送进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内部监狱，第二天又被转入列福尔托沃监狱。5月25日就出现了埃德曼给叶若夫的声明，在声明中他表示同意“帮助侦查人员”揭露犯罪活动。根据表面现象判断（笔迹不整齐以及在句子中漏掉了许多字母），这份声明是在神经受到极大震荡的状态下写成的，而这种震荡是侦查人员采用了肉体刑罚的结果。

1937年5月28日，叶若夫将埃德曼的供词提交给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并附有以下信函：

“呈上今年5月27日对苏联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原主席罗·彼·埃德曼的审讯记录。埃德曼供认，他是被图哈切夫斯基吸收参加托洛茨基反苏军事阴谋的，并进行了积极的破坏工作。埃德曼还供出了托洛茨基军事阴谋的其他参加者：费尔德曼、叶菲莫夫、彼得松、科尔克、戈尔巴乔夫、费什曼、奥谢皮扬和沃尔佩。由埃德曼招募参加托洛茨基军事阴谋的还有：……别利茨基，……瓦斯卡诺夫……（接下来又说出了苏联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的13名工作人员）。请求批准逮捕埃德曼所说的‘苏联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系统内参加军事阴谋的全体人员。”

获得了逮捕的许可令，叶若夫在这份文件的副本上写道：“立即逮捕埃德曼所说的苏联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系统的全体人员（中央的和地方的）。叶若夫。”

原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卡尔佩斯基交待了有关对埃德曼使用非法加工手段、使他处于不能自制状态的情况：

“埃德曼否认自己与军事阴谋有什么联系，声明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强调这样的指控既不符合他一生的品行、也不符合他的观点。

……对埃德曼进行了威胁：如果他继续顽固下去并对侦查人员隐瞒他的阴谋行动，那么将对他进行肉体上的刑罚……阿加斯说，

如果埃德曼现在不招供，那么他阿加斯将在另一个地方继续审讯他，但是将采用另一种方法进行审讯。埃德曼沉默不语。于是，阿加斯停止了审问，并对埃德曼说，他会埋怨自己的：将把他投入监狱，在那里会制服他的顽固态度……大约三天之后的一个白天，我被告知立即前往列福尔托沃监狱，阿加斯在那里等我。于是我赶到那里。我是第一次来这个监狱……，那天在列福尔托沃监狱所看到和听到的，超出了我的所有想像。监狱里充满了难以想像的嘈杂，从侦查人员的办公室里传出了侦查人员的尖叫声、呻吟声——不难理解，这是被打的人所发出的……我找到了阿加斯的办公室。埃德曼面对着他坐在桌子后。与阿加斯并排坐着的还有列普列夫斯基……杰尔加乔夫。埃德曼的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份他写好的给叶若夫的声明，他在声明中承认自己参加了军事阴谋并准备坦白交待。”“过了一两天，我在列福尔托沃监狱重新叫来埃德曼进行审讯。但是在这次审讯时埃德曼表现得有点怪，回答问题很呆板，驴唇不对马嘴，总是被不相干的思想吸引，听到工作马达的响声，埃德曼甚至叫起来：‘飞机，飞机’。我没有作审讯记录，接着，大概是向阿加斯做了汇报，说埃德曼处于某种异常的状态，应该对他的供词进行审核……此后，埃德曼实际与我已经毫不相干了，后来由阿加斯对他进行审讯。”

1937年5月28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了一级集团军级干部亚基尔。在叶若夫的笔记本里有这样的话：“在前往莫斯科的旅途中逮捕亚基尔。”与这句话并排着打了一个勾，这表明命令已经执行。第二天，也就是1937年5月29日，正在去莫斯科途中的一级集团军级干部乌博列维奇在维亚济马车站，在火车里被逮捕了。亚基尔和乌博列维奇被送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内部监狱里，并被关押在带字母牌号的单人牢房里。

在逮捕了亚基尔和乌博列维奇之后，根据1937年5月30日的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然后在1937年5月30日至6月1日经联共（布）中央委员以及中央候补委员表决形成并由斯大林签署了如下决议：

“批准中央政治局以下建议：鉴于联共（布）中央得到的材料表明联共（布）中央委员亚基尔和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乌博列维奇参加了托派—右派的法西斯军事阴谋，从事有利于德国、日本和波兰的间谍活动，将他们开除出联共（布）的队伍，并将他们的案件移交内务人民委员部审理。”

在审讯过程中，起先亚基尔和乌博列维奇不承认他们是有罪的，但是这些审讯都没有形成记录。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原工作人员 A.Φ. 索洛维约夫（自1918年起为苏共党员）1962年11月29日致苏共中央的解释函中写道：

“我亲眼看到，他们把乌克兰军区司令亚基尔带到了列普列夫斯基的办公室。当时，亚基尔穿着制服，但已经被摘掉领章，没有皮带，军服敞开着，他的表情是衰伤的，显然，列普列夫斯基以及他周围的人已经毒打了他。这次审讯，亚基尔在列普列夫斯基的办公室里呆了2~3个小时。”

为了迫使亚基尔提供假供词，让他与科尔克进行了当面对质。1937年5月30日，在进行这次对质时，科尔克确认，1931年他与亚基尔参加了军事阴谋的领导小组。对此亚基尔回答说：

“我坚决否认这一点。我历来就知道，科尔克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人，我不想说得更尖刻，但是我从来也没有设想过，他简直就是一个挑拨离间者……今年4月在图哈切夫斯基住所的一次聚会上，我们确实是在一起，但这什么也不能说明。”

叶若夫直接参加了对亚基尔进行“加工”并从他的口中获取假证词的行动。在已经被归入卷宗、但没有完成也没有签字的亚基尔给叶若夫的声明中写道：

“5月30日，您以详尽明确的侦查材料向我证明，再继续顽抗下去是没有任何出路的……我将在自己的供词里讲述我所知道的一切事情以及托洛茨基右倾阴谋的所有参加者，以协助彻底粉碎这个可恶卑鄙的组织。”

在亚基尔签了字的1937年5月31日的声明中写道：

“我愿意……帮助加快侦查工作，讲出有关军事阴谋的一切事情，以便使苏联政府相信我已经彻底解除了武装。”

在接下来的7天之中，乌沙科夫从亚基尔那里获得了6份他的亲笔供词并形成了2份审讯亚基尔的记录文件。

1937年5月30日，科尔克与乌博列维奇进行了当面对质。在对质时，科尔克甚至强调说，乌博列维奇在1931年就参加了右派-托派组织。乌博列维奇对科尔克进行了反驳，他声明：

“我坚决否认。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从来没有与科尔克进行过有关反革命组织的任何谈话。”

但是，乌博列维奇的假供词是迫切需要的，必须用强制手段迫使他提供这些供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局原工作人员阿夫谢耶维奇交待说：

“1937年5月，在一次协商会议上，特别局局长助理乌沙科夫向列普列夫斯基汇报说，乌博列维奇不愿意提供供词，列普列夫斯基在协商会议上命令乌沙科夫对乌博列维奇采取肉体刑罚措施。”此后不久，乌博列维奇就签署了两份给叶若夫的声明，承认自己参加了军事阴谋。他在审讯记录上也签了字，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斯大林每天都亲自过问军事阴谋案件的侦查问题，阅读审讯罪犯的记录；几乎每天都接见叶若夫，而在1937年5月21日和28日，还接见了副内务人民委员、直接参加了伪造指控的弗里诺夫斯基。

1937年5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

“鉴于加马尔尼克和阿伦什塔姆与因参加法西斯军事阴谋而已  
被开除出党的亚基尔有密切的联系，解除加马尔尼克和阿伦什塔姆  
在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并将其开除出军事委员会。”

当时，加马尔尼克由于生病正在家中休养。1937年5月31  
日，根据伏罗希洛夫的命令，工农红军政治部副部长布林和国防人  
民委员部总务局局长斯莫罗季诺夫来到加马尔尼克的家中，向他宣  
布了国防人民委员部关于将他开除出工农红军的命令。他们离开之  
后，加马尔尼克就开枪自杀了。第二天，《真理报》和其他的报纸  
都作了如下报道：

“与反苏分子有联系的原联共（布）中央委员扬·鲍·加马尔尼  
克，显然是害怕被揭露，于5月31日自杀身亡。”

自1937年6月1日至4日，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有联共（布）  
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会上  
讨论了伏罗希洛夫《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揭露工农红军中的反  
革命阴谋》的报告。除了军事委员会的常任委员以外，出席会议的  
还有116名来自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地方和中央机构的军事工作人  
员。必须指出的是，截止到1937年6月1日为止，已有20名军事  
委员会成员，即军事委员会成员的四分之一，已经作为“阴谋者”  
被逮捕了。

在军事委员会开始工作之前，所有的与会者都已经熟悉了图哈  
切夫斯基、亚基尔以及其他一些“阴谋者”的供词。自委员会开始  
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形成了一种紧张的气氛。

伏罗希洛夫在报告中广泛采用了侦查过程中所获得的被捕者的  
假供词，他强调说：

“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揭露了红军中存在已久并不受惩罚地进  
行活动的法西斯反革命组织，这一组织隐藏得很深，它是由军队首

脑人物领导的”……

“这些人——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等人——之间的关系很密切，这一点我们都知道，已经不是秘密了。但是，从密切——甚至从这种集团性的密切——到反革命之间的距离是很大的……去年5月份的时候，在我的家中，图哈切夫斯基对我和布琼尼进行指责，似乎是我把一伙人纠集在自己的周围，同他们一起行动、左右政策，等等。当时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以及其他一些人都在场。此后，第二天，图哈切夫斯基否认了自己所说的一切……当时，斯大林同志还说，应该停止个人之间的争吵，应该召开政治局会议并在会议上仔细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这次会议上，我们研究了所有这些问题，并又回到了从前的结论。

斯大林：他不承认自己发出的指责。

伏罗希洛夫：是的，他不承认，尽管亚基尔和乌博列维奇这一伙人对我的态度含有相当的敌意。乌博列维奇还保持沉默，而加马尔尼克和亚基尔对我非常憎恶。”

在报告中伏罗希洛夫号召“对军队进行审查和清洗，真正做到不漏掉每一个环节……”，他预先警告说，这次清洗的结果“在数量上形式上可能是我们将遭受很大的损失。”

接着，伏罗希洛夫又说：

“我作为人民委员……应该坦率地说，不仅没有发现这些卑鄙的叛徒，甚至在其中一些人（戈尔巴乔夫、费尔德曼以及其他一些人）已经被揭露的情况下也不愿意相信，这些表现无可挑剔的工作人员会作出这样可怕的犯罪勾当。在这方面，我的错误是巨大的。但是，我不能指出哪怕是一次来自你们的提醒，同志们……我再重复一次，没有人、没有一次向我和党中央委员会提醒过，在工农红军中存在着反革命阴谋分子……（同上，第66页）。”

1937年6月2日，斯大林在军事委员会作了报告。他引用了犯罪分子本人的供词，并得出结论：国内存在着一个“由德国法西斯鼓动并提供财政支持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军事政治阴谋。”他确认，这个阴谋的领导人是托洛茨基、李可夫、布哈林、鲁祖塔克、卡拉汉、叶努基泽、亚戈达，而在军事部门中有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埃德曼和加马尔尼克。

斯大林说：“这是军事政治阴谋的核心，这个核心与德国法西斯分子，特别是德国国防军有着系统的联系，这个核心的全部工作都是为了满足法西斯分子的意愿和要求。”

斯大林确信，他点到的这个阴谋的13个领导人之中的10个，也就是除了李可夫、布哈林和加马尔尼克之外，全都是德国间谍，而某些人还是日本侦查机关的间谍。例如，斯大林在谈到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被逮捕的军人时说：

“他把我们的作战计划——作战计划是我们最神圣的东西——出卖给德国国防军。还同德国国防军的代表会面。是不是间谍？当然是间谍……亚基尔定期向德国参谋部通报信息……乌博列维奇不仅同朋友、同事一起干，有时还亲自通报信息。卡拉汉是德国间谍。埃德曼是德国间谍。科尔克还在当驻德国武官时就开始给德国参谋部通报信息了。”

根据斯大林所说，鲁祖塔克、卡拉汉、叶努基泽是被丹麦人约瑟芬纳·根泽（恩森）——她是为德国国防军工作的德国间谍——招募的，她还“协助招募了图哈切夫斯基。”斯大林的这些结论——正如现在从核查材料中所看出的那样——是以假的、完全不应该相信的供词为基础的，况且根本就没有针对图哈切夫斯基的这类供词。

在自己的讲话中，斯大林利用假的侦查材料诋毁了一大批苏联军事活动家，把他们称为似乎是由德国国防军策划的军事阴谋

的参加者。斯大林在军事委员会中指责这些人从事间谍活动，宣称：

“这是军事政治阴谋。这是德国国防军亲自策划的阴谋。我认为，这些人是傀儡，是德国国防军手中的玩偶。德国国防军希望我们这里出现阴谋，我们的这些先生们就着手制造阴谋。德国国防军希望这些先生们系统地给他们提供军事机密，这些先生们就把军事机密通报给他们。德国国防军希望推翻和颠覆现存的政府，这些先生们就做这件事，但没有成功。德国国防军希望在战争爆发时一切都已就绪，军队中的破坏活动将使军队无力防御，德国国防军希望这样，这些先生们就准备了这件事。这是一伙间谍，是由 10 个货真价实的间谍和 3 个间谍教唆犯组成的苏联政治军事阴谋的领导核心。这是一伙德国国防军的间谍。这就是最根本的东西。出现这个阴谋不是因为具有内部土壤，而是因为具有外部条件；不是因为我们的国家的内部政策，而是因为德国国防军的政策。他们想把苏联变成第二个西班牙，并寻找和招募从事这项活动的间谍。情况就是这样。”

斯大林在宣布军事系统内已经有 300~400 人被逮捕之后，指责说军事阴谋案件被“马马虎虎地放过了，我们自己很少从军队中揭露出什么人。”他还宣称，我们军事系统的侦察机构不好，力量很薄弱，并混进了许多间谍；在我们的契卡侦察机关内部出现了一批为德国、日本和波兰工作的人。

斯大林对于缺乏来自地方的揭发材料表示不满，他要求得到这样的信息，说“哪怕只有 5% 是真实的，也就不错了。”

军事委员会会议的参加者确信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论点，认为被捕者本人的供词都是可信的，他们强烈地谴责了“阴谋分子”，并保证自己对党和政府无限忠诚。但是，在伏罗希洛夫的报告后作了发言的 42 人中，不久又有 34 人作为阴谋者遭到逮捕。他们是：

Я.И. 阿尔克斯尼斯<sup>①</sup>，И.П. 别洛夫<sup>②</sup>，В.К. 布柳赫尔<sup>③</sup>，  
Г.Г. 博基斯<sup>④</sup>，М.В. 维克托罗夫<sup>⑤</sup>，Я.П. 盖利特<sup>⑥</sup>，И.М. 格林贝格，  
И.К. 格里亚兹诺夫<sup>⑦</sup>，И.Н. 杜博沃伊<sup>⑧</sup>，К.И. 杜舍诺夫<sup>⑨</sup>，  
П.Е. 德宾科<sup>⑩</sup>，А.И. 叶戈罗夫<sup>⑪</sup>，А.И. 日利佐夫，И.К.

- ① 阿尔克斯尼斯·雅科夫·伊万诺维奇（1897～1938），1937年起担任空军副国防人民委员，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成员。
- ② 别洛夫·伊万·潘菲洛维奇（1893～1938），时任白俄罗斯军区司令。
- ③ 布柳赫尔，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1890～1938），苏联元帅（1935），1916年入党，曾在俄国旧军队中服役，内战期间任师长，远东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国防部长、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战争结束后担任过军长，列宁格勒筑垒区司令，1924～1927年奉派到中国担任孙中山革命政府的首席军事顾问，回国后任乌克兰军区副司令，1929～1938年期间为红旗特别远东军司令。
- ④ 博基斯，占斯塔夫·古斯塔沃维奇（1896～1937），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8年参加红军，1924年毕业于军事后勤学院。时任红军摩托化和装甲车辆部部长。
- ⑤ 维克托罗夫，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1893/94～1938），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20～30年代先后担任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黑海舰队司令、太平洋舰队司令，时任工农红军海军司令。
- ⑥ 盖利特，扬·彼得罗维奇（1894～1938），曾是俄国旧军队少尉，内战期间曾任副师长、师长，20～30年代先后担任军长和西伯利亚、北高加索、莫斯科等军区的副司令。
- ⑦ 格里亚兹诺夫，伊万·肯索里诺维奇（1897～1938），内战期间曾任旅长、师长，30年代任军区司令。
- ⑧ 杜博沃伊，伊万·纳乌莫维奇（1896～1939），一战期间曾在俄国旧军队服役，内战期间任师长，20～30年代任军长、乌克兰军区副司令，时任哈尔科夫军区司令。
- ⑨ 杜舍诺夫，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1895～1940），曾参加十月武装起义，时任北方舰队司令。
- ⑩ 德宾科，巴维尔·叶菲莫维奇（1889～1938），苏联军事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191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作为陆海军事务委员会委员进入人民委员会。1928～1938年间任中亚军区、伏尔加军区、西伯利亚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司令。
- ⑪ 叶戈罗夫，亚历山大·伊里奇（1883～1939），曾是俄国旧军队中校，内战期间曾任全俄总参谋部政委、集团军司令、方面军司令，20～30年代先后任一些军区的司令、红军参谋长，时任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

科扎诺夫<sup>①</sup>，П.Н. 克里沃鲁奇科，Г.И. 库利克，Д.А. 库钦斯基<sup>②</sup>，М.К. 列万多夫斯基<sup>③</sup>，И.М. 卢德里，М.П. 马格尔，А.И. 梅济斯，К.М. 梅列茨科夫，И.Г. 涅罗诺夫，Г.С. 奥库涅夫，А.И. 谢佳金<sup>④</sup>，А.К. 西夫科夫，И.Е. 斯拉文<sup>⑤</sup>，П.А. 斯米尔诺夫，М.О. 斯捷潘诺夫，Б.У. 特罗扬凯尔<sup>⑥</sup>，С.П. 乌里茨基<sup>⑦</sup>，И.Ф. 费季科<sup>⑧</sup>，В.В. 赫里平，В.Н. 舍斯塔科夫。

1937年6月5日，斯大林接见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正是在那一天，从一大批1937年5月被逮捕的军人中挑选出了“军事阴谋”案件诉讼的被告，他们是图哈

- ① 科扎诺夫，伊万·库兹米奇（1897 - 1938），曾任黑海舰队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太平洋舰队司令，时任黑海舰队司令。
- ② 库钦斯基，德米特里·亚历山大罗维奇（1898 - 1938），曾是俄国旧军队军官，作为布尔什维克参加了国内战争，20 - 30年代先后担任乌克兰军区参谋长、总参谋部军事学院院长。
- ③ 列万多夫斯基，米哈伊尔·卡尔洛维奇（1890 - 1938），曾是俄国旧军队军官，内战期间担任过一些集团军的司令，20 - 30年代先后担任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红旗高加索集团军司令、西伯利亚军区司令。
- ④ 谢佳金，亚历山大·伊格纳捷耶维奇（1893 - 1937），国内战争期间曾任团长、旅长、师长、喀琅施塔得要塞司令、彼得格勒筑垒区司令，20 - 30年代担任过集团军司令、伏尔加军区司令等职。
- ⑤ 斯拉文，约瑟夫·叶列麦耶维奇（1893 - 1938），国内战争期间历任旅长、师长、军区政治部主任，20 - 30年代担任过几个军区和军事院校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委员。
- ⑥ 特罗扬凯尔，别涅季克特·乌斯季诺维奇（1901 - 1938?），内战期间曾任彼得格勒党委宣传鼓动部部长，后来到前线工作，20 - 30年代先后任师政委、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红军政治部文化宣传部部长、空军政治副司令、民航政治部主任、莫斯科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
- ⑦ 乌里茨基，谢苗·彼得罗维奇（1895 - 1937），曾在俄国旧军队中服役，内战期间曾任红军参谋部情报部作战处长、旅长。20年代初从红军军事学院毕业后奉派出国执行任务，回国后相继在院校和野战部队任职，1935年开始担任红军情报部部长。
- ⑧ 费季科，伊万·费奥多罗维奇（1897 - 1937），20 - 30年代曾先后担任过红旗高加索集团军司令、伏尔加军区司令、基辅军区司令，时任副国防人民委员。

切夫斯基、亚基尔、科尔克、乌博列维奇、埃德曼和费尔德曼，而为了给这个案件赋予托派色彩，又将普里马科夫和普特纳列入其中，因为在1927年之前，他们确实与托洛茨基的观点相同。所有这些人的个人刑事案件在1937年6月5日这一天被合并成了一个案件。

1937年6月7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接见了叶若夫和维辛斯基<sup>①</sup>。正是在这一天，打印出了案件起诉书的最后文稿，并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的诉讼程序，由苏联最高法院候补成员布琼尼、沙波什尼科夫、别洛夫、卡希林<sup>②</sup>和德宾科进行了确认。接着，内务人民委员部采取措施立即结束军事阴谋案件的侦查工作。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8-1“6”，58-3，58-4，58-6，58-8和58-9章（背叛祖国、进行恐怖活动和策划军事阴谋罪等），1937年6月7日对普里马科夫提出起诉，6月8日对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费尔德曼和普特纳提出起诉。

1937年6月9日，维辛斯基与军事总检察长的助手苏博茨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对被关押者进行了简短的审问，确认了他们在受内务人民委员部侦讯时所提供的、带有检查机关签署的“可靠”字样的证词。斯大林的档案里保存着这些审讯记录的副本。在审讯图哈切夫斯基的记录上有这样的批示：“呈斯大林同志。叶若夫。1937年6月9日。”

在同一天，即1937年6月9日，苏博茨基向被告宣布侦讯已

① 维辛斯基，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1883～1954），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1920年脱离孟什维克加入俄共。1931年起为俄罗斯联邦检察长，1935～1939年担任苏联总检察长。

② 卡希林，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1888～1938），曾是俄国旧军队上尉，1931～1937年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委员。

经结束，但是他违反了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第 206 章的要求，未向他们提供刑事案件起诉书，也未说明 [他们] 具有要求检验案件全部材料以及进行补充侦查的权利。

在审判之前，允许被告向斯大林和叶若夫作最后的悔罪声明，以便造成一种幻觉，这样做可以保全他们的性命。被关押者利用了给予他们写这样的声明的机会。例如，亚基尔在 1937 年 6 月 9 日写道：

“亲爱的亲密的斯大林同志。我之所以胆敢这样称呼您，是因为我已经讲出了一切，奉献了一切，我觉得，我又重新成为一名真诚的、忠于党、国家和人民的战士，正如许多年来我一直是这样的战士一样。在我的整个有觉悟的生命历程中，我一直在为党和党的领导人进行忘我的诚实的工作，但后来却跌入了深渊，陷入了无法补救的成为叛徒的可怕境地……侦讯工作已经结束。我被指控背叛国家，我承认自己的全部罪行，我要进行彻底的忏悔。我无限信任法庭和政府的决定是正确和公平的……现在我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诚的，我将带着对您、对党和国家的热爱，对于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去死。”

在亚基尔的这份声明上有如下评语：

“我的个人档案。斯大林。”：“下流坯和出卖灵魂的人。约·斯·”：“绝对准确的结论。克·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对于这个恶棍、流氓和……只能有一个惩罚——判处死刑。拉·卡冈诺维奇。”

在军事阴谋案件结束侦讯的那一天，即 1937 年 6 月 9 日，斯大林两次接见了维辛斯基。第二次接见是在当天很晚的时候，22 点 45 分，当时在场的还有莫洛托夫和叶若夫。也是在这一天，维辛斯基签署了案件起诉书。

在起诉书中确认，1937 年 4~5 月，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揭露

并消除了莫斯科市的托洛茨基军事阴谋，加入这个阴谋的领导“核心”的是：加马尔尼克、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埃德曼和费尔德曼。这个案件的所有被告都加入了托洛茨基军事组织，该组织是按照德国总参谋部和托洛茨基本人的直接命令于1932~1933年期间成立的。该组织与托洛茨基中心和布哈林右倾分子集团建立了联系，从事颠覆、破坏和恐怖活动，并准备推翻现政府，夺取政权，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指控是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8-1“6”，58-8和58-11章认定的。同时，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认为，根据刑法典的第58-11章应该对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和其他4名被关押者提起公诉。

在23点30分，在斯大林接见了维辛斯基之后，莫洛托夫和叶若夫接见了《真理报》主编梅赫利斯<sup>①</sup>。1937年6月11日，《真理报》刊登的消息说，对图哈切夫斯基等人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案件的侦讯工作已经结束，不日将进行法庭审判，正如报道中所说的，这些人被指控“违背了军人的职责（誓言），犯有背叛祖国、背叛苏联人民、背叛工农红军的罪行。”

1937年6月10日，召开了苏联最高法院特别全体会议，听取了维辛斯基关于对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提出起诉的通报。全体会议决定成立审理这个案件的苏联最高法院专门法庭，其成员有：乌尔里赫、阿尔克斯尼斯、布柳赫尔、布琼尼、沙波什尼科夫、别洛夫、德宾科、卡希林和戈里亚切夫。

成立审理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案件的专门军事法庭，并吸收国家著名军事领导人参加这个法庭的倡议是斯大林提出的。挑选这些人绝不是偶然的。所有这些人都是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的成

<sup>①</sup> 梅赫利斯·列夫·扎哈罗维奇（1889~1953），1930年起在《真理报》编辑部工作，1937~1940年间任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

员，并在斯大林出席的军事委员会六月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阴谋分子”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和乌博列维奇。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原成员扎里亚诺夫曾经作为法庭秘书参加了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审判过程，他在自己的说明报告中写道：

“通过与乌尔里赫的谈话我明白了，这个特别法庭是根据斯大林的倡议成立的，其成员都是元帅和集团军司令。斯大林成立这个特别军事法庭的目的是提高法庭的威信和对判决正确性的确信无疑。”

1937年6月10日，召开了苏联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的筹备会议，核准了由维辛斯基起草的起诉书，并决定将图哈切夫斯基等人送交法庭。

也是在这一天，法庭书记员将起诉书的副本交给了所有被告，而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局局长列普列夫斯基签署并向叶若夫提交了组织警卫和保证庭审程序的计划。

侦查人员向被关押者榨取供词竟达到了如此地步，甚至在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案件已送交法庭之后，他们仍然要求被关押者提供有关其他军事领导人的证词，其中包括针对苏联高等法院特别审判厅法官本人的证词。就这样，1937年6月10日，从普里马科夫身上又获取了有损三名法庭成员名誉的供词，这三人是集团军级干部卡希林、德宾科和沙波什尼科夫。关于卡希林，普里马科夫是这样说的：

“1934年秋天，在莫斯科，我通过费尔德曼与阿拉弗佐建立了联系，同时他对我讲了有关科季茨基和卡希林的情况，他们也是阴谋的参加者。”

审讯过普里马科夫的侦查人员阿夫谢耶夫在解释报告中写道：

“在侦讯的最后阶段，列普列夫斯基把普里马科夫召来，交给他一份苏联军队一系列著名指挥员的名单，这些人的名字在普里马

科夫以前的供词中没有出现过。列普列夫斯基还以叶若夫的名义建议普里马科夫写出其中每个人的情况……这样，就出现了普里马科夫关于卡希林、德宾科、加马尔尼克、古比雪夫<sup>①</sup>、格里亚兹诺夫<sup>②</sup>、乌里茨基、科瓦廖夫<sup>③</sup>、瓦西里耶夫等人的供词。普里马科夫和其他被关押者当时胡说的这一切，是彻头彻尾的臆测，是由于违背了侦讯和审判的最基本法制原则而造成的……。当时，我们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斯大林将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叶若夫越过了联共（布）中央，只服从于斯大林并只执行斯大林一个人的命令。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直接隶属于斯大林的这种体制在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时代仍一直保留着，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在诉讼程序开始之前不久，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特别局召开了一次业务会议。会上，列普列夫斯基指示侦查人员对被告再一次进行劝说，以使他们在法庭上确认自己的供词，并使他们相信，在法庭上“认罪”可以减轻他们的厄运。伪造案件的侦查人员要陪同自己的被告出庭，在候审室和审判大厅里都要同被告们在一起。关于诉讼程序的准备工作，阿夫谢耶维奇是这样交待的：

“关于对图哈切夫斯基、普里马科夫等人案件的诉讼程序的准备工作，据我所知，在侦查工作结束之后，就召开了业务会议，这是在诉讼程序开始之前的1~2天之内。会上，列普列夫斯基命令

① 古比雪夫，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1893 - 1938），一战期间为俄国旧军队下级军官，内战中任旅长、师长，20~30年代先后任喀琅施塔得要塞司令、军长、莫斯科军区副司令、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南高加索军区司令等职。

② 格里亚兹诺夫，伊万·肯索里诺维奇（肯萨里诺维奇）（1897~1938），集团军级，1933~1938年期间担任外贝加尔军区和中亚军区司令。

③ 科瓦廖夫·米哈伊尔·普罗科菲耶维奇（1897~1967），苏芬战争期间为集团军司令，1941~1945年间为外贝加尔军区和方面军司令。

全体参加侦查工作的人员再对被告进行一次谈话并劝其在法庭上一定要确认自己在接受审讯时提供的供词。在审判前夕，我与普里马科夫进行了谈话，他答应在法庭上确认自己的供词。局里的其他工作人员也与其他一些被告进行了谈话。此外，还下达了指示，要求侦查人员与自己的被告一起出庭，在候审室里也要与被告呆在一起……接着我想报告的是，根据列普列夫斯基的指示，在开庭之前我又让普里马科夫熟悉了一下他的供词的副本。”

阿夫谢耶维奇在报告中还写道：

“……在诉讼程序开始前夕，被告被带到列普列夫斯基面前。列普列夫斯基向他们宣布说，明天将开庭审判，他们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他们在法庭上的表现。”

“在诉讼程序开始之前，普里马科夫被带去见叶若夫。在那里，很显然摸清了他的态度，他在法庭上将如何表现，他会怎样讲；他被说服了，他在法庭上的表现应该像在接受审讯时那样。他答应叶若夫，他在法庭上将彻底揭露阴谋家。”

关于诉讼程序的的这种准备情况，原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卡尔佩伊斯基也做了交待。

1937年6月11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在莫斯科秘密开庭审理了指控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案件。在宣读了起诉书之后，所有的被告都回答了审判长提出的问题，并声明承认自己的罪行。接着，被告们按照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要求，在法庭上确认了自己在受审时所提供的供词。

以下就是几例在庭审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情形。

根据组织者们的意图，亚基尔在庭审时的发言为其他被告指明了方向，即揭露托洛茨基和法西斯国家的反苏阴谋活动，并千方百计地强调图哈切夫斯基在这个阴谋活动中所起的作用。

但是，当布柳赫尔提出问题，要他具体说明为了使红军空军在

未来战争中遭到失败而进行的准备工作时，亚基尔回答说：“除了给侦查人员写的之外，我不能对您细说任何东西。”

在回答审判长关于“军事训练方面的破坏活动是怎样进行的”问题时，亚基尔含糊其词地说：“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在专门的信件中做了说明。”

在法庭上审问图哈切夫斯基和乌博列维奇是以提问题和回答问题的方式进行的，同时，乌尔里希还多次用自己的意见来打断他们。在法庭上，图哈切夫斯基不承认对自己的某些指控。当乌博列维奇开始否认关于自己进行破坏和间谍活动的指控时，法庭就中断了对他的审问，而在休庭持续了一个小时之后，再开庭时就转入审问其他被告了。

侦查人员对科尔克的供词寄予很大希望。为了进行庭审，对科尔克做了特别仔细的准备工作，并给他提供了作“揭露性”发言的机会，这个发言在法庭速记文件中有20多页。接着进行对埃德曼、普特纳和普里马科夫的审问，同样是以问答的方式进行的。法庭在审问埃德曼时，共向他提出了三个问题。

费尔德曼与科尔克一样，也是侦查机关寄予“希望”的一个。在接受审问之前，他向法庭提出了以下请求：

“我请求审判长公民允许我简短地（我不会占用您太多的时间）讲述一下我作为中心的成员所知道的情况以及我所做过的事情。我认为，这不仅对法庭有利，而且还有利于今天在场的所有指挥员。”

请求自然是被允许了。费尔德曼的发言有12页速记记录。

法庭对案件情况的调查都是表面的、不完全的。对被告所提出的问题带有片面性和提示性。法庭不仅没有消除被告供词中关于阴谋形成的时间、他们加入阴谋、阴谋“中心”的成员、实际进行的阴谋活动等诸多方面存在的矛盾，而且实际上甚至是掩饰这些矛盾，这一点在报告的以下章节中将谈到。

法庭没有要求出示任何客观的证明文件和证据，而这些文件和证据是鉴定所有指控所必须的。法庭没有传唤任何证人到庭，也没有吸收有威信的专家参加案件的审理工作。

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案件的整个诉讼过程都作了速记记录。但是，法庭速记记录的修改和校订都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工作人员进行的，这些工作人员就是进行侦查的那些人，其中包括案件的捏造者乌沙科夫—乌沙米尔斯基。速记记录中出现的许多被曲解的供词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庭审速记记录员之一的季莫费耶娃（自1938年起为苏共党员）将自己的记录原文与判读出的文稿进行了对比，她在1962年致苏共中央党的委员会的信中写道：

“我作为一名速记员参加了对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案件的诉讼过程……在提供给我的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案件的庭审正式速记记录第15卷、第154页上，不知道是谁添进了‘日本’总参谋部这句话，这样做的直接目的就是把这句话伪造成是图哈切夫斯基说的，这样就成了图哈切夫斯基在法庭上承认自己与日本总参谋部建立了联系。事实上，在我所做的法庭速记记录中，图哈切夫斯基并没有谈到这种联系，速记记录中并没有这句话……”

在正式的法庭速记记录文件的第144页（第15卷）上指出，费尔德曼向法庭交待：“当然，尽管我的情报同图哈切夫斯基等人交给德国人、日本人和波兰人的情报相比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应该承认，我进行了间谍活动，因为这些情报都是保密的。”这里也有捏造的东西，因为事实上在我所做的速记记录稿第133页上我是这样记录的：“当然，如果别人问我，那么是的，这是国事罪，是罪行，尽管这是些微不足道的资料，但这仍然是罪行，是对国家的背叛，应该这样称呼这件事。”

在法庭上作最后陈述时，所有的被告都在继续诽谤自己。与此同时，还发誓热爱和忠诚于祖国、党和斯大林。

他们的命运已被事先注定。原法庭书记员扎里亚诺夫说：

“乌尔里赫将诉讼程序的整个过程向约·维·斯大林做了汇报。这一点是乌尔里赫对我讲的。他说，斯大林已经下了命令，对全部被告处以最高刑罚——枪决。”

扎里亚诺夫关于斯大林接见乌尔里赫的说法，可以从1937年6月11日斯大林接见乌尔里赫的登记记录中得到确认。从记录中还可以看出，斯大林接见乌尔里赫时在场的还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叶若夫。

在审判那天，斯大林向各加盟共和国、各边疆区和各州下达了如下命令：

“各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各边疆区委员会和各州委员会。鉴于进行对间谍和破坏分子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等人的审判，中央建议你们组织工人集会、在可能的地方还有农民集会，以及红军战士集会，并作出必须采取最高镇压措施的决议。审判当在今天夜间结束。判决通告将于明天，即6月12日刊登。1937年6月11日。中央书记斯大林。”

1937年6月11日23点35分，主持审判的乌尔里赫宣读了判决书：判处8名被告人枪决，没收被告的全部个人财产并剥夺他们的军衔。

6月12日夜，乌尔里赫签署了给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警备司令伊格纳季耶夫的命令——立即对图哈切夫斯基等全部罪犯执行枪决。枪决的证明文件由参加执行判决的维辛斯基、乌尔里赫、采萨尔斯基以及伊格纳季耶夫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备司令布洛欣签了字。

审判后，布琼尼于1937年6月26日提交给斯大林一份书面报告，谈了对于整个诉讼过程的印象。他写道：

“从法庭审讯开始起，在宣读起诉书和其他被告的供词时，图

哈切夫斯基就直摇头，以此来强调无论是法庭还是侦查机关还是起诉书里所写的一切都不是完全正确的，是与事实不符的。换句话说，他做出不知情和受到不公正委屈的样子，尽管外表上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张皇失措和受到惊吓的人。大概，他没有料到这个组织这么快就被揭露并被粉碎，这么快就进行了侦查和审判……在审判大会上，亚基尔是阴谋的实质所在，这个阴谋的目的是在法西斯专政的基础之上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

在随后的被告发言中，事实上所有的人都未超出亚基尔发言的范围。

图哈切夫斯基在自己的发言中起先试图推翻预审调查时所交待的供词。图哈切夫斯基说，希特勒在德国进行法西斯政变之前，红军准备对付波兰并有能力摧毁波兰国家。但是，希特勒在德国掌权之后与波兰人结盟并将原来的 32 个德国师扩大到 108 个师，而红军与德国和波兰军队相比在数量上要少 60~62 个师……图哈切夫斯基试图在出席审判的听众面前叙述自己的似乎是有预见性的主张，并试图向政府证明，似乎没有人听他的意见，而业已形成的局势将导致国家的失败。但是，乌尔里赫同志根据特别法庭其他成员的建议，打断了图哈切夫斯基的发言并向他提出问题：图哈切夫斯基怎样把这个论据与他在预审时所交待的事实——即他与德国总参谋部有联系并自 1925 年起就是德国侦察机关的间谍——联系起来？当时，图哈切夫斯基声明说，当然别人可以认为他是间谍，但实际上他从来没有给德国提供过任何情报……

乌博列维奇在自己的发言中遵循的也是亚基尔发言的模式……

科尔克交待说，他知道一切，并说法西斯反革命军事组织的领导人认为与托洛茨基以及右倾分子的联系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埃德曼在法庭上什么也说不出来……普特纳，这真是一个地道的间谍，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交待说，在这个组织

里，他一直遵循的原则是忠诚地为阴谋家们工作，并且当时就连自己也好像不相信自己行动的正确性……从勇气的角度来说，普里马科夫在法庭上的表现是最好的……普里马科夫非常顽固地否认他领导了包括施密特、库兹米乔夫等人在内的针对伏罗希洛夫同志的恐怖主义小组……费尔德曼所交待的事情与科尔克交待的一样。”

在描述被告们最后陈述时，布琼尼指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普特纳以及费尔德曼说的都是他们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大墙内”已经承认并表示悔罪的东西。

在致斯大林的书面报告的结尾，布琼尼还写道：

“1.……为了掩盖自己的反革命间谍行为，被科尔克揭发的被告们试图把科尔克说成是撒谎者和头脑不清的人。2. 全体被告无疑都试图掩盖加马尔尼克参加了策划军事阴谋的活动……3.……尽管被告们声明说，他们没有来得及把失败主义的计划交给德国总参谋部，但我还是认为，使红军遭受失败的计划虽然可能不那么详细，但还是交给了德国侦察机关。”

军事法庭的另外一名成员别洛夫于1937年7月14日给伏罗希洛夫写道：

“资产阶级的道德可以解释一切——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在这次庭审过程中，一天的时间就胜过了我的整个人生，使我确信这种说法的欺骗性。所有这些匪徒的眼睛里什么都没有表现出来，根据这些眼睛是无法猜测坐在椅子上的被告们的极端卑鄙的。他们每个人的面貌总的说都是不自然的。在所有人的脸上都能看到死亡的印记。脸色基本上是所谓的土灰色……图哈切夫斯基竭力保持自己的“贵族派头”和相对于其他人的优越感……他试图表现自己宽阔的战略和战术眼界。他试图以回忆过去的共同工作以及他与法庭大多数成员的良好关系来打动法官们。他竭力将诉讼程序引向他是正面角色的方向，而将自己的叛徒行径引向无足轻重……”

乌博列维奇比前两个人显得要惊慌失措。他还穿着自己的制服上衣，但没有衬衣和领带，像个无业游民……

科尔克虽然穿着制服上衣，但看上去仍和平时一样像个士兵……费尔德曼竭力做出非常坦率的样子。按照诉讼程序，他指责了自己的同伙，说他们如同贵族学校的女学生一样，害怕一些事情暴露自己的名字；他们进行最通常的间谍活动，而在这里又希望把这变成是同外国官员的合法接触。埃德曼显得比所有的人都要可怜。他的身体软弱到了极限，非常困难地站着，他不是说话，而是用嘶哑的抽搐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嘟囔着。普里马科夫看上去十分消瘦，显得非常冷漠的样子，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他特别自信地站在那里……普特纳略为瘦了一些，但他的声音里已经没有了平常的那种自信……

所有人的最后陈述都很短。只有科尔克和费尔德曼说得稍长一些。费尔德曼和科尔克请求宽恕。费尔德曼最后甚至说：“如果不饶恕我们，哪还有对活着的人的关照呢？”其余的人都说：对此

述了……那些注定要死的同志们在临刑时都高呼：‘斯大林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现在，当苏维埃政权和党为这些意志坚定的人们彻底平反时，我们看到，甚至在面临不可避免的和不公正的死亡时，他们仍然勇敢而骄傲地声明，他们是作为共产党员而死去的。”

在处决了图哈切夫斯基等人之后，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各地都召开了会议和举行了集会，形成一种敌视他们的社会舆论。关于判决以及执行判决的公告在所有报纸上刊登，并在伏罗希洛夫给军队的命令中公布。整个这一案件误导了党的机关、军队组织以及苏联社会对于红军中的事态的认识，并过高评价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我国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在对图哈切夫斯基案件审判之后不久，以叶若夫为首的一大批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被授予了勋章。

### 三、对侦查和审判材料的分析

对刑事案件的分析表明，逮捕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以及其他军事活动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对他们的逮捕违反了苏联宪法，违背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要求，没有检察长的批准或者是法院的决议，完全是按照斯大林和叶若夫的个人意愿进行的。案件没有能够证明被告之中的任何一人犯有国事罪的客观证据。关于这些罪行的指控是虚假的，只是基于互相矛盾的被关押者“承认的”供词之上，而这些证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在对案件进行侦查时利用犯罪的手段强加给他们的。

#### （一）关于“军事阴谋”罪的虚假指控

对红军中军事阴谋的侦查没有任何客观依据。但是，侦查人员试图论证存在着军事阴谋，为此捏造了5个相互矛盾的关于军事阴谋产生情况的推断。根据这些推断，军事阴谋的出现是：1) 根据图哈切夫斯基的倡议，是为了实现他的波拿巴主义目的；2) 根据托洛茨基的命令；3) 根据右倾中心的指示；4) 根据托洛茨基 - 季

诺维耶夫集团和右倾组织的决定；5) 根据德国总参谋部的指令。

以下就是有关捏造军事阴谋产生情形的某些方面的事实。

1. 关于图哈切夫斯基具有波拿巴主义目的的虚假证词是从科尔克身上获得的。根据科尔克的确认，图哈切夫斯基似乎在1934年就曾经表示过赞成在国内建立军事专政，当时还有普特纳在场。图哈切夫斯基没有证实科尔克的这些供词。在普特纳的供词里也没有找到以上说法的证据。

在共同的工作中对图哈切夫斯基非常了解的伊谢尔松上校（自1919年起为苏共党员）、托多尔斯基中将（自1918年起为苏共党员）等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党性很强的人，波拿巴主义的思想对于他来说是格格不入的。特别是总参谋部作战部原副部长伊谢尔松就指控图哈切夫斯基具有波拿巴主义的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党委员会写了如下内容：

“当然，所有这一切——对于“反苏军事阴谋”的全部解释——都是拙劣的捏造。军事工作者珍视和尊重图哈切夫斯基非凡的军事才能……但图哈切夫斯基并没有任何个人的小圈子，也没有把所谓的‘特别偏爱的人’集中在自己的身边。顺便提一句，图哈切夫斯基对于指挥人员的任命没有施加任何影响，而且这些任命并不顾及他的愿望，相反经常是与他的愿望背道而驰的。正因为如此，图哈切夫斯基并没有可以依靠的人。毫无疑问，图哈切夫是明白自己的这种处境的，因此我觉得，在这种条件下他完全不可能会产生‘波拿巴主义’的倾向或思想。图哈切夫斯基是极其聪明的人，他不会不明白，在共产党独裁统治的条件下，哪怕是在这方面进行一点尝试，也会把自己悬在空中，最后招致灭顶之灾……图哈切夫斯基在军队里已经达到了最高地位并拥有了一切。”

托多尔斯基在自己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一书中正确地指出，诽谤性地把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具有波拿巴主义的企图强加在图

哈切夫斯基身上，是“对图哈切夫斯基进行政治诬陷的罪恶勾当”。“个人崇拜，——托多尔斯基接着写道，——不仅仅消灭了图哈切夫斯基，在许多年的时间里，它也损害了图哈切夫斯基的崇高威信，玷污了他美好的名字。”

2. 侦查机关竭力用捏造出来的关于图哈切夫斯基通过罗姆、普特纳、皮达可夫和普里马科夫与托洛茨基建立联系的供词来证明，军事阴谋是根据托洛茨基的指令而策划的。例如：关于图哈切夫斯基通过驻日内瓦的记者弗拉基米尔·罗姆与托洛茨基建立联系一事，被关押的费尔德曼于1937年5月23日写道：

“我推测，图哈切夫斯基是通过罗姆与托洛茨基联络的。1932年，当我与图哈切夫斯基一起前往德国的时候，在火车上他介绍我与罗姆认识。在火车离开莫斯科之前，图哈切夫斯基与罗姆在车站的站台上进行了秘密交谈。根据图哈切夫斯基与罗姆单独在一起以及在柏林会面等情况来判断，我的结论是，罗姆是图哈切夫斯基与托洛茨基之间的联络环节。”

侦查机关在得到了费尔德曼的这些推测之后，于1937年5月27日迫使图哈切夫斯基承认，他在1932年通过罗姆与托洛茨基建立了联系。图哈切夫斯基被迫在法庭上确认了这种捏造：

“1932年，罗姆向我转达了托洛茨基关于把托洛茨基分子干部集中起来的建议，我同意了这个建议。因此，我认为我们策划军事阴谋的行动始于1932年。”

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罗姆与托洛茨基和谢多夫有犯罪联系并与他们见面。罗姆是1936年被逮捕、1937年3月被判刑的，在图哈切夫斯基的卷宗中并没有他的供词；而从罗姆的卷宗中可以看出，他在自己的供词中根本没有提到图哈切夫斯基的名字。1958年2月，罗姆（自1918年起为苏共党员）得到身后平反。

普特纳也交待了关于图哈切夫斯基与谢多夫和托洛茨基的关

系。例如，他在接受审讯时说，1935年9月在伦敦，当他得知即将被召回莫斯科的消息之后，便将这一情况通知了在巴黎的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谢多夫差人送来了一个纸袋，里面装有谢多夫给普特纳的便函和“托洛茨基亲笔书写并签名的给图哈切夫斯基的密信”。普特纳执行了谢多夫交给的任务，在1935年10月初将托洛茨基的信交给了图哈切夫斯基。图哈切夫斯基看了信之后请普特纳“口头转告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是可以信任他的。”

在侦查过程中以及在法庭上，图哈切夫斯基只提到了似乎是普特纳交给他的谢多夫的信，但一次也没有谈到普特纳所说的托洛茨基的信。尽管如此，侦查机关和法庭更愿意对这种矛盾的说法保持沉默，以便不失去如此重要的“指控。”

侦查机关逼迫图哈切夫斯基和普特纳提供证词，获取了他们对于同谢多夫进行私人见面事实的“承认”，仿佛这次会面是在1936年由普特纳为图哈切夫斯基安排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进行的。关于图哈切夫斯基1936年2月10~16日在巴黎逗留的详细情况，不仅驻巴黎武官文佐夫，还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渠道都作了报告，这些信息里没有图哈切夫斯基与谢多夫会面的资料。在目前进行的核查过程中，内务人民委员部外事局原工作人员、1923年入党的苏共党员阿法纳西耶夫就这个问题解释道：

“自1932年到1938年，我一直在国外从事秘密侦察工作。我负责驻巴黎的秘密间谍机关，这个机关的主要工作是对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以及他周围的人进行监督……我们很清楚托洛茨基和谢多夫的最秘密的活动。因此，如果提出图哈切夫斯基、普特纳以及苏联其他军事活动家是否与谢多夫见过面——1936~1938年的莫斯科审判中谈到了此事——的问题，那么可以肯定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在调查托洛茨基、谢多夫、克列曼以及在巴黎的俄罗斯军人联合会部分成员活动的过程中所获取的间谍情报和文件资料，

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不能证实在法庭上对被告所提出的指控……特别是那些对卷入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红军军事活动家科尔克、加马尔尼克、普特纳等人的指控。”

在卷宗材料中还形成了两条虚拟的图哈切夫斯基与托洛茨基联系的渠道——通过普里马科夫和皮达可夫。但是，皮达可夫在受到侦查和审判过程中——这是在对图哈切夫斯基进行审判之前——没有提供任何关于他与图哈切夫斯基见面和交谈情况的证词；而拉狄克在法庭上回答维辛斯基提出的关于图哈切夫斯基参与托洛茨基组织的问题时，作了否定的回答。

至于普里马科夫，他证明说他在国外未能与托洛茨基建立个人联系。

3. 在得到图哈切夫斯基关于1928年叶努基泽将他吸收进右倾组织的证词之后，还从他那里获得了关于1932年出现“以右倾分子的观点为纲领”的军事阴谋的证词。

在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卷宗中，没有叶努基泽的证词。而对叶努基泽卷宗的研究表明，他也没有提供关于他曾经吸收图哈切夫斯基加入右倾组织以及1928~1930年间与图哈切夫斯基见面的供词。

在逼迫被关押者提供关于根据右倾中心和右倾-托洛茨基联盟的决定策划军事阴谋的虚假证词时，侦查人员广泛地援引了被关押者关于他们是从托姆斯基那里听说这件事的说法，而这时托姆斯基已经自杀身亡。在1937年5月30日的审讯中，叶努基泽交待说：

“……右倾组织中心做出决定，建立军事组织……。”“对于我提出的问题——图哈切夫斯基由谁吸收参加组织，托姆斯基回答说，李可夫。”

在对图哈切夫斯基案件进行调查时，叶努基泽的这个证词被默认了。图哈切夫斯基在回答法庭提出的关于他与右倾分子的相互关系问题时说，“我与李可夫没有进行过任何交谈。”

核查表明，李可夫根本没有提供有关他招募图哈切夫斯基的证词，但是在他 1937 年 6 月 6 日的“亲笔证词”中又提到，他似乎是听托姆斯基说过，图哈切夫斯基、科尔克、普特纳以及乌博列维奇“参加了”右倾集团。

4. 关于军事阴谋家们与右倾—托洛茨基联盟的联系，叶努基泽在侦查人员的压力下交待说：

“1932 年末，……托姆斯基告诉我以下消息：根据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以及右倾组织的决定，成立统一的军事组织中心。参加这个中心的有科尔克、普特纳以及普里马科夫。该中心由图哈切夫斯基领导。”

1937 年 6 月 2 日，也就是被捕之后过了 3 个月，侦查人员得到了布哈林的“亲笔供词”，他在供词中写道：

“应该谈一谈成立共同中心的问题，参加这个中心的有：右倾分子托姆斯基和李可夫，季诺维也夫分子——加米涅夫、索柯里尼科夫，托洛茨基分子——皮达可夫，军人——图哈切夫斯基、科尔克以及亚戈达。关于成立这个中心的问题托姆斯基曾向我通报过……我说不清楚，这个联合中心是否在某个时候开过会。”

在 1937 年 6 月 14 日接受审讯时，布哈林改变了关于中心组成人员的供词，把军人图哈切夫斯基和科尔克排除出其成员之列。

必须指出，在就这个案件进行侦查和审判时，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以及其他被告没有提供任何关于与托姆斯基进行谈话的证词。在接受侦查时，图哈切夫斯基说：

“我是通过戈尔巴乔夫和彼得松与军事中心和右倾分子保持联系的。戈尔巴乔夫和彼得松与叶努基泽、亚戈达、布哈林和李可夫有联系。”

从军级干部、1917 年入党的联共（布）党员戈尔巴乔夫的案件中可以看出，在法庭上他不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并否认了在接受

侦讯时由于受到侦查人员乌沙科夫和斯特罗明的逼迫而提供的证词。戈尔巴乔夫向法庭声明，他知道图哈切夫斯基、科尔克、叶努基泽等人的供词，但是这些供词都是假的。

布哈林和李可夫同样也没有提供关于通过戈尔巴乔夫和彼得松与图哈切夫斯基建立联系的供词。在1956年，戈尔巴乔夫和彼得松得到身后平反。

通过对一些党务档案馆里的个人党务档案和其他资料进行核查，可以确定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埃德曼、科尔克和费尔德曼没有参加反对派，他们不属于反党集团。在法庭上图哈切夫斯基声明说：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始终都是反对托洛茨基的，在党内争论时也是这样；我同样也是反对右倾分子的……因此，我并未站在右倾的立场上……至于我在1923年反对托洛茨基的发言，我曾就此亲笔写了报告并报送中央。”

在接受侦讯时，亚基尔在亲笔供词里提到：

“我站在列宁主义的立场上，在基辅进行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我历来都坚持党的正确的立场……人民委员建议由我接替布勃诺夫<sup>①</sup>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这是在军队里同所谓的白俄罗斯-托尔马乔夫反对派进行重大的斗争之后，在这个问题上我坚持的是完全正确的立场，是为消灭这个反对派作出很多努力的指挥员之一。”

亚基尔在法庭上说：

“在很多年的时间里面，我都是国家、军队和党的诚实的、忠

<sup>①</sup> 布勃诺夫，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1884～1940），1924～1929年期间曾任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自1929年起担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

诚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在1923年、1927年……我站在正确的列宁主义立场上……同反对派作斗争。”

乌博列维奇在1937年6月9日给叶若夫的声明中写道：

“我是从普通的劳动人民阶层走出来参加革命的，在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艰苦岁月里，我从来没有动摇过，无论是在国内战争时期，还是在战后的年代……我曾有过许多如此优秀的政治导师，如奥尔忠尼启则和——在一段时期里——米高扬等。我从来都没有当过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或者是右倾分子。”

这样，所有这四个关于产生军事阴谋根源的说法以及阴谋者按照德国总参谋部的指示进行活动的第五个说法（关于这一点以下还将说明）一样，都是没有事实材料可以证明的。这些说法都是极其矛盾的，是建立在侦查人员通过犯罪手段从被关押者口中获取的混乱的供词之上的。

被关押者关于存在着阴谋“中心”、后备“中心”、“平行”中心以及阴谋者计划进行恐怖活动的供词也是极其矛盾的。

根据起诉书的结论和法院的判决，法西斯军事阴谋组织是在以加马尔尼克、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埃德曼、费尔德曼为首的“中心”领导之下进行活动的。对案件材料的核查以及对“指控证据”的分析表明，三十年代在工农红军中根本不存在任何反苏军事“中心”。关于存在军事阴谋的指挥“中心”的这种说法，是在侦查过程中以被关押者所“承认的”供词为基础捏造出来的，而这些供词是由于对他们实施了非法的侦讯手段才获得的。

有关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加马尔尼克加入军事阴谋中心的直接证词，是侦查人员乌沙科夫、卡列林和利特文在开始诉讼程序的前两天从图哈切夫斯基和乌博列维奇口中获得的。在回答法庭的问题时，图哈切夫斯基评论了他与加马尔尼克的关系，声明说：“我负

责西方的事务，加马尔尼克负责东方的事务……我想说的是，假如这里是存在着两个中心的话。”

在捏造关于军事阴谋的“主要中心”的侦讯材料的同时，侦查人员乌沙科夫还力图证明在这个组织里还存在着由亚基尔负责的“后备中心”。

后来的情况，那个乌沙科夫斯基如果不制造又一个军事阴谋中心——似乎是以二级集团军级干部哈列普斯基<sup>①</sup>负责的“平行中心”——就不行。但是，图哈切夫斯基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存在“平行中心”的供词，也没有说出哈列普斯基以及由他“招募”加入阴谋的一些人的名字。1956年，哈列普斯基被身后恢复名誉。

为了更明显地表现军事阴谋活动及其中心的存在，侦查机关在被关押者的审讯记录中广泛地反映了招募新成员从事反苏活动的情况。被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提到的几乎所有人，当时都遭到了非法逮捕和没有根据的审判（在对他们的案件进行了核查之后，现已确认指控是假的，为他们恢复了名誉）。

关于所谓招募参加军事阴谋的时间、地点和情形，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被关押者在受审时作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的描述。例如，根据图哈切夫斯基的供词，他是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招募埃德曼和阿波加加入军事阴谋组织的，而招募戈尔巴乔夫是在克里姆林宫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期间，招募国防人民委员部对外联络部主任戈凯尔是在一次外交招待会上。

关于进行恐怖活动指控也是基于矛盾的供词，这些供词都是侦查人员从图哈切夫斯基、费尔德曼和普特纳身上“挖掘出来的”。

---

<sup>①</sup> 哈列普斯基，因诺根基·安得列耶维奇（1893～1938），国内战争中任集团军和方面军通讯主任，后来担任过工农红军通讯部长、摩托化和机械化部部长，1937～1938年任苏联邮电人民委员。

图哈切夫斯基的证词显得有些“转弯抹角”，他仿佛是“根据普里马科夫的话”提供的证词。但是，在侦查过程中以及在法庭上，普里马科夫否认自己准备恐怖行动，并肯定地说他根本就不知道施密特和库兹米乔夫准备进行恐怖行动。

关于恐怖活动的虚假指控的另一条线索也遭到彻底反驳，这条线索是侦查人员强加在被关押的普特纳身上的，也正是根据这一线索，由德列伊采尔，而不是图哈切夫斯基和普里马科夫，要求施密特和库兹米乔夫实施对伏罗希洛夫的恐怖行动。

对库兹米乔夫和施密特案件进行核查之后发现，指控他们对伏罗希洛夫实施恐怖活动是捏造的。库兹米乔夫和施密特于1937年6月被枪决，1957年被平反。在致斯大林的声明中，师级干部施密特（自1915年起为联共（布）党员）写道：

“所有的指控都是无稽之谈，我的全部供词是百分之百的谎言。为什么我提供了证词？这里有不少原因……我不是要请求您的宽恕。同您谈话之后，又在党的面前犯下某种罪行，这无论如何是背信弃义。是的，对这没有别的说法。我给您写信，是因为我知道，您是能够检验一切的……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最主要的是，我没有任何罪过……对于诚实的人、战士和革命者来说，监狱不是他该呆的地方……”

关于指控进行破坏活动的依据是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和其他被逮捕者的毫无根据的“坦白”，而这与事实相矛盾，与所有这些人为了加强苏联的国防以及我们武装力量的战斗训练所进行的积极和富有成效的工作相矛盾。在卷宗材料之中没有任何关于被告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客观证据。在这次复查中，由总参谋部军事科学管理局对图哈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亚基尔等人的军事活动问题的研究彻底推翻了关于他们从事破坏活动的指控。

## （二）关于叛国罪的虚假指控

根据侦查机关的说法，军事阴谋产生的一种情况是阴谋分子与德国总参谋部的联系。在捏造这种背叛祖国的指控时，侦查人员首先利用了苏联军事领导人与德国军队的代表所进行的具有官方性质的会晤。

众所周知，1922年俄罗斯联邦与德国缔结了拉巴洛条约，这一条约确定了两国之间的正常外交关系。苏联与德国之间和平关系的发展导致1922~1923年间进行谈判并签署了具有防御性质的苏联红军与德国国防军的合作协定。这种合作是受两国相互利益制约的。苏联统帅部力求利用的主要是德国人的技术经验以加强红军的战斗力。而德国国防军领导机关方面则力求获得在我国领土上培训其军事飞行员和坦克手的可能性，根据凡尔赛条约规定，这在德国本土是很难进行的。

以下是苏军总参谋部关于这个问题所做的结论：

“最大的成果就是让我们红军指挥人员前往德国进行演习、野外作业以及举办速成班……仅在1925~1931年间，军事部门前往德国的总人数就有156人，其中有50%的人是奉派研究军队一般问题以及司令部勤务问题，其余的人是研究各种专业问题以及执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特殊任务。”

1927~1928年间在德国军事学院学习的有亚基尔、乌博列维奇和埃德曼，1930~1931年间在德国的有叶戈罗夫、别洛夫和德宾科。研究德国国防军司令部勤务组织的是普特纳、费尔德曼、梅列茨科夫、什泰因等人；铁木辛哥和戈尔巴乔夫研究德国军队野外训练教学法；阿尔克斯尼斯和梅热尼诺夫研究空军编制，等等。乌博列维奇、特里安达菲洛夫、别尔津<sup>①</sup>（1930年）、叶非莫夫

<sup>①</sup> 别尔津，扬·卡尔洛维奇，原名丘济斯·彼得里斯（1889~1938），1936~1937年间担任驻西班牙共和国军队的总军事顾问。

(1931年)前往德国是为了了解德国的军工厂。为了同样的目的以及出席军事演习，图哈切夫斯基和费尔德曼也去了德国(1932年)。除此之外，科尔克在1928~1929年间担任苏联驻柏林武官，1929~1931年间担任此职的是普特纳。

自1933年希特勒掌权之后，同德国国防军的合作就停止了，而以前与我们的代表见过面的德国将军，如卡麦施坦因、阿达姆、博克尔贝格等“亲东方者”，都被替换了。

同时，在关于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案件的指控书中，对于军事阴谋的产生是这样说的：

“1932~1933年期间，根据德国总参谋部及其间谍、人民的敌人列·托洛茨基的直接指示，成立了托洛茨基军事组织。”

在判决书中，所有的被告都被宣布为法西斯军事组织的领导人，而这个组织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德国总参谋部及其间谍——人民的敌人列·托洛茨基——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

法庭还认为，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普特纳、埃德曼和科尔克同德国军事小组有着构成犯罪的联系，他们定期向德国总参谋部提供完全绝密的情报资料，这些资料关系到红军的组成、装备和供给等方面的情况，是最重要的国家机密。同时，他们还将列季切夫斯基防御区的计划转交给了波兰侦察机构。

在进行法庭审判时，亚基尔和乌博列维奇否认关于进行间谍活动的指控。例如，德宾科向亚基尔提问：“是您亲自开始进行有利于德国总参谋部的这项间谍活动的吧？”被告亚基尔回答说：“我本人没有直接开始这项工作。”

德宾科问乌博列维奇：“是您同德国总参谋部一起进行了间谍活动？”乌博列维奇回答法庭说：“我从来没有进行过间谍活动。”

乌尔里赫对图哈切夫斯基提问：“您确认是从1932年开始参加反苏活动的。而您开始从事间谍活动要早得多——您是否认为这是

反苏活动？”图哈切夫斯基的答复是：“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将此视为间谍活动……。”

在侦讯和庭审材料中，一句话也没有提到被告之中有人曾被德国、法国和其他外国的间谍机关招募。同时，案件中把官方会晤时任何有关军事问题的谈话都视为间谍活动。被告们对间谍活动的承认带有明显的编造性质，是侦查人员强加于他们的。甚至在起诉书和判决书中指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的依据方面，也只是列举了几个事实，而且都只是与图哈切夫斯基有关，另有一件事情是与普特纳有联系的。

在这些文件中都没有提到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和埃德曼转交间谍情报的具体事实。

在判决书中毫无根据地指出，图哈切夫斯基在1932年向德国国防军参谋长阿达姆将军转交了关于红军装备的情报资料。确实，图哈切夫斯基在1937年5月的供词中曾指出，在1932年德国军事演习时，他与阿达姆会面并把红军装备规模的情报交给后者。但是，在1937年6月接受侦查时以及在法庭上，图哈切夫斯基没有提到向阿达姆转交过这样的情报资料。侦查机关和法庭并不关心这些情报的具体内容，而他本人对此问题也没有进行交待。至于图哈切夫斯基在接受侦讯时所提供的证词，即他仿佛是在宴会上向阿达姆透露了苏联在对波兰的战争中将展开150个师的秘密，图哈切夫斯基后来在法庭上解释说，他对阿达姆说的是另外一件事，即这时苏联已经展开了150个师。令人怀疑的是，图哈切夫斯基能够在正式宴会的场合谈论这些事情。如果推测一下，图哈切夫斯基真向阿达姆说过这些师的数量，就如他在6月1日的审讯时以及法庭上所交待的那样，那么应该认为图哈切夫斯基的这种说法是完全虚假的，因为在那个时期，苏联实际上并没有150个师，而要少得多，按照1931~1932年的作战计划，准备用于对波兰的战争的兵力是

94 个步兵师和 12 个骑兵师。

这些情况是否符合事实，它们是否像下面将要提及的图哈切夫斯基的其他“暴露”国家和军队机密的情况那样，出卖了国家和武装力量的机密，对于这些问题侦查机关和法庭理应进行专门的技术鉴定，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接着，法庭认为图哈切夫斯基的罪行还在于，他将一系列军工厂生产能力的情报提供给了德国将军博克尔贝格，后者是在 1933 年 5 月来莫斯科的。在侦查人员强加于图哈切夫斯基的供词里，没有任何有关这些军工厂的具体资料，因此，依据这些证词不能够判定，这些资料是否含有国家和军事机密。

在图哈切夫斯基接见博克尔贝格以及德国代表参观军工厂时在现场的苏霍鲁科夫上校（自 1917 年起为苏共党员）谈到：

“1933 年 5 月，一组德国军官为了解一些军工厂的情况来到了苏联。这个小组的负责人是博克尔贝格将军，即德国国防军军械部主任。这是对于米·尼·图哈切夫斯基参观一些德国军事工业企业的回访。按惯例，参观的计划要与政府协商，并由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部批准。预先拟定的参观项目有第 1 飞机制造厂，第 8 火炮制造厂和图拉兵工厂。陪同博克尔贝格小组参观的人员有工农红军炮兵管理总局的代表和对外关系部的工作人员……在参观时……‘客人们’提出了有关机床和车间的生产能力等问题。通常，都要编造一些东西作为答复。如果在某些情况下通报了一些接近事实的情况，那也不可能暴露苏联飞机制造厂和火炮制造厂的总的生产能力，因为，像第 1 飞机制造厂这样的军工厂只是苏联航空工业的一个很小的单位……参观结束后，博克尔贝格出席了克·叶·伏罗希洛夫和米·尼·图哈切夫斯基举行的宴会。博克尔贝格在参观以及与米·尼·图哈切夫斯基谈话时，始终有对外关系部的工作人员陪同。任何一名德国军官，包括博克尔贝格本人，没有与图哈切夫斯基进

行过哪怕是一次单独的交谈。访问结束后，博克尔贝格也起草了一份总结报告。”

在关于自己的苏联之行的报告中，博克尔贝格写道：

“在重新建立的工业企业中，处处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考虑到苏联计划的庞大规模，同红军和苏联军事工业的合作不仅在军事政治意义上、而且在军事技术意义上来说都是非常理想的。”

在目前所进行的复查工作过程中，我们研究了博克尔贝格在报告中提到的苏联某些军事工业项目的资料，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第8管理总局的8名军官专家对苏联对外关系部工作人员的报告也进行了研究。他们不认为这些苏联企业方面的资料是绝密级的并包含苏联国家机密，他们确认，这些资料在当时的条件下只具有保密的性质。

在审讯时，极其拙劣地捏造了关于图哈切夫斯基在1935年以口头方式通过普特纳把军事情报提供给德国人的指控。关于这些情报的内容，图哈切夫斯基和普特纳所交待的证词是非常矛盾的。比如说，图哈切夫斯基在供词中提到，他通过普特纳转交的是关于防空兵状况、白俄罗斯军区和基辅军区的机械化部队以及西部边界部队集结计划的情报；而普特纳的供词却证明，他从图哈切夫斯基那里得到的是关于“工农红军装备的现况及其前景”和“苏联军事工业状况”的情报。在法庭上，图哈切夫斯基在回答审判长提出的他是从哪里搞到关于空军的情报的这个问题时说，“是从阿拉弗佐那里”。而已经被逮捕的阿拉弗佐没有交待，他曾交给图哈切夫斯基有关空军或者是白俄罗斯军区和基辅军区机械化部队状况的任何情报资料。

在亚基尔、乌博列维奇、费尔德曼、科尔克和埃德曼的供词中，还包含了关于被告之中的某些人与德国驻莫斯科武官克斯特林

有间谍联系的证明，仿佛他们利用官方的外交招待会与之进行会晤。但在起诉书和法院的判决书中，却没有任何有关这方面情况的具体指控材料。对1947年被苏联国家安全部逮捕的原德军少将施帕尔克的侦讯材料对于核实上述证词具有很大帮助。已经查明，施帕尔克1925~1937年间在德国总参谋部侦察局任职，专门从事对苏联的侦察工作。施帕尔克在受审时交待：自1926年起，他作为总参谋部的代表奉派与来德国参加演习以及在军事学院学习的苏军指挥员一起工作。施帕尔克提到了这些苏军指挥员的名字：亚基尔、普里马科夫、普特纳、叶戈罗夫、奥尔洛夫、别洛夫、德宾科、铁木辛哥等。施帕尔克强调说，在他们逗留德国期间，他在与他们的交往过程中从来没有从他们那里获得过任何具有侦察性质的情报，尽管有一次他试图这样做。后来，他成为总参谋部间谍局的负责人，主管侦察工作，并与德国驻莫斯科武官克斯特林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根据施帕尔克的证明，从克斯特林处没有收到过谍报资料，他所提供的全部信息都是根据官方的原始资料以及到苏联参加军事演习的德国军官们的报告。按照施帕尔克的供词，在发生了图哈切夫斯基审判案之后，克斯特林非常气愤并明确指出，他与苏军指挥员没有任何带有间谍性质的联系。

在侦查过程中，曾试图以对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被告与尼德尔马约尔上校所作官方会晤的定性来损害他们的声誉。尼德尔马约尔上校1931年以前一直在苏联，作为德军代表对当时的三个联合企业进行监督。但在后来的判决书中没有提到此事。

已经查明，1945年5月，已拥有少将军衔的尼德尔马约尔在 frontline 被苏军反侦察机关抓获，并于1948年根据苏联国家全部特别会议的决议以反苏间谍罪被判处25年监禁。尼德尔马约尔死于服满刑期的那一年。在接受审讯时，他曾交代：

“在宴会和招待会上，我结识了图哈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

亚基尔、科尔克、布柳赫尔、拉狄克等人并与他们进行过交谈……所有这些关系都是公务性质的……我承认，1924～1927年在苏联时，我曾为德国从事过侦察活动……但是，我可以证明，除了戈特弗里德一人之外，我没有其他的间谍……1927年我接到了命令，根据“Ц-МР”方针停止在苏联的侦察活动。”

已经查明，戈特弗里德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秘密工作人员，是被用来给尼德尔马约尔提供有关红军的假情报的。1927年，戈特弗里德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委员会判处枪决，罪名是打着完成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任务的幌子，向尼德尔马约尔提供间谍情报。

在起诉书中强调指出，1936年图哈切夫斯基利用出访伦敦的机会，将有关白俄罗斯军区和基辅军区的兵力部署材料转交给了德国将军伦施泰德。

这个指控的根据是亚基尔所作的关于图哈切夫斯基与伦施泰德举行会晤（似乎是在柏林、而不是在伦敦）的非常矛盾的供词。在法庭上，亚基尔根本没有交待这一情况。至于图哈切夫斯基，他无论是在接受审讯时还是在法庭上都没有提供关于在伦敦、柏林或其他地方把军区兵力部署情报交给伦施泰德的任何证词。结果，在起诉书里，法庭也没有提到指控的这个事实。

与此同时，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法庭在起诉书中写道：“1936年，被告图哈切夫斯基利用自己在伦敦逗留的机会，向德国总参谋部将军伦施泰德转交了使红军战败的计划”。这些文字是后来加进判决书原本的，但没有对这一修改作附加说明。是什么人根据什么原因作了这样的增补，已不可能查明。这一指控甚至连制造此案虚假证词的侦查员也没有提出。起诉书中说的完全是别的内容，即“图哈切夫斯基制定了瓦解红军的计划，并与德国总参谋部的代表商讨了这个计划。”图哈切夫斯基本人一直强调，他没有交给德国人瓦解红军计划。

图哈切夫斯基在受审时以及在法庭上对于1936年在伦敦参加英国国王葬礼时与伦施泰德的会晤以及同他就一些非常秘密的问题进行了交谈的描述是虚构的，没有任何资料 and 文件可以证明。而且必须指出，在侦查和庭审过程中并没有对当时也在伦敦的李维诺夫<sup>①</sup>、马伊斯基<sup>②</sup>和普特纳进行询问，以验证图哈切夫斯基关于自己在英国首都逗留情况的证词。

原苏联驻伦敦大使马伊斯基在1961年给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说明函中写道：

“图哈切夫斯基给我留下的总的印象是非常好的……图哈切夫斯基非常善于与外国人相处。他很坚定，但又很有分寸，非常机智和委婉地捍卫自己的立场并攻击敌人的立场……在各种正式场合，我多次注意到，图哈切夫斯基十分庄重但又十分巧妙地代表苏联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集团的领导人交往（要知道资本主义各国都有代表来参加乔治五世的葬礼）。图哈切夫斯基在英国逗留期间，在其行为中没有任何值得怀疑或能够提出疑问的地方，后来我也没有听到过任何消息说他仿佛与德国法西斯分子有着罪恶的联系。”

在侦查过程中以及在法庭上，亚基尔、乌博列维奇和科尔克提供了非常矛盾的证词，仿佛他们与图哈切夫斯基一起制定了瓦解红军的计划。为了使这些证词看上去像真的，侦查人员还援引了红军总参谋部在1935~1936年期间进行的有高级指挥人员参加的战术演习。从这些审讯记录本身就可以看出科尔克的证词的虚假性。比如，在1937年5月26日审讯时，科尔克交待说：

“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实施军事组织的战败计划时，我——

① 李维诺夫，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原名瓦拉赫·马克西，1876~1951），1930~1939年期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② 马伊斯基，伊万·米哈伊洛维奇（1884--1975），时任苏联驻英国大使。

科尔克——实际要做些什么……我记得，乌博列维奇立即插进来对我说：“你将在我那里，西部战线的右翼。给你规定的任务是：沿西德维纳河进军里加。接着，你将受到来自维尔诺方向的对于左翼和后方的打击，这将使你的整个行动遭受挫折。”

在1937年5月30日，在与乌博列维奇进行当面对质时，科尔克又重复了这一点。对此，乌博列维奇声明说：

“科尔克说的完全不是事实。在此我只指出他的一个谎言。他说，我对他说过，他将指挥右翼的部队，这支部队将开往里加，并将被摧毁。可以查看一下白俄罗斯军区1935年的作战计划，在计划中您找不到哪怕有一支在右翼的部队是要前往里加的。”

由于核查这一情况会动摇对被告犯有失败主义罪行的指控，这显然是不符合侦查机关和法庭的“利益”的，因此当时就没有进行这样的核查。1962年，总参谋部作战局研究了这个问题，其结果表明，在进行当面对质时所作的供词中，正确的是乌博列维奇，而不是科尔克。

这个强加于图哈切夫斯基的使红军失败的离奇计划实际上是侦查人员捏造出来的，可以用有关图哈切夫斯基和乌博列维奇在1931~1937年期间制定并呈送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一系列建议的文件资料将其彻底推翻。这些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建议是非常现实而有根据的、并充分考虑到了日益增长的德国和日本侵略苏联的危险性。

1961年，苏联陆海军总参谋部在其对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军事活动所作的总结中指出：

“图哈切夫斯基密切关注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训练及其发展情况，在规划战争、改进我们的战略展开方面提出了很多明智的建议……米·尼·图哈切夫斯基赋予战略展开以及战争规划问题以重大意义。图哈切夫斯基基本上正确地估计了敌方的力量和武器装备情况

以及我军的能力……作为边境军区司令的叶·彼·乌博列维奇始终关注邻国政治局势的变化，不倦地致力于制定武装保卫苏维埃国家的更合适的计划……他正确地估计了敌方军队的力量、战区的特点、新兵种的作用以及我军在战争初期实施强有力打击的意义。”

1935年3月31日，《真理报》刊登了图哈切夫斯基关于《当今德国的军事计划》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揭露了纳粹的军事计划——建立强大武装力量的四年计划。这篇文章引起了希特勒德国政府和军界的强烈不满。李维诺夫在日记中写道：德国大使舒伦堡于1935年4月4日对图哈切夫斯基关于德国武装力量情况的文章表示不满。同一天，驻莫斯科的德国武官卡特曼上校对红军总参谋部对外联络部主任戈克尔表示，“他奉命通报德国国防军指挥机关对图哈切夫斯基同志的文章作出的否定反应”。李维诺夫和戈克尔的报告副本转呈给了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

还必须指出的是，把鲁祖塔克开除出联共（布）中央所依据的也是那个决议，即把图哈切夫斯基作为右倾—托洛茨基集团的参加者和德国间谍逮捕的那个决议。在法庭上，鲁祖塔克没有认罪并且声明：

“我对法庭的惟一要求是：向联共（布）中央报告，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里还存在着未被根除的肿瘤，他们人为地制造案件，逼迫没有任何罪过的人们承认自己有罪……侦讯的方法是强迫人们制造谎言和诬陷那些没有任何罪过的人、更不用说是正在受审讯的人了。”

法庭没有满足鲁祖塔克这个让他能够把一切都写给联共（布）中央的请求，他被处决了。1956年，鲁祖塔克被平反。

除了指控图哈切夫斯基为德国从事间谍活动外，侦查机关和法庭只是依据“得到承认的”证词，还指控他为波兰从事间谍活动。在1937年5月29日的声明中，图哈切夫斯基写道：

“大约是从1925年起，我与波兰间谍多姆巴尔建立了联系。”

在法庭上，图哈切夫斯基强调说：

“我不知道多姆巴尔是波兰间谍。多姆巴尔是作为国会议员被接纳来苏联的，他曾主张波兰军队战败，并在红军进军华沙时号召加入红军。我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与其相识和会晤的。我知道他是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关于他的间谍活动我一无所知，但无论如何我都没有权利将这些机密情报告诉他。因为他是波兰间谍，而我要为参加有利于波兰的间谍活动承担完全的责任。”

经核查确定，波兰共产党党员、自1920年起为联共（布）党员的T.Φ.多姆巴尔院士是波兰共产党的领袖之一，1936年12月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非法逮捕，并于1937年8月判处死刑。在法庭上，他没有承认自己有罪，也没有提供关于图哈切夫斯基的证词。1955年12月，他得到平反。

对图哈切夫斯基和亚基尔的同样经不起推敲的指控还有：1935年，经他们批准，由杜罗夫斯基和萨布林把关于列季切夫设防地区的秘密计划交给波兰侦察机关。经核查确认，军级干部杜罗夫斯基和旅级干部萨布林并没有提供关于他们把列季切夫设防地区的情报交给波兰人以及将这件事通报给图哈切夫斯基和亚基尔的证词。

旅级干部萨布林（1919年入党的党员）在法庭上证明说：“亚基尔提供的关于他萨布林向他通报过将列季切夫设防区计划交给波兰侦察机关的证词是假的，因为他萨布林是不可能谈到这样事情的，况且他也没有把任何计划交给波兰侦察机关。”

法庭没有认定萨布林为波兰进行间谍活动的罪行，但仍然根据指控其从事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的假证词给他定罪。无辜被判有罪的杜罗夫斯基和萨布林在死后于1956年得到平反。

尽管在侦查材料中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图哈切夫斯基为日本侦察机关工作，但是侦查员乌沙科夫在提出对图哈切夫斯基的指控

时，仍然强调说图哈切夫斯基已经承认他是日本总参谋部的秘密间谍。在起诉书以及法庭对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判决书中，完全没有提到图哈切夫斯基与日本的间谍联系。

在侦查过程中以及在法庭上从图哈切夫斯基身上搞到的证词提到，“军事阴谋”的参加者阿波加仿佛与日本和德国的侦察机关有联系，阿波加曾经向图哈切夫斯基通报过，根据“中心”的指示，他与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一起，将有关远东方向的铁路运输的情报交给了日本和德国侦察机关。

工农红军军事交通部门的负责人军级干部阿波加（1917年入党的联共（布）党员）与图哈切夫斯基一起被逮捕。1937年6月，斯大林在看过1937年6月2日审讯被逮捕的卡拉汉的记录后，在上面写道：“审讯阿波加（严厉地）。”结果从阿波加身上获取了关于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以及与德国人有联系的证词。在1937年9月1日致联共（布）中央的声明中，阿波加推翻了以前的证词并强调说，这些证词是假的，是侦查人员利用惩罚手段逼迫他交待的。阿波加没有提供任何有关为日本进行间谍活动的证词。1937年11月，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判决，阿波加被处以枪决。1956年，由于不存在进行犯罪活动的事实，阿波加得到平反。

综上所述，关于图哈切夫斯基为德国、波兰和日本进行间谍活动的指控是捏造的，是侦查人员通过非法的手段——欺骗、恐吓和威胁——所造成的。由斯大林签署的1937年6月1日的联共（布）中央决议提到，仿佛亚基尔和乌博列维奇为德国、日本和波兰进行间谍活动，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对侦查机关和法庭的材料以及党和国家档案馆的文献资料所作的研究表明，对于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很多军事领导人的迫害早在1937年以前很久就开始了。揭示斯大林自国内战争时期以来对待某些红军活动家的态度，对于更正确地理解对图哈切夫斯基等人进

行镇压的原因，是极为重要的。

#### 四、关于在军事问题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 (一) 斯大林对于阐述国内战争某些历史问题的态度

国内战争之后，20年代，在我们国家里开展了关于研究和总结党领导武装力量和国家防御的经验的运动。在党内和军内，对于国内战争的历史以及对于红军领导方面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总结了正面经验，并揭露了在国内战争期间所犯的错误。

争论最为激烈的是关于苏波战争的一系列问题。许多著名的军事活动家都参加了这场辩论。

1923年，图哈切夫斯基的讲义《进军维斯瓦河》出版了，这是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上课用过的。图哈切夫斯基在讲义中直截了当地表明，西南方面军的领导人对于1920年华沙战役我军的失败应承担责任。在讲义中并没有直接点出具体的人名以及在这方面的错误，但是很清楚，这些人是西南方面军司令叶戈罗夫、方面军军事委员斯大林、第一骑兵军军长布琼尼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伏罗希洛夫。

在这个问题上，现有的档案资料可以证明以下事实。

1920年8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成立与弗兰格尔进行斗争的独立的方面军（南方面军），由斯大林负责组建该方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个决议还决定，将西南方面军（司令是叶戈罗夫）与西方面军（司令是图哈切夫斯基）合并，保留西方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合并后的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图哈切夫斯基担任方面军司令。

也是在这一天，弗·伊·列宁将关于合并方面军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通知了斯大林。8月3日，斯大林在给弗·伊·列宁的电报中表示自己不同意这个决定，并以极其粗鲁的方式声明说：

“政治局不应该去干这些无聊的事。”弗·伊·列宁向斯大林详细解释了党中央所作的决定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必要性。

1920年8月5日，俄共（布）中央全体会议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这个决定。根据俄共（布）中央和政府的指示，总司令加米涅夫<sup>①</sup>于8月6日向仍然处于行动状态的西南方面军（叶戈罗夫、斯大林）总指挥部下达命令，令其准备将第12、第1骑兵军和第14军移交给西方面军。同一天，总司令命令第1骑兵军“……进行休整以准备参加新的更坚决的打击行动。”但是，这个命令实际上没有被执行。自8月12日起，第1骑兵军在未经总司令批准的情况下，又被西南方面军指挥部派去进攻利沃夫。同时，还在8月11日，总司令就签署了关于将第12、第1骑兵军移交给西方面军的命令，西方面军已经拟定对华沙发动总进攻。斯大林坚决拒绝执行这个命令。1920年8月13日，斯大林给总司令发出了如下一封电报：

“您最近的第4774011/1052/III号指示毫无必要地推翻了已转入进攻的部队所在的地区形成的力量部署；这个指示最好或者是在三天以前下达，当时骑兵军正处于休整状态；或者是稍晚些时候，等骑兵军占领利沃夫地区之后。目前，这个命令只能使事情复杂化，并不可避免地对部队力量的重新部署造成不应该的有害的障碍。有鉴于此，我拒绝签署西南方面军执行您的指示的相应命令。Hp.38/20。”

斯大林的行为实质上意味着拒绝执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

<sup>①</sup> 加米涅夫，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1881—1936），曾是俄国旧军队上校，十月革命后加入红军，1918年任东线司令，1919—1924年间任共和国武装部队总司令，1925年起先后任参谋长、红军总监、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副陆海军人民委员等职。自1934年起担任对空防御管理局主任，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委员。

议以及俄共（布）中央全会 1920 年 8 月 2 日和 5 日的决议。党中央不能忽略这个事实，并于 8 月 14 日给斯大林发出了如下电报：

“您与总司令之间的摩擦已达到了如此程度：（无须解释）必须通过直接见面共同讨论的途径来弄清楚，因此请尽快来莫斯科。第 14/8248/111 号，中央书记克列斯廷斯基。”

在斯大林动身前往莫斯科之后，第 1 骑兵军指挥部（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拒绝执行图哈切夫斯基调动骑兵军援助西方面军的命令。只是在 1920 年 8 月 20 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命令之后，第 1 骑兵军才开始撤出利沃夫地区的战斗并向西线移动。但是已经晚了：敌人利用我军西线左翼力量薄弱的机会转入反攻并迫使苏维埃军队撤退。第 1 骑兵军在利沃夫地区的滞留是西方面军 1920 年 8 月进攻行动失利的原因之一。

但是，斯大林不顾苏波战争的这一过程，仍然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例如，1920 年 8 月 30 日，他在致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份声明中这样写道：

“我建议中央成立三人委员会（通过国防委员会）调查我们在西线的七月进攻和八月撤退的条件。给委员会两周的期限。我建议，委员会主席由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担任（如果中央没有更好的候选人的话）。”

党中央政治局没有审理斯大林的这份声明。1920 年 9 月 20 日，当俄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派斯大林前往高加索以弄清那里的局势时，在波兰战线和弗兰格尔战线上正在进行着极其残酷的战争。当时最迫切的问题是粉碎弗兰格尔军队，这关系到结束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问题。在这关键时刻，斯大林不同意对于造成西线撤军的原因的评价，并在 1920 年 9 月 20 日的俄共（布）中央全体会议上声明辞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俄共（布）中央全体会议作出决定：不接受斯大林的辞呈。

几天之后，1920年9月23日，在俄共（布）第9次全俄代表会议上，斯大林重新试图将华沙战役失利的全部责任推到总司令加米涅夫和方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身上。但是，弗·伊·列宁不同意这一点，并在进行会议总结发言时指责斯大林对于西方面军指挥部的态度是不公平的。即便在这之后，斯大林也不承认他对于图哈切夫斯基以及西方面军其他领导人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在代表会议上，他就“个人问题”发表了声明，试图把列宁对他的指责引开。他强调说：“……列宁同志声明说，我对西方面军指挥部的态度是不公平的……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就这样，图哈切夫斯基的讲义《进军维斯瓦河》（1923年）就成了内战之后关于苏波战争问题辩论的开端。

在随后的几年里，对一些与苏波战争有关的问题的讨论还在继续。

1925年，军事学院教授卡库林和梅利科夫的著作《1920年与波兰白军的战争》出版。作者分析了这场战争中的军事行动，同时也指出了西南方面军指挥部对我军在华沙失利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1929年，原西南方面军司令叶戈罗夫的著作《利沃夫——华沙》一书面世。叶戈罗夫在书中为方面军的行动进行了辩护，并将华沙战役我军失利的罪过全部推到了总司令加米涅夫和方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身上。确实，叶戈罗夫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竭力赋予自己的论断以客观性，力图说明与斯大林拒绝执行俄共（布）中央全会决议和总司令关于将第12、第1骑兵军移交给西方面军的指示有关的一些事件。但是，叶戈罗夫的这个尝试遭到了斯大林的反对。在1928年12月3日给叶戈罗夫的信中，斯大林再次评价自己在苏波战争进程中的行动是正确的。后来，他提议在历史著述中完全不要再提及这个问题。

叶戈罗夫为西南方面军的行动所作的辩护以及试图推卸自己和

斯大林对我军在华沙战役中失利应负责任的著作《利沃夫——华沙》引起了许多军事活动家和历史学家的不满。叶戈罗夫开始了解这一情况。1929年12月20日，他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通报了自己的处境：

叶戈罗夫写道，“与批评我的《利沃夫——华沙》一书有关的情况迫使我打扰您，并请求私人会面以确定一些至关重要的情节，否则我绝对不能也无权给予新闻界以必需的答复，因为，一些敏感问题具有很重大的原则性，并与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和职责有直接的关系。”

档案文献中还没有发现能够表明斯大林对叶戈罗夫这封信有所反应的资料。但是，《利沃夫——华沙》一书所阐述的观点，即苏波战争期间西南方面军指挥部的立场是正确的，在当时就已经开始被认为是得到官方承认的，它为夸大斯大林在国内战争中的功绩提供了可能性。除此之外，斯大林也利用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毫不难为情地夸大自己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例如，在1927年9月8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斯大林声称：“有一系列文献资料可以证明，全党也都知道，在三年时间里，当前线吃紧的时候，中央把斯大林从这条战线派往那条战线，派往南方和东方、北方和西方。”

1929年12月21日举行的庆祝斯大林诞辰50周年的活动被用来不恰当地宣扬斯大林对于党和国家的贡献。当时，在《真理报》上刊登的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所写的题为《斯大林与红军》的文章，就是有助于夸大斯大林在军事问题上的作用的。正如文章作者本人所表达的那样，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填补在研究“作为国内战争胜利的最杰出的组织者之一”的斯大林在军事活动方面的“空白”。伏罗希洛夫在文章中强调，国内战争中所取得的一切重大胜利（察里津战役、彼尔姆战役、战胜邓尼金、弗兰格尔和尤登尼

奇军队等等)都是因为斯大林起了非凡的作用。

在这篇文章还是手稿时,斯大林就阅读过并作了一些评论。根据伏罗希洛夫的原副官赫梅尔尼茨基的证明,在手稿——赫梅尔尼茨基是在伏罗希洛夫的档案中看到的——中写道:在国内战争时期“存在着成绩和失误,但是约·维·斯大林的错误要比其他人少些”。正如赫梅尔尼茨基所说的那样,这句句子用红笔删掉了,斯大林亲笔写道:“克利姆!没有错误,应该删去这段话。斯。”

三十年代初,鉴于党粉碎了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国内经济发展也取得了很多成绩,斯大林作为党中央总书记和国家领导人,其威信很快提高。但是,斯大林不正确地接受了给予他的信任,开始滥用职权,制造个人崇拜。

斯大林在无限夸大自己在国内战争中的功绩的同时,还贬低俄共(布)中央在组织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方面的领导作用,以及弗·伊·列宁作为国防的领导人、红军的缔造者和苏联军事科学的奠基人的作用。夸大斯大林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和歪曲军事历史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引起了众多党和军事活动家的不满,并导致他们与斯大林发生了冲突。

1930年,由布勃诺夫、谢·谢·加米涅夫、图哈切夫斯基和埃德曼主编的《国内战争》一书的第三卷出版。该卷的编撰者是军事学院教授卡库林和原总司令瓦采季斯。在筹备该卷出版期间,伏罗希洛夫和叶戈罗夫试图对编辑委员会施加影响,以迫使它对该卷手稿进行修改,使其能突出斯大林在国内战争中的特殊作用。编辑委员会在这方面作了一些让步,但是并没有改变自己对于苏波战争的评价,仍然指出了西南方面军指挥部(叶戈罗夫、斯大林)所犯的错误。应该指出的是,编辑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和第三卷的作者最后都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并遭到镇压。

国内战争以后,图哈切夫斯基多次遭到来自斯大林、伏罗希洛

夫、布琼尼和叶戈罗夫的攻击。在担任工农红军参谋长期间，图哈切夫斯基经常提议对总参谋部工作的组织加以改善，并就这些问题向伏罗希洛夫提出很多建议。但是，这些建议没有得到支持。伏罗希洛夫对图哈切夫斯基持有不正确的看法，并破坏他的威信，这影响了整个总参谋部的工作。关于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通过图哈切夫斯基于1928年4月5日写给伏罗希洛夫的信作出判断：

“补充一下我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之后对您谈的那些意见。我认为，必须向您汇报导致工农红军总参谋部的工作不正常的两个基本因素……首先，无论是在日常工作中还是在计划工作中都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仿佛您作为人民委员经常是在独立地工作，而工农红军总参谋部也在独立地工作，这是绝对反常的现象，因为总参谋部实质上应该是您职权范围内的一个负责统一各个方面以及全部备战工作的工作机构。如果它不是这样的机构，那么就意味着事情是不正常的。”

布琼尼、叶戈罗夫和德宾科于1928年4月16日写给伏罗希洛夫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们对图哈切夫斯基进行了攻击。在这封信里，他们贬低图哈切夫斯基的功绩和战斗经验，缩小他在工农红军总参谋部领导工作中的作用，并提出了撤消图哈切夫斯基担任的参谋长职务的问题。在业已形成的局面下，图哈切夫斯基被迫提出辞去工农红军参谋长职务。1928年5月，图哈切夫斯基被免去工农红军参谋长一职，并被排除出伏龙芝军事学院的科学研究工作——他曾在那里领导战略研究室，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

在军区工作期间，图哈切夫斯基对于工农红军整个组织的改善、它的发展和技术改造问题感到忧虑。他就这些问题向伏罗希洛夫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具体建议。图哈切夫斯基指出了战争危险的临近，建议扩充军队，在发展我国经济的基础上，通过装备坦克、大炮和飞机来提高工农红军的战斗能力。伏罗希洛夫不仅不支持这些

建议，而且还表现出否定的态度。他在1930年3月5日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

“……呈上图哈切夫斯基信函的副本以及参谋部就这个问题的报告，供了解情况。图哈切夫斯基想标新立异……做‘激进派’。糟糕的是，在红军中存在着这样一类人，他们对于这个‘激进主义’信以为真。请您阅读这两份文件并告知我您的意见。”

斯大林对于图哈切夫斯基提出的建议也持否定的态度，他在1930年3月23日给伏罗希洛夫的复函中这样写道：

“……我认为，图哈切夫斯基同志的这个‘计划’是迷恋‘左派’言论的结果，是热衷于极端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结果。因此，在计划中‘数字游戏’取代了分析，而红军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前景被幻想所取代。‘实施’这样的‘计划’就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军队注定会被葬送掉。这将比任何一种反革命行为更坏……你的约·斯大林。”

利用斯大林的这个答复，伏罗希洛夫准备了给图哈切夫斯基的信，其内容如下：

“……给您寄去他（即斯大林）对于您的‘计划’的评价。这个评价不是很令人满意……但是我深信，这个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对于您来说也是合适的。我完全同意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如果接受并实施您的计划，那将比任何一种反革命行为更坏，因为这将彻底消灭社会主义建设，并以某种很有可能是与无产阶级对立的‘红色军国主义’制度来取而代之。”

伏罗希洛夫没有把这封信发给图哈切夫斯基，但是为了进一步损害图哈切夫斯基的威信，伏罗希洛夫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公布了斯大林的这封信。

在图哈切夫斯基周围编织的阴谋，使他处于无法忍受的境地。关于这一点他在1930年12月30日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

“……伏罗希洛夫同志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公布了您的信，对我来说，信中所表述的思想已经完全排除了提出对一些涉及提高我国国防能力的问题进行广泛讨论的可能性，例如，我作为一名军事战略研究方面的领导人，被清除出工农红军军事学院，而我在那里主持这一课题已经6年。总之，在这些问题上，我的处境变得非常尴尬。”

国际形势的一系列变化和我国经济的重大转折，证明了图哈切夫斯基预见的正确性以及他关于加强我国国防能力的一些建议的及时性。最终，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不得不重视图哈切夫斯基在军事建设领域方面的经验和才能：1931年6月，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副国防人民委员和工农红军武器装备方面的负责人。但尽管如此，对图哈切夫斯基的攻击和对其声誉的破坏并没有停止。

1931年9月，伏龙芝军事学院出版了关于总结苏波战争的教学参考资料。在这本书里，再一次以更尖刻的方式对图哈切夫斯基提出了指责，仿佛他要对华沙战役的不良结局负责。在这本书里，图哈切夫斯基在担任西方面军司令期间的行为被评价为冒险主义。这本教学参考资料的基本内容和结论得到了伏罗希洛夫的赞同。

为此，图哈切夫斯基于1932年1月致信斯大林，提出停止对他的攻击。但是，当时斯大林没有给予答复。稍晚些时候，在1932年的5月，斯大林给图哈切夫斯基写了一封信。斯大林在信中承认自己对他以前的一些建议的评价是错误的，并请求原谅给他造成的不应有的伤害。斯大林写道：

“众所周知，我在给伏罗希洛夫同志的信中<sup>①</sup>基本上同意我们总参谋部所作的结论，并对您的‘报告’表示了坚决的否定，认为您的报告是‘极端文牍主义’的结果，是‘数字游戏’的结果，等

<sup>①</sup> 指的是1930年3月23日的信。

等。这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已经过去了两年时间，对于我来说，一些不清楚的问题现在变得比较清楚了，我应该承认，我的评论过于尖刻了，我的信的结论并不是完全正确的……我感到，我给伏罗希洛夫同志的信的语气并没有那么尖刻，这只是由于对于您的不正确看法而不由自主地说出来的，如果当时我能把争论引向这个新的基础就好了。可是我没有这么做，因为很显然问题对于我来说还不是很清楚的。我修正信中的缺点有些迟了，请不要责怪我。致共产主义敬礼！约·斯大林。”

斯大林在表面上恢复了一些对于图哈切夫斯基的信任，这改善了图哈切夫斯基的工作条件。在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期间，图哈切夫斯基忠诚勤恳地对待自己的工作职责，他制定并向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提交了关于军事建设各种问题的建议。图哈切夫斯基的建议，包括战略展开问题、发展各兵种和武器装备以及加强国家和军队的动员准备等等，基本上是正确的，与后来批准的那些计划是一致的。但是，图哈切夫斯基的倡议没有得到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应有的支持，他们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不和睦的状态。

## （二）夸大斯大林对于红军在内战前线的胜利所起的作用

军事历史科学在制造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斯大林和他最亲密的战友们，其中包括伏罗希洛夫，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和在党内的高位，自1929年起就开始给历史著作的作者们施加直接的压力，使他们违背历史真实、尽一切可能来提高斯大林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苏联武装力量建设中所起的作用。对斯大林最放肆的吹捧集中在作为正式教科书于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中。在这本教科书里，红军在国内战争期间所取得的一切最重大的胜利全部归功于斯大林。他被描绘成是被党派到最危险的、对革命最具有决定性的前线去的惟一一人，好像是他在那里保证了胜利。

但在事实上，斯大林在国内战争期间的角色不是这样的。以下就是有关国内战争期间斯大林在前线情况的简短调查报告。

1918年夏季，当面对捷克白军的东部战线被宣布为共和国的主要战线时，斯大林参加了察里津保卫战。

1919年初，当党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南部战线时，斯大林前往东部战线，以弄清第3军在彼尔姆战役中失利的原因。

1919年4月到6月，国家防御的主要战线是反对高尔察克的东部战线。而当时，斯大林作为国防委员会的全权代表正在彼得格勒。自1919年7月到年底，共和国的主要战线是反对邓尼金的南部战线。而斯大林自1919年7月到9月期间担任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只是在同年的9月26日才被任命为南方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在共和国的这个主要战线上他只呆了三个月。

1920年1月9日至4月期间，斯大林在西南战线。而1920年初的重大战役都是在高加索战线上进行的，在这里图哈切夫斯基和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奥尔忠尼启则领导摧毁了邓尼金的军队。

在与资产阶级波兰进行战争期间，主要战线是西部战线（司令是图哈切夫斯基，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是温什利赫特），而斯大林是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当南方面军在伏龙芝的指挥下摧毁了弗兰格尔军队时，斯大林正在高加索出差。

因此，在国内战争期间，党中央和弗·伊·列宁总共只有一次把斯大林派到斗争的主要战场——反对邓尼金的南部战线（1919年10~12月），而且在斯大林即将到达南部战线的前夕，党中央就已经制定了粉碎邓尼金的计划并为实现这个计划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个人崇拜时期的说法，即斯大林在制定这个计划和粉碎邓尼金的斗争中起了特殊的作用，是经不起推敲的。

在前线时，斯大林在工作中犯有严重的错误，其中包括公开不

服从俄共（布）中央的决定。

在察里津期间（1918年），斯大林同伏罗希洛夫一起推行游击作风，不服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在使用旧军事专家方面执行了一条不正确的路线。根据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察里津省契卡委员会对旧军事专家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奥库洛夫于1918年来到察里津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他在1919年3月21日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发言说：

“经常发生普遍逮捕军官干部的事件……而且这些逮捕没有任何根据……我想指出察里津的一艘很出名的大驳船，它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得同化军事专家的问题不能解决。”

1918年9月被任命为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米宁，拒绝承认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任命原沙皇将军瑟京为南方面军司令的命令，尽管这个任命是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作出的。在1918年10月2日的俄共（布）中央局会议上，讨论了关于斯大林的这一行为的问题，弗·伊·列宁参加了这次会议。在通过的决议中指出：

“批准斯维尔德洛夫同志的建议——通过直通电话召回斯大林并向他指明，服从革命军事委员会是绝对必要的。”

当天，斯维尔德洛夫通过电报向斯大林转达了俄共（布）中央局的决定。但在1918年10月3日，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给弗·伊·列宁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们坚持要求取消瑟京的南方面军司令职务，毫无根据地下结论说他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求重新审议“来自无党派反革命阵营的军事专家问题”（《苏联国内战争史文件汇编》第1卷，莫斯科，1940，第383～390页）。

斯大林不愿意承认，当时瑟京作为一名大军事专家已经很出名

了，并且得到了党中央和弗·伊·列宁的信任。十月革命之后，被选为军长的瑟京转向了革命一面，后来建立了巨大的功勋。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内部的冲突使中央认识到，必须组建一个新的、没有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其成员有方面军司令瑟京、梅霍诺申和列格兰。但是在此之后，斯大林仍然继续攻击瑟京和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他致函俄共（布）中央，要求追究南方面军司令和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们的法律责任，说他们仿佛是暗中破坏第10军的供给。斯大林不愿意承认第10军提出的申请已经大大超出了一个军的需求，也不愿意考虑方面军指挥部所具备的条件。在1918年10月25日俄共（布）中央会议上，对斯大林提出的对南方面军指挥部的要求问题进行了讨论。中央对此作出决议：“不追究任何人的法律责任，责成阿瓦涅索夫同志进行调查，并向中央通报调查结果，然后再做出一个确定的决议。”

事情以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被从察里津召回而告结束。瑟京后来的命运也同许多军事领导人一样：1937年，已经退休的瑟京被逮捕并遭枪决。

1919年，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军事建设方面的问题时，“军事反对派”反对党的路线。它反对建立正规军队，坚持游击作风，要求拒绝使用旧军官。伏罗希洛夫和米宁都是“军事反对派”的积极参加者。斯大林尽管在大会上发言，为俄共（布）中央关于军事问题的提纲进行辩护，但是他没有谴责反对派对旧军官的不正确的态度，也没有与伏罗希洛夫和其他反对派分子划清界线，没有对他们的活动以及自己的错误给予党性的评价。

稍晚些时候，在1927年，斯大林试图说明自己对“军事反对派”的调和态度。他声明说：

“我没有如此敌视地反对‘军事反对派’……因为我认为，军

事反对派之中有很多杰出的工作人员，没有这些人就无法应付前线的事情。”

在1919年3月21日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非公开会议上，弗·伊·列宁发言，揭露了“军事反对派”的纲领在理论上的不足和在实践中的危害。弗·伊·列宁以防御察里津的第10军军事行动的指挥为例，令人信服地证明：在实践中不重视旧军官以及他们的才能会导致什么样的有害后果。弗·伊·列宁指出，苏维埃军人在1918年察里津战役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是红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但他同时认为，第10军在这些战斗中损失了6万人，这是不能容忍的。列宁在代表大会上指出：“伏罗希洛夫同志说，我们没有任何军事专家，我们损失了6万人。这是很可怕的。”弗·伊·列宁强调说，如果在察里津有“军事专家，如果这是一支正规军队”，那也许就不会出现如此巨大的损失了。

斯大林没有接受弗·伊·列宁的这个指示，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他对于旧军官始终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他不加区分地把他们划入反革命的阵营里，并顽固地坚持对他们实行不信任的政策。

在担任南方面军（反对邓尼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期间，斯大林在向俄共（布）中央提出的要求中不止一次地采取了最后通牒的方式。这些行为在党的工作的实践中是不能容忍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19年11月14日作出决议，对此进行了谴责。决议中说：

“通知斯大林同志，政治局认为：以最后通牒和要求辞职来加强自己的事务性要求的分量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正如以上指出的那样，1920年在西南战线，斯大林拒绝执行总司令根据1920年8月5日中央全会决议所下达的调第1、第12骑兵军援助西线命令。1920年9月1日，在有弗·伊·列宁出席的情况下，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解除了斯大林的西南方面军革命军

事委员会委员职务。

许多参加过国内战争、后来在党内和红军中担任重要领导职位的同志都非常清楚斯大林的不良作用以及他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不正确行为。他们中有许多人捍卫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战胜敌人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公开表示不同意过分夸大斯大林的作用。

例如，国内战争的积极参加者，恰巴耶夫牺牲后担任第25师师长的库季亚科夫，后来是伏尔加军区的副司令，他在1935年写了一本名为《基辅的卡纳》的著作。在书中，作者阐述了西南方面军与波兰白卫军进行的战役，揭示了方面军和第一骑兵军（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叶戈罗夫和布琼尼）在管理军队方面的缺点。库季亚科夫对西南方面军的战斗行动作了客观的评价，他因此而遭到迫害。

对这本书的评价引起了斯大林的关注。在1937年6月（当时图哈切夫斯基等人均已被逮捕）的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斯大林谈了军人们对这部作品的意见。

斯大林说：“据说是一本很坏的书。问过克利姆——这是一本坏书。但还是读了一遍，确实是一本坏书。”

始于1935~1936年的镇压，使《基辅的卡纳》一书的作者库季亚科夫预感到对自己的迫害已渐渐逼近。在被捕时遭到没收的私人日记中，他写道：

“1936年10月26日，萨马拉。我的《1920年的卡纳》是套在我脖子上的绳索，适当的时候将毁掉我。就是说，应该对此有所准备……”

1937年3月15日于古比雪夫。

只要‘铁人’还在掌权，那么一切都将是一团糟，阿谀奉承和一切愚蠢行为都将被视为荣耀，而一切明智的东西都将被贬低。《卡纳》起先是以我的鲜血，后来是以我的全部心灵写出来的。但

尽管如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除了可怕的灾难之外，它没有给我带来也不会带来任何东西。只有一点使我感到欣慰，那就是将来——甚至是遥远的将来——它将使我的名字流芳百世。”库季亚科夫的预言应验了：1937年，他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遭到逮捕并被消灭。

由于《基辅的卡纳》而蒙受灾难的还有著名军事活动家、二级军级干部谢佳金。在为库季亚科夫的《基辅的卡纳》所写的序言中，谢佳金对该书作了肯定的评价，说这是一本真实的、有教育意义的书。1937年，谢佳金被逮捕并被枪决。这样的遭遇同样落在了所有那些对斯大林在内战前线的行为持批评态度或者非常清楚他的实际作用的人的身上。

综上所述，在国内战争年代，斯大林是与其他党的和苏维埃的领导干部一起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一系列任务的。但他的活动并不是特别杰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后来，当斯大林成了党中央的总书记并将巨大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时候，在弗·伊·列宁去世之后，他采取了一切措施来夸大自己在国内战争中的功绩，极端敌视对苏维埃人民与白军和武装干涉者进行斗争的历史作真实的描写。所有那些试图恢复斯大林在前线的事实真相的人，都会失去他的宠爱，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并以斯大林固有的方法加以迫害直至被消灭。

### 五、利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损害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军事领导人的名誉

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对图哈切夫斯基不友好的态度，不仅使图哈切夫斯基得不到对自己提出的军事建设问题的支持，而且还成为在他周围形成不良社会舆论的基础。这一点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对图哈切夫斯基的态度上也有所反映，在这些

年里，他们一直极不客观地评价呈报给他们的关于图哈切夫斯基的材料。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机关在国内国外散布谣言，仿佛图哈切夫斯基怀有非苏维埃的、波拿巴主义的情绪，在他周围集结了一批有反苏情绪的人物，其中包括原沙皇军官和将军。在国外和苏联还流传一种虚妄的传言，说在工农红军中存在着一个反苏组织，图哈切夫斯基隶属于这个组织。

制造关于米·尼·图哈切夫斯基、谢·谢·加米涅夫  
以及其他军事领导人政治上不可靠的谣言；  
利用这种谣言迷惑外国侦察机关和白俄侨民中心。

从1921年11月到1927年4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进行了一项被称为“托拉斯”的间谍活动，其基本使命是对付名为“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的国外白俄军事组织。为了确保对国外君主派侨民阶层和资产阶级国家侦察机关的间谍渗透，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编造了一个神话：在苏联境内存在着一个名为“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的密的反革命组织。

苏联侦察机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旨在使“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在国外被视为是一个覆盖了工农红军指挥人员的大部分、能够领导反革命力量来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强大的间谍阴谋组织。而实际上，“建立”这样的组织的目的是为了有助于获得关于白俄军事组织及其计划的情报，以及迷惑外国侦察机关并制止他们在苏联领土上的间谍活动。

臆造的君主主义组织的代表是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形形色色的间谍充当的。早在1922年，他们就与爱沙尼亚和波兰的间谍组织建立了联系。后来又与立陶宛、芬兰和英国的间谍组织取得了联

系。自1922年起，“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与白俄军事组织的领导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沙皇将军弗兰格尔、库捷波夫和米勒，以及马尔科夫、塔尔贝格、阿拉波夫、阿尔塔马诺夫、兰勃和其他一些居住在法国、德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疯狂的反革命分子建立了定期的联系。

1922年2月，一份关于在苏联境内存在着一个“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的假情报转交给了爱沙尼亚驻莫斯科公使馆的工作人员比尔克，目的是使他不怀疑这个组织的存在，并将此情况通报给白俄侨民和资产阶级爱沙尼亚的侦察机关。后来，在1922年4月18日，比尔克被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招募了，此后他就开始积极参与制造虚假的故事，这个虚假的故事获得了一个特定的名字——“托拉斯”。

以间谍活动的方式、通过比尔克与爱沙尼亚侦察机关和参谋部保持联系的，还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其他人员。例如，1922年5月，原沙皇军队上校、间谍弗莱舍尔被派往爱沙尼亚，代表“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在那里建立“间谍联系”。给弗莱舍尔提供了一系列文件，让他转交给白俄侨民和爱沙尼亚的侦察机关，其中包括有以下内容的“指令”：

“……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可以承担义务，向这些国家通报有关俄罗斯局势的情报，并根据这些国家的需要向他们提供自己的军事总部所拥有的侦察情报资料……”

弗莱舍尔在报告自己与爱沙尼亚总参谋部反侦察局局长拉乌里茨于1922年5月11日举行的会谈情况时说：

“4点钟，我在拉乌里茨处，没有详细谈到关于武器和通讯方面的问题，我答应给他提供关于俄国红军的情报，对此他表示同意协助我们。我提供了关于新年之前组建工农红军参谋部的情报。还有军区参谋部的组织、服装的式样、军事院校管理总局的情况以及

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斯克良斯基等活动家的评价材料。他们对于特卡乔夫、加米涅夫、斯拉谢夫和列别杰夫非常感兴趣。”

1923年10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雅库舍夫和波塔波夫也代表“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与波兰总参谋部建立了联系，并向它转交了包括如下内容的备忘录：

“组织存在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了，与此同时，保持严密的组织形式也已有一年半的时间，正在整个俄罗斯扩展开来。

中央通过各地的全权代表与地方保持联系，这些全权代表都是各个军区的人……组织的性质主要是军事的，它的绝大部分成员是军人，正因为这样，组织才能渗透到各个部队里，其中某些部队的人员全部隶属于该组织。除此之外，在整个中央行政机关以及绝大部分地方行政机关里，组织都有自己的人，它的消息如此灵通也说明了这一点。

组织的目的是通过在俄罗斯发动军事政变来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重新建立法律制度和政治体制。”

在这之前，“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还以间谍情报的方式将有关苏联红军的假情报提供给了其他资产阶级国家的侦察机关。

大约是在1923年的6月，经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批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比尔克与在雷瓦尔的英国侦察人员米克利琼和他的助手、英国移民护照管理局工作人员日德科夫建立了联系。日德科夫代表英国侦察机关开始与“托拉斯”秘密联系。

关于这个问题，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斯特尔涅于1924年12月9日写道：

“在这方面进行了以下制造假情报的工作：在工农红军总参谋部侦察局中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假情报工作的特别处，我们还按照军事部门的指令向所有中欧国家的参谋部提供情报（尽管实际上只是通过互换军事情报的方式把材料交给了波兰人、爱沙尼亚人、芬

兰人和英国人，但有文件表明，在拉脱维亚、法国、日本和德国的参谋部里也都有我们的情报资料)；在这种情况下，红军的实力要比实际所拥有的实力更强大。”

从现存的“托拉斯”间谍案的卷宗文件里可以看出，从最初开始虚构这个或者其他类似的组织的时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就在国外和苏联散布假消息，说在红军中服役的绝大部分原沙皇军官、很大一部分苏联军人、甚至是部队的大多数人，对于苏维埃政权充满了敌意并在等待时机，准备参加在苏联实施的反革命政变。

经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负责人的批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向白俄侨民和外国侦察机关通报了诋毁图哈切夫斯基、谢·谢·加米涅夫、列别杰夫以及其他一些著名军事活动家的假情报，说他们对苏维埃政权怀有敌意。

1922年12月，间谍雅库舍夫在出差期间在柏林与一些白俄侨民进行了会晤，其中包括与所谓的“君主主义组织最高委员会”主席马尔科夫的会晤。在会晤期间，为“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制定了与苏维埃政权进行斗争的“纲领”和“策略”。

例如，在题为“俄国保皇党的策略”的文件中指出，“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近期的任务是：

“……推翻共产党的政府，以能够立即建立秩序并着手国家建设的有组织的力量夺取政权……为实现近期的目标，即推翻布尔什维克，应该利用一切党派和所有站在反苏维埃立场上的人……在俄罗斯当前的任务是训练工人和军队……。”

雅库舍夫向马尔科夫通报了目前在苏联已经进行的工作，宣称在苏联西方面军里站在他们一边的军人就已达到了百分之25%，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样的人已从15%增加到18%，在乌克兰和苏联的其他地区也有很多支持他们的人。

雅库舍夫在回答马尔科夫“在西方面军里是否有旧将军”的问

题时说：

“……西方面军里几乎没有旧将军了，但是，在高级指挥员的职位上有很多非常年轻的过去的基干军官，他们是由我们通过自己的组织提拔到领导职位上的。”

接着，雅库舍夫继续向马尔科夫通报说：

“总之，在所有大部队里都有我们自己的人，或者是在指挥人员中，或者是在各个参谋部里……我们在中央也有非常得力的关系。可以说，几乎在整个中央机关里，特别是在军事部门里，都有我们自己的人，正因为这样，我们经常能够对任命或罢免不理想的人物施加影响。”

从雅库舍夫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来，他对马尔科夫提到了在工农红军中服役的“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领导人的名字：扎伊翁奇科夫斯基、波塔波夫和萨布勒，他们原来都是沙皇军队中的著名将领。

作为疯狂的反革命分子，马尔科夫自然对于在工农红军中有很高地位的著名苏联军人是否也属于“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的问题十分感兴趣。因此，他向雅库舍夫询问：“……图哈切夫斯基、加米涅夫、列别杰夫以及布鲁西洛夫怎么样？”

对此雅库舍夫回答说：

“他们没有正式加入组织，但是毫无疑问，前三个人是我们的人，而第四个人已经太老了，没有什么用处了。”

从雅库舍夫的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早在1922年，他就已经开始在国外制造舆论，说图哈切夫斯基、谢·谢·加米涅夫、列别杰夫和其他一些著名将领对苏维埃政权怀有不友好的态度，这一点也正是白俄侨民和资产阶级希望并期待的。

很自然，在此之后，国外的白俄侨民以及与“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有联系的外国侦察机关的间谍开始特别关注起图哈切夫斯基、谢·谢·加米涅夫等人。

例如，1923年，波兰侦察机关向并不存在的“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成员提出了以下一些问题：

“1) 最高鉴定委员会的情况。

2) 托洛茨基、斯克良斯基、加米涅夫、列别杰夫、沙波什尼科夫等人的社交圈。

3) 侦察总局的编制。

4) 关于西部军区的情况……。”

“总司令加米涅夫出行的准确路线。5月30日他将前往突厥斯坦……华沙得到的情报说，这时伏龙芝和图哈切夫斯基将在什切青。请立即核实……。”

爱沙尼亚的侦察机关对“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提出如下要求：

“致弗拉基米罗夫。图尔斯基请求通报以下内容：

1) 列别杰夫已经获得或即将获得新的任命，到东部的某个地方任职，该消息是否可靠。

2) 亚基尔是否已经离职。

3) 列维切夫目前担任什么职务。”

在这份文件上还有某人批示的手迹：“由于图尔斯基即将起程，我请求今天答复上述这些问题。”

随着有关所谓“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的“活动”方面的情报增加，国外越来越经常地向“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人提出吸收图哈切夫斯基加入这个组织的要求。为了使“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更有“威信”和更加“强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满足了白俄侨民集团的这一要求，向国外通报说图哈切夫斯基已经被“吸收进”“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而实际上这是继续诋毁图哈切夫斯基。

1931年9月15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别局工作人员斯特尔

涅对“托拉斯”案件作了简介，他就该问题写道：

“后来，在某个时期里，‘托拉斯’内部在吸收米·尼·图哈切夫斯基参加组织问题上的分歧引起了国外君主主义者的关注。事情是这样的：国外不止一次地向我们提出吸收图哈切夫斯基加入“托拉斯”的建议，特别是青年君主主义者希望在图哈切夫斯基身上看到一个俄罗斯的波拿巴，并认为如果从一个共产党员的角度来衡量，他实际上是一个君主主义者。‘迎合’这种气氛，国外有报道说，图哈切夫斯基已被成功地吸收加入了‘托拉斯’。这条消息在那里引起了轰动……。”

从这则简介中还可以看出，1923年秋天，库捷波夫将军派遣的间谍扎哈尔琴科和拉德科维奇从法国秘密来到苏联，他们受到了假扮成“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成员的国家安全总局间谍和工作人员的迷惑。在从苏联发给库捷波夫将军的信函中，他们证实图哈切夫斯基加入了这个反苏维埃的组织。

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假情报，国外白俄侨民的各个阶层都确信，图哈切夫斯基在从事阴谋活动。确实，作为直接负责散布有关诽谤图哈切夫斯基的假情报的斯特尔涅在1931年所写的关于“托拉斯”的简介中曾描述了此事，仿佛“吸收”图哈切夫斯基加入“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的倡议出自国外，因为国外的人们认为图哈切夫斯基对于苏维埃政权不友好。但是，斯特尔涅隐瞒了下面这个情况：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雅库舍夫很早以前就将图哈切夫斯基的“这种不友好”通报给国外了，散布这种说法的还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其他间谍。

1923年中，雅库舍夫再一次前往柏林和巴黎出差，在那里他会晤了白俄侨民兰勃、克利莫维奇、米勒、科尔姆森、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和其他一些人，并与他们讨论了准备在苏联发动政变的问题，还谈到了苏联军队以及“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成

员的一些情况。

1923年6月26日，雅库舍夫在动身之前还准备了一些问题，准备在与白俄侨民会晤时向他们说明。问题包括以下内容：

“要求：

1. 与“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有联系并准备参加政变的将军名单。

2. 属于“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的前高级官员名单。

3. 有该组织存在的部队的名单，应指明该部队的驻地，并尽可能根据准备情况将部队分为几个等级。（标出百分比）

……

5. 说明是否应该要求尽快发动。

6. 应该考虑这样的想法：青年人无所事事，越来越倾向于法西斯主义，如果再过一段时间不采取决定性行动，整个运动可能会具有另一种形式，并趋向于法西斯主义……

……

8. 指明用谁的名字进行往来通信。

9. 预先通知前往柏林的行程并向他建议按地址往来进行信件。”

作为提供给白俄侨民集团的情报（准确地说是假情报），还交给雅库舍夫一份《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和一份所谓“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代表大会的决议。

在《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中包括如下内容：

“3. 确认指挥部和军事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在红军中加强君主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应该把红军变成俄罗斯国民军。

4. 确认工作的重点是：

1) 使基于军官占据指挥员职位。

2) 争取在红军中实现单一指挥制、取消政治委员制，同时建

议基于军官在取消了政治委员的部队里应留在共产党内以保持指挥员职位……

……

8. 全力以赴争取进入所有司令部，在各部队建立宣传鼓动网络。

9. 特别注意把我们的人安置在所有的飞机库和弹药库……

……

13. 建议指挥部研究法西斯主义。”

在决议中还指明，经过委员会和“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指挥部的批准，可以将有关红军的间谍情报转交给外国侦察机关。

为了使国外更加坚信“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是一个“强大的组织”以及该组织与红军中的重要人物有‘直接的关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和工农红军侦察管理局向外国侦察机关的间谍提供了各种情报资料：关于红军的军事训练和动员准备、部队部署、部队人数以及人员编制和军需供给方面的资料，关于各级指挥人员和各级参谋部负责人的姓名、铁路运输能力、军工企业生产能力以及资产阶级国家侦察机关（其中包括波兰和爱沙尼亚等国家）的侦察机关感兴趣的军事情报。

但是，出于对提供明显的假情报可能使“托拉斯”这个神话被揭穿，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领导人在提供一系列假情报的同时，也通过自己的间谍提供一些关于红军的真实情报，同时还将带有某些军事工作人员亲笔签名的文件提供给外国侦察机关。

斯特尔涅在关于“托拉斯”的简介中指出，给外国侦察机关提供了以下情报：

“1) 关于外国侦察机关任务的间谍情报；

2) 根据原始资料编写的报告；

3) 真实的命令或其副本，因为敌人已经有了这些文件，出于

‘战略’考虑而提供这些真实的文件；

4) ‘真实的’、但已经被修改的命令文件或其副本；

5) 完全是假的命令或是其他同等价值的文件；

6) 正式的、非正式的和机密的（过时的或是已失去现实意义的）的军事出版物；

7) 挑衅性文章和报刊的时事述评。”

白俄侨民和外国侦察机关收到这些带有工农红军负责人亲笔签名的情报之后，毫无怀疑地确认他们与反苏组织有联系，加入这个组织的还有一些著名的军事领导人。

例如：1923年，给波兰间谍机关提供了一份《关于保证战时红军技术装备供应的报告（附详细数据）》的副本，该文件是1923年10月5日对第2143/cc号函电的答复，上面有谢·谢·加米涅夫、温什利赫特和沙波什尼科夫的亲笔签名。

斯特尔涅对转交这份文件的情形做了以下描述：

“我们提供的以各种原始资料为依据的间谍情报基本上还是让人放心的，通过向波兰侦察机关转交带有武装力量总司令谢·谢·加米涅夫同志、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温什利赫特同志和副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同志签名的‘真实’文件的副本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包括战时红军技术装备的数字资料和军事—政治结论……我指的是：这不仅在目前这种动荡的政治形势下、而且对于我们今后的继续工作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我军物资保障的数字情报成为波兰和法国总参谋部今后工作以及法国和波兰总参谋部代表于1924年秋召开的特别协商会议的基础。”

1925年1月29日，向波兰侦察机关提供了一份军级和师级指挥员和各级参谋部负责人名单，以及关于红军其他方面的情报资料。在集团军指挥人员和各级参谋部负责人名单里有“德宾科、费季科、费尔德曼、卡希林、库季亚科夫等等。”

在1923年底、1924年初已经显示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对图哈切夫斯基的名字“玩弄过火”了，于是又下达了命令（不清楚是谁下的命令）：把图哈切夫斯基从“托拉斯”的工作中“排除出去”。斯特尔涅写道：

“……由于确定不便将图哈切夫斯基‘列入’托拉斯的组成人员中，并得到了停止用他的名字做‘游戏’的指示——考虑到国外的影响而只得把图哈切夫斯基从‘托拉斯’的组成人员中撤出来。但是，应该逐渐做到这一点。我们发表文章说，‘托拉斯’的领导人扎伊翁奇科夫斯基（当时，他还不知道自己是某个反革命组织的成员）违背政治委员会的决议，不允许图哈切夫斯基开展实际工作，因此在扎伊翁奇科夫斯基与‘托拉斯’其他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严重冲突，事情似乎到了‘托拉斯’的最重要领导人被迫辞职、将要换班的地步。这个策略提供了某种喘息的机会，因为对于已经辞职、但又没有交出职位的托拉斯的活动家来说，可以在一段时间里不进行活动。组织的工作似乎是暂时停止了。

除此之外，发生的‘冲突’还使扎伊翁奇科夫斯基在巴黎公众眼中的威望有所提高。因为，在那里人们曾认为他威信不高，缺乏领导君主主义者组织的能力。而在这件事情上，由于我们的信以及我们与‘侄儿们’<sup>①</sup>谈话的结果，他成了胜利者。扎伊翁奇科夫斯基在威信、坚定性和意志力方面赢得了胜利。

为这件事写了数十封信，并使‘侄儿们’在几周的时间里都为‘组织’的命运而焦虑不安。此后才决定通知，‘冲突’已经平息，图哈切夫斯基也没事了。巴黎流传着一批信件，反映出对消除所有误会的欣慰。‘侄儿们’也非常满意，并开始写文章向国外详细描

<sup>①</sup> 指的是与“托拉斯”有联系的间谍扎哈尔琴科和拉德科维奇，他们是库捷波夫的手下，当时居住在苏联。

述托拉斯内部的一些勾心斗角的事情。

应该说，这一事件的特别引人注目之处是，在与‘侄儿们’谈话时不得不非常准确地分配角色。奥佩尔普特对于这些勾心斗角的事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雅库舍夫也按自己的方式描述和评价了仿佛发生过的事情。最后，波塔波夫在与‘侄儿们’会晤后，经常‘认为’有必要发表一些意见，以便说明他对‘托拉斯’命运的担忧，或是对已发生的事情的看法。”

但是，正如档案资料清楚表明的那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将图哈切夫斯基从“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这个组织里“撤出”时，并不是为了消除由于他们的过错而在国外造成的虚假印象，即认为图哈切夫斯基是对苏维埃政权怀有敌意的人。

本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可以——譬如说——向国外通报：图哈切夫斯基拒绝从事任何反苏活动并中断了与“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组织的联系，但他们把事情说成仿佛图哈切夫斯基准备继续在阴谋和间谍组织里进行“实际工作”，而“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领导人——扎伊翁奇科夫斯基则不允许他进行这种“工作”。不仅如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还通报说，“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组织中一批拥护图哈切夫斯基的领导人都已经退出了这个组织。这样一来，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同志们从“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这个组织中“退出”就变成了另一种形式，即是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提出来的，而在实际上意味着所有这些人将继续反苏活动，只不过是在“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这个组织之外进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继续破坏图哈切夫斯基的名誉，在国外制造更加强烈的看法：图哈切夫斯基敌视苏维埃政权。

损害图哈切夫斯基和苏联其他军事活动家的情报资料并不仅仅被白俄侨民组织获得，这些情报资料还通过白俄侨民之手流传到各个国家的间谍机关，并被它们为自己的情报工作需要而夸大、歪

曲、传播。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编造的关于图哈切夫斯基是一个反苏人物的神话，从外国侦察机关的口中说出来就成了“机密情报”，然后又被我们驻国外的间谍所得到并重新回到这个神话的制造者手中。例如：居住在爱沙尼亚的英国情报人员日德科夫在1925年1月12日写给“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组织的信中，有如下内容：

“根据我所掌握的、来源非常可靠的情报判断，按照你们的（党的）精神来加工图哈切夫斯基和瓦采季斯是非常合适的。特别是对后者，甚至更有机会达到目的。”

在这封信上还有这样的指示：“致阿尔图佐夫同志。斯特尔涅。1925年1月24日。”

目前还没有确定，是否以“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的名义给国外发出过有损瓦采季斯名誉的情报资料，但是他们可以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比尔克那里得到这些，比尔克当时是驻莫斯科的爱沙尼亚公使团工作人员，与瓦采季斯很熟悉。

在招募了比尔克之后，与他进行了谈话，并将谈话内容制成了文件：《1922年5月7日与比尔克的谈话》。其中关于瓦采季斯是这样记录的：

“还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比尔克就认识了瓦采季斯。当时他在拉脱维亚步兵团里服役，而瓦采季斯是这个团的指挥员。他们之间的关系几乎从来都没有中断过。1921年，瓦采季斯经常到比尔克那里去。除了军事杂志和苏联军事文学作品之外，比尔克从瓦采季斯处没有得到过书面形式的间谍情报。自瓦采季斯迁居到新的住宅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于1921年底就中断了，在这一年里没有往来。”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有充足的“根据”来证实对瓦采季斯的怀疑，并在比尔克的协助下组织对他的秘密监督。

在1922年5月2日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外事局局长阿尔图佐

夫的书面报告中，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基亚科夫斯基写道：

“关于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格鲁沙’<sup>①</sup>提供了如下情报：临近3月份的时候，他与斯维钦教授和涅兹纳莫夫教授见了面；而早些时候，他与目前秘密居住在爱沙尼亚的列别捷夫将军——格鲁沙正是通过他才同我们相识的——见过面。实际上，格鲁沙并没有从他们手中获得文件情报，也不能说他们就是间谍。但他在同他们就军事问题进行谈话时经常了解到对于爱沙尼亚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后来又决定，格鲁沙要重新同斯维钦建立联系，并让他与我们的第202号相识。我们希望以此来了解斯维钦，查明他的活动。此外，斯维钦最要好的朋友列别捷夫也向格鲁沙提供了一些资料。关于总参谋部的瓦采季斯，格鲁沙谈的也是这些内容。同时也决定，还是派格鲁沙与他联系。”

由于担心泄露机密，明仁斯基直接下达指示：不让“托拉斯”与英国间谍机关有联系。这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没有把有关图哈切夫斯基和瓦采季斯“参与”反苏组织的消息通报给英国间谍机关的代表日德科夫，而于1925年1月29日写了一个含糊的、模棱两可的复函：

“我们毫不怀疑情报来源的可靠性，正是由此你们获得了适用于对T.和B.<sup>②</sup>进行加工的材料，但是，这两个人不是我们故事里的主人公。对于他们，我们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研究，我们看不出，招募他们有什么益处。”

尽管图哈切夫斯基已经“被排除”参加“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组织的活动，但他继续受到白俄侨民的关注。他们非常渴望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的著名军事干部能站到他们一边来。

① 即比尔克。

② 指图哈切夫斯基和瓦采季斯。

关于这一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弗拉索夫的报告可以证明。为了与库捷波夫和其他白俄侨民会面，弗拉索夫于1926年10月前往巴黎：

“对于红军，库捷波夫感兴趣的只是军队——主要是指挥人员——的情绪，以及现役军人在执勤时和非执勤时的相互关系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对军队的日常生活也有兴趣。

他感兴趣的人中有伏罗希洛夫同志、图哈切夫斯基同志以及曾是上校和将军的其他著名军事专家。不知为什么，他对图哈切夫斯基同志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问能否将他吸收到民族运动拥护者的队伍里。”

临近1927年，编造“托拉斯”这个案件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确信，必须收缩这个案件。他们认为，被“阴谋参加者”编织的各种关系会越来越暴露“托拉斯”。取消“托拉斯”的建议得到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领导的支持。由此开始了取消“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组织的准备工作。

但是，事件却按另一种情形发展了。1927年4月，“托拉斯”的主要间谍之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奥佩尔普特与库捷波夫将军的间谍马利亚·扎哈尔琴科一起逃到了国外。在国外，奥佩尔普特揭露了“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是一个臆造出来的组织。奥佩尔普特是恐怖分子萨文科夫的老战友，曾于1921年被肃反委员会逮捕并受到监禁，1922年1月，作为国家安全机关的秘密工作人员被吸收参加工作。他积极参加了“托拉斯”一事。奥佩尔普特是一个政治上极不坚定的人，是一个追求个人名利地位的冒险家，他暂时成功地隐瞒了自己对苏维埃政权的仇视。在从苏联逃到芬兰后不久，他又与扎哈尔琴科一起偷偷潜回莫斯科进行破坏和恐怖活动。他们未能实现重大行动。但在1927年6月，奥佩尔普特和扎哈尔琴科把位于小卢比扬卡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宿舍烧

了。在此之后，他们企图逃往国外，但在斯摩棱斯克州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发现，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开枪自杀了。

在“托拉斯”间谍案件的卷宗里，还有一份译自波兰文的文件，标题是《对红军总参谋长就1925年12月9日至1927年3月19日期间的军队状况致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报告的评价》。

从这份文件的内容可以看出，波兰侦察机关是从“君主主义者组织”那里得到的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的这份报告的。正如档案文件所表明的那样，这份报告包含了一系列假情报。但是，从军事情报角度来看，它暴露了涉及工农红军的动员、战备、铁路运输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转交给波兰人的报告是否带有图哈切夫斯基的签字、是以副本还是照片的形式，尚不可知。但是，波兰侦察机关指出，“就其形式来说，文件的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

奥佩尔普特叛逃后，揭露了“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是一个臆造出来的组织。在此之后，波兰侦察机关在1928年底通过将报告内容同其他各种情报——其中包括报刊上公布的伏罗希洛夫同志、图哈切夫斯基同志、谢·谢·加米涅夫同志、普加乔夫<sup>①</sup>同志等人的公开讲话——进行对比的方式，对图哈切夫斯基的“这份报告”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分析报告书里写道：

“……从以上阐述的比较内容中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仿佛是图哈切夫斯基的报告中所提出的作战思想与总参谋部第2局观察的结果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在“对图哈切夫斯基报告的分析的总的结论”一章里，波兰侦

<sup>①</sup> 普加乔夫，谢苗·安得列耶维奇（1889～1938），曾是俄国旧军队军官，1918年参加红军。20～30年代先后担任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红军副参谋长、乌拉尔军区和中亚军区参谋长。

察机关指出：

“这样，我们所遇到的是明显的挑唆事件。如果注意一下挑唆事件本身的性质，以及以前对于事件的起源所做的研究（君主主义者组织）和苏联总参谋部进行挑唆活动的方法（过分夸大苏联军队的重要性），就可以充分肯定，君主主义者组织的产生源自获得的一份文件，而这份文件正是苏联总参谋部编造和提供的，它的机构就是整个事件的起源……君主主义者组织在莫斯科、在我们华沙和其他外国中心城市都有代表。无论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对于全体俄罗斯侨民来说，这个组织就是苏联从事间谍活动的组织。”

还在“托拉斯”案件败露之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就臆造了一系列类似“俄国君主主义者同盟”这样的假装反苏的组织，并通过这些组织的间谍机关向国外发送假情报以及损害图哈切夫斯基名誉的情报。

关于这一情况，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在题为《“托拉斯”神话的目的》的文件中写道：

“根据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希望的方向，利用加工过的关于红军情况的情报（为此目的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侦察管理总局下专门设立了一个处）来误导敌人的侦察机关。我们传播这些情报起先是通过‘托拉斯’，后来就开始通过其他各种渠道。”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必须建立“秘密的反苏平行组织”，这是因为：第一，要将仿佛是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情报转交给外国侦察机关和白俄侨民，并使他们完全相信所获得的情报的“可靠性”；第二，如果“托拉斯”败露，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能够利用这些平行“存在”的渠道与外国侦察机关和白俄侨民保持联系。

例如，虚构的名为“辛迪加-4”的间谍组织就是这样的渠道之一，它存在于1924~1930年期间。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在外国侦察机关和白俄侨民面前编造了

一个关于这个组织的故事，说在苏联境内存在着一个以推翻苏维埃政权为目标的秘密的“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组织”，其中心在莫斯科。

1925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通过自己的间谍拉尔森-普费伊尔与柏林的君主主义者-基里尔派联合会（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大公”觊觎沙皇宝座，甚至在国外就宣布自己是俄罗斯的皇帝）的代表进行了通信来往。1925年11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波波夫被派往柏林，冒充是“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组织”司令部的代表。在柏林，波波夫会晤了基里尔分子的代表别尔加尔德和比斯库普斯基将军。在进行会谈时，波波夫向他们通报了“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组织”的状况并与他们达成协议，共同进行反苏活动。波波夫还向比斯库普斯基通报了损害图哈切夫斯基威信的假情报，仿佛图哈切夫斯基是一个有波拿巴主义倾向的人。

关于这一点，波波夫在1925年12月24日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报告中写道：

“比斯库普斯基对于拉捷尔、萨瓦捷耶夫、图哈切夫斯基以及各军区新的司令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当我向他有几分夸张地描述图哈切夫斯基是一个地道的波拿巴主义者时，他说，我们可以向他许诺，如果在必要的时候他能站到我们这边来，君主<sup>①</sup>可以任命他为侍从武官。总之，对于我们需要的人，如果能使他们转到我们一边，我们是不会吝惜任何奖励的。”

在别尔加尔德的协助下，波波夫与驻德国盟国管制委员会成员、英国国王的侍从武官拉杰伊上校建立了联系，向他描述了共同纲要和组建“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组织”的目的，并同他商定保持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未能得到发展，因为拉杰伊奉召回国了。

<sup>①</sup> 此处指的是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大公”。

后来，基里尔运动的弱点表现出来了。据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力加强“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组织”与英国和德国侦察机关的联系。

例如，1926年6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拉尔森-普费伊尔通过德国男爵克莱斯特同德国国防军侦察机关进行关于建立联系的谈判。但是国防军的官员回避同“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组织”进行直接联系，为此派了一个叫拉亚的人，这个人是德国警察局和德国总参谋部侦察机关的间谍。

1927年2月，间谍波波夫在比斯库普斯基的协助之下，与德国法西斯组织“钢盔团”的代表埃恩凯尔和德国民族党首领、国防部领导成员维斯塔尔普男爵的全权代表瓦捷尔建立了联系。但是，埃恩凯尔和瓦捷尔拒绝协助“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组织”。

1926年8月，通过国家政治保卫局间谍、原沙皇军队的中将季亚科诺夫（此人与白俄侨民有着广泛的联系），在“辛迪加-4”计划中还开辟了一条英国方面的路线。1926~1927年间，季亚科诺夫与英国右翼保守分子洛卡尔-列姆普逊、比尔肯赫德、德捷尔金格等人进行了关于支持“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组织”进行“反苏维埃”活动的谈判。此后，间谍波波夫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派往国外，他在那里同英国人德捷尔金格、比尔肯赫德等人见过面，并代表“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组织”同英国外交部俄国司司长的全权代表莫尔进行过谈判，当时在场的还有英国驻俄侦察机关原负责人托伦希尔和驻巴尔干地区的英国侦察机关领导人马克-费尔佐。

在1927年5月16日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报告中，波波夫写道：

“德捷尔金格对于俄罗斯即将发生的政变极为关注，竭力想从我这里获知，在特别被看好的人中，谁将成为运动的首脑人物。这个问题他向我提了三次，极想得到一个确定的答复。我回答他说，

我们的组织里还没有这样的人，在我们这儿也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但是，在军队里有一个人，他享有极高的威信，我们将推荐他作为运动的最高领导人。德捷尔金格听了非常高兴，说他想问的正是这样的人。”

从有关“辛迪加-4”的档案材料中还无法确定：1927年的时候是否提到了图哈切夫斯基是可能的反苏运动领导人。但是，作为拟议中的推翻苏维埃政权之后的军事执政者，图哈切夫斯基的名字在1928年4月17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人员波波夫和杰-罗勃特前往巴黎、柏林和伦敦的出差计划中已经被提到，文件上有波波夫的签名。在这份计划中详细地阐述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在与白俄侨民各个中心的代表以及英国保守党议会党团领导人洛卡尔-列姆普逊及其秘书史密斯、马克-费尔佐和德捷尔金格等人就“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组织”问题进行谈判时应该遵循的方针。

对于“如果俄罗斯的政变行动成功，谁将成为运动的首脑人物”这个问题，间谍们应该这样回答：

“最有可能保持未来政变的积极成果而使俄罗斯避免共产党政权重新恢复的是个人专政，这个人将是在政变时刻由起事者选举产生的，他将承担使俄罗斯摆脱混乱局面的责任，因为不能只是依靠刺刀来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当然，不可能提前任命这样的专制者，但我们必须准备选举这样的知名人物，尤其是在军队中，因为军队在这次政变中将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考虑到性格特点、在社会上尤其是在军队中的影响以及生活经历，组织确定由图哈切夫斯基担任这一角色。当然，他本人是不知道这一情况的，但是他周围的人对此已有充分准备，我们毫不怀疑，在决定性的时刻他将同我们在一起并领导我们。”

从有关间谍波波夫1928年7月27日巴黎之行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上述诽谤图哈切夫斯基的计划是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来执

行的。在巴黎，波波夫与白俄侨民梅尔古诺夫、库捷波夫、扎伊采夫等人见了面。

“在第二次见面时，库捷波夫提出了过渡时期以及在这个时期必须建立强有力的专政的问题。‘福托格拉弗’<sup>①</sup>回答说，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我们决定，在最初的一年半到两年……我们倾向于在这个时期建立专政。于是，库捷波夫立即提出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看待图哈切夫斯基。这显然是梅尔古诺夫将他与‘福托格拉弗’就这一问题的谈话向库捷波夫作了通报，正是在这次谈话时，‘福托格拉弗’向他说明了图哈切夫斯基是我们拟定的未来的专政者。这时，库捷波夫已经足以为胜利而干杯了，‘福托格拉弗’在答复他时声称，我们确定这个候选人是因为在我们自己的队伍里找不到像图哈切夫斯基这样在军队和人民中享有如此高威信的人。”

1928年11月，为了检查“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组织”的活动，库捷波夫的代表、白俄侨民奥加列夫秘密来到莫斯科，并同也是“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组织”成员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谢列勃列尼科夫多次会面。

在自己1928年12月1日的总结报告中，谢列勃列尼科夫引用奥加列夫的话通报说，巴黎白俄侨民组织“人民革命联盟”的领导人阿列克辛斯基在1928年曾向法国总参谋部代表请求给予财政援助以在侨民中开展反布尔什维克运动，当时奥加列夫也在场。正如谢列勃列尼科夫强调的那样，法国总参谋部的这位代表说：

“……如果阿列克辛斯基提供关于苏联武装力量情况的资料，我们就立即付钱。而且已经告诉他，我们感兴趣的是关于……通过推举图哈切夫斯基在部队中宣传波拿巴主义思想的可能性的情报

<sup>①</sup> 波波夫的化名。

……奥加列夫还向谢列勃列尼科夫询问实现波拿巴主义的可能性，谢列勃列尼科夫向他说明，图哈切夫斯基具备担任这样的角色的全部条件，他在军队指挥人员中、特别是在旧军官中享有极高的威望。”

1930年1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波波夫和杰-罗别尔季被派往柏林，在那里同库捷波夫和其他白俄侨民以及德国国防军成员班格和“钢盔团”在柏林的全权代表瓦格涅尔少校见了面。所有这些都答应给予臆造的“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组织”以援助。

1930年，“辛迪加-4”间谍计划停止了活动，因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被怀疑参与了时任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主席的库捷波夫将军失踪案。

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馆里保存的某些资料能够说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以各种各样的名字捏造一些反苏维埃组织的存在，利用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著名的红军干部和苏维埃国家机关干部的名字玩弄阴谋，向外国侦察机关提供诽谤他们的假情报。

###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 对图哈切夫斯基、谢·谢·加米涅夫和其他 苏联军事活动家所进行的间谍活动

有大量的资料可以说明，图哈切夫斯基、谢·谢·加米涅夫、沙波什尼科夫、亚基尔、科尔克、布琼尼以及其他著名的苏联军事活动家，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间谍监视之下。利用专门派遣的间谍，散布各种各样针对他们的传闻、谎言、假材料以及其他诽谤情报。

对于这些间谍情报资料的研究证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在有

意诽谤图哈切夫斯基的同时，竭力将其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内，并预先采取措施来说明其观点和情绪。图哈切夫斯基同其他军事专家一样，也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进行了“加工”。此外，参加虚构的“托拉斯”间谍组织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也参与了“加工”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工作。

上面已经强调指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进行挑唆行动的方法是：让间谍人员散布“诋毁”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情报，并使第三者拥有这些情报，然后通过其他渠道将这些情报作为间谍情报返回。对于以这种方式所获得的情报，通常是不作核查的，而在此之前的若干时间里，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档案馆里已经积累了这些资料。

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间谍祖耶夫、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奥夫相尼科夫等人积极参与了诽谤图哈切夫斯基及其周围的人的挑唆阴谋。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著名军事专家进行“加工”的主要间谍案件是“总参谋部军官案”，在这个卷宗里集中了军事首长们自1924年开始的全部材料。这一案件涉及350多人。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列出的“不可靠分子”有：图哈切夫斯基、谢·谢·加米涅夫、原总司令瓦采季斯、邦奇—布鲁耶维奇、斯涅萨列夫将军、斯维钦将军，以及其他许多人。

最初的一些有关图哈切夫斯基仿佛具有波拿巴主义情绪的间谍情报是在1925年12月由间谍奥夫相尼科夫提供给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他通报说：

“目前，在基于军官和将军阶层中，非常明显地出现了两个较大的派别：君主主义派……和波拿巴主义派，这一派主要集中在米·尼·图哈切夫斯基周围。”

在此后的通报中，奥夫相尼科夫又指出了一系列原是沙皇军队

军官的红军现役军人的名字，说他们参加了图哈切夫斯基小组。于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又吸收了某些与图哈切夫斯基一起工作的人员参与秘密工作，指派这些人去调查这个被称为“波拿巴主义的小组”的情况。

但是，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其中包括奥夫相尼科夫本人——报告过有关图哈切夫斯基进行任何反苏活动的情况。奥夫相尼科夫在1938年被捕后交待，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给他下达的任务就是调查图哈切夫斯基，但是，他——奥夫相尼科夫——却没有找到任何有损图哈切夫斯基声誉的材料。

在专门调查图哈切夫斯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人员中，最为积极的是祖耶夫和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他们在谋取有关图哈切夫斯基的各种传闻和谣言的活动中表现非常主动，对这些谣言进行了非常细致的研究，并增加了许多自己的臆造和推测。这些间谍在完成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发的关于调查和诽谤图哈切夫斯基的任务的同时，还积极参加了围绕上述“托拉斯”案件的间谍措施。间谍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和祖耶夫互相认识，但最初彼此都不知道他们各自都与国家安全机关有关系，并互相交换诽谤图哈切夫斯基的各种谣言。后来，这些诽谤性的情报都汇集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并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许多工作人员所掌握。

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利用来调查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军人的人员并没有受到信任。例如，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是原沙皇军队一位将军的女儿，这位将军1922—1926年期间在军事学院从事教学工作。扎伊翁奇科夫斯基本人自1921年起就是全俄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名间谍。他的女儿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没有从事过任何对社会有益的劳动，却很“荣幸地”成为各种挑唆性谣言的传播者。自1922年开始，直至1937年，她一直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后来有一段时间，她因被指控从事

间谍活动而受到侦讯。获释后直到1954年，她仍然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间谍。为了引起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关注，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长期以来一直在编造与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著名军事活动家有关的错综复杂的情节，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关于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各种情报，不择手段地诽谤他们，而这也给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中的投机钻营分子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例如，1928年春天，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接受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任务，与德国记者戈尔宾格建立了联系，此人1937年以前一直居住在莫斯科。戈尔宾格被怀疑与德国间谍机关有联系，并被认为是的对苏联怀有敌意的人。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引用戈尔宾格的通报，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了各种诽谤苏联著名军事活动家的情报。她是关于红军中存在着一个军事阴谋组织的臆想的作者。

德国间谍机关了解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联系。1927年逃到国外的奥佩尔普特在揭露参加制造“托拉斯”一案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时，也说出了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的名字。因此，不排除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通过戈尔宾格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诽谤图哈切夫斯基和苏联其他著名军事活动家的情报，是根据德国间谍机关的指示而进行的。

以下是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关于她在1929年6月从戈尔宾格处获得的情报的一份报告：

“1929年，德国记者戈尔宾格对我们说，谢·谢·加米涅夫和图哈切夫斯基分别接受了德国总参谋部的任务，在为德国工作。戈尔宾格还说，加米涅夫已经工作了很久并很积极，而图哈切夫斯基则很消极。”

目前，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居住在莫斯科。她在1962年5月9日的信中对这个问题解释说，戈尔宾格并不知道图哈切夫斯基与德国侦察机关有联系，但是，据戈尔宾格本人讲，他是接受了“白

己主人”的任务，来散布诽谤图哈切夫斯基的情报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现有的关于图哈切夫斯基和苏联其他著名军事活动家的“诽谤性材料”，有些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本身所使用的挑唆方法的结果，还有些是外国间谍机关的假情报以及各种各样的臆造和杜撰。尽管如此，这些材料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仍然被系统地进行归纳整理，然后又被作为以下结论的依据，即在红军中服役的所有革命前的军事专家，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及其周围的人，都对苏维埃政权充满了敌意。

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这类总结文件之一中写道：

“在工农红军中、尤其是在高层机关任职的有很多是旧军队的基干军官。这类军事专家就其过去的社会地位来说，是与苏维埃政权格格不入的……他们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苏维埃政权的垮台。”

以上提到的材料是1930～1932年期间对军事领导人——首先是旧军官——进行大规模镇压的依据。仅仅一个名为“春天”的大案件，就逮捕了3000多名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红军部队各级领导岗位上任职的原沙皇军队的军官和将军，他们都被毫无根据地指控参加了各种反苏军官组织并从事敌对活动。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我们党的政策的个别问题上表现的动摇和不坚定被认定是有组织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动。

被逮捕的人之中有军事学院教师卡库林和特罗伊茨基。逮捕这些与图哈切夫斯基关系最为密切、同他一起在军事学院工作并赞同其军事观点的人，目的是为了获得损害图哈切夫斯基声誉的供词。

特罗伊茨基和卡库林提供了许多这样的证词。只要愿意，从中可以得出诸如图哈切夫斯基对右倾抱有好感等结论。起先，这些证词很相似，而且模糊不清。在这些证词中表述的仅仅是猜测和怀疑。

但是，在1930年8月26日进行审讯时，从卡库林处已经得到

了直接诋毁图哈切夫斯基的证词：

“在莫斯科，有时在图哈切夫斯基那里，有时在盖伊那里，有时在茨冈人那里聚会。在列宁格勒，是在图哈切夫斯基那里聚会。所有这些聚会的首脑都是图哈切夫斯基，参加的人员有：我、科列辛斯基、埃斯特莱赫尔、叶戈罗夫、盖伊、尼科诺夫、丘索夫、维特林和卡乌费尔德。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期间及以后，确认要在右倾和中央的斗争最为尖锐的时期组织干部，等待时机。但是，当时图哈切夫斯基却提出了有关政治行动的问题，其目标是使右倾分子充分发挥作用并转入新的高级阶段，即通过右倾而夺取政权的军事专政。在7月7日和8日两天里，以上人员在图哈切夫斯基处见面和商谈，并作出最后的决定，即组织起来，等待时机。”

在以后的审讯过程中，卡库林走得更远了，说图哈切夫斯基的阴谋组织在1930年之前就已形成了。在接受审讯时，卡库林对图哈切夫斯基的观点、他周围的人、他把人们吸引到自己方面的方法以及图哈切夫斯基的声望谈得很多。他赋予这一切反政府密谋行动的色彩，尽管在卡库林和特罗伊茨基的供词里没有任何有关图哈切夫斯基从事这种行动的具体事实。

所有这些针对图哈切夫斯基的供词都被赋予极其重要的意义。明仁斯基把这一切都作了汇报，他在1930年9月10日向斯大林做了如下书面报告：

“我已向莫洛托夫同志汇报了这一案件，并请求允许在得到您的指示之前保留这样的说法，即卡库林和特罗伊茨基是因为间谍案件而被逮捕的。分别逮捕犯罪集团的参与者是很冒险的事。有两种办法：或者立即逮捕犯罪集团的最积极的参与者，或者暂时采取特工措施以防不测，并等待您的到来。

我认为必须说明的是，目前所有谋反集团发展得很快，因此后一个方案非常冒险。”

明仁斯基还将审讯卡库林和特罗伊茨基的记录附在自己的信里。斯大林收到这些文件后未作应有的批评性评价，他在1930年9月24日写给奥尔忠尼启则的信里谈到了图哈切夫斯基在政治上的不忠。斯大林写道：

“请尽快读一读卡库林和特罗伊茨基的供词并考虑一下消除这个令人不快的案件的措施。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份材料是极其秘密的：这件事莫洛托夫和我知道，而现在你也很快就会知道。我不清楚，克利姆是否知道这件事。原来，图哈切夫斯基已经成了反苏分子的俘虏，他被右倾队伍里的反苏分子成功地说服了。这是根据材料得出的结论。这是否可能？既然不能排除，这当然是可能的。显然，右倾分子甚至准备实行军事专政，只要能够达到摆脱中央、摆脱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以及发展工业的布尔什维克速度的目的。正如你所看到的，奥尔洛夫和斯米尔诺夫的供词（关于逮捕 П.Б.）以及卡库林和特罗伊茨基的供词（关于特罗伊茨基的计划和‘观点’）有着同样的形成环境——右倾阵营，这是他们的来源。显然，这些先生们是想让这些军人为孔德拉季耶夫—格罗緬—苏汉诺夫之流服务。孔德拉季耶夫—苏汉诺夫—布哈林的党，就是这样的均衡。事情就是这样……”

不能以通常的方式（立即逮捕等等）来了结此事。这件事应该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把明仁斯基在报告中提出的问题推迟到10月中旬解决，那时我们大家将聚在一起。

你来莫斯科的时候，请与莫洛托夫谈谈这件事。”

后来，从卡库林那里得到了证词。这些证词起先涉及阴谋活动，后来则涉及图哈切夫斯基的恐怖主义情绪。例如，卡库林在1930年10月5日受审时声称：

“接着，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说，恰恰相反，可以指望党内斗争的继续尖锐化。他说，我不排除出现这种前景的可能性，即当

这种斗争发展到极其残酷和激烈的时候，政治的和个人的激情就会燃烧起来，那时一切框框和界线都将被忘却和冲破。还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使右倾分子放开手脚，狂热之徒甚至会铤而走险刺杀斯大林同志本人……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可能与乌格拉诺夫有某种联系，也可能与许多党内和党外的人物有联系，这些人认为，在与无政府主义和外敌人侵作斗争时，图哈切夫斯基是可能的军事领袖。现在，当我有时间深入思考所发生的一切时，我不能排除，图哈切夫斯基在预言狂热分子将向斯大林开枪时，他是在掩盖他本人实际考虑的那种情景。”

从被逮捕的特罗伊茨基处也获得了类似证词。

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和伏罗希洛夫共同决定，核实卡库林和特罗伊茨基提供的关于图哈切夫斯基的证词。为此目的，让卡库林和特罗伊茨基与图哈切夫斯基进行了当面对质。在当面对质时，他们确认了自己的证词。被询问的还有著名的军事活动家加马尔尼克、亚基尔和杜博沃伊，他们都非常了解同在工农红军中工作的图哈切夫斯基。当时，没有作出逮捕图哈切夫斯基的决定。

图哈切夫斯基与卡库林和特罗伊茨基当面对质的记录文件没有保存下来，也没有发现评述这些对质情况的其他任何文件。在档案馆里也没有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和伏罗希洛夫与加马尔尼克、亚基尔和杜博沃伊的谈话记录。但是，可以根据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1937年6月在国防部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发言对此作出判断。在这次会议上，当夏坚科发言时，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打断了他：

“斯大林：我们问过杜博沃伊同志、亚基尔同志和加马尔尼克同志，将图哈切夫斯基作为敌人逮捕是否正确。他们三个人都说，不，这可能是某种误会，是不正确的。

伏罗希洛夫说：我们已经进行了当面对质。

斯大林说：我们已经进行了当面对质，并决定将这件事情一笔

勾销。但现在的情况是，供出图哈切夫斯基的两名军人的交待是正确的……”

但是，没有任何其他材料能够证明斯大林关于卡库林和特罗伊茨基的证词是正确的断言。

卡库林是国内战争的参加者，1932年未经司法程序被判枪决，后来改判监禁10年，被严密隔离，死于1936年，现已获平反。

特罗伊茨基于1930年被判处3年流放，从那时起他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秘密合作。1938年，根据重新捏造的材料，他被作为仿佛是以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军事阴谋的参加者而遭到逮捕。在接受审讯时，特罗伊茨基确认了自己在1930年提供的关于图哈切夫斯基具有反苏情绪的证词，他说：

“……从土耳其返回之后<sup>①</sup>，我与图哈切夫斯基和卡库林恢复了联系。我经常去图哈切夫斯基那里做客。他那里几乎每天都开会，尽管还谈不上是什么政治性的集团，但是所有的人都心照不宣：图哈切夫斯基及其政治前途是这个联盟的中心。1926～1930年间，我一直鼓吹图哈切夫斯基的优点。尽管已经感觉到他的反革命本质，但仍在一切方便的场合吹捧他的才干。我说‘感觉到’是因为他极为谨慎，显然认为我们还不够资格，还不足以向我们表述他的下一步计划。1930年我被逮捕。经过长时间极其痛苦的体验和思考之后，我决定与任何反革命活动一刀两断，在苏维埃政权面前放下武器。我提供了关于图哈切夫斯基和他周围的人的供词，并在与图哈切夫斯基进行当面对质时确认了供词，当时在场的还有斯大林同志、伏罗希洛夫同志、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以及其他政治局委员……”

在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1939年5月11日开庭审判时，特

<sup>①</sup> 大约是在1925年。

罗伊茨基不承认自己有罪，推翻了以前的供词，并宣称他是在受到威逼的情况下被迫说了假话。在被判枪决后，特洛伊茨基在1939年5月12日提交的上诉书中就这个问题写道：

“我是在极其严酷的状况下招供的。我在列福尔托沃监狱被关押了5个月，这使我丧失了为我的证词的真实性而斗争的能力。他们经常强迫我在一些记录文件上签字，这些文字不是我所作的符合实际的回答，而是侦讯人员要求的回答。”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很多著名的军事专家由于名为“春天”的案件而于1930年被逮捕。对他们所作的进行反苏活动的指控是虚假的、捏造的，这一点现在已被绝大多数案件证实，这些案件的所有被告均已得到平反。实际上在1930—1931年期间就已经清楚，对于“春天”案件被告的指控材料是站不住脚的。例如，因“春天”案件而被逮捕的军事学院教师别扎诺夫—萨克沃列利则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招供说，莫斯科反革命中心的组成人员有G.A. 普加乔夫和B.M. 沙波什尼科夫。在1931年3月13日进行当面对质时——当时在场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普加乔夫和沙波什尼科夫当场揭穿了别扎诺夫的诽谤性谣言。据此，普加乔夫在当天被释放。其他一系列军事专家，包括沙波什尼科夫、谢·谢·加米涅夫以及一些原旧军队军官，尽管仍存在着针对他们的指控，但是并没有遭到逮捕。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某些领导人员，其中有梅辛格、别利斯基和叶夫多基莫夫，早在1931年就认为军事专家的案件是“虚假的”，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并对罪犯的证词表示不相信。但是，他们的这些预告不仅没有得到正确的评价，还被认为是“集体反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领导。”他们还因此而被免除了所担任的职务。1931年8月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改变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领导班子的组成，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务委员会的某

些成员调到其他工作岗位。

同一天，斯大林签署了一份致各民族地区党中央书记、各边区党委书记、各州党委书记的指示信。信中指出：

“责成各民族地区党中央书记、各边区党委书记、各州党委书记，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骨干工作人员的小范围内解释最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领导班子的变动原因：

1. 梅辛格同志和别利斯基同志被停止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奥尔斯基同志被解除特别局的工作，叶夫多基莫夫同志被解除秘密作战部主任职务……其原因是……

1) 他们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中散布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具有腐蚀性的谣言，说军事部门中的敌对活动案件是“虚假的”案件；

2) 他们以此涣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的铁的纪律……中央认为议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的“内部弱点”及其实际工作的“不正确”路线的行为无疑是某些感到痛苦的“共产党员”糊里糊涂地接受了来自敌对阵营的谣言。”

最有代表性的是：当时，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31 年 8 月 5 日的决定，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被剥夺了给特别局下达任务以及监督他们完成任务的权力，为的是“使特别局直接隶属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早在 1931 年就被逮捕的苏联军事领导干部之一、曾是沙皇军队军官的维尔霍夫斯基在给伏罗希洛夫的信中描述了在对其案件进行侦讯和庭审时违背法律的事实，此信于 1935 年 1 月 5 日转给了斯大林。维尔霍夫斯基指出，曾经公开向他宣称，如果不交待有关自己从事反苏活动和他在军队中的熟人的罪行，那么等待他的将是必然的枪决。在 11 个月的时间里，维尔霍夫斯基遭受了严酷的体罚和逼供，生活在令人难以忍受的监狱里。维尔霍夫斯基在信中还

写道：

“在监狱的时候，检察机关的代表来过三次。我向他声明说，如此进行侦讯工作，最终是无法弄清事情真相的。但检察机关认为甚至没有必要听我说。

从整个侦查过程可以明显看出，没有任何人对事情的真相感兴趣，他们只想逼迫我提供虚假的证词。”

这样，在调查1930~1931年期间被逮捕的一系列原苏联军事专家的案件过程中，没有找到能够证实现有的关于图哈切夫斯基等军事活动家进行反苏活动的间谍情报和侦查材料的证据。不仅如此，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仍然继续收集各种损害图哈切夫斯基名誉的间谍情报和其他资料。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支付报酬的间谍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仍在继续加紧从事这项工作，蓄意散布诽谤性的谣言。出于卑鄙的动机，自1931年起，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又开始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提供各种挑唆性的情报资料，不仅诋毁图哈切夫斯基，而且诋毁其他许多军事领导干部，如沙波什尼科夫、亚基尔、普特纳、乌博列维奇、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

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提出的任务，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继续与上面提到的戈尔宾格保持联系。例如，她在1934年3月报告说：

“戈尔宾格说，他已经得知，在军队里存在着一个军事阴谋组织，准确地说是在莫斯科的高级指挥人员中，更准确地说，是在高级指挥员中的共产党员之中。军事阴谋组织当前的目标是谋害斯大林同志，消灭现存的政治局并实行军事专政。阴谋者们的工作在不久的将来即将展开。目前所进行的逮捕，即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最近的行动，不能惊动军队。因为，目前在军队里无疑不应该进行逮捕行动。”

1934年5月2日，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报告说，她在1934年

4月30日拜会了戈尔宾格。戈尔宾格又一次对她说，在工农红军中存在着一个军事阴谋：

“按照戈尔宾格的说法，在红军指挥人员中，在最上层，已经存在着对苏维埃政权的现实的背叛行为，其目的是自上而下地改变苏维埃政权的面貌。此外，在红军的指挥人员中正在形成一种以隐蔽的形式表现的完全独立自主的倾向。”

在这次谈话时，戈尔宾格似乎还说：

“对于俄国军队来说，布尔什维克是什么？这不是敌人，而不是敌人的人实质上也不是布尔什维克。图哈切夫斯基不是布尔什维克，他从来都不是布尔什维克。乌博列维奇是这样，加米涅夫也是这样。布琼尼也不是布尔什维克。但是——戈尔宾格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他们选中了图哈切夫斯基。”

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所提供的关于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著名的军事活动家的情报，不仅仅只是从外国人那里听到的。正如已经阐明的那样，自1933年起，她就开始从自己的熟人那里收集各种关于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传闻，在所提交的报告中，她写了很多自己编造的谎言，这些谎言不仅诽谤一些军事指挥员，还攻击某些苏维埃组织和机关。

由于保存期满，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报告的正本卷宗已经被销毁，但是，从目前还保留的这些报告的副本可以确定，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她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交了大量诽谤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谢·谢·加米涅夫、普特纳、沙波什尼科夫、布琼尼以及其他许多红军干部的报告材料。

1937年，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被逮捕，在接受审讯时，以及在自己的亲笔供词里，她为了表明自己的功劳而指出了那个事实，即定期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有关在工农红军中存在着一个军事阴谋以及诋毁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情报。扎

伊翁奇科夫斯卡娅就这些问题交待道：

“大约自1933年起，我报告了沙波什尼科夫（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原院长，后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的背叛活动……”

自1932年起，我同盖伊一起来到列宁格勒，根据列宁格勒方面的材料，我提请盖伊注意科尔克、普特纳、克里沃鲁奇科等声望稍低一些的军事活动家。”

“1933年，索斯诺夫斯基把我派到列宁格勒，化名为‘维拉·帕夫洛夫娜·尼古拉耶夫娜’，以便弄清工农红军指挥人员的情绪，以及原沙皇军队军官的情绪……我在列宁格勒逗留了十天左右。我写了一份关于指挥人员情绪问题的总结报告，这份报告被盖伊采纳了。报告中提到了一些谈话，其内容涉及建立一个由他们自己掌握领导权的组织。当时我已知道，一些党务机关的负责人也参加了这个组织，如沙兰戈维奇；军队的干部有普特纳、科尔克、埃德曼、E. 谢尔盖耶夫、费尔德曼等。我写信告诉盖伊，传闻说仿佛正在准备恐怖行动。当时我还不知道，到底是将对谁实施恐怖行动。后来，我从报纸上得知，基洛夫被杀害了。”

为了完全弄清这个集团，我请求盖伊让我在列宁格勒逗留一段时间，但他没有答应。

当时，我还同沙兰戈维奇的妻子建立了联系，我是在她从列宁格勒来莫斯科时同她见面的。沙兰戈维奇的妻子还应该协助我同科尔克以及普特纳建立联系，但是没有成功，因为，索斯诺夫斯基逮捕了沙兰戈维奇。此后，对科尔克、普特纳等人进行加工的所有工作都中断了。”

“我同索斯诺夫斯基一起，对摩托机械化部队的指挥员哈列普斯基进行了加工。”

我在给索斯诺夫斯基的关于哈列普斯基的总结报告中写道，哈列普斯基在红军中建立了一个遵循图哈切夫斯基路线的集团，他们

也是德国人的拥护者。

关于这个集团的情报，我是从军事工程学院教员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戈托夫斯基上校和哈列普斯基的助手马·阿·马图尔以及他的妻子处获得的。”

目前对于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的情报资料的研究表明，这些情报资料具有挑唆性质，其中很多都是荒诞不经、凭空虚构、根本不足以相信的。即便在当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许多工作人员对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的这些情报资料也持这种评价。例如，在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 1934 年 12 月 9 日的一份情报中说，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在军队中是依靠旧军官的支持，还说：

“应该由军人来刺杀斯大林……刺杀应该在莫斯科进行，并由有可能接近斯大林同志的人、或者是由于工作职务离他很近的人来完成。”

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局原局长盖伊读了这份报告后，于 1934 年 12 月 13 日写道：

“这纯粹是愚蠢的昏聩的老太婆的胡言乱语。把她带到我这里。”

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仍然继续收集这种明显是假的间谍材料，并且与像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这样的间谍—挑唆者保持经常的联系。

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的情报就其内容来说都是不具体的、矛盾的。她在这些报告中谈到的情报不是出自图哈切夫斯基之口——她自 1923—1924 年起没有与图哈切夫斯基见过面，而是根据别人的口述。关于这一点，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于 1929 年 12 月写道：

“除了米·尼·图哈切夫斯基本人——他在大约 5 年前曾来过我们这里——以外，我不认识他家里的任何人。”

在 1962 年 4 月 27 日致苏共中央的解释信中，她还强调了这一

点：

“实际上，我本人从来没有就政治问题同图哈切夫斯基交谈过，也没有报告过图哈切夫斯基本人对我说过的任何一句话，因为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

我所报告的关于图哈切夫斯基的情况都是从我父亲以及我的堂兄H.E.卡库林、伊万·亚历山大罗维奇·特洛伊茨基的母亲和姐姐、德-拉扎尔、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戈托夫斯基兄弟……<sup>①</sup>那里听说的。可能还有其他人，现在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我记得，我通常都详细和准确地引用那些对图哈切夫斯基发表看法的人的话。我同他们——除了卡库林以外——甚至连一般的熟人都不是。无论是我，还是图哈切夫斯基，都只是到过他们的住宅而已。”

至于间谍情报的内容，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在自己1962年5月10日的说明函中写道：

“正如从我所提供的证词以及1937—1939年期间的情报中可以看出的那样，自1923—1924年到1937年期间，我经常收集各种各样的对于图哈切夫斯基、加米涅夫、沙波什尼科夫、普特纳、亚基尔、普里马科夫以及其他一些红军指挥人员的毫无根据的意见、见解、言论以及一些没有事实证明的谈话，而在某些问题上则完全是个人的结论、总结和臆测并将这些材料转交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所有这些情报我都是从德-拉扎尔、卡库林、祖耶夫、索洛古勃、托洛茨基的母亲、马列夫斯基、戈尔宾格、列别托以及其他一些人处得来的，当时，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引起了我的怀疑。我没有任何具体的事实可以证明图哈切夫斯基、加米涅夫、沙波什尼科夫、普特纳、普里马科夫等人从事犯罪活动，尤其

<sup>①</sup> 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接着还提到了20个人的名字。

是组织反苏活动。我根本就不认识科尔克、亚基尔、沙波什尼科夫、加米涅夫、普特纳、普里马科夫、乌博列维奇，而对于图哈切夫斯基，我只是在1924年以前见过他几次，同他的家人我也根本不认识。”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原工作人员塔尔洛夫斯卡娅在1937年接受审讯时说，她是自1933年开始参加工作的，最初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某局局长索斯诺夫斯基的秘书，后来成为侦缉人员，1936年12月之前与间谍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见面。在1937年8月29日接受审讯时，塔尔洛夫斯卡娅评价了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作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所做的工作：

“她是索斯诺夫斯基的间谍。他同她会面，接收情报，并付给她钱。在我之前与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见面并付给她钱的是另一位秘书费罗班托夫，他是在我之前担任这项工作的……她有供应卡和医疗证。在索斯诺夫斯基去列宁格勒之后，我奉他的命令开始与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见面，从她那里得到情报并付给她钱，然后我再把情报交给盖伊。根据盖伊的指示，我要按规定转交情报，比如，关于军事问题情报转交给多勃罗季茨基和加尔特，关于德国人的情报转交给沃伦斯基和科诺诺维奇。大家都竭力避开她的情报，不愿意接受，认为这些情报是虚假的……她写了很多关于军队领导人的事情，比如亚基尔、图哈切夫斯基、科尔克以及其他一些人。写这些东西的还有她的丈夫，我是从加尔特处知道的……”

当我把这些情报交给多勃罗季茨基和加尔特时，他们对此付之一笑，并说，她这是在胡说……”

她对索斯诺夫斯基和盖伊特别好。有一次，盖伊给了她1000卢布购买别墅。我还从她的话中得知，盖伊曾送给她一块金表。大家表面上对她很好，说她以前提供的材料很有价值，但是最近好像是“枯竭”了。她的情报经常被称为疯人呓语，并使她停留在过去的功劳上。”

临近1937年，当开始大规模镇压党、苏维埃以及其他方面的领导干部时，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开始积极地伪造诋毁军事领导人——首先是针对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等人——的材料。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里抛出了假的间谍情报和侦讯材料，针对图哈切夫斯基的各种各样的谎言迅速传播。

1937年1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局原领导人阿尔图佐夫给叶若夫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引用了存档的在国外的间谍人员关于图哈切夫斯基似乎从事敌对活动的情报，并表述了自己的意见，说在红军中存在着托派组织。

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局的材料，特别局局长列普列夫斯基编写的工作计划中提出了很多对军事工作者进行积极加工的具体措施。在计划中特别指出：

“B. 收集全部现有的有关罗戈夫斯基、奥尔洛夫、沙波什尼科夫和其他著名军事工作者的材料，核查这些材料，制定对他们进行加工的具体计划，并将这些工作置于第5局局长日常的直接的监督之下……8. 要特别注意弄清楚莫斯科的或是地方的军人中间的法西斯分子集团。”

1937年5月13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向叶若夫提交了关于与图哈切夫斯基有关的材料的调查报告。在调查报告中再次援引了卡库林和特罗伊茨基关于图哈切夫斯基进行阴谋活动的供词，而这些供词早在1930年就已经被确认是假的。在调查报告中还采用了间谍—挑拨者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1937年1月28日的间谍情报，说还在1931年的时候，“……他更渴望的是按德国人的意愿、而不是苏联政府的意愿成为一名元帅……。”

所有这些明显是假的间谍情报和侦讯材料都有助于形成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以及其他一些军事领导人在政治上不可靠的观点，并成为指控他们犯有严重国事罪的材料依据。

## 【专题说明】

# 朱可夫元帅的命运

(1946年4月至1963年6月)

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1896—1974)是苏联著名军事家，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建立了辉煌战功，获得了崇高威望。他的名字和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经永远地联系在一起，作为民族的英雄和国家的荣耀，对他的爱戴和纪念经久不衰。但在战争结束不久，出现了大量以搞垮朱可夫为目的的挑拨性言论。同时国家安全机关采取了各种手段对朱可夫进行调查，竭力寻找一切可以破坏他名誉的东西，并试图制造朱可夫策划军事阴谋的假案。1957年，时任国防部长的朱可夫帮助赫鲁晓夫击败了“反党集团”，但4个月后就因被认为有“波拿巴主义”企图而被解除了国防部长职务。朱可夫的言行被置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严密监视之下。本专题收录的文件反映了朱可夫元帅在战后年代的生活和工作中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和内幕。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白云、刘明翻译)

№09369

## 阿巴库莫夫关于诺维科夫声明

### 致斯大林的信

(1946年4月)

绝密

斯大林同志：

呈上现被关押的原空军总司令、空军主帅亚·亚·诺维科夫写给您的声明信。

阿巴库莫夫<sup>①</sup>

打印三份：

第一份：斯大林同志

第二份：军队反间谍总局书记

第三份：执行者：阿巴库莫夫

---

① 阿巴库莫夫，B.C. (1908—1954)，1946—1951年期间担任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1951年6月被开除出党并被逮捕，1954年12月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庭判处枪决。

附 录

原空军总司令，现被关押的诺维科夫  
致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  
约·维·斯大林同志

声 明

我在您面前是有罪的，在空军中发生的一系列犯罪活动中，我的罪过要比任何其他人的罪过更大一些。

在接收由航空工业部生产的装备空军的不合格飞机和马达方面我犯有直接的罪过，作为空军司令，我应该将这些所有的情况向您汇报，但我没有这样做，却对您隐瞒了在空军和苏联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中存在的反国家行为。

除此之外，我还向您隐瞒了空军中一些负责干部无所事事、飞短流长，很多人干私事的时间要多于干公事，还有一些领导干部对待工作持不负责任的态度。我包庇了这些坏蛋，比如扎罗夫，他在我的庇护下为所欲为。我本人在空军中养成了奴颜婢膝和阿谀奉承的作风。

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是由于我本人陷入了与接收质量不合格的航空技术器材装备空军有关联的犯罪活动的泥潭里。说起来我感到羞耻，我多次从前线弄来各种财物据为己有，并谋取私利。我失去了理智，妄自尊大，认为自己是个大人物，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外国都有名气。为了表现自己是多么了不起，甚至在与我的前妻维列杰耶娃谈话时说，丘吉尔、ЦИЕН<sup>①</sup> 等人知道我。

<sup>①</sup> 所指不详。

只是现在，进了监狱，我才猛然醒悟并开始思考，我都干了些什么。

在战争期间，为使我更好地、称职地工作，最高统帅为我做了一切，真的是对我耳提面命。但我对此不是感激，而是像下流坯那样总是抱怨，表现不满情绪，甚至在自己的亲友面前对武装力量部部长进行敌意的攻击。

我在这份声明中想向您诚实地、彻底地说清楚：我除了给我所领导的空军的日常工作所造成的巨大损失——这些我在供词中已经作了交待——之外，我还犯有一系列更为严重的罪行。

我现在认为，在给您的声明中必须谈谈我与朱可夫的联系，谈谈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战争期间和直到不久前我们所进行的政治上有有害的谈话。

现在我虽然已经被捕，没有义务建议哪些方面该怎样做，但是我还是想对您讲讲我与朱可夫的关系，因为我觉得该是结束朱可夫的有害行动的时候了，因为如果事情还是这样继续下去，就将造成更有害的后果。

战争期间，我与朱可夫一起在前线工作，我们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我被捕之日。

谈到朱可夫，我首先想说的是，他是一个极端好权又自命不凡的人，他非常喜欢荣誉、名望以及对他的阿谀奉承，他不能忍受反对意见。

了解了朱可夫以后，我明白了，他尽量经常呆在部队里并不完全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更多地是为了个人的目的，即以此来为自己获取到更多的威望。

我们作为高级将领，应该将全体指挥人员团结在最高统帅的周围，而朱可夫执行的却是一条有害的、独特的路线，即在自己的周围拉拢一些人，使他们成为自己的亲信，并作出一副自己是他们的

“慈祥的大叔”的样子。在朱可夫身边的这样的人中有我，还有谢罗夫。

朱可夫对我很好，而我也竭力巴结他。

朱可夫非常喜欢了解有关上层机构动向的所有新闻。朱可夫在前线时，根据他的要求，我尽自己所能打听关于大本营情况的信息然后告诉他。我向您承认，我在这项卑鄙的活动中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例如有这样的情形，当我去过大本营之后，就向朱可夫讲述斯大林的情绪，斯大林在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批评我或其他人，我在那里听到了什么样的谈话，等等。

在与我和其他人交谈时，朱可夫非常狡猾、隐晦地以谨慎的口气试图降低最高统帅部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大言不惭地强调自己作为一位战略家在战争中的作用，他甚至宣称，所有主要的军事行动计划都是由他制定的。

在最近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朱可夫在与我交谈时多次说过，粉碎德国人的列宁格勒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及库尔斯克大会战的作战计划都是根据他的思想制定、并由他朱可夫起草和审核的。关于粉碎德国人的莫斯科保卫战，朱可夫也是这样对我讲的。

1946年2月，有一次我在朱可夫的办公室，也许是在别墅，准确的地点我记不清了，朱可夫对我说，斯大林往柏林给他打电话，并询问他希望获得什么样的任命。对此，根据朱可夫的说法，他似乎答复说，希望担任陆军总司令。

朱可夫这个意见的动机，我理解，不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而是因为在这个职位上他实际上将指挥几乎是整个国防人民委员部，并与军队永远保持联系，因而也就不会丧失自己的知名度。正如朱可夫自己所说的那样，所有的人都将知道他。

朱可夫还说，如果担任分管一般事务的武装力量部副部长，那

就要对所有的事情负责，而在军队的威信却要小得多。

当时朱可夫还对我说，在通过高频电话谈论有关国防人民委员部改组的问题时，斯大林问他，他认为应该任命谁担任什么职务。

朱可夫对我说，他向斯大林说了自己的看法，斯大林对他的观点表示赞同，而且仿佛还说：“我等你回莫斯科，到时我们一起来决定任命的问题”。

我之所以举这次谈话为例，是因为朱可夫在对我讲这些话时向我暗示，他怎样建议，斯大林就怎样做。

对于这一切还要说一点，朱可夫非常狡猾，工于心计。这在表面上自然是不易察觉的，但我由于同他关系密切，就看得非常清楚。

谈到这里，我还要向您讲一个事实作为例子：朱可夫在表面上总是极力接近瓦西里·斯大林，像父亲一样对待他、关心他。

但事实上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不久以前，也就是在我被逮捕的前夕，我在朱可夫的办公室里谈工作，在谈话时他对我说，看来瓦西里·斯大林将被任命为空军督察，当时我对这一任命表示了不满并说了许多侮辱瓦西里的话。而朱可夫在与我单独交谈中谈到瓦西里·斯大林时比我所说的还要尖刻，对他的侮辱更加卑鄙和下流。

1943年初我在西北战线上，当时那里正在准备粉碎所谓“杰米扬斯克大包围”的战役。我在那里与朱可夫见了面。

有一次在午餐的时候我问朱可夫，关于空军战斗行动的报告我应该写给谁。朱可夫答复说，应该写给斯大林，但他又马上对我说，他在离开莫斯科前与最高统帅就制定某个作战计划的问题发生了争执，因此，朱可夫说，他决定不给最高统帅打电话，尽管他应该这样做。朱可夫还说，如果斯大林亲自给他打电话，那么他也打电话。

朱可夫对我讲这件事情时，口气是如此傲慢，以至我感到很惊

讶，他怎么能够这样谈论斯大林呢。

朱可夫还当着我的面批评最高统帅和苏联政府的某些措施。在就这些话题交谈时，我在很多情况下是支持朱可夫的。

在我被解除空军总司令职务后，在朱可夫的办公室里，我向他抱怨说，斯大林解除我的职务以及逮捕空军的人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朱可夫赞同我的说法，并说：“应该由某人承担责任”。

不但如此，朱可夫还对我说：“瞧，没有一个人替你说句求情的话，而在斯大林作出这样的决定时，又怎能沉默呢”。尽管朱可夫没有直截了当地说，但我从他的话中明白了，他不赞成政府关于解除我的空军司令员职务的决定。

还应该指出，当斯大林召见我，向我宣布解除我的空军司令员职务并严厉地批评我在工作中的严重错误时，我心里对马林科夫的行为非常愤恨，他也参加了这次谈话，而且他非常清楚在接收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交付的用于空军的不合格物资中存在的所有错误，但他什么话也没说。当我向朱可夫说到这一点时，他回答我说：“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支持你了，所有的人都一言不发”。

朱可夫还对我说：“当斯大林指出你在工作中的缺点时，还说了两句‘没关系，会改正的’，我听了甚至暗自发笑。”

我还想起了朱可夫不满政府决定的其他一些事实。

在科尔孙—舍甫琴科夫斯基<sup>①</sup>战役结束之后，原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获得了元帅称号。

朱可夫对政府的这个决议非常不满，他在与我交谈时说，这次战役的计划是由他朱可夫亲自制定的，而奖励和称号却给了其他人。

<sup>①</sup> 乌克兰城市。

同时，朱可夫还对瓦图京作了否定的评价。他说，作为部队指挥员，瓦图京的能力不强，他只是司令部的一名军官，如果没有他朱可夫，那么瓦图京根本不能领导任何战斗行动。

为此，朱可夫向我抱怨说，他作为大本营的代表领导了大部分作战行动，而嘉奖和表扬却都给了方面军的指挥员。为了证明这种观点，朱可夫还举例说，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战役的命令都是发给方面军指挥员的，而他却留在背后，尽管所有的战役都是由他制定并且实施的。在这次谈话时，朱可夫向我暗示，要我去莫斯科时替他在这方面说说话。

这一时期，朱可夫在与我进行的一系列谈话中还对我说过，政府没有因为他制定和实施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列宁格勒保卫战以及库尔斯克会战而奖励他。

朱可夫说，尽管这些战役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他至今为止没有受到嘉奖，而方面军的指挥员们已经得到好几次奖励了。对此朱可夫还表示说，与其当大本营代表，最好还是担任方面军的指挥员。

朱可夫在很多事情上总是竭力主张采纳自己的意见，在他的某些建议未被政府采纳的情况下时，他经常大发怨言。

1944年，有一次我与朱可夫一起在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他对我说了1943年他与科涅夫一起向斯大林汇报某个作战计划、而斯大林没有同意这些计划的情形。朱可夫说，他坚持试图向斯大林证明这个计划的正确性，但是斯大林却建议对这个计划进行更改并下达了有关指令。朱可夫对此非常不满，对斯大林颇有怨言，并说他对斯大林对他的这种态度非常反感。

同时，朱可夫还对我说了他对政府授予国防工业部领导干部将军军衔是如何不满。朱可夫说，授予人民委员及其副手将军军衔的决定是不正确的，政府本身就贬低了将军军衔。我们这次谈话是在

1944年底进行的，当时我和朱可夫都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

1944年秋天，在华沙附近，朱可夫还对我说过，他向斯大林提出申请，请求授予库利克苏沃洛夫勋章，但斯大林不同意；他朱可夫又请求把根据审判而剥夺的勋章归还库利克，对此斯大林也没有同意。在这件事情上，朱可夫向我抱怨说，他的意见没有得到支持，斯大林不同意他的意见，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

我还想告诉您，谢罗夫与朱可夫的关系要比我与朱可夫的关系更加亲密。谢罗夫在朱可夫面前对他也是阿谀奉承、卑躬屈膝和曲意逢迎。他们的亲密关系一直到在基辅共事时仍在继续。他们经常在一起，并且互相拜访。

他们的这种亲密关系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朱可夫没有对我讲过，但是我感觉到，像谢罗夫这样的人对朱可夫是有好处的，他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里有很高的地位。

我与谢罗夫的关系也很好，我们之间也经常来往。

当我被斯大林免除空军司令员的职务时，谢罗夫对我说，我应该去找马林科夫，请他帮助辩护一下。

我在德国期间，谢罗夫还协助我获取了一些物品。

在谈到自己的罪行时，我不得不承认，当我被解除在空军的工作岗位时，我曾感到非常委屈，尽管当别人的面我在表面上虚情假意地承认对我的决定是正确的、是应该的，但在自己亲近的小圈子里则表示了自己对斯大林决定的不满，

例如，关于我的免职决定宣布后不久，我在与我的妻子和她的弟弟弗拉基米尔谈话时说到了我被免职的原因。我说，这不是因为我工作干得不好，而是因为有人进了谗言。同时我还谩骂和诽谤最高统帅和他的家庭。我还声称，斯大林对待我不公平。

当我听到沙胡林、列宾等人被捕的消息时，我非常气愤，并在自己的亲属中说过，既然逮捕这些人是经过斯大林同意的，那么也

就没有什么人可以为你辩护的了。

1946年4月，在我的前妻M.M.维列杰耶娃路过莫斯科时，我与她进行了敌对内容的谈话。

在与维列杰耶娃交谈时，我说，斯大林对我的态度不客观，这导致了我对他的恶毒诽谤。

我在与我现在的妻子伊莉莎白·奥多罗夫娜和维列杰耶娃交谈时，指责政府和斯大林本人不珍视别人的功劳、无所顾忌地驱逐他们甚至把他们投入了监狱。

我再重复一遍：尽管我占据高位，并享有最高统帅为我树立的威信，但我总是感到精神沮丧。这种情绪已经由来已久了。

我是一名警察的儿子，这一点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压力，直到1932年以前，我一直对党和上级隐瞒着这一情况。

我与朱可夫相识后，他善于吸引我，而我也很喜欢这样，并在他身上寻求支持。

同朱可夫的这种联系使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以至于我们在单独谈话时议论政治上有有害的话题，也就是现在我向您所忏悔的东西。

我还要向您承认，我完全是一个胆小鬼，尽管我曾担任重要职务并曾是一名元帅。

我从来都没有足够的勇气向您讲述由于我的过失而在空军中形成的混乱状态以及我在本声明中所陈述的那些事情。

诺维科夫

1946年4月30日

№09370

## 布尔加宁关于扣压朱可夫的家具

### 致斯大林的报告

(1946年8月23日)

致斯大林同志

在亚戈金诺海关（科韦利市附近）扣留了七节车皮，里面有85个装着家具的箱子。

经核查报关文件后弄清，家具是属于朱可夫元帅的。

已查明：苏联驻德国占领军集团军后勤部代理主任为运输这批家具签发了以下证明：“此证明发给苏联元帅格·康·朱可夫同志，列在下面清单上的家具是他本人在德国‘阿里宾—马伊’家具厂定购的，已支付了现金，苏联驻德国占领军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批准运往苏联。上述家具运往敖德萨军区，由上尉亚格利斯基同志负责押运。运输号为：№152/8431”。

装有家具的车皮于8月19日由亚戈金诺发往敖德萨。

已经向敖德萨海关发出命令，在接到专门的指示之前不得放行这批家具。

附上被检查过的车皮所装运的家具清单<sup>①</sup>。

布尔加宁

1946年8月23日

<sup>①</sup> 清单未收入本专题。

№09371

## 阿巴库莫夫关于秘密搜查 朱可夫住所事致斯大林的报告

(1948 年 1 月 10 日)

绝密

致苏联部长会议

约·维·斯大林同志

根据您的指示，今年 1 月 5 日对朱可夫在莫斯科的住宅进行了秘密搜查。

任务的目的是为了在朱可夫的住宅里找出一个皮箱和一个装有黄金、钻石和其他贵重物品的盒子并予以没收。

搜查中没有发现皮箱，但在卧室的保险柜里发现了盒子。

盒子里装有下列物品：

手表 24 只，其中金表 17 只，镶钻石金表 3 只；

镶宝石的金坠子和金戒指 15 枚，其中镶钻石的有 8 枚。

镶有多颗宝石的金坠子。

其他的金饰品还有：烟盒、项链和手链、镶宝石的耳环等。

由于在住宅里没有找到皮箱，就决定对保险柜里的所有贵重物品进行了拍照，然后又将以上物品原样放回保险柜，以便看不出有搜查的痕迹。

根据搜查人员的结论，朱可夫的住宅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即从这里面没收的东西可以毁掉朱可夫的名誉。虽然这里既没有装贵

重物品的皮箱，也没有甚至信件和便条之类的东西。显然，这个住宅是经过整理的，这里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

今年1月8-9日的夜间，对位于莫斯科市附近的鲁布廖沃村的朱可夫的别墅进行了秘密的搜查。

搜查结果发现，别墅的仓库里藏有两只皮箱，里面装有许多各种各样的东西和贵重物品。

例如：

毛织品、丝绸、锦缎、天鹅绒和其他面料——共计4000多米；

毛皮——貂皮、猴皮、狐狸皮、猫皮、卡拉库尔卷毛黑羔皮和卡拉库尔羊皮——共计323张；

优质软山羊皮革制品——35件；

从波茨坦和德国的一些宫殿和官邸运来的贵重的大尺寸地毯和地毯，共计44件，其中有一部分铺挂在房间里，其余的都存放在仓库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别墅的一个房间里挂着一张尺寸特大的地毯：

镶嵌在艺术镜框里的大尺寸珍贵古典风景画——共计55幅，其中一部分挂在别墅的房间里，一部分则保存在仓库里；

价格昂贵的餐具和茶具（带有工艺装饰的瓷器、水晶）——共计7大箱；

全套银制餐具和茶具——共计2箱；

带有精美工艺装饰的键盘式手风琴——共计8架；

格兰特-格兰德公司以及其他公司生产的优质猎枪——共计20支。

这些物品保存在51只铁箱和皮箱里，也有散放着的。

除此而外，在别墅所有房间的窗台上、书架上、桌子以及床头柜上，都摆放着很多铜质和瓷质的花瓶和工艺品，以及各种各样外

国生产的小饰物。

负责搜查的工作人员所说的话是值得注意的：朱可夫的别墅实质上是一个收藏各种珍贵艺术绘画的古董店或者博物馆，而且这些绘画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至竟有4幅挂在餐厅的墙壁上。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在朱可夫房间里卧床的上方竟然挂着一幅巨大的有两个裸体女人的画像。

一些非常珍贵的艺术绘画无论如何都不适宜放在住宅里，而应该转交给国家博物馆收藏。

别墅所有房间的地板上都铺着大幅地毯，有20多块。

别墅里的所有物品，从家具、地毯、餐具和装饰品一直到窗帘，都是外国货，主要是德国货。除了通往别墅的小道以外，别墅里没有一点东西是苏联生产的。

别墅里没有一本苏联的书，书架上陈放着许多封面烫金的图书，全都是德文的。

走在房子里你很难想像，这是在莫斯科郊外，而不是在德国。

搜查结束时，还发现了皮毛、布料、地毯、装饰用手工织品、皮革以及其他一些物品堆放在一个房间里，房间被锁上了，门口还设有警卫。

已经派出一组苏联国家全部的工作人员前往奥德萨，对朱可夫的住宅进行秘密搜查。这次行动的结果随后向您报告。

关于在朱可夫的莫斯科住宅里没有找到的装有贵重物品的皮箱，也就是罪犯谢莫奇金供认的那只皮箱，已查明这只皮箱朱可夫的妻子总是随身携带着，在旅行的时候也将它带在身边。

今天，当朱可夫同妻子一起从奥德萨回到莫斯科时，这只皮箱又出现在他的住宅里，现在还在那里。

看来，应该直接要求朱可夫的妻子交出这只装有贵重物品的皮箱。

同时，向您呈上搜查朱可夫住宅和别墅时拍摄的一些古董和物品的照片。

阿巴库莫夫

1948年1月10日

№09387

## 朱可夫关于被人指控致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8年1月12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同志

我的原副官谢莫奇金向联共（布）中央提交的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指控我的声明完全是臆造的、诽谤性的。

第一，指责我对斯大林同志曾经怀有敌意的情绪，在一系列场合贬低斯大林同志，对于斯大林同志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作用保持沉默，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是捏造的。谢莫奇金声明中所说的事情是他胡乱编出来的，同时也是由于1947年底谢莫奇金知道了我本人对于诺维科夫的诽谤性声明的评价的结果。

我承认，我犯了一个愚蠢的、极其缺乏党性的错误，这就是向谢莫奇金说出了自己对诺维科夫声明的意见。但是，我这样做并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想法，也没有有什么其他的目的。

指责我在法兰克福在“同盟国”面前作了无党性的发言，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大概维辛斯基同志能够证明这一点，当时他和我在一起，他本人也作了发言。在接见第82伞兵师时，有索科洛夫斯基、谢罗夫和谢苗诺夫同我在一起。在那里我没有作什么发言，至于我所说的话，我认为都是有党性的。

第二，指责我卖汽车给演员米哈伊洛夫，向作家斯拉温赠送礼物，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1) 给斯拉温汽车是根据莫洛托夫同志的命令。与他的关系都

是工作上的。

2) 米哈伊洛夫是经我批准、并通过调拨处购买的汽车。米哈伊洛夫是通过海关办理的手续，而不是通过我；他把钱交给了海关和银行，而不是交给了我。

我郑重地声明，我从来没有卖给任何人汽车。

我从来也没有请求过斯拉温或其他什么人为我自己写任何东西，也没有向斯拉温订购什么书。谢莫奇金写的是明显的谎言。

第三，关于我贪得无厌地掠夺和占有贵重战利物品。

我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为家人和亲戚购买了很多物品，但这些物品我都付了钱，是用自己的薪金购买的。我在莱比锡用现金购买了以下物品：

- 1) 水貂大衣 160 件，
- 2) 猴皮大衣 40~50 件，
- 3) 海狗皮大衣（人造的）50~60 件。还有一些给孩子们的东西，我已不记得了。以上这些物品我共支付了 3 万马克。

我还买了 500~600 米法兰绒和墙纸，用于家具和各种窗帘，因为国家全部拨给我的临时使用的别墅还没有进行装修。

除此而外，弗拉西克同志还请我为其购买用于某个专门设施的料子 500 米。但是由于弗拉西克被撤职了，这些东西也就堆放在别墅里了。

我被告知，在别墅和其他一些地方发现了 4000 多米各种各样的料子，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我请求对实际情况核查。我认为这是不可信的。

绘画、地毯和枝形吊灯实际上都是从废弃的别墅和住宅里拿来的，用于装修我使用的国家全部的别墅。4 盏枝形吊灯由管理员交给了国家全部，3 盏用于总司令部的办公室。地毯也同样如此。地毯一部分用于我的办公室，一部分用于别墅，一部分用于住

宅。

我认为，以上这一切都已列入了国家安全部的资产中，因为别墅和住宅都是属于国家安全部的。所有这些都是照管我6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小组运来和使用的。我不清楚，这些是否付过钱，因为我有一年半的时间没有在这里。我的过错在于，我没有关心一下，应该在什么地方进行登记。

至于黄金饰品和手表，我声明，这主要是各种组织赠送的礼品。而各种戒指和妇女用的饰物都是家人在很长时期内购买的，也有生日和其他节日时朋友赠送的礼物，其中有几件贵重物品就是莫洛托夫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送给我女儿的。其他东西大部分是仿金的，没有什么价值。

关于成套餐具。买这些东西我一共花了9200马克，送给每个女儿一套。我可以出示购买发票，谢罗夫同志也可以证明，我是通过他购买这些东西的，因为他主管所有的经济问题。

关于我从谢罗夫那里得到了5万马克，仿佛是用于个人开销的。

这也是诽谤。有一次，我收到国家安全部警卫队长别多夫归还的总额为5万的一笔钱，是用于代表处的费用的。如果我是一个贪婪的人，那么我就会把这笔钱据为己有，因为没有任何人索要这笔钱的收据。此外，谢罗夫要给我50万，用于我考察的开销。我没有拿这些钱，尽管他声明说贝利亚同志已经批准他，如果需要，我要多少给多少。

银制的勺子、叉子和刀子，都是在庆祝华沙解放时波兰人送的，箱子上面有题词，可以证明是礼品。一部分盘子和一些别的东西是戈尔巴托夫集团军的士兵送来的礼物。

所有这些都堆放在仓库里，我没有想过要以此来积累个人财富。

我承认自己犯有很大的错误，没有把这些我并不需要的东西上交到某个仓库去，因为我认为没有人会要这些东西。

至于戈别林地毯，我已指示过阿戈耶夫同志，让他交到某个博物馆去，但他还没有上交就离开了警备队。

第四，指责我与捷列金在买东西方面互相攀比，这也是谎言。我对捷列金没什么好说的。我认为他在莱比锡购买房子是不对的，这一点我对他本人讲过。后来他怎么处理的，我不清楚。

第五，关于猎枪。战前我就有6-7支猎枪，有5-6支是我在德国买的，另外2支是别人送的礼物。所有猎枪都是警卫队弄来的，其中有些双筒的是礼物，我曾打算把它们交到什么地方去。我承认自己有错误，白白地占有这么多枪支。我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作为一个守猎爱好者，我舍不得将这些优质猎枪交出去。

第六，指责我生活作风放荡也是造谣诽谤，谢莫奇金之所以制造这样的谣言，是为了博得更多的赏识，并表明自己是清白的，而我却是肮脏的。我承认一个事实，这就是我与3.的亲密关系。整个战争期间，她一直在警备队和总指挥部的列车上工作，她忠于职守，勤勤恳恳，并与全警备队一起多次荣获勋章和奖章，这次奖励不是我颁发的，而是根据大本营的命令由我指挥的方面军指挥部授予的。我完全承认，我是有错误的，我问她有关系，她长期与我生活在一起。但谢莫奇金所说的完全是谎言。在办公室里我从来没有过不检点的行为，这完全是谢莫奇金在昧着良心撒谎。

K.确实是在西方方面军被逮捕的，但是她在方面军里只呆了6天，老实说，我同她没有任何关系。

第七，关于我不愿意认购国债的事。这也是谎言。我认购的国债从来没有低于过1.5-2个月的工资。这一点有文件可以证明。

第八，党费确实是谢莫奇金交的，因为我的组织关系在总参谋部，而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前线，为了不延误交纳党费，我就委托谢

莫奇金代为交纳。

最后，我完全负责地声明：

1. 谢莫奇金明显地在诽谤我。我恳请进行核查，我是否与科涅夫和其他人谈过，在向斯大林同志讲述战场形势时应该怎样欺骗他。

2. 谢莫奇金对我进行诽谤，认为他将是继诺维科夫之后第二个证明我有反苏观点的证人，这样别人就会毫不怀疑地信任他。

我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于把有关诺维科夫诽谤性声明的情况告诉了他，使他有了关于欺骗性谈话、反苏言论以及最终反对我的把柄。

3. 请求党中央委员会考虑，我在战争时期所犯的错误是没有恶意的，我在事实上任何时候都是党、祖国和伟大的斯大林同志的一名不坏的仆人。

我一直都在认真忠诚地完成斯大林同志委托给我的全部工作。

作为一名布尔什维克，我发誓不再发生类似的错误和愚蠢行为。

我坚信，祖国还需要我，伟大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和党还需要我。

请求把我留在党内。我一定改正自己的错误，决不玷污联共（布）党员的崇高称号。

联共（布）党员 朱可夫

1948年1月12日

№09388

## 莫洛托夫关于朱可夫的声明 致日丹诺夫的通报

(1948年1月21日)

日丹诺夫同志

鉴于朱可夫今年1月13日所作的声明，我认为有必要向您通报下述情况：

1. 根据我的指示，并以苏联人民委员会1945年8月23日命令的形式，发给作家斯拉温一辆缴获来的小轿车，以补偿战争初期他的被盗的汽车（同一天对作家基尔萨诺夫、利金等人也颁布了类似的命令）。

2. 我已经问清楚，我的女儿斯维特兰娜曾于1945年赠送给她的女友，朱可夫的女儿，一枚镶钻石的金戒指作为珍贵的生日礼物，戒指是花1200卢布在寄卖商店购买的。类似场合下的其他礼品都是一些廉价的小东西。

维·莫洛托夫

1948年1月21日

№09372

## 阿巴库莫夫关于移交 朱可夫被没收的物品事致斯大林的报告

(1948年2月3日)

绝密，第 3726 /A 号

致苏联部长会议  
约·维·斯大林同志

兹向您报告，苏联国家安全部已从国家金库里取回了从朱可夫元帅处没收的全部物品。

根据您的指示，这部分财物以及保存在苏联国家安全部里的从朱可夫元帅处没收的全部贵重物品，已于今年2月3日照交接文件和物品的详细清单，全部转交给了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恰达耶夫同志。

代表苏联国家安全部转交贵重物品和财物的有以下人员：

副部长布利诺夫中将；

“A”处处长格尔佐夫斯基少将；

总务处主任科切加罗夫上校；

财务处副主任鲍罗夫科夫中校；

“A”处工作人员——沃罗比约夫中校，巴利尚斯基中校，巴里诺夫少校以及古谢夫大尉。

代表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接收转交以上贵重物品和财物有以下人员：

办公厅主任恰达耶夫；  
办公厅副主任奥帕林；  
总务机关处副主任马卡罗夫；  
总务部主任基里林。  
同时向您呈上交接文件和上述被交接的物品清单。<sup>①</sup>

阿巴库莫夫

---

<sup>①</sup> 交接文件和清单未收入本专题。

№09373

## 阿巴库莫夫关于逮捕图日洛夫问题

### 致斯大林的报告

(1948年2月6日)

绝密

致苏联部长会议

约·维·斯大林同志

在此向您呈上对原内务部驻柏林反投机倒把和抢劫行动处主任、罪犯阿·马·西德涅夫少将的审讯记录。

我们还逮捕了谢罗夫驻德国的机关的财务处原主任萨奇科夫以及内务部驻柏林市行动处财务部原主任诺奇温，因为他们参与了为消灭犯罪痕迹而销毁文件的活动，这些文件涉及西德涅夫等人偷盗的贵重物品和德国马克的数量。

根据西德涅夫和别扎诺夫的供词，原谢罗夫的秘书、现为苏联内务部军事学院学员的图日洛夫被揭露了。

请您批准逮捕图日洛夫。

阿巴库莫夫

分送：斯大林同志

库兹涅佐夫同志

附 录

对罪犯阿列克谢·马特维耶维奇·西德涅夫的审讯记录

(1948年2月6日)

阿·马·西德涅夫，生于1907年，萨拉托夫市人，高等学校肄业，自1931年起为联共（布）党员。

原为苏联内务部驻柏林市行动处主任。最近一段时间担任鞑靼自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长。少将军衔。

问：你是什么时候在德国工作的？

答：自1945年到1947年期间，我担任苏联内务部驻柏林市行动处主任职务。1947年11月，我接到了新的任命，从德国去了喀山。

问：在你离开柏林之后，你直接参与的盗窃贵重物品和金银珠宝的大案被揭露了。你交待一下这件事。

答：坦白地说，我早就为此不安了，并且预料到我在柏林所犯的罪行一定会被揭穿的，到时我将不得不对这些罪行负责。

众所周知，占领柏林的苏联部队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在城市里的几个部分都发现了保存金银珠宝和白金制品以及其他贵重物品的地方。同时还找到了几个大仓库，里面有很多贵重的毛皮、皮衣、各种面料、高档服装以及其他很多东西。我就不去说诸如餐具和成套器皿这类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多得不计其数。这些贵重物品已被各种各样的人偷走了。

应该坦率地说，我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手中掌握着权利、可以立即组织对红军在德国境内所缴获的所有贵重物品进行保护和登记的领导人员之中的一个，但是我没有采取任何防盗措施，我认为自己在这一点上是有罪的。

问：你本人也进行了偷窃活动？

答：我承认这一点。我没有珍惜自己的苏联将军的军衔，没有考虑自己在内务部所担任的职责，在柏林期间，贪图钱财，忘记了我应该维护的国家利益，只想个人发财了。

现在谈这些令人感到羞耻，但是我将毫无保留地交待我在德国盗窃和侵占应归国家所有的财物的行为。

在此，我应该说，我把非法得到的财物运到我在列宁格勒的住宅里，当然，我只是弄到了少量的剩余部分。

问：对你在列宁格勒的住宅进行了搜查，结果发现了大约 100 件黄金和白金制品，大约 1000 米毛纺织面料和丝绸，大约 50 块贵重的地毯，大量的水晶、瓷器和其他高级物品。

这就是你所说的“少量的剩余部分”？

答：我不否认，我从德国运回了很多贵重物品。

问：现在向你出示的照片，是在进行搜查时从你那里没收的 5 块 17 世纪和 18 世纪佛来米和法国工匠编织的世上独一无二的双面地毯。

这些珍品你是从哪里偷来的？

答：这些双面地毯是在德国帝国银行大厦的地下室里发现的，这是战争时期德国的某些富豪藏在这里的。

发现这些地毯后，我命令我的卫队长阿克谢诺夫把它们运到列宁格勒我的住宅里。

问：这些地毯只适合放在博物馆。你要它们干什么用呢？

答：老实说，我甚至连考虑都没有考虑我是在偷窃。这些东西被我碰到了，我就把它们拿走了。

问：但是，你并不是什么都偷，而是偷最贵重的东西。可见，你是一个不寻常的小偷。

答：自然，我拿了最贵重的，但是我还占有了其他一些东西，现在已记不清了。

问：我们可以提醒你。有一只用黄金制作的女式小包，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答：我已经记不清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弄到这只小包的了。我想，可能是我或者是我妻子在德国银行大厦的地下室里弄到的。

问：3只镶钻石的金手镯你是从哪里弄到的？

答：这些手镯是我在一个被我们发现的德国贮藏室里拿的，具体是在什么地方，我不记得了。如果我没有弄错，我还将其中的一个手镯给了柏林行动处的会计诺奇温。

问：搜查时，在你那里没收了15只金表，42枚宝石金坠子，宝石项链，胸针，耳环，项链，15枚金戒指以及其他的金饰品，这些东西你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

答：同那些金手镯一样，这些珠宝也是在德国的贮藏室里偷的。

问：你不仅偷盗德国的贮藏库，还像拦路抢劫的土匪一样抢劫被逮捕的人。

答：我没有侵占罪犯的贵重物品。

问：撒谎！你以前的副官П.В.阿克谢诺夫已经揭发了你，就是你抢劫了被逮捕的人。

下面是阿列克谢耶夫的供词：

“1945年夏天，西德涅夫命令我去扎哈罗夫少校处，将那里的一名被逮捕的德国人的贵重物品拿来并交给他西德涅夫，被逮捕者也一同带来，但在路上让他下车，放他跑了。

我执行了他的命令。我把从这个德国人那里没收的金表、包金自来水笔、4块高级毛料、够做两件皮大衣的毛皮交给了西德涅夫。

当时我还向西德涅夫报告，根据他的命令，我从扎哈罗夫少校处带来了一个被逮捕的德国人，并在路上放了他。我记得这个德国人的名字叫查尔贝尔。”

你承认这件事吗？

答：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也许发生过，但我已经不记得了。

问：600只银勺子、叉子以及其他餐具也是你偷的吧？

答：是的，是我偷的。

问：看来你那里常有几百位客人。你为什么要偷这么多的餐具呢？

答：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

问：32件贵重的毛皮制品，178张贵重的毛皮，1500米高级针织、丝绸、天鹅绒和其他面料，405双女式高统袜，78双鞋，296件衣服——所有这些只是在你那里没收的物品的一部分。

偷这么多东西，难道你是打算做买卖？

答：做买卖我自然是没有想过。所有这些东西只有一部分是我在妻子的积极参与下偷的，而绝大部分是我的副官阿克谢诺夫和我的亲戚库兹涅佐夫偷的，他是我写信从苏联召到柏林的，并任命他为行动处负责统计事务的全权业务代表。

问：现在也许该由你自己来谈谈，你在德国还进行了哪些抢劫？

答：现在我很难列举所有那些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通过各种渠道运往列宁格勒我的住宅的物品。我只能大致地说，我从德国为自己运出了40多只装得满满的皮箱、木箱和包裹，里面装有各种服装、高级面料、男女西装、毛皮大衣、狐皮大衣、男女鞋子、照相机、收音机、水晶花瓶、古董以及其他财物。

一个月以前，我已将这些财物中的一部分运往我在喀山市的新住宅。

除此而外，在1947年12月初，我还从柏林运往喀山市一批红木的卧室和餐厅家具、三角钢琴、电影放映机以及其他物品。

问：你怎么会成为强盗的，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答：在监狱里，我也不止一次地给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要知

道，我从1928年起就已经在苏联军队里服役了，我曾经是一名很好的指挥员和光荣的共产党员，1939年，当我从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时，根据党的路线被派往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并担任领导工作。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我曾向大家保证，要忠诚和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我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局工作，同军队一起担负着繁重的任务。1944年，在担任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反间谍局副局长时，在波兰境内，我遇到了谢罗夫，他当时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该方面军的全权代表。在波兰我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后来，在苏联军队占领柏林后，谢罗夫就设法把我调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并任命为柏林行动处的主任。

在工作中谢罗夫使我与他亲近，我经常到他那里去。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开始堕落。

在党和国家面前，我完全承认我在德国所犯的一系列罪行，我只希望能够考虑到在我的上面还有谢罗夫，他是我的领导，他不但没有制止我犯罪，相反还鼓励这种抢劫行为，而且比我要贪婪得多。

在德国工作的人未必有谁不知道，谢罗夫实际上是把掠夺来的财物据为己有的最主要的人物。

谢罗夫的飞机经常穿梭于柏林和莫斯科之间，不经边境检查地为谢罗夫运送贵重物品、皮毛、地毯、风景画和珠宝。谢罗夫还利用火车和汽车向莫斯科运送这些物品。

应该说，谢罗夫搞这一套的手法是很高明的。谢罗夫借口将这些战利品从德国运送回苏联上交国库，将大量的贵重物品据为己有。

以谢罗夫为榜样，我也开始了偷盗贵重物品的活动。但说实话，其中的一部分我是付了钱的。

问：但这些钱也是你偷来的。

答：我没有偷钱。

问：不对。内务部图林根行动处原主任、被逮捕的Г.А.别扎

诺夫在受审时交待说，你将大量的德国钱据为己有，中饱私囊。

别扎诺夫的供词是否正确？

答：是的。在占领柏林时，我的一个行动小组在德国帝国银行里发现了4000多万德国马克。

我们在米特地区（柏林）的其他一些贮藏地点也收缴了大约同样数量的德国马克。

所有这些德国马克都被运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柏林行动处所在大厦的地下室里。

问：这个放钱的地下室是处于你的管辖范围吗？

答：是的，是在我的管辖范围内。

问：那里总共保存了多少钱？

答：地下室里有100多个装钱的口袋，共有8000多万德国马克。

问：你有什么权利将这样大量的钱留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把它们上交给苏联国家银行？

答：保存这样一大笔钱自然是不合法的，但这样做也是根据谢罗夫的命令。

我向他汇报，在柏林发现了装有德国马克的袋子，谢罗夫说，这些钱为我们所用是最合适的，并指示不要把它们上交到银行，而是保存在自己手里。

问：你们是不是想把这些钱据为己有来中饱私囊？

答：是的，这些弄来的钱有相当一部分都进了个人腰包。

问：谁的腰包？

答：占有这些钱最多的是谢罗夫和我。得到好处的人还有克列波夫和别扎诺夫，他们都是内务部在德国各行动处的主任。

问：你们是怎样偷出上百万的德国马克的？

答：这做起来很简单。谢罗夫向我提交各行动处主任的申请报告，报告上面有谢罗夫同意拨给他们钱的批示。

通常，这些申请报告都是以各行动处建设和管理所需开支为理由提出的。这些钱一部分确实是用于各行动处的实际开销，而一部分则被盗走了。

与此同时，谢罗夫每个季度还要分别送给各行动处主任一些不用报销的款项，数额在几万马克，这些钱大部分是作为他们的个人开销。

所有这些款项的开支都是在我的行动处里由会计诺奇温经手办理的。

通过这种方式，各行动处主任从我的地下室里得到了几百万德国马克，而我本人经谢罗夫同意用了 800 多万马克支付柏林行动处的开销，这些钱的一部分用在了我的个人开销上，但具体数额是多少，我现在已无法说清了。

还是在 1945 年在德国银行的地下室里发现这些钱的时候，我就把大约 10 万德国马克据为己有了。

谢罗夫的机关里只有 20 个工作人员，但他经常派自己的秘书图日洛夫带着一些有他批示拨付多多少少款项的条子到我这里来。通过这种不合法的方式，谢罗夫仅仅从我这里就得到了大约一百万德国马克。

除此而外，图日洛夫还在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从会计诺奇温那里拿过钱，因为我曾指示诺奇温，他可以不受限制地给谢罗夫付款。

问：你故意缩小你和你的同谋盗取的钱的数额。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答：我什么也没有隐瞒，但我无法更准确地说出谢罗夫、克列波夫、别扎诺夫和其他人所获取的钱的数额，因为如果他们报销了这些钱，那么收据也是直接转交给谢罗夫机关的会计处，这个处是由萨奇科夫和克鲁佩宁负责的。

在我的会计诺奇温手里只保存着拨付这些钱的凭据，但后来这些凭据都被谢罗夫拿走了。

问：因为什么？

答：由于在德国的行动处工作转交苏联国家安全部管辖，1946年10月谢罗夫把我叫去，要求我把所有支付德国马克的凭据都交给他，同时把剩余的全部款项都上交。

由此我明白了，谢罗夫非常担心我们——谢罗夫、我、克列波夫和别扎诺夫——的罪行有可能被揭露。

因此，从谢罗夫处返回后，我要求会计诺奇温把所有的拨款凭据和我手头剩余的300万德国马克全部送到谢罗夫机关。诺奇温执行了这个指示。

必须说明的是，在交给谢罗夫的拨款凭据中，有几千万德国马克的款项——具体数额是多少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是1945—1946年期间根据我的指示由诺奇温上交给国家银行的。

问：您是否知道，所有这些支付德国马克的凭证现在在哪里？

答：诺奇温对我说，根据谢罗夫的指示，从各个部门汇总来的支付德国马克的报销单据、其中包括由我拨出的款项的所有凭证的几包文件都被烧掉了。

只剩下了由谢罗夫机关财务处工作人员编制的被烧毁的文件名称清单。

问：到底是谁烧了这些报销单据和凭证？

答：这一点我不清楚，但最有可能的是谢罗夫机关的财务工作人员，或者是他的秘书图日洛夫，也可能是他们一起干的。

问：但这些资料按说是必须交给苏联国家安全部重新任命的驻德国全权代表的。

答：是的，但这对我们不利。

我认为，谢罗夫命令烧掉全部文件，就是为了消灭罪迹，因为如果保留这些文件，那么所有的罪行，即谢罗夫、我、克列波夫、别扎诺夫以及他的所有亲信所犯的罪行就会暴露得更早一些，显然，这样会在监狱里呆得更久。

问：你把关于你们那里保存的被没收的黄金和贵重物品的清单放到哪里去了？

答：我将这些文件都交给了谢罗夫，因为他向我要这些文件。

关于我偷窃贵重物品的问题，我已经作了交待。但偷窃这些贵重物品的还有谢罗夫，因此，很显然必须销毁这些文件，以便把事情隐瞒到底。

问：不要用空话敷衍，讲讲你所知道的关于谢罗夫偷窃黄金的事情。

答：在把没收来的黄金、钻石和其他珠宝上交给国家银行的同时，谢罗夫还命令我将最好的黄金制品直接交给他。

我执行了他的命令，在不同的时间里交给谢罗夫的机关大约30公斤黄金制品，还有其他一些珠宝。

谢罗夫对我说，所有这些贵重物品他都要运送到莫斯科去，但是我知道，谢罗夫把十几件最贵重的黄金制品留给了自己。

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答：我亲眼看到的。在向谢罗夫汇报关于没收来的贵重物品事宜时，我给他带去了最贵重的黄金制品和钻石的样品，让他检查。当时，谢罗夫长时间地将这些珠宝把玩欣赏，然后把其中的一部分留了下来。

除了我以外，其他各处主任也交给谢罗夫许多黄金制品。

正如我以前所交待的，谢罗夫除了占有珠宝和德国马克以外，还抢劫其他贵重财物。

谢罗夫的妻子和他的秘书图日洛夫多次到柏林行动处的仓库，在那里挑选并拿走了大量地毯、手工织品、高级服装、银制器皿和成套餐厅用具，以及其他一些物品。

图日洛夫和谢罗夫的副官赫连科夫还分别前往德国各地，为谢罗夫挑选贵重物品。

上面列举的全部物品以及谢罗夫偷窃的其他财物，全都从德国运到了莫斯科他的住处。

我不止一次地陪同谢罗夫从柏林机场起飞，亲眼看到他的飞机是怎样装运铁箱、皮箱以及捆扎好的包裹的。

谢罗夫从德国运回了许多好东西，我甚至难以想像他怎么安置这些东西。

以谢罗夫为榜样，我也派自己的人——阿列克谢耶夫、库兹涅佐夫和阿克谢诺夫——在柏林的各个区为我搜寻高档服装、料子和珠宝。

像谢罗夫一样，我也从柏林行动处的仓库里拿走了许多贵重物品。

利用苏联驻德国军事管制局的飞机以及谢罗夫的飞机，我亲自——有时是与阿列克谢耶夫一起——把这些东西运送到列宁格勒。

从事抢劫和偷盗珠宝财物的人还有克列波夫和别扎诺夫。

正如我所知道的那样，别扎诺夫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驻图林根行动处的主任，过着地主般的生活，把图林根财主们的大量珠宝财物据为己有，搬到了自己的家里，并派某个很有势力的党卫队成员开设啤酒厂，从这家啤酒厂获取了很大的利润。

克列波夫也像别扎诺夫一样，在德国过着阔绰的生活。在他的位于萨克森的别墅里，有大量的珠宝财物和精美的家具。克列波夫也进行偷盗，他参与了偷窃在莱比锡发现的一个毛皮仓库的活动。

问：你们是怎样能够进行所有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而不受惩罚的？

答：我们在进行这些偷盗行为时，都是以缴获的战利品并转运到苏联为借口的。除此而外，我、克列波夫和别扎诺夫还受到了谢罗夫的保护，在德国他是以主人的地位而自居的。因此，我们的全部肮脏行为都得以顺利完成，并且我们还认为，同谢罗夫这样的人

在一起，我们是不会吃亏的。

谢罗夫对我特别好，因为在我的作战部的贮藏室里保存着大量的珠宝财物和德国马克，我可以将这些财物不受任何阻碍地拿给谢罗夫。况且我还知道，谢罗夫经常回莫斯科去，而每次他都要带走大量的贵重物品。我毫不怀疑，对于我知道内情这一点，谢罗夫是会考虑的。

应该坦白地说，在谢罗夫、我、克列波夫和别扎诺夫之间已经建立了相互包庇的关系，我们都进行偷窃活动，并且在这方面还相互帮助。我们对于谢罗夫的阿谀奉承也起了很大作用。

谢罗夫还经常鼓励我们，并且很善于利用我们来达到个人目的。

问：列举出事实。

答：先从我开始说起吧。我不止一次地完成了纯属他个人的委托，这不能不说是溜须拍马。

记得有一次谢罗夫让我弄两条纯种长毛英国国家犬，在哪里弄到都行，显然他是打算作为礼物送给某人。这可是一项相当困难的任务，费了很大力气，但最后还是以每条一万五千马克购买了两条长毛狗。

总之，应该说，谢罗夫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来获取各种贵重物品，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某些关系。

为了这些目的，谢罗夫还在隶属于我管辖的汽车修理厂专门生产了5、6台收音机。谢罗夫曾找到一名德国技术员专门为他研究收音机的结构并画出图纸，而谢罗夫则亲自校订这些图纸。生产这些收音机所用的木材是从帝国大厦办公厅希特勒办公室的墙壁上抠下来的木头。

谢罗夫还花费了很多时间寻找绍艾尔老头——一家猎枪厂的厂主，并在别扎诺夫的帮助下在这家猎枪厂订购了几十支猎枪，其中的一部分在制造时还进行了特别的装饰。

谢罗夫还通过克列波夫和别扎诺夫在耶拿的采斯工厂订购了照

相机，专门去图林根的一家瓷器厂订购了数套镶金的餐具和茶具，还有其他一些贵重东西。

问：谢罗夫把这些猎枪、收音机、餐具、茶具和照相机都赠送给谁了？

答：据我所知，有一台收音机谢罗夫送给了朱可夫元帅，另外几台收音机送给了莫斯科的某些人。猎枪、餐具、茶具和照相机是给谁准备的，我就不清楚了。

我还知道，谢罗夫给一位美国将军送过几只女式金表，这位将军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他是柏林的警备部队的一名指挥官。这些金表都是我交给谢罗夫的。

在波茨坦召开四国首脑会议期间，谢罗夫指示我给他弄一批手表，当作礼品用。我完成了他的这个指示。后来谢罗夫把手表给了谁，我不清楚。

谢罗夫还送给我本人两套餐具和一支猎枪。

问：谢罗夫为什么送你这些礼物？

答：我已经交待过了，谢罗夫对于我一直起着保护作用。除此而外，我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工作人员，他还要指望我干事情。

问：你的精力都用在了进行偷窃活动上，你并没有时间去干工作。难道不是这样吗？

答：我已经承认在抢劫活动中我是有罪的。至于我对待工作的态度，那我是非常认真地履行自己所负的责任的。

问：你的说法是非常可笑的。你一边从事偷盗抢劫的犯罪活动，腐化自己的下属工作人员，一边居然还好意思说自己在认真地工作。

答：在腐化下属工作人员这方面我是有罪过的，自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对业务工作产生了影响。但是谢罗夫对这种罪过也负有很大的责任，正如我所交待的那样，他不是领导我进行工作，而是忙于自己的私事。况且，他还有很多时间都是呆在莫斯科。

我在德国工作期间，谢罗夫到我的处里不超过4次，并且都是在他从他在巴贝尔斯贝格的官邸到苏联军政府所在地时路过我这里时来的。每次谢罗夫在我这里停留都不超过5分钟。

这样，在工作方面，实质上都是我自行处理。其他各处负责人的情况也都和我一样。

谢罗夫除了安排自己的私事以外，很多时间是在朱可夫元帅的办公室里度过的，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两个人都不干净，并且相互包庇。

问：解释一下你的这种说法。

答：谢罗夫非常清楚地了解朱可夫在工作中和行为方面的全部缺点，但是由于他们已经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谢罗夫为他包庇了一切。

有一次在谢罗夫的办公室里，我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张朱可夫的像，背面有这样的签字：“赠给最亲密的战友和同志留念”。在谢罗夫这间办公室的墙上还挂着朱可夫的另一张照片。

谢罗夫和朱可夫经常会面，一起去打猎，相互给予帮助。受谢罗夫的委托，我不得不将朱可夫捎来的三把短剑送到我属下的汽车修理厂进行重新打造，这些短剑过去是属于德国的一个男爵的。

后来，朱可夫又给我捎来了一个王冠，根据所有的标记判断，这是属于德意志帝国皇后的王冠。从王冠上弄下来的黄金被镶在马鞭上，朱可夫想把它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女儿。

（审讯暂停。）

审讯记录我已阅过，对于我的供词的记录完全属实。

西德涅夫

审讯人：苏联国家安全部重大案件侦查处侦查员

中校 普京采夫

№09375

## 谢罗夫关于阿巴库莫夫编造谎言 致斯大林的信

(1948年2月8日)

绝密

约·维·斯大林同志

我请求原谅，斯大林同志，不得不再一次打扰您。但是，目前在我周围形成的情况使我必须给您写信。

从我向您，斯大林同志，呈上对别扎诺夫、阿巴库莫夫的虚假证词的说明信那时起，同我一起工作的人员之中已经有10个人遭到逮捕，其中包括2名副官。苏联国家全部和内务部的工作人员都知道这些逮捕和“证词”，并且公开谈论说，阿巴库莫夫在暗中给我下绊。

我没有在意所发生的这些事，还一如既往地工作着，但是我认为这些情况必须向您——斯大林同志汇报，因为我坚信，阿巴库莫夫所作的汇报是不真实的。

通过这份信函我想详细地谈谈关于阿巴库莫夫所编造的一切。

据我所知，有人曾向联共（布）中央递交过报告，说阿巴库莫夫为了向上爬而准备消灭任何妨碍他的人。很多诚实的人都知道有这样的事实。

毫无疑问，阿巴库莫夫会想尽办法报复的，不仅仅是对我，还有他的其他敌人，即费多托夫、克鲁格洛夫、缅希科、拉帕瓦、米

尔施泰因等人。

还是在1943年的时候，阿巴库莫夫就向我说过，他早晚会在什么时候毙了缅希科。现在他已经当了部长了，完全有可能找到另一种复仇的方法。缅希科也知道这件事，因此也防备着他。这样戒备阿巴库莫夫的人还有其他一些诚实的同志。

斯大林同志，我毫不怀疑，您是不会允许阿巴库莫夫长久地以这种方法工作的。

我列举几个事实，这些事实都是这些年来我与阿巴库莫夫打交道时了解到的。

现在，为了陷害我，阿巴库莫夫想尽一切办法把我与朱可夫扯在一起。对于这些阴谋我并不害怕，因为，除了阿巴库莫夫以外，还有党中央。党中央是能够客观地看待问题的。但是，阿巴库莫夫从来不谈，他是怎样吹捧朱可夫以及他在朱可夫面前是怎样毕恭毕敬、像个小孩一样的。我可以列举几个事实，斯大林同志。

当德国人兵临列宁格勒时，那里的局势相当严重，但是，没有人能够像无所不知的阿巴库莫夫一样散布谣言说：“日丹诺夫已经在列宁格勒消失了，他怕留在那里；伏罗希洛夫不能组织防御；但是朱可夫来了，整个事情就变了，现在，列宁格勒不会被放弃了”。

毫无疑问，阿巴库莫夫现在已经忘记了自己说过的话，但是我可以提醒他。

第二个事实。在德国时，从党中央来的乌布利希到我这里，他谈到，英国人和美国人在柏林的其他三个区从德国人中委任地区法官，他们搜寻和逮捕德国党中央的工作人员，因此那里无法开展党的工作。会谈结束时，他请求在这方面给予帮助。我下达了命令，将三名法官秘密送进集中营。

英国人和美国人得知三名法官在柏林市他们控制的地区失踪的消息后，就立即在管制委员会上发表声明，要求进行调查，是谁逮

捕了法官。

朱可夫打电话给我，以坚决的口气要求我释放他们。我不认为应该释放他们，就回答他说，我们没有逮捕他们。他非常生气，并对所有人说，谢罗夫做得不对。后来，一个盟国委员会进行了调查，没有事实证明是我们逮捕了法官，这件事就这样终止了。党中央在这些地区又开展了工作。

当阿巴库莫夫知道朱可夫批评了我以后，决定要巴结朱可夫。为此，他委派自己最信任的朋友、当时担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反间谍总局局长的泽列宁（目前正处于被调查中）——也是一个投机钻营者——来查证，是我逮捕了这几个法官。泽列宁了解了关于这几个法官被逮捕的情况并向阿巴库莫夫作了汇报。

在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时，阿巴库莫夫与朱可夫并排坐在一起（报纸上有照片为证），他向朱可夫说了我逮捕几个法官的事。

会议结束时，阿巴库莫夫走到我面前，建议我一起去部里。在路上，阿巴库莫夫对我说，他已经准确地查明德国法官是被我逮捕的，并且还知道他们被关押在哪里。我承认了这一点，因为在契卡人员面前是无须隐瞒的。于是阿巴库莫夫问我，为什么我对朱可夫隐瞒这件事，我回答说，不是什么都必须对朱可夫说。阿巴库莫夫试图教训我，说“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对朱可夫说”，“朱可夫是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等等。我打断他的话，并问他为什么在朱可夫面前如此顺从。对此阿巴库莫夫说，他已经向朱可夫讲了我逮捕法官的事，在我身上会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我骂阿巴库莫夫是蠢货，我们就这样分手了。现在应该问一问，是什么原因使阿巴库莫夫在朱可夫面前这么伏首贴耳的。

斯大林同志，回忆起战争年代在使用战利品的问题上，阿巴库莫夫无数次满足自己欲望的事情，我就感到很不愉快，但我还是认

为其中的一些事情有必要向您报告。

阿巴库莫夫想必不会忘记，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有一列 20 多节装满战利品的车皮的军用列车开往莫斯科，其中的一节车皮就是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反间谍总局巴结阿巴库莫夫的，里面装运的物资上全部标有“给阿巴库莫夫”的字样。

也许阿巴库莫夫已经忘记了，当解放塞瓦斯托波尔的苏联红军官兵正在克里米亚流血牺牲的时候，他的副官库兹涅佐夫（目前还在“保卫着”阿巴库莫夫）却飞到了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反间谍总局局长那里，装运了满满一飞机战利品。方面军空军下命令，返回时不许给阿巴库莫夫的飞机加油，因为同德国人进行作战的飞机的燃料都不够，但他的副官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通过欺骗手段加了油并飞走了。关于这件事空军集团军的指挥员向我申诉，并给我看了阿巴库莫夫副官所签的收据。这就是在战争期间阿巴库莫夫消耗 СМ-47 型飞机发动机的寿命和燃料而进行的卑鄙勾当。现在，这些不成体统的事却用这样的话来掩盖：“飞机是去接那些被逮捕的人”。就是现在，阿巴库莫夫的飞机从国外返回时，也不让莫斯科的边防检查站进行检查，并在飞机上布置了国家安全委员部的士兵，尽管政府有规定，所有的飞机无一例外地都要接受检查。

应该让阿巴库莫夫自己向党中央说说，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当德国人兵临莫斯科时，他的畏缩行为。他像一只可怜虫一样，呻吟着、叹息着将要发生的事，而不是去做工作。他的胆怯表现影响了机关的工作人员。为了巴结主管经济工作的伊万诺夫，阿巴库莫夫把他鞋子的尺寸交给我们，以便缝制溜出莫斯科时所需要的毡靴。阿巴库莫夫还为自己和一些将军缝制了这样的靴子。要知道，当时留在莫斯科的将军们都看到了阿巴库莫夫的行为。

让阿巴库莫夫自己说一说，在最艰难的战争岁月里，他是怎样在城里闲逛，追逐妓女，并把她们带到“莫斯科饭店”的。

而现在他已经忘记了这些，并把图日洛夫中校投进了监狱，这位中校在战争初期曾担任边防哨所的指挥员，与德国人进行了七个小时的战斗，直到剩下最后一粒子弹，负了伤，并荣获了红旗奖章。

当然，现在阿巴库莫夫已经“忘记”了1941年10月时我们就莫斯科面临的局势所进行的谈话，以及当时他对此给予了什么样的评价。阿巴库莫夫很秘密地通知我说：“部队从西伯利亚开过来了，看来，莫斯科的局势应该向好的方向发展了”。对此我回答他说：“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改变了战争的进程，他拯救了莫斯科并将受到人民的爱戴”。与此同时，我还向他转述了我所听到的您说的话，也就是当已故的谢尔巴科夫向您报告被夸张了的希特勒的命令时您所说的话。希特勒下过这样的命令，说11月7日他将在红场上举行阅兵式。

当你听到这个消息时，平静而坚定地说：“这个希特勒真是蠢货！他怎么不设想一下，怎样才能尽快地逃出俄罗斯”。

我把您的这些话讲给阿巴库莫夫听，如果他还有一点良知的話，他是不敢否认的。您的这些话我还讲给了许多人听。

当粉碎了德国人对斯大林格勒的进攻时，阿巴库莫夫又对我说：“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沃罗诺夫元帅以及其他人在那里很成功地组织了粉碎德国人进攻的战斗”。对此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组织进行粉碎敌人进攻斯大林格勒的不是元帅们，而是斯大林同志。我还补充说：“要是没有斯大林同志，我们也同你的元帅们一起牺牲了。全体俄罗斯人民都要感谢斯大林同志”。对此阿巴库莫夫除了说“是”以外，再无别的话可说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阿巴库莫夫对于事态是没有能力做出政治评价的。

战争年代，我只是由于工作关系而经常与阿巴库莫夫见面，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见面。我观察和研究他。对于他我有一系列

的看法，后来发生的事情充分地证实了这些看法。

为了给自己树立名望，他可以去干任何卑鄙的勾当，甚至不惜给事业造成损失。

在阿巴库莫夫的领导下，目前对国家全部机关与内务部机关的共同工作已经形成了令人无法容忍的条件。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机关，国家全部的工作人员总是尽可能多地败坏内务部机关的名声。要知道阿巴库莫夫在正式会议上就曾轻蔑地说过：“现在，脱离了那个警察局，我们变得纯洁了。内务部不应该再闲逛了”，等等。

要知道，目前在国家全部机关与内务部机关之间没有任何事业必需的工作关系。在机关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敌对时期。国家全部和内务部的党组织不愿意一起开会来纪念列宁，而是分别进行，而且国家全部的党组织不认为应该邀请哪怕是内务部的领导同志参加纪念大会。

要知道阿巴库莫夫在部里制造了这样的恐怖：在一起工作了20~25年的契卡人员，一些人在内务部工作，另一些人在国家全部工作，见面时都害怕打招呼，更谈不上交谈了。国家全部的工作人员中，如果有谁因为工作需要到我这里来，那么他必须要有阿巴库莫夫的专门批准。关于这一点，国家全部局长格里鲍夫等人都正式通知我。

要知道，在国家全部只能吹捧领导，谈论他们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而要批评以前的工作方法。

在从内务部调转到国家全部的部队里，禁止军官们提起战争年代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关于迁移德国人、卡拉恰耶夫人、车臣—印古什人、卡尔梅克人，等等）。对于这些工作只能进行批评。

要知道，国家全部对于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所进行的秋季行动在行动开始的前十天就被民族主义分子知道了，因此他们之中的

许多人都躲藏了起来。这是事实。但是，阿巴库莫夫却为这次行动推荐了一百个人获取奖励。

不久以前，阿巴库莫夫召见了一位管理局的负责人，指责他没有在党的会议上对国家安全部原来的工作方法进行尖锐的批评。

所有的领导岗位上都委派了“除奸部”的工作人员，而这些人缺乏在国家安全部机关工作的经验。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为可能被免职和被调查而担惊受怕。

所有的人都知道，阿巴库莫夫从不检查“除奸部”机关的工作，他害怕这样做，因为在那里会遇到许多不成体统的事情。

从地方上来的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说，在那里国家安全部的许多分支机构一年内一个人也没有抓住。试问一年之内一个国家安全部地区分支机构的3~4个工作人员在于什么呢？

您知道，斯大林同志，有多少人被遣送回国，而这些人中又有多少英美间谍。

要知道阿巴库莫夫欺骗党中央，把苏多普拉托夫的机关列入国家安全部的编制中，这个机关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什么也没干，坐等工作。

国家安全部干部管理局里有数十名将军和上校常年没有工作干，但却有5000~6000卢布的薪金。秘密在于，这些将军们在工作中名誉扫地，但对于阿巴库莫夫来说他们是需要，于是就等待时机，然后把他们“推荐”到别处去。

为了提高个人的威望，阿巴库莫夫不惜进行反国家活动。

我想对您讲述一下，斯大林同志，关于莫斯科警察局将道路交通警察转交国家安全部的事情。

首都的劳动者和外地来的公民不断地向苏联内务部呼吁，说莫斯科主要街道上的警察粗鲁无礼，不愿意与居民说话。同时还指明了这些警察的岗位号码。当我们去进行检查时，这些有问题的岗位

上站着的全是穿警察制服的国家安全部的保卫人员。我们不得不就这种情况致函阿巴库莫夫。但阿巴库莫夫并没有采取措施，而是请我去一下，并与弗拉西克一起侮辱我和克鲁格洛夫同志，同时还宣称，如果他们愿意，他们能够把全部交通警察都抓过来。

真的，两天后果然出现了将交通警察转归国家安全部的命令。

现在，就连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自己都说，他们根本不需要交通警察，而实际发生的事是多么荒唐。在一个双人岗位上现在站着4个人。沿高尔基大街100米之内，肩挨肩站着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试问为什么非要耗费双倍的国家资金呢。而这样做的借口，斯大林同志，是加强对政府成员的安全保卫。

阿巴库莫夫感觉到，早晚有一天，他的所有行为都会被揭露，因此他现在想尽一切办法来收拾了解这些事情和其他事实的人。

斯大林同志！请您责成有关人员，对我在这份信函中所列举的事实进行核查，这一切都会被证实的。我坚信，在核查中还会发现很多给国家安全部的工作造成极坏影响的其他事实。

与此同时，我恳求您，亲爱的斯大林同志，责成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审理阿巴库莫夫为了报复我所编造的反对我的事件。

伊·谢罗夫

1948年2月8日

№09376

## 克留科夫关于屈打成招 致苏共中央的声明

(1953年4月25日)

被监禁的弗拉基米尔·维克多罗维奇·克留科夫，生于1897年。  
于1932年<sup>①</sup>8月7日根据刑法第一部第58~10条被判徒刑。

刑期为25年劳动改造和5年剥夺权利。

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泰舍特市执行判决。

信箱号是215/603。

### 声 明

我于1897年生于沃罗涅日州布图尔利诺夫卡镇的一个邮递员家庭。我父亲后来成了报务员，自1917年起为联共（布）党员，一直到1922年他去世。

1914年，我在实科中学毕业，1915年作为后备军士官生参加了后备役部队。培训班结束后，被派到准尉学校学习，1916年结业后被派往前线。1917年被选为团委员会委员。1918年自愿参加了彼得罗夫同志的赤卫队，在这支队伍中，在南方战线与白卫匪帮作战。从红军组建以后直到国内战争结束，担任过从排长到团长的各级职务，在东方战线和南方战线与白卫匪帮作战。受过伤。

<sup>①</sup> 原文如此。从下文看，应为1952年。

国内战争结束时，被派往高级骑兵军官学校学习；1940年上了高级进修班。担任过从团级学校负责人直到骑兵军军长的职务。

在1939~1940年与芬兰的战争期间，指挥一个步兵团，同该团一起率先突破了“曼讷林防线”，为此，该团被授予红旗勋章，而我被授予列宁勋章。

伟大卫国战争开始时我担任摩托化步兵师师长，1942年3月被任命为第2近卫骑兵军军长，指挥该军直至1945年11月，在其解散后我被任命为高级军官学校校长，1947年11月被任命为第36近卫步兵军的副军长。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我与部队一起参加了一系列作战行动。最高统帅在命令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过第2骑兵近卫军。在我任军长期间，该军被授予红旗勋章和二级苏沃罗夫勋章。由于波美拉尼亚战役，该军被授予“波美拉尼亚斯基军”称号。该军的所有部队都多次荣获过各种勋章和称号。

我本人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被授予苏联英雄金星勋章，两枚列宁勋章，一枚红旗勋章，一枚一级苏沃洛夫勋章，一枚一级库图佐夫勋章，两枚二级苏沃洛夫勋章，各种奖章，以及波兰共和国的“瓦尔图季·米利塔里”和“格伦德瓦尔德十字”勋章。

我最后的军衔是中将。1941年参加苏联共产党。

该军所受到的嘉奖以及我本人所荣获的奖励，都说明了我曾经为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事业而忠诚地战斗过。

1948年9月18日，我被国家全部机构逮捕。这天的凌晨4点，有5个人来到我的住所，向我出示了由国家全部部长签发的逮捕令。给了我15分钟的准备时间，之后我被带到了国家全部的内部监狱。在我和我妻子都不在的情况下，对我的住所进行了搜查。我14岁的女儿被送到了我姐姐家。对住所的搜查是在根本没有主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在狱中完成了一系列有关的手续后，我被带到了侦查处副处长利哈乔夫上校面前，他立即向我宣布说：

“记住，你现在已经不是将军了，而是一名囚犯，同你的谈话将是很简短的。如果你在供词中拒不认罪，我们将动用刑法，痛打你”。我反对说，我的军衔不是国家全部授予的，因此也谈不上由它来免去我的军衔，而在苏联任何人都没有被授予权力对被审人员进行毒打。对此，利哈乔夫上校声明说：“这个问题有地方可以协同解决，我们是不会单独来行刑的”。我对他说：“但目前我只是一名受到侦讯的人，暂时还没有任何人降我的职”。“到这边来”，利哈乔夫上校把我带到窗前，从这里可以看到街道。“看见那里的人了吧，那才是被侦讯的人呆的地方，而你现在已经被判罪了，想自由离开我们这里是不可能的，只有去劳动改造营一条路”。

这样，自与国家全部侦讯处代表第一次见面时起，就开始准备对我的侦讯程序。从利哈乔夫的办公室回来，我就被带到了国家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面前。显然，他认为自己有责任首先警告我，如果我在受侦讯过程中表现固执的话，我将遭到毒打。他直截了当地对我宣布说：“如果你顽固不化，我们就毒打你，使你终生残废。”“请问，怎么能这样呢，在苏联是不允许使用这种侦讯方法的，这就像‘叶若夫方式’”。 “我会给你演示‘叶若夫方式’的，我再说一遍，如果你不交待，我们会使你终生残废，反正我们一定要从你那里得到我们需要的证词”。“接见”到此结束，经过国家全部部长和侦讯处代表利哈乔夫以这样的方式进行了一番“培训”后，我被带到了侦查员萨马林大尉面前。侦查员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好吧，已经到过部长那里了，也对你进行了预先的警告，那就让我们立即开始工作吧，我还想再一次劝告你，不要固执，不要让情况变得更坏。”“我不知道你们对我的指控，我犯了什么罪？”“够了，不要顽固了，开始交待吧，我们什么都知道，快讲出你的反苏维埃行为以及你的同谋者。”“我从来没有进行过反苏维埃活动，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同谋者。”“你撒谎，我们一切都清楚”。

“既然你们一切都清楚，那么就根据你们所知道的事实进行审讯吧。但我知道，你们没有这些事实，因为我没有从事反苏活动。”

这样，在一个月內，我在侦查员的办公室里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通常，白天的10~12点提审我，一直到晚上5~6点，然后是晚上10~11点一直到早上5~6点，而监狱里是早上6点起床。我明白，这也是他们的侦讯方法之一，为的是逼我说出侦查员所需要的供词，而且这些供词还必须是他们喜欢的。与侦查员谈话之后，我明白了，我被指控参加了某种阴谋，而这个阴谋似乎是由朱可夫元帅领导的。

一个月过去了，我自然是什么也没有交待出来，因为我没有参加任何阴谋活动，并且从来也不相信朱可夫元帅是这个所谓阴谋的组织者，看来这个阴谋是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幻想出来的。

例如，有一次侦查员对我说：“或者是你开始交待，或者是今天我就把你送到执行特别制度的军队监狱去，到时你会懊悔的”。对此我回答说：“我在你的手里，你愿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但我不会提供任何假证词”。

当天我就被送到了列福尔托沃监狱，在那里被关在单独的小牢房里。在这座监狱里，我被剥夺了在监狱小店购买食品的可能性，不给读书。在这一个月时间里，侦查员每天都来宣布“明天”开始动刑。

有一次，我又被带到了国家安全的内部监狱，在那里的所谓“单间”里呆了8天，不让散步，不让读书。第8天，利哈乔夫上校召见了，对我宣布说：“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快提供证词，要不今天就开始狠狠地打你”。自然，我能说的只有一句话：“我什么也不知道”。

当天夜里，我又被投入了列福尔托沃监狱。我刚进所谓的“单间”，又立即被带到侦查员面前。侦查员立即扑向我，嘴里叫喊着

骂娘的粗话，逼我提供证词，要不他就毒打我。他还从公文包里抽出一支橡胶棍给我看，并说：“你看见了吧？或者是你现在立即交待，或者是让它到你身上‘走一走’。”我说：“我不拒绝交待，但我不知道向你们交待什么，关于阴谋的事我什么也不知道，我本人也从没有参加任何阴谋活动，我绝对不会提供假证词。”侦查员提出了问题：“你是否参加了在朱可夫、布琼尼以及其他那里举行的宴会？”“是的，参加过”。“在那里都决定了什么问题？”“您所指的是什么问题？我参加过宴会，像每一个宴会那样：喝酒，吃饭，娱乐，就这些。”“你撒谎，不要再固执了，我们全都知道。”“如果您全都知道，那您还想让我怎样？那么请用事实揭发我吧。”“我将不用事实，而是用橡胶棍来揭发你。你是不是颂扬了朱可夫？对他说了什么祝词？”“我对朱可夫的赞扬能说明什么？我不知道哪里有规定禁止参加宴会，并且还是正式的宴会。”“你们的所有宴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阴谋者的集会，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你是说还是不说？我给你10分钟的考虑时间，此后这个橡胶棍就要到你的身上‘走一走’。”我坐在小桌旁，等待着厄运的降临，侦查员手持橡胶棍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怎么样，——侦查员说话了——你是交待还是不交待？”“我不会提供任何假证词。”侦查员挂了一个电话，随后来了一名少校，看来，也是侦查员。萨马林上尉抓住我的肩膀，猛踢我的双腿，并把我摔在地上。然后开始用橡胶棍疯狂地毒打我，他们轮流打我，一个休息，另一个接着打，边打边辱骂，都是骂娘的粗话。我不知道他们打了多长时间。在半清醒的状态，我被带回了“单间”。第二天的11~12点我又被带到了侦查员面前。当我被带进办公室时，萨马林上尉和那个少校又开始用橡胶棍毒打我。这样，在这4天的时间里，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里他们都这样毒打我。第5天，我又被带到了侦查处副处长利哈乔夫上校面前，当时萨马林上尉也在场。利哈乔夫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怎么

样，现在你是否还固执”？我说：“我不会提供假证词。”“那么，我们还是要打你。为什么你害怕提供证词呢？所有的人都知道，朱可夫是一个叛徒，你应该交出证词，并以此来减轻自己的痛苦，要知道你只是这场阴谋里的小卒。考虑一下自己的命运，快开始交待吧。”“不管你们怎么打我，我都不能提供任何假证词。我可以坚决地对你们说，我既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也不知道任何组织的情况。我也从来没有从事过任何反苏活动。我只是不明白，我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是在国家安全部，还是在苏维埃祖国的敌人那里，这些敌人利用党证和国家安全部的权威来干这些犯罪的勾当。你们无论打我多少次，也不会把我变成苏维埃政权和党的敌人。在党和苏维埃政府面前，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曾三次忠诚地同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敌人进行战斗，从来没有当过你们竭力要想把我变成的反对苏维埃的人。在我看来，你们的毒打并不是来自于苏维埃政权，打我的不是它，而是那样一些人，他们忘记了，他们是谁，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勾当。我不知道，我们之中谁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是你们还是我？”这里充满了谩骂和侮辱，是难以描述的。但是非常奇怪，这一天他们竟然没有打我。显然，他们很清楚我的身体状况，他们决定不打我，尽管侦查员萨马林向利哈乔夫建议说：“您看到他什么样了吧，应该现在就处理他，使他不再醒过来。”利哈乔夫显得大度些，说：“今天我没有时间同这个下流坯纠缠，如果他到早晨还没有醒悟的话，明天再‘处理’他。”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差不多每天侦查员都要用毒打来恐吓我。在这段时间里，编造了很多审讯记录，所有这些记录都是按侦查员本人认为需要的那样编造的。下面的记录可以作为例子：侦查员的问题：“朱可夫是否去过你的住所？”对此我回答：“去过。”“都谈了些什么？特别是朱可夫关于在莫斯科实施反击的问题说了什么？”我回答：“关于这个反击行动朱可夫没有详细说。他说得很简

短。他被召到最高统帅那里并对他说：这是任务，这是计划，这是作战方法。无论如何要守住莫斯科，这就是全部。”在侦查员编造的记录里，我的答复（大致）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朱可夫贬低了最高统帅的尊严。朱可夫元帅被委派进行1947年5月1日的阅兵，然后军事部长依次给元帅们下达命令。侦查员大概知道朱可夫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讲话。侦查员坚决要求我提供这些讲话的证词。我说，除了朱可夫元帅停止了骑马训练以外，我什么都不知道。但在侦查员的记录里出现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仿佛朱可夫对军事部长的决定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对于侦查员的提问“在你们离开在装甲部队司令员处召开的协商会议时，朱可夫表示了哪些不满，说了什么？”我回答说，除了朱可夫说的“装甲部队，炮兵部队，工程兵部队从陆军总司令的管辖范围划出去”之外，我没有听到他有任何别的说法。而在记录文件中是这样写的：朱可夫对军事部长的决定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对于侦查员关于我是从什么地方知道某些将军被逮捕的消息的问题，我回答：“从副军长帕夫洛夫少将处得知的。”“对此你说了什么？”我说：“我了解这些将军，都是些老军人，我感到很奇怪，怎么能逮捕他们呢。”而记录文件中写道，我正是以此来否认在苏联存在着个人自由，这也成了按刑法第一章第58~10条款指控我犯罪的理由。

同时还编造了这样的记录：我处处都在吹捧朱可夫，并且最终我还掩盖着朱可夫的犯罪行为，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犯罪行为，直到现在我也不清楚。起初，我坚决拒绝在这些记录文件上签字。但接着是各种各样的威逼和恐吓，应该坦白地说，最后我胆怯了。要知道我的状况已经是非常困难了。

我遭到毒打、挨饿、侮辱，整夜不让睡觉也起了作用。我坚持不住了，最后签了字。直到现在我也不能原谅自己。但我还抱有一

线希望，会有那样一天我能说出实情，我为什么要签字。

对我的第二个指控——这已经接近侦讯的尾声了——就是侵吞战利品的罪行。在判决书中指出：“在德国时，把各种各样作为战利品的贵重物品等据为己有（准确的我已记不清楚了）。”在我的案件材料中有一份在我妻子克留科娃—鲁斯兰诺娃住所发现的财产的清单。我妻子确实拥有很多各种各样镶钻石和名贵宝石的黄金制品，110幅俄罗斯艺术大师的绘画，主要是巡回展览派艺术家的作品。在她那里还有一套家具，很多瓷器——主要是由一些俄罗斯老厂生产的，以及其他一些东西。我妻子住所里的所有财物都是她的私有财产，没有一件是非法侵占的战利品，只有两个无线电收音机是属于我的。如果国家全部侦查处能够公正无私地按我们的法律所要求的那样去进行侦查，这一切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证明。鲁斯兰诺娃的全部财产绝大部分都是在伟大卫国战争前以及我们结婚之前就拥有的。所有这些绘画、瓷器、各种珠宝首饰和家具在她的住所里已经有几十个年头了。在我妻子的熟人和朋友之中还有活着的证人，以及她原来的丈夫加尔卡维，他们都可以证明，这些财物确实是鲁斯兰诺娃的，而不是我或鲁斯兰诺娃侵吞的战利品。当我和妻子在德国的時候，战争过后我们是买了不少东西，餐具、面料、各种装饰品以及其他物品，顺便说一下，每一件物品购买时都保留有收据，这些收据都保存在我的住所里（卷宗里没有出现收据），从这些收据里可以得出结论，这些财物不是侵吞的，而是购买的。在我那里发现的三辆汽车被列入了侵吞的财物之列，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一辆双排座“霍尔赫”牌汽车是最高统帅赠送的礼物，对此有相应的文件证明。第二辆“霍尔赫”牌高级轿车是经占领军总司令的批准由我从作为战争赔款所交付的汽车之中购买的。我有这家公司出售汽车的发票。汽车运到莫斯科时，我已向莫斯科海关交纳了税金。所有的汽车都有相应的文件可以证明，这些汽车

不是我侵吞的。我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竟把当时还属于驻军房产管理部门的一套家具也作为我所侵吞的战利品，列入了在我的切尔尼亚霍夫斯克的住所里发现的物品的清单。除此而外，文件里甚至还将一辆 37 年生产的“别克”牌公车也作为我所侵吞的战利品写上了。

这样，一系列属于我妻子和我的各种财产和物品，都被算作是侵吞来的战利品。

我是否在侵吞战利品方面有罪呢？

是的，我是有罪，但在卷宗里写的那个数量。而我的妻子鲁斯兰诺娃无论如何都没有罪过，她与此事没有丝毫的关系。

侦讯进行了 3 年多的时间，我不知道，什么法律允许进行这样长时间的侦讯？我是 1948 年 9 月 18 日被逮捕的，而审判是在 1951 年 11 月进行的。

1951 年 10 月，侦查员把我带去对 256 页文件进行签字，在这里侦查员开始“训练”我怎样与检察长谈话。侦查员是这样开始自己的“训导”的：“怎么样，案件终于结束了，不排除检察长将同您（已经开始称呼‘您’了）谈话的可能性。应该预先警告您，如果您开始推翻自己的供词并谈论有关侦讯过程（尽管他应该直截了当地说——有关拷打、侮辱以及其他的行为），那么您只能是毁了自己。我们将再次开始侦讯，持续一年，或若干年。我将把您重新送回到列福尔托沃监狱，在那里我们一切将从头开始，并且比第一次还要严厉。这样，您的命运只能取决于您自己了”，等等，等等。简短地说，又开始进行恐吓，就像侦讯开始时所做的那样。除了遵循侦查员的“劝告”，我没什么能做的。在与检察长谈话时，对于所采取的侦讯手段我一个字也没提，并承认了自己的全部罪行。我对于法庭还抱有一线希望，希望在那里我能获得公正。但在开庭之前侦查员又召见了，并再一次“忠告”我，在法庭上应该如何表

现，如果我推翻自己以前的供词并向法庭说出遭到过毒打，那么只能加重我的罪行，并在监狱里被折磨致死，而现在的出路是去劳改营，在那里里还可以活下去。“记住一点，——侦查员说——您的命运已经无可更改地被决定下来了，什么也帮不了您。谁也不会相信您的话。我再一次劝告您，到了劳改营也别妄想写申诉状。记住一点，无论您写给哪里，都会落到我这里，留在我的办公桌上，再也不会出现在任何别的地方，而为此我们将把您拘禁在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的劳改营里，在那里您将结束自己的生命。”接受了侦查员的这些临别赠言，我在法庭上承认了自己的全部罪行。显然，原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虚构了某种阴谋，但是当这种不存在的阴谋再不能够被“制造”时，他们就让我以及其他军人去“参与”这个或那个案件，然后对每个人都进行单独的审判，以使我们长久地呆在劳改营里，并以此来掩盖自己破坏苏联司法权和法制的全部罪行。

我从来也不是，而且永远也不会是国家安全部侦讯处在其卷宗中把我变成的那种人，即反对苏维埃国家的人。我在苏联军队里忠诚地服务了30年，并三次在战场上（国内战争，同芬兰人的战争，伟大卫国战争）与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敌人进行英勇的战斗，在这方面我的良心是清白的。还有什么地方能像在战场上那样检验我对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忠诚呢？

我是否在侵占战利品方面有罪呢？

是的，我有罪，但不是那种强加在我头上的数量。自然，我坚决否认强加在我和我妻子头上的有关侵占各种贵重物品的说法（黄金、钻石以及其他物品）。我将严格要求自己。问题不在于侵占战利品的数量，而是在于侵占这个事实本身。这不是一名共产党员和苏联将军应该干的事情，这玷污了党员和将军的名誉。我应该受到惩罚，但是，我因为这些“鸡毛蒜皮”即通常所说的“毫无意义的

东西”而失去了党和政府的信任，失去了25年的自由（这意味着终生丧失自由，因为我已经56岁了）。我失去了家庭，失去了在战场上用鲜血换来的称号和奖励。我不相信，党和苏维埃政权会这样惩罚我。这是党和苏联政府的敌人干的。

如果接触我的案子并进行审理，那么里面所写的一切很显然从法律的角度是提不出任何异议的，但是你们现在将会弄清楚，这个案子是采用什么手段“制造”的。

我相信，真理必将胜利，原国家全部所采用的侦讯手段将会被党和苏维埃政权所揭露。这一时刻已经来临，我决定现在勇敢地写出这份声明，因为我知道，我的声明会到达它应到的地方，而不是落在侦查员萨马林大尉的文件夹里。

我请求苏共中央指派委员会对于我和我妻子鲁斯兰诺娃的案件进行重新审理。

恳求将通过的决定按以下地址通知我：伊尔库茨克州，泰舍特市，邮政信箱号码215/603。

囚犯 克留科夫

1953年4月25日

№09377

**克留科夫关于转呈声明副本  
致朱可夫的信**

(1953年5月4日)

致国防部副部长、苏联元帅朱可夫同志

请您原谅，我的信可能打断了您的工作，但是我的处境要求我必须这么做。

我于1953年4月28日（通过劳改营负责人）向苏共中央寄出了一份声明，但我担心它可能在路途中“丢失”，因此，我现将这份声明的副本寄给您，并请求您将它转呈党中央。

请您耐心地读完它，这样您就会清楚，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罪犯”。如果可能的话，请您在我的案子上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并协助恢复事实真相。

尊敬您的 克留科夫

1953年5月4日

№09378

**朱可夫关于转呈克留科夫声明  
致赫鲁晓夫的信**

(1953年6月2日)

致苏共中央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原骑兵军军长、1948年被逮捕的B.B.克留科夫中将给我寄来了一份声明，并请求将该声明转呈苏共中央。

我从1931年起就认识B.B.克留科夫，他是一名认真负责的指挥员，在反对希特勒侵略者的战斗中表现勇敢。

请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就克留科夫的声明给予指示。

格·朱可夫

1953年6月2日

№09379

## 赫鲁晓夫关于克留科夫的申诉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信

(1953年6月3日)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

1951年被判刑的原中将 B. B. 克留科夫给苏共中央寄来了一份声明。同一声明他也寄给了朱可夫元帅一份，并请求转呈苏共中央。

在该声明中，克留科夫写道，侦查工作进行了三年多的时间，在侦查过程中采取了不能容忍的体罚措施。他请求重新审理他和他妻子鲁斯兰诺娃的案件。

我将克留科夫的声明分发给你们。必须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应该核查和重新审理这个案件。

尼·赫鲁晓夫

1953年6月3日

分送：

格·马·马林科夫同志

拉·帕·贝利亚同志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

尼·亚·布尔加宁同志

拉·莫·卡冈诺维奇同志

阿·伊·米高扬同志

马·扎·萨布罗夫同志

米·格·别尔乌辛同志

№09380

## 谢列平关于朱可夫的言论 致赫鲁晓夫的报告

(1959年9月7日)

绝密

苏联部长会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1959年9月7日

第2668号密电

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今年的8月19日，因为克留科夫中将逝世，他的妻子，著名的歌唱家鲁斯兰诺娃举行了悼念酒宴，出席人员之中有苏联元帅谢·米·布琼尼和格·康·朱可夫。

在交谈过程中，在场人员就苏联部长会议1959年7月27日通过的关于军人的退休金及其家属的抚恤金的第876号决议提出了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朱可夫同志说，如果他是国防部长，他就不能允许实施政府所通过的关于军人的退休金以及他们的家属的抚恤金的新决议。

接着，他还说，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给予政治部主任、陆军将军戈利科夫以行动的自由，而后者正在把军队搞垮。

朱可夫继续说：“在《红星》报上天天都刊登文章，号召提高和巩固政治工作者的威信，批评指挥员。这种政策的结果将会导致

军队的瓦解。”

朱可夫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得到了布琼尼同志的支持。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所掌握的材料，苏联军队的绝大多数军官都能正确地接受苏联部长会议1959年7月27日就军人的退休金及其家属的抚恤金问题所通过的第876号决议。

与此同时，个别军人对于退休金方面的变化表现出了不健康的反应。

例如，苏共党员、土耳其斯坦军区第一集团军参谋长И.Д.帕宁上校在有許多军官在场的情况下说：

“决议是不正确的，整个军队将会散掉。任何一名军官都不会再服役了。”

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奥德萨军区第25集团军第987通讯营排长Г.А.巴拉诺夫中尉说：

“现在越早离开军队越好。我不想再继续服役了，谁也说服不了我。”

巴拉诺夫已经向指挥部提交了从苏联军队退伍的报告。

苏联共产党员、明斯克高级无线电工程技术学校的军官波兹捷耶夫上校说：

“在军队里服役没有意义，应该在还有能力在地方安置工作的时候复员，因为工人和职员待遇比军人要好得多。”

外高加索军区第145山地步兵师的连长库拉科夫上尉说：

“根据新的命令，只有40岁以上的军官才能保证退休金。没有服役到这个年龄就没有退休金。因此，在脑袋还完整时，应该离开军队。”

武装力量补充和人员统计处主任А.К.库兹明上校说：

“现在，我们军人的主要保护人约·斯大林已经不在，只有他才不会让我们受委屈。”

苏共党员、国防部房产管理局第6处主任、上校工程师瓦利科夫说：

“我们在埃及建大坝，帮助伊朗人，而自己却勒紧了裤腰带。有的人大吃大喝，而有的人现在将没饭吃。”

苏共党员、防空军莫斯科军区参谋部行政管理处被服部主任И.А.弗列贡托夫少校在讨论退休金问题时说：

“……我们苏联军官在部队服役20和25年后退役时的退休金已经这么少了，而根据新的命令退休金将会更少，这将会使人们怨恨并产生不健康的情绪，这些情况将会大大降低军队的战斗力。食品和日用品的价格没有降低，而退休金却减少这么厉害……”

苏共党员、第50摩托化步兵师炮兵参谋部主任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科维茨基中校说：

“政府不应该经常变更法律，否则人们将对明天没有任何信心。”

苏共党员、白俄罗斯军区第103空降师伞兵团连长А.Н.巴热诺夫上尉在讨论新决议时，在有許多军官在场的情况下说：

“……军官同志们，这件事情很严重，应该举行罢工，要知道我们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应该给中央写信和打报告，要求让我们转业，应该离开部队……”

也是这个团的军官雷切夫少校建议：

“……应该写要求转业的报告和军官对新决议不满的信，在师里进行空降训练时从飞机上向全体军官空投这些信件……”

在青年军官中也出现了这些不健康的情绪。

第192航空师无线电排排长B.H.罗谢普金上尉说：

“青年军官最好是离开部队，在经济部门找个职位，那里好歹还给套住宅，而这里连根本棍都没有。需要你的时候把你留下，不需要的时候就把你往各处推，哪怕你去加入匪帮，没有人会关心不

再需要的人。”

苏共党员、104空降师排长 П.П. 洛斯库托夫上尉说：

“我们的政府用这个决议来欺骗我们，就像欺骗手持债券的人们一样。能够相信今后不再变更退休金了吗？”

一些已经退伍的军官和后备役军官对新规定也持否定态度。

例如，苏共党员、后备役上校 П.А. 季科夫（白俄罗斯军区）说：

“……公布改变退休金的决议不是别的，正是苏联政府财政的破产，这在取消归还工人阶级债券之后被再度证明。在我们这里，人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不允许的。”

曾担任工程学院政治部副主任的后备役上校莫罗佐夫就已公布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退休金的决议说：

“……在部队干了一辈子，现在该帮助一下孩子们了……但现在对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标准——无论是打过仗的，还是卖汽水的。”

原后勤集团军副军长、退役上校克雷洛夫说：

“这样伤害军人是令人气愤的。现在，只有那些傻瓜才到部队去。不可能再吸引聪明的能干的人去服役了。如果我有儿子，我宁愿让他去工厂，也比到军校好。”

后备役上校巴布金（白俄罗斯军区）说：

“糟糕的是我们这里不稳定，法规经常变化，这导致人们缺乏信心。”

上述全部事实已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局向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边疆区委员会书记、州委员会书记以及各军区军事委员会作了通报。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亚·尼·谢列平

№09381

**苏共中央主席团  
关于处理谢列平报告所说问题的决定**  
(1959年9月11日)

绝密

致基里琴科同志，勃列日涅夫同志，苏斯洛夫同志；

苏共中央书记处

中央主席团会议第238号记录摘录

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谢列平同志）1959年9月7日第2668  
（密电）号报告

责成中央书记处根据中央主席团会议交换的意见，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谢列平同志）1959年9月7日第2668（密电）号报告中所述事实采取必要的措施。

中央书记

№09382

## 布琼尼关于朱可夫的言论 致苏共中央的信

(1959年9月18日)

苏共中央：

对于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阿·伊·基里琴科同志向我提出的问题，即我是否在8月19日与朱可夫元帅一起参加了克留科夫将军的葬礼和追念酒宴，在酒宴上朱可夫是否在有我在场的情况下说了关于军队被瓦解、毫无根据地提升费·戈利科夫同志、贬低罗·雅·马利诺夫斯基同志以及关于军人退休金问题的一些话？我现在作以下答复：

1. 我没有出席克留科夫将军的葬礼（当时我正在参加荣获红旗勋章的全苏支援陆海空军志愿者协会中央主席团会议）。

2. 我看见朱可夫总共只有5~10分钟的时间，是在鲁斯兰诺娃别墅的院子里，当时是晚上约7点左右，我和我妻子一同去看望鲁斯兰诺娃，在她最痛苦的时刻给予一点安慰。当时出席追念酒宴的人正在散去，其中也包括朱可夫元帅。

这次见面时朱可夫元帅没有说过任何类似的话。

谢·布琼尼

1959年9月18日

№09383

## 什维尔尼克关于处理朱可夫言论问题 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9年11月27日)

苏共中央：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已经了解到，在克留科夫中将葬礼期间，在苏联国防部二号楼里，苏联元帅格·康·朱可夫同志与后备役少将列维亚金同志就苏联部长会议1959年7月27日关于军人的退休金及其家属的抚恤金问题的决议进行了在政治上有害的谈话。

根据朱可夫同志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所作的说明，是列维亚金同志提出了关于缩减退休金的问题，列维亚金到他那里说：“我们这些老头子们感到委屈，靠新的退休金将难以生活。”接着，列维亚金同志还对朱可夫同志说，目前在很多退伍军官和后备役军官中有很多不良议论，在降低退休金问题上大家纷纷指责马利诺夫斯基。

但是，作为拥有高级军衔、又曾担任过国防部长的朱可夫同志并没有向列维亚金同志指出他的这种政治上不健康的行为的全部危害，而且在知道列维亚金同志在物质生活方面有充分保障的情况下没有对他进行反驳，也没对这一切做出必要的结论。他甚至支持这种非党性的言论，这些言论既是反对党和政府就调整退休金所采取的措施的，也是损害苏联国防部新领导人的威信的。

在提交给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说明报告中，列维亚金同志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听了我的意见后，朱可夫同志说，在研究关于

第一次降低退休金的问题时，就明确第一次降低要维持很长的时间。我立即说，显然，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政府面前没有坚决坚持将现有的退休金数额再维持一段时间。关于退休金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上，在本人出席的情况下，对于B.A.列维亚金同志（自1918年起为苏共党员）和格·康·朱可夫同志（自1919年起为苏共党员）的不正确行为进行了批评。

在自己的说明报告中，朱可夫同志对自己的行为给予了正确的评价，他说，最初他不认为与列维亚金的谈话有什么重要意义，而现在要对自己做出必要的结论。列维亚金同志也否定了自己的不正确行为。

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党的监察委员会决定就此结束这个问题的讨论。

什维尔尼克

1959年11月27日

No09384

## 谢米恰斯内关于朱可夫的情况

### 致赫鲁晓夫的报告

(1963年5月27日)

绝密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1963年5月27日

第1447/C号

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向您报告最近得到的有关原国防部长格·康·朱可夫情绪的情报。

在与以前共事的同志进行的谈话中，朱可夫详细地讲述了苏共中央主席团是怎样准备和进行关于免去他国防部长职务的会议的，并对中央主席团的某些委员进行了激烈的攻击。

朱可夫说，“整个这件事情可以按照另一种方式进行调整，也许我能够服从，但是我不可能去乞求。为什么我要去乞求呢？我感到自己没有任何罪过，不需要去乞求。强加于我的所有这一切，目的自然是很明显的……。”

在同过去一起在部队工作的一些同志的谈话中，朱可夫是这样评论罗·雅·马利诺夫斯基的：

“这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他善于阿谀奉承。他从来都不说反对的话。只会说‘愿意效劳’。‘是的’。他从不暴露自己的观点，

竭力去迎合别人。而目前正好需要这些……。”

在与后备役少将 И. М. 卡尔马诺夫交谈时，朱可夫说：

“我们这里……在援助方面存在着缺乏理性的商人式的挥霍。数十亿元飞向了宇宙空间。在加加林的飞行上面花费了40亿卢布。从来没有人问过，所有这些招待宴会，这些旅行，来我们这里做客，等等，这一切花费了多少钱……我看见了赠给皮杜尔<sup>①</sup>妻子的貂皮大衣。赠给代表团另一名成员的妻子的一套镶钻石的饰物，其中包括一枚镶12克拉钻石的胸针……现在做这种事的人更多了……斯大林有很多不好的方面，但是，没有人能够指责他不珍惜国家财产，哪怕是一戈比。他没有举行这么多的招待会，除了自己亲笔签名的书籍以外也不赠送任何人礼物……”。

在另一次关于出版《伟人卫国战争史》的谈话时，朱可夫说：

“……这是一部被粉饰了的历史。我认为，在描写历史方面，德国的将军们尽管也歪曲事实，但总的来说诚实一些，他们写得更真实些。而这部伟大卫国战争史绝对是不真实的。

现在都说，同盟国从来没有帮助过我们……但是要知道，不应该否认美国人给我们送来了这么多的物资，没有这些我们就不能形成自己的储备力量，也不能够继续战争……我们获得了35万辆汽车，这是多好的汽车呀！……我们缺少炸药、火药。造子弹缺这些东西。美国人确实在炸药和火药方面帮助了我们。他们给我们运送了多少钢板！如果不是美国人提供钢铁来帮助我们，难道我们能那么就调整好坦克的生产问题？而现在却把事情描绘成我们这里的一切都是自己的，而且很丰富。

这不是曾经发生过的历史，而是被描写出来的历史。它迎合当代的精神。对谁应该歌颂，而对谁应该保持沉默……而最主要的东

<sup>①</sup> 皮杜尔（1899-1983），时为法国总理。

西一字不提。他曾是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关于战争的最初阶段是可以指责我的。但 1942 年已经不是战争的初期阶段了。从巴尔文科沃、哈尔科夫开始，一直到伏尔加河。这段历史谁也没有写什么。他们同铁木辛哥一起溜掉了。让一个德军集群到了伏尔加河岸，而另一集群则到了高加索。他们隶属于西南方面军、南方面军。这曾是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我不知道，关于这一情况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说明，但是我要把发生过的所有的事情写出来，我不会宽恕任何人。我已经写了大约 1000 页。我打算再写 3000~4000 页，然后就可以进行编辑……”。

根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资料，朱可夫计划在秋天时带着家人前往国防部在南方的一个疗养院。这时，我们就可以采取措施来了解他已写完的那部分回忆录。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弗·谢米恰斯内

№0938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  
关于朱可夫问题的讨论记录  
(1963年6月7日)

绝密

致苏斯洛夫同志、勃列日涅夫同志、什维尔尼克同志、谢尔久克同志

中央主席团会议第100号记录摘录，1963年6月7日

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谢米恰斯内同志）1963年5月27日第1447-c号报告

责成勃列日涅夫同志、什维尔尼克同志以及谢尔久克同志召格·康·朱可夫来党中央，根据党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交换的意见对其进行警告性谈话。<sup>①</sup>

中央书记

---

① 本文件上有勃列日涅夫的以下文字：“根据委托，我和谢尔久克同志一起召来了朱可夫，并与其进行了必要的谈话。列·勃列日涅夫。1963年6月12日。”

№09386

## 谢米恰斯内关于朱可夫的言论 致赫鲁晓夫的报告

(1963年6月17日)

绝密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1963年6月17日

第 1651 /C 号

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兹向您报告，在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和齐·季·谢尔久克同志与朱可夫进行谈话之后，朱可夫对妻子所说的话：

[谈话的人说：]“我们召您来，是为了与您谈谈，并就某些事情向您提出警告。您那里常有各种各样的朋友，您也经常到朋友那里去。我们自然不反对您同谁见面，但你们在见面时进行了非党性的谈话。您谈到了 1957 年全会的准备情况，同时对赫鲁晓夫同志、勃列日涅夫同志以及其他中央委员作了令人不愉快的评价。就是说，您至今为止仍不赞成中央的决定，您还在那里暗中试图与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进行斗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件事就相当严重了。

第二个问题是，在宇宙航空问题上进行的非党性的谈话。说政府在航天火箭方面耗资巨大，执行的是不理智的政策，使加加林进行宇宙飞行的火箭耗资 40 亿卢布。说我们不爱惜国家财产，把资

金用以帮助发展落后的国家是领导人商人作风严重。举行各种各样的有几千人参加的招待会，送给人们各种贵重礼物，等等。好像斯大林在世时是另一种做法。大家都指责斯大林，说他脱离人民，等等。在全党、全国人民都为我们在宇宙航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万分喜悦时，您却反对党在这个问题上所执行的方针。

第三个问题。您仍在继续谈论马利诺夫斯基，说他是一个领导需要的、顺从的人物，说他是一个善于迎合讨好、阿谀奉承的人，等等。中央信任马利诺夫斯基。他是中央委员，部长，尼·谢·赫鲁晓夫同志信任他，这些非党性的谈话危害了党中央的威信。

第四个问题。说我们这里对伟大卫国战争的历史进行了不正确的描写，对它进行粉饰，是为一些人的利益而写的；说它对一些人的功绩保持沉默，但对另一些人过分地歌功颂德，而实际上他们是不配的。您还特别强调，是谁把德国人引到了伏尔加河，谁领导作战行动没有成功。说德国将军们所写的历史比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所写的历史要真实。然后又说不同意对美国人所给予的援助所作的评价。指的是运输工具、金属和其他方面。那时，可能每一个人都清楚，我们蒙受了多大的损失，而美国人有多大的损失。

第六个问题。我们召您来进行同志式的谈话，这些问题都是不可原谅的，如果任其继续发展下去，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出您应承担严肃的党性责任的问题。”

我说，对于1957年的决议我是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去接受的，并认为这一决定对于我来说就是法律。我从来没有在什么地方在某种程度上批评过它。我很清楚党的章程，我曾说过，我本人直到目前为止仍然认为，这像一块石头一样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除此之外我没有说过任何其他的话。对于决议中的那种表达方式我不能妥协。决议是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作出的，因此我没有可能对于冒险主义的说法提出否定的证明。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曾是一

名冒险主义者？在什么事情上我曾是冒险主义者？我加入共产党已经43年了，参加过4次战争，为了祖国丧失了健康，我在什么地方有过什么冒险主义呢？事实呢？这种事实是不存在的。坦白地说，这种不真实的评价直到现在还像一块沉重的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上。我坦率地向你们说明这一点。

关于评价以及批评党的中央全会的问题，我说，我从来没有进行过这样的谈话。请把这个人叫来，在这里当着我的面说一下这件事。我可以用脑袋担保，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也没有到任何地方去，没有同任何人会面。有各种人邀请我去谈谈，但我感觉到，他们对我特别关注显然是想从我这里了解一些事情，因此我避免各种会见，也不到任何地方去，除了我别墅的邻居——卡尔马诺娃，那里还有一对夫妇，是一名上校和他的妻子，以及我的4个熟人，此外再没有任何其他人了。我哪儿都没有去过，总之，脱离了这个世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因为我感觉到，每一步都可能有人挑衅……全会过去三个月后，我碰见了科涅夫。他问，为什么我不常来？我回答说：“我为什么要来呢，我已经退休了。”他说了几句，接着表示：“你总还是我们的老同志，为什么不来谈谈呢？”我说：“还什么老同志呢，你在那里当着大家的面公开声明说，我根本不是你的什么同志，也不是朋友。”“以前的事就不提了，你知道那时是什么情况。当时我们大家都感到这件事情很严重”……

关于卫国战争的历史。我说，这个谈话是子虚乌有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同任何人交谈过。也可能，有过在某种程度上涉及这样内容的谈话，但它完全被改头换面了。被描述成这里所说的那样。关于是谁将德国人带到伏尔加河的问题。就连你们自己也清楚，没有任何个人能够带来。

至于德国将军们是怎样描写的，真实与否。你们可以看看我在自己读过的书上作的简评，有很多书。我认为，我从未见到过、读

到过比德国将军的描写更不真实的书。确实，我写过这样的简评。我说，这种指责毫无疑问是很牵强的。看来，这样说或这样报告的人所表达的是他自己的观点，并将此强加于我。关于美国的援助问题，同样也是如此。我说，我曾经发表过很多讲话，写过很多文章，当时这都是公开的，我对于美国的援助及其在二战期间的牺牲作过相应的评价。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也是从什么地方弄来加在我头上的。

关于马利诺夫斯基，我现在也可以对你们直说，我不尊敬这个人。作为一个人来讲，我不尊重他。这是我个人的事情。任何人也不能强迫我，要我尊敬他，要我对他抱有好感。关于马利诺夫的这些谈话。那时，众所周知，他以前的妻子曾经写过一封让人非常震惊的信，我被责成对这件事进行侦查，我把他从远东召回，并进行了调查。这份材料已经转交给了国防部长布尔加宁。我不知道，这些资料现在在哪里。资料中涉及什么问题？是关于马利诺夫斯基曾拒绝返回祖国，滞留法国，在摩洛哥人的队伍里，好像自愿在那里服役直到1920年。而当高尔察克军队被粉碎后，他不知又为什么经过远东、经过高尔察克战线，自愿参加了红军。

关于这些情况，干部管理总局是非常清楚的。夏坚科也谈过这件事。斯大林也不信任马利诺夫斯基。他曾经在我这里担任过参谋长。我要求让他到哈勒欣河我这里来，但我的要求被拒绝了，出于政治考虑他不可能被任命。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利用赫鲁晓夫到远东的机会，他给赫鲁晓夫打电话进行挑拨离间，是针对我的。他说：“您要留心朱可夫。他会掐住你们大家的喉咙。”难道我能够尊敬这样打挑拨性电话对付我的人？他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后，戈利科夫对他随声附和，说这就是波拿巴，这就是拿破仑，他试图先夺取军权、然后夺取全国政权。如果我有企图，如果我在这方面有什么行动，那么为什么不逮捕我？如果在这件事情上确实存在着任何组

织基础的话。很清楚，我不仅不尊重他，而且也不信任他。这是我个人的事情。

对他说的这些，他似乎被告知：“……这也不是我们自己臆造出来的。也可能，有些添枝加叶，但有些谈话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是有过的。我们责怪您是因为，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坚决杜绝这些行为，中断与这些人的联系，不允许进行这样的谈话。那样也就行了，您可以留在党内，会为您创造相应的条件。而现在，您看，我们同您的谈话不是以什么别的方式，而是以警告的方式。”

按他的话说，对此他是这样回答的：“我说过，我不害怕。”我知道，很多人对我本人很感兴趣，他们知道我了解很多事情，因此每个人都竭力想在什么地方听到点什么话。我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我最怕的就是挑拨和造谣。我说，在工厂的党组织那里你们可以得到证明，在那里尽管有许多人试图和我谈话，但在那里我从来没有与人进行过任何交谈。我避免回答问题，或者给予一些我认为合适的答复。但是，至于你们把我召来、你们的谈话，那么我认为无疑是有益的。这至少使我能够看清楚我周围的人和我的同志。我非常感激你们请我来。他们问我：“这就是说，您对于我们召您来感到满意？”我说：“我没有理由不满意。”他们也承认，我是否满意都已表现出来了。我说，我非常感谢。

谈话的人似乎还说：“您看，我们对您非常关心和尊重。”

我说：“谢谢你们的这种关心和尊重。”然后我又说：“我实际上已经有5~6年时间什么事也没干了，但要知道，我还是一个有工作能力的人。”这是我在进行试探。“感谢上帝，我自我感觉身体很好，思维至今仍很敏捷，记忆力也很好，素质和知识方面都很好，还是可以使用我的。请使用我吧。我准备在任何岗位上为祖国效力。”

他们对我说：“是的，但这将取决于您今后的行动。”

我说：“我的行为任何时候都是讲党性的，但你们也看到了，效果并不很好。后来我为什么实际上被抛弃了呢，我不明白。我为祖国差不多贡献出了自己的一生，而我甚至被剥夺了在这个组织工作的可能性”。

“我阅读和写作。我也可以出示我所写的东西。我没有写任何不好的东西。我说，请向尼基塔·赫鲁晓夫转达敬意，并请谢谢他的关心。”

妻子问：“他们对你态度友好吗？你是怎样理解的？”朱可夫回答说：“还可以。谢尔久克特别好。我要说，进行谈话是正确的。有人向他们提供了材料，他们有责任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在我这里突然有这样的谈话。他们应该从我本人这里弄清楚。”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弗·谢米恰斯内

他们对我说：“是的，但这将取决于您今后的行动。”

我说：“我的行为任何时候都是讲党性的，但你们也看到了，效果并不很好。后来我为什么实际上被抛弃了呢，我不明白。我为祖国差不多贡献出了自己的一生，而我甚至被剥夺了在这个组织工作的可能性”。

“我阅读和写作。我也可以出示我所写的东西。我没有写任何不好的东西。我说，请向尼基塔·赫鲁晓夫转达敬意，并请谢谢他的关心。”

妻子问：“他们对你态度友好吗？你是怎样理解的？”朱可夫回答说：“还可以。谢尔久克特别好。我要说，进行谈话是正确的。有人向他们提供了材料，他们有责任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在我这里突然有这样的谈话。他们应该从我本人这里弄清楚。”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弗·谢米恰斯内